

吾輩愛自由，勉勵自由一杯酒。

# 五四 女性

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行者

王政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五四女性

近三十年前，《五四女性》英文版面世，在海內外漢學界引起巨大反響。書中記述了20世紀上半葉五位女性的生命歷程，她們作為女權運動的強力推手，身體力行地參與了中國近代社會的巨變。王政教授以其堅實的女權理論素養和充滿激情的筆觸，鮮活地呈現了這段被掩埋的歷史，揭示出中國婦女運動發展的種種悖論和歷史複雜性。這份詳實生動的女權主義族譜將為今天致力於女性研究和社會行動的群體提供極其實貴的資源。

——胡纓，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東亞系教授

此書於20世紀末問世時已令人驚艷，2025年增修中文版的推出，更為全球華人提供再思五四話語與性別解放的重要契機。王政教授援用自由主義女權觀，重估被馬克思主義壟斷的近代中國婦女及性別史。她以深入淺出的精彩行文，藉五位受五四洗禮的女知識人回顧並評價自身破舊立新、爭女權與愛國/黨的人生，檢視中國新女性建立主體意識與追求自主解放的發展及困境。書中對政治如何影響個人選擇、生命意義與歷史評斷的性別剖析，值得當代讀者再三反思。

——許慧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本書讓我們從社會性別的角度了解和理解五四時代、啟蒙的中國提供了絕佳的範例。書中對中國女權先驅的口述訪談，為近代中國的女權歷史保留了火種；文獻史料與口述歷史對讀式的研究，是開創性的，富有啟發意義。王政教授的研究和她筆下的中國女權先驅們的故事必定會激勵一代代後來者。

——陳雁，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

本書記錄了五位知識女性的生命軌跡——她們是校長、律師、主編、教育家與革命家。王政探討了女權主義思想與制度如何為知識女性開闢新道路，同時揭示她們持續面對的結構性困境。本書提醒我們：社會變革路徑具有多元性，存在差異化的過程，而絕非單一的線性演進。在思考當下與未來時，我們必須從歷史困境中學習。英文版面世25年後，在中國社會持續轉型的脈絡下，這項研究的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愈發突顯。

——賀蕭 (Gail Hershatter)，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歷史系榮休特聘教授

儘管歷史書寫慣於建構狹隘的女權主義（資產階級女權運動）與中共革命女權主義的二元對立，但個體女性的意識形態實踐往往超出這種非此即彼的框架。本書的五位婦女展現出她們的主體意識實為多重話語的混雜場域：她們既基於被壓迫的生命經驗萌發女權意識，又強烈渴望參與國族建構。王政透過精細的脈絡梳理，既呈現國共兩黨在婦女議題上的趨同，又剖析其背後的意識形態分野——這種比較視野打破了傳統革命史的單線敘事邏輯。

——文棟 (Wendy Larson)，俄勒岡大學東亞系榮休教授

透過揭示五四婦女運動與清末思潮的內在延續性，王政論證了若無早期的思想積淀，五四女性的理論與實踐都將成為無源之水——這一關鍵維度在主流歷史敘述中長期缺席。王政更呈現了另一個被忽視的面向：五四婦女運動內在的矛盾張力。她既剖析了男性知識分子言說與實踐的斷裂，也追蹤了女性參與者流動的主體立場（其轉變多源自於生命經驗而非國族考量）。透過這種多維度的交叉考察，本書為理解被遮蔽的多元女權主義傳統提供了範式的突破。

——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系主任

王政並沒有把受訪者僅視為背景史料，而是探討時間和記憶如何影響敘事的塑造。她更始終保持雙重翻譯意識：既關注西方術語在中西語境中的轉換，也留意代際間的語義變遷——如何將受訪者帶有時代烙印的詞彙，轉化為20世紀末的批判話語。本書既銘刻了女性的聲音，也將其置於歷史分析的框架中。這形成了對五四時期——對當代中國仍有深遠影響的時期——的獨特敘述，不僅富有啟發性和挑戰性，更為理解五四運動提供了批判性的視角。

——瑪麗蓮·楊 (Marilyn B. Young)，已故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





「她的現代史」書系

# 五四女性

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行者

王政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她的現代史」書系

《五四女性：現代中國女權主義先行者》

王政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25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978-988-237-326-6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cup.cuhk.edu.hk

■ HERSTORY SERIES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in Chinese)

By Wang Zhe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25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8-237-326-6

©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9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T., Hong Kong

Fax: +852 2603 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cup.cuhk.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 目錄

中文版序 / ix

鳴謝 / xxiii

年表 / xxvii

導論 / xxxiii

## 第一部分：女權主義與中國現代性

1 創造女權主義話語 / 3

2 女權主義傳播案例——《婦女雜誌》 / 35

## 第二部分：被遺忘的先行者

3 敘述者介紹 / 87

4 陸禮華 (1900–1997) —— 校長 / 111

5 朱素萼 (1901–2001) —— 律師 / 165

6 王伊蔚 (1905–1993) —— 主編 / 215

7 陳詠聲 (1900–1997) —— 教育家 / 257

8 黃定慧 (1907–2017) —— 職業革命家 / 295

結語 / 371

參考文獻 / 383



# 中文版序

本書英文原著的初稿源自我1995年完成的史學博士論文。1999年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後，受到英語學術界關注，因為這是首部從社會性別視角審視五四時期的歷史著作，並主要以我對五四女性的訪談作為第一手資料，書寫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女權主義的發展軌跡。我完成本項研究迄今已有三十年，此次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令我感慨良多，當年作為學子為本項研究所做的努力依然歷歷在目。我想中文讀者可能會對本書的寫作背景感興趣，在此就以「個人學術簡史」的形式談談我如何進入這個領域、這項研究對我個人的意義，以及今天我對自己三十年前著述的反思。

## 對女權主義史學由無知到著迷

1985年，我被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歷史系錄取，成為美國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出國前，我剛在美國福

布萊特文化交流項目舉辦的高校師資培訓班學了一年美國史，結業論文題目我選了「美國的職業婦女」。可能當時我作為高校青年女教師，在事業和個人生活方面都覺得有些困惑和迷茫，所以想了解一下美國職業婦女是啥情況。總之，班裏只有我選了個與婦女有關的題目，那位美國男教授也從來沒在課上講過美國婦女。同班的一位老師得知我論文寫美國婦女，並且即將去加州大學學習美國史，就找我說，美國史學會的秘書長劉緒貽教授想約我為他主編的美國史叢書寫一部美國婦女運動史。<sup>1</sup>在那之前，我連一篇文章都沒發表過，一下子有人約書稿，不免受寵若驚，連忙答應下來。去歷史系報到時，我就直接找了位美國婦女史教授做我的導師，專業研究領域自然也定了婦女史。當時的選擇完全是出於寫作任務的考慮，壓根兒沒想過我要做婦女史學者。在那個階段，我對文化比較研究興趣最濃，選了不少這方面的課，後來還獲得跨學科的「社會理論和比較歷史」課程的結業證書。

始料未及的是，美國婦女史的各門課程讓我感覺好像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啥都沒見過，啥都新鮮。1985年美國大學教的美國通史已經普遍運用社會性別 (gender)、階級 (class) 和種族 (race) 這三個主要分析範疇，婦女史更是處處體現了女權主義的批判性理論概念，對制度性、結構性不平等的剖析充滿獨到見解，每一部專著都解構了某種神話，或質疑了前人的一些定論。如果說這些特點是美國史學著述的共性，那麼婦女史又以獨到的視角審視了傳統史學從未關注過的領域。學習美國通史已經使我恍然大悟：「哦！原來歷史是可以這樣寫的！」學婦女史更讓我感慨無比：在我們中國學界尚未想到過的領域中，她們已經用筆如篋子般細細篋了一遍。婚姻、家務、生育、育兒、性活動、就業、職業、參政、教育、社會運動、社團活動、娛樂，等等等等，各種族各階級的婦女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許多歷史專著作詳盡的、各有側重的闡釋和探討。這大量的著述作為高等院校歷史課和婦女學課程的讀本，成為年輕一代的新知識。我以美國婦女史專業學生和中國來的研究者的雙重身分，在與中國學界和高等教育

界的比較中，清晰地看到美國女權主義學術活動對社會文化的改造作用，以及女權主義學術在中國學界的空白。每每手捧著一本美國婦女史專著閱讀時，內心就會有種騷動：像這樣的研究在中國還沒人涉及，而我是能夠做的。第二個學年尚未結束，我已打定主意：完成了美國史專業碩士學位後，我要學中國史，做中國婦女史研究。

## 向英語世界介紹中國婦女

幸運的是，在我轉到中國近代史專業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的那一年，曼素恩 (Susan Mann) 教授正好調到我校歷史系來了。她是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界推動婦女史研究的中堅分子。美國高校教中國史的教授本來就不多，能教中國婦女史的更是鳳毛麟角。於是我如願以償，順順當當地有了一位以扶持培養婦女史學者為己任的博士導師。日後我在國內各高校講課時，經常有研究生對我苦惱地訴說自己的男性導師如何反對她們做婦女研究課題，我在憤慨之餘，更深切地體會到自己的好運。

在曼素恩教授開設的中國婦女史課上，我很快接觸了西方學者這些年對中國婦女研究的成果。讀著西方學者寫的中國婦女研究專著，我的感受很複雜。西方學者在受到地域、語言和中國政治環境的限制下出了這麼多專著，可見這些學者的執著，我被她們的精神所感動。雖然與美國婦女史著述相比，1980年代西方關於中國婦女的研究涉及的領域要窄得多，課題的設計和問題的分析也不夠複雜深入，但這類研究在國內尚未出現。我們中國學界何時能出這樣的學術成果呢？我為這顯而易見的差距感慨而焦急。幾部主要著作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作了剖析和批評，書中的一些洞見令我深受啟發。比如對國家父權制在社會主義國家得到鞏固的分析、對婦女解放未能改造父系家庭和婚姻制度及其後果的透視等等，這些從社會性別視角重審中國歷史所迸發的新見解，以其獨特的穿透力深深震撼並啟發了我。字裏行間躍動的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更是令我傾心。



與此同時，對大部分著述我又有一種說不明白的不滿之處，捉摸許久才悟到：我對中國婦女在這些著作中的缺席感到不滿。進入1990年代，美國女權主義理論界的主流是反思西方中心主義；後結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批判性理論在西方人文學界的上升。在這個大背景下，我對西方的中國婦女研究著述中的問題才看得更清楚。她們的長處是分析體制性、結構性的弊病，短處是見制度不見人。究其原因，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受原始材料的限制。因為中國長期與世隔絕，不僅中國人對外界隔膜，國界之外的人也難以實地考察了解中國，中國研究專家也只能靠官方出版物來做分析判斷，得到的中國印象自然局限很大，也無法呈現中國老百姓的實際經歷。但在中國婦女研究著述中，不突出展現婦女的能動作用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那就是東方主義的影響——即使是西方女權主義學者，也往往難以完全擺脫這種視角的局限。在西方人的敘述中，包括早期西方女權主義的敘述中，中國婦女大多被描述成纏足、文盲等形象。儘管在女權主義的著作中這類形象的突顯是為了說明婦女受壓迫的普遍性，但它同時強化了中國婦女是弱者的刻板模式。這模式恐怕限制了一些中國婦女研究者的想像，以至於在設計研究課題時沒有把尋找中國婦女的能動性列為主要內容。而同期出版的大量美國婦女史著作就截然不同，你總能從中看到充滿生氣的、強有力的女性人物。

我這個有著美國婦女史背景的中國學生早就感到不服氣：我就不信中國婦女比美國婦女弱。從古至今我們有無數的巾幗英雄，美國大眾對此是聞所未聞的。在我自己的人生經歷中，我就見過許多不屬於弱者的婦女。我也從不認為自己是個弱者。正因如此，當我在美國看到中國婦女被表現為弱者和犧牲品，就感到特別不舒服。我這種情緒在美國女權主義學界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和對東方主義的批判中有所化解，但是一個情結不散：我要通過我的筆讓西方讀者了解中國婦女。

## 追尋女權前輩的足跡

作為出生在1949年後的上海、成長在毛澤東時代的女青年，我沒有質疑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婦女的大救星」這個官方定論。我的人生經歷很順利，在家是受到父母寵愛的小女兒，上學工作也從沒有因為自己是個女的而受到歧視。相反，有好幾次因為是女的而獲得男性所沒有的「優待」，比如作為知青在農場生活時被挑選去廣州交易會當講解員、被挑選去主演一部電影等等。1977年恢復高考，我以初中二年級的學歷考上大學，在大學裏被評為市「三好學生」，還被選為學生會副主席，畢業後又被留校當大學老師。在我看來，我的人生就是1949年後中國婦女被解放的寫照，尤其是在同我母親的強烈對比之下。我母親是裹過小腳的文盲，包辦婚姻嫁給我父親，生了九個孩子，操持家務一輩子。我母親在我眼裏就是中共宣傳中的舊社會被壓迫婦女的典型形象。在我的認知中，在「舊社會」不存在有自我解放的女人。

在美國婦女史課堂上學習女權主義歷史，我開始產生問題：美國女權主義運動都是女人自發搞的，怎麼中國婦女解放就是被動的，需要等大救星來解救的？那大救星沒誕生前中國女人都在幹嘛？轉到中國婦女史學習後，從書中我了解到20世紀初中國有過女權運動，但那些著述都沒有追蹤它的來龍去脈。我在出國前就從官方敘述中聽說過「失敗的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說法，國外學者倒沒有用這些負面的詞去定義，但是也沒有正面說清楚那女權運動是怎麼回事。美國的中國婦女史開拓學者瑪麗蓮·楊 (Marilyn Young) 在英語世界第一本中國婦女研究文集中，就問道：我們不知道當年女權運動積極分子的下落，參加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命運如何？留在城市的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我的好奇心被這些問題給刺激起來了，想追根究底，把我腦子裏更多的疑問都搞清楚。

在國內一直接受的說法是：資產階級的女權運動不適合中國國情，所以失敗了。對美國女權運動的考察使我了解到，雖然女權運動最初由中產階級婦女發起，但它涉及的婦女問題則涵蓋了各階級各種

族婦女的利益，一個多世紀以來也是因為各階級各種族的婦女的廣泛參與，才會跨越國界，不斷發展蔓延成為全球的婦女解放潮流。這個基於社會性別、包含多階級婦女利益和衝突的複雜動態潮流是「資產階級」這個詞所無法界定涵蓋的。但是中國的女權運動究竟是怎麼回事？如果它在20世紀初出現過，社會歷史原因是什麼？在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條件下婦女的自發社會運動能夠出現？哪些人為了什麼成為女權主義者？她們在何時又為何消失了？中國女權運動與美國女權運動相比會有哪些異同？……我被自己腦中不斷湧現的問題迷住了，決定博士論文就做這方面的研究。

1992年夏天，我帶著剛滿月的女兒和兩歲的兒子回到我的老家上海，開始了為期13個月的田野調查研究。在我的論文前期研究中，已經了解到20世紀初北京、天津、上海、廣州這幾個大城市的女權活動都很活躍，但是我回國做研究沒有任何資助，缺乏經費去外地調查。還在哺乳期的嬰兒也讓我無法出遠門。客觀條件的限制使我只能縮小研究的空間範圍，扎根上海開展調查。由於幾部出色的美國婦女歷史著作都是基於豐富的個人資料，如書信、日記之類，我也希望能找到當年女權活動家的個人資料，來深入探究她們的內心世界，於是遍訪上海圖書館、歷史博物館等史料收藏處，詢問是否收藏婦女的個人資料。接待人員一聽到我的問題，就流露出奇怪與不屑的神情：「我們這裏不收婦女的資料。」上海圖書館的館員告訴我：「我們這裏只收藏名人手跡，有孫中山和魯迅的書信。」我明白自己犯傻了，真是美國待久了，忘了國情了（自從1960年代女權運動以來，美國婦女自發籌款在全美多處設立婦女檔案資料庫，這也是美國婦女史學術繁榮的一個基礎）。心想還是找倖存的婦女活動分子訪談，希望大一些。通過我在上海的社會關係網，終於幸運地找到了一群出生於1900年到1907年的當年的婦女活動分子，她們很熱情地接受了我的訪談要求。用口述材料為主要史料，不是我預先的設計，而是無奈中另闢蹊徑。

這些老太太的歷史敘述使我震驚和激動：解放前竟有這麼大一群職業婦女早在自覺地追求婦女解放！我竟然對這些傑出女性在推動婦

女社會進步的艱難歷程上所創立的業績毫不知曉！顯然，我面對的是一個被歷史抹去的群體。這些在二三十年代曾經叱吒風雲的知識婦女很清楚自己今日的處境，一些人始終不甘於被歷史所淹沒。1930年代創立《女聲》雜誌的主編王伊蔚為自己準備了一塊墓碑，刻上了請朋友寫的碑文，記載了當年一起從事婦女活動的女友們的姓名和事跡，希望藉此讓後人了解她們這一輩人的奮鬥歷程。我慶幸能親耳聆聽她們的自述，我知道自己的使命是為這一代女傑寫出對得起她們的墓誌銘。

但我在返回美國時又很忐忑不安，因為從沒見過史學博士論文是用口述材料作為主要史料來寫的，我的導師們會接受嗎？可我的寫作衝動是如此強烈，心想，若不接受也罷，我反正早晚會把她們的故事寫出來的。沒料到，曼素恩教授讀了我的訪談錄音的英文轉錄稿後，立刻約我見面。她揮動著厚厚一疊訪談文字稿，滿臉興奮地對我說：「王政，這就是你的博士論文！」得到導師的首肯和支持，我半年裏完成了論文的寫作和答辯，然後就急急忙忙地回國搞女權活動去了（參加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非政府論壇活動以及和女權同仁們組織的一系列活動）。後來才知道曼素恩教授直接把我的博士論文推薦給了加州大學出版社。

## 用行動續寫中國女權主義歷史

1992年到1993年我在國內做田野調查時，「女權主義」是沒有人敢公開認同的貶義詞，因此我明明是研究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也不敢公開用這個詞，只是說尋訪早年婦女運動的積極分子。令我吃驚的是，當我同受訪的老太太聊起來，她們卻毫不忌諱地大談當年的女權活動。94歲的陸禮華對我說：「我參加了女權運動同盟會、婦女參政協會等十幾個婦女組織，凡是為婦女謀利益的組織，我都參加」、「女權是要爭的！不爭不行的！」93歲的朱素萼在1930年就開了律師事務所，經常義務為婦女打官司。談到自己年輕時的職業選擇時，她鏗鏘有力地說：「我就是為了伸張女權去學法律的。」無疑，對這些參與過女權活動的婦女，「女權」這個詞具有特殊的含義，無論如今的官方

話語如何貶低它，她們始終珍惜給了她們新的覺悟和力量，從而使她們成為「新女性」的女權主義。面對這些歷史親歷者，你無法說女權主義是因為不適合中國國情而失敗了。相反，這些歷史變革的參與者明明白白地告訴我，一個多世紀裏有幾代中國婦女為了自身的解放，在一個男尊女卑根深蒂固的男權社會裏，奮力去打破方方面面的性別藩籬；中國婦女的发展進步是女人們自己爭來的，而不是任何人恩賜的。正是「新女性」們身體力行地推動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的巨大變革，只是這段歷史被遮蔽了，「女權主義」也被污名化了，這個過程也就此成了我想解開的歷史之謎。

毋庸置疑，我的性別身分使我在聆聽老太太們的敘述時產生強烈的共情。我經常在採訪後，騎著自行車穿梭在暮色蒼茫的大街小巷中，思緒和情緒仍陷在剛剛聽到的人生故事裏。那是我不必抑制淚水、盡情宣洩情感的時刻。不僅是她們人生中的艱難困苦、悲歡離合令我動容，她們不經意之間講述的細節更是常常帶給我頓悟。22歲就創立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的陸禮華告訴我，她建立了兩江女子籃球隊，改掉了之前的長袖和燈籠褲的運動服，給女學生訂製了白色翻領短袖和紅色短褲運動衣，上場與滬上外國人女籃比賽，頓時成為上海灘的醜聞。輿論一致譴責兩江女籃隊員著裝「袒胸露臂露大腿」、「有傷風化」。我看著幽默地以此當笑料與我分享的老人，心想：「多虧了你和你同代女性的勇敢！不然我還得穿著長袖長褲下游泳池哪！」諸如此類的聯想在訪談中時時出現，她們這代女傑闖關越界的種種舉動就與我這晚輩享受的種種自由緊密相連，一種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那麼，作為在前人栽下的大樹下乘涼的後輩，我的歷史責任是什麼呢？身為歷史學者，我以書寫女權前輩的歷史為己任，努力整理出一份中國女權主義的「家譜」，四處彰顯。<sup>2</sup> 要為「女權主義」正名，首先自己就應「出櫃」。有了白髮蒼蒼的「五四新女性」的加持，我從此便在國內各種公共場合自豪地宣告，我是個女權主義者。當然，要真正不辜負前輩，我們後輩需要用行動續寫女權主義歷史。於是，我的

目標不僅是「寫」中國女權歷史，更是要「做」女權歷史。雖然我的女權行動始於1989年，遇到五四女權前輩使我對自己的人生目標更為明確和堅定。若是光「寫」不「做」的話，我心裏會對前輩有一份虧欠。所以，完成了博士論文以後的三十年裏，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推動女權主義學術在國內的發展，包括翻譯出版女權主義著作、組織召開國際研討會、舉辦高校師資培訓班和博士班，以助力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科在高校的建立。<sup>3</sup> 本書的讀者能理解，我為什麼會選擇這樣一種女權行動方式。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使我清楚地看到20世紀初葉女權主義話語在推動中國向現代社會轉型中的關鍵作用。任何人都可以想像一下這個歷史畫面：20世紀若無新女性的湧現，今天的中國會是怎樣一種面貌？而20世紀末中國男性知識分子群體的沉淪（他們拋棄了前輩以倡導女權為榮的立場，卻充當了排斥和反對女權主義的主力軍），則成為世紀末中國女性知識分子必須奮力重振和發展女權主義話語的社會歷史背景。如今這項女權主義話語運作的目標之一，是呼喚21世紀的「新男性」的誕生。

### 三十載後論長短

本書的缺陷與當年做研究時的局限密切相關。如前所述，缺乏經費和受限於母職，使我無法執行原先設計的全面調查20世紀初葉的女權運動圖景的方案。我不僅不能去台灣尋訪1949年離開大陸的許多女權運動核心人物，甚至都無法去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國民政府檔案。在上海做田野的大部分時間，我都是在徐家匯藏書樓埋頭於1949年前舊報刊雜誌裏，希望找到女權運動的蛛絲馬跡，結果是看到了五四時期鋪天蓋地的文章討論婦女問題。因為那時我讀過的關於五四時期的英語學術著作都不提婦女，就連周策縱先生被尊為最全面的經典之作《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裏，提到婦女的也只有簡略的一段。所以當我在藏書樓裏看到鋪天蓋地的關於「婦女問題」的長篇短論（儘管其中大多是抄

襲或人云亦云)，著實非常驚訝。頓然悟到：原來前面的歷史學者做五四研究，都需要把成堆的關於婦女問題的報刊雜誌文章從眼前扒拉開，才能聚焦他們感興趣的、無女人的「重大」議題。這意味著，我發現了一個不同於前人書寫的五四時期，且有俯拾皆是的第一手資料來佐證我看到的歷史，這令我興奮。

讀博士期間，雖然主修歷史，但我對當時美國學術界流行的各種批判性理論都非常感興趣。後結構主義對於話語 (discourse) 的理論闡釋在我看來是個很好的分析社會政治文化現象的工具，也是探究特定歷史中主導性話語與人的主體性構成之間的關係的有效途徑。在藏書樓文獻研究中遭遇到撲面而來的五四新文化女權主義話語，與我隨即幸運地追尋到的五四新女性，在後結構主義理論背景中形成了有機的結合，使我能沒有費太多周折便設計了對第一手文字資料和口述材料的組織結構和分析框架。即：用文本描述女權主義話語形成的歷史背景、用「新女性」的自述來考察女權主義話語與「新女性」主體身分建構的關係。如是，本書的主線是追溯女權主義話語與「新女性」群體的關係，以及這兩者的互動關係如何作用於 20 世紀中國社會文化變遷。

本書主角除了在求學、職業發展、經濟獨立、婚姻自主等方面具有共同特點外，都深淺不一地介入過各種有組織的婦女社會活動——承擔社會責任也是「新女性」的標誌，因此多樣的、有組織的婦女活動便成為書中一條副線。但是因為研究範圍的局限，我無法系統呈現民國時期多樣的女權運動。這個結果偏離了我博士論文的最初設計。最為遺憾的有兩點：一、當時我若能拓寬研究地域範圍，去北京、天津、廣州、南京尋訪，有可能找到更多尚健在的女權運動領袖人物。這樣的口述材料可能會幫助我理清有組織的女權運動脈絡，以及理解組織內部運作機制或矛盾衝突，也可以成為 20 世紀末大陸又出現的女權組織活動的歷史借鑑。好在進入 21 世紀英語和台灣學界都不斷有關於民國時期女權運動的歷史著作發表，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通過這些著述進一步了解民國時期多樣的有組織的女權活動。

二、本書關於民國時期婦女運動的史料較多利用了全國婦聯在1980年代出版的《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而那套史料集主要搜集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婦運資料，<sup>4</sup> 所以造成本書對國共兩黨婦女運動呈現的不平衡。雖然中共地下黨對國統區各類婦女組織有廣泛的滲透，但國民黨畢竟是執政黨，國民黨內的女權主義者的組織行動自然聲勢更大。本書口述者之一朱素萼曾經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領導成員，當年我若接觸到更多的國民黨婦女運動史料，本可以與朱素萼口述材料相互核對深入挖掘，使書中對國民黨的婦女運動有更符合歷史事實的關照。為了彌補英文原作中這方面的不足，我重新搜索三十多年前朱素萼的訪談錄音，將她關於國民黨婦運的描述都充實到中文版中。重聽各位口述者的錄音，也常常遺憾因為自己的學術準備不足、檔案研究不充分，面對這些歷史活檔案時沒能就婦女組織活動提更深入的問題，錯失良機。學術著作總是特定歷史背景中的產物。今日對民國時期女權組織活動沒有乘當事人還在世時深入探究的遺憾，其實更多是來自我過去幾十年從事女權實踐的種種挫折，才後悔當年沒有以一個實踐者的身分向前輩認真討教經驗教訓。那時尚缺乏女權運動實踐經驗，還太嫩，難以提出老道的問題。

儘管有種種遺憾，重溫前輩的口述錄音，我依然感到彌足珍貴：新女性自述獨特人生經歷的史料無法再覓得；她們豐富的人生經歷給我的啟發感悟是多方面的。英文原作表達了訪談給予我在認知上的諸多收穫。如今重讀，感到書中涉及到的一個議題需要更清晰的表述和更深入的探討，即：女權主義話語與女權主義運動的關係。這互相關聯的二者是既有重疊又有區分。女權主義話語產生的場域往往在知識文化界，而女權主義運動，無論圍繞何種議題，既是女權主義話語的效應，又是強有力地傳播和實踐女權主義話語的途徑手段。積極投身於有組織的女權活動的人必定是被女權主義話語浸潤過，但並非所有具有女權主義覺悟的人都投入女權組織活動。本書中的新女性既有同時駕馭女權組織活動與自己的職業發展的，如朱素萼律師；也有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職業，而選擇這些職業既是為了自身發展（追



求經濟獨立從而實現不依附男性的獨立人生)，也是為了促進婦女的社會進步，如陸禮華、陳詠聲投身於發展女子體育教育，王伊蔚選擇辦女子刊物。我們可以看到有女權主義覺悟的職業婦女們深刻地改變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文化景觀，其歷史作用並不亞於有組織的女權運動。或更準確地說，女權組織為在各職業領域拼搏的新女性提供了抱團取暖的場所，而職業婦女又是女權組織各項行動的重要依靠對象及經費來源。在民國時期，兩者是互相依存關係，都實踐著女權主義話語。只要有女權主義覺悟，則既可以通過組織活動爭取各項婦女權益，也可以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上從事改造男權社會的工作。這其實是女權主義革命不訴諸武力，卻在人類歷史上不同的政體中產生深刻社會文化變革的奧秘，也是傳播發展女權主義話語的重要性所在。21世紀隨著日益增多的有女權覺悟的知識女性佔據了有話語權的位置，女權主義更深刻的社會文化改造是必然趨勢，哪怕有組織的女權運動在特定時空中受到限制。

本書五位敘述者有各不相同的人生經歷，讀者自可從中獲得多樣的感悟。為了盡可能完整地呈現當年訪談的內容，也因為中文版容量可以大一些，我花了大量時間對每一份口述都根據錄音做了重新整理，而不是從英文原作翻譯成中文。五位敘述者為青浦人、常州人、湖南人（兩位）和福建人，前二位是用吳語交談的，後三位用帶著口音的普通話。我在文字稿中盡量忠實轉達她們的方言特色，原汁原味，讓讀者能較生動地感受到性格迥異、表述方式各不相同的「新女性」前輩的特點，從而去想像她們叱吒風雲的青壯年時期。同時也為了呈現20世紀上半葉，各地有條件的青年女子為了求學隻身奔赴上海的歷史潮流（只有黃定慧是中共派她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儘管我無法離開上海做調研，原籍在外地的前輩還是讓我們看到了20世紀初女權主義在中國各地傳播的景象。

十多年前，我因為需要在國內教婦女史，請了兩位青年學者將原作翻譯成中文，譯稿電子版在網上共享，有一定的傳播量。此次正

式出版的中文版，與那份電子版有較大的差別。除了重新整理口述部分、審校勘誤之外，我對一些關鍵詞根據歷史背景重新翻譯。如 gender equality，只要是「性別平等」這個譯詞尚沒在漢語裏出現的年代，我根據具體語境譯成「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權」。同樣的原則，women 也是根據時代背景譯成「婦人」、「女子」、「婦女」、「女人」。「女性」則用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一些情境中。詞語的變化折射了社會文化的變遷，也請讀者在閱讀時關注不同詞語在特定歷史背景中的用法，以加深對歷史的了解。

考慮到原作注釋中提到的許多英文學術著作與中文讀者關係不大，除非是被直接引用的，其他在中文版的注釋裏刪去，僅保留在參考書目中。同時，修改後的中文版引用了1999年（原作出版年份）以後出版的一些書籍，特此說明以免讀者困惑。

三十多年前與五四新女性的相遇，深刻地影響了我的後半生。在此與讀者分享她們的人生故事，衷心希望諸位和我一樣，不僅從中獲得歷史知識，還能增添改造社會的力量和勇氣。

王政

2025年2月25日

## 注釋

- 1 拙作《女性的崛起：當代美國的女權運動》於1995年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修訂後的再版於2025年由後浪出版公司出版。學習美國婦女史對我個人認知的轉變在此書中有詳細的討論。
- 2 關於瑪麗蓮·楊的另一個問題：「參加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命運如何？」除了本書有共產黨員黃定慧較大篇幅的自述作為部分答覆，我在本書完成後繼續追尋對這個問題的答案，並於2016年完成了第二部中國女權主義的英文專著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版即將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尋找國家中的婦女：社會主義體制中的國家女權主義（1949–1964）》。

- 3 有興趣了解我的女權行動和其他學術著述的讀者，可以瀏覽我的個人網頁：  
<https://sites.lsa.umich.edu/wangzheng/>。
- 4 中華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的《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中國婦女出版社，2011）民國政府卷兩冊，糾正了1980年代那套史料集的偏頗傾向，收集了許多非共產黨婦女運動的珍貴的史料。

# 鳴謝

這本書是我首次橫跨太平洋後一次漫長思想之旅的成果。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老師、朋友和同事，是他們為我開拓了新的知識景觀。

本書始於我的博士論文。我要特別感謝我的論文指導委員會成員曼素恩、露絲·羅森(Ruth Rosen)和唐·普瑞斯(Don Price)給了我學術上的指導和鼓勵。從我最初的訪談文字轉錄，到送交出版社的最後手稿，曼素恩都一直和我一起討論。如果沒有她在我探索論文主題和結構時的不懈鼓勵，這本書恐怕難以完成。我對羅森的感謝要追溯到我讀研究生的初期，正是在那個階段，她培養了我對婦女史的興趣。這本書最初的啟發來自於當年她講授的美國女權主義課堂中我和她以及同學們的無數討論。普瑞斯引導我進入了五四時期思想史研究，使得我對這一時期如此著迷。在本課題研究過程中，他對於民國時期的淵博知識都讓我受益匪淺。我的導師們也是我書稿的審校人，

在我的博士論文的幾次修改中，她／他們都認真地進行了很多文字修訂。可以說，本書文字的可讀性都得益於她／他們的幫助。

社會學教授韓格理 (Gary Hamilton) 在我讀美國史碩士學位時就邀請我合作，完成了將費孝通的《鄉土中國》向英語世界的譯介工作。那次合作使我獲益匪淺，也是我著迷於學習和思考中美社會文化差異的階段，本書中一些中美比較分析反映了當年與韓教授無數次討論時的思考。韓教授也是對我從事女權主義學術和活動始終熱情支持和鼓勵的良師益友。

我還要對兩位美國歷史學者表示深深感謝，他們對本書也有間接的影響。已故的羅蘭·馬香德 (Roland Marchand) 擁有超凡的智慧與道德力量，他使我領悟到做一個知識分子的意義以及做一個學者的責任。我最為遺憾的是他沒能看到本書出版。大衛·布羅迪 (David Brody) 指導了我研究生時的第一篇論文，他教會我追求思考與寫作清晰明瞭。我很慶幸在剛開始歷史學者生涯之際，就能遇到了這兩位導師。

我的很多朋友和同事閱讀過整篇論文，並給了我珍貴的評論和建議。她們的智慧、慷慨以及鼓勵使我備受鼓舞，也使得論文的修改過程更加順利。我要深深感謝高彥頤 (Dorothy Ko)、賀蕭 (Gail Hershatter)、瑪麗蓮·楊、凱倫·歐芬 (Karen Offen)、阿比蓋爾·斯圖爾特 (Abigail Stewart)、梅儀慈 (Yi-Tsi Mei Feuerwerker)、切麗·巴基 (Cherie Barkey)、姜進，以及一位匿名審稿者。歐芬還與我分享了她關於歐洲女權主義歷史的研究，這給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比較的視域。我還要感謝羅斯瑪麗·坎塔克拉斯 (Rosemary Catacalos) 以及在斯坦福大學婦女與社會性別研究所、在斯坦福婦女傳記研討會上的許多其他學者，感謝她們對於我就部分章節內容做的報告給予富有洞見的反饋建議。我也感謝貝蒂·瓦勒克 (Betty Vlack)，她協助潤色了訪談的翻譯；還有格瑞斯·埃克特 (Grace Eckert) 和佛蘭·布朗 (Fran Brown)，她們加強了本書部分內容的可讀性；羅伯特·伯根 (Robert Borgen) 和菲利斯·王 (Phyllis Wang) 則給我提供了寶貴的原始資料信息。

當本書還處於構思階段，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的婦女資料與研究中心就給了我一筆研究獎金，這鼓勵我展開了進一步的思考與研究。瑞德－史密斯獎金以及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的研究獎金，使我得以專心撰寫博士論文。我能獲得這些獎金都得益於曼素恩的幫助。

在中國，我的這項研究有一個龐大的支持網絡。為了幫助我獲取一手資料以及與受訪者見面，我的老朋友為我牽線、介紹我給新朋友認識。我的朋友圈擴大了，要感謝的人也增多了。我要衷心感謝以下這些朋友，他們對我的研究有著不可或缺的貢獻：顧光青、孔海珠、任萬祥、任順妹、宋鑽友、熊月之、王周生、潘頌德、沈智、李子雲、舒蕪、孫曉梅、杜芳琴、曲文、劉伯紅、徐安琪、戰車和張小瑩。我有幸採訪了許多在上海的前輩。儘管我沒有在本書中直接講述她們的故事，但是我對1949年以前受過教育的婦女的人生的理解主要來自楊之英、安志潔、李子雲、邵冠飛、龐蓮、謝祖儀以及已故的陳俊英。我感謝她們與我分享了她們的時光與經歷。劉光昆給我講了她母親劉王立明的一生，她的故事也是本書重要的組成部分。

我在上海的家人是這個支持網絡的另外一個部分。因為我丈夫留在美國工作，我的兩位姐姐秀芝和秀君，輪流幫我照顧我繡緞中的女兒和學步中的兒子。我對兩位姐姐感激不盡，因為她們分擔了我作為母親的責任，使我在投入田野工作時沒有後顧之憂。我的哥哥曉猷得知我在上海的研究沒有任何資助，就把他的公寓讓給我居住，他自己則在辦公室一間狹小的儲藏室裏住了一年。我還要感謝一位特殊的朋友郭敏君，在那段日子裏，她總是主動幫助我照看孩子。如果沒有上海各位親朋好友的鼎力支持，拖兒帶女的我就不可能完成在上海的研究。

最後，我想對與我分享其人生經歷的五四那代受訪者表達最深的謝意。本書獻給陸禮華、朱素蓁、陳詠聲、王伊蔚和黃定慧，她們不僅「給予」了我這本書的內容，還向我展示了一個中國女權主義的譜系，使我們可以從中追尋到自己的根。五位口述者生前都沒能讀到中文版。但我希望她們是安寧地離開這個世界，因為她們長期被遮蔽的人生故事將被年輕一代所珍視。

## 中文版補充鳴謝

自英文版於1999年出版至今，已經過去26年。這期間海內外學術界出現了不少關於五四女性以及民國時期婦女運動的中英文學術著作。限於篇幅，我無法一一列舉。好在如今互聯網便於有興趣的讀者搜索相關著述，本書中文版也引用了一些原作出版時尚沒有的學術著述。在此特別感謝美國西北大學博士研究生王一鳴提供的相關書目和著作信息，以及為書中引文的核對所給我的諸多幫助。也衷心感謝復旦大學陳雁教授，為了提供我急需的史料，她不辭辛勞地在暑假期間專門到學校資料室幫我掃描，並推薦懂滬語的倪馨蔚同學，幫助我轉錄陸禮華的錄音；在此感謝倪同學的熱情相助，為中文版口述方言的復原出力。上海理工大學的章羽老師幫助了我轉錄文字；美國西北大學的博士生陳冕也熱心幫我搜尋史料，在此一併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林驍、陳沅宜和彭騰為中文版所做的耐心細緻的辛勤付出，是本書順利完成的關鍵，在此深表謝意。最後要感謝十多年前將原作譯成中文的兩位青年學者侯艷興和趙婧。除了口述部分外，此中文版其餘的文字是以那份譯稿為基礎修改而成。

# 年表

| 紀年   | 口述者生平        | 時代背景                                        |
|------|--------------|---------------------------------------------|
| 1895 |              | 中國在中日戰爭中戰敗，清朝（1644–1911）存續。                 |
| 1898 |              | 百日維新期間，中國人創辦的第一所女校《經正女塾》在上海設立；維新派主張興女學、廢纏足。 |
| 1900 | 陸禮華和陳詠聲出生。   | 義和團運動爆發。                                    |
| 1901 | 朱素萼出生。       | 清廷在《辛丑條約》中接受了西方列強的條款。                       |
| 1903 |              | 女權主義著作《女界鐘》出版，引領了一個時代的婦女出版物和婦女活動。           |
| 1905 | 王伊蔚出生。       | 科舉制被廢除。                                     |
|      | 陸禮華和陳詠聲開始上學。 |                                             |
| 1907 | 黃定慧出生。       | 清廷頒佈了《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                  |
| 1908 | 朱素萼開始上學。     |                                             |



|      |                                         |                                                |
|------|-----------------------------------------|------------------------------------------------|
| 1911 |                                         | 清朝被推翻，中華民國成立，軍閥混戰，爭奪政權。                        |
| 1912 |                                         | 女子參政運動興起，但不到一年就被鎮壓。                            |
| 1913 | 黃定慧開始上學。                                |                                                |
| 1915 | 陳詠聲離開長沙前往上海，進入中國女子體操學校。                 | 《新青年》創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發端，引發了關於婦女問題的大討論。              |
| 1916 | 陸禮華離開青浦前往上海，進入中國女子體操學校。                 |                                                |
| 1919 | 陸禮華和陳詠聲參加了上海的五四運動。                      | 五四運動爆發。關於婦女問題的討論進入主流媒體。很多城市實現了男女同校；婦女解放成為時代標誌。 |
|      | 黃定慧在長沙的周南女校學習半年後回到了武昌。                  |                                                |
|      | 朱素蓁離開常州來到上海，進入愛國女校學習。                   |                                                |
| 1920 | 陳詠聲從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體育師範學校畢業，成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系主任。 | 北京大學成為中國第一個男女合校的高校；中國共產黨成立。                    |
| 1921 | 王伊蔚離開哈爾濱來到上海，進入中西女塾學習。                  | 中共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上海召開。                                |
| 1922 | 陸禮華創辦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學校，加入婦女組織，結婚。              | 女權運動同盟會和女子參政協進會在全國範圍內建立。                       |
| 1923 | 陳詠聲進入美國貝勒女子大學學習。                        |                                                |
| 1924 | 王伊蔚進入北京的京師高中學習。                         | 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婦女國民會議促進運動開展。                        |
|      | 陸禮華參加國民會議促進運動。                          |                                                |
|      | 黃定慧結婚。                                  |                                                |

|      |                                                 |                                                |
|------|-------------------------------------------------|------------------------------------------------|
| 1925 | 陸禮華離婚，組建中國第一支女子籃球隊。                             | 五卅慘案發生。國民革命繼續高漲。                               |
| 1926 | 黃定慧參加國民革命，成為武漢婦女部部長和中共黨員。                       | 北伐戰爭開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兩黨領導的婦女運動蓬勃發展。 |
|      | 朱素蓴進入上海法科大學。                                    |                                                |
| 1927 | 陳詠聲從貝勒女子大學畢業。                                   | 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控制了大部分中國，共產黨員成為被追捕者。           |
|      | 黃定慧擔任武漢三八節慶典的主席，並和宛希儼結婚。在國共合作失敗後，夫婦倆被派到南昌做地下工作。 |                                                |
| 1928 | 朱素蓴加入國民黨。                                       |                                                |
|      | 陳詠聲回到上海。                                        |                                                |
|      | 王伊蔚進入復旦大學。                                      |                                                |
|      | 黃定慧生下第一個兒子，三個月後宛希儼犧牲。                           |                                                |
| 1929 | 黃定慧被派到上海，她的兒子被送往宛家。她和賀昌結婚；企圖自殺；因罷工被關進監獄一百多天。    | 共產黨在上海組織大規模的工人罷工。                              |
|      | 陸禮華和顧正來結婚。                                      |                                                |
|      | 陳詠聲成為山東第一女子師範學校首任女校長。                           |                                                |
| 1930 | 朱素蓴畢業，結婚，創辦律師事務所。                               | 國民政府頒佈《中華民國民法典》，規定了婦女的平等權利。                    |
|      | 黃定慧在香港生下第二個孩子，隨賀昌被調到天津，兒子被送人。                   |                                                |
|      | 陸禮華在江灣建設學校新校區。                                  |                                                |

|      |                              |                                                  |
|------|------------------------------|--------------------------------------------------|
| 1931 | 陸禮華帶領女子籃球隊前往日本。              | 日本入侵滿洲里；愛國救亡運動遍佈全國。婦女積極參與其中。                     |
|      | 黃定慧接到特殊任務，與賀昌分離。             |                                                  |
| 1932 | 王伊蔚畢業，創辦《女聲》。                | 一·二八事變在上海發生，日本軍隊與中國軍隊在閘北交戰。                      |
|      | 陳詠聲在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               |                                                  |
| 1935 | 王伊蔚停辦《女聲》。                   |                                                  |
|      | 黃定慧與陳志皋結婚。                   |                                                  |
| 1936 | 陳詠聲在參加完奧運會後遊歷歐洲。             |                                                  |
| 1937 | 陸禮華的學校在八一三淞滬會戰中被毀。           | 日本軍隊全面入侵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組成抗日統一戰線；抗日戰爭開始，婦女抗日救亡組織在全國猛增。 |
|      | 陸禮華、黃定慧和朱素蓁在戰時上海婦女組織中擔任領導角色。 |                                                  |
|      | 王伊蔚主編《廣東婦女》。                 |                                                  |
| 1938 | 朱素蓁成為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和《中國婦女》的主編。 |                                                  |
|      | 陸禮華在重慶開辦兩江分校。                |                                                  |
| 1942 | 黃定慧被關進監獄，剛生下的孩子夭折。           |                                                  |
| 1943 | 陳詠聲在日本佔領之際離開上海工部局女中。         |                                                  |
|      | 王伊蔚在上海中西女塾教書。                |                                                  |
| 1944 | 黃定慧從監獄釋放。                    |                                                  |
| 1945 | 王伊蔚重辦《女聲》。                   | 日本投降。                                            |
|      | 朱素蓁擔任上海婦女聯合會的常務委員和務光女中校長。    |                                                  |

|      |                           |                                |
|------|---------------------------|--------------------------------|
| 1946 | 陳詠聲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內戰開始。                  |
|      | 陸禮華努力收回自己在上海學校的校址。        |                                |
| 1947 | 陳詠聲取得碩士學位。                |                                |
|      | 陸禮華在上海開辦兩江中學。             |                                |
|      | 王伊蔚停辦《女聲》。                |                                |
| 1949 | 陳詠聲開辦中國第一所殘疾兒童學校。         | 共產黨接管中國大部分地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全國婦聯成立。 |
|      | 朱素蓁的學校被政府接管。              |                                |
|      | 黃定慧的黨籍被華東局領導饒漱石否認。        |                                |
| 1950 | 陸禮華的學校被政府接管。              | 中國加入朝鮮戰爭。                      |
|      | 王伊蔚當家庭教師。                 |                                |
| 1951 | 陳詠聲被自己創辦的學校解僱。            | 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                     |
| 1952 | 陸禮華開辦一家編織合作社。             |                                |
| 1954 | 陳詠聲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任教。           |                                |
| 1955 | 陳詠聲接受政治審查，辭職。             | 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                     |
|      | 朱素蓁被關進上海監獄。               |                                |
|      | 黃定慧被關進北京監獄。               |                                |
| 1957 | 朱素蓁被保外就醫。                 | 反右運動開始。                        |
|      | 陳詠聲開了一家按摩診所。              |                                |
| 1958 | 陸禮華的合作社被收歸國有，分配進羊毛衫五廠當工人。 | 大躍進開始；婦女被動員參加社會生產。             |
| 1962 | 王伊蔚進入文史館。                 |                                |
| 1963 | 黃定慧從秦城釋放，緩刑三年。            |                                |

|      |                     |                      |
|------|---------------------|----------------------|
| 1966 | 黃定慧、朱素蓁、陳詠聲和陸禮華被抄家。 | 文化大革命開始。             |
|      | 黃定慧第二次被關進秦城。        |                      |
| 1975 | 黃定慧從監獄釋放。           |                      |
| 1976 |                     | 毛澤東去世，對毛澤東時代的重新評價開始。 |
| 1978 |                     | 中共開始對毛澤東時代的冤假錯案人員平反。 |
| 1979 | 朱素蓁平反。              |                      |
| 1980 | 黃定慧和陸禮華平反。          |                      |
|      | 陸禮華進入文史館。           |                      |
| 1981 | 黃定慧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                      |
| 1982 | 陳詠聲進入文史館。           |                      |
|      | 陸禮華成為上海市政協委員。       |                      |
| 1983 | 朱素蓁進入文史館。           |                      |
| 1993 | 王伊蔚去世。              |                      |
| 1997 | 陸禮華和陳詠聲去世。          |                      |
| 2001 | 朱素蓁去世。              |                      |
| 2017 | 黃定慧去世。              |                      |

# 導論

## 以社會性別視角看五四時期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語境下，「女權主義」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貶義詞。在中國共產黨的文本中，「女權主義」一詞總是與形容詞「資產階級」以及修飾詞「西方」聯繫在一起。將女權主義從官方話語中剔除，不僅是從公眾記憶中抹去了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也順理成章地把中國共產黨描述為中國婦女的大救星。女權主義的「失敗」成為中共婦女解放路線「成功」的鮮明對照。在毛澤東時代以後，重估西方女權主義的努力成為部分中國知識分子挑戰毛時代官方話語的嘗試。<sup>1</sup>然而，中國婦女解放歷史的官方敘述仍然沒有受到質疑。<sup>2</sup>

在西方學術界，中國婦女解放是自1970年代初以來關於中國婦女的著述中一個持續不斷的主題。許多女權主義學者集中討論共產黨的革命與婦女解放的關係。這反映了西方女權主義者的關注點是社會主義與

女權主義之間的關係。由於難以接觸到第一手資料，1980年代的大部分著作都使用共產黨的政策和官方文件來闡釋中國婦女的近現代歷史。其不可避免的結果是，這些著作中的婦女不能以社會變革的能動者身分出現。讀者無從知道，歷史中的婦女在面對其所處環境時是如何反應、應對、抗爭或者改變周圍環境的，也不清楚各類婦女在社會、政治、家庭領域的權力關係中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總之，在這類以官方文件為史料的著作中，中國婦女往往成為歷史進程中無足輕重且面目模糊不清的群體。

我的研究源於對解構主流歷史敘述的政治興趣，同時也是出於對那些關於中國婦女的敘事卻缺乏婦女主角的著述深感不滿。為了將關注點從黨轉移到婦女，來探尋婦女的能動性，我的研究問題不假設黨的領導是婦女運動的前提。我好奇的是，在「救世主」誕生之前，中國婦女都在做什麼？這個問題把我的注意力引向了中國政黨勢力尚弱，婦女活動卻風起雲湧的時期——五四時期（1915–1925）。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統治後不久，處於政治動亂狀態的民國進入了一個思想空前活躍的時期。後來被稱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和社會的發酵劑，在中國城市地區催生了一個女權主義激盪、婦女在各界積極行動的新浪潮。男性知識分子在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討論「婦女問題」，並在整個五四時期都繼續著這個話題。<sup>3</sup> 儘管中國婦女狀況一直是19世紀末以來改革者的關注焦點，辛亥革命還伴隨著第一場婦女參政運動，使「女權」一詞在20世紀初就進入中國公眾話語，但是「婦女問題」這個詞在五四時期得到了最為廣泛的傳播與普及。<sup>4</sup> 關於婦女問題的公眾意識迅速崛起，與此相應的是婦女追求女權的參與度也在急劇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者宣稱這一時期開啟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認為五四時期孕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他們的論述中，五四運動為創建中國共產黨鋪橋搭路，而中國共產黨則領導婦女走上一個無產階級婦女運動的更高階段。中國婦女從此走上了通往光明未來的「唯一正確」道路。雖然我不同意這種帶有目的論的歷

史觀，也不支持中共領導的婦女運動是「唯一正確」的說法，但我贊同五四時期對於中國婦女來說是一個獨特而且意義重大的時期。在本書中，我將闡明在五四時期中什麼是我認為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在我開始研究五四時期婦女問題後不久，就注意到了一個特別的現象。雖然五四時期對中國和西方的學者都有強烈的吸引力，但這一時期的西方學術很少討論婦女，儘管關於「婦女問題」的史料很豐富且易於獲得。二十多年前，在一部研究扎實的博士論文中，露克珊·維特克 (Roxane Witke) 表達了她對這一現象的驚訝。她認為這些學者不討論婦女的主要原因，是這類研究會被歸入「婦女史」，因此不能超越「偏狹或自己承認的少數人的歷史的水平」。<sup>5</sup>到了1990年代，當社會性別已經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分析範疇，關於這段歷史的研究若忽略了社會性別討論，則會被認為是偏狹且不完整的。五四時期的社會性別議題不僅顯示了中國「現代性」所具有的文化和歷史特性，而且也塑造了20世紀的中國社會。通過探討社會性別議題，本書的研究嘗試重構五四時期的歷史。

一直以來，五四時期都是學者表達價值和立場的競爭場域。保守主義學者認為新文化運動要為破壞中國傳統文化承擔責任。雖然文化保守主義者們的思想追求和信仰各不相同，但是對五四的批判卻反映了他們要挽救儒家傳統的共同願望，並以此回應在社會巨變中所遭遇的方向迷失。<sup>6</sup>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的共產黨學者，把五四時期界定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必經階段。在這些學者看來，五四運動是由中國無產階級的代表所領導的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這一觀點合法化了中國共產黨掌握領導一場「不可避免」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權力。中國和西方的自由派歷史學家將新文化運動稱之為「中國啟蒙運動」。1980年代，中國自由派學者為了解構毛澤東時期主流話語，開始共同努力復興五四時期的啟蒙遺產。在由著名男性知識分子建構的公共記憶中，「民主」與「科學」變成了五四時期的唯一主題。1990年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社會、文化的快速變化中，對於許多自由派知識



分子來說，展開對五四時期的討論既是一種自我探索的方式，也是找回其精英地位的一種策略。<sup>7</sup>

我對五四時期婦女的調查把我引向了這些論爭。雖然我的研究看似受到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挑戰官方霸權話語的影響，其實我的目標是對五四時期做社會性別分析，這樣的視角和分析方法迥異於那些具有社會性別盲點的中西方自由主義學者。事實上，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關於五四的討論很大程度上由男性主導，社會性別議題被擯棄，因而很少能吸引女性讀者。我是以自己的立場進入這場論爭，我所秉持的是女權主義視角，即將婦女作為學術研究中的一個正當主體，將社會性別作為歷史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維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我的研究試圖打破男性在五四研究這一競爭場域的壟斷地位。

正如五四婦女運動是由同時期西方女權運動所激發一樣，我對五四時期女權主義的研究也是受了當代女權主義的啟發。過去十年西方女權主義的發展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性別建構的文化和歷史具體性，以及婦女經歷的多樣性。「普世的女人」在1990年代聽起來像一個幼稚的概念，我們需要更深入地理解社會性別化的歷史過程中跨文化的異同之處。因此，本書將五四女性置於中國婦女爭取解放的具體歷史和文化背景中來考察，並將她們的具體經歷與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歐美婦女進行比較。

當然，這不可能是一項系統的比較研究，對諸多個案用一套變量來考察。五四女性與世紀之交的歐美女權活動家差異甚大，甚至無法找到一組相同的變量。我的研究主題需要用蒂利（Charles Tilly）所稱的個體比較法，來表達研究者對「確立究竟什麼是特殊歷史經驗的特殊性」的關注。<sup>8</sup>我的目的不是要尋找跨文化間婦女經歷的普遍性，而是要突顯五四女性的獨特經歷，同時彰顯中國婦女和歐美婦女爭取解放的異同之處。

本研究中的跨文化比較絕非隨意為之。歐美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進入中國。在五四時期，西方女權主義文本的翻譯（許多是譯自日文

版)和西方婦女運動的討論，構成了新文化運動者倡導女權的大部分內容。為什麼西方女權主義能夠吸引中國觀眾？西方女權主義在中國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女權主義對中國婦女究竟意味著什麼？中國女權主義的命運與西方女權主義的命運有何不同？沿著這些問題的軌跡，比較的視角有助於加深我們對女權主義作為一種國際運動的理解。

最後，這項研究考察了近現代中國女權主義話語的建構。我的問題是：是誰在中國提倡女權主義？誰有資格這麼做？那些有權推動這一話語的人處於怎樣的地位？誰從中獲得了他或她的與眾不同的特質和威望？五四知識分子的話語實踐創造了什麼樣的主體位置(subject position)？這一時期創造的主體位置與婦女有何關係？擁抱了新的主體位置的婦女的政治結局如何？我帶著這些問題進入研究主題，闡釋了新文化運動者作為一種社會力量的出現，與這一階段創造的婦女新主體位置之間的關係，以及中國現代性與婦女解放之間的關係。總之，這項研究試圖闡明的不僅是五四時期「新女性」的話語建構，也是五四時期男性話語權形成的社會性別化過程。

我選擇的研究方法與能獲得的史料有關。五四時期男性創作的文本極其豐富，我用了這些文本來研究五四話語的形成。為了彌補這些文本的不足，我將提供五四新女性的口述史資料，這些資料基於我在1993到1995年間所做的訪談。利用這些訪談材料，我試圖分析那些標誌了五四時期主體性的詞句和術語，並辨別這個時期產生的哪些術語和概念對婦女有意義。簡而言之，我用女人自己的言說來重構五四新女性的主體位置，而不是僅僅從男性的文本中尋找女性的主體性。這一方法使我得以探索男性創作的文本與女性思想覺悟之間的聯繫。

五四時期，不同的作者使用「女子主義」、「婦女主義」、「女權主義」、「女性主義」、「弗彌涅士姆」等詞語來指稱「feminism」。「Feminism」沒有固定的中文翻譯，也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想把握西方女權主義的複雜內涵所做的努力。那些堅持在翻譯和寫作中使用「女子主義」、「婦女主義」、「女性主義」和「弗彌涅士姆」的作者，想要呼

籲讀者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即「feminism」比爭取婦女平等權利具有更豐富的內涵。但是，由於「女權」（婦女權利）這個詞在「feminism」傳入中國前很長一段時期都被用來表示歐美婦女運動，並且相比「女子主義」、「婦女主義」、「女性主義」或「弗彌涅士姆」，「女權主義」能表達更確切和清晰的含義，加上婦女的平等權利是許多中國女權主義運動的參與者直接關切的議題，所以民國時期使用「女權主義」比其他詞語更頻繁。不像在日本，「feminism」（フェミニズム）的音譯使其明顯區別於「women's rights」（婦女權利）；在中國，音譯詞「弗彌涅士姆」的傳播未能超出介紹女權主義的文本的範疇。作為表意文字的中文更傾向意譯而不是音譯，這使得那些想要用「弗彌涅士姆」來向中國人表達女權主義那更全面而複雜含義的譯者遭到了挫敗。

在毛澤東時代，沒有公共論壇可以討論女權主義，因而黨擁有界定「feminism」的絕對權力。在共產黨關於婦女運動的文獻中，「女權主義」成為「feminism」具有確定含義的唯一譯法。女權主義與「資產階級」和「西方」聯繫在一起，因此是貶義詞。在黨的界定中，「女權主義」意味著資產階級婦女對平等權利的狹隘追求，卻不介入政治或者經濟制度的革命。不過漢字「權」也可以被理解為「權力」，「女權主義」因此與婦女追求權力的形象結合，這種形象在文化大革命後引起的負面情緒不亞於「西方資產階級」這一抽象概念。中國文化傳統中千百年來對女人篡權的恐懼，文革期間似乎在江青身上得到證實和強化。而1989年之後民間對「權力」的訴求更成為政治禁忌。在這一政治背景下，中國新一代的女權主義策略地採用了「feminism」的另一種翻譯：「女性主義」。但是在1980年代後期上升為主導地位的「女性味」（femininity）社會性別話語中，「女性主義」一詞有時被理解為等同於「feminism」，有時則用來指對所謂「女性特質」的新研究。雖然對「feminism」一詞的翻譯不盡相同，令人困惑，不過黨不再壟斷對「feminism」的定義。<sup>9</sup>

這些不同的中文詞都是「feminism」的譯法，看似回譯成英文是一個簡單的任務。但當我試圖將「女權」翻譯成英文時，卻有些猶

豫。沒有「主義」的「女權」一詞，既包含有「婦女權利」的意思，也有「feminism」的意思。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使用「feminism」來表示「女權主義」和「女權」，因為五四時期這些詞都被等同於「feminism」來使用。比如，我把「女權運動同盟會」翻譯成「Feminist Movement Association」。但當「女權」出現在「feminism」引入中國之前的公開文本中，或者言說者特指「婦女權利」時，我就會翻譯成「women's rights」。<sup>10</sup>我之所以討論翻譯問題，是希望讀者不僅注意到英文詞「feminism」在中國有著語言學上的持續爭論，還要留意「feminism」在不同語境中不同譯法的細微差別。讀者會在書面文本和敘述者口述中遇到各種不同的譯法。甚至「女權主義」一詞本身的含義也有許多細微差別，這取決於誰在使用這個詞。這些差異反映了多種話語博弈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的政治勢力都有她/他們對「feminism」的理解和定義。通過研究這一歷史過程，我試圖闡釋現代中國的一個悖論：儘管五四女權主義議題早就進入20世紀中國的主流政治話語並產生了重大的社會文化效應，但是「女權主義」作為五四時期閃耀著現代性光輝的一個詞卻在毛澤東時期墜入歷史塵埃。

## 新文化人士與新女性

歷史學家在各自關於五四運動的著作中強調了各種不同的主題。一些人強調了愛國學生運動，一些人突出了新文化知識分子主導的啟蒙運動，大部分歷史學家從一個包括文化批判和學生行動的廣闊歷史視角來描繪五四運動。我傾向於將「五四」理解為始於新文化運動、止於1925年五卅慘案的一個歷史階段。<sup>11</sup>在我看來，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題和學生運動的愛國主題，都只是在學術著作中被區分開。實際上，對於新文化和學生運動的事件和態度，在1919年五四運動以後的公眾記憶裏基本都交融在一起了。影響那一代婦女的，是整個歷史時期的各種事件。「五四」界定為一種思想和社會潮流的匯合而非一個單獨的社會運動，更符合五四新女性的歷史經歷。在本項研究中，「五四運動」一詞僅僅指狹義上1919年五四事件引發的學生運動高潮；

「新文化運動」一詞是指五四事件前後的新文學和新思想運動；「五四時期」或者「五四」則指1915年到1925年的整個十年。

雖然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思想自19世紀末就已經出現，但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生卻要追溯到1915年《新青年》（原名為《青年雜誌》）的出版。辛亥革命並沒有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近代民族國家，卻反而以軍閥混戰的局面收場。夢想破滅的中國知識分子開始轉向尋求文化振興國族的途徑。他們相信，中國若欲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就有必要重塑中國文化和國民性。《新青年》的創辦者和主編陳獨秀，也是日後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新青年》成為首個批判儒家思想這一中國文化霸權之根基的知識分子論壇。一大批男性文人迅速加入批判的陣營，他們或為《新青年》撰稿，或在其他雜誌和報紙上開辦新論壇。

這些後來被稱為「新文化人士」的人具有明顯的相似經歷。他們大多數都出身於沒落的仕宦家庭，童年時期都接受過儒家經典的教育。大部分人都曾在以西方或者日本為模式建立的「新式」學校就讀過。許多人都曾出國留學，大部分是去日本。所有人都精通一門或者幾門外語，大部分人對中國和外國文學有著強烈的興趣。他們來自中國不同地區，最終都扎根在像上海和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並在大學和新聞界找到了合適的職位。他們代表了近代中國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群體：知識分子。與傳統儒家文人不一樣，這些新式學者受儒家思想和西方教育的共同影響。1905年科舉制被廢除後，讀書與仕途之間的聯繫被切斷，新學者不再自動屬於那個維護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帝國體制的官宦群體。相反，這些錯位的新學者——近代知識分子——成為了對抗主流文化的叛逆者。<sup>12</sup>

新文化人士的出現與中國遭遇西方密不可分。他們不僅多多少少受過西方教育，而且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的機構中任職。更重要的是，他們在西方找到了幫助他們挑戰儒教的思想武器。西方的意識形態——社會達爾文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女權主義——為他們提供了在主流儒家思想框架之外的位置，

這讓他們能聲稱自己是新文化的創造者。此外，西方的權勢也增強了那些徵用西方意識形態的人的權力。在中華帝國衰落而西方列強崛起的關鍵時刻，新文化人士傳播西方意識形態就具有不尋常的份量。他們因此獲得的話語權，是在其他文化和歷史背景下類似的邊緣群體所無法想像的。反諷的是，中西方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成為 20 世紀初期這一群文化叛逆者的權力來源。

新文化人士站在西方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立場，集中批判儒教中的「非人」思想。儒教三綱思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使中國人變成奴隸的主要原因。說得更嚴重些，這些維繫封建社會秩序的禮教只不過是「吃人」的工具。<sup>13</sup> 新文化人士認為，如果中國人想要建立一個現代民主共和國，就必須用自由、平等和獨立來取代儒家教條。因此，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被用來作為一種顛覆性的解放工具，使那些臣服於儒家思想的主體得到自由。

一個抽象的人 (abstract human being) 被剝離了具體的家族和社會關係，卻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概念在中國傳統語境中很陌生，但卻很有力量，因為它被作為普世真理來倡導。那些容易接觸到西方文本的新文化人士聲稱掌握了這一真理。在進化論佔據中國知識話語主流地位的時代，指向人類更高發展階段的「真理」極具吸引力。對新文化人士來說，更重要的是，「真理」徹底曝露了儒教的虛偽。與獨立自主的人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順從的儒教臣民不僅被描繪成現代世界中的可憐人，並且是完全不適合新的文明世界。在把儒家推下神壇之際，這些自稱掌握真理的人若不是訴諸於普世真理則不會如此有影響力。他們驚世駭俗的言論所引起的激烈反響證明，他們確實在那個歷史時刻選擇了有效的工具。

在那關鍵的歷史時刻，批判儒家思想和提倡西方人權自由觀念必然會涉及到婦女。儒家三綱之一「夫為妻綱」就是社會性別等級觀念，所以對儒家思想的全面攻擊必然包含了對社會性別等級制的批判。對於新文化人士來說，更重要的是，遵從男尊女卑原則的社會制度提供

了大量儒家傳統「非人」本質的證據。新文化人士經常引用纏足、納妾、包辦婚姻、女子貞操、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等，來證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殘忍、荒謬、落後和愚昧」。婦女成為儒教「非人」制度的典型象徵。此外，中國婦女最終被描述成在過去的兩千年裏都過著這樣的「非人生活」。雖然新文化人士對婦女都是犧牲品的描述既不符合歷史也過於籠統，明顯有問題，但是男性新文化人士畢竟響亮地指出：婦女受壓迫是以父權制為基礎的儒家文化的一種病症。

此刻20世紀初歐美的女權運動（主要是參政運動）正處於頂峰時期，以西方為座標的新文化人士在討論中國婦女的悲慘處境時就多了一個參照點。他們將女權運動看作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是「現代性」的一個標誌。因此，男女平等是現代社會的一條基本準則，並直接與封建社會男尊女卑等級制度的法則相對抗。中國若要實現現代化，中國婦女就必須得到解放，並獲得作為人的平等地位。否者，半數人口處於被奴役和屈從的狀態，這個半身不遂的民族就永遠不能進入現代文明。婦女的地位與現代世界中民族國家的地位被聯繫在一起，這令婦女解放與人權和現代化一起，構成新文化交響樂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主題。

新文化人士對儒家男尊女卑的批判和對婦女解放的倡導，激發了五四時期高漲的女權主義情緒。由於這些文人控制或從事著新聞業，他們能向讀者傳播他們的思想。當遍及全國的學生運動出現時，新文化刊物及讀者人數在五四事件後急劇增加，包括女學生在內的大量學生群體成了新文化的追隨者。新文化隨著愛國學生運動的潮流席捲而過，進入了中國城市社會的主流。對新文化的認同成了現代公民身分的標誌，而談論婦女解放則是表達這種身分的簡易方式。那些自詡為開明進步的男性紛紛加入支持婦女解放的隊伍，五四時期見證了知識分子對婦女解放的空前鼓動。男性精英把婦女納入了「中國的啟蒙運動」的構想中，導致了一場新的女權運動的湧現。

起先五四女性參與社會運動是受到國族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的鼓動。五四事件為年輕女學生提供了以國族利益為名義的機會來跨越

「男女授受不親」的性別藩籬。從而五四運動見證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的崛起——「女學生」。她們的愛國行動使得社會認可她們是公共領域中的一個合法群體。一旦她們加入了愛國活動中，許多女學生的注意力就轉向了女權主義議題。

新文化人士對女權主義的鼓吹經過一段時日之後，激發並促成了1920年代初的女權運動。1919年後的那幾年裏，中國女權主義在全國大城市迅速鋪開並達到頂峰。不僅婦女雜誌數量激增，其中許多都由婦女營運，1922年在全國範圍內更是出現了婦女爭取女權的有組織活動。女權運動的出現不僅彰顯了新文化人士的話語權，也表明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的迅猛發展：「新女性」，即受過教育的婦女，她們以新獲得「要做一個人」的主體位置開展行動。

五四一代女子出生於19至20世紀之交，經歷了劇烈的制度變革。晚清改良派倡導的禁纏足和興女學的運動取得顯著成效。強國需要強壯而不是孱弱的婦女，對這一觀點的認可使得上層社會的父母讓其女兒保持「天足」，這一實踐逐漸延伸到其他接觸了新思想的家庭。到民國政府頒佈禁纏足法律時，許多來自精英家庭的女孩早已逃脫了這種折磨，許多其他家庭的女孩也開始放足。因此，一大批在體能上能夠過上積極和行動自由的生活的青年女子出現了。

第二個巨大變革是晚清政府對女子教育的支持。1911年辛亥革命進一步推動了女子教育的發展。甚至在1911年之前，美國「共和國母親」論（主張興女學）的翻譯文本已經在中國傳播。<sup>14</sup>到民國政府將女子教育制度化時，送女兒進學校已經成為愛國舉動和令人稱羨的地位象徵。公立和私立女校，以及西方教會學校的出現使得20世紀最初二十年受教育的青年女性數量急劇增長。對於那些一心想要獨立生活的女性來說，教書是一個較容易入行的職業。

學校的地理位置也有助於培養一群新女性。因為初等以上的女校都建立在縣城或者大城市裏，進入中學學習對於許多十來歲的女孩來說意味著獨立生活的開始。過去，只有包辦婚姻允許中上層社會的女兒離家去遠方。現在，這是她們自己的選擇，許多都是經過艱苦奮鬥



之後，遠離家鄉，追尋夢想。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個性強的女孩都被吸引到了大城市。後來的五四事件則將來自中國大城市女校的許多女青年吸引到了社會活動之中。

總之，新文化人士成功的關鍵，是在這個歷史時刻，已有數千受過教育的青年女子聚集在新文化出版活動中心的這些大城市裏。如果沒有這些受過教育的女學生，新文化女權主義就只能在男性中傳播，而這正是一些人擔心的局面。少數前衛男女在清末時就竭力傳播女權主義，<sup>15</sup> 她/他們的努力促成了辛亥革命時期短暫的女子參政熱潮。但是，那代女權鼓動者缺少足夠數量的女讀者，無法實現女權主義思想的廣泛傳播。當幾年後新文化人士重新發出幾乎沉寂了的女權主義聲音時，早期鼓吹女權主義的人士的命運在他們腦海中依然清晰。

相較而言，1919年的女學生樂於接受新思想。多年的現代學校教育給她們灌輸了國族主義的思想。這些受過教育的女學生期望成為現代國民並為國家貢獻綿薄之力。但她們在五四前夕卻遇到了許多障礙，當中最嚴重的是社會仍然存在性別隔離這一事實。尤其是那些特權階層的女子，禮教規定她們不能拋頭露面與家庭成員以外的男性共處。除了教師和護士這兩個當時剛剛才顯得「體面」的女性職業外，幾乎沒有什麼職業向婦女開放。甚至教育制度也是性別隔離的：初等教育以上的學校沒有男女同校，女子大學也只有幾間，而其課程也與男子大學不同。國族主義不但沒有打破性別界限，反而經常在公眾話語中被用來限制婦女留在家裏：養育品行端正的男性國民被看作是愛國婦女的光榮職責。如果沒有闖入男性世界的正當理由和途徑，女學生的最終歸宿仍將是包辦婚姻。

新文化運動對婦女解放的號召在受過教育的婦女中產生強烈共鳴，其實並不令人驚訝。人權、男女平等、獨立人格、封建禮教的「非人」、婦女受壓迫，這些新詞語賦予了那些追求個人進步的婦女強大的力量，使她們有可能用新的語言、新的觀念來重新審視自己和其他婦女的生活。過去那些被認為是正常的事情或者被認為是「女人的

命」，現在都被打上了「婦女被壓迫」的標籤。新的語言也開啟了一種新生活，一種超越性別界限的生活。具有遠大抱負的女子能夠規劃自己的未來以實現自己的夢想。從這個角度來說，新的語言使這些受過教育的青年女子成了「新女性」。

五四時期全國範圍對「婦女問題」的大討論是一次話語實踐，它提高了青年女性的覺悟，創造了現代中國婦女的新的主體性。「婦女問題」最初是強調婦女的普遍遭受壓迫，後來迅速發展成「婦女的諸多問題」(women's problems)，這就延伸到對大量婦女的困境進行大規模審視。<sup>16</sup> 對解放了的女性即新女性提出的標準是十分具體的。這些標準包括受過教育，這種教育要能使其成為自覺的現代國民且能確保其獲得一份職業；擁有獨立人格，這意味著經濟上自足以及在婚姻、職業等方面能自主做決定；參與公共生活的能力；對其他受壓迫婦女的關心。對新女性的描述——更確切地說是規範——與儒教中的孝女、賢妻、良母有著本質的不同。

當正在崛起的共產黨批判自由主義女權主義(liberal feminism)時，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關於解放了的新女性的規範已經得到了廣泛傳播。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指出新女性的規範中存在階級偏見，並稱其是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幻想。直到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仍然堅持認為，「資產階級女權主義」的失敗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婦女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正確性。然而，我對一群五四新女性的訪談證明，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在塑造現代中國婦女新的主體性方面取得了成功。新女性絕不是資產階級的幻想，而是一種女權主義的社會建構，是為打破中國的性別界限推動男女平等做出巨大貢獻的一個新的社會群體。

在白露(Tani Barlow)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文章〈理論化婦女〉(“Theorizing Woman”)中，她詳細解釋了現代中國婦女新主體性的話語建構。<sup>17</sup> 正如白露所說：「在男性為主的反儒家話語框架中，女性是一個話語符號和一種主體身分。」<sup>18</sup> 她提出的五四話語使女性成為一

個新的群體的洞見，對於我構想這項研究至關重要。然而，白露依賴於對五四時期多種話語的文獻的閱讀分析，強調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二元論在建構「女性」中的重要性：「女性是西方的、排他的、本質化的男女二元論中的一元。」她認為，中國女權主義者不僅把性的生理學特徵作為性別認同的基礎，而且也持有與性別二元論相關的女性卑微的觀念：「因此，只有當中國婦女變成了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別二元論中男性的他者，才能真正成為女性。」<sup>19</sup>

這一論斷引起了我的一些疑問。對中國女性缺乏人格或人性的批判，僅僅是試圖將關於女性的被動、生理上的卑微、思想上的無知等觀念給「固化」下來嗎？抑或是對儒家「非人」的譴責，並以此把女性提升到人的地位（雖然是以男性的形式）？如果男性小說家出於自己的利益，以男性的他者來再現女性，那麼女性在奮力擺脫卑微的社會地位的鬥爭中還宣揚女性本就劣等的科學觀念，又是出於什麼考慮呢？如果新的主體位置只是給女性確認被科學證明天生劣等，那麼它又怎麼有能量來改變婦女的思想並且構建新的主體性呢？女性，這一五四時代出現的新的主體位置，真的是由維多利亞時代的二元論建構的嗎？

維多利亞時代性別二元論是在五四時期傳入中國並進入讀者的視線，我完全承認這是個正確的論斷，然而我認為這絕不是當時中國的主流話語。五四女權主義者的任務是瓦解儒家的父權制，她/他們需要的是一種理論（或者理論體系）來為男女從這種制度的支配和屈從狀態擺脫出來提供正當性。一個本質上抽象的人擁有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人文主義概念，與儒家按照等級差異規範塑造、處於具體人倫關係中、且內化差異性道德規範的人的思想（禮教），相去甚遠。對於五四知識分子來說，一旦本質的抽象的人的概念被固定為一種普世真理時，就能夠將男女從儒家不平等的人倫關係網中解放出來，使她/他們擁有平等的基礎。這就是他們為什麼熱切地宣揚自由主義人文主義和女權主義的原因。蘊含著性別等級制度的性別二元論與這一歷史背景背道而馳，只會損害他們的目標。這正是這一理論傳播不廣的原因。

我對一群五四女性進行的訪談使我對新女性的主體性有了不同的理解。我詢問每一位受訪者是否讀過任何一本把婦女描繪成性化(sexed)的「他者」的五四時期文學作品。從本書中她們的敘述裏找不到絲毫證據，顯示有被維多利亞性別二元論建構的主體位置，儘管她們使用的語言反映了她們對五四女權主義的文本非常熟悉，這正是我在第一、二章中所論述的內容。雖然沒有一個人記得給她們提供了新語言的文章或雜誌的具體名字，但是她們都毫不費力地清楚地說出了新文化女權主義的關鍵詞。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她們從未讀過基於維多利亞二元論的五四作品，但卻證明了什麼樣的五四文本對她們有意義。

在本研究中我的觀點是，沒有任何規定說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移植到中國，中國人就一定要複製西方自由主義人文主義那套性別差異化和排他的話語過程。中國啟蒙運動根植於不同的哲學、政治和文化背景，講述了男性知識分子將女性納入其建構「現代人」過程中的故事。在這一特殊背景下，確立新定義和新身分過程中的差異化和排他性，是通過否定儒家主體和文化實踐來實現的。然而，將女性納入這一過程，並不能確保真正消解不對稱的性別權力關係，尤其是當把她們「納入」的人，是那些無視人文主義中的大男子主義傾向的男性知識分子的時候。在中國啟蒙運動的背景下，「要做一個人」就是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價值的「男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女性並沒有被規訓成為男性的「他者」，相反被召喚做和男人同樣的人。

五四女權主義者對女性作為「人」而不是性別差異的強調，迅速在中國扎根。五四女權主義的影響力在以下幾個方面反映出來。首先，具有新思想的受過教育的婦女進入公共空間，要求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革。第二，高等教育向婦女開放。第三，職業中的性別隔離被打破。最後，男女平等作為一條原則寫入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治綱領。大約半個世紀後，毛澤東自豪地宣告：「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男同志能辦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辦得到」，就是人文主義包含婦女五四理想的回聲。當然，堅持以男性普世性(male-universal)為

中心的婦女解放是有問題的。20世紀後半葉，當這種男性中心的男女平等成為官方主流時，不少中國知識婦女感到了它的壓迫性。她們對這種官方主流觀念的不滿導致她們在後毛時代反對女人應該「與男人一樣」的觀念。20世紀末，中國婦女反抗男權中心的男女平等故事是另一項研究的主題。<sup>20</sup>這裏我要強調的是，以「女人也是人」為標誌的五四女權主義話語對整個20世紀的中國婦女都產生了影響。

我對男性提倡的男女平等話語的發展的文獻提出兩個主要觀點。第一，正是由於自由主義的「人」是男性的，所以中國自由主義創造的主體位置是有權力的。當五四女性接觸到這一主體位置時，她們立即提出要把以往只屬於男性的權力和特權分一杯羹。第二，要擁有這種男性的主體位置就需要否定女性是低劣的思想，拒絕女性是孱弱的所謂科學論斷，五四新女性正是這樣做的。

作為這一時期崛起的至關重要的批判性話語，五四人文主義的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為那一代男女提供了新的選擇。可以肯定的是，其他具有競爭力的話語，不論新舊，也參與了對婦女主體位置的建構。「新女性」肯定不是20世紀初唯一的主體身分。從新女性的故事中，我們知道至少存在另外一種新女性不想與之為伍的新群體——「太太」（官員或資產階級的妻子）。我們還不確定「太太」在何時成為上層社會男性的妻子的專用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四那一代，「太太」群體包括了受過新式教育的婦女，以及新女性的親屬、朋友或同學。此外，「太太」也與現代性聯繫在一起，因為她可以陪伴丈夫出入社交場合。開展一項關於新女性與「太太」的比較研究應該很有趣，但這超出了本書的研究範疇。與本研究相關的一點是，受過教育的新女性本可以選擇當一個「太太」，依靠她那新興的資產階級丈夫過上舒適而奢華的生活，但是她並沒有做這種選擇。儘管「太太」能讀書，會跳舞、彈鋼琴，參加社交生活，但在本質上，她們卻與傳統妻子無多大差別，因為她們缺乏新女性最為核心的特質——獨立人格。

不過，新女性的主體性並非完全由新文化話語構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傳統文化為她們提供了巾幗英雄這個正面的主體位置。傳統

的「巾幗英雄」是指那些在履行統治者或者家族賦予的責任中創建卓越功績的婦女。古代巾幗英雄的故事既出現在野史或小說裏，也出現在儒家正統史書中。儒家傳統中的女子就是要履行做女兒、妻子、母親和臣民的責任。一個女人因履行這些責任和義務的需要而展現出尚武精神，會被認為是武藝和品德超群的女人，而非西方概念中的男性化的或雌雄同體的女人。<sup>21</sup>同樣的，作為一個儒家男人，就要履行做兒子、丈夫、父親和臣民的責任。缺乏尚武精神的男性（以儒家文人為典型）也不會被視為女性化。換言之，「武」和「文」並不是象徵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的性別符碼（codes）。相反，它們是男女都可具備的、具有積極意義的品質。

「巾幗英雄」這一話語符號主要是士大夫對婦女宣揚諸如忠、孝等儒家道德規範時創造的。巾幗英雄的形象通過地方戲曲和民謠廣泛傳播到各階層和各地域的中國婦女。在眾多巾幗英雄中，具有傳奇色彩的花木蘭在那些出生於19至20世紀之交的年輕女子中最受歡迎。可能是因為她們更容易認同這個來自平民家庭的單身女子，也可能是因為膾炙人口的《木蘭辭》使得木蘭的故事在識字的女孩中廣泛傳播，總之花木蘭在那時如此受歡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木蘭將自己裝扮成一個男子，代替年邁的父親出征。她勇敢地與入侵者戰鬥了12年。敵人敗退後，她選擇回家侍奉父親而放棄了高官厚祿。和其他所有巾幗英雄一樣，木蘭一旦履行了對統治者和國家的義務，就從男性的世界中撤退了。除了勇氣非凡和武藝高強，木蘭是出了名的忠心愛國和孝順父母。世紀之交，面對西方列強的威脅，許多知識男性發現木蘭和其他巾幗英雄是值得他們的女兒或女學生學習效仿的榜樣。《木蘭辭》成為受到女孩歡迎的流行文本，許多女孩都取木蘭為名。<sup>22</sup>

巾幗英雄的流行對那個時期出生的女孩具有重要意義。深受國族主義的影響，她們在木蘭身上發現的主體位置，能允許她們展望一種超越家庭和男女界限的生活。國家的福祉需要忠孝女兒的奉獻，而當下的目標不僅是驅逐侵略者，還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現代木蘭（接受了國族主義教育的女子）渴望進入公共領域，並且不用女扮男裝也

能待下去。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時刻，現代木蘭剛好與女權和平等的新思想不期而遇，她進入男人世界的夢想因西方舶來的現代話語而合法化。畢竟，木蘭的形象完全符合了與男子享受平等權利的現代女性的形象，即一身戎裝的女人可以在男人的世界裏像男人一樣有所作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傳奇色彩的木蘭提供了一種話語位置，使得中國婦女得以徵用男性的、自由主義的主體身分。

新文化人士對婦女解放的倡導同樣可以從文化延續性的視角來理解。歷史上，當中國傳統文人為婦女創造了諸如木蘭這樣的符號時，他們也就扮演了道德守護者的角色。新知識分子為婦女創造新符號也具有同樣的功能。這些失去傳統社會精英位置的知識分子通過鼓吹婦女解放而獲得了權力，因為他們承擔了解放者的角色，成了新道德的領袖。然而，由男性扮演婦女解放先驅的角色卻導致了一個矛盾現象：他們在致力於廢除儒家等級社會關係的同時，卻維持著性別等級。考察新文化人士的私人生活可以看到，這些男性保持著高於婦女的社會地位（解放者與被解放者、啟蒙者與被啟蒙者、導師與學生）。此外，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寫作中）他們對婦女的態度也折射著舊文化而不是新文化。

儒家文化以各種方式繼續對五四男女施加影響。許多新女性拒絕赤裸裸的從屬地位，尤其是從屬於同輩的男性。但是，當不平等的性別關係被諸如對國家、人民或者對黨的責任這類宏大敘事所掩蓋時，年輕女性就經常陷於兩難境地。她們思想意識中的木蘭主體位置提醒她們對他人負有責任，而現代女性的主體位置則堅持她們有平等的「人」的權利。對於加入共產黨的五四女性來說，這一衝突尤為嚴重，因為共產黨要求個人絕對的服從。解決這個矛盾衝突的辦法是壓抑擁有獨立人格的新女性，而從表達強烈忠誠和愛國精神的木蘭身上吸取力量。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是革命的木蘭得以自我安慰的是，她加入共產黨不是為了父親而是為了人民。因此，她所有的服從和犧牲就獲得了新的意義。

五四時期受過教育的男青年——新文化人士的學生——沒有進入我的研究視野中，儘管他們對新女性的生活具有重要意義，並且他們應該是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的主要預設受眾。這些受過教育的男青年是否也把男女平等作為一條人生準則？他們是否也經歷了同樣的提高女權主義覺悟的過程？五四新文化話語給他們創造了怎樣的新的主體位置？五四時期男性和女性的主體性有何不同？這些問題只好留待將來研究。這裏我只能強調，這個時期突顯了「新女性」而不是「新男性」這個詞彙絕非偶然。雖然五四女權主義多少改變了受過教育的男性對婦女的看法，但畢竟是新女性作為一個史無前例的社會群體出現在現代中國，是她們最鮮明地標誌了中國的現代性。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時期是中國婦女解放這一漫長進程中一個意義重大的突破。

五四女權主義高潮沒有持續太長時間。洶湧澎湃的女權主義宣傳和組織活動之所以能在此刻出現，主要是因為20世紀初獨特的政治環境。在清朝覆滅到新的中央集權產生之前的這一段時間，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得以自發投入到文化革命之中。雖然著名的新文化人士很快獲得了相比普通追隨者更大的話語權，當時尚無有效的思想和政治權威以及體制機制來控制不同思想、方法、路徑和探索的表達。20世紀的中國還從未有過比五四時期更為自由多樣的思想激盪的場域。國共兩黨合作推動的國民革命終結了這一思想自由時代。國族主義作為能夠強化國共合作的政治凝聚力被推到前台（推手包括眾多新文化幹將），並在1925年五卅事件後迅速使其他主義黯然失色。儘管五四女權主義的主題在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國民革命，但是無黨派的女權主義活動的社會空間則萎縮了。

1927年，國共合作的破裂使中國女權主義發展版圖進一步複雜化。合作破裂後不久，共產黨的非法地位逼迫黨內的女權主義者或轉入地下，或逃進山區根據地。城市地下黨無法公開從事婦女解放運動，但在出版、文化藝術界和國民黨允許的婦女組織中有廣泛的滲透，五四女權議題結合愛國主義被那些有獨立職業身分掩蓋的地下黨



女權主義者繼續傳播著。在農村根據地的中共黨內女權主義者推進婦女解放議題面臨的制約較多：戰爭的環境、傳統的鄉土文化和父權制家族制度、黨內男權領導對「女權主義」的打壓，等等。經歷過五四的那代女共產黨人在艱難的環境中創造了生存發展的策略，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堅持為農村婦女爭取權益。在國民黨統治區，非共產黨的女權主義組織被允許存在，國民黨內的女權主義者在推進立法和婦女參政方面有持續的活動，如本書受訪者之一，國民黨黨員朱素蓁的敘述所顯示的。在國民黨作為執政黨鞏固其新政權的過程中，女權主義作為一種具有顛覆性的意識形態，對於一個試圖通過宣揚儒家倫理規範來維持社會穩定的統治集團而言，也成為需要規範掌控的對象，尤其當一些女權言論有「赤化」嫌疑的時候。政府對媒體的審查與監控，導致五四時期多元政治傾向的激進女權主義革命論述在公共領域逐漸消退。雖然分手後的國共兩黨都依然宣稱支持男女平等，但是此議題在兩黨爭奪政權的計劃中並不佔據重要位置。鍥而不捨地以各自的方式在兩黨內推進女權議題的主力軍是經過五四洗禮的女權主義者。

在1920年代後期，高漲的女權主義輿論宣傳和組織活動浪潮在波譎雲詭的政局中似乎進入低潮期。但是，如本書的敘述者所證明，在社會群體、組織機構、立法，以及人們的觀念和語言中所包含和表達的五四女權話語，已經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這一話語所創造的新的女性主體性在現代中國社會徘徊不散。新女性在各自的社會位置上不屈不撓地繼續為女權主義的目標奮鬥。本書的主角——五四新女性們，既驗證了五四女權話語的力量，也為之做出了貢獻。是她們堅實的足跡鐫刻了20世紀中國婦女發展進步的歷史。

## 口述史的建構

1992年，當我開始在上海做研究時，我從未想過能夠遇到20世紀初出生的受過教育的婦女。但是，對於我進行的「五四時期女權主義」研究課題而言，理解那個時代婦女的生活，或者至少理解那個時代婦女活動家的生活是至關重要的。因此，一到上海，我就開始尋找那些在五四運動中活躍的婦女，以及可能保存著這些婦女個人檔案的地方。

第一階段的搜尋令人沮喪。我的親朋好友中沒人認識那個時代的婦女；當我詢問在圖書館和博物館工作的熟人，他們的單位是否保存那代婦女的日記、書信或其他個人文獻時，他們都感到很困惑，回答說只有像孫中山和魯迅這樣的男性名人的私人資料才會被收藏。我意識到尋找婦女個人資料會徒勞無功。第一，那個年代識字的婦女比例非常低。第二，即使許多受過教育的婦女保存了日記和書信，這些個人資料經過內戰和抗日戰爭還能保存下來的機率微乎其微。第三，即使有的婦女足夠幸運地在1949年前將其個人資料完整地保存下來，這些檔案也難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倖免於難。我決定調整思路，更加現實的辦法是尋找那代依然健在的婦女。

憑著自己是上海人的有利條件，通過私人關係網，我最終遇到了我一直在尋找的婦女。我訪問了十位90歲左右的婦女，另有三位年輕一些的婦女講述了自己母親和姐姐的人生故事。這些向我講述她們人生故事的婦女大多都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館（文史館）的成員。我更傾向於用「文史館」這個縮寫，因為全稱傳達的學術聲望是文史館所不具備的。文史館是1949年後中共建立的遍佈全國的機構。1949年前的各種知名人士，包括末代皇帝，都被中央和地方政府任命為文史館館員。按照官方的說法，「文史館是黨和政府專為安置和團結舊知識分子而設的榮譽機構。」<sup>23</sup> 館員的責任是做研究或者撰寫回憶錄，政府給他們支付工資。不過，搞研究和撰寫出版物並不是他們必須完成的工作。許多館員只是在有機會出版的時候才會寫作——也就是在政府

或者報刊雜誌向他們徵稿的特殊情況下。總之，文史館與其說是一個研究機構，不如說是在社會主義中國安置1949年前的非中共名人的地方。我的本書受訪者之一王伊蔚曾犀利地評論說，文史館「就像一個收留高級乞丐的地方……各種各樣的人都被關在文史館，那種在舊社會有點名氣的人、有些追隨者的人。把我們放在政府派來的幹部的監管之下，共產黨就可以向世界展示他們有多重視知識分子」。

我採訪的大部分婦女都是在1980年代初進入上海文史館的。她們被聘入文史館主要有幾個原因。由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文史館停止聘用，館員數量急劇減少。許多館員要麼受迫害致死，要麼自然死亡。1978年文史館重新開始接收館員，其條件與文化大革命之前不同。如今，1949年之前大學畢業的老人就能成為館員，即使他們不是知名人士。這些新館員大多在毛澤東時代遭到排斥、歧視和迫害。通過給他們提供經濟保障和社會地位，中共似乎在為過去的錯誤道歉，並利用這些人的私人關係去影響包括台灣在內的海外華人。我的受訪者把文史館館員的身分看作是由於政府錯誤而遭受損失的一個補償。雖然她們感激文史館讓她們老有所養，但是她們還是無法忘記自己遭受的損失，沒有什麼能夠真正彌補失去的歲月。

除了個別例子外，我的訪談對象都在20世紀初接受了大學或者中學教育，並在1920、30年代開始職業生涯。除了教育背景和職業生涯，本書中的婦女還有一個共同點：她們富於創造性和充滿活力的生活狀態在1949年後戛然而止。93歲的朱素萼在我第一次採訪時就感慨地對我說：「解放時正當好做事情的辰光，正當要發展的辰光，1949年就休息下來了，等於退休了，虛度光陰幾十年。」新政府不僅剝奪了這些婦女珍愛的職業，也成功地將她們從歷史中抹去。1949年後出生的我，在遇到這些老人之前，從不知道解放前就存在如此多的獨立職業婦女。我在毛澤東時代長大，從未質疑過只有共產黨的革命解放了中國婦女的說法。面對這些歷史見證者，傾聽一個又一個史詩般的人生故事，我受到了極大的震動，也被深深地感動了。

對於這些接受採訪的婦女來說，這些訪談也常常令她們激動。這些年邁的婦女從不指望會有人珍視她們的人生故事。她們熱情歡迎我這個陌生人，許多人立即開始傾訴她們的經歷（雖然這也部分緣於我是由她們的熟人引薦而來）。與我這個來自美國，卻和她們說著同樣語言的年輕上海人相處，她們感到自由自在。因為我僅打算把訪談用英文在美國出版，有幾位說她們可以告訴我一些特別的故事。不過她們也不是毫無顧忌。當她們批評共產黨時就要求我不要錄音，儘管這些批評比我在商場、公交車和其他公共場所聽到的批評要溫和得多。但是她們確實能自由自在地表達感情。回憶往事時，她們時而開心地大笑，時而傷心地流淚。對有的受訪者我的到來有著更多的意義。88歲的王伊蔚在訪談一開始就告訴我，過去共事的好朋友都已去世，她經常會想起她們，睡不著。她1990年就做了塊墓碑，並把墓碑的圖片給我看。墓誌銘裏提到了那些曾與她一起做過婦女運動的朋友。她說：「我花了二千塊錢要弄這個墓碑，就是為了這幾個人寫，我就是怕她們被埋沒。你要是早來了，我就不要弄這些墳墓了。我不相信宗教，我相信這有點命運，大概是上帝派你來的。」王伊蔚給我講述她的人生故事的三個月後，就去世了。

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是為紀念這些婦女而寫的，她們的英雄往事已經被遺忘很久了。這本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些婦女自己寫的回憶錄。這些非凡的人生描述超乎我的想像，和我原先的研究設計也「不相關」，是她們的敘述形塑了我對本書的構思，並成為呈現在書中的主要內容。作為這些口述者的朋友，我想按照她們希望被銘記的方式來勾勒出她們的「肖像」。因此，我用她們在訪談和自傳中的原話來組織她們的敘述。我對原始材料進行了一些結構上的調整，刪去不必要的重複和關於她們親朋好友的詳細信息，按年代順序展開人生故事。我用從1993年2月到7月間進行的第一輪訪談內容作為主線。之後，又從1994年12月到1995年1月間所做的續訪中，挑選了一些信息補充到第一次採訪整理中。

作為一項歷史研究，本書不能採取墓誌銘的形式。這些婦女活動家在歷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的目標是將這些看似孤立的人生故事置於具體歷史背景之中，以呈現一個更加完整的歷史舞台。作為一名歷史學者，我必須將這些推動歷史變遷的行動主體轉為我審視的對象。她們的敘述因此成為我仔細檢驗、分析和闡釋的第一手資料。所以本書不是單純記錄這些婦女的言說，還表達了我面對這些歷史主體時的立場。

我對於歷史學家在呈現歷史時應扮演的角色的自覺意識，引導我去探索適合本項研究的寫作形式。我極希望讓五四女性直接用自己的語言發聲，所以我決定盡可能完整地呈現她們自述的人生故事，而不是依我的需要摘取片段納入書中。在結構上我選擇圍繞她們的敘述來組織章節，而不是按照歷史事件順序來編排。在每個人的敘述後面，我將敘述者置於特殊的歷史背景中去分析，並闡釋了我對她們自述的理解。本書第一部分「女權主義與中國現代性」追溯了晚清至五四時期書面文本中女權主義的形成，描繪了新女性產生的歷史背景。第二部分「被遺忘的先行者」開始的一章是對五位口述者的背景介紹，隨後五章中，每章是一位新女性的口述和我的闡釋分析。我希望通過這種編排讓讀者能夠直接聽到新女性的講述，並從她們的原話中得出自己的理解。

由於這些敘述構成了本書的主要部分，因此我必須強調口述史的複雜性。讀者在閱讀這些新女性的故事時，需要意識到下面幾個問題。第一，正如一位學者對口述史所作的評論，「被訪者的故事（資料）是兩個人互動的結果。研究者的個性和偏頗顯然體現在訪談中並影響著結果。」<sup>24</sup>雖然受訪者往往會對我提出的開放式問題（如「你是怎樣上大學的？」或者「你是怎麼參加婦女運動的？」）滔滔不絕，直到我要求她們進一步解釋清楚某些問題時才稍作停頓，這些口述依然是敘述者和我之間一系列特殊因素互動的產物。我對婦女史的極大興趣以及來自美國的女留學生的身分，可能會使這些被訪者強調她們過去的輝

煌經歷。美國學者曾警告研究者，訪談者在所處環境中的優越地位，容易使被訪者貶低自己過往經歷的意義。<sup>25</sup>但是在我的具體情況中，這些敘述者都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前輩，大多數人對古典文學和歷史經典的知識遠勝於我。雖然她們很久以前就失去了精英地位，但文史館館員的身分還是讓她們受到尊重，周圍人用尊稱「陸老」、「朱老」來稱呼她們。當文史館的朋友用這樣的稱謂將老人介紹給我的時候，立即讓我這個研究生誠惶誠恐。即使沒有顯示她們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的「老」字，中國文化中的輩份也會自動將她們的地位置於我這個晚輩之上。在訪談中，她們通過強調自己過去的奮鬥和成就來給我這個年輕女性傳授歷史，顯然樂在其中。

她們慷慨地與一個陌生晚輩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也是因為她們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意圖。她們知道自己已經從歷史中被抹去了，因此很期待我這個來自美國的歷史學者能夠替她們發聲，甚至恢復她們在歷史中的地位。文字的力量和我的地理位置激發出她們極大的熱情。在美國出版她們故事的可能性，一方面使得她們能自由地表達思想，另一方面也使得她們謹慎地選擇人生故事。

如果我的身分在前輩們傾訴她們的豐富經歷時是一種優勢，但在討論她們人生中某些方面問題時卻是一個障礙。有教養的中國人不習慣隨意談論性的話題。如果要談論性，那一般也是在同輩親朋好友之間。我若去打聽這些前輩的性生活，顯然極為不妥與失敬。因此，性這個主題在我們的談話中幾乎沒有談及。不過受訪者在性方面的沉默不僅僅是因為我的年齡，也符合她們的人生態度。與依靠婚姻來獲取身分的資產階級「太太」不一樣，新女性的身分取決於其在公共領域的職業成就，而非私人生活。

第二，我們必須考慮這些婦女獨特的經歷對她們口述內容的影響。隨著政治環境和話語的改變，她們的社會地位發生了劇烈變化。在1920年代，站在女權主義和國族主義潮流的前沿，她們成為活躍的社會變革者。在1930年代，她們獲得了社會精英的地位。1949年

後，她們被邊緣化了。最終，在後毛澤東時代，她們的名譽得到了恢復，在風燭殘年時受人尊敬，但毫無社會權力。她們深感生命的一半珍貴時光已經被浪費，這使得她們相比其他老人更強烈地懷念昔日的榮光。

第三，因為本書是一項有關主體性的話語建構的研究，口述史作為一種研究方法使得闡釋變得複雜化了。比如，時間的變遷就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90多歲的婦女講述著她們年輕時的故事。從1920年代到1990年代，中國主流話語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如果語言建構了主體性，那麼變化的話語又怎樣重塑了主體性呢？我又如何能辨別這些敘述者表達的是當下的主體性，還是1920年代建構的主體性呢？我試圖駕馭口述材料的一個辦法是查閱五四時期生產的原始文本。通過比較流行於當時和今天的術語的不同，我能夠判斷出這些敘述者隨口蹦出的哪些詞語是屬五四時期的。像「獨立人格」、「伸張女權」、「人的權利」等這些詞句，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國很少使用。但是當這些前輩描述她們年輕時的經歷時，這些詞語卻從她們嘴裏自然而然地脫口而出，清晰地證明了五四話語建構的主體性的存在。除了隨意使用這些「過時」的詞彙，敘述中缺乏「時髦」的詞彙也證明了她們還在堅持五四女權主義的思想覺悟。1980年代，「民主」和「科學」在建構五四記憶中成了兩個最突出的詞彙。圍繞五四運動60週年和70週年紀念活動中，知識界把五四運動的主要目標界定為對民主和科學的追求。有趣的是，本書敘述者從不用這些流行詞彙來描述她們當年的五四目標。當我問及她們在五四運動中的經歷時，她們提到的是愛國主義和女權運動。對流行詞彙的不敏感，意味著當下的思想潮流對這些老年知識婦女並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或者，即使有所耳聞，她們也不會讓自己的五四記憶去迎合最新建構的公眾記憶。畢竟，後毛時代對五四時期的歷史重構與其說是一種官方主導的形式，不如說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抵抗策略。<sup>26</sup>

第四，與上一個問題相關的是：新女性與毛澤東時期主流話語之間究竟有什麼樣的相關性？在長期邊緣化的過程中她們有意識地抵制了主流話語了嗎？或者，她們與其他許多知識分子一樣，或多或少被黨文化所改造？她們的敘述在多大程度上是毛時代主流意識形態的產物？官方意識形態仍然是一個決定什麼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應該強調、什麼不應該強調的隱形審查者嗎？在這一點上，這些婦女的政治身分就變得極為重要。女共產黨員會大量使用官方的黨的語言，而非共產黨員婦女則不用或極少正面使用。這些婦女敘述中這種巨大差異顯然標誌著她們在毛澤東時期主流話語中不同的位置。共產黨員的人生與黨的歷史完全交織在一起，而其他婦女對官方話語則無切身利益的投入，這使她們在後毛時期較易拋棄毛時代的主流話語。當然，這並不等於說她們擺脫了官方的話語霸權。實際上，她們每一位都仍然活在毛澤東的餘威之下。在回憶往事時，這些受訪者經常用一種自我辯護的口吻來陳述過去的行動。她們並非僅僅在回應我的問題，而是在駁斥毛澤東時期中共對於她們的指控和批判。她們經常強調「愛國」這一主流肯定的褒義詞，來為其在1949年之前的活動正名和賦予意義。因此，雖然這些五四女性建構的1949年之前的女權活動歷史事實上駁斥了共產黨是中國婦女救星的神話，但同時她們經常使用的語言表明，她們仍受制於毛澤東時期主流話語的主宰。

後結構女權主義強調需要關注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話語中生產的經歷 (experience)。正如瓊·斯科特 (Joan Scott) 所指出：「經歷總是既是一種闡釋，同時又需要被解釋。什麼算作經歷既不是不證自明的，也不是一目了然的，它總是要經過博弈的，從而也是政治化的。」<sup>27</sup> 對我們來說，將新女性的敘述理解為話語產品是重要的。這些講述不可避免地包含著矛盾衝突和意義轉換。正因為這些敘述蘊藏著多重含義，它們對於我們理解主體性的複雜性才更有價值。此外，經歷的意義是政治鬥爭的關鍵場域。這些婦女竭力用愛國主義為她們過去的經歷賦予合法的意義，與其說是證明了她們對毛澤東時期霸權話語的默許，



不如說是一種政治上抵抗的姿態。當然，用主流話語來鞏固她們的歷史和社會地位，也會導致否認和壓抑她們在主流話語中不具合法性的主體位置。這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在她們的故事中較缺乏自身利益，卻有一個突出的固定的愛國者的主體身分。

這些新女性的故事幾乎跨越一個世紀，是以她們在 20 世紀中國社會、文化和政治變遷中浮浮沉沉、磕磕絆絆的個人歷程編織而成。因為篇幅所限，我只能勾劃出五位敘述者的肖像，這對於新女性群體的豐富而多樣的經歷來說有失公允。好在本書主角的敘述為理解中國婦女運動、五四女權主義、中國婦女解放中存在的諸多困惑提供了重要線索。很多年之前，瑪麗蓮·楊在其開創性著作《中國婦女》(*Women in China*) 中發問：「那些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城市女權主義者後來怎樣了？那些加入共產黨的命運又如何？」<sup>28</sup> 我希望這本書能用五四女性自己的語言，來回答這些問題。

## 注釋

- 1 自 1980 年代中期以來，來自學界和婦聯等官方機構的知識婦女倡議對西方女權主義進行重新評估。參見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文》（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陶春芳等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 2 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春秋出版社，1989）。與早期中共文獻對中國婦女運動的描述相比，這部著作更為正面地呈現中國早期女權運動。但是，它仍然將女權運動定義為屬於初級資產階級階段，注定會被共產黨領導的更高級的無產階級婦女解放所取代。
- 3 中文詞「婦女問題」原是對英文詞「the woman question」的翻譯，這個詞在歐洲已經流行了幾個世紀。我將「婦女問題」翻譯回英語時用了「the woman problem」，是想要強調翻譯經常會改變一個詞的內涵。在 19 至 20 世紀之交中文語境中使用「婦女問題」這個譯詞，不僅表明了知識界對之前習以為常的婦女狀況產生疑問的意識，還蘊含著婦女是「問題」、阻礙了國家邁向「現代」的一種男性中心的假設。

- 4 關於晚清改良派鼓吹婦女權利的討論，參見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四章和第七章；以及金一（金天翮），《女界鐘》（大同書局，1903）。這本小冊子是中國最早的女權主義宣言。作者提出了「女權萬歲」的口號。對《女界鐘》的批評，見王政等，〈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代序），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1-29。
- 5 Roxane H. Witke,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對於五四時期婦女的態度的轉變），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2.
- 6 在保守派中，「新儒家」是五四文化激進派的一股反對力量。毛澤東時代，新儒家主要在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中發聲。後毛時代，新儒家擁有了更多的聽眾，在中國大陸對保守主義觀點的公開討論和出版也增多了。
- 7 中國知識分子關於「人文精神」的著名論爭開始於1993年，一直持續到1995年。關於討論細節，參見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文藝理論》，第7-12期（1995）。
- 8 Charles Tilly,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大結構、大過程與大比較）（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88.
- 9 台灣學者長期以來都使用「女性主義」翻譯「feminism」，這或許是大陸學者採用這個詞語的來源。關於後毛時期女性味話語的討論，參見王政，〈「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辯異〉，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頁25-52。
- 10 卡倫·奧芬追溯了歐洲女權歷史中「feminism」一詞的出現，發現這個詞首先是由歐克勒（Hubertine Auclert）於1882年鼓吹的法國女子參政運動中使用，並在20世紀初傳到北美和亞洲，參見卡倫·奧芬著，朱曉慧、柯倩婷譯，《歐洲婦女解放史：1700-1950》（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Feminism」在中國直到五四新文化時期才出現。新文化人士從歐洲、美國、日本翻譯介紹女權主義文本，因此這個詞有多種來源。
- 11 1925年5月，一名上海工人（共產黨員）與其他工人進行罷工時被日本士兵殺害。中共上海支部決定號召大罷工和開展反帝運動。5月30日，上千工人和學生聚集在上海公共租界抗議時，英國巡捕房的巡警下令向人群開槍，最終導致13人死亡，20人受傷。共產黨和國民黨迅速將國內的國族主義情緒引導到國民革命的政治目標中。五卅事件使得反帝國主義情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高漲。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重要事件，它將女權主義者的能量轉變為國族主義的動力，並使國族主義壓倒了其他的五四主題。關於五卅運動的討論，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87-210。

- 12 關於部分新文化人士的中文自傳，可參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4）；茅盾（沈雁冰），《我走過的道路》，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
- 13 參見魯迅，〈狂人日記〉（1918），文學出版社編，《魯迅選集》（文學出版社，1956），頁53–63。
- 14 美國婦女史中的「共和國母親」（republican motherhood）是指早期共和國宣揚的愛國母親，她們養育了有美德的兒子。參見Nancy Woloch,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婦女與美國經驗）（McGraw-Hill, 1984）, Ch. 3。教育婦女成為愛國母親，培養具有高尚品德的共和國兒子，這成為了美國普及女子教育背後的重要原因。中國改良派推動女子教育時也頻繁使用同樣的觀點。
- 15 清末女權主義者秋瑾與何震是其中的佼佼者。
- 16 關於五四時期全民討論的問題的具體條目，參見梅生編，《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新文化書社，1929）。
- 17 Tani E. Barlow（白露），“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理論化婦女：婦女、國家和家庭），in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中國的身體、主體和權力），eds. Angela Zito（司徒安）and Tani E. Barlow（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53–289。
- 18 同上注，頁265。
- 19 同上注，頁266–267。
- 20 後毛時期知識婦女反抗男權中心的男女平等，顯示了強勢而具顛覆性的五四女權話語已經成為官方主流話語，以及具有內在男權中心傾向的中央集權式的男女平等對一些婦女造成的壓抑。為了挑戰官方壟斷的男女平等話語，後毛時期的男女知識分子調動起在五四文學作品中發現的性二元論。以「性科學」為導向、以「科學方法」闡釋的「女性特質」，成為1980年代後期上升的「女性味」話語的理論基礎，挑戰了五四時期以男性為座標的「人」的概念。五四的遺產很複雜。關於後毛時代中國女權主義的討論，參見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21 杜芳琴，《女性觀念的衍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作為一個不會說英語的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歷史學家，杜芳琴從來不用女性氣質和男性氣質這類西方性學引進後的現代術語來描述中國古代的巾幗英雄。參見她書中關於花木蘭的討論，頁276。
- 22 20世紀初婦女的文章和世紀末老年婦女的回憶錄中經常提及木蘭。男性對木蘭和其他巾幗英雄的讚美也出現在晚清的報紙中。參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頁167–172。木蘭的傳奇主要是通過詩歌《木蘭辭》（或者叫《木蘭詩》）流傳下來。這

首詩被認為創作於四到六世紀之間。參見暨南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室編，《中國歷代詩歌名篇賞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頁180–183。因湯婷婷（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戰士》（*Woman Warrior*）（Knopf, 1976），美國讀者對木蘭的故事相當熟悉。迪士尼電影《木蘭》（1998）增加了木蘭在英語世界的知名度。然而，與迪士尼對木蘭的描述不一樣，在中國人的認知中，婚姻與木蘭傳奇無關。對於五四一代的許多女性來說，成為「木蘭」意味著一種取代婚姻的選擇。好萊塢電影《木蘭》突出的「忠實於自己」的主題表達了典型的美國價值觀，但卻改變了中國木蘭傳奇中的核心道德要素，即「盡最大努力去履行自己在人倫關係中的責任」。

- 23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卷1（上海文史館，1990），王國忠導論。1990年以來，上海文史館出版了四卷：1990年出版了第一卷，1991年出版了第二卷，1993年出版了第三、四卷。這些出版物屬內部資料。
- 24 Kathryn Anderson, et al., “Beginning Where We Are: Feminist Methodology in Oral History”（我們從何入手：口述史中的女權主義方法論），in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女權主義研究方法），ed. Joyce McCarel Nielsen（Westview Press, 1990），94–112.
- 25 參見 Sherna Berger Gluck, and Daphne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女性的話語：口述史的女權主義實踐）（Routledge, 1991）；Walerie Raleigh Yow,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記錄口述史：社會科學家的一種實踐指南）（Sage, 1994）。
- 26 在1995年的一次訪談中，夏衍這位五四參與者談起了他記憶中的五四運動。與訪問者強調民主和科學是這個時代兩個最有影響的問題相反，夏衍強調中心議題是反帝和反封建。關於反封建，他回憶說：「首先，我們強調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學生參加運動體現了男女平等的訴求。接著才有了反儒家道德的口號，再接著我們轉向了反孔。」夏衍的談話是當代中國對五四記憶的主流建構中罕見的聲音。參見〈促膝談五四〉，《東方》，第2期（1995），頁24–25。
- 27 Joan W. Scott, “Experience,”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s. Judith Butler and John W. Scott, 37. 也可參見 Weedon,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 28 Marilyn B. Young, comp.,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2.



the 1990s,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UK who are employed in the public sector has increased by 1.5 million, from 2.5 million in 1980 to 4 million in 1999.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employer in the UK,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The public sector has become a major provider of social services, and its growth has been a major factor in the overall growth of the economy.



# 1

## 創造女權主義話語

民國五年，陳獨秀先生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一九一六年〉，沉重地向青年喊道：「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於被征服地位；……」，才對於三綱五常的舊說，開始炸毀……婦女的生活才真正改了個局面。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1928)<sup>1</sup>

凡自稱為覺醒分子的，不論女子或男子，可說沒有一個人不曾在這等文藝的及非文藝的——即當時所謂新文化的文字上注目，留心，乃至筆述，口說。投入潮流游泳的數目之多，為有史以來所少見。

——陳望道，〈中國女子底覺醒〉(1926)<sup>2</sup>

1920年代中期，陳東原、陳望道等中國男性知識精英仍在婦女話題上筆耕不輟。陳東原用了兩年時間



寫出了《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陳望道給《新女性》雜誌撰稿，這本剛剛創辦的婦女刊物全由男性任職。1920年代早期婦女解放的浪潮才達到頂峰，隨即被迅速高漲的國族主義聲浪所淹沒。但是許多五四男性已經習慣了「游泳」，儘管這一浪潮逐漸式微，他們仍在討論婦女議題。正如本章開頭的引文所言，五四男性精英意識到他們自己和其他男性在鼓吹婦女解放中所扮演的角色。

五四男性對「婦女問題」的關注往往被西方學者所忽略。關於對五四女性的研究，唯一值得稱道的是露克珊·維特克的博士論文（於1971年完成但從未出版）。她經過深入研究，指出「大部分五四論戰都是青年人以青年的名義進行的。然而，青年人（大部分都是男性）更關注婦女解放，而不是自身的解放。他們之所以大張旗鼓地反對傳統、支持婦女事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自己想從舊社會秩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sup>3</sup>

新文化運動期間，男性撰寫的大量關於「婦女問題」的著作文獻形成了流行的社會性別話語，對20世紀的許多中國婦女產生了重要影響。本章將追溯20世紀早期社會性別話語的變化。我將對晚清時期男性倡導婦女解放的現象進行回顧，隨後集中論述1911年清朝覆滅後這類社會性別話語的進一步變化，這一時期，中國知識精英把倡導婦女解放作為批判儒家文化的重要內容，這在當時諸如1915年創刊的《新青年》等報刊上經常見到。在檢視男性知識分子在推動女權主義話語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同時，我將詳細描述五四時期受過教育的婦女傳播和擁抱女權主義思想的過程。1922年和1923年婦女有組織地爭取女權的活動，標誌著中國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達到頂峰。同時，平行於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熱潮，由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所推動的關於婦女解放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開始進入知識界思想的競爭中。1920年代，這兩股競爭思潮相互激蕩、互相影響，這為我們的主人公——新女性——演出自己的人生戲劇提供了政治和思想背景。

## 晚清先行者

假如我們僅從每個人主張什麼來評判的話，晚清改良派康有為無疑是擁護婦女解放的中國男性名單上的第一人。他支持西方自由主義，追求個人自由和平等，這把他引向女權主義之路。他1884年開始撰寫《大同書》，於1902年完成。在書中，他表達了自己的女權主義觀點，而此時西方的女權主義著作尚未傳入中國。<sup>4</sup>康有為不僅提倡男女平等，還把性別議題作為社會改革的焦點。他秉持男女平等獨立的觀點，並將此作為他構建大同世界烏托邦的基石。在他的大同世界裏，所有界限都被廢除：國界、級界、種界、形界、家界、業界、亂界、類界、苦界，他認為這些界限是導致人類痛苦的根源。他倡導的女權主義觀點預見了後來中國婦女運動所提出的許多議題：女子教育、女子參政權、女子在法律上平等、已婚婦女保留自己的姓名、擇偶自由、社交自由、廢除他所謂的「肉刑」（纏足、穿耳、束腰等等）、服飾不分男女（去形界）和婚姻自由。為了確保個人自由和幸福，康有為大膽地提出了婚姻量定期限：即男女簽訂一份為期不超過一年的婚姻契約。僅憑這一提議，康有為就應該被看作那個時代最激進的中國男人，也是明確表達性自由目標的第一人。<sup>5</sup>

作為一個進化論者，康有為並不指望他所描繪的「大同世界」的願景能馬上實現。他提醒婦女解放這一過程必須經過三個社會發展階段：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因為激進變革必會引起更大的動蕩。鑒於此，他有生之年並未出版《大同書》。康有為認為婦女解放的第一步是要廢止對女子身體的殘害，並將她們從家庭束縛中解放出來。康有為於1883年在自己的家鄉組建了中國第一個不纏足會，並同他的兄弟以及朋友（如梁啟超）一起堅持致力於此項活動。不纏足會在19世紀末已經遍佈全國。1898年，康有為提交了禁纏足的奏摺，並在百日維新中被光緒皇帝採納。<sup>6</sup>

康有為的禁纏足活動對中國婦女的社會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他的女權主義思想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卻並不明顯，因為《大同書》

直到1935年才出版。儘管康有為的女權主義觀點要早於新文化人士的婦女解放思想，但沒有證據表明新文化人士閱讀過他的《大同書》手稿。另一位著名改良派譚嗣同關於婦女問題的觀點很早就出版了。譚嗣同是康有為的學生，他在《仁學》一書中抨擊了儒家的「三綱」。與康有為一樣，譚嗣同也提倡男女平等、擇偶自由和性自由。《仁學》於1899年出版，比五四運動早了20年。然而，陳東原在撰寫《中國婦女生活史》一書時，顯然對康有為和譚嗣同的女權主義思想並不熟悉。他只是強調了康有為推動的放足運動和梁啟超的興女學，並且把1898年戊戌變法前這段時期稱為中國婦女運動的「萌芽」階段。

陳東原認為，晚清最有影響力的婦女解放著作是金天翮1903年所寫的小冊子——《女界鐘》。<sup>7</sup> 金天翮筆名為「愛自由者金一」，是一位著述頗豐的革命派作家。在這本書中，金天翮嫻熟地闡釋了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他把西方思想比作「中國黑暗世界之一線陽光」，而這線陽光尚未照耀到中國婦女身上。他試圖敲響「警鐘」，喚醒中國婦女，讓她們加入到推翻君主專制的革命中。他在《女界鐘》中提倡西方的自由民權和女權。他相信「民權與女權，如蟬聯附萼，而生不可遏抑也」。<sup>8</sup> 他強調，西方科學研究顯示男子和女子的智力沒有差異，他認為中國男女間的不平等於「半自野蠻時代聖賢之垂訓，半由專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sup>9</sup> 他相信20世紀是一個女權革命的時代，屆時中國婦女會奮起恢復自己的權利。

金天翮提出的女權包括入學之權利、交友之權利、營業之權利、掌握財產之權利、出入自由之權利、婚姻自由之權利。他也提倡女子的議政權，尤其是參加革命和建立共和政府的權利。他宣稱：「20世紀新中國、新政府之不握於女子之手，吾死不瞑。」<sup>10</sup>

金天翮不僅鼓勵女子擺脫傳統束縛開始新生活，他還提供了塑造新女性的新標準，並提出女子教育的八個目標：

1. 教成高尚純潔、完全天賦之人。
2. 教成擺脫壓制、自由自在之人。

3. 教成思想發達、具有男性之人。
4. 教成改造風氣、女界先覺之人。
5. 教成體質強壯、誕育健兒之人。
6. 教成德性純粹、模範國民之人。
7. 教成熱心公德、悲憫眾生之人。
8. 教成堅貞激烈、提倡革命之人。<sup>11</sup>

《女界鐘》不單止是喚醒受壓迫中國婦女的「警鐘」，還是打造20世紀中國新女性的藍本。與傳統婦女截然不同，新女性應該是和男子一樣獨立又積極的國民。意味深長的是，金天翮在他的八條標準中，使用了「人」這個詞，而不是「女子」來指涉婦女，是用了西方個體主義構想中國婦女這個概念。母性是新女性需要保留的唯一的傳統角色，在金天翮看來，這個角色也僅僅是生物意義上的。女人作為女兒、妻子和兒媳等其他傳統家庭責任都應被徹底拋棄。雖然《女界鐘》沿用了傳統的規訓婦女的書寫形式，它給中國婦女遵循的卻是一套激進的新規範。

金天翮的這本小冊子出版於革命風起雲湧之際，受到人們尤其是反清革命者的熱烈追捧。第一版在幾個月內就銷售一空。許多婦女報紙和雜誌或討論《女界鐘》的觀點，或直接登載《女界鐘》的原文，金天翮被讚譽為「中國女界的盧梭」。<sup>12</sup> 隨著《女界鐘》的出版和廣泛傳播，「女權」一詞開始進入中國社會和政治話語。此外，金天翮也是20世紀初期向中國自由主義者提出女權主義原則的第一人：天賦人權應當包括女權。

雖然金天翮是這一時期聲音最響亮的女權鼓吹者，一群來自精英家庭受過教育的婦女也在積極傳播女權主義思想。一份關於1897至1912年之間中國婦女出版物的研究表明，在北京、上海、東京（許多中國婦女前往那兒求學）和其他城市出版的40種婦女雜誌和報紙中（大多數都由婦女主辦），只有三種是1903年前創辦的。這也許說明《女界鐘》鼓舞了受過教育的婦女，激勵了她們的行動。雖然婦女雜誌大

多數生存週期不長且傳播範圍有限，卻宣揚了從西方思想中新引入的「天賦人權」、「男女平等」、「恢復女權」等口號。雖說《大公報》和《東方雜誌》等有影響力的主流報紙雜誌也發表了不少推動婦女教育和爭取女權的文章，其內容多為倡導女子教育、報道歐美的女權事件，而婦女報刊在當時更為引人注目，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婦女自己創辦報紙和雜誌，她們公開表明自己辦刊的目的是要伸張「女權」。<sup>13</sup>

第一代中國女權主義活動家對於她們在推動歷史變革中所扮演的先鋒角色具有高度的自覺意識。與同時代的男性改良派和革命者一樣，這些受過教育的婦女利用西方婦女的社會進步作為參照物，來討論改變中國社會制度的必要性，這種社會制度把婦女置於從屬地位。當時中國婦女雜誌的顯著特徵就是大量刊載了關於日本、美國、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女子教育、女子參政、女子職業和就業機會，以及婦女取得成就等文章。在那些介紹國外婦女狀況和討論中國婦女狀況的文章中，關於美國和歐洲如火如荼的婦女運動的信息非常頻繁地出現。許多女作者把西方婦女的進步與中國婦女的苦難（纏足、文盲、幽閉深閨、包辦婚姻等）進行對比，並急迫地呼籲中國婦女起來反抗。在一篇題為〈中國女子之前途〉的文章中，筆名為「楚南女子」（女報人陳擷芬）的作者認為：花木蘭是19世紀前中國歷史上唯一大放異彩的女性。即使花木蘭擁有異才奇志，卻還是得女扮男裝去從軍。作者對此感到悲哀，並尖銳地發問：「茫茫數千年，除木蘭幸露頭角外，豈遂無一人有特別思想耶？不過束縛於風俗，受制於家庭，雖有異才奇志，亦不能越此範圍而展其才、達其志也。」作者接著論證，這種情況會發生變化，20世紀中國婦女將大放異彩：

又或者曰，中國十九世紀以前之女界既如彼，二十世紀以後之女界何能遽望發達如此？曰十九世紀以前，上無引證，旁無仿慕，偶有特別性質，欲思稍動，而男子群起壓制之。今則萬國踵興，新書新報，日多月廣，男子明白者，非但不阻止，且有昌言女學者，雖彼等所言未必有真實心，然吾輩即可借彼口頭禪之力，以

行吾之真實事也。噫嘻乎！美哉！吾輩現今之地步，真萬世不易得之地步矣！

在對變化著的歷史潮流做出敏銳判斷後，作者號召婦女積極參與世界變革，並告誡她們不要只當旁觀者：「今日之義務輕一分，日後之權利減十分。」因此，婦女應當竭盡全力推動改革：「能言者則鼓吹之，能文者則揚萬之，能行者則實行之。」作者滿腔熱情地呼籲：「須知此日此時為吾女界中由黑暗而反光明之時代，勿失此機會，而再陷入十八層地獄也。十九世紀前女子不成事可諒之，十九世紀後女子不成事，則不能恕矣！」<sup>14</sup>

清朝的滅亡見證了女權主義的湧現與國族主義的興起，包括《女界鐘》在內的大量出版物都號召中國男女起來反對滿清的獨裁。很多女權活動家把清王朝視作婦女解放和國家富強的首要障礙。爭取女權與反滿立場變得密不可分，確切地說，加入反滿的陣營，意味著爭取女子平等權利的真正開始。1911年辛亥革命中最著名的烈士秋瑾，就是這一代女權活動家的典範。秋瑾天資聰穎，卻因為不幸的婚姻而備受打擊，她在那個離婚還是聞所未聞的時代與丈夫離婚，並於1904年東渡日本，改名為競雄（與男人一爭高下），創辦月刊《白話》雜誌，1906年回到上海後，她創辦了《中國女報》，寫了很多提倡女權的文章和詩歌。秋瑾在日本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回到上海後她參加了反滿活動，大力提倡女權。她始終認為，要獲得平等權利，婦女就必須擔負起國民的責任。在其詩詞《勉女權歌》中，她寫道：「男女平權天賦就，豈甘居牛後？……恢復江山勞素手……責任上肩頭，國民女傑期無負。」<sup>15</sup>秋瑾想向世人證明女人與男人一樣能夠完成英雄壯舉，這種強烈願望導致她在1907年英勇就義，年僅29歲。<sup>16</sup>

對於這一代女革命者來說，對國家的責任與婦女應獲得的權利是掛勾的。在末代皇帝退位之後，包括秋瑾的朋友和學生在內的許多女革命者立刻成為婦女參政運動者。<sup>17</sup>1910年代初期曇花一現的婦女參政運動，證明了參加辛亥革命陣營的許多婦女都懷有女權主義的期

許。她們認為自己對國家負有同等的責任，於是為共和國的誕生做出奉獻，並以為新的共和國會滿足她們享受平等權利的要求。這些由革命者轉變為參政運動者的婦女，是第一批趁著上升的國族主義進入政治領域的中國婦女。雖然參政者們沒能獲得政治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學家經常用這個事實來證明「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不適合中國——但是20世紀頭十年的女權主義者確實對中國政治文化喊出了她們的反抗。因此，它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女權主義浪潮的興起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礎和前提。此外，這一代婦女活動家和參政運動積極分子為隨後一代的五四年輕女性樹立了具體的榜樣。從本書第二部分五四新女性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五四女性童年時期的榜樣對她們追求新生活產生了重要影響。簡而言之，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女權主義浪潮不是孤立的現象，而是自清末就存在的女權主義話語在中國的延續和擴張。

## 新文化運動早期(1915-1919)的女權主義先鋒

在袁世凱政府鎮壓了中國第一場婦女參政運動的兩年之後，陳獨秀於1915年創辦了《新青年》。<sup>18</sup>我們尚不清楚，袁世凱對婦女的噤聲是否加深了陳獨秀對此獨裁黑暗時期的反感。可以肯定的是，陳獨秀關於中國新文化的構想包含了婦女解放的內容。在《新青年》第一期，他發表了〈敬告青年〉一文。在題為「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一節中，他寫道：

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權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謂也。<sup>19</sup>

在當時，西方的婦女運動也還處於邊緣且遭遇很多阻礙，陳獨秀卻樂觀地把這看作是西方奴隸解放史的一部分。在陳獨秀和許多新文

化人士看來，這一「解放史」代表了現代文明的趨勢，為中華文明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正如陳獨秀所描述的，這一歷史大勢的目的是追求「自主之人格」。在隨後的幾年裏，這種個體主義的解放的主題被其他新文化運動者不斷重申。

陳獨秀的另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是〈一九一六年〉，他在文中詳細解釋了個體主義對中國人的必要性。陳獨秀帶著一種緊迫感，號召男女青年拋棄儒家思想，塑造獨立人格，要「自居征服地位而勿自居被征服地位」。他認為西方的個人珍視平等、自主和自由；個體的強大促成了國家的強大。與之相反，中國的儒家禮教卻將中國人置於奴隸地位：

儒者三綱之說，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為臣綱，則民於君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父為子綱，則子於父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夫為妻綱，則妻於夫為附屬品，而無獨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為臣為子為妻而不見有一獨立自主之人者，三綱之說為之也。緣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詞，曰忠，曰孝，曰節，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為以己屬人之奴隸道德也。<sup>20</sup>

這篇文章被陳獨秀的同時代人視為新文化運動第一枚炸彈。陳獨秀「毀孔子廟罷其祀」。<sup>21</sup> 譚嗣同嚴厲批判了儒家的三綱思想，金天翮大力倡導個人自由和獨立，而陳獨秀則把儒家思想與個體主義的對立想像成奴隸與主人的對立。這樣的想像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極具說服力，因為中國被西方擊敗的事實尚記憶猶新。通過奴隸和主人的比喻，陳獨秀分析了中國羸弱的原因，並提出了解決之道：中國幾乎被西方征服，究其原因，是儒家文化造成了中國人的懦弱。欲從奴役狀態中反抗，中國人首先要具有主人的意識，即西方人擁有的獨立與自由，而男女青年是最有可能成為擁有這種新精神的新國民。在此時的陳獨秀看來，塑造新人以創造新文化（或者創造新文化以塑造新人）是推動傳統中國邁向現代的唯一途徑。<sup>22</sup>



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中，陳獨秀進一步闡明了孔子思想與現代生活之間的不可調和性。他舉例證明儒家的荒謬，其中三分之二的例子都是關於加諸在婦女身上的禮教，並與他認為代表現代文明標準的西方婦女活動進行了比較。相比於儒家教義的「內言不出於閭」，女子參政運動是「現代文明婦人生活之一端」。這樣的對比還包括，西洋寡婦再醮自由，儒家寡婦的守節風俗；西洋婦女社交自由，儒家社會男女授受不親；西洋婦女獨立自營生活與擇業自由，儒家婦女則「女不言外」、「夫為婦綱」；西洋婦女是小家庭中的妻子，儒家婦女則對夫家承擔孝養翁姑之義務。如此，陳獨秀對孔子的抨擊揭露了對中國婦女的壓迫。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問題很快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成為新文化運動集中討論的「婦女問題」。<sup>23</sup>

作為一名進化論者，陳獨秀認為中西婦女的對比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差異。如果想要向更好文明階段邁進，中國就必須摒棄代表了封建主義的孔子之道。陳獨秀主張：

孔子生長封建時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時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禮教，即生活狀態，封建時代之禮教，封建時代之生活狀態也；所主張之政治，封建時代之政治也。封建時代之道德、禮教、生活、政治，所心營目注，其範圍不越少數君主貴族之權利與名譽，於多數國民之幸福無與焉……

吾願世之尊孔者勿盲目耳食，隨聲附和。試揩爾目、用爾腦，細察孔子之道果為何物，現代生活果作何態。訴諸良心，下一是非、善惡、進化或退化之明白判斷。<sup>24</sup>

陳獨秀把儒家文化等同於封建主義，很快成為 20 世紀的中國男女所熟悉的概念。婦女所受的壓迫主要（或者曾被視為）與封建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這一分析框架並不能解釋封建主義階段之後的男女不平等，但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中國仍然把「封建殘餘」看作是當前婦女受壓迫的根源。認為儒家「封建」文化壓迫婦女且應被拋棄，這種思想在 1910 年代卻是很有解放意義的。

如果婦女地位低下從一個側面證明了儒家文化的落後，那麼中國文化要進步和發展，就必須改變婦女的地位。康有為、梁啟超等晚清改良派通過艱辛努力來戒纏足、興女學，因為他們堅信中國婦女的落後阻礙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根據同樣的進化論邏輯，新文化人士首先把注意力轉移到婦女狀況上來。但是新文化人士的目的不僅僅是改變纏足和文盲問題。在他們看來，婦女的從屬地位以及導致她們地位低下的文化都應該被改變。換言之，如果沒有新女性的誕生，就不能說中國擁有了新文化、變得更文明。因此，陳獨秀等新文化人士認為，號召人們關注婦女問題顯得極為緊迫。

陳獨秀不久後就開始了接觸婦女的特別努力。1917年2月，《新青年》開設了一個「女子問題」專欄。據說作者都是女性，但是後來證明起碼其中一篇文章是由男性所寫。這一專欄在隨後五個月的四期《新青年》雜誌中都有出現，一共發表了七篇關於婦女的文章。〈女權平議〉是其中一篇，後來被證明這篇文章其實是出自那位所謂作者的丈夫吳虞之手。<sup>25</sup> 這些文章鼓吹婦女平等的教育權和職業權，批判儒家思想中的男尊女卑、封建禮教和婚姻制度，提倡女權革命。一些作者仍然認為，女子教育的目標是培養賢妻良母。但是最激進的這篇〈女權平議〉，堅持認為女權革命勢在必行。文中，吳虞引用孔子的話來證明中國婦女的從屬地位以及平等權利的缺乏。他描述西方婦女日益在公共事務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她們當前為參與政治進行的鬥爭，他強調這正是世界大勢所趨。他號召中國婦女努力學習並提高能力，以獲取自身的權利，並希望中國婦女「同男子奮鬥於國家主義之中，追蹤於今日英德之婦女」。<sup>26</sup>

「女子問題」專欄最終停辦，可能是因為在1917年的時候女性撰稿者還太少，也可能是因為《新青年》還沒有大規模的女性讀者群。編輯劉半農寫道：「女子問題，本志非常注意；只因外間來稿甚少，記者等把自己的主張發表了，也沒有人來討論，所以不知不覺，竟像把這個問題冷擱起來了。」編輯陶履恭說：「欲求其能無所忌憚研究女子

問題，解決女子問題，釋女子之真性，明女子之真位置，定女子與國家社會相密接之關係者，殆若鳳毛，若麟角。」<sup>27</sup>

然而事實上，女性讀者的冷淡反響並沒有讓《新青年》的男性偃旗息鼓。她們的反應可能起到了一定的反作用：新文化的男性先鋒比以往更加堅信他們要承擔喚醒中國婦女的責任。陶履恭在1918年1月發表的〈女子問題〉一文中討論了西方女子追求經濟獨立，以及她們正在變化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陶履恭強調，西方女權主義思想在上個世紀已出現，並提到了幾個著名的女子理論家，如愛倫凱(Ellen Key)和亞當斯(Jane Addams)。他認為，西方社會的變革導致了教育和職業的平等這些婦女問題的出現，這些新思想也警醒婦女去重視這些問題。西方這種模式與中國婦女息息相關。陶履恭認為：

然今日之世界，乃交通頻繁之世界，經濟、職業、思想之發展，無不遍佈於全球，成世界的潮流。現於歐洲今日之社會者，明日即將現於吾族之社會。今日歐美之女子問題，必將遠見臨於此邦，無俟疑惑。至於預俟其來，謀解決之方，則責難任重，匪一人任。要在今日之青年，而尤在今日之青年女子。<sup>28</sup>

陶履恭表達的這種觀點，在當時的新文化人士中普遍存在。他們對進化論深信不疑，「對融入世界大潮流的渴望」使得他們相信普世價值。<sup>29</sup> 中華民族受儒家思想的羈絆，現在還處於低級的發展階段。為了加速發展進程，中國人應該以西方文化為榜樣，自覺改造自身。此外，西方婦女生活的快速發展變化是現代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照此推理，只有當中國婦女生活發生同樣的變化，中國才會邁向現代。因此，以西方視角來討論中國婦女問題，就成為新文化人士推進中國邁向現代文明所作出的熱切努力的一部分。

著名的「新文學」先驅胡適也曾用西方模式來鼓勵中國女子。在〈美國的婦人〉一文中(原是胡適在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所作的演講)，他堅持認為美國婦女是為了自由和獨立之人格而奮鬥，中國婦女要學習

美國婦女的「自立心」，擺脫依賴：「初看去，似乎完全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其實是善良社會絕不可少的條件。」<sup>30</sup>

胡適關於個人主義的宣揚隨著易卜生戲劇《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出版達到了高潮。1918年，胡適策劃了一期《新青年》「易卜生主義」專號。《玩偶之家》被翻譯成中文，譯名為《娜拉》。易卜生對歐洲父權家庭的批判被用來抨擊中國家庭。主人公娜拉反抗罪惡的家庭制度，象徵著個人的抗爭。在她離開家庭之前，她對丈夫宣稱：「我是一個人，和你一樣。不管怎樣，我要盡力成為一個人。」因為娜拉的這一番話，她成了受過教育的一代婦女心目中西方行為榜樣的第一人。娜拉以行動表明一名中國新女性應該如何做：勇敢反抗封建家庭，努力做一個獨立的人。娜拉的形象伴隨「獨立人格」的流行話語，在城市受過教育的年輕女性中快速傳播，尤其是五四運動後傳播更為廣泛。本書第二部分的敘述者，雖年歲已高，但身上依然可看到娜拉迴盪的身影。<sup>31</sup>

在為中國女性提出新榜樣的同時，新文化人士希望摧毀儒家的榜樣。清朝覆滅後，軍閥政府仍然保留了提倡守節的舊律。政府鼓勵三種婦女應該被旌表褒揚：一是節婦，其守節年限從30歲之前守節到50歲之後；二是烈女或者烈婦，寧死不受辱，或在喪身失節後自殺，或因夫亡殉節的女子；三是貞女，即未婚夫亡而守節的女子。1910年代的報刊經常發表「節婦」和「烈女」的故事。即使經過20世紀頭十年女權思想的興起，伴隨著辛亥革命許多女革命者的湧現，貞操仍然被看做是女子最重要的美德。<sup>32</sup>

1918年，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譯作〈貞操論〉，對主流的性道德觀進行大膽挑戰。這篇挑釁意味濃厚的文章，原是由日本現代女詩人與謝野晶子所寫。她質疑傳統的貞操觀念，認為貞操不應該與道德捆綁在一起。此外，她揭露了傳統性道德在社會中建構了雙重道德標準，這使得傳統性道德天然具有壓迫性。她宣稱：「倘這貞操道德，同人生的進行發展，不生抵觸，而且有益；那時我們當他新道

德，極歡迎他。若單是女子當守，男子可以寬假；那便是有抵觸，便是反使人生破綻失調的舊式道德，我們不能信賴他。」<sup>33</sup> 與謝野晶子並沒有對貞操道德的文化背景進行詳細說明。但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她強有力的論證道出了一個直接適用於中國情形的普遍真理。

周作人聲稱，翻譯這篇文章只是給那些少數會關注婦女問題的覺醒男人提供參考。胡適迅速作出回應，發表了〈貞操問題〉一文，把現實中貞操觀念與一夫多妻制和合法賣淫共存的荒謬誇張地呈現出來。他公開反對政府關於「節婦」和「烈女」的規定，譴責其為「野蠻殘忍的法律，這種法律，在今日沒有存在的地位」。他號召要形成這樣一種公眾輿論，即勸人作節婦或者烈女者，罪等於故意殺人。除了平等的自由概念之外，胡適還提倡男人和女人的統一性標準。他強調，「貞操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一種態度。因為如此，男子對於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度。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操的待遇。」<sup>34</sup>

緊隨胡適之後的另一位「覺醒」的男性是周作人的哥哥魯迅，他對貞操道德進行了嚴厲攻擊。在〈我之節烈觀〉一文中，魯迅把貞操道德與儒家思想聯繫起來，並指出每當民族處於危難關頭，儒教就把女子貞操作為挽救民族的一個手段。魯迅把矛頭直指宣揚貞操崇拜的軍閥政府，以他一貫的尖銳質問道：「不節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國家？……多妻主義的男子，有無表彰節烈的資格？」據他觀察，「皇帝要臣子盡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節。」他把儒家思想統治下的中國男人描繪成卑鄙的懦夫，他們把女人看作是自己的個人物品。他們引誘並禍害女人，還每每把亡國敗家的原因歸咎女子。作為新文化的鬥士，魯迅在文章結尾處表達了他強烈的願望：「要除去於人生毫無意義的苦痛。要除去製造並賞玩別人苦痛的昏迷和強暴。我們還要發願：要人類都受正當的幸福。」<sup>35</sup>

新文化人士對儒家性道德觀的抨擊對於那個時代來說是極為激進的。他們大肆揭露中國女子的悲慘遭遇，確實挑戰了儒家的倫理道

德。中國男女千百年來習以為常的事、一以貫之的生活方式，如今卻被證明只不過是可以歸結為「吃人」二字的舊習。<sup>36</sup>野蠻的非人體制當然無立足於現代世界之理由。少數「覺醒」的男性以他們直言不諱的勇氣與人道精神，以他們的洞見與睿智，很快就吸引了無數的青年追隨者。在隨後幾年裏，「婦女問題」成為全國熱潮，這證明了這些早期論說的巨大影響力。全國各地受過教育的年輕男女都在討論新的性道德、婚姻、離婚，等等。結果，五四時期男女的性行為也迅速發生了變化。第二部分的敘述將闡明這一點。

五四運動之前，一本剛創刊但已頗具有影響力的雜誌《新潮》發表了一篇文章，總結了新文化人士對婦女解放的觀點。作者葉紹鈞受到「幾個先覺的言論」的啟發，對「女子人格問題」進行了詳細分析。他把「人格」定義為「做大群裏獨立健全的分子的一種精神」。他認為中國婦女沒有人格，不僅是因為勞動的性別分工使得婦女在家庭生活中處於依附地位，也是因為儒家思想中的男人由於私心作祟否定女子人格。新文化人士對儒家文化中婦女受到的各種壓迫進行了批判，葉紹鈞追隨他們的步伐，羅列出了許多男人限制女人的方式：通過「夫為妻綱」的儒家準則「名分」來限定婦女的從屬地位；通過「賢妻良母」的教育；通過貞操和節烈的道德；把女子當做性和生育工具一樣的附屬品。他極力主張婦女要具有「人」的覺悟：

女子自身，應知道自己是個「人」，所以要把能力充分發展，做凡是「人」當做的事。又應知道「人」但當服從真理，那荒謬的「名分」、「偽道德」，便該唾棄他、破壞他。……男女大家應該有個共同的概念：我們「人」，個個是進化歷程中一個隊員；個個要做到獨立健全的地步；個個應當享光明、高潔、自由的幸福。<sup>37</sup>

葉紹鈞的文章切中要害，明確表明了女子獨立人格是「婦女問題」的核心，這也是當時新文化人士意識到的問題。獲得獨立人格迅速成為五四時期女權主義的標誌，也同樣成為五四時期新女性的目標和行為標準。

## 男性倡導者的動機

20世紀初期的中國，一大群男性倡導者的出現是當時特殊歷史背景下的一個獨特的社會文化現象。正如我所討論的，國族主義的興起、對儒家思想的批判，以及對進化論、自由人文主義和普世主義的信仰，共同促使這些男性迅速接受女權主義。歐洲和北美的婦女參政運動適時出現，更讓新文化人士堅信，全世界的男女都必將走向平等和自由。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世界局勢向新文化人士傳遞了一個信息：即人文主義或周作人所謂的「人的發現」，應該包括女性。

中國學者舒蕪研究了周作人關於婦女解放的思想後，評論道：

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初期，關於婦女解放和一般婦女問題的先進思想，都是以「人的發現」這個根本思想為指導的。「人的發現」，在歐洲是十五世紀十六世紀的事，到了二十世紀之初已是陳年老帳，但在中國，還非常新鮮。歐洲的「人的發現」，本不包括女人，又過了兩個世紀，才有了「女性的發現」。中國確實兩個發現同時並提，任務的艱巨當然過於歐洲，落後民族的追趕本來只要加倍地吃力；但是兩個發現「畢其功於一役」，不必像歐洲那樣再經過兩個世紀的距離，單論這個速度，也可以說是後來居上。<sup>38</sup>

中國啟蒙運動被視為符合普遍的進化歷程，不同之處在於，新來者在成功趕上時有後知之明的優勢。歐洲啟蒙運動開始僅關注男性權利，因此西方在等待了兩個世紀後才迎來了第二個發現，即「女性的發現」。中國啟蒙運動的支持者已經充分意識到了西方早期模式的局限性，而用他們的普世思維來看，如果中國啟蒙運動納入婦女解放，中國能夠跨越這段長時間的間隔。此外，許多新文化人士觀察到西方社會仍然是以男性為中心。若能實現婦女解放，中國在邁向現代文明過程中或許能「超越」西方。<sup>39</sup>

舒蕪的研究表明新文化運動中人文主義和普世主義的線索，這在歷史文獻中也得以證明。另一位中國學者錢理群則強調在新文化人士

關於婦女問題的觀點中，世界主義有多麼重要。錢理群認為，新文化運動中「人的覺醒」，同時也是「個體意識」和「人類意識」的覺醒。新文化人士對個體發展的關注與對人類未來的深切憂慮緊密聯繫在一起。事實上，他們對婦女問題的思考包含了對整體人性發展的思考。<sup>40</sup>

葉紅玉在其研究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著作中，注意到這些知識分子對民主有著同樣的世界性的國際主義 (cosmopolitan-internationalist) 的責任感。她對陳獨秀和李大釗進行了分析，評論說：

可以確定的是，他們之所以希望建立一種「民主的」國際關係，是出於國族主義關懷，因為這種關係會促進落後民族以獨立與尊嚴。即便如此，國族主義關懷至少沒有使這兩位著名知識分子的世界性國際主義的民主視野局限在只是關注驅走壓迫上，而是進一步激勵他們站在國際的高度，去重視更為積極的因素——愛、互相尊重、互相幫助。<sup>41</sup>

這種世界性國際主義思想在關於婦女的新文化著作中非常普遍。作者經常在同一篇文章中既討論中國的婦女問題，也討論西方的婦女問題，表達出對全人類的關注。李大釗寫了〈戰後之婦人問題〉一文，考察了西方婦女的狀況以及西方的女權運動。這篇文章不僅顯示了李大釗對西方歷史發展的熟悉，也證明了他對性別和階級之間關係的深入理解。如此用心的研究不僅是因為他對中國的深切憂慮，也是因為他對世界文明的深切憂慮。在文章最後，他寫道：「我們中國的女界，對於這世界的婦人問題，有點興趣沒有，我可不敢武斷。但是我狠盼望我們中國不要長有這『半身不遂』的社會。我狠盼望不要因為世界上有我們中國，就讓這新世紀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半身不遂』的文明。」<sup>42</sup>

李大釗關於人類未來的烏托邦願景強調了性別的中心地位，這與康有為在《大同書》裏強調的重點是一樣的。在五四運動後逐漸高漲的學生運動中，李大釗寫了〈婦女解放與 Democracy〉一文，以發起一場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他在文章裏寫道：



社會上一切階級都可變動，富者可變為貧，貧者可變為富，地主、資主可變為工人，工人可轉為地主、資主，社會若經過適當的改造，這等階級都可歸於消泯，獨有男女兩性是一個永久的界限，不能改變，所以兩性間的Democracy比什麼都要緊。我們要是要求兩性間的Democracy，這婦女解放的運動，也比什麼都要緊。<sup>43</sup>

在以後的年月裏，共產黨的理論強調，無產階級革命高於一切，婦女解放只有通過婦女參與革命才能實現，而不是通過獨立的女權主義運動。然而，在新文化運動的第一階段，那些包括共產黨創始人陳獨秀和李大釗在內的男性先驅堅持以性別議題為中心。儘管他們最初出於各種不同的思想與關切來思考性別議題，而且其中許多人不斷地改變思想立場，但是這些名聲顯赫的男性的一致聲音還是給婦女解放創造了一種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的話語。

在我們停止討論這些男性倡導者之前，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探討：在他們公開表明自己對婦女解放的思想投入的背後，是否在潛意識層面有什麼可以解釋他們的行動呢？

在一項有趣的研究〈絕望的語言：五四作者對「新女性」的意識形態表述〉中，陳清僑論證到「近代知識分子拼命地想要借『他者』在危機中的突變來再現自己」。他認為，五四知識分子不僅向他們的讀者傳達了一種動蕩與困惑的危機感，而且事實上也塑造了歷史危機的集體意識。他還指出：「對於五四知識分子而言（其中有各種各樣的反傳統的作家），抓住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時刻，本質上就是要喚起那些危機體驗，**用作**建立一種新的再現模式，這其實就是一個再現本身的問題。」他認為，這種再現（representation）行為應該「被視為植根於五四作家們集體無意識中的身分危機的物化過程」。<sup>44</sup> 因此，五四男性對新女性形象的建構折射的是這些男性對於其自身身分危機的無意識焦慮。

陳清僑集中討論了五四男性作家的文學作品對婦女的再現。他的主旨與我的研究不同，我要探究的是男性倡導者對傳統的社會性別

關係的破壞。他的研究資料也與我的不同，他討論的不是由五四男性知識分子所撰寫的關於婦女的非文學文本。非文學文本中傳遞出的信息——比如關於婦女問題的論爭以及女權運動的熱議——通常與那些文學文本大相徑庭。正如陳清僑所揭示的，文學作品對新女性的再現就使用了性別二元論，即智性的自我（男性）和感性的他者（女性）的對立。但是在非文學文本中，最為普遍的主題是呼籲不分性別、普世人類的自由觀念，這與性別二元論是完全矛盾的。我們之前對男性倡導者們的非文學作品的討論已表明，男性認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目標就是要讓中國婦女跨越性別界線，成為獨立的人。因此，對新女性的文學再現儘管是五四時期新女性話語的一部分，卻應當完全區別於同一話語中佔主導地位的自由人文主義主題。這一區別可以幫助我們理解真實的新女性的主體建構，而非那種只是作為一種比喻存在於男性文學再現中的新女性。

如果我們記住這一區別，陳清僑的再現理論就有助於我們去探究男性倡導者對婦女解放的提倡。畢竟男性創作的非文學文本也不過是一種不同的再現而已，其中對於儒家文化壓迫婦女的批判以及對於婦女解放的鼓吹，都突出了「近代知識分子拼命地想要用性別議題來再現他自己」這一點。他們對中國社會性別制度的攻擊表達了自己對舊文化的疏離。他們擁護娜拉，不僅曝露出他們對中國的等級制和父權制家庭的沮喪，而且在更深層顯示出，他們憎恨在自身所處的社會結構中經歷的負擔與束縛，這種社會結構基於等級差序的人倫關係網以及由此衍生的責任與義務（即儒家道德）。男性精英夢想自己成為一個擁有個體自由的獨立人。此外，他最根本的危機還源於他痛苦地意識到身在被西方半殖民化的中國，他是處於邊緣和下屬的位置。中國男性文人多個世紀以來所享有的優越感被強勢且又「高人一頭」的西方顛覆了。近代知識分子率先找到了婦女這個「受壓迫的」、「卑微的」社會群體，以此重新肯定了他們自己的優越性。簡而言之，他們大聲疾呼婦女解放，也是在**再現**，抑或喊出他們自己有意識或無意識的慾望、矛盾衝突和危機感。<sup>45</sup>

近代知識分子的再現需求在心理層面上是與其無意識的身分危機相勾連的，這一點在陳清僑的研究中已經進行了分析。如果我們秉持身分危機這個概念，或許可以從一種文化和社會的視角來考察男性的再現需求問題。為什麼受過西方教育的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沒有徑直舉起自我解放的大旗，而是舉起了婦女解放的大旗？是什麼阻止他們用行動公開表達自我解放的慾望？這些問題與許多研究五四中國知識分子的西方學者的一個觀點相關：就連所謂的文化叛逆者或反傳統者也被他們想改造的舊文化所緊緊束縛。<sup>46</sup> 在儒家文化的霸權下，個人利益不能公開作為個人行動的目標，尤其當一個人渴望社會聲望的時候。儒家「克己復禮」的信條使得「做自己」或「表達自己」不具有合法性。相反，儒家道德體系「雖然給予了遵從其準則的個人高度滿足感，但每個人的行為都要投射到家庭或更大的社會利益上去」。<sup>47</sup> 講倫理、有道德，就是要履行對他人的社會義務。想要在社會上立足的人就必須表現出最起碼的社會意識。在這種文化背景中，要求自我解放就不具有合法性，而任何提出這一要求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宣揚西方個人主義的新文化人士，還是必須有意無意地以國家富強和現代性的名義使這一努力合法化。從這個角度來看，婦女作為一個受壓迫的社會群體被新文化人士所發現，實屬幸運。知識分子們通過再現婦女的壓迫，不僅表達了他們自身的疏離與失落，更重要的是，他們得以在一個動蕩不安的世界中確立自己的社會位置。正如周作人在1927年敏銳地評論到：「群眾還是現在最時新的偶像，什麼自己所要做的事都是應民眾之要求，等於古時之奉天承運。」<sup>48</sup>

中國婦女是近現代知識分子選擇代言的第一個受壓迫群體。此後，在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影響下，左翼知識分子開始代言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這樣的情形到1927年達到頂峰，以至於脫離了左翼的周作人覺得他必須要批判這一現象。

通過再現受壓迫婦女，知識分子同時在幾方面獲益。他們滿足了自身文化養成的應盡的社會責任，也滿足了社會對學者的期望。爭取

婦女解放與他們在「新文學」上所花的努力不同，新文學僅僅被看做是文人之間對文學形式的爭論，但婦女問題是一個可能有著眾多支持者的社會問題。現在，用新的文學形式和「白話」來倡導婦女解放，知識分子發現自己迅速從以前的默默無聞變得聲名鵲起。五四學生運動中關於婦女問題的熱烈討論，或者由當時婦女問題引起的激烈爭論，既證明了新文化人士日漸增強的影響力，也使他們的影響力超出了文學界。到1920年代初期，少數新文化人士把自己定位為引導青年邁向新時代的導師。如果不理解男性先驅關於婦女解放的潛在利益（心理或社會方面），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五四時期如此之多受過教育的男性會對他們的足跡趨之若鶩。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歷史時刻，受過教育的男女都因男性創造的女權主義話語而被賦權了！

然而，新文化人士對中國婦女的再現還是有問題的。正如陳清僑所指出，在男性的文學再現中，新女性言說的並非她們自己的心聲，而是男性所思。這些男性再現損害了顛覆關於婦女的霸權話語的初心。孟悅和戴錦華在她們五四文學作品的研究中評論到：文學文本中的「受壓迫婦女」和新女性都是男性對婦女刻板印象的產物，而不是對這一歷史時期婦女的真實描述。她們發現，男性的話語「既要女人覺醒又要女人沉睡」。<sup>49</sup> 俞明寶在其關於中國近代小說的研究中，進一步批評了五四男性作家沒能把婦女問題與語言本身聯繫起來：「女人的聲音在歷史上被各種再現工具所淹沒，現在仍被五四時期革命知識分子所倡導的、新的語言工具所壓抑……即使作家們真心想要維護婦女，但他們的著述卻曝露了父權傳統的話語習慣，即在表達中排除婦女經驗。」<sup>50</sup>

當婦女在更廣闊的社會場景中，而不是在他們的文學形象中，被男性創造的女權主義話語激勵，新的動力就進入社會場域，開始顛覆了男性倡導者的想像。1920年代初期在婦女自己組織的婦女解放活動中，她們大聲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受到婦女解放這一新話語的激勵，許多受過教育的女性勇敢地追求她們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繼續沉

睡」。我在本項研究中強調：婦女不是被動地由男性話語所塑造。相比於男性作者建構的新女性形象，五四時期的新女性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然而，新文化精英的話語權力弔詭地一方面激發了女權主義運動，一方面又削弱了中國婦女解放事業。

隨著新文化人士日益增長的話語和政治權力（尤其是1920年代後），他們明確界定了他們為什麼要婦女解放以及什麼是婦女解放的內涵。1920年代早期，新文化人士上升為思想話語的中心後，他們對於自己在闡釋婦女問題上的權威地位感到躊躇滿志，也對婦女自身為解放所做的努力嗤之以鼻。倡導中國女權主義運動的著名先驅沈雁冰發表〈評《新婦女》〉，批評這份由婦女創辦的雜誌，文中流露出不加掩飾的優越感。在他看來，婦女所撰寫的關於婦女解放主題的文章只是證明了作者們對西方思想和文學理論的無知。這些文章「專做人人皆知、報報皆見的話」，因而毫無價值。他對婦女作家缺乏知識而感到悲哀，並以一個新文化捍衛者的口吻告誡她們：「我還勸做《新婦女》諸位女士將來讀好了書一定要發表意見時，還是不要『自立門戶』的好，因為新文化運動的出版物不求分量的多，應求程度的高呵。」<sup>51</sup>

男性倡導者既打破了又維護了社會性別等級關係。對許多婦女來說，新文化人士挑戰儒家父權制，是一種解放。但是，她們隨即又在新文化精英身上發現了新的男性權威。新文化精英理所當然承擔著知識和道德權威的角色，而不論男女都對這種男權似乎毫無疑慮，看不見它對發展獨立的婦女運動造成的掣肘。

隨著思想潮流和政治形勢的變化，男性倡導者對婦女解放的界定也發生了變化。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個人主義被用來反抗儒家文化，女子被鼓勵做獨立的人，來反抗封建主義。在左翼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後，個人主義的主題則被對社會主義革命的宣傳所取代。陳獨秀在1921年面對婦女的一次演講中強調，婦女只要離開家庭就能獲得獨立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婦女即使在社會中謀得職業，她們仍然是資本家的奴隸，婦女只能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獲得

獨立人格：「婦女的痛苦，十件總有九件經濟問題，而社會主義不止解決婦女的問題，且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所以希望男女要全部努力於社會主義。」<sup>52</sup> 陳獨秀對於婦女問題進行的初步馬克思主義分析，得到當時歐洲社會主義關於婦女的翻譯著作所支撐，並逐漸發展成為共產黨在婦女問題上的主流理論。五四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認可，部分動因是出於探索解決婦女問題的道路，但在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分析框架下，性別議題很快被階級鬥爭所掩蓋。<sup>53</sup>

五四男性為婦女代言最大的問題也許是：他們將婦女解放作為其實現更宏大目標的手段，而非將婦女解放就作為目標。這些公開表明的目標包括推翻封建主義、推動國家現代化、打倒帝國主義，以及後來的挽救民族危亡。將婦女解放與這些宏偉目標聯繫在一起，有助於為推動婦女進入公共領域掃除障礙，但與此同時，婦女運動只有依附於這些宏偉目標，才能在主流話語體系中獲得合法性。中國婦女解放的利他性最終讓一些婦女感到被利用而不是被解放。本書第二部分的敘述者就表達了這種情緒。

總之，解放者的角色讓五四知識分子掩蓋了新文化人士自身思想中新舊文化之間的矛盾衝突。新文化人士將儒家文化視為壓迫者，並成功地將自身置於壓迫者的對立面。此時，沒有人去質問這些新文化精英：「你們在多大程度上本身就是霸權性儒家話語的產物？又採取了哪些具體措施來處理內心深處習以為常的父權觀念？」有大量討論談及了婦女應如何克服各種障礙以獲得解放，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探究男子尋求自身解放時會有的問題則鮮見，尤其是如何從父權文化的建構和束縛中獲得心靈上的解放。<sup>54</sup> 換言之，提高女子的覺悟與提高男子的覺悟並不同步。解放者的定位似乎使得男性倡導者免去了自我審視的責任。其結果是，男性中心和父權話語不僅存在於許多新文化人士的著述中，也在其私人生活中大行其道。

魯迅的生活就是重蹈父權制覆轍的最好例證。經過一段長期不幸的包辦婚姻後，魯迅與小他17歲的學生許廣平戀愛了。許廣平是一位

新女性，曾是天津五四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她被五四時期女權主義話語深深吸引，準備打破「舊道德」並去追求自己的真愛：「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而彼此間在情投意合，以同志一樣相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sup>55</sup> 許廣平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在知道魯迅沒有和原配妻子（魯迅視其為「舊制度的犧牲品」）離婚的情況下，仍然與魯迅共同生活。<sup>56</sup>

在他們共同生活的十年中，許廣平一直擔任魯迅的秘書，也為他主持家務。這位新女性多次試圖參與公共活動並尋找一份職業，但每次都遭到魯迅的反對。她想辦一份婦女雜誌，魯迅就說：「這種不疼不癢的東西，辦它幹什麼？」她有了工作機會，魯迅又會說：「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裏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吧。」<sup>57</sup> 為了魯迅，許廣平放棄了有一份獨立職業的夢想。唯一沒有放棄的是，她在與魯迅同居前從教書的薪水裡攢下的300塊銀元。如果她和魯迅分開了，這筆錢足夠支撐她找到一份工作前幾個月的生活。

對於許廣平這樣的新女性來說，為了所愛的男人清醒地犧牲一切是很痛苦的。正如她寫道：「他的工作是偉大的，然而我不過是做了個家庭主婦吧！」這種想法讓她極度痛苦，但不會改變她自我犧牲的行為模式。她非常清楚自己內心衝突的原因：「我想，我大約是有一點舊頭腦，有一點新思想融合起來的一個東西。這東西也許被一些人所滿意，如對手<sup>58</sup> 方面就是，然而自己本身則是不滿意的，有苦悶的——有時被新思想所指引，不甘於現狀；有時被舊道德所涵養，又安於現狀。」<sup>59</sup>

這段話可謂一針見血：新與舊集於一身的女人滿足了像魯迅這類男人的需求。新文化人士倡導著婦女解放事業，卻並非都願意放棄男權社會中的男性特權，而這種特權只有靠女人的自我犧牲才能維繫。儘管如許廣平這樣的新女性深受男女平等原則的鼓舞，但同時她們也背負著深埋於她們潛意識中的儒家道德。作為女人，尤其是一個年輕

女子，面對德高望重的年長男子的要求，堅持平等權利和平等待遇就會顯得是不道德和自私的。平等的「新」準則，與壁壘森嚴的等級差序人倫關係和責任義務組成的「舊」原則產生直接的衝突。在許廣平身上，「舊」倫理在新女性個人生活中佔據了上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許廣平與魯迅的關係，即年輕學生和年長教師之間的關係、被解放者與解放者之間的關係，正體現了新女性與五四時期男性倡導者之間的關係。新女性承載的歷史包袱對五四時期男性來說是一種福音。男性倡導者的優越感以及他們在男權文化中理所當然地享受的男性特權沒有受到挑戰，反而在一個婦女解放洶湧澎湃的年代裏得以維持。

## 注釋

- 1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28），頁2-3。
- 2 陳望道，〈中國女子底覺醒〉，《新女性》，第1卷，第9期（1926），頁639。
- 3 Witke,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331.
- 4 康有為的女權主義觀點可能是受一部美國烏托邦小說《回顧》（*Looking Backward*）的影響。《回顧》於1888年在美國首版即成為暢銷書，不僅引起19世紀末美國改革家的重視，更吸引了中國改革家的目光，數年後便被譯介至中文世界。這部小說批判了19世紀美國的兩性關係，並且表達了與當時西方女權主義思想相似的觀點。見Edward Bellamy,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Penguin Books, 1986), 183-193。
- 5 康有為，《大同書》（中華書局，1935），第五章。康有為的女權主義觀點，在很多方面都早於當時的西方女權主義思想。比如，他提出家族制是婦女從屬地位的罪魁禍首，認為婦女的生育是導致她們從屬地位的一個重要因素。
- 6 Jung-pang Lo (羅榮邦), ed., *K'ang Yo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康有為評傳)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38-39. 關於康有為和《大同書》，以及他在中國婦女解放中扮演的角色，參見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頁232-242、416。
- 7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28），頁316-329。
- 8 愛自由者金一（金天翮），《女界鐘》（大同書局，1903），頁3。關於金天翮的研究，參見李又寧，〈女界鐘與中華女性的現代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1055–1082；另見王政等，〈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

- 9 愛自由者金一，《女界鐘》，頁48。
- 10 同上注，頁50–67。
- 11 同上注，頁45。
- 12 關於《女界鐘》影響的討論，參見熊月之，《中國近代民族思想史》，頁431–433。
- 13 沈智，〈辛亥革命前後的女子報刊〉，《辛亥革命70週年念學術討論會·資料II》，編號73（武漢，1981）。也可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37–61。關於何震與她的報紙《天義報》，參見Lydia Liu, et al.,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Femi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Peter Zarrow（沙培德），*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無政府主義和中國政治文化）(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6。
- 14 楚南女子，〈中國女子之前途〉，《女學報》，第4期（1903），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頁393–396。
- 15 秋瑾（鑑湖女俠），〈勉女權〉，《中國女報》，第2期（1907），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頁441。秋瑾是由孫中山創立的反滿組織中國同盟會中少數的女性成員之一。
- 16 鮑家麟提出了有力的論證：秋瑾在被捕前本有充裕時間脫身，卻選擇留下，源於她始終希望成為英雄——一如那些為反滿事業獻身的男性烈士。參見鮑家麟，〈秋瑾與清末婦女運動〉，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稻鄉出版社，1992），頁346–382。秋瑾的出生年並不明確，不同的歷史學家引用不同的年分。王士倫研究了秋瑾寫給好友吳芝瑛的蘭譜，推測秋瑾出生於1877年，參見王士倫，〈秋瑾出生年代〉，《歷史研究》，第12期（1979），頁64–65。秋瑾被捕後在自白書中寫到她當時29歲，但吳芝瑛則說秋瑾被害時31歲。這種差異可能是因中國和西方計算年齡的方式不一樣而成。
- 17 如果秋瑾沒有在革命中犧牲，她很可能成為傑出的婦女參政運動者，就如她的革命夥伴一樣。關於1910年代早期中國婦女參政運動者的進一步討論，參閱本書第四章和第五章。
- 18 袁世凱（1859–1916）是晚清北洋軍的首領。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他在促使清朝皇帝退位上起了重要作用。由於他在軍事上的權力和威望，辛亥革命領袖孫中山讓他當中華民國總統。袁世凱政府的一系列行動令為民國奮鬥的中國人心灰意冷。最終袁世凱曝露了其政治野心，於1915年稱帝。

- 19 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期（1915），頁2。
- 20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5期（1915），頁3。
- 21 陳獨秀的北大學生們對他的這一創舉進行了這樣的描述，另一位著名的新文化運動者周作人是陳獨秀的同事，他認為這一描述「很得要領」。參見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頁483。
- 22 1914年，陳獨秀告訴他的朋友：「我辦十年的雜誌，全國的思想都會改觀」。1916年，他被邀請前往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他以正在辦《新青年》雜誌為由謝絕了。當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可以帶著雜誌前往北京時，陳獨秀才接受了這一邀請。在這一時期，改變人們的思想是陳獨秀和其他新文化人士的目的。參見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63–76。也可參見Lee Feigon (李芾甘),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創立者)(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23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4期（1916），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頁99–105。
- 24 同上注，頁104–105。
- 25 〈女權平議〉發表後，吳虞在《新青年》上以自己的名字發表了許多篇文章。他成為一名傑出的新文化人士，並且以批判儒家思想而聲名鵲起。
- 26 吳虞，〈女權平議〉，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8–14。雖然「女權平議」提出了爭論焦點，並且包含了激進的觀點，但作為那個時代最早關注女權的文章之一，並沒有得到應該有的公眾關注度。陳東原研究了《新青年》中較有影響的婦女解放的論文，但沒有提到這一篇。可能這篇文章是以文言文寫成，影響了文章的普及。其他更有影響的文章是以白話文形式寫成，這抓住了潛在的女性讀者。但吳虞其他一些令他聲名大噪的文章同樣以文言文寫成，唯一的區別在於那些文章署上了他的本名，或許吸引讀者的是他的名字本身；而遺憾的是，〈女權平議〉用了一個女性的署名，其重要性似乎因此打了折扣。
- 27 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1905–1949〉（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頁111–117。
- 28 陶履恭，〈女子問題〉，《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頁19。
- 29 參見Hung-yok Ip (葉紅玉), “More Than Ideological Beings” (超越意識形態),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94)。葉紅玉對五四知識分子的世界觀進行了詳細論述。她把五四知識分子的世界主義觀點定義為「融入主流世界的渴望」，頁81。

- 30 胡適，〈美國的婦人〉，《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頁213–224。
- 31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5卷，第6期（1918），頁489–507。關於娜拉對中國女性影響的討論，見Witke,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164–167；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69；陳東原，《中國婦女運動史》，頁375–376。關於胡適的研究，參見Jerome B. Grieder（賈祖麟），*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1917–1937*（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與關於中國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其他著作一樣，賈祖麟也忽略了胡適對推動中國婦女解放所作出的努力。中國「新女性」的出現，證明了胡適及其同仁傳播西方自由主義的成功。鑒於上個世紀中國婦女生活發生的變化，正如賈祖麟所指出的那樣，新文化人士的努力並不能被認為是失敗的。
- 32 胡適，〈貞操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期（1918），頁5–14。
- 33 與謝野晶子，〈貞操論〉，周作人譯，《新青年》，第4卷，第5期（1918），頁386–394。關於日本女權主義的研究，參見Sharon L. Sievers, *Flowers in Salt: The Beginning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鹽中之花——現代日本女權思想的肇始）（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與謝野晶子詩歌的英譯本，參見Akiko Yosano, *Tangled Hair: Love Poems of Yosano Akiko*（亂髮——與謝野晶子的愛情詩），trans. Dennis Maloney, and Hide Oshiro Hide（White Pine Press, 1987）。
- 34 胡適，〈貞操問題〉。他還寫了兩篇抨擊貞操崇拜的文章：〈論貞操問題〉和〈論女子為強暴所污〉，見《胡適文存》（遠東圖書公司，1968），第1卷，第4冊，頁676–685。
- 35 魯迅（唐俟），〈我之節烈觀〉，《新青年》，第5卷，第2期（1918），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115–123。這篇文章呈現了魯迅其著名故事《祝福》中的早期觀點。參見魯迅，〈祝福〉，文學出版社編，《魯迅選集》（文學出版社，1956），頁78–94。
- 36 在魯迅1918年發表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中，他用「吃人」的比喻來譴責孔子教條的殘忍。吳虞隨後寫了一篇名為〈吃人與禮教〉的文章。這兩篇文章都很有影響，對現代中國的反儒家思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 37 葉紹鈞（葉聖陶），〈女子人格問題〉，《新潮》，第1卷，第2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124–130。葉紹鈞文章所用的語言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徵，「獨立健全」、「光明高尚」等詞語經常出現在新文化人士和五四學生所寫的文章中，並經常為20世紀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所用。使用這些標誌著烏托邦理想的詞語，意在構建一種新的國家話語。
- 38 舒蕪編，《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導言部分頁5–6。參見周作人，〈人的文學〉，見舒蕪編，《女性的發現》，正文部分

頁3-10。周作人提倡個人主義的人文主義，聲稱中國經歷了四千年的歷史發展，現在仍然沒有發現「人」。

- 39 例如，李大釗1919年提出婦女解放，並批判了西方：「現代歐美的民主仍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為他們一切的運動、立法、言論、思想都還是以男子為本位，那一半婦女的利害關係，他們都漠不關心。」引自李大釗，〈婦女解放與Democracy〉，《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27。
- 40 錢理群，《周作人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124。
- 41 Hung-yok Ip, "More Than Ideological Beings," 94.
- 42 李大釗，〈戰後之婦人問題〉，《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20。《女界鐘》作者金天翮早期曾使用過「半身不遂」這個比喻，當時他提出如果婦女沒有受教育權，那麼這個民族就像一個半身不遂的人。這樣的半身癱瘓最終會影響身體的另一半。因為新文化人士不斷重複使用，這個詞語在五四時代變得眾所周知。許多人用這個詞把婦女解放與中華民族聯繫起來，但李大釗想表達的是超越民族利益的關注。
- 43 李大釗，〈婦女解放與Democracy〉，頁27。
- 44 Ching-kiu Stephen Chan (陳清僑), "The Language of Despair: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ew Women' by May Fourth Writers" (失望的語言：五四作者對「新女性」的意識形態表述),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4, no. 1/2 (1988): 19-38.
- 45 關於中西方社會結構的對比，以及對儒家準則規定的中國人的道德義務的討論，見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
- 46 新文化人士身上帶有的這種文化延續性，見Grieder,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Feigon, *Chen Duxiu*；以及Vera Schwarcz (舒衡哲),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中國的啟蒙運動)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47 Frederick W. Mote (牟複禮),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中國思想的淵源) (McGraw-Hill, 1989), 41. 在儒家觀念中，一個人之所以為人，取決於他（她）有否按照儒家道德準則來行為處事。關於儒家文化中自我與社會的進一步討論，見Fei, *From the Soil*的導論。
- 48 周作人，〈北溝沿通信〉，舒蕪編，《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頁12。
- 49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頁43。
- 50 Ming-bao Yue (俞明寶), "Gender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近代中國小說起源的性別分析),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20世紀中國文學和社會中的性別和性), ed. Lu Tonglin (呂彤林)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48, 54.

- 51 佩韋 (沈雁冰), 〈評「新婦女」〉, 《婦女雜誌》, 第6卷, 第2期 (1920), 頁3。
- 52 陳獨秀, 〈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 《廣東群報》, 1921年1月21日,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 《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 頁82–83。
- 53 不管他們在學術流派還是政治取向上有多大不同, 大部分思考婦女解放問題的五四男性都認為廢除私有制是婦女最終解放的前提條件。因此, 社會主義被視為婦女問題的根本解決途徑, 很受歡迎。陳獨秀用簡單的語言表達了這樣的思想邏輯: 「婦女和勞工都是弱者。如果我們想幫助弱者對抗強者, 除了社會主義別無他法。」同上注。
- 54 關於這方面, 周作人是新文化人士中的一個例外。他堅持不懈地批評男性的自我中心。在〈北溝沿通信〉一文中他強調, 「現在最大的謬誤是在一切以男子為標準, 即婦女運動也逃不出這個圈子」。後來幾年裏, 他繼續寫短文來表達他對男性中心文化中的婦女命運的關心。在許多短文中, 他都強調了女性應自覺從事婦女解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這表明了他並不信任男子為婦女利益而開展的活動。然而, 在五四時期, 他對男子中心文化的關注被女性自由所取代。周作人關於婦女解放的一系列討論, 參見舒蕪編, 《女性的發現: 知堂婦女論類抄》(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0)。

李人杰 1920 年寫的〈男女解放〉提及男性解放的主題, 指出很少人關注男性解放並對這問題發表意見。他認為私有制讓男人遭受痛苦, 但是消除私有制的必要前提是女性獨立。因此, 女性解放應先於男性解放, 且男子要幫助女子獲得獨立。他鼓勵男子在女子解放中要意識到自己的利益, 以免男子在提倡婦女解放時言不由衷。他講了一個朋友的故事, 這位朋友發表了很多關於婦女解放的演講, 但他自己卻納妾並對妻子實行家庭暴力。參見李人杰, 〈男女解放〉, 梅生編, 《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 第一冊》(新文化出版社, 1929), 頁68–88。

- 55 出自許廣平寫給許壽裳的信, 許壽裳於1936年魯迅逝世後寫了《魯迅年譜》。引自曾智中, 《三人行: 魯迅與許廣平、朱安》(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0), 頁391–392。在這部傳記中, 曾智中用歷史文獻再現了魯迅的私人生活, 以及魯迅與原配夫人朱安和事實婚姻妻子許廣平的關係。
- 56 參見魯迅 (唐俟), 〈隨感錄四十〉, 《新青年》, 第1卷, 第6期 (1919),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 《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 頁200–201。這篇文章寫於1919年, 魯迅表達了無愛婚姻的痛苦, 以及對原配妻子的道德責任。因為她也是舊習俗的犧牲品, 魯迅當時覺得要犧牲自己的幸福來永遠陪伴她。即使他和許廣平共同生活後, 他繼續給朱安提供資金上

的資助來盡責。要理解魯迅關於追求愛情的思想轉變以及他與許廣平之間的關係，參見魯迅，《兩地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57 曾智中，《三人行》，頁356–357。

58 編注：「對手」今指「對象」。

59 曾智中，《三人行》，頁357–358。



# 2

## 女權主義傳播案例 ——《婦女雜誌》

女權主義理論家克麗絲·維登 (Chris Weedon) 觀察到：「如果想要產生社會效應，一種話語至少要得以傳播。」<sup>1</sup> 造成新文化人士在婦女解放方面的努力與康有為的努力截然迥異的原因，並不是新文化人士的思想更加激進，而是他們的思想比康有為的思想傳播得更廣泛。20世紀初期迅速發展的女子教育，造就了一大批願意接受新思想的女子。五四學生運動進一步將許多女學生轉變為新文化思想的積極傳播者。1919年五四運動後，隨著大批青年男女的參與，婦女雜誌和報紙中的婦女專欄或婦女論壇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湧現。在當時追隨五四文化潮流的主流婦女雜誌中，《婦女雜誌》影響最大、傳播最廣、訂閱最多、生存時間最長。它本身也最有力地詮釋了新文化女權主義的普及過程。



## 1919年五四運動之前的主旋律

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1月出版了《婦女雜誌》，陳獨秀也於同年創辦了《新青年》。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最成功的出版社，其書店遍佈中國28個城市，還有香港、澳門和新加坡。在當時大部分婦女雜誌的傳播都受到渠道和資金的限制，影響有限的背景之下，《婦女雜誌》卻突破重圍，在廣闊的地域範圍內傳播給很多婦女。在1910年代，婦女識字水平仍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雜誌自然把目標瞄準了中上層社會的女子，女教師和女學生也都會向雜誌的專欄和論壇投稿。但是雜誌中大半文章都是由包括主編王蘊章在內的男子所寫，而且雜誌的大部分讀者也是男子。

《婦女雜誌》從一開始就強調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在創刊號中，幾位教師(男女都有)撰稿討論了中國的女子教育，以及《婦女雜誌》在推動女子教育過程中可以扮演的角色。這些作者相信《婦女雜誌》能幫助婦女之間的知識交流，也相信女子教育能培養出國家需要的賢妻良母。如一位女作者寫到：「婦女最大之天職豈非在相夫教子？而雜誌發刊之本意，又豈非遵此職志，為國中造多數之賢妻良母耶？」<sup>2</sup>

在西方榜樣的示範下，通過教育使女子成為賢妻良母的努力被激勵或被合法化了。作者在強調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時，經常會提及西方模式。美國女子持家的形象被作者大肆讚揚和浪漫化，以之來論辯教育可以使中國女子專注於家庭。「以女權最盛之國，其女子亦惟以相夫為本分」，<sup>3</sup> 這位男性作者用美國的「真正女人氣質」來攻擊那些對中國婦女傳統角色有反對意見的人，然而有一位女作者用西方的模式，把女子家庭角色與國家地位聯繫在一起：

近二十年，中外大通，形見勢絀，乃知歐美列強縱橫於世界，非徒船堅炮利也，實由賢母良妻淑女之教，主持於內，為國民之後盾也……吾婦女界夙秉慈善之天性，人之好善，孰不如我，合我全國婦女界二萬萬之心思才力以《婦女雜誌》為機關，互換德智，以求有益於吾國。<sup>4</sup>

清末梁啟超首次將女子教育與國家福祉聯繫在一起。<sup>5</sup>梁啟超用西方和日本提倡女子教育的事例，闡明強大的國家和智慧的民眾都肇始於女子教育的發展。在他影響甚廣的《論女學》中，指出女子作為妻母的傳統角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意義。女子扮演好這些角色的能力決定了中華民族能否屹立於現代世界之林。據梁啟超的分析，強國保種這一雙重目標，完全依賴於受過教育的母親和妻子。梁啟超的倡議以及他和其他改良派創辦女校的舉措，使得20世紀初女子受教育機會穩步擴展。隨著女學的發展，強調賢妻良母具有社會政治意義的言論進入到社會主流話語中。1915年，受過教育的女子仍然在重複梁啟超17年前闡述的主題。<sup>6</sup>

20世紀早期中國賢妻良母的理論與美國早年的「共和國母親論」非常相似。在美國邁向現代國家的發展過程中，18世紀末的美國婦女被稱頌為社會價值守護者，女子教育被看作是女子承擔賢妻良母角色的重要準備：「經過特殊和適當的教育，我們的女士應該具備了合適的能力，可以用自由的原則和政府的規範來教育她們的孩子。」<sup>7</sup>國家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母親如何形塑孩子們的價值觀，因為孩子們將是共和國公民。受過良好教育的共和國母親，將向其兒女灌輸正直、虔誠和愛國的價值觀。

正如共和國母親論使美國、歐洲、日本的女子教育合法化一樣，梁啟超關於母親和妻子具有社會政治作用的闡釋，也使得中國女子教育合法化。國家的需要為女子教育的制度化提供了最初的契機，而這一機會也終將為女子的生活帶來很多變化。雖然受過教育的女子仍然被排除在公共生活外，但共和國母親或者賢妻良母的角色使得她們朝著獲取公民身分方向邁進了一大步。全國對婦女在新國家中角色的討論，實際上宣告國家政治生活將向婦女敞開大門，儘管她們尚處於政治話語體系的邊緣地位。

雖然女子教育在中國的出現，像是在重複其他國家的熟悉故事，但提倡女子教育的不同歷史和政治背景則成為導致不同動態的基礎。

比如，當中國開始倡導女子教育時，日本、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的女子教育已經開展得如火如荼。中國在這方面和其他國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這種反差在當時大量文本中都得到關注和討論，並使國人迫切想要迎頭趕上。此時，中國剛經歷過對西方和日本的戰敗，因此中國學者將女子教育視為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徑。

在美國，女子教育是隨著國家的勝利和強大而擴展。19世紀初，美國在社會、經濟、政治和地理方面都在快速發展和開拓，導致民眾極度渴望穩定。生活在混亂動蕩世界的美國男人祈求家庭的和平和安全，家庭是「沙漠中的綠洲」，是「避難所」，「集同理心、誠實和美德於一體」，更是「逃避生意上的煩惱和困窘」的避風港。男人對心靈港灣的需求激發起對「真正女人氣質」和強調女人家庭角色意識形態的推崇。新出現的中產階級婦女因而被高高捧起，成為寧靜港灣的守護者、堅守美德的衛士。在一片讚譽聲中，美國婦女的傳統家庭角色在急遽變化的世界中得以保留。<sup>8</sup>

相比而言，中國男人將女子帶入政治話語中並不是為了尋求家庭的穩定。相反，他們所冀求的是家庭和國家的改變，使中國在現代世界中更具競爭力。婦女被視為中國亟待開發的一半人力資源。持改革思想的男性知識分子分析指出，中國落後於西方的關鍵癥結在於半數人口還太落後，而女學將引導婦女接受西方主婦範式，改造這落後的一半人口。因此，1919年前《婦女雜誌》中關於中國女子教育的文章呈現出兩個平行的主題：一個主題強調女子教育對於國族的重要性，另一個主題則哀嘆中國女子的「劣根性」。闡釋第一個主題的文章從西方借用了婦人具有仁慈的天性和美德這一概念。但是被討論更多的則是第二個主題：作者不僅聚焦中國女子的種種弱點，還提出為了國家女人必須改造陋習的途徑。有些男性作者的評論近乎對婦女的攻擊，如一作者列舉了中國女子的八大惡習：享樂、懶惰、放蕩、偏執、愚蠢、狹隘、妒忌和惡毒。發表了如此的厭女言論後，他訓誡道：「綜此八者，女界之失德，略盡於此。矯正惡習，修明壺儀，竊有望於女教育家。」<sup>9</sup>

男性的訓誡還出現在一些小故事中。在一篇名為〈國民之敵〉的故事裏，作者描述了他親眼目睹一個母親為了要兒子讀書而打他。故事以一段言辭激烈的推斷作結論：

我們中國決不是亡在武人政客的手內，一定亡在婦女的手內；因為她們不能和西婦一樣，造出如歐戰內勇敢的好國民，恰天天傷害他，戕賊他，使他成了痴子痴人，使他成了不健全的國民，一點沒有力量去幹事，恰還算她是能夠教育的。唉！唉！這豈是國民之母，實是國民之敵了。<sup>10</sup>

雖然女讀者對這類苛責攻擊的反應尚無從考證，但顯然編輯已將改造婦女陋習視為己任。雜誌發表了由女子就同樣主題所寫的文章。在為女學生開闢的文章專欄中，一學生給「婦」這個字賦予了新的內涵。漢字「婦」由「女」和「帚」兩部分組成，她認為這代表古代聖賢的意思，就是打掃家庭是女人的分內之事。如果沒有女子專事打理，一個家就會破敗。但是，女子的掃帚也應該掃除另一種灰塵：「女界沉黯二千年於茲矣。倚賴之性，嫉忌之情，護短之見，迷信之愚，習慣自然，牢不可破。是亦無形之垢也。有學以矯其失，方將舉其胸中污點一掃而空之。」<sup>11</sup>

雖然這位女作者關注的是「舊」習俗，但另一位作者卻攻擊了一些女子的「新」作派。一篇題為〈理想之女學生〉的社論批評了女學生「令人厭惡的行為」。作者論述道，儘管許多女學生擁有非凡的學識和良好的美德，但少數「害群之馬」卻給整個群體帶來了壞名聲，以至於「女學生」這個詞在大多數國人心中引起了恐慌和厭煩。這些害群之馬到底做了什麼？

開口自由平等、男女平權，參與政治，而其實行則仰給生活於他人，即至烹飪、洗滌之事，一為女學生，即有所不屑為，此則廢人而已。昔尚言女學生裝束樸素，有異於常人者，今何如矣。或初解英文字母，而欲以英文寫情書，俾父母不能識認矣。其有略

通本國文字者，亦每用之於不正當之途。毋怪持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說者振振有詞，使子女以入學校為戒也。<sup>12</sup>

在這篇文章結尾，作者提醒女學生要記住自己的職責：「女學生者，今日為學生，即他日之賢妻良母，與家庭之榮枯有密切關係者也。」對女學生「令人厭惡行為」的這些攻擊，反映了對現代教育結果的焦慮。改造中國婦女的任務顯然相當艱巨。無論她們是無知還是博學，大家要始終警惕她們的各種弱點。

將中國女子塑造成賢妻良母的一個更為積極的辦法，是推動中國女子效仿西方注重婦人家庭角色的模式。即使這一時期被新文化人士視為保守派的改良派，也要向西方取經。他們深為西方規範婦女家庭角色的意識形態和中產階級核心家庭的實際存在而鼓舞。在他們看來，美國人強調婦女家庭角色與儒家宣揚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相似。古老的中國家庭需要的是現代美國的管理方式。《婦女雜誌》上充滿了諸如《女士之家雜誌》(*Ladies' Home Journal*)、《母親雜誌》(*Mother's Magazine*)等美國出版物的譯文。內容涵蓋個人衛生、家庭教師聯合會、家政各領域。現代家庭的科學管理、孩子教育的民主精神、美國妻子對丈夫的陪伴、家居的美觀整潔——以上種種都被強調為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因素。《婦女雜誌》的主編希望，通過發表這些通俗易懂且饒有趣味的文章，以講授既現代又科學的家政技能，《婦女雜誌》將會「改良家政、增進學問之觀念，由舊家庭而嬗蛻為新家庭」。<sup>13</sup>

在將美國婦女專事家務的理念和實踐宣揚為改造中國家庭的一種手段的同時，《婦女雜誌》也刊登一些關於世界大事的文章。「記述門」欄目傳遞了世界各地婦女的信息，包括歐洲婦女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進入了勞動力大軍的報道，文中還附有顯示婦女勞動力的照片，有比利時女礦工、英國擠奶女工、女屠夫、女司機、女搬運工以及德國工廠女工和女郵遞員。其他文章描述了哈麗葉特·比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為廢除奴隸制所做出的貢獻，還有英國女學生組織的活動、瑞典婦女運動、日本女子的就業機會、菲律賓婦女享有

的社會活動自由及在家庭和社會中很高的地位，等等。這一欄目傳遞的信息看似與婦女專事家務的主導話語相矛盾。其實，這是編輯為了拓寬中國主婦的視野、使她們及時獲知世界時事和社會發展所作努力的邏輯組成部分。<sup>14</sup>

《婦女雜誌》也為在家庭觀上互相衝突的思想提供了一個論壇，主要呈現在「國文範作」這一欄目。這欄目把女學生定為主要的讀者群，邀請她們將其在學校寫的文章投稿。這些文章顯示了女學生思想的活躍以及各種思想對她們的衝擊。在一篇文章中，學生陸振權分析了「婦」這個詞的含義，表達了與之前的討論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認為，「女」和「帚」的象徵組合在一起，顯示了古人對女子的鄙視：

女子當執箕帚以事灑掃，古之所謂箕帚，婦也。要之為男子之僕役而已。奴婢賤役而字從女，尤可為卑視女子之證。此實人道之大不平也。近世日即於文明，人類亦漸趨於平等，吾儕不幸作女子身，宜如何顧名思義，自尊自重尚禮儀，苞貞操，以神聖我女子之價值乎。<sup>15</sup>

在這段似乎自相矛盾的文字中，學生陸振權表達了對「大不平」的憤慨，卻又流露出遵從傳統習俗的意願。

另一位女學生殷同薇認同良母的角色，但堅持女子應該自治。她在組建學生自治會的倡議中談到：「共和之國民貴自治，而女子為國民之母，故女子之學校教育亦必以養成自治能力為先務也。」<sup>16</sup> 學生孫熙育建議，女子應該修身養德以更好地承擔治家的任務。<sup>17</sup> 學生馬仁常關注的卻是「人必如何而後獨立」：

人無職業，必不能生存，遑言獨立。且不能獨立之害，關係頗大。不但於己之身有礙，而於社會、國家亦受莫大之影響也。天下無論何事，大抵根諸個人，由個人推於社會，由社會推於國家。一人之關係於國家，豈不重哉。試觀一般無才無識之人，賴他人之營養以生活。此等之人，寄人籬下，任人欺蔑，最可憐矣！是故，獨立為人生處世之基礎也。<sup>18</sup>

在文中，馬仁常隻字不提妻母之角色，也不提家庭的重要性，卻只是公開提倡要有獨立的職業，將關注的焦點放到了個人獨立上。這讓人想起了1919年之前新文化人士的那些著名文章，可能這女學生的老師深受新文化作品的影響。不管這些學生通過什麼途徑接觸到新文化思想，她們的文章顯示了1919年五四學生運動之前，諸如「平等」、「自由」、「自治」、「獨立」這些詞語已經在學生中傳播開來。

不僅是從這些學生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窺見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話語的線索，期刊社論也顯示了主編意識到了新文化人士鼓動婦女解放所提出的問題。事實上，面對新文化運動的勢頭，《婦女雜誌》採取了保守的態度，並通過社論批駁新文化思想。如1918年5月這一期社論反對大學男女同校。作者堅持中國的倫理規範有別於外國，男女授受不親，大學不應為了招女學生而打破禮教。作者還論述說，少數幾個適合女子的職業也不需要女子掌握大學提供的深奧知識。<sup>19</sup>

雖然《婦女雜誌》足夠開明，刊發了不贊同編輯意見的讀者來信，但大部分社論都秉持否定的論調。1918年8月這一期，題為〈女權平議〉的社論警告讀者，要提防婦女獲得權力後帶來的危害。因為漢字「權」包含有「權利」和「權力」的意思，「女權」經常被理解為「女人的權力」。按照這個意思來理解，作者列舉了中國歷史上「女人篡權」的所有事例。他強調，史上無論哪個朝代，只要是皇后篡權或干政，其結果必是家毀朝崩。他建議，民國的官員應把其妻子的野心引導到安全的途徑上來，讓她們擔任女校的校長或者教師；但「若夫財政問題、訴訟問題、賦稅問題以及凡百興利除弊有關公益之問題，萬勿越俎代庖」。他警告說「女權」不僅威脅到國家利益，而且導致婦女社會行為放縱，引起家庭衝突。他強調中國女子不應該全面模仿西方婦人，因為「夫中西風俗習慣不同，女子自治之能力、自尊之觀念，吾國不及歐美遠甚」。作者告誡女讀者，為了民國國家、社會和家庭的利益，不可濫用婦女權力。<sup>20</sup>

直到1919年5月，《婦女雜誌》的社論還在培育賢妻良母的主題上喋喋不休，不過用了種辯解的調子，來反對廣為鼓吹的女子職業教

育。作者又用了美國女子的例子來闡釋他的觀點，但這次美國女子的形象是負面的：「後二十世紀美國之女子，其智育之發達，無可或諱者也。然美國女子，好自私，喜幻想，維其智育發達之故……競求職業，而厭家庭生活，於是脫離其夫而獨立者日眾，影響所及，美之生產力為減，而人口不繁。」<sup>21</sup> 因為美國女子職業教育導致如此巨大的災難，作者堅決反對中國效仿美國模式。相反，因為男女有別的規範位置和責任義務，教育也應該有所區別：「無論男女能為其所應為，而不越俎代庖，斯可以。」作者表達了維持男女界線的強烈願望，他的語言完全不同於正在流行的男女平等話語。這篇社論和之前提到的那些文章都說明直到此刻《婦女雜誌》還堅守反對新文化的立場。

1919年5月，具影響力的新文化雜誌《新潮》刊發了羅家倫的一篇文章，他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所有雜誌進行了批評。羅家倫譴責《婦女雜誌》「專說些叫女子當男人奴隸的話，真是人類的罪人，聽說有好幾處女學校還只許學生看這種雜誌呢！……這類的雜誌若不根本改良，真無存在之餘地」。<sup>22</sup> 新文化人士所採取的直接攻擊，與五四學生運動結合在一起，引來了要求拋棄舊思想、舊語言、舊文化的熱烈擁護。《婦女雜誌》備受壓力，被迫變革。

新文化並沒有立馬攻入保守雜誌。1919年5月到10月，《婦女雜誌》只是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學生示威、遊行和公開演說這些如火如荼的喧囂之聲好像發生在另一個世界裏，完全與《婦女雜誌》無關。《婦女雜誌》繼續刊發一些教讀者如何管理現代家庭的文章，除了一個例外：一份關於鄧春蘭要求廢除大學男女界線的報道。鄧春蘭這位年輕女子生活在偏遠省份甘肅，受到男女平等潮流的鼓舞，要求進北京大學學習。學校沒有答覆，她便在全國的報紙上發表了一份公告，呼籲有同樣想法的女子組成一個女學生團體，為了女子的大學入學權去北京請願。她也呼籲全國所有「愛國愛種、提倡人道」的男子支持這一事業。鄧春蘭的行動鼓舞了無數要求女子平等教育的人。《婦女雜誌》的9月號刊登了她的公告，以及她寫給北大校長蔡元培的信件原文，但沒有對她的舉動作出評論。《婦女雜誌》報道了點新潮流的新聞卻又



沒有追隨新潮流的意思，這奇怪的姿態流露出了編輯的矛盾心態。作為婦女雜誌的領軍者，很難不對當時的女界大事進行回應。但是主編還沒有做好緊跟新潮流的準備。五四學生運動後那數期雜誌刊登的保守文章，也可能是很久以前就已經徵稿且排版了，主編並不想打亂他對雜誌的尋常安排，儘管他感受到了做改變的壓力。<sup>23</sup>

隨後，突然之間，《婦女雜誌》在11月大膽刊登了一篇由佩韋（沈雁冰的筆名）所寫的題為〈解放的婦女和婦女的解放〉的社論。與之前的文章不同，這篇社論以白話文形式刊登，並重申了新文化人士關於婦女解放的主要觀點，宣告新文化成功攻佔到那時為止還是保守的領域。作者沈雁冰是商務印書館的教科書翻譯員，也是那個時代冉冉升起的新文化明星。幾十年後，他回憶起當時的情形。在《新青年》的影響下，沈雁冰開始了新文學活動。他翻譯了西方和俄國的文學作品，並兼職撰寫文學評論。他是一位多產作家，到1919年末，他的名字出現在許多新文化雜誌和報紙欄目中。有一天，《婦女雜誌》和《小說月報》的主編王蘊章來拜訪他，邀請他擔任《小說月報》新開闢的專載新文學的欄目的編輯，還邀請他為《婦女雜誌》撰寫一些「討論如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後來沈雁冰發現，商務印書館的高層決定迎合新潮流。沈雁冰被委以重任，要求為讀者呈現一份革新的雜誌。<sup>24</sup>

沈雁冰沒有浪費時間，他花了大量精力來改革《小說月報》，同時還翻譯和撰寫了八篇關於婦女的文章。〈解放的婦女和婦女的解放〉先刊登在《婦女雜誌》上，其他文章則刊登於1920年的第一期上，明確宣告了《婦女雜誌》現在由「新人」接管。關於婦女解放的討論取代了家政、烹飪、做衣服和玩具的文章。沈雁冰以勝利的姿態評論說：「這意味著有五年之久提倡賢妻良母主義的《婦女雜誌》，在時代洪流的衝擊下，也不得不改弦易轍了。」<sup>25</sup> 這份有威望的雜誌對新文化的認可，意味著新文化不再處於激進邊緣位置。相反，新文化已經炸開中國主流知識、社會、政治話語場域，新文化女權主義者倡導的主題也隨即成為「良家婦女」談論的合法話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攻入《婦女雜誌》這個主流話語的要塞，大大增強了新文化女權主義的話語權力。

## 婦女解放的爭論

與新文化運動初期不一樣，那時男性倡導者關注的焦點是揭露婦女所受的壓迫，而在五四學生運動時期，男子的注意力轉移到婦女解放上來。當《婦女雜誌》開始對逐漸興起的新文化女權主義回應時，婦女解放還是一個流行卻模糊的概念。為了反對壓迫婦女的舊文化和舊社會，婦女解放的口號才被提出來。但是婦女解放的目標和內容是什麼？婦女解放通過何種方式才能在中國取得成功？這些都是懸而未決且令人困擾的問題。在改革後的《婦女雜誌》中，大量文章從各種視角來探索這些問題。1919年12月這一期的社論警告讀者，如果對婦女能力缺乏清醒的評估，卻用煽動語言蠱惑婦女之心，肯定會造成麻煩和失敗，其結果將對婦女和社會都是有害的。這篇社論很可能是由立場保守的主編所作，表達了許多人對婦女解放的疑慮。<sup>26</sup>

即使在提倡婦女解放的人群中，對於婦女自我解放能力的擔心也普遍存在。這種擔心與他們對婦女解放目標的看法相關。對他們來說，婦女解放有個功能性的目標：改良整個社會。沈雁冰明說了這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提倡婦女解放？為人道主義麼？不是！為平平女子的氣麼？自然也不是！我敢說我們提倡婦女解放的目的，就為的是從社會進化著想！惟其我們是拿社會進化做根本觀念，所以一方欲設法抬高女子的人格與能力，**使和男子一樣**，一方更欲設法使後一代的人比現在強。正惟我們欲抬高女子的人格和能力，所以先欲解除女子身上的種種束縛——這是手段是方法不是目的。<sup>27</sup>

在沈雁冰看來，解放的婦女是既能享受人的權利又能履行人的義務的人。這裏的義務是指能承擔改造社會的一半責任：「婦女要準備精神學好本事來接這擔子。這才稱是真解放。」<sup>28</sup>最後沈雁冰評論說，婦女解放最終要依靠解放了的婦女而不是依靠男子。為了社會進步，男子不應承受社會責任的整個負擔。但這個理由卻導致沈雁冰和其他男性作者把婦女自身視為婦女解放的最大障礙：在這些作者看來，中

國婦女還遠未做好婦女解放的準備，甚至還不夠格承擔婦女解放這一事業。正如一位男性作者所描述的：「我以為婦女們所居於改造上的地位，要和男子們一樣。卻是我國婦女們本身上還是大半數沒有改造過，怎麼能夠去改造身外的事情呢？我國婦女可以說完全缺乏改造國家的能力，因為他們完全沒有改造國家所應具的幾種資格。」<sup>29</sup>

由於婦女解放被視為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但婦女又被認為尚未具備解放的資格，男性改革者只能盡最大努力讓婦女具有這種資格。如是「婦女解放」變成了「改造婦女」，而諷刺的是，這與《婦女雜誌》改革前將婦女轉型為現代主婦的目標如出一轍，許多《婦女雜誌》的男性撰稿人再次強調改造婦女——只不過心裏的目的有所不同了。結果，儘管許多文章運用了新語言，但還是採納了家訓樣式，要麼批評女子弱點，要麼為女子設立新標準。

沈雁冰為受過教育的女子提出了四點規勸。一是尋求自我解放：樹立比當前世俗標準更高的高尚人格和理想，不受無知民眾的干擾。二是要理解新思潮的真正含義：所謂解放，是需要堅強決心的精神解放；人類生活應基於互助，而不是基於索取和競爭。三是希望婦女盡力提高能力，並幫助其貧窮而愚昧的姐妹，而不是浪費時間和男人爭權。四是希望婦女活動不應超越當前社會生活所允許的範圍。<sup>30</sup>

雖然這些規勸對婦女解放加了限制，但還是受到許多男女不同程度的擁護。男性所撰寫的文章有了如〈今日中國女子應覺悟的一點——自己的責任〉、〈新婦女所應該鏟除的幾種劣根性〉這樣的標題。這些作者強調的主題是婦女應完善提高自己以承擔改造社會的責任，文章語氣從鼓勵到譴責各有不同。彭季能熱切呼籲：

女同胞們！……你們應該自覺是在危險的境內——在男子的壓迫和社會的束縛下面。要逃出這個危險，也須得費去許多的精力才能成功的。你們要養精蓄銳！

上面所講的話不過是勸現在大多數的女子捨棄那些非人類的生活，去過那些理性的「人」的生活，就是提起精神，對人類負責，為人類謀幸福。希望現在的同胞不要再束居閨閣了。<sup>31</sup>

王平陵討論了女子的人格，譴責婦女導致了男性中心文化的興起和中國社會進化的低水平：「中國社會沒有進化的原因，未始不是女子一方面喪失人格，放棄天職的緣故。只有男子一方面的人，去經營社會的事實，自然沒有多大的進步可言了。」婦女自己要為她們現在的處境負責。王平陵認為，婦女讓自己的能力退化並放棄她們的權利，自願過著「地獄」般的生活：「我想一定不是男子有意壓榨她們、虐待她們的結果，老實說一句，這都是自己沒有能力的緣故。」既然婦女只能怪自己，所以王平陵主張婦女要把注意力放到自我解放方面：「當今高高的解放聲中，在女子方面的話，日常所聽到的，所觀到的，不是說男子欺侮她們，就是說男子虐待她們。我看這些話且慢兒講，你們還是先把自我改造一下罷！不亟亟於自我的改造，徒作無謂的狂呼，其結果仍舊是不生效力的。所以女子的解放，要從女子自己解放起！」<sup>32</sup>

那些強調婦女自我改造的作者列舉了他們看到的婦女弱點：依賴、虛榮、狹隘、屢教不改、迷信、保守、缺乏判斷力、缺乏國家觀念。確實，在否定和蔑視婦女方面，保守派與新文化派之間並無多大差別。很可能有些人提倡婦女解放，恰好就是因為他們看不起婦女，迫切希望改造婦女。在改造婦女的實踐中，男性作者表達出顯而易見的優越感。當國家地位在世界上迅速下降時，中國婦女似乎成了一種最便捷的媒介，使男性知識精英可以重拾或維持自身的優越感。

除了批評女子的守舊思想和惡習之外，許多作者提出女子應該達到的新標準：具備自強獨立、社會責任、改革思想、批判意識、互助精神、服務精神、好學上進的品質，更要有開放正直的行為態度和健康的體魄。其中一些要求顯然是過於理想化的。一位作者告誡新女性：「自此以後，要有哲學家的頭腦，文學家的態度，科學家的眼光，勞動家的身手；終以養成一個社會革新運動的健全分子，建築人類永久的普遍的幸福的工人，為唯一的目標。」<sup>33</sup> 這些文章對新女性的素質進行了理想主義的描述，反映了五四一代人的烏托邦觀念。為

了達成男性知識精英所預想的「健全的」社會，迫切需要形成「健全的」新女性，因為婦女的落後阻礙了社會進步。

在為數不多的女作者的文章中，也有相同的論調：即新女性應刻不容緩地改進自我以滿足社會變革的需要。但是女作者關注的焦點，通常是向她們開放的那些新的可能性。徐世衡提出了新女性要達到的幾個目標：一是革除惡習，如束胸、穿耳、敷粉、戴奢侈的飾品以及留長髮；<sup>34</sup>二是提倡勞動，經濟獨立，不依靠男人生活；三是社會事業，參加公共事務以承擔婦女的社會責任；四是群眾運動，通過一番群眾運動為社會圖進化；五是婚姻自決，未訂婚的要積極地行自我的主張；已訂婚的倘使不是自由意志訂定的，應當解除婚約；守寡的應該自決前途，不容雜有舊禮教舊倫理。婚姻應該是男女兩性間基於自由意志和戀愛發生、學問道德和同一志趣的結合。<sup>35</sup>

為了回應社會中對婦女的蔑視，女作者通常強調新女性要具備受人尊重的品質。李佩蘭提出，解放後的婦女態度須要落落大方，行為須要光明正直，意志須要百折不撓：「果能把人格兩字用些修養功夫，不留旁人議論的地步，自可以得人尊敬。」<sup>36</sup>繆程淑儀告誡新女性要格外注意道德，警告那些在剛開放男女同校的大學就讀的女學生，「處處更要格外留心，萬一有個曾參殺人的謠言，就是授了把柄與人了。自己固然是黃河的水難洗羞恥，後首的女同胞就絕了學術平等的希望了。」<sup>37</sup>頗為反諷的是，為了獲得社會尊重，解放了的婦女不得不更加嚴格地約束自己，遵循傳統習俗。

儘管這份男性主辦的婦女雜誌十分關注改造婦女，但也回應了當時婦女解放潮流的重要主題，指出阻礙婦女社會發展的諸多問題。事實上，由新文化刊物引領的關於婦女問題的全國大討論中，《婦女雜誌》成為一個頗具影響的論壇。這份雜誌在1920年全年中都在討論有關婦女的諸多問題：女子教育、女子職業、女子經濟獨立、男女社交公開（打破性別隔閡）、婚姻自由（擇偶自主）、戀愛自由、離婚自由、新的性道德、家庭改革、釋放婢女、廢除童養媳制度、廢除娼妓、貞操問題、避孕問題、節育問題、女子髮型和服飾、女子身體鍛煉，等

等。所有這些問題開始都是由男子提出來的。為婦女問題命名成為一種時尚，以至於沈雁冰忍不住譏諷道：「在中國講婦女問題頂容易，因為無處不可以攻擊，隨便揀了一個題目，比如婚姻、家庭制度、女子的人格問題、納妾……說不盡的種種題目，只要一頓罵，便可以成了一篇大文章，血性的青年男女看了，都眉飛色舞，拍掌道『好！好！痛快！痛快！』。」<sup>38</sup>

婦女問題的討論顯然吸引了一大批讀者。因為這個原因，商務印書館的高層董事會選擇了一位能夠緊跟新思潮的主編。<sup>39</sup> 1921年1月，章錫琛取代王蘊章成為主編，開啟了《婦女雜誌》的一個新時代。章錫琛曾是商務印書館旗下頗具影響力的《東方雜誌》的編輯。他本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新文化人士，但1921年後，因其對《婦女雜誌》的改革而名聲大噪。他廣泛閱讀女權主義著作，包括許多日文資料，他堅信「構造新文化，其基礎應該是男子和女子的『思想革命』」。<sup>40</sup> 章錫琛把魯迅的小弟周建人拉入雜誌社作為他的合作者，並對《婦女雜誌》的內容和版式進行了改革，推動了一場女權主義的思想革命。<sup>41</sup> 雜誌的字體變小了，內容更緊湊；針對關鍵問題的文章更具理論性；推出了研究婦女生活的地方習俗的學術調查；讀者有更大的空間來表達對婦女解放及相關問題的觀點；邀請了如周作人、魯迅等著名新文化人士擔任撰稿人；西方和日本作者關於女權主義和婦女問題的譯作在每期佔有較大比重（其中章錫琛翻譯了大量日文論著），這些文章為中國婦女解放討論提供了指導，增強了合法性。這一改革大獲成功。1921年6月，編輯告訴讀者說，先前售罄的幾期正在加印第二版，以滿足全國讀者的需求。雜誌發行量達到了上萬份，比雜誌創辦初期多了三倍。一位新文化編輯梅生曾將1920年代關於婦女問題的文章編輯成了幾冊文集，他對改革後的《婦女雜誌》給予高度讚譽，稱其「在中國目前關於婦女問題的出版物裏，坐第一把椅子」。<sup>42</sup>

改革後的《婦女雜誌》使得婦女的聲音更加響亮。主編多次呼籲婦女為雜誌投稿。雖然當時雜誌大部分文章仍由男性所寫，但如「讀者俱樂部」和「通信」這類的新欄目為一些非正式討論提供了空間，使得

更多婦女可以參與其中。章錫琛還組織了幾期專題，就不同的主題向讀者徵求意見。以上舉措皆得到女讀者的熱烈迴響。有趣的是，雖然有女子響應主編號召向雜誌投稿，但她們經常公開表示對男子的不信任。勞秋英寫道：「我以為婦女解放，是婦女自身的事，該由婦女自己起來解決。男子的口頭婦女解放，是絕對靠不住的。只有婦女自己覺悟。」<sup>43</sup> 心珠在〈我所希望於男子者〉一文中，列舉了新思潮中男子視女子為性對象的一些例子。她抱怨說：

徵文的題目是：〈我所希望於男子者〉，但是我愈寫愈覺得現在的男子——無論是新的或是舊的——我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希望。唉！數千數萬年賤視女子的傳統觀念久已深入人心，希望改革，談何容易！我老實說，女子對於男子感到不敢希望，不可希望，不必希望，也不知經過多少多少年了！說他做什麼呢？<sup>44</sup>

但是，她繼續說到，因為這次徵文的目的是要破男女兩界的牆壁，是要使兩性各有徹底的了解，因此她感到有必要表達一點希望，雖然她知道這希望在短期內是不可能實現的。她希望男子把女子看作為人而不是玩意兒來對待，這也是其他所有女作者表達的希望。其他女作者還提出了對男子的這些希望，包括：「忠於女子」、「尊重女子」、「幫助而不傷害女子」、「以正大光明，開誠布公的態度來對待女子」，這些討論觀點明確表達了性別衝突的意思，這些衝突在大部分男子對婦女問題的「客觀研究」中是看不到的。一些男性警告，要反對將婦女解放視為「男女爭鬥」的這種「趨勢」，並堅持在討論各種問題時，「我們要立於性的界限之外，虔心研究，切不可先存一些男女性的意見，而對於異性加以輕視攻擊。」<sup>45</sup>

1922年，章錫琛開始策劃專號，每期集中討論一個問題。這些專號不僅顯示了章錫琛的關注點，也突顯了讀者需注意的關鍵議題。這些專號的內容包括：離婚問題、產兒限制與桑格女士(Margaret Sanger)、愛情與婚姻、獨身、參政、貞操、婦女運動、擇偶、婦女職業、男女相互理解、新性道德，等等。章錫琛的婦女解放觀點雜糅了

進化論、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性學以及以愛倫凱為代表的女權主義。他寫了幾篇重要文章來介紹西方的性欲觀和戀愛觀，尤其是愛倫凱關於戀愛和母性的思想。在那個時代，只有極少數男人認為性解放是婦女解放的關鍵問題，章錫琛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用《婦女雜誌》來傳播他的思想。<sup>46</sup>

為了回應讀者批評《婦女雜誌》太過於關注戀愛問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婦女利益議題，章錫琛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解釋了他的立場。第一，很多中國人都不理解「love」這個詞，因為中國向來沒有這個概念。即使勉強翻譯成「戀愛」，但概念還是沒有，所以許多人把它與「姦淫」做同一解釋。第二，戀愛與姦淫的區別，簡單的說，戀愛是融合兩個人格為一，姦淫不過是一方佔有他方，滿足自己的欲望。戀愛承認個體人格與平等，戀愛是精神與性欲的崇高結合。第三，解決婦女問題的根本在於戀愛自由，因為婦女問題說到底是兩性問題。兩性的結合，用勢力和金錢作綰結，所以由此組成的社會，便是掠奪的社會。要救濟這樣的社會，必先從戀愛的兩性結合起頭。如果男子承認女子有戀愛的自由，他們便不會把女子當作可以掠奪、可以買賣、可以滿淫欲、可以供役使的東西，男女就平等了。章錫琛還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者婦女解放觀點的反對：

在主張社會主義的人，以為只要把財產私有制度打破，便沒有問題了。這固然可以打破男子所有女子，家長所有女子的基礎，但我以為使女子對於男子，子女對於家長，主張個人的人格、意志的自由，實在是同樣的要緊或者是更要緊……

人類有兩種基本的欲望，便是食欲和性欲。社會一切的習慣、風俗、道德、法律、制度都以這兩種欲望為中心……所以，饑與愛的兩大問題，是一切社會問題的基本問題；社會的一切糾纏，一切爭鬥，都是從這兩大問題發生的。社會主義，是現在解決饑的問題的根本方法；戀愛自由主義，是現在解決愛的問題的根本方法……「戀愛自由，是解決婦女問題的起頭，也是解決婦女問題的煞尾。」<sup>47</sup>



為了推動「戀愛自由」，章錫琛繼周作人、胡適、魯迅之後繼續批判中國傳統的性道德。當時討論的焦點從對強制性的貞操的譴責，轉為提倡基於戀愛這一新概念的性關係。如今，戀愛被視為合乎道德的婚姻的唯一基礎。戀愛自由是五四青年反對包辦婚姻的一條基本原則，基於戀愛的結合即使沒有經過法律程序也具有合法性。「戀愛自由」成為五四時期最響亮的口號之一。雖然《婦女雜誌》中的故事經常描述青年男女對新的性準則的困惑，但章錫琛這些倡導者們所界定的愛情，已經成為五四青年熱切追求的理想。<sup>48</sup>

章錫琛強調性解放，並篤信個人權利，他將《婦女雜誌》變成了一個宣傳女權主義話語的重要論壇。他贊同愛倫凱的觀點，認為女權主義運動的目的不是要把女人變成男人，因為他相信：「人類的有男女，本來只不過是性的區別，並沒有什麼尊卑優劣可分。」<sup>49</sup>他經常提醒人們，不要把平等理解為女性對男性的效仿。靄理士(Havelock Ellis)創建了積極認識人類性慾的理論，愛倫凱闡釋了「母性神聖」這一浪漫的觀點，章錫琛把這二者結合起來，認為女性的性覺悟和社會對神聖母性的保護是婦女解放的更高目標。然而，他堅持認為婦女平等權利和戀愛自由是提高婦女「性覺悟」的前提條件。根據這一理解，《婦女雜誌》不僅強調戀愛問題，而且用了很多的版面空間去探究婦女獲取平等權利的途徑。通過這些舉措，《婦女雜誌》不僅反映了也推動了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的發展。<sup>50</sup>

## 推動中國婦女運動

1919年末，在當時人們稱之為婦女解放的高漲「聲浪」中，新文化刊物開始倡導中國婦女運動。新文化人士們開始談論婦女運動在世界發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中國為什麼需要跟隨這一世界潮流。這些男性通常深諳歐美的婦女運動。在他們看來，女權主義運動的出現是社會進化的必經階段，中國婦女運動的產生標誌著中國向現代化邁進。可以理解，他們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構想是效仿了西方婦女運動。<sup>51</sup>

在《婦女雜誌》中，早期關於婦女運動的文章都是由沈雁冰所撰寫。1920年8月，沈雁冰發表了〈婦女運動的意義和要求〉一文，他提醒讀者：一年以來大家已經很急迫地談論婦女問題了，現在應該著手去做而不是徒然討論：「這著手做的表示，喚作『運動』。」如何開始運動？沈雁冰通篇都在介紹西方女權主義運動，以便讓讀者充分理解「婦女運動」的含義和議題。他告訴讀者，婦女運動不僅僅是為了參政權，而且要表達在教育、經濟生活、婚姻與家庭、社會或國家中的公共生活等方面的訴求。他強調：「我們現在如欲積極提倡婦女運動，不可不向這最近代最完善的意義去做。」<sup>52</sup> 有趣的是，僅僅幾個月之前，在另一篇題為〈我們該怎樣預備了去譚婦女解放問題〉中，沈雁冰批評那些鼓吹婦女參政權的人，認為他們不想想「這是社會上所切要否？這是我們現社會的程度所能容忍否？」他堅持認為，除了學習西洋女子主義的歷史外，還要曉得中國社會實況，然後去謀解決婦女問題的辦法。他還強調要曉得社會實況「不是單靠書本子弄得到」，也直言「我們自己不能充分照自己說的做」並對此感到抱歉。<sup>53</sup> 現在，他把一種「完善的」西方女權主義介紹到中國，似乎暗示這更為全面的女權主義知識是中國社會所需要且能接受的。

和其他主要倡導者一樣，沈雁冰只是翻譯了西方女權主義文本，並沒有按照自己所說的去研究中國社會現實。他對社會需求的看法必然是片面的。他所介紹的女權主義者的訴求，並不能反映出20世紀初期中國農村社會中大部分婦女的要求，這一點被後來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的經驗所證明。但是，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士關於女權主義的認知，卻建立了一種新的社會現實。因為許多文章都用西方女權主義的框架結構來討論中國婦女運動，而且許多人直譯了西方女權主義文本，因此西方女權主義提出的議題，就成了男性倡導者們所認可的中國婦女運動的正當議程。婦女在教育與職業、政治參與、戀愛和家庭方面的平等機會——這些歐美的女權團體、參政權論者、自由戀愛或者母性神聖倡導者所強調的問題——被視為中國婦女運動應該包含的一套「全面」內容。<sup>54</sup>

這種對西方女權主義主題的全盤接受，是基於那個特殊歷史時期中國受過教育的城市男女的需求。因此，當這些議題被放到中國背景下討論時，必然具有特殊的文化和社會意義。比如，教育被一致認為是中國婦女運動中最重要問題，但關於女子教育需求的討論卻有著更多目的。高等教育的男女合校問題，最早是由三位北大男生在學生運動興起之前提出來的。三位先行者之一徐彥之敘述了這一行動是如何開始的：

去年的差不多這個時候——約在春假後十日左右，朋友王若愚找我談天。兩個人覺得寡味，又一同到北河沿椅子胡同十號，找康君白情。天黑了，點起燈來，三個人三角形式的對坐著，嚼著蘿蔔和甘蔗，痛談。但仍覺不快。繼而悟到，這是沒有女性的緣故！然而要男女交際，須預先製造空氣。於是我們三個約定，在一個星期內，每人做一篇鼓吹的文字，送到《晨報》去登。<sup>55</sup>

徐彥之投給《晨報》的文章強調了他在中國男女授受不親社會中的個人「切膚之痛」，並且引用一位美國婦女的演講來證明男女同校對兩性心理都有裨益。他也譴責社會剝奪了女子平等的教育機會。他指出：「人生痛苦，婚姻不良為一大原因，而解除此弊在婚姻自由。欲婚姻自由非男女有公然交際不可，而男女交際以男女同校為最好入手辦法。」<sup>56</sup>

男女同校作為鼓勵男女社交公開的一種途徑，受到許多男生的熱烈歡迎。對他們來說，消除男女隔離與其說是達至男女平等的步驟，不如說是「婚姻自由」的前提。向包辦婚姻制度宣戰不僅需要挑戰父母權威，宣佈自主權，還需要有機會結識女性（受過教育的「良家」女子，而不是交際花）以便擇偶。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於那些受到西方戀愛觀和婚姻觀影響的五四青年男子而言，婦女解放的目標——男女同校、社交公開、婚姻自由、戀愛自由——也是他們共同追求的目標。現代中國知識男性的情感滿足或者性幻想，或多或少受到西方浪漫文學的影響，而他們的這些情感需求終究只能通過新女性來實現，

因為新女性才能與他們共同分享思想和社會經驗，以及對戀愛的理解。這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什麼如此之多的男青年迫切地加入婦女解放的潮流。

對大學男女同校的討論儘管熱烈卻很短暫。鄧春蘭等五四女生率先站出來，要求高等教育的平等權利。自從1920年代初由北京大學開始，一所又一所的公立大學都開始接收女生。一年後徐彥之驕傲地說：「那時白情志希我們三個雖則人微言輕，但在這日月未出之前，不能不算是燭火之光！由今憶昔，當時我們那敢夢思不到一年的功夫，就有今天呢！」<sup>57</sup>

但是中國的女子教育不僅僅是高等教育問題。在許多倡導者看來，中國之所以沒有婦女運動，原因在於很少有婦女受到足夠的教育。推動婦女運動的關鍵在於普及初等教育，以及那些讓婦女在社會中得以獨立和自由的教育。如一位作者問道：「女子沒有受教育的機會，還在那裏做沉沉好夢，沒有根本的覺悟，我們怎能希望她們自己站起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呢？」<sup>58</sup> 在這些男性倡導者看來，女子的教育機會是提高中國婦女社會覺悟的先決條件。

其他一些強調教育的人經常將女子教育與婦女經濟獨立聯繫在一起。由於關注焦點都在城市中上層婦女，她們常被描繪成男人的依賴者、男人的負擔，甚至寄生蟲。消除婦女依賴性的唯一辦法是發展婦女職業，以職業來確保婦女的獨立。教育必然成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這一背景下，女子職業教育成為熱門話題。陳問濤在〈提倡獨立性的女子職業〉一文中，討論了婦女勞動與女子獨立職業之間的區別。他認為大多數婦女從事的是家務勞動和家庭勞作，這並不能讓她們獲得獨立。工廠女工由於賺取了微薄薪水而具有一些獨立性，而女商人和女教師可以看做是獨立的職業。他批判那些將女子職業教育限制在傳統婦女勞動上面的人，強調應把女子當一個活潑潑的人看待，而不是賢妻良母：「今日所需要的，簡單說：就是『獨立性的女子職業』。我們提倡女子職業和辦女子職業教育的人，萬萬不可忘記了這一點

……凡現社會所有的職業，除一二特別男子職業，女子生理上萬不能經營外，其餘都是女子職業的領域，還有女官吏、女議員等。」<sup>59</sup>

要幫婦女準備好獲得同男子平等的職業，教育也必須平等。大部分關於中國婦女解放的文章都將教育和職業作為解決諸多婦女問題的根本辦法，也將其視為社會進化的一條途徑。著名的新文化人士胡適也加入到普及女子教育和職業的行列，向女學生發表講演。他認為，女子經濟獨立是婦女運動的基礎，沒有這一點，平等、自由、獨立都是不可靠的：「女子如能經濟獨立，又有學問，社會政治等問題自易解決。」<sup>60</sup> 雖然女子教育和職業平等權問題是照搬了西方女權主義運動，但現在對於中國讀者來說已不再陌生。隨著中國倡導者將關注點聚焦於這些問題與培育中國婦女獨立性的關係上，教育和職業日益被看成中國婦女運動中最緊迫的問題。從一定意義上看，圍繞女子教育和職業的討論說明，接納西方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過程，也是根據中國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來對其進行改造和調整的過程。新文化女權主義充滿了獨特的文化內涵，而不僅是西方女權主義的翻版。

雖然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議題構成了《婦女雜誌》的重要內容，但1919年五四運動後不久，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就受到了質疑。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極大興趣。很多社會主義文獻從日文、英文、德文、法文、俄文翻譯引進，在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中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隨著一些新文化人士領袖轉向社會主義，關於婦女問題的社會主義分析開始出現。中國社會主義者照搬了日本社會主義者的分析法，依據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術語對世界婦女運動進行了分類。根據田漢的分類，中西方歷史上的女性統治者代表了「第一階級」的婦女運動；中世紀掌權的女貴族代表了「第二階級」的婦女運動；19世紀資產階級國家的女權主義運動代表了「第三階級」的婦女運動；「第四階級」的婦女運動是由工業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階級婦女所發起。「第三階級」和「第四階級」婦女運動的概念很快被運用於中國社會場景中，後來被中國共產黨術語所採用，變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運動。<sup>61</sup>

章錫琛在1921年的《婦女雜誌》上使用了這一術語，呼籲人們關注中國勞動階級婦女。他接受了社會主義者的批評，即西方婦女運動很少關心勞工婦女運動，因為前者是由「資產階級第三階級」所支配，而後者由「第四階級」所領導。然而，與那些堅信「第四階級」婦女是中國婦女運動的主要力量的社會主義者不同，章錫琛認為在中國無論是婦女還是勞工都沒有強大而有組織的運動。同時，中國「第三階級」婦女正在產生社會覺悟，「第三階級」婦女運動正在興起。因此，他提醒正在興起的「第三階級」婦女，不要像西方婦女運動那樣忽視勞動階級婦女。他希望，「已發生未發生的婦女團體，和一般站在第三階級的婦女，務須注重在第四階級的勞動婦女，不要局限於第三階級的婦女的權利問題。這實在是今後婦女運動應取的新方針呵！」<sup>62</sup>

章錫琛與其他倡導中國女權運動的人，吸取了西方婦女運動的教訓，也受到社會主義的影響，自覺意識到未來中國婦女運動中的階級問題。他們盡力讓中產階級婦女關注勞動階級和其他受壓迫婦女的問題，這樣下層婦女就會被納入中國女權運動中，這是彌合不同階級婦女鴻溝的理想解決之道。主編的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傾向還表現在翻譯作品中，《婦女雜誌》發表了對婦女問題進行社會主義分析的譯作，包括奧古斯特·倍倍爾 (August Bebel) 的《婦女與社會主義》(*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 和日本社會主義學者山川菊榮的《婦女的勝利》中的節選，以及一篇介紹蘇俄婦女解放的文章。<sup>63</sup>

不過「婦女運動」一詞還是沒有被清晰地界定。作者們一邊哀嘆中國缺乏婦女運動，一邊批評中國婦女運動的軟弱，而造成這種困惑的部分原因源於男性倡導者的尷尬角色。他們用西方女權主義的概念來推動中國婦女運動，把自己看做是運動的發起人。但是西方婦女運動主要是由婦女來發起的，而且以具有特定目標和有組織的活動為標誌。在中國，好像只有男性——那些自命其言論十分重要的男性——在談論婦女運動。正如章錫琛所言：「言論的鼓吹，對於有教育而未十分覺悟的婦女，實在萬不可緩。我們因此可以說：〔俄國

民粹主義式的「到民間去」民間運動，是婦女運動的基本；而言論鼓吹，在中國今日，又是基本的基本。」<sup>64</sup>

一些婦女甚至認為男性的鼓吹**就是**婦女運動。一位女作者這樣分析了1923年之前的情況：「實行做婦女運動者，不外兩種人，一種是學生，一種是教育界的人，就中大多數都是學生，學生之中又以男學生為多。所以狹義的婦女運動的中心分子，就是男學生。」<sup>65</sup>

但是在很多男性看來，男性的鼓吹並不是婦女運動。到1922年，越來越多的男性倡導者覺得單靠口頭談論已經不夠——是時候採取行動了。惲代英用這樣的話鼓勵他的朋友：「再切實，再刻苦，再勇猛。多一個腳踏實地的運動家，比多一百個浮泛的志士，於社會還有益處。」<sup>66</sup>然而，沒有男性倡導者會為了婦女運動變成這樣一位婦女運動活動家；沒有人願意組織運動，因為他們感到男性無法取代婦女去完成這項使命。中國婦女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推動中國婦女形成獨立的人格，只有婦女以自己的覺悟代表婦女自己行動起來，才標誌著中華民族的進步。男人的責任是喚醒婦女起來開展行動。男子們談論得夠多了，是婦女站出來的時候了。男性作者的語氣變得緊迫起來。其中一人強調：

新婦女即不為自身計，為救援大眾計，也應該發大願，肩大任，快起來作種種婦女運動，把各問題一一解決起來，實行起來。你看中國講婦女問題，也有幾年，他的成績，不過幾個新人物講講而已，並未曾解決了一個問題。……今日是中國的婦女運動推行的時候了！不可再因循蹉跎了！你們奮臂一起，有知識的男子定當響應的。<sup>67</sup>

另一作者試圖吹響鼓舞婦女的號角：

敬愛的姊妹們！你們看吧，那歐洲中世紀之末，近世紀之處，男子們的新生運動是何等樣的？現在呢，輪到你們的新生運動了。……青年姐妹們！努力吧，努力吧！快燃起你們的情熱之火，快放出你們的智慧之光，來幹這可歌可泣的英雄事業呵！

敬愛的姊妹們，你們要覺悟：以前的文化，是男子的文化；以後的文化，要是男女均等的文化——或是竟是女性本位的文化了。……你們還不奮起麼？敬愛的女青年們！努力吧，努力吧！光榮之寶座，正留待你們的！<sup>68</sup>

事實上，許多女學生在五四運動後就採取了行動。她們不僅勇敢參與愛國運動來反對列強和中國政府的軟弱，而且還致力於婦女解放。早期女權主義活動家之一鄧穎超回憶說：

隨著五四愛國運動的發展，同時掀起了婦女解放運動，這也是五四的民主運動中一個主要內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對包辦婚姻」，要求「社交公開」、「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學開女禁」、「各機關開放任用女職員」等。在天津首先把男女同學分別組織的學生聯合會合併，共同工作。<sup>69</sup>

勃拉克女士 (Dora Black) 曾生動描繪了五四女性活動家的新風貌。1920年，這位劍橋大學社會學畢業生與其戀人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一起來到中國，她去過上海、杭州、南京、漢口、長沙、北京，發現中國的思想氛圍自由而活躍。她結識了很多女學生，並對她們提出的問題感到驚訝。這些女學生毫不猶豫通過男翻譯向她詢問戀愛和母性的問題。在勃拉克看來，她們對個人自由和社會改革的激進追求超過了歐洲最進步的女子，後者在追求婦女解放方面是克制而謹慎的。勃拉克評論道，那些認為東方婦女屈從柔順的歐洲婦女，在聽到中國年輕女子大膽、直率而激烈的言論後一定會大為震驚的。她敏銳地觀察到女青年中的一種激進好戰的特徵，並將其與中國傳統戲劇中「女戰士」形象聯繫在一起：「中國目下，這種女戰士正橫行各處。」在描繪了中國女青年衣著樸素，不著女性飾物，以及在公眾場合的泰然自若後，她說：「我覺中國的婦女，都有似乎男兒的活潑精神，這便是中國女性的特色！」<sup>70</sup> 勃拉克眼中的中國新女性的正面形象，卻很少出現在當時男性解放者的描繪中。



據勃拉克觀察，女權主義議題已被全國各地的女學生所接受。但是諸如戀愛和婚姻等大多數議題更適合倡議，而不適合用來做組織活動，因為這些議題都強調私人生活中的個人覺悟和個人自主。女學生和女教師開始創辦自己的刊物來提倡新思想，但那些主持著影響力大的刊物的男性卻對女性出版活動不屑一顧。婦女組織的一些其他活動也開始出現。例如，北京和天津的女學生向教育部請願，要求女校學生有平等的教育權。但是，由於這些活動比較零星分散，因此看起來不同於西方的經驗，西方婦女通常會組織全國或者國際性活動，為了特定事業而進行長期鬥爭。<sup>71</sup>

不過類似於西方婦女運動的情況終於出現了：全國範圍爭取參政權的運動，確切地說是「參政運動」。1921年初，各省軍閥推動聯省自治，湖南、廣東、四川、江西和浙江的婦女利用這個機會來爭取婦女的憲法權利。這些省級層面有組織的活動取得了一些成功。婦女平等的政治權利被寫入了湖南、廣東、四川等省的憲法裏，一些婦女甚至被選為省議員和縣議員。1922年，當黎元洪總統要求國會籌備起草一部國家憲法時，這股婦女參政運動的新潮流席卷全國。<sup>72</sup>

北京女學生發動了這場全國性組織的活動。1922年7月，北京三所學校的女學生代表聚集在一起謀劃參政運動。由於組織者的目標存在分歧，因此成立了兩個組織。女子參政協進會宣稱其主要目標是獲得婦女平等的政治、經濟和教育權。女權運動同盟會則採用了一個更為寬泛的綱領。綱領將女權主義與社會主義話語混合在一起，宣稱：

社會上一切階級的差別，都易泯滅，獨有兩性的自然差異，是帶有永久性的；若不把隨著這個永久性的自然差異發生的階級差別，剷除淨盡，這種階級的壓迫，將隨永久的差異而存在。所以，我們對於兩性間的民主主義的要求，比什麼都迫切，我們對於兩性間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所負的責任，亦比什麼都重大……

我們進行的步驟是：第一步要與革命的民主主義結合起來，對抗封建軍閥。第二步要與革命的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對抗帝國

派資本主義；同時要平民階級的男女注意了解並尊重我們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這是我們唯一的使命。<sup>73</sup>

女權運動同盟會要求婦女各方面的平等權利，特別強調了平等的教育權利與職業機會的重要性。它還特別為工廠女工要求同工同酬和保護性法律，要求禁止買賣奴婢和禁止纏足，為下層階級婦女奔走呼號。這一寬泛的女權主義綱領，證明了五四女權主義者認識到了社會性別的階級維度，也意識到了要聯合不同階級婦女。後來在國民革命期間，國共兩黨合作中也照搬了這一綱領。總之，雖然參政運動是多年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蓬勃發展的產物，但也受到日益強大的社會主義的影響。<sup>74</sup>

1922年7月以後，女權運動同盟會和女子參政協進會在全國主要城市迅速建立起分會。成立宣言和婦女組織的請願活動經常出現在《婦女雜誌》上。主編掩飾不住他對女權運動蓬勃發展的興奮，在1922年底寫道：「本年是我國婦女界最可樂觀的時期：各地的女權運動，大有像春初的花木一般，欣欣向榮之勢；幾千年來被閉鎖在家庭中的女子，都已經或將要敲斷了鐵索，奔跑到社會上來了！」<sup>75</sup>為了指導和進一步提倡日漸壯大的婦女運動，章錫琛在1923年1月策劃了一期婦女運動專號。

這期婦女運動專號羅列了有關「中國目前婦女運動應取的方針」的主要討論。熱心的男女讀者可以自由表達各種各樣的觀點。章錫琛在一篇重要文章中，闡釋了他的兩步解放理論。他對逐漸興起的婦女運動表示歡迎，認為這場運動遵循了英美個人主義的女權主義路徑。然而，他警告中國婦女不要把「女性與個人性」對立起來，他已經意識歐美婦女運動中存在這一問題。他認為，雖然中國婦女要達到作為人的覺醒的第一階段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時他們要為性的覺醒這第二階段做好準備。在他看來，婦權運動是邁向母權運動這個目標的一個步驟。然而，婦女運動的最終目標不僅僅是滿足男女的個人利益，而是促進種族的進化和人類的進步。這有賴於戀愛的實現和婦女「神聖的母性」。<sup>76</sup>

大部分作者並不關心婦女最終的性解放。相反，他們關注了其他一些優先事項。多數人都同意教育和職業是第一位的，這能確保婦女獨立。也有很多人質疑參政運動的效果。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如此骯髒，女子參政會導致她們自己被玷污。然而，大多數人相信參政運動本身是婦女提高能力和提升覺悟的過程。還有少數幾個作者強調婦女運動中的階級問題。上海縐絲廠女工近期的一次罷工，突顯了勞動階級婦女與受教育的婦女之間的隔閡。雖然一些作者號召兩個階級的婦女要聯合起來，但是有幾個作者認為在階級分化社會裏，無產階級婦女運動才是運動主力軍。這一爭論意味著，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中提出的女權主義綱領被廣泛接受，而且也顯示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的呼聲越來越高。<sup>77</sup>

讓主編失望的是，儘管《婦女雜誌》全力推動參政運動，但這一運動沒能壯大勢頭。不到一年時間，全國範圍內有組織的活動逐漸偃旗息鼓。婦女運動專號出版幾個月後，對婦女運動的批評聲音開始出現。比如，晏始指出，大多數婦女組織最初成立之時，往往召集一兩次熱鬧的盛會，發表幾篇激昂的宣言，有時或招待新聞記者、請求名人講演，以及其他幾件較近實際的工作。但是，他抱怨說：「然而此等舉動，卻竟像紙炮一般：當其初燃的時候，未嘗不其聲震天，其高衝天，使人望而駭異；然不久便只剩幾團破紙，散落地上。我們固然日夜盼望婦女的從事團體運動，然而像這樣輕躁浮動的團體，我們卻不得不極端反對了。」<sup>78</sup>

晏始批評很多婦女加入組織不是由於需要，而是為了虛榮。晏始沒有意識到女權主義運動已經成為五四時代的一種摩登潮流，以至於吸引了那些並非專注於此的男女。晏始和一些其他作者也指出，缺乏強有力且堅定的領袖，是有組織的活動變得隨意混亂的主要原因。高山對這一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領袖人物必須有經驗的老成的婦女們，而且將這事作終生職業看的。因此能任這事的，必須有閒暇的，有運用經濟能力的，並且

所處的環境是固定的。求學時代的女子在時間和經濟上都不適合作這種團體運動，固不消說，一經結婚以後，環境為之一變，能夠再繼續前次的運動又是一個問題了。<sup>79</sup>

雖然這些分析認為，羽翼未豐的女權主義運動根基尚不穩定，但他們仍對其將來的發展抱有希望。因為這些作者有歐美女權主義運動這個「全方位」的榜樣，他們不同意那些批評中國婦女參政運動不切實際或者毫無意義的聲音。一些新文化人士厭惡政治骯髒，認為當前中國政治太過於複雜險惡，婦女不宜捲入，她們如果集中精力於教育和職業會更有成效。章錫琛主編認同教育和職業的重要性。但是，他堅持認為婦女參政是世界主流，中國婦女不僅應為參政而鬥爭，而且應參與政治改革。此外，由於教育和職業推動了婦女在各個領域的個人進步，參政運動能在一個簡單目標下將所有婦女團結起來。章錫琛指出，根據他對歐美經驗的了解，參政的成功能立即提高婦女的政治和法律地位。<sup>80</sup>

章錫琛一直認為中國婦女運動應有一個全面的計劃，並堅持性革命的中心地位。在1924年1月這一期的社論中，他再次宣稱社會中把男女區別對待是人類最大的錯誤——這一錯誤是基於對性的錯誤觀念。他認為：

男女間一切的錯誤，都從性的錯誤而生；而性的錯誤中最基礎的錯誤，就是關於色情的錯誤。在人類把性的關係的行為、要求、欲望看做低劣污穢的時候，婦女將永遠被罩在卑微的地位，婦女問題決不會有解決的希望，這是我們所敢斷言的。

我們常常聽到蔑視女性的人們說，女子不過是生殖的機器；這固然太把女子其他的能力忽視了，但即使照他的話，女性也並不是該蔑視的。許多人所以把這當做蔑視女性的話，只為了他們不知道生殖的崇高的價值的緣故。女性在生殖方面所負的任務，的確要比男子重大；人類如果能夠承認生殖是人類的最神聖的一件事情，便不會再有像今日那般蔑視女性的習慣了。

所以我們的意見，以為改正性的觀念，是今日唯一重要的急務，解決婦女問題的最初入手方法。<sup>81</sup>

這篇社論僅僅表達了章錫琛和他少數同事的關注點。其他文章則顯示了不同的側重點。

在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觀點內部，至少有兩種截然不同但不相互排斥的派別。我們或許可以把章錫琛和他的同事歸為自由主義文化女權主義，他們強調改變男性中心思想以及與此相聯繫的文化價值觀。另一派的觀點可以被歸為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許多作者在分析婦女參政運動的弱點時，顯示他們意識到要求平等權利中的階級偏向。他們指出，大學開女禁僅僅滿足了一小部分富裕家庭女子的利益。儘管讓一小部分女性享受平等教育和率先覺醒起來很重要，但是將教育機會擴展到貧窮階級婦女並為她們提供必要的服務，也非常緊迫。渭川認為，只有當十分之九的婦女接受教育並獨立生活時，大規模的婦女運動才成為可能。因此，他號召那些少數已經覺醒且受過教育的女性，要承擔起教導全國婦女的責任。他提出，這些女性應該開辦義務教學，接收那些無法上學的婦女。貧窮婦女還需要職業學校來讓她們掌握技能並實現經濟獨立。這種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主要關注的，是為大多數下層階級婦女提供實際服務，同時著力改善她們的生活。<sup>82</sup>

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女權主義者並不是唯一關注下層婦女福利的人。向警予對1923年中國的婦女運動做了一個調查，發現上海女權運動同盟會和基督教婦女組織（如基督教女青年會〔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簡稱YMCA〕和基督教婦女節制會〔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簡稱WCTU〕）都為改善工廠女工的狀況做出了很多努力。向警予評論說，基督教婦女組織「對於一般婦女所輕視鄙賤的工廠勞動婦女尤其特別注意」，並且「他們於勞動婦女要稱不遺餘力的幫助」。<sup>83</sup> 由於這些婦女組織附屬於國際基督教組織，因此具備必要的資源和機構穩定性來運作為貧窮婦女謀福利的項目。相

比較而言，新成立的女權組織儘管願望很好，但資源有限且組織經驗不足。《婦女雜誌》的這些討論從一定意義上體現了女權主義組織還沒有成功影響到下層婦女。

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目標在於婦女的政治、法律、社會、經濟、性的平等權利以及新的覺悟。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卻明確指出了一條不同的道路。這條馬克思主義道路以蘇聯為榜樣，強調經濟制度是婦女解放的基礎，並主張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是婦女獲得自由和平等的途徑。尚一在1923年寫道：

在這秩序的圈內，要求得婦女解放之實，正如在資本主義社會內要求勞動者解放一樣，到底難得成功的。從普通選舉購不到勞動者的自由，同樣，從婦女參政權的獲得，也購不到婦女的自由。所以婦女運動和勞動運動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可不放眼於新的社會秩序。真正的婦女運動，不可不為無產婦女的運動，更不可不為無產階級運動的婦女運動。……

婦女運動的目標，既在用新的社會秩序代替今日的社會秩序，所以要使婦女運動的效果格外顯著，不能不與無產階級大眾的運動相提攜。<sup>84</sup>

《婦女雜誌》的編輯對婦女解放的不同觀點持開明態度，他們起初並沒有意識到一種競爭話語的出現。然而，隨後的幾年裏，共產黨關於婦女解放的話語挑戰了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優勢。1923年，共產黨決定聯合國民黨發動國民革命運動，關於婦女運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爭論，變成了共產黨動員婦女的政治策略。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項婦女運動的決議，指示女共產黨員要把女權主義運動引導到國民革命運動中來。決議通過後，中共婦女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向警予在她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調查中，分析了女權主義參政運動的「錯誤」，並敦促受過教育的婦女加入到國民革命運動中。在這篇文章中，她批評了《婦女雜誌》的主編支持溫和的參政運動，同時對參政運動提出了猛烈的批判：

他們不明白中國的大勢，不明白現在中國的政治是軍閥武人割據的政治，真正的人民政治還在革命改革之中，只一味對向現實政治瞎衝亂撞，對於真正的政治運動——國民革命運動，為完成女權及參政運動之先決條件的，他們反沒有勇氣參加。對於為女權及女子參政障礙的軍閥政治——全國覺悟人民同仇敵愾一致喊打的，反而俯首將順，妄想委曲求全。<sup>85</sup>

這一猛烈的批評可能鮮為人知，因為這篇文章發表在一份不知名的共產黨刊物《前鋒》上。為了吸引更多的讀者，向警予向《婦女雜誌》投稿，討論婦女運動的未來。在長文〈今後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中，向警予以中共的理論觀點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進行了分析。中國是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中國人民遭受著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軍閥的雙重壓迫，從未嘗過人權和民權的滋味。她認為，針對這一背景，中國婦女如果沿襲18世紀歐美婦女運動的「舊程式」將是錯誤的。向警予指出，如果中國婦女只是追求與中國男子的同樣地位，其後果將是一場災難：

參政運動成了功，一班笨點的婦女趁機闖入北京或各省的豬圈，夥同一般男性的豬仔幹那禍國殃民的勾當。職業運動成了功，女子脫離被保護的地位投入社會謀獨立的生活，那時候，便可隨時隨地領略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土匪般掠奪的滋味。總而言之，在中華民國未能達到獨立、自由、和平、統一以前，漫說婦女的徹底解放不可能，就是十八世紀歐美婦女所懸為目標的女權也絕難辦到。<sup>86</sup>

那麼，中國婦女解放的正軌是什麼呢？向警予將中國婦女置於全球帝國主義體系，號召婦女加入了國民革命運動，以推翻英美帝國主義列強以及其扶持的中國軍閥。國民革命又如何與婦女解放有聯繫呢？向警予認為，因為中國是一個反抗帝國主義的受壓迫民族，中國的國民革命必然會加入到西方工人革命中，形成一場世界革命。世

界革命的成功最終會解放勞工。由於婦女和勞工在私有經濟制度中都是奴隸，因此將勞工從這種經濟制度中解放出來，也會使婦女得到解放。

向警予的這篇文章是共產黨國族主義反對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重要聲音，因此值得進一步探究。有趣的是，雖然她對西方女權主義的批評充滿著國族主義情感，但卻不是出於本土主義的立場。相反，它是基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對世界形勢的分析。歸根究柢，她與她批評的對象沒有本質區別。相比那些推動女權主義的人，向警予更加生硬地將歐洲社會主義路線運用到中國婦女解放，因為中國共產黨不僅在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而且在組織上屬於第三共產國際。<sup>87</sup> 總的說來，那些鼓吹改造中國的或激進或溫和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都從國外的理論思想中尋求靈感和分析框架。我這裏要強調的是，國族主義並沒有讓中國共產黨更少地以西方為導向。對西方話語（主流的或邊緣的，互補的或者衝突的）的挪用、吸收和互動，是近現代中國的一個主要歷史進程，在這一進程中，不同政治力量和社會利益都積極地加入話語的搏弈。

當馬克思列寧主義被奉為真理時，它就具有了排他性，向警予的文章就是例證。向警予不僅強調了婦女參加國民革命的政治必要性，還指出了她認為的婦女解放唯一正確的途徑。更為重要的是，她兩次提到了「18世紀歐美女權運動的舊程式」，並以此與20世紀勞工解放這一正確途徑進行了對比。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向警予為了闡釋革命真理，將歐洲女權主義描述為「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的過時玩意，而馬克思主義代表了20世紀正在興起的無產階級革命。用她的話來說：「中國婦女運動，已到20世紀勞動解放人類整個歷史全體轉變的時期。歷史的進化，早把婦女解放的道路指給世界婦女了。」<sup>88</sup>

向警予的「真理」顯然不能讓《婦女雜誌》的編輯信服。發表向警予和其他關於國民革命的文章，或許表達了編輯對政治運動的支持。但是，這並不意味他們接受了對婦女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分析方法，也



不意味他們同意將他們的女權主義綱領由國族主義綱領所取代。實際上，主辦《婦女雜誌》的這些男性對國族主義—馬克思主義的辭藻根本無動於衷。<sup>89</sup>

1924年底孫中山應馮玉祥邀請，北上共商國是，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全國婦女組織活動出現第二次高潮，要求婦女團體參加國民會議的參政權。有意思的是，這次國民會議促進運動是由中共發起的，向警予一反在年初發表的對婦女參政的激烈批判立場，積極組織領導了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在這次參政運動中發揮了整合各界婦女團體的突出領導作用。<sup>90</sup>但是，段祺瑞軍閥政府拒絕了婦女在議會中的參政權，婦女政治參與的目標再次宣告失敗。章錫琛分析了最近這次國民會議促進運動失敗的教訓，建議婦女應該更注重倡議女權主義而不是急於做參政運動。女權主義能夠從根本上改變男女的「心」。章錫琛強調，不經過這種「心的革命」，中國婦女運動將難以奏效。重要的是，為了表達女權主義對心靈改造重要性的想法，他使用了「弗彌涅士姆」這個詞——日本女權主義著作引入中國時對「feminism」一詞的音譯——而不是「女權主義」這一包含有「婦女的權利」之意的意譯詞。還清晰說明「塞弗拉極士姆」(suffragism，即參政運動)是「弗彌涅士姆」的一部分：「中國婦女運動的所以沒有成效，就是因為一般的婦女運動者，只知注重於部分的塞弗拉極士姆的要求，而忽略了全般的弗彌涅士姆的認識和宣傳。」顯然章錫琛通過閱讀和翻譯日本女權主義著作了解了弗彌涅士姆(女權主義)的複雜含義，他對這個詞的選擇，突顯了他想把中國讀者的注意力轉移到文化和心理層面的女權主義「心的革命」的意圖，同時也流露出他對專注於婦女權利的「初步階段」婦女運動的不滿和焦慮。<sup>91</sup>

章錫琛在1925年繼續倡導弗彌涅士姆—女權主義。但是，自1920年章錫琛開始撰寫女權主義主題的文章以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局面發生了劇烈變化。許多新文化人士從充滿疏離感的文化批判者變成了積極投入的政治活動家。國共兩黨正在集中精力發起一場國民革

命，這使得國族主義在政治話語中上升為主旋律。不難理解，章錫琛對女權主義「心的革命」的呼喚顯得特別不合時宜，尤其是對那些提倡推動國族主義運動的人來說。在中共剛創辦的《中國婦女》雜誌中，一篇文章公開批駁章錫琛的「心的革命」理論。作者綺紋認為，章錫琛所謂的「心的革命」，「其實只是改革社會習慣道德上對於婦女的偏見」。這種「革命」不能改變受壓迫婦女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綺紋說，只有在生產和經濟狀況改變後，這種「革命」才可能發生。她認為，「章錫琛先生的所謂的『心的革命』在婦女解放上並不佔若何重要位置。而婦女解放應該做的，乃在初步比較易做的廢除法律上男女不平等地位和第二步比較難做的根本廢除私產制。這就是說，真實的婦女解放必須在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私產制廢除以後。」<sup>92</sup>

綺紋的文章突顯了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把女權主義「引向」國民革命，也同時說明中共對《婦女雜誌》的關注，以及其新創辦的《中國婦女》的重要性。在中共推動的國民會議促進運動之後，創辦《中國婦女》正是中共動員婦女的新作為，宣傳黨對婦女運動的定義並且將城市女權主義者的能量引向國民革命運動。要實現這一目標，就需要挑戰當前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章錫琛，作為女權主義的著名倡導者和一份有影響力的雜誌的主編，無意間成為正在興起的國族主義—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話語的主要對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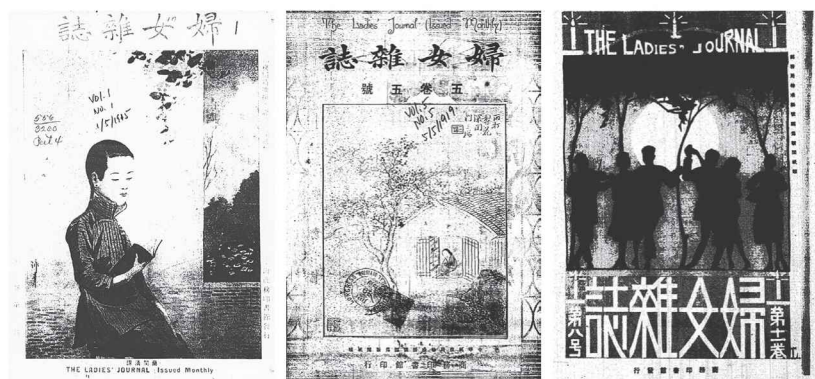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主辦《中國婦女》的都是五四時期出現的新女性。楊之華、向警予和張琴秋等都是經歷了五四學生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女學生。然而，這些新女性並沒有成為像美國史丹頓夫人(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莫特夫人(Lucretia Mott)那樣的職業女權運動領袖(章錫琛在分析中國婦女運動的弱點時特別提到了她們)，反而由於對婦女解放的追求而投入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懷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共產黨作為一種新的政治話語和政治活動的具體體現，使高漲的女權主義熱情偏離了獨立的婦女運動，而章錫琛和他的同事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sup>93</sup>

總之，1925年時《婦女雜誌》編輯對婦女運動的界定受到了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路線的嚴重挑戰。聚焦於婦女政治、法律、經濟權利的有組織的女權運動，在全國範圍存在的時間很短暫，只是在1922年底到1923年初曇花一現。1924年底伴隨著國民會議促進運動而興起的婦女組織運動的第二次浪潮，標誌著兩黨努力拉攏女權運動的開始。共產黨和國民黨運用有效策略吸引了一批追隨者，使得政黨領導的婦女國民革命運動獲得話語權，而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大部分已經融入了國族主義的婦女運動的議程中，而非黨派的獨立女權運動在與兩黨領導的婦女運動爭奪追隨者的收編中勢頭衰減。

## 女權主義堡壘的坍塌

《婦女雜誌》一直扮演著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堡壘，但為時不長。它的持有者商務印書館只對擴大市場感興趣。當編輯們富有新意的女權主義論調迅速增加了雜誌的發行量時，商務印書館的董事就支持他們。但在新的氣候下，當公眾對編輯的「邪說妄談」厭倦反感時，也就是出版社拋棄這些編輯的時候了。<sup>94</sup>

章錫琛堅持提倡性解放的努力最終導致他的失敗。1925年1月，章錫琛與他的合作者周建人出版了一期「新性道德專號」。在兩篇重要文章中，章錫琛和周建人討論了道德的相對性，並提倡一種基於個人行為是否侵犯他人自由和利益的新性道德。章錫琛認為，由於性是人類的天生需求，它不應被視為是骯髒的。此外，男人應該關注和滿足女子的性需求。這兩篇文章充滿新思想，試圖開啟民智，並強調當前性道德對女子是不公正的。然而，他們對性自由的鼓吹超越了傳統道德的限制，遭到了北京大學教授陳百年的猛烈抨擊，指責他們企圖要恢復一夫多妻制。知名大學教授的攻擊引起了一片譁然，《婦女雜誌》的執行董事解除了章錫琛和周建人的職務。他們甚至沒有機會在《婦女雜誌》上為自己辯解。<sup>95</sup>



《婦女雜誌》封面變化(由左至右)，出自第1卷，第1期(1915)；  
第5卷，第5期(1919)；第11卷，第8期(1925)

從1925年9月開始，《婦女雜誌》完全換了新主人。關於戀愛、婚姻、離婚、性的討論從《婦女雜誌》中銷聲匿跡。女權主義文本和西方小說的翻譯也消失了。新主編的興趣在於培育婦女的藝術品味，迅速組織了一期藝術專號。甚至讀者群也似乎迅速改變了，現在讀者不再諮詢有關戀愛、求偶、婚姻或者婦女運動的問題，而是對攝影和健康感興趣。雖然還有一些文章在討論女子教育和女子職業培訓的話題，但《婦女雜誌》不再是女權主義發聲陣地了。

事後看，這一事件標示著激進文化變革時代的終結。激進的新文化人士丟失了繼續衝鋒陷陣的一個前沿陣地，他們的語氣也變得退守和無奈。魯迅後來發表了一篇由章錫琛寫給陳百年的駁文，當時沒有人願意刊登這篇文章。他諷刺地評論道：「我總以為章周兩先生在中國將這些議論發得太早——雖然外國已經說舊了，但外國是外國。」<sup>96</sup> 魯迅的言下之意是，即使經過整個五四時期對戀愛和新的性道德進行如此充分的討論後，公眾還遠遠沒有為性解放做好準備。周作人在1927年表達了同樣的觀點。當他受邀寫一些關於婦女問題的文章時，他說：「婦女問題的實際只有兩件事，即經濟的解放和性的解放。然而此刻現在這個無從談起，並不單是無從著手去做，簡直是無可談，

談了就難免得罪。」<sup>97</sup>雖然他在傳統性道德的背景下繼續堅持關於性和婦女困境的寫作，但是現在這位曾經的先鋒派新文化人士的言辭已露出疲態。

但是新文化不會在一場戰鬥中就被擊敗。那些真正相信新文化願景的新文化人士們仍在繼續戰鬥。章錫琛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解除《婦女雜誌》主編職務後不久，就和周建人一起從商務印書館辭職，共同創辦了一份新刊物。1926年1月，《新女性》作為《婦女雜誌》的續篇出版了。之前為《婦女雜誌》撰稿的老朋友，現在開始為《新女性》寫稿。戀愛、婚姻、性等主題繼續在這份新雜誌中得以呈現。

有趣的是，周建人在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二重道德〉的重要文章。十年之前，正是他的哥哥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了〈貞操論〉的譯文而名聲大噪。〈貞操論〉以含蓄的語言和邏輯的論證來挑戰雙重性道德，而〈二重道德〉則用科學語言直截了當地描寫女性的生殖系統，以此闡述雙重性道德的根源。周建人用直白語言對婦女經血和懷孕做的分析，以此批判不同文化和宗教中認為女人是污物的觀點，這對於他的兄長來說是不可想像的。周建人關於文化與經濟生活之間的辯證關係的觀點，顯示了他在婦女受壓迫問題上深入的知識性探究。通過指出男女被社會建構的差異，周建人強調了在文化中形成的觀念的可塑性，尤其是性觀念。如果說周作人的譯文開啟了一個認真審視性道德的時代，那麼周建人的文章則代表了過去十年知識求索的巔峰。但是，周建人的這篇文章沒有像他哥哥十年前那樣引發熱議，很有可能是因為如今受過教育的男女作為這類文章的主要讀者，對這種語言太過於熟悉，以至於不會產生任何興奮感了。<sup>98</sup>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女權主義話語的成功削弱了《新女性》這類雜誌的話語力量。陳望道在1926年哀嘆婦女運動的沉寂，抱怨說：「真正覺醒的女子多已埋頭研究專業去。」<sup>99</sup>他指的僅僅是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運動。事實上，這個時期國民革命中的婦女運動如火如荼，並隨著北伐戰爭蔓延到中國許多地方。陳望道的觀察說明了一個頗為反諷的

現實：當受過教育的婦女真正去追求經濟獨立並發展個人職業、實現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廣泛宣傳的解放目標時，像《新女性》這樣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雜誌對她們就缺乏吸引力了。

女權主義的男性倡導者充分認識到了這諷刺的現實。1929年編輯們選擇停辦《新女性》時，他們以痛惜的語氣來慶賀他們的成功：

廢刊的原因很是單純，就是時代已經不需要我們了。

時代真是握有無上權力的專制暴君。在五六年前使人震駭以為邪說妄談的議論，到了今日，人人都只覺得平淡無奇。「婦女解放」、「婦女運動」一類的名詞，在五四運動以後的知識階級裏，人人都在興高采烈地討論著，宣傳著，同時還有一部分思想落後的人在反對著，詛咒著；現在卻被當做像飢了應該喫飯，冷了應該添衣一般的老生常談，雖然飯有沒有得喫，衣有沒有得添還是一個問題。<sup>100</sup>

不過編輯們所強調的，並不是五四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如何決定性地將「婦女解放」變成中文詞彙中的一個褒義詞，儘管他們也可說這個成就裏有他們的貢獻。相反，他們要強調的是，相比各種政治傾向的人口頭宣稱支持婦女解放，要真正實現婦女解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畢竟他們放棄了女權主義倡議，並不是因為他們已經取得了完全的勝利。相反，是因為1920年代末，自由討論和倡議的言論空間要比五四時期狹窄多了。1927年國共合作破裂，國民黨控制了中國大部分地區，左翼分子和左翼意識形態變成非法。如今思想爭論不可避免地帶有黨派政治意味，因而極具風險。編輯們非常清楚他們的困境。他們承認對自己的「空談」不滿意，抱怨說：「但是換個什麼方向呢？左傾一點吧？在這黨的權力高於一切的黨治國家之下，也許會因此被認為赤化，砍掉腦袋。」<sup>101</sup> 政治環境惡化到這種程度，以至於自由探討婦女解放的道路都不再可能。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相比較而言，四分五裂的軍閥割據時代卻是中國女權主義發展的稀有黃金時期。<sup>102</sup>

《新女性》這一女權主義堡壘的最後倒塌，標誌著五四女權主義在1920時代末的「退潮」。但是，在這十年間男性女權主義者的鼓吹和女性女權主義者的活動過程中，中國城市社會見證了婦女生活發生的不可逆轉的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兩個變化是，高中以上的男女同校取代了性別隔離；日漸增多的婦女職業機會和政治參與所帶來的婦女社會進步。

另一個不常提及的深刻變化是：隨著五四女權主義的普及，一種新的女性主體性形成了。1924年，章錫琛對這一變化進行了描述：

在這十年中，還有一種勢力最大而成長最速的，便是無形的思想的革新。這革新的就是所謂婦女的「人」的覺醒。在十年以前，雖然也有過像要求參政的那種壯烈的運動，然那時從事運動者的唯一的目的，不過在乎求得政治上的男女平等，並沒有其他的意義。然從近年所謂新文化運動起來之後，在婦女解放上，也加了不少的影響，使一般婦女，對於古來因襲的風俗、習慣、教條、迷信，起了根本的懷疑。凡是略為和新思想接觸的女子，無不有一種「**女人也是人**」的覺悟，歷來奉為女子聖經的《女誡》、《內訓》、《女論語》、《女範》等書，都被踐在新女子的腳底下了。<sup>103</sup>

章錫琛的觀察抓住了五四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核心主題。新文化人士可以宣稱獲得了非凡功績：在五四女權主義的潮流影響下，要求獨立、自主和男女平等的新女性出現了。正如本章所論證，新文化人士對婦女解放的鼓吹與中國婦女的新覺醒存在著直接聯繫。然而，五四時期新女性的出現，也是對晚清以來關於女子的國族主義話語回應的一部分。富國強種為廢纏足和興女學提供了合理性，婦女健全的身體和女子教育為新女性的社會進步提供了身體條件和制度基礎。

新女性作為有關婦女的國族主義話語的受益者，受到了國族主義的深刻影響。首先，國族主義話語與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之間似乎並不衝突，因為新文化人士圍繞文化改造的爭論認為，中國這個古老

國家要想邁向現代化，中國婦女就應成為擁有平等權利的獨立個體。這兩種話語體系直到中國共產黨誕生後，才變為互相競爭且有衝突。中國共產黨的話語將馬克思主義與國族主義結合起來，號召婦女在現存的政治和經濟制度下擱置對平等權利的追逐。鼓勵婦女參加革命來首先確立一個獨立統一的國家，最終推翻私有制。借助與國民黨合作的力量，中國共產黨的國族主義話語在1920年代後半期得以壯大。但是，正如本章所揭示，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儘管有所式微卻並未消失。事實上，自從五四女權主義浪潮興起以來，「婦女解放」和「婦女運動」已經成為中國政治文化中經久不衰的現代符號，雖然兩者的定義在不同歷史背景下為滿足政治需要，都頻繁發生過變化和轉換。本書第二部分將論述女權主義和國族主義是如何塑造五四時期這一代女性的，而這些女性又是如何在20世紀初期崛起，成為中國急遽社會變革的主力軍。

## 注釋

- 1 Chris Weedon,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女權主義實踐和後結構主義理論)(Blackwell Publishers, 1987), 110.
- 2 梁令嫻，〈敬述吾家舊德為婦女雜誌祝〉，《婦女雜誌》，第1卷，第1期(1915)，頁6。
- 3 余天穗，〈余之女子教育觀〉，《婦女雜誌》，第1卷，第1期(1915)，頁2。
- 4 劉盛，〈發刊詞〉，《婦女雜誌》，第1卷，第1期(1915)，頁3—4。
- 5 關於梁啟超在推進女子教育中的作用的進一步討論，參見第四章。
- 6 參見梁啟超，〈變法通議〉，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28)，頁321—324。
- 7 Benjamin Rush, “Thoughts upon Female Education” (女子教育思想)(Boston, 1787), quoted in Woloch, *Wome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91.
- 8 參見Nancy F.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 (女人氣質的聯結)(Yale University, 1977), Introduction and Ch. 2; 也參見Woloch, *Wome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Ch. 6。



- 9 丁逢甲，〈女界箴言〉，《婦女雜誌》，第4卷，第2期(1918)，頁5-6；第3期(1918)，頁1-4。引文請見第3期，頁4。
- 10 黃逸農，〈國民之敵〉，《婦女雜誌》，第5卷，第9期(1919)，頁6。
- 11 陳式甄，〈申婦從女帶之義〉，《婦女雜誌》，第2卷，第4期(1916)，頁12。
- 12 飄萍女史，〈理想之女學生〉，《婦女雜誌》，第1卷，第3期(1915)，頁1。
- 13 西神(王蘊章)，〈通信問答〉，《婦女雜誌》，第3卷，第7期(1917)，頁15。  
編輯朱胡彬夏去過日本和美國，對美國中產家庭進行了生動而浪漫的描述；在〈美國家庭〉一文中，她描繪了一位幸福能幹的美國主婦如何將家庭視為自己知識發展的領域。她還評論說美國婦女對家庭的專注，體現了儒家的家國精神。參見《婦女雜誌》，第2卷，第2期(1916)，頁1-8。對美國婦女家庭角色意識形態的提倡，折射了中國大城市新興的資產階級的需求。資產階級家庭集中在受西方影響最大的港口城市，他們經常自覺模仿西式生活，是其自我身分形成的一種方式。可以說，《婦女雜誌》對於形塑中國上層西式「太太」也作出了貢獻。
- 14 參見〈記述門〉，《婦女雜誌》，第2卷，第3期(1916)，頁1-16；第3卷，第3期(1917)，頁1-16；第3卷，第5期(1917)，頁1-20；第3卷，第10期(1917)，頁1-16；第5卷，第5期(1919)，頁1-8。
- 15 陸振權，〈婦從女帶釋〉，《婦女雜誌》，第2卷，第5期(1916)，頁2-3。
- 16 殷同薇，〈擬本校學生自治會徵集會員啟〉，《婦女雜誌》，第4卷，第1期(1918)，頁2-3。
- 17 孫熙育，〈女學生之責任〉，《婦女雜誌》，第4卷，第11期(1918)，頁3-4。
- 18 馬仁常，〈人必如何而後能獨立說〉，《婦女雜誌》，第4卷，第4期(1918)，頁2。
- 19 參見王卓民，〈論吾國大學尚不宜男女同校〉，《婦女雜誌》，第4卷，第5期(1918)，頁1-8。
- 20 江學輝，〈女權平議〉，《婦女雜誌》，第4卷，第8期(1918)，頁4-7。
- 21 張登仁，〈說女子教育〉，宋國樞譯評，《婦女雜誌》，第5卷，第5期(1919)，頁8。宋、張二人都是大學生。
- 22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頁627。
- 23 主編王蘊章也負責管理《小說月報》，其後由沈雁冰接任職務。據他說，王蘊章準備了足夠豐富的稿子，足以完成雜誌一整年的排版。沈雁冰為了用新文化主題來改革《小說月報》，不得不放棄所有已支付稿酬的文章。參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頁140。

- 24 同上注，頁134-135。
- 25 同上注，頁136。
- 26 參見記者，〈本雜誌今後之方針〉，《婦女雜誌》，第5卷，第12期（1919），頁1-3。
- 27 佩韋（沈雁冰），〈婦女解放問題的建設方面〉，《婦女雜誌》，第6卷，第1期（1920），頁2。著重處為後加。
- 28 佩韋，〈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婦女雜誌》，第5卷，第11期（1919），頁2。
- 29 雲舫，〈改造時代的婦女應具什麼資格〉，《婦女雜誌》，第6卷，第6期（1920），頁2。
- 30 佩韋，〈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頁1-6。
- 31 彭季能，〈今日中國女子應覺悟的一點〉，頁4。
- 32 王平陵，〈新婦女的人格問題〉，頁11-12。
- 33 同上注，頁13-14。也可參見彭季能，〈今日中國女子應覺悟的一點〉；雲舫，〈改造時代的婦女應具什麼資格〉；黃河濟，〈新婦女應有的覺悟〉，《婦女雜誌》，第6卷，第10期（1920），頁18-20。
- 34 20世紀初期，上層婦女認為束胸是一種時尚，因為大胸總是和從事體力勞動的下層婦女聯繫在一起。剪掉長髮在五四時期是個熱門議題，因為長髮被認為不衛生且浪費時間。類似1920年代美國飛來波女郎（flappers）的齊耳鮑伯短髮，旋即與中國新女性聯繫起來。
- 35 徐世衡，〈今後婦女應有的精神〉，《婦女雜誌》，第6卷，第8期（1920），頁12-18。
- 36 李佩蘭，〈解放後的婦女人格觀〉，《婦女雜誌》，第6卷，第5期（1920），頁4。
- 37 繆程淑儀，〈香與婦女〉，《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1920），頁5。
- 38 雁冰（沈雁冰），〈讀少年中國婦女號〉，《婦女雜誌》，第6卷，第1期（1919），頁1。梅生主編的六卷本《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新文化出版社，1929）最為全面地展現了婦女問題討論。
- 39 沈雁冰是他們的第一選擇。雖然自1919年底以來，沈雁冰給每一期《婦女雜誌》撰稿，但他最終還是選擇擔任《小說月報》的主編。參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頁140。
- 40 參見本間久雄，〈婦女問題十講〉，中國婦女研究會編、章錫琛譯，《婦女問題叢書》，卷一（中國婦女研究會，1924），序言。本間久雄是東京早稻田大學的一位教授，專攻英國文學和日本文學。1918至1927年，他擔任《早稻田文

學》的主編。他的原著《婦女問題十講》共十章，其中僅一章專門討論日本婦女運動，其餘都是介紹當時歐美的女權主義著作和問題。翻譯成中文版時，章錫琛增加了中國婦女運動的一章。

- 41 章錫琛出生於1889年，他是浙江紹興人，當他還在山會師範學堂讀書時就和魯迅成為了朋友，魯迅曾經教過他一段時間。章錫琛當上《婦女雜誌》主編後，魯迅向他推薦了自己的弟弟周建人。1921年10月，《婦女雜誌》聘請周建人擔任助理編輯。周建人與章錫琛在婦女解放和性道德方面觀點一致。周建人的婦女觀點，參見謝德銓，《周建人評傳》（重慶出版社，1991），頁84-99。
- 42 參見〈編輯餘錄〉，《婦女雜誌》，第7卷，第7期（1921），頁116。梅生編輯了三本由上海新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著作：1924年的《婦女年鑒》、1926年的《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和1928年的《女性問題研究集》。為了推動婦女問題研究，1922年章錫琛成立了婦女研究會，其大部分成員都經常給《婦女雜誌》投稿。
- 43 勞秋英，〈對於第三階級婦女的希望〉，《婦女雜誌》，第7卷，第10期（1921），頁110。
- 44 心珠，〈我所希望於男子者〉，《婦女雜誌》，第10卷，第10期（1924），頁1519。
- 45 另一個反映性別鴻溝的主要討論是由一個男子的婚姻自述所引起。許多男性對這名男子的不幸婚姻表示同情。但是一些女性卻極為同情這名男子的妻子，並批評這名男子的傲慢態度和自我中心。參見蓮史，〈婦女的非人時代〉，《婦女雜誌》，第9卷，第4期（1923），頁44-46。一些男性讀者批評女性準備要挑起男女之爭。參見〈讀前號〉，《婦女雜誌》，第9卷，第6期（1923），頁121-123。
- 46 瑟廬（章錫琛），〈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觀和戀愛觀〉，《婦女雜誌》，第6卷，第10期（1920），頁1-8；〈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婦女雜誌》，第7卷，第2期（1921），頁21-27。
- 47 瑟廬（章錫琛），〈戀愛問題的討論〉，《婦女雜誌》，第8卷，第9期（1922），頁122；第10期（1922），頁121。
- 48 在〈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一文中，一位叫荷荷的女學生描述了她所在學校的自由戀愛準則。但是，她對收到同班男生的情書感到不安。她並不想濫用戀愛自由，因為「戀愛」在她心中是神聖的。讀者們回信反應，女學生受情書的困擾是普遍的事情。M. Y. H. 這位不願意署真名的青年男子抱怨，在新思潮的影響下，他排斥父母給他安排的包辦婚姻。但是，現在他要和誰結婚呢？他學校的女生數量很少，他也不敢接近她們，害怕女生把他看作流氓，或者害怕他的情書被發表到雜誌和報紙中。參見荷荷，〈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

- 《婦女雜誌》，第9卷，第7期(1923)，頁41–44；M. Y. H.，〈青年求愛問題〉，《婦女雜誌》，第9卷，第9期(1923)，頁124–125。
- 49 瑟廬(章錫琛)，〈到婦女解放的途徑〉，《婦女雜誌》，第7卷，第1期(1921)，頁2。另見〈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
- 50 瑟廬(章錫琛)，〈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2–7。
- 51 1919年10月，剛出版的《少年中國》雜誌出了一份婦女專號。李大釗、田漢、黃日葵都就婦女運動的主題寫了一些文章。在《解放與改造》上，李達也發表了〈女子解放論〉一文，提倡中國婦女運動，見李鶴鳴(李達)，〈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期(1919)，頁18–32。
- 52 雁冰(沈雁冰)，〈婦女運動的意義和要求〉，《婦女雜誌》，第6卷，第8期(1920)，頁6。
- 53 雁冰(沈雁冰)，〈我們該怎樣預備了去譚婦女解放問題〉，《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1920)，頁5。
- 54 當中國共產黨試圖在農村根據地鞏固政權時，不得不放棄他們自五四時代繼承的部分女權主義話題。關於這個問題，參見Johnso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以及Stacey,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 55 徐彥之，〈北京大學男女共校記〉，《少年世界》，第1卷，第7期(1920)，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頁264。
- 56 徐彥之，〈男女交際問題雜感〉，《晨報》，1919年5月4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179。
- 57 徐彥之，〈北京大學男女共校記〉，頁264。
- 58 勞澤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將來〉，《婦女雜誌》，第7卷，第9期(1921)，頁10。
- 59 陳問濤，〈提倡獨立性的女子職業〉，《婦女雜誌》，第7卷，第8期(1921)，頁10。
- 60 趙景深記錄了胡適在天津學生同志會女權股的演講。胡適(胡適之)，〈女子問題的開端〉，《婦女雜誌》，第8卷，第10期(1922)，頁127。
- 61 田漢，〈第四階級婦人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32–34。
- 62 瑟廬(章錫琛)，〈國際婦女勞動會與中國婦女〉，《婦女雜誌》，第7卷，第11期(1921)，頁5。
- 63 讀者的投稿也反應出他們意識到下層婦女的問題和痛苦。參見〈讀者俱樂部〉，《婦女雜誌》，第7卷，第5期(1921)，頁104–106。

- 64 〈編輯餘錄〉，《婦女雜誌》，第7卷，第7期（1921），頁116。章錫琛所謂「到民間去」運動是指19世紀俄國改革者為接觸下層階級所作出的努力。他鼓勵男性倡導者向俄國學習，以提高中國受教育女子的覺悟。
- 65 方民耘，〈我國目前婦女運動應取的方針〉，《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111。
- 66 參見張友鸞，〈今後更要切實些〉，《婦女雜誌》，第8卷，第2期（1922），頁28。
- 67 C. K.，〈婦女問題與中國婦女運動〉，《婦女雜誌》，第8卷，第11期（1922），頁56。
- 68 唐敬皋，〈我所望於女青年〉，《婦女雜誌》，第8卷，第2期（1922），頁14。
- 69 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頁5。
- 70 羅素夫人（Dora Black），雲鶴譯，〈中國的女權主義與女性改造運動〉，《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51。這篇文章起初發表在日本婦女雜誌上。勃拉克女士與羅素從中國返回英國後就結婚了。《婦女雜誌》的這篇文章還配了一張勃拉克和剛出生的孩子的照片，這意味著1923年中國許多讀者仍然對這一對著名夫婦的行蹤感興趣。關於勃拉克訪問中國的回憶，參見她的自傳Dora Russell, *The Tamarisk Tree: My Quest for Liberty and Love*（檉柳樹：我對自由和愛情的追求）（Elek/Pemberton, 1975），Ch. 7。
- 71 1920年各期《婦女雜誌》的「婦女新消息」專欄都報道了湖南、北京、天津、上海的女學生活動。這一專欄還報道了國際婦女活動。見《婦女雜誌》，第6卷，第4期（1920），頁6；第5期（1920），頁6；第6期（1920），頁16；第7期（1920），頁8；第8期（1920），頁38；第11期（1920），頁10。
- 72 晏始，〈最近的女權運動〉，《婦女雜誌》，第8卷，第10期（1920），頁61-63。
- 73 〈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婦女雜誌》，第8卷，第9期（1922），頁126-127。關於綱領的詳細引文，見本書第六章。
- 74 關於對早期共產黨女黨員繆伯英的一項研究表明，繆伯英按照黨的指示參與組建了女權運動同盟會。雖然沒有進一步的證據來證明剛成立的共產黨與女權運動同盟之間有什麼聯繫，但女權運動同盟會的北京創始人很有可能對共產黨傳播的社會主義思想非常熟悉。參見曾長秋、周建純，〈中國第一個女共產黨員繆伯英〉，《人民日報》，1987年6月8日。羅素夫人也在〈中國的女權主義與女性改造運動〉中評論說，她所認識的新女性都是社會主義者。
- 75 〈編輯餘錄〉，《婦女雜誌》，第8卷，第12期（1921），頁124。

- 76 瑟廬(章錫琛)，〈婦女運動的新傾向〉，頁2-7。在這篇和其他篇關於戀愛的文章中，戀愛與種族進化的聯繫是基於這樣的一個理論，即因戀愛結合的父母所生的孩子比通過其他方式結合所生的孩子要更聰明和健康。
- 77 參見方民耘，〈我國目前婦女運動應取的方針〉。
- 78 晏始，〈婦女團體運動力的微弱〉，《婦女雜誌》，第9卷，第6期(1923)，頁17。晏始是筆名。從文章內容和發表的頻率來判斷，他很可能就是編委會的一員。
- 79 高山，〈將來的女權運動〉，《婦女雜誌》，第9卷，第12期(1923)，頁15。
- 80 記者(章錫琛)，〈我們今後的態度〉，《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2-7。
- 81 同上注，頁3。
- 82 渭川，〈對於婦女界的希望〉，《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73-77。何覺余，〈婦女運動的錯路及正軌〉，《婦女雜誌》，第10卷，第4期(1917)，頁591-593。1923年第9卷第1期的專刊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 83 向警予，〈中國最近婦女運動〉，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頁90。
- 84 尚一，〈婦女運動與新社會的建設〉，《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31-32。
- 85 向警予，〈中國最近婦女運動〉，頁92。
- 86 向警予，〈今後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29。
- 87 共產黨第三國際於1919年在列寧的領導下創建，此後他向中國派遣了兩名代表。第三國際代表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並傳遞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綱領。關於歐洲社會主義和女權主義之間的衝突，以及蘇聯革命對女權主義的影響的深入研究，參見卡倫·奧芬著，朱曉慧、柯倩婷譯，《歐洲婦女解放史》。
- 88 向警予，〈今後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頁32。
- 89 在同一期中，幾篇其他文章提到了國民革命運動，參見謝遠定，〈促婦女徹底的覺悟〉，《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70-73。
- 90 「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向警予的直接領導下，成為促進國民革命運動的一個有力的團體，也是上海婦女運動的重要領導者和組織者。」見上海市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頁93。向警予在推進這次參政運動中的一系列文章，見《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

- 91 章錫琛，〈最近婦女運動的失敗和今後應取的方針〉，《婦女雜誌》，第11卷，第7期（1925），頁1120–1124。「弗彌涅士姆」早就作為「feminism」的音譯詞出現在《婦女雜誌》裏。味辛在向中國介紹女權主義時，翻譯了日本作家原田實的女權主義著作。原田實在文章開頭強調了翻譯問題，指出「女權主義」這個詞太窄，不能表達「feminism」的含義，而「女子主義」或者「婦女主義」太過抽象。他建議用「弗彌涅士姆」來代替。參見原田實，〈弗彌涅士姆概說〉，味辛譯，《婦女雜誌》，第8卷，第5期（1922），頁64–71。也可參見由章錫琛翻譯的日本作者本間久雄的〈婦女問題十講〉，他翻譯時也使用了這個詞。

原田實（1890–1975）是一位教育學教授，他將西方著作翻譯成日文。愛倫凱的《戀愛與婚姻》（*Kärleken och äktenskapet*）是其譯作之一，引起了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熱烈討論。
- 92 綺紋，〈真實的婦女解放在哪種條件下才能實現？〉，《中國婦女》，第2期（1926），頁4–5。
- 93 關於這些女共產黨的活動，參見上海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她們在將女子參政活動引向國民革命運動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也可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以及楊之華，《婦女運動概論》（東亞圖書館，1927）。
- 94 尼瓦爾（Jacqueline Nivard）認為，由於五四思想引起了社會劇烈的變化，作為回應，保守力量在那些年開始抬頭。是否由於保守力量導致雜誌銷量下滑尚不清楚，但是商務印書館決定解僱立場大膽的編輯，可能是基於對雜誌聲譽的顧慮，而不是其發行人。見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婦女與女性報刊：以《婦女日報》為例，1915至1931年），*Republican China* 10, no. 1 (1984): 37–55。
- 95 章錫琛，〈新性道德是什麼〉，《婦女雜誌》，第11卷，第1期（1925），頁2–7；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婦女雜誌》，第11卷，第1期（1925），頁8–12；陳百年，〈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現代評論》，第14期（1925），頁6–8。章錫琛最後出版了《新性道德討論集》（開明書店，1926）。
- 96 魯迅，〈編完寫起〉，章錫琛編，《新性道德討論集》，頁98。
- 97 周作人，〈北溝沿通信〉，頁11。
- 98 周建人，〈二重道德〉，《新女性》，第1卷，第1期（1926），頁1–11。
- 99 陳望道，〈中國女子的覺醒〉，《新女性》，第1卷，第9期（1926），頁641。
- 100 〈廢刊詞〉，《新女性》，第4卷，第12期（1929），頁6。
- 101 同上注，頁6。

- 102 關於白色恐怖時期對國民革命運動中女權主義命運的討論，參見Elisabeth 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中國的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148–152。
- 103 瑟廬(章錫琛)，〈最近十年內的婦女界的回顧〉，《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21–22。著重處為後加。《女誠》、《內訓》、《女論語》、《女範》都是教授儒家與婦女有關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範的文本。









# 3

## 敘述者介紹

五四時期有很多標誌性的流行語，如「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婦女權利」和「女子獨立人格」。這些聚焦婦女問題的新詞彙成為新文化的主要符號。但是，這些新詞彙對當時的婦女意味著什麼？**她們**對當時的思想潮流有怎樣的回應？在20世紀初的中國現代性話語中，把女權主義造就成一種正面且值得追求的意識形態，五四時期的男性功不可沒；承認男性的這一角色，也使我們更想知道當時的個體女子對五四女權主義有何認知，又有何回應？只有歷史中的具體女子，而非男性作品中的女性文學再現形象，才能告訴我們這一時期的文化變革給她們在意識層面帶來了怎樣的變化。因此，我們希望通過五四女性自己的語言，來理解五四女權主義在20世紀中國產生的影響。

向讀者呈現五四女性的人生故事之前，我必須討論與閱讀她們的敘述有關的兩個彼此獨立又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產生這些人生故事的歷史背

景。本書中的敘述者既是在回答我的問題，也是在面對特定的社會和政治背景講故事。將這些敘述呈現出來，也是因為我作為一名歷史學者在這特定的歷史時刻所具有的強烈興趣和關注。為了讓讀者能將敘述置於歷史語境中解讀，我必須先討論一些下面敘述背後的目的和含意（包括敘述者和採訪者雙方）。因此，對本書主角的介紹將從對當代背景的討論開始，這一特定背景構成了這些敘述內容的特殊內涵。

第二個問題是與敘述者的人生經歷交織在一起的複雜歷史背景，這一歷史背景幾乎跨越了一個世紀。每個敘述後面的解讀都試圖梳理這些人生故事，並將這些個體女性行動者／演員（actors）還原到歷史舞台上。本書這部分是圍繞每位敘述者的人生結構組織起來，沒按照年代順序來呈現五四女性的歷史，各章之間缺乏時間上的連貫性可能會讓讀者感到困惑。因此，本章用一些主題來框架和連結起後面幾章，同時將敘述者提到的重大事件置於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

## 公眾記憶的建構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在公眾記憶中創造了三種1949年前的婦女典型：加入革命的女共產黨員，她們被提升到女英雄的位置；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壓迫的婦女，她們是被中國共產黨解放的受害者；依附於丈夫生存的資產階級太太，她們是墮落、寄生、剝削階級的化身，理應在革命中被消滅。<sup>1</sup>在毛澤東時代（1949–1976）創作的大量文學文本中，如小說、傳記、電影、戲劇、歌劇，將婦女被壓迫者轉變為革命女英雄是一個突出的、普遍的主題，而第三種典型只是偶爾作為背景人物出現。共產黨政治話語對共產黨女英雄的建構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但超出了本書的研究範圍。不過樹立這些典範的意涵與本書人生故事的產生背景息息相關，故在此審視幾個相關要點。

共產黨女英雄的建構主要是為了闡釋共產黨的輝煌歷史，其效應是既讚頌又抹殺了婦女的歷史功績。這裏的問題關鍵不在於婦女是否

被銘記，而是**哪些**婦女能夠被銘記。中共話語中被褒揚的女英雄首先必是個共產黨員。女英雄被建構的故事總是重複著這一主題：她們對黨、對革命事業無比忠誠，共產黨是把她們從受害者變為女英雄的救星，以此來讚美黨。黨的女英雄成為中國婦女的楷模，她們以認同共產黨並獻身於革命事業而使得人生有意義。

對婦女經歷這種排他性的建構有其積極的含義。在黨支持的文學作品中大量而頻繁出現的共產黨女英雄，可以被解讀成是黨對婦女在中國革命歷史中能動作用的承認。儘管在大部分共產黨女英雄的故事中，都有一個代表黨的男性人物給女英雄指明解放道路，或鼓勵女英雄的成長，但是具有非凡品質的英雄女主角都會讓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年輕女孩的心目中。對於包括我在內的1949年後出生的中國婦女而言，共產黨女英雄的文學形象提供了具有鼓舞力量的人生榜樣，增強了女青年的自尊自信。

共產黨對女英雄的描繪，並非是對中國歷史上常規書寫婦女的方式進行革命性顛覆，反而是與傳統中國的歷史編撰手法一脈相承。自古以來，歷史的編撰都要選擇和建構一些婦女楷模，以此教化其他婦女。中國歷史上打造婦女楷模是為了構建和維護性別規範，共產黨女英雄的建構也有助於界定性別角色，倡導國家認可的、婦女應遵從的優良品德。舊時皇權主張的許多婦女美德的確在共產黨的文學作品中都得到了確認和褒揚，但舊式的婦女楷模與共產黨女英雄之間有一個根本區別。古代婦女的非凡功績通常是以她履行對家庭的義務的形式來呈現，而黨的女英雄事跡則示範了她經常以犧牲家庭為代價，來為黨和國家作全部奉獻。這種具有國族主義思想的高度政治化共產黨女英雄形象，無疑是源自五四女權主義，它視婦女融入一切社會領域為中國現代化的前提條件。將婦女忠誠和奉獻美德的對象由家庭轉向國家和黨，黨的女英雄形象進一步鞏固了婦女融入男子世界的合法性。在一個有千年性別隔離社會文化制度的國度，這可是一個不小的功績。<sup>2</sup>

可以說，生產共產黨女英雄是對婦女的賦權，也有許多女共產黨員的參與。比如，烈士向警予，經由她在世女戰友的努力，於1950年代成為全國聞名的女英雄。全國婦聯主辦的《中國婦女》雜誌於1958年向警予30週年忌辰時刊發了一些紀念文章。同年，該雜誌出版了一本小冊子，重印了其中部分文章。在這本小冊子的八位作者中，有七位當年都是向警予的女戰友。<sup>3</sup> 這些資深女共產黨員對向警予的宣傳，可以被看作她們為彰顯婦女在革命中的能動性所做的話語運作——即，是爭取黨的承認和加強女共產黨員在黨內勢力的一種博弈形式。

當然宣揚共產黨女英雄經常包含著更為複雜的動機。除了對婦女貢獻的一般性褒揚，附著於特殊的女英雄身上自有別的意義。向警予不僅因其對革命的貢獻而被稱頌，還因為她是對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進行理論化的主要角色。與承認向警予的貢獻緊密相連的，不止是宣稱中國共產黨婦女解放路線是成功的觀念，也包括「其他的、錯誤的」婦女運動（即女權主義運動）是「失敗」的這一觀念。每一個被建構的女英雄都為黨傳遞出一個特殊的政治信息，綜合起來她們共同建構起非黨婦女活動家毫無蹤影的公眾記憶。如此，對共產黨女英雄的頌揚則同時抹去了非共產黨婦女在歷史中的能動作用。這種同時並存的頌揚和抹殺，有助於形成一種主導敘事以此創造並維護了共產黨統治地位的合法性。

本書中的敘述者出於各種原因，可以歸入被共產黨主導敘事所刪除的那類婦女。1949年前，陸禮華、朱素蓁、王伊蔚和陳詠聲都是非共產黨員，也都是獨立的職業婦女，這一群體既不是悲慘受害者的形象也不是共產黨女英雄的典型，也不屬資產階級太太這一類。更有意思的是，這些婦女在1949年之前取得的成就與共產黨的婦女解放路線完全沒有關係。在遇到她們之前，我對這些職業婦女的成就一無所知，也沒有意識到她們已經從公眾記憶中被抹除。儘管我在做訪談時尚不能完全把握住她們人生故事的意義，但我還是受到莫大震驚。有

許多個夜晚，當我做完訪談，騎著自行車穿越上海的大街小巷時，激動、憤怒和悲傷的情緒襲上心頭，五味雜陳。這些婦女生命長河中的功績和悲劇深深觸動了我，並徹底改變了我的認知，我長期以來秉持的關於1949年前的婦女以及共產黨作為解放者角色的許多觀念瞬間崩塌了。挑戰中國婦女解放主導敘事，隨即成為我一個清醒的寫作動機，而這個動機與我想將這些婦女重新寫入歷史的熱切願望密不可分。

對於這些敘述者來說，她們忍受了近半個世紀的邊緣化狀態。我1993年第一次拜訪她們時，她們在毛澤東時代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已經得到了政府的道歉，但這並沒有改變她們無權和無聲的處境。當她們看到我這樣一個對她們過去經歷感興趣的歷史學者時，她們知道這是她們以自己的記憶來呈現歷史的機會。儘管她們不知道我最終會怎樣呈現她們的口述歷史，但她們仍然願意傾訴自己的故事，希望以自己的敘述來重申她們的歷史貢獻以及重建公眾記憶。從這點來說，敘述者的目的和我的動機不謀而合。

我之所以選擇這幾位敘述者，也是因為她們有參與歷史撰寫的熱忱。這些有著自己目的的受訪者很願意詳細敘述自己過去的經歷。哪怕是一個普通的問題，都會引發這些老人滔滔不絕的講述，這絕非巧合。在我完成了第一輪13位婦女的訪談時，我觀察到一個清晰的模式。最豐富多彩的個人故事都是來自那些1949年前取得了許多成就的婦女，但她們在毛澤東時代被排擠到社會邊緣。顯然，呈現她們的歷史與她們的利益息息相關。甚至她們的女兒和姐妹都迫不及待地講述她們記憶中的故事。在這類受訪者中，我選擇了20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出生的婦女，並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呈現她們的敘述。<sup>4</sup>

## 重申中國「現代性」中的婦女能動性

由於婦女解放長期以來一直都是構成中國現代性話語的一個重要主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男女學者都傾向於將這一主題納入他們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敘事中，而西方學者在同類著作中對這一主題的描述



卻大相徑庭。創立已久的毛澤東時代主導敘事不厭其詳地重述著婦女解放歷程中共產黨獨一無二的領導作用。近年來，中國學術界開始出現試圖呈現婦女自身的解放奮鬥。雖然黨的婦女解放路線仍被稱為唯一正確的路線，但關於各類婦女為擺脫文化和社會束縛而進行不屈不撓鬥爭的生動故事，卻挑戰了這個主流迷思——即中國婦女自己尚沒覺醒，是**被**中國共產黨解放的。<sup>5</sup> 我的研究不僅要將婦女置於歷史變遷的中心，還要考察變化的社會性別話語與互相競爭的思想和社會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敘述者的口述史有助我們看清性別是如何成為中國現代性的中心主題、女權主義是如何融入到國族主義之中並迅速入侵文化和社會習俗，以及婦女在推動20世紀重要社會變化中起到了怎樣的決定性作用。20世紀初「職業婦女」這一群體的出現，集中體現了所有的這些主題。

19至20世紀之交，中國的主流文化規範將女子定位為母親、女兒和妻子的角色，女子的行為在一個男女授受不親的世界受到嚴格限制。儘管底層婦女為了生計需要在家戶內外從事經濟活動，上層家庭的女子可以足不出戶接受私塾教育並經常涉足文學創作，但是社會性別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原則，嚴格限制了男女之間的接觸，許多機構組織都是男子的專屬領域。<sup>6</sup> 正式的學校教育作為維繫帝制科舉制度的中心，就是這樣的男子獨佔領地。19世紀中期，一些西方教會學校向貧窮家庭的中國女孩提供教育機會，開始挑戰男子在正式教育中的壟斷地位。但是面向女孩的學校教育極為有限。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女子教育才成為晚清改良派議程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清廷將女子教育作為強國保種的必要手段，前提是女子教育不能顛覆男女有別的古訓。這個棘手的問題——允許女子進入國家政治生活卻又限制她們的角色和行為——最終由女子自己的選擇和努力得到解決。

雖然女子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具有愛國精神和賢良淑德的母親，使她們能養育具有強健體魄和聰慧天賦的兒子，但是隨著女子教

育的發展，女子開始對逐漸興起的男女平權的呼聲更感興趣。對於許多女子而言，教育是跨入男子世界的重要一步，是做女國民的資格，絕不僅僅是成為一個好國民的賢妻良母的途徑。女子把強國和平權兩條爭論路線合二為一：強國需要女子在所有領域擁有平等的參與權。最早朝這個目標邁進的是晚清第一批留學日本的女生。

1894至1895年日本在一場關鍵戰爭中戰勝了中國，控制了朝鮮。此後，日本成為中國屈辱的象徵和亞洲現代性的典範。日本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比歐美國家更接近中國，以及明治維新後的工業化現代化程度，對於那些想探索救亡圖存之道和希望學習新技能，以便在變革社會中立足的國人來說，日本成為一個很有吸引力的目的地。1910年代，成千來自上層家庭的中國男子前往日本，學習政治、軍事、經濟、醫學、科學、文學，等等。最初，只有少數中國女子伴隨她們的丈夫和父親來到日本；後來，越來越多的獨立女學生來到日本。日本人採取了特殊措施來接納中國女留學生。著名的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在1901年為中國女學生創辦了實踐女學校。下田歌子將女子教育作為「男子教育的基石」，積極推動。這與「共和國母親」論一致，也與提倡女子教育的中國改良派的觀點類似。下田歌子認為，受過教育的賢妻良母能讓亞洲國族在與「白種人」的競爭中變得強大。<sup>7</sup>這種女子教育模式對清政府很有吸引力，因為它堅持女子教育應該遵循傳統，「教以為女為婦為母之道也」。<sup>8</sup>出於為中國女校訓練教師的現實目的，清朝各省從1905年開始向日本派遣女學生。到1911年清朝滅亡時，大約有兩百名中國女學生曾在日本留學。<sup>9</sup>

與日本教育家和清政府的初衷大相逕庭，許多中國女學生成了社會活動家和革命者，而不是家庭的守護者。在日本，激動人心的政治思想氛圍比著重女紅和家政的課程更吸引中國女學生，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女權主義的西方著作在中國留學生群體中被翻譯和傳播。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留日中國學生是一個自我選擇的群體。他們留日學習的動機大多來自於中國戰敗後的國族危機感，及對

外國列強瓜分中國領土的憂慮，尤其是1901年清政府與西方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之後。這些學生對尋求救亡圖存之道的執著在一系列活動中表達出來，從通過翻譯和出版（主要是將西方著作的日文版翻譯成中文）來傳播新思想，到加入旨在反滿的秘密會社。儘管女學生為數不多，卻對這個生氣勃勃的場景貢獻顯著。在1903年到1911年之間，留日女學生組建了許多組織，並獨立或聯合男性創辦了至少九份雜誌，以宣揚女子的平等權利和女子教育，譴責中國的家庭制度和包辦婚姻，提倡反纏足。這些婦女雜誌辦刊時間都很短，短則一期長則兩年，但都是既受到中國新興女權運動的啟發，同時也對其有所貢獻。日本，尤其是這些雜誌發行之地的東京，沒有成為培養母性的搖籃，反而成為1911年辛亥革命前中國女權主義活動的一個重要基地。

早期女權主義者所構想的女子教育與日本所實行的女子教育差異甚大。1909年的《女報》對日本女子教育進行了強烈的批評，其社論宣稱「本報不居日本政府專制之下，而以扶植東亞女權為事」。文章批判道：「日本女子教育一以奴隸女子為主義，可嘆各日本女學雜誌亦不提倡女權……蓋日本與我同種同文，不忍使日本女子受男子之牢籠之壓制，爰加日文論說以喚醒之。」<sup>10</sup>主編陳以益在〈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一文中指出，日本針對男女設置的不同課程，反映了其根深蒂固「男尊女卑」的謬論。他引用中國歷史上如花木蘭、梁紅玉等巾幗故事，來闡明女子有能力靠自己取得功績，而日本的教育只是利用女子幫助男子獲取功名。陳以益對以「良母賢妻」為目標的女子教育的批判，後成為五四時期一個重要的主題：

且夫賢母云者，良妻云者，均對於男子而言。為他人母，為他人妻，美其名曰賢母、曰良妻。實則男子之高等奴隸耳。日本女子教育，因亦有高等下女教育之評。……嗚呼！女子教育豈為男子而設耶？……為聖賢，為庸人均教育所致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以賢母良妻之目的教育女子，則女子自成賢母良妻。此餘之

痛惜者也。……謹告女學界：其勿以賢母良妻為主義，當以女英雄、女豪傑為目的教育之本旨，不可不從日本之流毒不可不去。……與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教育，即與女子以男子同等之權利。<sup>11</sup>

留日女學生對20世紀早期中國的影響不限於她們的出版物。她們中大部分人回國後都成為風雲人物。比如，秋瑾因其在反滿革命中英雄就義，使其成為20世紀中國婦女的主要榜樣。秋瑾的事例說明，對於仍生活在性別藩籬社會中的那一代女子來說，與男人一起在國族革命之中並肩戰鬥，是極為重要的平等權利問題。與秋瑾同時代的人視她為不必女扮男裝便能進入男人世界的女人，其英雄事蹟遠超男人。筆名為「鑑湖女俠」的秋瑾自己也是被中國歷史長河中的許多巾幗英雄所鼓舞，她在同代人眼中也確實可與史上女俠比肩而立。這位20世紀的女俠在國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新話語中表達了對打破男女界限的渴望，由此奠定了她近代女英雄第一人的地位。古代女英雄總是零星出現，而秋瑾的出現標誌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在劇變的政治與思想浪潮中，女英雄在那個歷史關頭如群星般璀璨湧現。新興的國族主義為深鎖閨房的良家女子闖入男子空間提供了合法性——她們為這種越界闖入給予了一個新名詞：伸張女權。有意無意之中，婦女對平權的追求總是綁在國族主義事業上。在中國婦女解放的歷程中，這種國族奉獻與自我解放的糾纏是一個顯著特徵，而這一特徵深深根植於20世紀上半葉的國族危機之中。如本書敘述者們所闡明的，秋瑾故事的廣泛傳播有力塑造了下一代婦女所具有的國族主義和自我解放的雙重視野。

秋瑾在當時主流話語建構中作為堅定的反滿革命者形象，遮蔽了晚清婦女運動的女權主義目標，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清朝滅亡。民國政府剛建立，許多參加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婦女立刻開始了一場激進的婦女參政運動。一群留日歸來的學生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領導角色。其中，唐群英（秋瑾在實踐女學校的同學、同盟會早期會員）成為最著名的領袖。唐群英和其他許多女革命者在民國初年組建了各種爭

取婦女權利的婦女組織，但臨時國會卻拒絕將男女平等權利寫入臨時約法。唐群英當時是女子參政同盟會的主席，她感到非常失望，領導了一群婦女參政者於1912年3月向國會請願。當她們被拒絕進入國會時，這些憤怒的婦女參政者砸了會議室的玻璃，踢倒了試圖阻止她們的守衛，並威脅說她們將「訴諸武力，如果她們的要求被拒絕的話」。1912年8月，同盟會（許多成員都是婦女參政者）將男女平等從重組的國民黨政治綱領中刪去。唐群英和王昌國（女子參政同盟會副主席，也在日本留學過）對這種背叛極為憤慨，在兩個不同場合猛烈抨擊宋教仁這位起草新政治綱領的國民黨領導人，「激起了中國二萬萬女同胞之怒氣」。<sup>12</sup>雖然她們強悍的態度行為沒能幫她們在1912年贏得婦女參政權，但卻向公眾傳遞了一個明確信息，即婦女不僅應該履行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而且要擁有一個國民應該擁有的權利。受挫的婦女參政運動領袖唐群英和王昌國繼續在地方層面努力，並在1921年五四婦女運動全盛時期捲土重來。1921年，王昌國成為湖南省議會選舉出的兩位女議員中的一位。<sup>13</sup>

留日女學生回國後也成為中國最早的職業婦女。<sup>14</sup>有的從事出版，有的經商，大部分人要麼在家鄉開辦女校，要麼在女校任教，都在努力推動中國女子教育發展。本書的敘述者中，有的最初是從她們曾留學日本的老師那裏，第一次接觸到「男女平等」這個概念。不少留日女學生沒有成為賢妻良母，而是拒絕結婚、堅持獨身。新興的教師職業為這些受過教育的婦女提供了不同於傳統的選擇。本書中這些五四主角成年時，受教育的女子成為獨立的單身職業婦女已被普遍接受。她們的老師已經向她們示範了過上這種生活的可行性。晚清婦女活動家與五四女性之間的關聯是真實且具體的。

然而，五四婦女發現她們處在一個大為不同的歷史語境中。在第一次婦女參政運動被鎮壓後的沒幾年，婦女問題在中國以更大的聲勢重新出現在人們視野。在新湧現的新文化人士推動下，婦女解放問題到1920年代末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由於民國第一個十年女校的迅猛發展，<sup>15</sup>「女學生」成為一個重要的新興社群，並成

為五四時期容易接受新文化思想的讀者群。重要變化不僅表現在女學生的數量上，也體現在女子教育的根本目標上。主流的賢妻良母楷模受到秋瑾一代的挑戰，在五四時期又成為舊文化的一個靶子被痛批，被獨立自主、胸懷公眾的新女性徹底拋棄。按照五四女權主義者的觀點，追求婦女平等權利和平等參與到社會各領域，這本身就是現代性的標誌，也是國家富強獨立的關鍵。國家利益仍然是終極目標，但新文化國族主義不是號召婦女為了這個目標去犧牲自己，而是以婦女的自我實現作為強國的基礎。國族主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地與女權主義議題邏輯和諧地融為一體。

毫無疑問，五四時期是現代中國的分水嶺。五四女權主義所激發的新的覺悟，促使大量受過教育的婦女去追求一種不受世世代代性別規範所限制的、「人」的生活。受過教育的婦女自覺地勇敢地闖入所有禁區，在城市地區有力地突破性別藩籬。日益增多的婦女進入社會、經濟、政治和公共生活領域，在中國城市化和專業化進程中處處留下她們的足跡。隨著五四新女性的崛起，中國城市社會的圖景發生了急遽變化。甚至日益增長的中國城市消費文化也把目標瞄向新興的新女性群體。歷史學家羅蘇文在關於中國近代婦女的研究中觀察到：

1919年下半年，女性形象在廣告中明顯增多，……在1921至1925年，美女形象已在報紙廣告中被競相使用了，女性被視為文明的象徵、時髦消費的先導。……所謂的摩登女郎並不是徒具奢華包裝、以色取人的美女，還必須是受過教育、身體強健、懂得享用都市文明的一切最新成果，包括在娛樂、消遣等方面與男子共享樂趣的現代女性。於是都市女性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国成為摩登的化身。<sup>16</sup>

對五四女權主義主題的商品化，也從一個側面證實了新女性興起所導致的深刻社會變革。自從1920年代婦女被允許接受高等教育以來，婦女的職業選擇範圍擴大了。<sup>17</sup>這使得職業婦女群體成了1930年代城市中的社會精英群體。一股新女性文學、新女性電影、新女性時

尚和新女性廣告的潮流讓這個群體的社會影響進一步擴大。1930年代的中國城市人意識到新女性的出現是一場劇烈的社會變化，是中國現代性的最佳指標。

我無意將本書中五四新女性的敘述用作再現「現代性」的媒介。<sup>18</sup>相反，我的目的是讓讀者去傾聽和理解那些屬於新女性自己的、一直以來被湮沒的聲音。通過新女性的敘述，我想去探究在五四女權主義和國族主義思潮中她們新覺悟的形成過程，去記錄她們基於新的主體位置所採取的行動。我試圖去理解女權主義和國族主義、主導話語和婦女能動性之間的關係。我反思著她們漫長生命中的悲喜，並以此鑒古知今。於我而言，聆聽和理解五四新女性的聲音，不僅是更好地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關鍵途徑，也是理解我自己歷史的一個深刻過程。她們促使我在自己成長的社會中辨識出五四女權主義和新女性留下的遺產，這些遺產毫無疑問塑造了今天的我。我相信，不同的讀者會在她們的敘述中發現各種意義，而不僅僅是本書所表達的。

## 重訪女權運動

自從晚清以來，女權就被納入文化激進者和革命派所倡導的人權之中。五四時期，女權主義作為來自西方的眾多「主義」之一，被新文化人士進一步倡導。新文化人士不僅把女權主義看作是攻擊傳統儒家文化的有效武器，而且也將其視為現代文明的關鍵所在。當五四女性接受了女權主義議題，女權主義就從詞語和概念轉變為實踐，並在改變個體婦女生活的同時，也改變了社會體制的結構。當男女平等的原則被崛起的兩黨（1920年的共產黨和1924年的國民黨）所擁抱時，女權主義話語的力量得到了進一步的表達和強化。矛盾的是，儘管女權主義帶來的社會變化得到了政治主流的支持，並被稱頌為社會進步的證明，但日後「女權主義」卻成了一個貶義詞。這種情況為什麼會發生？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它又是怎樣影響了中國女權運動？這些問題促使我們對這一歷史進程做進一步的深入審視，在這個過程中，女

權主義在改造世界和不斷創新的同時，也被挪用、歪曲、定義和重新界定。

歷史學家卡倫·奧芬在其關於歐洲女權主義的研究中，觀察到這樣一種模式：為了贏得支持者，社會主義政黨採取了這樣一種策略，即把女權主義稱為「資產階級的」，且詆毀女權主義的努力是「狹隘的」，同時又挪用女權主義議題，並將其納入自己的綱領中。<sup>19</sup> 這一模式同樣適用於中國女權主義的歷史，甚至連貶義詞也被複製：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用上了「狹隘的女權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女權主義」的詞組，唯一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加了「西方的」這一形容詞。五四時期尚不成熟的中國女權運動先是成為剛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的競爭對手，隨後又被1924年到1927年間的國民革命中的國共合作所收編。當國民革命吸引了許多女權主義者加入革命陣營後，黨對中國女權運動的掌控開始形成。共產黨內的女權主義者用「婦女解放運動」這個詞來和「女權運動」劃清界限，以顯示其不同之處，宣稱前者正確地把激進革命視為婦女解放的前提，後者則錯誤地追求婦女的政治和法律權利，無視現存經濟政治制度的罪惡。中國共產黨對女權主義負面定義的宣傳力度，隨著20世紀上半葉中共變化不定的政治力量而起伏。中共在大陸確立統治地位之前，其對女權主義的定義還無法壟斷公眾對女權主義的理解。本書中的敘述者在描述1949年前與女權相關的活動時，以不同的態度使用了不同的詞語，如「女權主義」和「婦女主義」，間或加上「狹隘的」這個形容詞。使用這些詞語不僅反映了這些婦女不同的政治傾向，也揭示了各種競爭話語之間複雜的搏弈。

本書的五位人物可以說是代表了20世紀上半葉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受教育的城市婦女的多種立場。陸禮華、王伊蔚和陳詠聲是政治傾向各不相同的無黨派人士；朱素萼是國民黨員；黃定慧是共產黨員。為了追求自我解放，這些婦女在不同的環境下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選擇。讀者會注意到，儘管這些婦女的政治觀點不同，但她們都致力於改善婦女的處境。她們的敘述清楚地表明，雖然女權主義議題有時被重新



貼上「婦女解放運動」的標籤，但卻是不同政治背景的婦女所追求的目標。無黨派的女權運動和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之間的界限有時是模糊的，尤其是在共產黨尋求政治聯盟的時候。從一定意義上說，這些敘述突顯了我的觀點，即女權主義追求在中國並不受政治邊界所限，這恰好證明了五四女權主義話語在中國的影響力。

這些豐富多彩、內容各異的敘述也促使我們去探究女權主義群體與中國其他政治勢力之間的關係。我的研究聚焦於所謂「狹隘的女權主義運動」（非黨派的、獨立的女權主義運動），這場運動在民國時期巧妙地開闢了自己的社會空間。哪些婦女構成了這場運動？她們是如何理解她們所從事活動的意義的？是什麼支撐著她們的努力？又是什麼限制了她們的影響力？女權主義運動在毛澤東時代被邊緣化和排斥時，無黨派的女權主義者的命運如何？本書中的敘述對這些問題都有所回應。接下來我將以劉王立明的簡要傳記來闡釋這些問題，作為民國時期女權主義的領袖人物之一，她的奮鬥經歷與本書講述者的女權主義努力相互交織在一起。她的人生展示了無黨派女權主義者經歷的複雜歷史過程，她們在逆境中艱難奮鬥以堅持獨立的女權主義議程。這個小傳是基於我對她女兒的訪談以及其他書面文獻所作，它也折射了本書其他女主角人生戲劇的歷史場景。

## 劉王立明的故事

劉王立明1897年出生於安徽省太湖縣。她的原名叫王立明，劉是她丈夫的姓。她父親是一位中醫，在她九歲時就去世了。她們一家只好依靠母親的針黹活度日。1907年，縣裏創辦了一所由中國人管理的美國教會學校，最初只招收上不起舊式私塾的貧窮男孩。王立明和其他幾個女孩向校長求情，校長最後同意她們入讀。當時教育改變了許多婦女的人生，受教育的機會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王立明的人生。

王立明聰明好學，很快成了一名優秀學生。每年的考試中，她都名列第一。學校教育對她來說不僅僅意味著學習書本知識，她也很快

地接受了當時傳播的新思想。12歲時，她不顧母親的反對和他人的嘲笑，成為當時縣裏第一個放足的女孩。王立明畢業後，校長把她送到了九江的儒勵書院，這是安徽、江西、湖北三省交界中唯一的一所女中。在那裏，她依然表現出色，畢業後就留校成了一名中學教師。

1915年王立明還是中學生時，就加入了基督教婦女節制會中國分會。這個分會於1904年在鎮江成立，隨後擴展到上海、南京、九江、漢口。1916年，她得到了節制會的獎學金，前往美國伊利諾伊的西北大學學習生物學。幾年後，她在芝加哥大學遇到了在九江就認識的劉湛恩。劉湛恩也是幼年喪父，同樣是個基督徒。和王立明一樣，劉湛恩也是優等生，得到了芝加哥大學的研究生獎學金。他們相愛了，並於1920年王立明大學畢業時結婚。與20世紀初千千萬萬的中國留學生一樣，這對年輕夫婦將在美國受教育視為實現強國目標的一個途徑。劉王立明畢業後立即回國，她丈夫也在1922年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sup>20</sup>

雖然許多回國的留學生都在中國城市開始了職業生涯，劉王立明卻選擇成為一名社會活動家。她很快就在1920年代初上海生機勃勃的社會環境中嶄露頭角。在她所著的《中國婦女運動》一書的自序中，她說道：「當民國九年初夏，我自美國回抵上海，一方面因為友人們的鼓勵，一方面因為我本人幼小時的志願及在異邦讀書時所見的種切，尤其是那女權的申張，我毫不躊躇地加入了中國婦女的各種運動，從此我的一部分生活與這些運動發生了極密切的關係，而我的大部分思想也就被它們佔有了。」<sup>21</sup>

1922年中國參政權運動進入第二波高潮，劉王立明成為上海女子參政協進會創辦者之一，並擔任了該會的主席。她也是1924年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的領導之一，倡導婦女平等的權利以及婦女的國民大會參與權。1927年北伐軍到達上海後，國民黨政府任命劉王立明為婦女運動委員會的委員。1930年代，劉王立明仍然是上海女子參政協進會的主要領導人。該會在1930年國民政府通過了承認婦女平等權利的新民法後，更名為中華女子參政會。

劉王立明的名字與中華婦女節制會的關聯最為緊密。1926年，她出任中華婦女節制會的會長，並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到1950年代中期。到了1930年代初，中華婦女節制會在15個省成立了分會，會員達到一萬人。其總部在上海，建立了幾個服務婦女的設施：上海租界收容所，是中國當時唯一的婦女救濟機構，向乞丐、婢女、被遺棄的婦女提供福利；婦女職業學校，為婦女提供新職業的培訓；上海女子公寓，為單身職業婦女提供住所，本書敘述者之一王伊蔚就曾住在那裏；還有由王伊蔚擔任主編的《女聲》。圍繞這份雜誌，她們成立女聲協會，由一些女學者和經常給《女聲》投稿的作者組成。作為一個無黨派的婦女組織，中華節制會的影響和成就僅次於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劉王立明得到美國婦女節制會的財政支持，她丈夫的收入也足以支持家庭，因此她是中國為數不多的全職投身於婦女運動的活動家。她從未從事過生物學的工作。

1933年，劉王立明出版了《中國婦女運動》，她在書中寫到，她「總悲哀地感覺到中國婦女運動過於幼稚，缺乏完整的計劃、領袖的人才和健全的組織」。<sup>22</sup> 她認為必須要增強婦女運動的知識以消除這些弊病。因此，這本書不僅總結了她關於中國女權運動發展的觀點，更為正在進行的女權運動指引了方向。這本書聲稱，新文化女權主義者的目標就是中國婦女運動的目標，強調了婦女的參政權、經濟獨立、教育機會、婚姻自由和新的性道德（消除雙重標準和鼓勵基於戀愛的婚姻）。由於中國婦女剛獲得了法律上的平等權利，《中國婦女運動》把重點放到如何有效地使用這些法律權利。在書的第一章，劉王立明就給出了五四女權主義者對婦女運動的鮮明定義：「婦女運動就是婦女革命的意思，中國婦女運動就是中國婦女起來革命。我們革命的範圍異常寬闊，我們希望從各方面的努力，把舊日原有的、不堪人道的種種生活推翻，重造一個新的生命。」<sup>23</sup>

如何實現婦女革命的目標？劉王立明提出的途徑反映了社會主義對五四女權主義的影響。她提出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可以消

滅階級對立和不公。她相信這種制度能為婦女提供平等的職業機會，這樣，婦女就能經濟獨立並擁有獨立人格。但是，她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目標的一種途徑。她譴責共產黨的殘忍和獨裁。她主張通過議會制度而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在這所有的目標中，婦女的參政權尤其重要。劉王立明認為，神聖的母性賦予了婦女憐憫和仁慈之心，她們參政會比男人取得更大的成就。<sup>24</sup> 她希望婦女用自己的投票權來產生一個更人性和公正的制度。

劉王立明也清楚地意識到中共對女權主義運動的批評。她在書中寫到：

這班批評家又說，婦女運動的失敗，是因為只有少數的知識階級的婦女，在那裏運動，而不是普遍的運動。這話一部分是對的，但是，從事婦女運動的女子，又何嘗不希望全國所有的婦女，團結起來，共同地去努力呢？解除大多數婦女的痛苦是婦女運動者已公認的目標，然而一個運動，如果要有永久的價值，一定要由近及遠，由少數人的意識而變成大家的意識，少數人的信仰而成為大眾的信仰。雖然現在還在幼稚的時代，我們切實地相信，經過較長的時間，這運動將發生偉大的效力。<sup>25</sup>

本著如此強烈的信念，劉王立明在1930年代初努力推動十年前就已開始的女權運動。在她看來，婦女運動受阻是因為國內的混亂和外國的入侵，而不是因為其只是得到了少數女知識分子活動家的支持。她準備好要經歷一段長時間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少數精英婦女的思想意識變成大部分婦女的思想意識，稚嫩의、弱小的女權運動將會發展成為成熟的、強大的女權運動。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她創辦了一份新的婦女雜誌《女聲》，以此來獨立地表達婦女的聲音。

當日軍在1931年佔領滿洲時，劉王立明仍然極力推動女權運動。在劉王立明看來，中國的國族危機感應增強而非削弱對追求婦女解放的需求。她認為，如果婦女的處境得不到改善，中國仍然是一個半身不遂的弱國。她堅持說：「我們的運動就是要婦女本身得到了解放，

一掃以前摧殘女子的奇恥大辱，再從事促進中華民族，及世界人類，進入一個燦爛的新紀元！」<sup>26</sup> 婦女解放仍然是她的首要目標，她既不被強烈的國族主義所動搖，也不被共產黨的婦女解放路線所影響。

儘管共產黨把優先實現婦女解放貶低為「狹隘的女權主義」，但劉王立明既沒有把婦女解放作為唯一目標，也沒有對國族利益棄之不顧。相反，諸如劉王立明這樣的「狹隘女權主義者」堅持認為，即使深處國族危機之中，婦女的權利和婦女的痛苦也不應被遺忘。她們對國家命運的持續關注，集中體現在她們為了救國而進行的捐款和服務。1931年9月日本佔領了滿洲後，劉王立明擔任了上海婦女救國大同盟的主席，號召婦女抵制日貨，支持中國軍隊。<sup>27</sup> 1937年9月，當上海婦女慰勞會號召婦女為抗戰捐款時，劉王立明捐了她的金手鐲和鑽石戒指。<sup>28</sup> 中華婦女節制會還通過為婦女提供庇護來參與救國運動。即使如此，劉王立明被王伊蔚、朱素蓁這兩位敘述者記住的是，劉王立明是一個全心投入婦女運動的領袖，與國共兩黨共同推動的救國運動沒有關聯。可見當救國運動成為1930年代初國共兩黨的競爭場域時，劉王立明盡量不捲入其中。她在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懷時，保持了獨立的女權主義立場。

劉王立明對共產黨的消極看法在抗戰時發生了變化。她的丈夫劉湛恩，滬江大學的校長，是著名的愛國知識分子。在1937年日軍進攻華北，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成為上海各界救亡協會主席。南京的日偽政府拉攏他，讓他當教育部長，他拒絕了。上海被日軍佔領後，他仍然在上海從事抗日活動。1938年4月7日，劉湛恩被日本收買的中國特務殺害。劉王立明帶著三個孩子去了戰時陪都重慶，在那裏更積極地投身於抗日活動。她是國民黨抗戰期間舉行的國民參政會中少數幾位女參政員之一。由於她敢公開批評國民黨的腐敗，也因為她是一位名人（尤其是劉湛恩死後），所以她在重慶時，共產黨和她進行了接觸。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及其夫人鄧穎超都和劉王立明很熟悉。她把大兒子送到了共產黨根據地延安的軍事學院，表示了她對共產黨抗

日立場的支持。同時，她又把二兒子送到國民黨的軍事學院。這個階段，她最為關切的是抵抗日本侵略者，這是生命和生活都受到日本侵略威脅的千百萬中國人的共同願望。

除了在重慶高調的政治活動之外，劉王立明還繼續領導著婦女活動。她成立了湛恩難童教養院，在戰爭期間撫養了數百名孤兒；她開辦了全日制的保育院，幫助職業婦女照顧孩子；她也是華西女子職業學校的校長。同時，她還繼續擔任著參與抗戰活動的中華婦女節制會的會長。她和其他婦女活動家一起成立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動員國統區的婦女參加抗戰。國家的危亡和她丈夫被暗殺似乎促使她更傾向於共產黨動員婦女參與抗戰的路線。

1937年，共產黨和國民黨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兩黨都號召婦女參與抗戰。在一致抗日的目標下，城市地區的婦女活動激增。統一戰線允許共產黨員在國統區的抗日動員中發揮積極作用，共產黨的政治影響力迅速擴大。由統一戰線所推動的婦女運動，此時被界定為婦女平等參與抗日的運動。雖然戰時的婦女運動要求婦女為戰爭貢獻力量，而不是強調性別議題，但許多婦女活動家通過拓展公共活動增強了影響力。職業婦女在城市婦女動員中發揮了核心作用。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黨派路線的界限模糊了。華東淪陷後，許多婦女活動家逃離淪陷區，在西北的共產黨根據地扎根下來。持續的戰爭讓五四女權主義議題被擱置一旁，卻使許多婦女參與到政治和軍事活動中來。

在整個戰爭期間，劉王立明始終秉持堅定的無黨派立場。當第二次國共合作破裂後，國共之間開始內戰，她把兩個兒子召回家，因為他們會被送上戰場同胞相殘。與二戰結束時許多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她夢想著建立一個民主聯合政府。由於堅信婦女政治參與的重要性，她在1944年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民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戰後，劉王立明於1945年返回上海，在華東重新恢復中華婦女節制會的活動。她和王伊蔚一起重辦《女聲》雜誌。但她在民盟內發揮

著更為顯著的作用，花了很多精力來反對即將開始的內戰。1947年，國民黨政府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並勒令其解散。劉王立明從上海逃到香港，在這裏她參加了民盟中央委員會代表大會，民盟一直在國民黨禁令下繼續活動。劉王立明被選舉為民盟經濟委員會主任。民盟在宣佈公開反對國民黨後，同意與共產黨開展合作。

1949年初，北平解放，毛澤東邀請包括民盟在內的主要民主黨派組織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會議。劉王立明作為民盟的代表前往北京，並成為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正式代表。1949年3月，全國婦聯成立，中華婦女節制會成為其團體會員。劉王立明被選為婦聯執行委員會常委，顯然中共認可劉王立明作為一位著名女權主義領袖的影響力。在中共執政初期，統一戰線政策運行有效，贏得了中國進步力量的支持。通過給民主黨派組織領導人授予官銜的做法，共產黨樹立了擁有廣泛民主基礎的形象。

1949年後，劉王立明在全國婦聯、全國政協和政務院政法委員會等機構任職。這些職位是榮譽性的，沒有實權。儘管如此，在中共執政初期，她仍然能在中華婦女節制會中繼續自己的工作。1956年，她率領一個四人代表團前往西德參加世界婦女節制會第十屆會議，她被選為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由於她捍衛了新中國的成就，並在取消台灣代表團參會資格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周恩來公開表揚了她的愛國行為。但是，這次表揚卻成為劉王立明輝煌人生的終結。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後，因為她拒絕揭發毛澤東的兩個政敵，劉王立明被劃為右派分子，隨之失去了所有的職位和榮譽。中華婦女節制會也喪失了獨立地位。在中共的高壓統治下，全國婦聯（最初是獲取不同婦女組織支持的統戰聯合機構）開始致力於把婦女活動引導到配合黨的路線上。從1957年開始，如中華婦女節制會這樣的團體會員就不再擁有獨立的章程。<sup>29</sup> 從一定意義上說，劉王立明的失勢標誌著中共正式關閉了婦女獨立自發社會活動的空間。

1966年9月1日，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劉王立明被指控為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間諜而被逮捕。在她女兒家裏找到的罪證，是一個裏面裝滿她手稿的小箱子，還有她寫給被劃為右派而被關進勞教所的兒子的詩歌，另有一台被認為是發報機的打字機。劉王立明被帶走時，她小聲說了一句英語，那是她女兒在她被打成右派時也曾聽到過的話：「我背負著耶穌的十字架」（“I am carrying the cross of Jesus Christ”）。話畢，她就被帶走了。她家人再也沒有見到她。

1970年4月15日，劉王立明在上海的監獄裏去世。一直到生命的盡頭，她始終堅持自己是無辜的。文化大革命後，她的兒女把她的案子上交給中央政府，1980年她被平反。1981年，全國政協、民盟和全國婦聯共同為劉王立明舉行了追悼會。<sup>30</sup> 在追悼會上，劉王立明被官方讚譽為愛國者，這是中共話語中能授予非中共黨員的唯一桂冠。為了與她被打成右派之前的頭銜相匹配，她被安葬到為高幹準備的北京八寶山公墓。因為劉王立明的所有財產被抄走，甚至連骨灰都沒有交給家人，她女兒放入墓中的只有她留下的一把梳子。

作為一位慎始敬終的女權主義領袖，劉王立明在日本侵華前取得了婦女解故事業的諸多成就。即使在顛沛流離的抗戰期間，她依然竭盡全力去解除婦女在戰爭中的苦難。但在毛澤東時代，這位女權主義活動的明星隕落了——這一模式在後面的敘述中還會重演。共產黨領導的全國婦聯的成立，實現了許多早期共產黨女權主義者統一婦女運動的梦想，標誌著中共成功地將婦女運動體制化。當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在隨後歲月裏越演越烈，婦女自發活動的社會空間很快就在毛澤東時代消失了。中國的女權運動並不是因為其「錯誤」的路線或者西方淵源而「失敗」，卻是因為中共霸權性的社會改造，使得劉王立明和許多其他女權主義活動家、以及她們的女權主義運動在毛澤東時代迅速凋零了。



## 注釋

- 1 受壓迫婦女這一典型也是五四的一個遺產。關於五四男性文學文本中對受壓迫婦女的再現，參見Yue, “Gender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47–65。
- 2 「性別隔離」一詞並不是指「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隔離」，而是更像種族隔離，通過嚴格限制男女交際來維持社會秩序。在社會、經濟和宗教活動中，男女分別被劃分至不同的區域。男性區域經常是那些由正規權力控制的地方。比如，儘管精英婦女早就在私塾中接受了教育，但是與帝制的文官制度相聯繫的官方教育機構卻仍是只限男子出入的場域。
- 3 參見中國婦女雜誌社，《烈士向警予》（中國婦女雜誌社，1958）。
- 4 儘管我強調這些敘述者積極參與了歷史書寫，但也必須提醒讀者，我在呈現這些敘述時，也難免帶有某種視角偏見。在毛澤東時代，1949年之前的職業婦女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的確從公眾記憶中被抹去，但是並非所有職業婦女個體都經歷了本書敘述者在1949年之後經歷過的被排斥、被邊緣化、被迫害的經歷。1988年出版的《中國婦女名人錄》列出了102位非共產黨員職業婦女，她們都出生於1910年代，並在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書中提到了她們在1949年前取得的成就，其中76位婦女在1949年後仍然保留了職位和頭銜。《中國婦女名人錄》在談到本書敘述者之一陸禮華時，卻錯誤地說她在1949年後仍然擔任校長一職，因此這本書敘述的準確性存在疑問。然而，從該書提及的一些出版物日期來看，顯然確實有一些婦女在1949年後仍能繼續從事其職業，尤其是在醫學和科學領域中的職業婦女。參見薛維維，《中國婦女名人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5 最近一部以婦女為中心的歷史研究著作是羅蘇文的《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6 中國家庭有多種模式，從一對夫妻的核心家庭到幾對夫妻組成幾代同堂的家庭。婦女的勞動因應家庭規模和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漢字「家」被用來指涉整個家族。在本文討論的這一時期，中國大部分地方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家庭都是指父系的、從夫居的家族。
- 7 見Joan Judge (季家珍), “Knowledge for the Nation or of the Nation: Meiji Japan and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Female Literacy in the Late Qing,” (知識是為了國家還是源於國家：明治日本與晚清女性文學中的變化內涵)(paper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Qing Dynast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4 October 1997), 7。
- 8 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頁131。

- 9 關於留日中國女學生群體的大量研究中存在一些矛盾之處。例如，謝長法列舉了1902年到1908年間的180位女學生的名字，但季家珍在其沒有發表的文章中，舉出了一個更高的數字。見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及其活動與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期（1996），頁63–86。
- 10 〈不可不讀本報〉，《女報》，第1卷，第2期（1909）。
- 11 陳以益，〈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女報》，第1卷，第2期（1909），頁5–7。粗體為原文有之。陳以益是秋瑾的好友，兩人曾計劃合作辦報，但報紙尚未創刊，秋瑾已經遇害。陳為不負秋瑾遺願，堅持辦女報。另一男女攜手辦報佳話為何震與丈夫劉師培在日本辦《天義報》，宣傳女界革命。參見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 12 見王家儉，〈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577–608；另見羅柳之，〈女權運動領袖唐群英〉，《婦女》（瀋陽），第3期（1983），頁25。
- 13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26。
- 14 清末的其他職業婦女或是接受了中國的西方教會學校的教育，或是接受了美國的教育。
- 15 把四年制的初等小學和三年制的高等小學的學生加在一起，1905年共有1,761名女學生，1908年共有20,557名女學生，1919年共有215,626名女學生。參見羅蘇文，《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頁137、156。
- 16 同上注，頁434、436。
- 17 到1922年，大學裏已經有669名女學生，這還不包括教會大學裏的女學生和國外留學的女學生。同上注，頁352。
- 18 雖然我的研究重點是婦女而不是國家，但我研究的女性和男性都被20世紀中國的國族主義主流話語所建構，同時他們也都參與構建了這一主導話語。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曾批評國族主義者的歷史佔據著主導地位，這種歷史不但因循啟蒙思想所持的線性的、進化的歷史觀，還沿襲殖民地模式：

我們汲取的第一個教訓是，我們面對的中國歷史是由啟蒙主義思想的模式來敘述的，而不單是由亞洲歷史學者所塑造的，也不單是通過我們閱讀的材料所塑造的。從20世紀初開始，我們所研究的許多歷史人物自身就在努力把歷史塑造成線性的普世模式，這樣自然而然將中國歷史納入世界歷史的進步之中。

這種國族主義者的歷史模式取得了主導地位，這一點顯見於本書的訪談之中。通過考察這一歷史的社會性別維度，我試圖理解國族主義話語是如何及為何會在20世紀一直居於主導地位，以及它是怎樣形成並不斷被重塑

的。見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國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史研究)(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26。

- 19 卡倫·奧芬著，朱曉慧、柯倩婷譯，《歐洲婦女解放史》。
- 20 在英語世界，劉湛恩以「Herman Chan-En Liu」的名字而為人所熟知，王立明則是「Mrs. Herman C. E. Liu」。王立明的英文名字是「Frances Wong」。1938年劉遇刺身亡後，她在自己的姓前加了夫姓，表達對亡夫的哀悼和紀念。
- 21 劉王立明，《中國婦女運動》(商務印書館，1933)，頁1。
- 22 同上注，頁4。
- 23 同上注，頁2。強調為作者後加。
- 24 同上注，頁172-173。
- 25 同上注，頁2-3。
- 26 同上注，頁19。
- 27 上海市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頁143。
- 28 同上注，頁143、181。
- 29 關於全國婦聯的詳細研究，參見Naihua Zhang (仇乃華)，“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Chinese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1949–1993” (全國婦聯：中國婦女與婦女運動，1949–1993)(Ph.D. dis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6)。仇乃華強調全國婦聯對婦女組織的控制始於1957年。劉王立明作為最大的婦女組織之一的一位獨立女權主義領袖，她的經歷正好契合了仇乃華對婦聯歷史的分期。但本書後面的敘述證實，地方上的一些女權主義者在1949年後不久就被剝奪了活動的空間。關於1949年後婦聯在體制內的運作，見Wa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 30 參見〈劉王立明追悼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1981年3月19日。

# 4

陸禮華  
(1900-1997)

校長

“

除了學堂，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我的工作一天到晚都沉浸在這個裏面，為女權、為體育。女權是我終身的事業。

”



陸禮華，1936、1995

初次踏進陸禮華的公寓做訪談時，她正被一群老太太圍著，熱烈地高談闊論。陸禮華還沒來得及介紹我，那群老太太就異口同聲地解釋說，她們是陸校長以前的學生，現在已七八十歲了，都是退休的體育教師。已經93歲的陸禮華在她鍾愛的學生中間顯得非常高興。可能是體育鍛煉的緣故，她的學生都很苗條；相比而言，陸禮華有些發福，舉止也不太靈活。然而，她依然思維敏捷，聲音洪亮，這也可能是因為她有些耳背。當學生離開後，她緩緩地打開了回憶的閘門。<sup>1</sup>

## ■ 自述

我出生在上海青浦縣。<sup>2</sup>爸爸是讀書的，但是我的祖上下來都是商人，在我們這個地方，全鎮上只有我們這家店最發達了。叫麼叫(雖然是叫)南貨店，<sup>3</sup>實際上各式各樣的東西全有的。這家店是歷史上延下來的，一直是很好的。直到我父親要讀書，他要考武舉，要想報國，他想商業是沒意思的。我也跟著爸爸覺得商業沒意思，你讀書，我也要讀書。但他武舉沒考上。武舉從前清講起來就是要做將領的，要射箭囉騎馬囉。他有點小心臟病的，他到這個時候有點害怕了，射箭不準，所以沒考取。然後就回到屋裏維持這個南貨店。他自己在全鎮上就是一個文人，他讀書的。我們那個小鎮交關(很)簡陋閉塞，一般男小囡(小男孩)都不讀書的。那麼我是不服貼的，我要讀書。

我父母一共生了四個，剩了我姊妹兩個，我阿姐和我。我是老二。老二在當時是最倒霉了。國家在推翻滿清，興民國，兩個新舊時代正在鬥爭，社會最惡劣最極端的時後。生一個老二小姑娘出來了，那麼這家人家是倒霉。那麼我父親呢，一直不開心，說：「頭一個是個小姑娘，第二個又是個小姑娘，我做人沒面子的。」因此呢，就冷淡我母親了。

我母親不識字，繞(纏)小腳的。我六歲時，她也幫我繞小腳，我包小腳眼淚流掉交交關(好多好多)。她日裏繞，我夜裏剪。我最肯

服從大人，他們歡喜是歡喜我的，就是覺得叫她繞小腳怎麼就不肯？包小腳是很痛的，我也不喜歡小腳，包了小腳，人家一看就會看出是個女的。我只想和男的一樣。大人說：「你不曉得將來你要吃苦頭的，大腳人家不要你的，你嫁不著好的人家的。」我說：「你讓我害我好了。這苦頭我吃不了。」腳上紮出來的血，我給母親看：「姆媽，你看呀，我吃得消嗎？」她說：「沒辦法的呀，你一定要吃苦的呀。」還在幫我纏。她白天纏，我外婆家就在過頂橋那裏，我夜裏到外婆家用剪刀剪掉。母親說：「假如我給你小腳纏不成，我哪能做娘呢？」她三次包，我三次剪掉。母親說：「你剪，我總歸纏！」我心想：「你纏，我總歸剪！」然後我說：「姆媽，我樣樣聽你的，就是這椿事情我不能聽你的。」她鬥爭不過我：「讓你去，讓你去大腳，將來你自己大腳難看，不要怪我。」我說：「姆媽我不怪你，我大腳不怪你的，我就這樣好走路了。」最後我勝利了。不過這樣纏來繞去，我的腳的樣子不是頂好的，有點被包小了一點。這樣小腳就成為歷史了。我的家鄉族裏有差不多歲數的小囡有四五個姊妹，鎮上也有十幾個，都學我了，包小腳就不肯，「陸家二小姐不纏，我們也不纏。」都剪掉了。後來她們都謝謝我了，「都是阿姐好呀，讓我們不纏小腳。」

我母親覺得生兩個女小囡也好的，沒啥錯，但我父親看不起她。父親心灰意冷，樣樣事情不肯做，還抽鴉片，家道中落。我母親想單靠店也不行了，靠我父親也靠不住了。她就帶著我父親兩個還沒出嫁的妹妹種田、種豆、種棉花，養一家九個人。我到五六歲已懂事了，覺得母親太苦了，我就安慰她。我對她說：「姆媽，你放心。我長大後要像男的一樣。男人能做的事，我一定也去做。」我母親特別喜歡我，但也只好喜歡在心裏。要是露在臉上的話，人家會說：「為啥要寶貝一個女小囡啊？活到一百歲還是人家的人。」

我小時候就聽見木蘭從軍啊，這種古代的婦女作戰英雄。我從書裏看到她們的故事。我六歲就讀書了，我讀書是女扮男裝。爸爸本來不許我讀書，中間有個小故事。姆媽生病，說我想吃點稀飯。我孝我

娘孝得不得了，夜裏聽到，明天一清早我就到河邊去淘米。人小，只有六歲呀。又是天不亮，黑漆漆的，跑到鄉下河灘上，河灘上有一隻船停在那兒，我把那隻船一推，人就跟著去了，咍當跌到水裏了。現在心裏想起來，當時是神救了我了。我人是下去了，兩隻腳就勾在兩根木樁上。人還沒有下去，在划水，吃力死了，水吃飽了。快要死的時候，上頭有家人剛好來打水，水桶放下去好像有個東西在裏面，拉上來一看有個人，是個很小的姑娘。就哇啦哇啦喊，淹死人了！鎮上的人都聽見了。拉起來大家都說死了，死了，不行了，臉已經青了，嘴唇皮也黑了。有個人說了句好話：「死馬當活馬醫吧！胸口還有點熱的，你們救救她。」就把小人臥在裝50斤米的一個圓的筐上。小人嘔出來很多水，裏面心臟沒有死，所以「哇」地哭出來了。一哭出來以後，旁邊的人都罵我：「小姑娘白相（玩）也不是這樣白相的，到河灘上去了！天又不亮，要去做啥啊？要弄水也不是這樣弄的。自己不好，死了算了，活該！」我說：「我不是，我是因為姆媽要吃粥，我去淘米的。」救活後變成兩種輿論。一種是說：「這種小姑娘死掉拉倒了。」那個時候小姑娘都是扔掉的，垃圾堆裏拾拾都是。我是第二個，我母親又是身體不好，我父親又不喜歡我，所以沒人看得起我。有的人說：「難怪這個小姑娘還活過來，她孝心蠻好的，孝娘。所以應該死的沒有死。」我父親從這個地方心轉過來了：這個小姑娘還算是不錯的。我為啥不喜歡她呢？他說：「她倒是蠻乖的，對娘好。」就這樣調轉了。所以我父親讓我六歲女扮男裝去讀書，讀私塾，讀四書五經。

我曾祖父90歲，是我們鎮上德高望重的公正老人，大家樣樣事情都要問他的。他看見我爸爸一直不開心，走進走出唉聲嘆氣，說：「沒面子了，晦氣，晦氣，沒男小囡了。」曾祖父看得出他的心思，有天晚上把子孫叫到屋裏，叫我父親的名字：「俊仁啊。」我父親是大孫子。「俊仁，你啥事情老是唉聲嘆氣啊？是因為你只養了女小囡沒養男小囡是嗎？我今晚要和你講一講，不可以這樣想。男女是一樣的。」

比方來講，我伢（們）一家九個人，六個是女的，三個是男的。假如我家只剩三個男的，那還像一個家嗎？一個家要男的也要女的，一個國家也是如此。沒男的不成國，沒女的不成家。你這事情是錯了。」我父親想想就認錯了，說：「我心裏想想沒有子孫，沒有男小囡，覺得真沒面子。」曾祖父問：「那你現在想通了嗎？」父親說：「我們的老二倒是蠻好的，小姑娘蠻乖的，那我就當她男小囡來培養。」之後父親就讓我讀書了，讓我穿了長袍子囉小馬褂囉，去讀書去了。我是鎮上女的頭一個讀書的。

老師是我的親戚。因為我用功書讀得好，背書比其他小囡都快，老師很喜歡我。但有一些男小囡取笑我，說我「女扮男裝」，我都不理。我同族的人也有諷刺的。我家沒有男小囡，將來家財要歸他們經營的，他們總會說：「女小囡有啥用場啊，終歸是別人家的」、「女扮男裝，算啥腔調！」父親聽到這些話會氣的。但我歸我。我書讀得好，有父親寶貝我，別的都不要緊。

我讀四書五經，看得懂書了，各式各樣的書都去看看，都懂了。之後革命的新潮流來了，秋瑾囉，這些是從書上曉得的，報紙也看。我父親思想蠻先進的，他最早訂了一份上海《申報》，在全鎮上只有這張報，我早上起來也搶來看。讀了三年私塾，八九歲就能看《申報》。起先看啥呢，看點圖畫，孫中山先生啊、黃興啊、誰誰啊，還有女革命家誰誰誰。我就去把這些畫像剪下來貼在牆壁上。這就是我的敬仰。孫中山先生說，將來女子好讀書，好做教師，男女一樣平等。我很佩服他，說長大後也要參加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我思想的轉變就是這個時候。

讀到九歲，不好讀了。我自己覺得像他們男小囡一樣，女扮男裝不大好了，所以換女裝了。後來三年在父親的南貨店裏學生意。我預備著將來萬一讀書讀不成，待在家裏，繼承我父親的行業。我坐賬台、算賬、學了珠算，看銀元。小姑娘坐在賬台上，不到十歲，穿男裝。在私塾學堂也女扮男裝。鄉下風氣不好，到九歲十歲，女小囡大



了想想不方便，不高興，在店裏也不高興，一天到晚跟銅板和角子<sup>4</sup>打交道，到晚上手弄得齷齪得很。我父親也不願意做這種管錢的事情。所以晚上數錢、打算盤、弄什麼全是我和祖父兩個人。我媽媽在我後面養過一男一女。第三個又是個女的，很小就死了。第四個倒是個男的，但小產了。之後家裏男孩沒了。我父親一門心思要把店交給我。換了女裝之後我腦子一想：「我做什麼呢？」我不喜歡商業，人家說無商不奸，我不要做商人，我父親不要做，我也不要做。我要出去讀書。家鄉只有小學，是私塾。辛亥革命後，離家幾里路的白鶴鄉辦起了率英女校。我聽說後就想去讀書，但讀書去要三里路。大人也不放心，當時才12歲，他們說你太小了。但我說要去白鶴鄉去讀書。

我進入率英女校時，學生全是比我小的。老師說一年級、二年級的書你看看好嗎？兩年級的書我全看得懂。私塾讀了三年，有底子了。馬上一進去就三年級了。三年級讀了一年多一點，四年級就畢業了。很快，又升到縣立在明女校讀，一考就考取了，當時叫高小，又跳級，讀了一年多，又畢業了。畢業之後，我考蘇州二女師。那時我對做教師特別喜歡。因為我在小學裏面讀書時，一個幼稚園老師生病，常常不舒服。她不舒服，我就自告奮勇，說，我去替你代課好嗎？這個老師很喜歡我。她說：「禮華，你快點替我去代課吧。我今天又頭暈得很。」我和小朋友有緣分，小朋友和我好得不得了，我教他們心裏歡喜得很，想我將來就做幼兒園老師。我考取了，但後來沒去。我的一個體育老師看中我了，她說：「禮華，你去讀體育好嘛？」我說：「讀體育好的。」她說：「我給你介紹到我的母校去。」這樣我考取了上海的中國女子體操學校。

我越大一點，家境一天天衰落下去，我17歲到上海讀書，出不起學費了，商店後來關掉了。我的學費呢，靠我母親積攢的。從前老式，〔女人〕要藏點小股銅鈔<sup>5</sup>的。我媽媽給我一兩百塊，我自己小時候也會賺錢的，養雞、養羊，積下來的銅鈔也有一百多塊洋鈔<sup>6</sup>，我外公也給我湊一點。我也不去管它了，自己行李弄弄好，到上海去。

我姆媽說：「你出去我不放心，你沒出去過。」我說：「那姆媽你送我去。」「姆媽上海也沒去過。」後來爸爸和姆媽送我到上海。

那時候學體育的人很少，一期只有三十多個學生。我說這個學校怎麼這麼小，這麼簡單。老師說這裏畢業的同學出去都教師範的，都挺好的，你用心讀好了，我教出來的學生還去教省立學堂的。我想我假如讀出來能去教省立學校，那我就是一步登天啦。讀書以後，很快學校裏面樣樣事情都會輪到我。因為肯吃苦，校長有啥事情，外面出去也叫我代表代表。自己鍛鍊鍛鍊，人就老練一點了。我就和王校長說：「王校長，你少請一個人，你派我一個職務。」他說：「那我派你去教育處，做個教育助理。」所以學校裏的行政工作我也在幫忙弄。一樣會做，就樣樣會做了。王校長很喜歡我。

唉，但入學不久，我姆媽生病死了。我一生頂頂苦（最苦）的時候是娘死。我幾乎書也不讀了，因為我灰心了。我因為到上海來，母親苦死了。我父親不喜歡她。一家的事情她一個人管，家庭經濟衰落了，她一個人辛苦勞碌、種地，養一家九個人，這個苦得不得了。那麼我特別要為母親爭口氣。母親沒了，對我打擊太大了。我家裏辦好喪事，穿身白衣裳，到學堂裏去，對校長說：「王老師啊，我不讀書了。」「哟，你做啥啊？」我說：「我姆媽沒了。」他說：「姆媽沒了，你不要灰心啊，你更加要讀書啊。」我說：「經費沒了，我讀不起書了。我來拿行李的。」這校長好，他開導我了：「不讀書總歸是不對的。你麼，對母親孝道的，母親是對你寄希望的。現在母親沒了不怪你心裏難過。書讀不起，慢慢來，不要緊的。我免掉你學費，你交一點吃飯銅鈔。」哎哟，我想怎麼有這麼好的人啊！同情我得不得了。他這麼一說，我總是聽他的話。他說：「你學堂裏事情協助一點。你畢業之後就在學堂裏教書，叫你留校。」我心裏想想，人能這樣幸福的啊！畢業的時候，他說：「你不要出去了，你就留在母校吧。」這讓我快活死了！我想出去做的話，我到哪裏去啊，都陌生的呀。留母校麼，還有繼續學習的機會。



畢業的一年，剛好是五四運動，於是我如魚得水了。我參加了所有學生會的組織，外面出去遊行、演講，蘇州囉、無錫囉、杭州囉、上海的學校都去宣傳，到處去演講去。人家說我一隻嘴巴呱呱啦啦，「小姑娘膽子大啊。你怎麼膽那麼大啊？」我說：「愛國呀，中國現在被日本人欺負呀。要打倒帝國主義！」這些口號都要大聲疾呼。有一次，報上登載了，說大遊行的時候打死幾個學生，裏面有一個是陸禮華。家裏急死了，派人出來了，硬是要來看我。我當時頭上是被警察打了一棍，但沒有打到要害的地方，頭是暈的，但沒暈倒在地上。那次衝突警察用軍棍打了，其實槍是沒有用，打傷是有的，沒有發現打死的。這麼一來，陸禮華這個名字出名了。出名之後，我認識的人也多了。在學生會的時候，黃炎培、南通的張謇、上海的馬相伯、蔡元培，這些老先生都到學生會來演講。幾個老先生都是很有名的。先生來演講，我麼去招待，接啊送啊。孫中山先生也從廣東到上海來，接見了上海學生會的代表。我沒有被接見，那時還小啊。市學生會從前叫「環球學生會」，我麼也算總會裏面的一個代表，人雖小，鑽來鑽去，全去參加。女的也蠻多的。那個時候實際上是蔡元培先生領導的。這個學生會是全國性的組織，也是北京來的代表來之後，上海再跟上去的。後來廣東囉、廣西囉，各省全部都響應了。所以五四運動這一次，在現在歷史上看來呢，是革命運動，是當時那個時候的一個轉折點，是群眾性的，尤其是青年，是蠻大的運動。我現在數來數去學生會裏的人全沒了。

老先生們演講主要講三件事：一個是中國人民要組織起來，要發揚愛國精神，打倒封建主義，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要打倒軍閥。這個時候第一個就是要發揮創新，新文化和新思潮，大辦教育，大辦企業，大辦體育。那麼這就引到我的工作來了。馬相伯老先生那個時候已經80歲了，他變賣家財創立了震旦大學。震旦大學被法國人接管後，又創立了復旦大學，意思是恢復震旦大學。他的演講是出名的。

他是大聲疾呼的，說：「革命很艱難，我們絕不能滿足於五分鐘的熱情。中國要國富民強，需要辦三件大事，第一教育，第二實業；第三體育，體育使中國民強，民強才能富國。」蔡元培先生說中國人民全是文盲，95%是文盲，現在應該要大辦教育，教育中間有體育。哎哟我想：「張謇老先生來辦實業，<sup>7</sup>使國家富；蔡元培先生領導全國的教育，我全辦不到。我能做什麼呢？我是學體育的。那我說我來辦體育。」我當初讀體育的時候，只想做一個體育教師，聽了馬相伯先生的演說後，才把體育和國富民強聯繫起來了。那我體育怎麼辦呢？那個時候心裏頭盤來盤去，自己在盤，嘴裏國富民強，民強國富，應該先民強而後是國富。民強要怎麼強法子呢？你一個小小的教師，怎麼會民強起來呢？我心裏想，從發展方面來講，應該培養師資，女子體育師資，一個師資可以帶一個學校，假如我一年培養一百個學生畢業，一百所學堂就有體育老師了。那個時候，體育老師都請不著。我的學生出來，一轟而請光。所以23歲時，<sup>8</sup>1922年我就辦女子體育師範學校了。

在籌備女子體校期間，我去看望了我最欽佩的馬相伯老先生。他住在土山灣（今徐家匯）的一個孤兒院裏，他財產賣光，銀元捐光，自己一個人住在孤兒院裏，80多歲了，頭髮雪白。我跟他講，他的演講啟發了我想辦一所學校。還有一個原因，我是個從小體弱多病的女小囡，自從進了率英女校，上了體育課，參加體育活動，我的身體變好了，所以我體會到體育真的能夠健身的。另外，在馬相伯先生那裏，我遇到了于右任先生，<sup>9</sup>他是馬相伯先生的學生，是個書法家，在社會上蠻有名望，在國民黨裏也蠻有地位。我想：「老先生的學生都做這麼大的事業，老先生晚年快樂。我將來也辦學，那麼我老了也有許多學生。」我喜歡模仿好的事情。馬相伯問我：「禮華，你真的要辦學堂啊？」我說：「是呀。但我是小囡，想請你做學校董事會的主席。你願意嗎？」當時按規定，開辦學校之前必須要有學校董事會。因為我年紀小，人家不相信我，所以想邀請馬相伯和一些有名望的人做學校的董事。

馬相伯同意當學校的董事會主席，還把我介紹給王振庭和顧維鈞，這兩人都擔任過外交部部長。馬先生說：「禮華啊，校董事會要有真正幫你忙的人。這些外交官都受過弱國外交的痛苦，看到中國無體育很羞愧，有想法，在中國要辦體育。你辦體育他們一定肯幫你的。」我一請他們都答應了。我還邀請了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我是在一次全國教育會議上認識他的。還有幾個校董也都是有名望的。這樣我的校董事會很強，立案就蠻順利的。按規則校董會要出錢的，但我沒有讓他們負擔經費，因為我擔心要他們花錢，他們就不肯答應了。像馬相伯先生他自己也沒錢了。1922年，在畢業三年後，我創辦了自己的學校，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學校。



學校開學第一個學期，只有18個學生，維持不了，學堂經費不行。但是不久，各省來投考了，廣東來投考，四川來、湖南來、東北來了。在兩三年時間裏，學校每年招收一百多個學生，所以到我們兩江學校來教書蠻困難的，又有四川人，又有湖南人，又有什麼地方的人，你講上海話她們都聽不懂，你講國語，她們有些也聽不懂。我要去學了，我要和學生接近，我要去學四川話，學湖南話，學湖北話，學廣東話，所以我隨便什麼都搭得上兩句的。我辦學校本來只想在江蘇和浙江，所以叫兩江，我想只要江蘇、浙江的學堂的體育教師全是我學堂出來的，我已經蠻快活了。我怎麼會想到全國各地來考的？為什麼人家都要來考體育學堂呢？實在也是許多學生和我一樣感覺：總是想女子總要堅強，不堅強不行。然後在投考的中間，我把這個問題放在裏面：「你們為什麼要來考體育師範？」她們說：「我們想要國家強盛，人民健康。」我說：「你們的志願都是好的。」還有小腳來投考的（笑）。小腳投考不好錄取的，不錄取有些學生就和我吵了，說：「你辦學校為什麼小腳不能讀？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爺娘給我們纏了腳，怎麼現在體育也不可以啊？」我說：「別的都沒什麼，體育是要示範的，你出去教體育，你的小腳動作到底兩樣的，做不好動作的。」

曾經錄取了一個小腳的學生，她的腳是放出來的，不是頂小。結果她成才了。後來她在哈爾濱女子中學教書，一次在日本舉行的遠東運動會，中國女子代表隊，她帶隊的。她現在88歲了。

至於辦學資金啊，這件事情我現在想起來也是有點神奇的。我畢業出來以後是母校裏面留任的，留任有住宿。我在五個學堂兼課，20塊洋鈔一個學堂，五個學堂教下來有100塊。那時候100塊是非常大了。<sup>10</sup> 那個時候也有艱苦的心，三分錢的電車也不坐。住宿、吃飯全都是母校供給，我不用什麼錢的，只是給家裏寄一點錢。所有外面的工資拿回來，全部積起來了。我積起來蠻快的，在兩年半就積了三千塊。我有三千塊了，我想我的學校好辦得起來了。那個時候五六百塊買點教具都可以了，還有房租。沒料到你這個日常的開支要花錢的。起先只有18個學生。18個學生收進來只有多少錢啊？沒多少。一兩年的開銷，全都沒了。那怎麼辦？然後用自己的面子、自己的信用到外面去借，東借西借，東借西借。那個時候我在上海有點名氣，同時那些學校對我很好，每個學校都去借點。朋友那也去借。這樣借算維持了一個學期。到第二個學期一招生，36個，加倍了，經費有錢了，好一點了，但還是困難的很。到第三年、第四年學生收到一百多了，自己好獨立了，然後學校經濟收支好相抵了。由於窮，我過得很艱苦。有一次窮到年三十晚上，實在沒辦法，工人要工資了，沒辦法，我身上一條嗶嘰裙子脫下來，送到當舖去當掉，付工錢，人家要過年呀。這個工人是個車夫，車夫看著同情了，說：「校長啊，你不要啊，你不要啊，我沒有用不要緊啊。」我說：「你家裏一家大小要吃飯的。你沒銅鈔怎麼辦呢。」這是講窮極了的時候，米店裏來跟我討債了，邦唧邦唧，鍋子給我掀掉了，電燈來給我剪掉了。你們剪你們的好了，等我不是鈔票付不出的時候，你們還是要給我來接回。那怎麼樣呢？我責任擺在身上，你不能夠沒有堅毅的心，做不成事情的。我是這樣想，我是堅定到底的，隨便怎麼樣，你打也打不倒我。

即使經濟的逼迫沒有了，那個時候是社會的壓力太大了。「怎麼讓你一個學校一下子辦得這麼發達呢？發展這得麼快呢？」社會的風氣，當時是嫉妒。尤其是一個女子，辦一個學堂。「你什麼地方來的錢呢？」全是疑問。都以為我什麼地方有經濟後台的。其實一個也沒有。校董都是有地位的人，教師也都是有地位的人，但是經濟上都沒有背後幫助我，經濟全是我自己一個人。自己心裏想：一個女子，如果我要去乞求人家，我覺得叫人家捐點什麼的，我不肯開口的，我不響（不吭聲）的。因為什麼？我不願意。為什麼一個女子什麼都沒有要去乞求人家呢？我借可以。借，我是要還的。後來有了信用了，學堂一年一年開展，辦了十多年以上呢，人家相信我了。有許多人學堂開了一年、半年關掉了，頂多三四年關掉了。我不關掉，我一直維持下去。那這也是一點信用，銀行也肯借了。我借到最多三萬塊，借是信貸，這個信貸不是容易的。那時我要造房子。造房子麼，買地皮。先把地皮作抵押，再造房子。因為教育部規定，你辦體專要自己造房子。人家一聽都嚇死了，學校都關掉了。我呢，屏（堅持）下去了。我說我是抱了終身志向，我怎麼可以關掉呢？關掉，我面子就沒了。我要堅持下去。

房子造到三層樓造不起了，鈔票又沒了，又去借，借不到了，一點都借不到。造四層樓造不成，停工停了一年。怎麼造不成了呢？「你校舍為什麼不造在租界上？」我說我愛國。為什麼人家都要靠租界？我最恨租界，我要造在中國地界，我爭這口氣。「那你吃苦頭了。你中國地界，你的房子造十萬塊，去借一萬塊都借不到的。」因為什麼？沒保障的。租界上，你有一萬塊就可以抵押一萬塊的。啊呀！我想愛國也吃苦頭的，愛國愛成這樣！有氣呀！我氣中國人呀！氣得來，我說怎麼一點也沒志氣啊？為啥就看中國人看不起啊？但我總歸是要愛國的，不管怎麼樣無論如何，學堂我要造在中國〔地界〕。於是在南市體育場隔壁，現在一幢四層樓的高房子。那個時候造價三萬，後來加一層變四萬。當時的四萬塊不是容易的，可以做點事情

了。所有的學堂全部都關光了，只有兩江存在。所有別的學堂都沒造房子，我校舍就造起來了。那麼人家對我的看法呢，總算，你是專心一致地辦學，也是信用，有堅毅的精神。所以協助的人、銀行都對我說：「陸校長，有啥事情你吩咐啊，你吩咐。」這樣說了。

我在南市大吉路造起一幢四層教學大樓及三層、兩層校舍各一幢。我以為校舍建成，專科可在教育部立案了。不料在校舍即將落成之際，市教育局放出風聲，要將我新造校舍接收去，做市教育局辦公用房。我很氣憤，預感到將來在此辦校不會太平。所以在1931年又在江灣翔殷路籌劃建校，先租樓房兩幢，買住房12幢及農田一片，建了風雨操場、宿舍和教室，同時還建造了籃球、排球、田徑運動場地。好不容易初具規模，日本侵略者發動一二八戰爭，苦心經營的校舍毀於戰火。<sup>11</sup>戰後我在這片廢墟上再次恢復建設，自己動手設計圖樣，買舊磚瓦，修復40間房屋作教室，添造宿舍，置備12架鋼琴，作為體操、舞蹈的音樂伴奏。還增闢了槓、墊等運動器材齊全的健身房、划船運動所需的人工河以及游泳池等配套設施。從1932到1937年，我大量精力還是花在學校的基本建設上。隨著學校建設的不斷完善和聲譽的提高，報名來校的學生擴展到各省，旅居日本和南洋的愛國僑胞，也有送女兒回祖國，到我兩江接受教育的。這五六年是兩江的全盛時期，我們學校以「遠東最好的體校」而聞名。



我在中國女子體操學校學習時，我們穿的運動服是燈籠褲，燈籠褲有個寬緊帶，寬緊帶上面燈籠褲攢下去，到腳，腿不露出來的，長統襪子。然後衣服有領頭，大襟，身上穿根帶子，中袖。這是照女青年會辦的女子體育師範學校穿的服裝。我的母校也穿這個，因為那時候女青年會有幾個教師在我的母校裏面教書。穿運動衫、短褲是從我開始，和外國人比賽了，我們和西青（西人青年會）比賽了，全是外國人，你穿條長褲進去怎麼可以比賽呢？總要和她們相同的。她們外國人又不管的。西青會外國女運動員全穿短褲。她們穿什麼衣服，我



們就做什麼衣服，定做呀。我們做得更漂亮，白方頭襯衫，大紅的短褲。人家看不慣，穿這個翻領衫、運動衫，說我們「坦胸」，短袖子的衣服叫「露臂」，穿條運動褲，短褲、赤腳、露腿，叫「露大腿」。被人家罵透了，報紙上罵。社會輿論反對呀：「誰家中國女子，什麼領子翻開胸部袒在外面？短袖穿著胳膊露出來？」過去全是長袖子。我們籃球隊到北京去，幾個體育界的領袖全是外國留學生，看到我們學生的籃球褲子，他們說，「女學生穿那樣的短褲子，大紅短褲子，我們從來沒看見過。」連幾個留學生都好像心裏面不太自然。實在是他們的眼光已經落後了。

我呢，一心要學習先進。我喜歡外國有的我也要有。外國好的，我們應該學，我是這樣的心。你們外國有跳舞，在舞台上表演，我的學生也組織在舞台上表演。總歸表演，籃球表演、排球表演，什麼都表演。然後造游泳池。然後人家說：「昨天去看個什麼舞蹈表演，明天她自己學校出來表演了。她一看就出來表演了。」後來，輿論也都看慣了。我說：「這都不怪你們的。你們掌握這個輿論權，報紙的編輯什麼的，你們批評啊、罵啊什麼的。我不怪你們的。你們那時候的眼光只有這點。你們看得太少。」我的意思是你們的眼光太小了，我看得遠一點。我說：「我覺得中國應該要有一種志氣，外國人有的，我們也應該有，他們比我先進，我想要學習。這樣將來我好去國際上比賽。」

兩江組織的中國第一支女子籃球隊，成立於1925年，先是在上海舉行的萬國籃球錦標賽中露頭角，隨後又到北平、天津、武漢、香港等地比賽，每場都取勝。1931年4月，我率領兩江女子籃球隊到日本去比賽，這是中國第一個女子籃球隊出國，國際上的友誼比賽，當時東南亞人家蠻重視的。日本人當時其實侵華形勢也蠻嚴峻的，我們中國對日本人沒好感了。同時他們的體育突飛猛進，在奧運會裏面有個女的運動員得冠軍的。<sup>12</sup>我們中國在奧運會裏只有個劉長春去，<sup>13</sup>中國這個國家是根本沒有體育的。這個時候我要和日本比賽，社會上的人看法不一樣的：「你毫無準備，國際上毫無地位，你啥地方來的銅

鈿？你怎麼能到日本去？現在日本已經參加奧運會了，我們中國一個人都沒有過的成績。你怎麼能去和他們比賽？」「兩江的膽子這麼大啊，日本人你現在和他們去比啊！你明明是去送死！你去輸了回來，你坍台（丟臉）吧？」他們這種市黨部，平常沒有用處的，他們來阻擋你蠻行的，「你怎麼好去啊？你去是坍台，國家的台被你坍光了。」我說，不一定的。但人家又說：「你試試看。你不要將來不能見人投進東海！」我那時候很氣。中國人怎麼這麼沒志氣？難道我們中國人就這麼沒用？我自己也有準備的：我的隊伍自己日日夜夜帶著訓練，一年一年，兩三年下來，上海所有的比賽我們都參加，最大是參加上海西人青年會的比賽，全是運動員，人麼又高又大，年紀也蠻大的，二十七八歲。我們都是年紀輕的學生，人是矮小的，怎麼去和她們比呢？被她們一撞就撞倒了。我不相信，我總歸要去參加。開頭西青會不許我參加。後來我們爭取了，爭取參加了呢，得了四年錦標。我們全國各地都去比，都是勝利的，我覺得有一點把握可以到日本去。不敢同人家商量，也不敢公開向別人籌經費。放在肚子裏，今天積點鈔票，明天積點鈔票，為了這個籃球隊出國。做了一張預算表，一個人要幾鈿，十幾個人要幾鈿。假如他們不招待我們的人，不和我們比賽，我也不靠你們。我們來遊歷一趟，考察一趟。總之一句話，不借人家一個銅鈿。

吃苦嗎？吃苦的。坐四等艙輪船。到了那邊，一個運動員一天加一隻雞蛋。借人家的房子，伙食包在日本人的家庭裏。我總歸是自己獨立，不求人家，打算靠人家是不行的。你們罵我也好，咒我也好，你們望我死在東海裏也好，將來一敗塗地回來囉，看她怎麼有面子囉，讓你們去講好了，我總歸做我的事情。所以，我叫他們報紙不登，讓我走掉了你們報紙再登。上了船，開出去了，到日本去了，再發表：「兩江籃球隊出征東京」。登了報紙後，噢，教育部來說我們沒有經過批准噢，上海教育局也說：「她也沒有經過我們教育局的批准。」都來說。但是我老老早早日本都已經到了（笑）！

剛到日本，日本人就想要和我們比賽，而且希望贏得所有比賽。他們竭力給我們製造麻煩——用他們自己的球，為了消耗我們的體力就把賽程排得很緊。但是，在日本的十場比賽中，我們贏了六場，一場平局，還有一場他們作弊才贏的。中國的許多外交官，比如領事館總領事起先不敢來看，人家請他們來看打球，嚇死了，不敢來看。萬一我們輸得一塌糊塗，沒面子回去。結果連贏三次之後，就來要票子了。那我要搭架子了，我說：「票子沒有。」總領事館來要的，後來拿票子去了。他們也出來請客，說：「你們第一次來，也是為國爭光。」最後，日本運動員和我們的運動員結成姊妹，好得不得了，送來送去，送東西，回去的時候大家流淚了。在日本大概十天。後來朝鮮聽見我們和日本打得這麼好，也來聘請。又去朝鮮，一共算下來二十幾天。在朝鮮我們是全贏了。

那些勝利來得不容易。日本人提出用球要用他們的，插旗子要插日本旗，國歌唱日本國歌。我說日本國歌我們唱不來，要麼我們唱我們中國國歌，你們唱你們日本歌。你們有日本旗，我們插中國旗。我總歸要你平等的，你要講得出理由。用球，他們日本算是用自己的國球。我們不爭氣，我們沒國球，皮球自己沒有出產，用這個 Spalding，美國的。他們說不可以，你們用外國的球，我們用自己製造的球。我說不管你外國的球也好，中國球也好，總歸半場用你們的球，半場用我們的球。就是一個比賽（日程）沒辦法改，人吃不消，今天比明天比。

隊員講起來又是可憐得很。應該是十二個，是六個上場，六個預備員。我們有幾個人？我們只有十個。臨時兩個沒去，一個生病了，一個懷孕了，只有十個。平均年齡二十一二歲。人麼，只有一個高的，其餘都很矮的。人家日本人一看，人好小，「這叫運動員？」不曉得這幾個學生球藝成熟了，她們鑽來鑽去鑽來鑽去，從她們咯吱窩下面鑽。一打，勝利了，人家也不好批評什麼了。然後你越打越輸，打得沒辦法了，然後她心裏佩服了，只能說：「噢，她們是好的！」、

「你們震驚三島。」甚至日本皇家也出來觀球，也出來送禮，還請吃飯。我們把關東錦標隊打掉，關西錦標隊打掉，從大阪、神戶、奈良、京都、東京。後來到朝鮮一趟就回來了。從朝鮮到丹東回來了。後來有一件事情讓我蠻喜歡的。日本一些大學生旅行團從日本到北京〔旅遊〕，他們從丹東回國，一聽到我們在這輛車上，我們朝這邊，他們朝那邊（反方向列車），我們車子剛剛停下來，他們下來馬上把他們的學生旅行團排隊整隊，要和我們大家一起，想見面，然後介紹，說這個是中國女子籃球隊，和日本比賽震驚三島。這趟出訪日本比賽，球隊不僅表現了高超的球藝，而且為國家、民族尊嚴做出了努力，贏得了應有的尊敬。1935年我又帶領兩江女籃出訪南洋多國，獲得全勝。兩江女子籃球隊最後被認為是中國實力最強的女子籃球隊。我不是要爭這個，是為了提倡女子體育運動，是為了友誼。我們出國呢，終歸要爭個國家的榮譽，總算爭到了。現在那些學生都八九十歲了，總歸談起這件事情：「校長，我們跟著你到日本去，雖然當時是很辛苦，但是到現在也不能忘記那段日子。」對我也是，現在想到也是一陣高興。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日本侵略軍在淞滬地區，一路沿江灣向西用砲火轟擊侵佔前進。<sup>14</sup> 我們學堂正處在戰線前沿，首當其衝。硝煙中，兩江多年的建設、各種教學設施，以及兩房間的學校史料、獎品被毀。隨後殘存的校址成了侵略者的兵營，好端端的游泳池當成馬糞坑。兩江被迫停課。此後我懷著國仇家恨，全力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組織了上海市各界婦女運動促進會，並被推選為主席。這一段是我真的一條命撲在上面。有一千多名學生青年跟著我婦女運動促進會，這個婦女運動促進會一組織，人家就全來報名了。其中大部分是學生，還有家庭婦女有很多，全要來參加。她們願意幫忙在家裏燒了菜，送到婦女會來，匯總之後送到醫院裏去，那時傷兵很苦啊，肚腸都在外面。我是一直忙得不得了，慰勞、救濟婦女、捐款。我們為救國工作

捐到八萬多塊。我們在成都路延安路口的高房子，租了兩間寫字間做辦事室，來組織所有的活動。作為促進會的主席，我是何香凝搞的上海婦女慰勞會裏的理事，有七個理事。<sup>15</sup>

1937年我從上海到香港，38年到了重慶，是從越南經過桂林、貴陽，再到重慶的。沿途看到許多流亡的學生，都是十七八歲的小姑娘，全是離開家鄉出去參加抗戰的，參加各種抗日團體。去的時候是浩浩蕩蕩汽車送去，但到了戰地，經費沒了，抗日團體只好解散。這種精神，看看是看得我心裏很痛。這些小囡怎麼辦？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無家可歸。她們知道我是兩江的校長，向我求救。我怎麼辦呢？我也在逃難。我說我到重慶去請政府辦理救濟事業，來收容流亡青年。那時候有個賑濟委員會，是屬於行政院的，我需要通過行政院長申請，總要給我一筆籌備經費。他們建議我辦兩江分校，學生不收費，慈善機構就肯給一部分經費。你辦兩百個學生，可以免費的。在重慶的一個學生捐了地皮兩百畝，給我一塊地皮。然後各方面的人都來幫忙辦這個學校。那麼我心裏想：「哎呀，這麼順利。校建也有了，幫忙的人也有了，經費也有了。」於是馬上成立辦事處，在都郵街上。我4月26日把學校在南岸辦起來了。辦起來招生，招二、三百人過來，七百多個人投考。結果好了，這個學校啊，學生像潮水一樣湧過來。人家對學生說：「你們去哭，校長總歸收的。」她們都說：「家也沒有了，大人也沒有了，流浪在社會上。」事實也是事實。然後我想：至少現在收了，以後沒經費再說。總歸好弄的，又沒經費的話，我去向他們（政府）要。這個抗戰的時候，好說點的。他們也知道我幾十年辦學堂，我也不會做什麼的：「噢，校長你來麼我們總歸要幫忙的。你怎麼在這裏又辦學校了？」然後我把全部的精神都撲到學校裏。我這個人一直住在這個籌備學校。離開重慶八天功夫，第一次轟炸是5月4日，一大群飛機向重慶隨便轟炸。像雨滴一樣炸彈淋下來。我看著覺得不得了，這個重慶市一定不好了。大火燒了三天。到第三天我跑過去看看，噢，樹啊什麼的全部焦掉了。人的屍體，

一隻腳，一隻手，一個頭。然後我就想了：「我怎麼不在裏面，我應該死的啊。」後來學生說：「校長呀，你救了我們。」我淚流滿面地說：「不是我救了你們，是你們救了我。我不辦學校就在那裏。」按我現在的信仰來說，這是上帝的恩惠。

我在香港的時候，我聽見人家講陝北公學（共產黨在延安辦的一所學校）辦得好，學生都是獨立的，可以自給，辦得都是自食其力的。我聽見這種，我最喜歡了。我想這麼辦我也會辦的。那個時候鄧大姐（鄧穎超）曉得我在籌備，我向她要陝北公學的組織法，他們學校怎麼組織的，裏面有什麼功課，什麼內容。鄧穎超把這份材料捲好了，送給我的，在重慶籌備處。她和我說了一句：「禮華姐啊，你是好心，可是你要吃虧的。」鄧大姐的意思是，你辦這樣一個學堂也是好的。她也曉得我不會去走共產黨的道路，你能夠辦這件事也是好的，但是你要吃虧的。她也明白的，你這麼辦，他（國民黨）要給你名目的。

在那塊捐贈的土地上，我辦起了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重慶分校，校址設在重慶南岸海棠溪盧家壩的山坡上，因陋就簡建起教室、宿舍、飯廳。原計劃收納流亡女青年三百名，後來在無家可歸的流亡青年懇切要求下，增加到五百名，編為初中、體師和體專三個部，提供的食宿均不收費。我照陝北公學做，學生穿草鞋，頭上戴草帽，身上穿工裝，草綠色的工裝，搨鋤頭、務農務工、有農工課。要養活她們這些人，你自己不生產，怎麼養活她們呢？於是在學生捐的地皮上我們種豆子、種麥子、種什麼，讓學生吃飽。你進來了就是自家小囡了，要養大她們。於是方法是要改變了，要務農，然後裏面辦小工廠，什麼縫紉廠、什麼廠。然後這個時候國民黨來了，一看，你是個共產黨學校。他說：「你辦的是什麼學校？」我說：「勞動學校。因為抗戰時候，特殊時期。你要像從前那樣，穿長衫辦這個學校呢是不可能的。現在第一經費沒有，我要自己生產出來。」他說：「你現在純粹就是共產黨的外圍組織呀，徹底給你指出來。」然後就叫我停辦了。

三步曲，先是來勸戒，你這個做法不對，你應該改進，你按照教育部的辦法。一個辦法是教育部收去。我說你們教育部我知道是不會辦得好的，經濟又不來，讓你辦下去，然後你苦死了，他經費又不給你，你又要維持這個學校。我寧願不要。你們教育部收了去吧。再後來，他說，你如果不照教育部的辦法，要取締的。我麼，一句簡單的話：寧願玉碎，不願瓦全。你們只好接去，我也實在辦不下去了，人吃不消了。當時五百個學生的生活，房子、設備，還有住宿，給她們吃飯，給她們衣服、被子，啥地方來啊？後來他們說要改組，體專的送到重慶大學體育科，師範的體育屬重慶大學，中學歸到重慶市幾個中學。可是有幾十個學生不肯去，一定要跟校長。我後來幫她們辦了一個手工業社，以生產自救渡過艱難歲月。

抗戰勝利後，我1946年自重慶回到上海準備繼續辦學，學校部分建築雖還在，卻已面目全非。江灣校址已是兵營，門前掛著六塊牌子，都是國民黨軍政部軍令部及港口司令部的附屬機關。為了收回校產重新辦校，我用去兩年多時間，往返奔波於上海、南京，與國民黨政府部門交涉，最後總算拿到簽有「准予發還」的證明。沒想到，交到駐江灣的軍隊手裏，又成了一紙空文。他和你怎麼說呢？他說：「你是誰？我不認識。」我說：「我是這個學校的創辦人。這些房子都是我建造的。」「你講你的，我們就不會聽你的。我們又不知道，我們又不是從你手裏接下來的，我們是從日本人手裏接下來的。」這氣人吧？我氣得不得了。這個房子收回來是苦透苦透了。我手裏都有證件的，他們不認帳。國民黨的軍隊，抗戰勝利後之後可以說威風的不得了，對國家有功了。他說，不管怎樣，軍事第一。大家講理論了。我說：「在戰爭的時候，是的，軍事第一，那現在戰爭結束了，教育第一。」和他們辯論，辯來辯去沒辯頭了，到南京去找上面的人。為啥找上面呢？因為它這個都是附屬〔機構〕，軍政部的附屬，海軍部的附屬，全是附屬，六個機構。你要把六個機構都趕出去，房子退回來，你談何容易！我一點精神全去花在這個學堂裏。上頭好說話：「陸校長，你

這個房子我們無論如何要騰給你的。」蠻安慰我的。但我拿著上面的文，再去找軍隊，他們說：「給我們房子我們就搬，沒有房子我們就要住。我們為國家吃了苦。」這段時間裏我對國民黨政府起惡感了：你們弄不好了，腐敗。我告訴他們這學堂是我自己辛辛苦苦建的，現在沒地方住，只好住旅館。他們才開始同意給我一個房間住，後來又給了一間。我僱好木工，買好材料，騰出一間，我就收一間，用一間，幾十間房子，幾十個月才收回。那年冬天我每天住在江灣，一面收房子，一面招生。設備也沒了，經費也沒了，我想再辦體專已不可能，結果辦了一所兩江中學，先開設初中三年級，男女兼收。房子逐漸收回，又增開高中班，並取名為兩江中學第一部。老西門的房子也費很多周折，收回產權，重加修復，設立了兩江中學第二部。兩部合起來有四五百人，共開設了兩年多，後來就解放了。解放後，我沒再從事教育，而是成了一名工人。



文化大革命前面也有一段時間，當時還要搞搞你，到底你的歷史怎麼樣呢？他們問我（陸禮華模仿北方共產黨幹部的方言）：「哎，你這個人，你說你和國民黨沒有關係，這簡直是奇蹟，不可能的。怎麼能夠叫你幾十年一個學校存在呢？不可能的。過去作為一個校長一定要當國民黨黨員的。」解放後他們這麼對我說，我心裏覺得冤枉死了。我是沒有呀，我是辦教育。從前國民黨、共產黨，當時有點先進思想的人，怎麼看得慣國民黨呢？我和國民黨沒什麼聯繫的。他們說：「但是你總歸成立一個學校，你不是國民黨黨員，他會給你成立嗎？不可能的。」我說：「我和國民黨的人認識蠻多的，上上下下，就是蔣介石、宋美齡，宋家的人，熟的全有的。但是黨的關係沒有的呀。」然後講不清楚。怎麼講得清楚啊？他們說：「國民黨從前對你非常好，你所得的成績都是蔣介石囉這些頭頭給你獎杯獎狀，這麼多，你兩間房子的獎品。你和國民黨沒關係？那你為啥共產黨來組織你你不參加呢？」我明明曉得，進步是好的，實際上我同進步人士也蠻多接



觸的，然後她們知道我活動的，就來聯繫我的。我就是不敢同共產黨直接聯繫，暗中還是同情進步的。但我有個堅定的思想，我總歸是做無黨。因為你先進黨進來了，國民黨一定進來。先進黨一進來以後，他們（國民黨）煩人得不得了，一會來逮捕學生了，一會來做啥了。我想我好好的學生為啥要去受這種苦難啊？我情願不組織，再說我也害怕的。他們國民黨看見我不左也不右，一本正經辦學堂，他也不來和我聯繫。所以這個情況就是兩面受夾檔氣。

共產黨來接觸過我的，這個時候都是鄧大姐比較多。鄧大姐和我真的像姐妹一樣。我從前辦校的時候，當時也是成功了，不成功她們不會來的。1922年23年就認識的，還蠻熟的。在抗戰的時候，我組織救國救亡會，全是大家一起的。我麼也喜歡社會活動，婦女組織都參加的。我參加了婦女同盟會。這個早一點了，幾個闊夫人、駐蘇聯大使夫人、幾個先進的學校校長，如神州女校，都是女校長，上海有名的幾個校長都出來的。學運會之後，五四運動之後成立的婦女組織，上海有十幾個婦女組織，我都參加的。這些婦女組織的目的都是提倡婦女權利、女權運動。女權運動也有的，婦女節制會也參加的，青年會也參加的。國民黨組織的幾個我也去參加，全是她們要我去參加。我反正你們為婦女利益，我總歸參加的。不過我對那種我這個組織反對你那個組織的，我不做的。我麼歡喜婦女大家攜起手來，大家為婦女運動。所以他們說我政治思想不夠明朗。那我沒有辦法呀，我要辦學堂呀，我的目的是辦學堂。

在抗戰的時候，鄧穎超到上海來。她重要的任務是請孫夫人到北方去，然後她們對外是說到上海來看病什麼的。<sup>16</sup>於是大家一起開會。我們都曉得她是老共產黨了，周恩來也曉得的。承蒙他們看得起我，就是說你是一本正經辦學堂的，別的沒有。所以你總歸是圍繞婦女，是一個婦女團體，總是要擴大組織，多一個，就多一個協助。我麼，只要是為婦女爭權利，我總歸是踴躍參加的，我都參加的。



舊社會的婚姻多半都是封建時期的，有的時候還要聽從家長。我第一次的婚姻就是當時我不喜歡的，但是父親喜歡的，那只好聽父親的話。我23歲辦學堂，辦了學堂以後父親說，你一個人太辛苦了，總要有個人幫幫你忙。你的學堂自己一個人，我們看著你苦死了。橫講豎講橫講豎講（反覆講）。這個時候為了辦學堂麼，想想也對的，有個人做做幫手，他的文字比較好。他叫吳建鑾，是學的工業專科，出來後在一個社會團體裏工作，一個牙齒學會裏當幹事。我和他認識後，他想追求我，就對我父親很好。然後他看見我辦學堂麼，他也到我學堂來，在學堂裏幫忙做文書。做了兩年朋友，父親說你們還是結婚吧。人家都知道〔我們〕做朋友了，就結婚吧。我想他協助辦好學堂也是好的。但我對他並不滿意，性格不行，不是幫助你學堂，生是非。他應該對我也要愛護，對學堂也要愛護。他呢，頂好我的學堂將它破壞掉。他有野心，我沒把權給他。校長他是做不了的，我們是女校。他想權要大點，主任什麼的，但事實上他不可能的，他要闖禍的。他能力不行，性格不好，不是真心誠意地做事。我沒給他權力，他就覺得不高興了。不高興也不去說他了，還會造點事情出來。這個事情談起來就不好聽了。他和學生什麼的好了也有的。那我心裏恨吧。你不是來幫助我，是在破壞我。他和學生們打球、運動，玻璃窗也打碎了，他是野豁豁（任意妄為）的，不是什麼穩重的，一會和學生好了，一會和學生吵架了。這種性格怎麼和我合得來呢？那我心裏恨得很。

有一次，我摔斷了手臂，在醫院養病。學堂裏沸沸揚揚地議論，來講給我聽了，說吳先生帶著學生到蘇州去，什麼什麼的。我傷了一個月了，他一次都沒來看我。夫妻呀，這怎麼可以呢？我說，別的沒什麼的，你在我學生頭上侮辱她們，這個是不能原諒你的。我說這是女學堂，我學堂總歸要辦下去。你這個樣子，我只能犧牲家庭了。他氣死了，就跑掉了。跑出去兩年，到蘇州去討（娶）了個鄉下女人。

過了兩年他來找我。我說：「你女人討好了，那這樣蠻好。〔離婚〕手續要辦掉，登報就不登了。」舊社會離婚、結婚有兩次，人家就要看不起的。老實說，女子受不起這種打擊的。辦離婚，我律師請過來，也就是三個人，大家說好了，不登報。那我總歸是個校長，從前舊社會實在是小報多得很，輿論全是不三不四的，婚姻問題他們就要做文章。我想不要在這個地方使得人家說我不好。我說大家客氣客氣麼就好了。律師也贊成得不得了，說我講的話得很有理。我說你在外面的行為我都曉得了，反正我已經不願意和你再繼續下去了，你自己你管自由去好了。他也求之不得。他自己女人也討好了，還有啥好講的啦？他也不說啥了，我也就原諒他了。這以後過了一個禮拜，啪，他單方面登報了！說我們結婚蠻鄭重的，說我總是嫌他配不上我，說這個女人的心是交關容易變啦，什麼的。用的這種口吻是非常不恭敬的。那我心裏氣傷了。這個人做事不守信用，大家都講好了的，不登報。登報也可以，你經過我同意你再登好了。但是他登也登出來了。那我愈加看不起他了。他曾經帶著他妹妹來阿侄（侄子）來，到學堂裏偷東西。全搞出這種不三不四的事情！他最好是把這個學堂讓他自己家裏人來佔據。就是這種小人派頭。這種事情我又不好說，聲明又不好聲明，不好把它宣佈出去。我是痛恨這件事情（與吳的婚姻），談也不想談起。只有部分人曉得我離婚的事情，正式的報紙不談這些的。本來歷史上也不需要留下一筆。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第一次談話時，我沒有給你講我的婚姻。<sup>17</sup> 新舊社會交接的時候，社會風氣對女子總是不利的。精神上痛苦。那一段我不容易。傷心事，傷心得蠻厲害的。

我在30歲時再婚。丈夫叫顧正來，他一生就是做童子軍的，辦教育的。他是教師，我也是教師。大家最早成立教育改進社，蔡元培先生、陶行知先生，這幾位先生發起的，它的範圍是全國的，所以叫中華全國教育改進社。<sup>18</sup> 所以各省教育廳長，各種私立大學校長、教育部長全在裏面，一年開一次年會，顧正來和我就是在年會上碰到的。大家會議裏面一起開會，大家說話，你覺得很好，我也覺得很好，那個時候就接近了、認識了、熟了。後來他到廈門集美學校做總

教練，再後來到上海來辦所中國體專，我協助他辦。那個時候他40歲，我30歲，我們結婚了。

這之前，朋友是多的。我一直做事業的，一本正經做事業的。在事業上和他是同志，曉得彼此的痛苦，體諒的。他麼年紀大點，我也覺得蠻好，就結婚了。接了婚後的第二年，1931年我們到日本去了，他麼去考察去，我麼帶著兩江女子籃球隊到日本去比賽去。他在1932年去世了，我們結婚才一年多點。一二八戰爭，<sup>19</sup>他是做南市保衛團副團長。南市是個城，城裏面全是屬於保衛團，中國的地界。他是副團長，帶著訓練的。人家都搬走了，老百姓都逃光了，然後留一部分人保衛團在裏面，吃的東西買不到，生活沒辦法的。吃得不好，又沒好好睡眠，人身體怎麼行？等到戰爭結束，就身體垮掉了。我給他請了最好的醫生，但也沒用。所以說句簡單話，我等於沒結婚。<sup>20</sup>

抗戰的時候，那時我在重慶流亡，這個不是正式的〔婚姻〕，他也是從前認識的，據他自己說，過去他對我有意的，我也不曉得。後來他說在重慶看見我，非常高興，經常來看望我，生活上也有時候來往，有兩三年同居。他是保險公司的。大家互相照顧。後來到了上海呢，他從前的原配還在，他就回去了。我也和他說，我們不可以在一起。在重慶沒辦法，到上海了你就回你家去。<sup>21</sup>回家後不久他就生病了，生病也就死了。我的命就是這樣……（笑）。那些辦事業的人，對於家庭總是不稱職的，沒這種心思大家過溫暖的生活。情願忙著，忙忙碌碌，吃苦患難倒是不怕的，就是家庭裏面，自己感覺到沒啥家庭樂趣。和顧正來在一起一年多，也是這樣。他也是校長，我也是校長。他也忙，我也忙。到吃完晚飯，總算是事情辦好，他到我學堂來看看我，或是我到他學堂去看看他。不是像人家那種夫妻，待在一起的時間很少，後來到日本是一道去的。人是蠻好的，端正的人。

我沒生過小囡。我姐姐養了八個。在生了四五個小囡後，她讓我帶兩個出來，要給我的。我不是人家那種舊派，要過房給我囉，改名字囉，算我的囉。我也不是這種自私的心。我說好的，你叫他們出來好了，待在我這裏讓我熱鬧點，培養大了也是將來讓他們能夠成

材。開頭一男一女兩個帶出來了。那麼一二八戰爭了，這兩個小囡吵了要到鄉下去：「待在上海你辛苦死了，我們回去一趟，將來戰爭好了再回來。」兩個小囡已經14、15歲了。沒想到一回去兩個小囡都生病了，一個是肺結核，一個是白喉，一個男小囡，一個女小囡，兩個小囡都在鄉下沒了。後來呢，我姐姐越養越多，有八個了。她說再給你兩個。我說不要了，我這個人命硬不過，兩個小囡已經死了。她說不要緊的，不要緊的。然後第六個和第八個跟我出來了。於是抗戰後我辦中學時，姐姐家又一個男小囡和女小囡從鄉下出來，到上海來讀書，住在我一起，在江灣，我請保姆來照顧。他們在上海過得挺好，現在還經常來照顧我。我姐姐在75歲沒的。她沒讀過書，她的時代不同，她還比我大五歲，在辛亥革命前長大，思想又老一點。她繞小腳的，讀書還沒興起呢。她後來怪大人，「你們不讓我讀書。」大人說：「沒人讀書，怎麼可能給你讀書呢？」所以她沒地方讀。她的一生蠻辛苦的，小囡多。

我的一切的生活，和學生在一道的。我燒飯什麼不弄的，到重慶燒過飯。在上海我在學堂和學生一起吃飯，這樣才曉得學生吃飯吃得好不好呀！這樣現在這些學生感情總歸和我不淺的。所以等於是有一天到夜陪著這些學生。早上查房間，是我單獨要去查的。學生個個睡得好嗎？房子都弄好了嗎？雖然有管理的先生，但常有不周到的。所以和學生感情好。她們病了，我就把她們送出去，送到四川路那兒的醫院。所以她們叫我救命恩人。有個學生是外地的，她要開刀，她說：「校長，你不好走的哦，今天隨便怎樣不走，讓我醒過來，我要看見你的哦。」那我只好不走，等她開好刀，看見校長還在。還有一個學生，得了霍亂，這個小囡是江西學生，面孔嘴唇皮全黑了，人都不能碰了。我也不怕，我抱著她，坐了一部三輪車，送她到醫院。到了醫院他們問：「你是誰？」我說：「我是她校長。」他們說：「你怎麼這麼糊裏糊塗啊？她生啥毛病啊？她命都沒了，你還抱牢她！快點你去消毒去！」然後我去消毒去了。結果這個學生救出來了。她也是到日本去的，在日本買了個很大的參，買來送給我。

重事業的人，婚姻家庭不要緊，一直做著做著，做老小姐了。我的學生裏有很多都是老小姐。我說：「你們怎麼都做老小姐？」她們說：「就一直高高興興地做麼，就做到五六十歲了。」教書教得很好，學校裏成績很好，年年體育運動會得成績。有些學生一畢業進她們學校教書，一直到退休為止，沒結婚。我一些女性朋友也沒結婚，或者很晚結婚。長得男性兮兮的多半重事業，我也是男小囡脾氣，看見男的也不顧忌，我和男的結交認識什麼的，我不是怕兮兮的，我不怕的。



1950年，共產黨解放上海後不久，上海教育局的人來我學堂，宣佈政府接收學堂。當時的情況是，有一個人是我的學堂的畢業生，她的丈夫是人大裏面的，周谷城，<sup>22</sup>曉得共產黨來了，老的學堂都要接收的。和教育局一說：這個學校接收的時候由他妻子來接收。我想不到是她，我想她沒這個資格做校長，我想想也不可能的。後來別人告訴我：「真的，她已經聯絡你裏面一個職員，她們已經聯絡好了，到教育局去了，她要來接收了。」她不是共產黨員，她就是我學堂裏畢業的。她也沒做過事情，所以我知道她沒這個能力辦學堂的。結果過了幾天教育局派人來接收了。接收之後她做代理校長，我出來了。他們來篡奪了。要篡奪麼總要說我的壞話囉，說我是國民黨政府的要求人，因為上海的報紙曾經登了我和一些國民黨官員的合影，學堂的董事長潘公展後來又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主任。就這樣把我趕出來，我變得一無所有。我心血都在這個學堂裏，我外面一切有點什麼就全放在這個學堂裏。除了學堂，我上無片瓦，下無寸土。

我離開學校，我的生活就困難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不怕的，再苦我都會過這個日子的。我就辦新式的絨線編結。1952年我和兩個家庭婦女在南京路上開了一家新式編結社，用機器編結新式絨線衫，也是上海第一家用機器的。不辦則已，一辦又發達了。一個月我們每人有一百多塊。1958年政府實行公私合營，國家組織合作社，把我們併進去，生產也併進去，人也併進去，由國家規定給你幾個銅鈔

生活，你的財產麼給你幾百塊錢，你的生活麼給你二十、三十、四十塊。也只好這樣，沒辦法麼，要吃飯麼。我總歸有一個想法是對的，我是勞動吃飯，我總不依靠別人。我對小輩也沒存依靠的心，他們那時也是艱苦的時候。我初開編結社的時候也是困難得不得了，三個人合作，辦了六年，辦得蠻好，辦發達了，合作社來了，停掉，之後進羊毛衫五廠，做工人。一個月45元的工資，一直做到65歲退休。我是做檢驗，出國檢驗，工作也蠻好的。我做工人也做得來呀(笑)。靠勞動吃飯麼。人家說：「你是校長，你現在怎麼去做工人？」我說：「勞動光榮的呀。校長總歸是一個指揮者，現在我是接受指揮。我勞動吃飯，我怕啥呀？」開編結社時，有幾個人路過，偷偷在外面看，說：「這是陸禮華呀，這是兩江的校長。現在就辦辦絨線店。」我想，你們怎麼這樣的思想。我現在勞動吃飯，蠻好的。我呢，也順從的，人好像思想是跟著跑的，不跟著跑要生氣的，跟著跑不氣。氣啥呀，還有人家大老闆，今朝也要下來的。

我和兩個子女住在一間七個多平方的亭子間，朝北，冬天像冰窟，夏天像火坑。文化大革命也來抄家了，「嗨，你從前是校長，你總歸有財產的，你房子都造了那麼多。」我說這些造的是國家的，不是造我的呀，我造了教育用的。「那你一分錢也沒有嗎？」使勁問我。我說：「你們去查吧，來，到我房間裏翻，另外一個地方有360塊。」「藏在啥地方？」「床下面，在箱子裏頭，你們去查好了。」一查出來，剛剛360塊。積蓄360塊，倒沒有拿去。我45塊工資，然後你退休打六折，因為我工齡不夠，打六折。那麼27塊加5塊伙食費，32塊。32塊工資十幾年了。1980年，我已經退休了。我有幾個學生在中央方面，她們說我們校長太苦了，組織了一生教育，現在住在亭子間，講不過去的，我們去說，房子不給她住不行的。於是她們幫我去說，中央到上海，反正你們要給她房子。後來為我解決了住房，安排了現在這個公寓。1980年進了文史館，後來又成為上海市政協的委員，但政府仍然不提我校產的任何事情。當年接收我學堂的教育局長杭葦，

後來也做了政協委員。我1982年去找他：「杭局長，你當時接收我這個學校的時候算是什麼名目呢？這要讓我弄清楚吧？」他說：「接管呀！我不辦你已經算好了。」我說：「你辦我什麼呢？我做什麼你要辦我呢？」「越是在革命初期的時候，這個階級鬥爭呀！」這種話都說出來！我說：「學校你接管了，我這個人你為什麼不接管？」然後他沒話說了。「哦，對不起，對不起。」三鞠躬。他自己知道錯了，他要混水摸魚，說上海私立學校一律接管的。但是我和他說：「你這個接不上頭的，你在54年之後全部接收，你接收的時候接收的是名目，沒接收校產，沒有校產的，人家私立學校都是租房子。我學堂是50年就接收掉，你怎麼說起來我都不符合。」他說：「總歸是接收呀。解放了嘛，總歸是要接收呀。」

1950年政府剛剛對我這樣處理之後，我沒去找鄧大姐。你想，她在同樣的一個黨裏面，我說我這個道理，不是在講共產黨判錯了嗎？她曉得我的學堂受到這樣的委屈的。所以我也索性沒去講，也不響，一百個不響。我那個時候有志氣，我自己能夠安排生活，我就顧自己的生活，道理總有一天會講清楚的，不要緊的。我和共產黨這麼說：「我如果有一句虛話，隨便你們怎麼處理我。你們說我和國民黨有關係，你們去調查。查出來我陸禮華在黨組織裏面有開會，或者簽名，隨便你們怎麼處理我。沒的話，你們不能叫我承認，我不承認的。」我要說，我一輩子都沒做過任何對不起共產黨或者人民的事情。

我二十幾歲的時候，看見怎麼相信耶穌的人這麼熱心，怎麼這麼誠懇，這麼誠實？所以我想應該要學習他們，就曉得基督教了。尤其是什麼時候呢，五四運動我去教會學堂宣傳革命、救國主義，她們學生向我宣傳基督教，賣給我一本聖經，叫我相信耶穌。我不看聖經倒沒啥，一看聖經就心裏抵觸了——什麼上帝一天造一樣什麼東西，六天功夫天地都造成功了！喲！我想這麼容易的事情啊？六天功夫造成功全世界？心裏就抵觸了。實際上我這個思想是不對的，我當時想的是人，人誰能做得到啊？他是神啊。當時沒辦法解釋這個事情，但



我現在懂了。認識了就懂了，過去的時候不相信，抵觸啊，所以聖經放在旁邊不看，一直不看。禮拜也去做的，聽不進去，然後直到1950年。那年正式感到我過去那樣都是錯的，信教是真的。不是從思想，思想也做不到，是心靈，這個心靈覺得是迫切需要了。一生疲勞也疲勞了，冤枉氣也受夠了，勞苦也夠勞苦了，窮也窮夠了。

我的一生就是這樣。我假使是個男子，我不會到這個地步的，還是個女性的關係。事實上呀，他（政府）對我學堂這樣處置，假設我後面有個老闆，或者是有人支撐我的，也不會到這個地步呀！我在舊社會一辦學的時候就感受到女性的苦惱，樣樣用壞的名字來詆毀你的，比如講：「陸禮華麼，手法大呀，她認識的人多呀。」總好像我是在社會上認識些闊人麼，總有一些人幫她的忙啊。好像你就是同他們有什麼〔性〕關係呀。這麼都是個女性呀，要不是個女性這種閒話都不會有。對嗎？還有現在這個時候，這個學堂這樣子，有誰會出來幫我說話？沒人出來幫我說話，曉得我是單獨的一個女性。所以我想到這個地方，中國女性是苦惱！中國女性真苦惱！不是我一個人，多少我的朋友中間都弄得名譽損失，名譽損失壓得來，就不做事情了，都是這樣，名譽損失，結果事業也放棄掉，失敗了，都不做了。中國女性特別比外國女性更困難點，蠻艱苦的。所以我從前就說：女權是要爭的！不爭不行的，再這樣下去不行的！因為這個歷史上下來，輕視女性。比方說，這個女子離過一次婚後，再一次結婚，就不得了了！那就批評得不得了。但是男子就不是這樣，男子你三次四次結婚都沒關係的。所以這個我常常也要問了：我說女性為啥要這樣被摧殘呢？但你和誰去講呢？所以只有說我們大家組織這個會，宣傳宣傳也好的。女權運動同盟會、女子參政會，劉王立明辦女子參政會，<sup>23</sup> 我差不多都參加了，十幾個女子運動組織，全參加了。

我的工作一天到晚都沉浸在這個裏面，為女權、為體育，女權是我終身的事業。所以我那個時候，一面是學堂，一面是社會活動，做婦女運動。上海所有的婦女運動我都參加。第一個最早的時候，是康

有為的女兒，叫康同璧；還有叫張竹君，她開了上海醫院。<sup>24</sup>我從前的這兩個朋友都是有點魄力的。辛亥革命之後有幾個女權的，照我現在看來，歷史上應該表揚她們。我小時候，辛亥革命的時候就從報紙上知道了她們。她們組織了天足會，天足會就是大腳，不包小腳。我想，這兩個什麼人啊，我要是到上海去，先要去望望（拜訪）她們。然後我一到上海來，她們開天足會，我也去了。我就講給她們聽，說我讀了你們天足會到消息啊，我在鄉下也領導叫大家都不包小腳。那麼她們就叫我「小司令」，不包腳的司令。我是受了天足會的影響，所以我對她們兩位呢，很敬重她們的。後來到上海來之後，她們叫我一直參加開會，後來我做校長了，她們叫我一直參加了。從前女子參政、天足會、女子同盟會，最主要是這幾個。我們所做的就是伸張女權、宣傳宣傳、開開會、發發言、沒動作呀，做不出。國民黨的時候，說是說婦女運動，國民黨也蠻忌婦女組織的，對人民的運動什麼的，都在注意了，所以實際上不能有啥動作，不好做啥運動，就是有名目開會，發發消息，三八節遊行。參加的人多半是教育家、醫生。人不算多，也不容易，二三十個人參加開會，也不容易。後來有個比較大的〔行動〕，叫制憲運動。男子也有制憲運動。我們婦女比較早，就是上海的各個團體婦女、學校，大家派代表，幾十個人。我是上海代表。這是婦女派代表到南京去，要求國民黨制憲，然後憲法裏面就是要男女平等。然後南京他們國民政府也出來招待的，他們認為我們也是蠻好的。這個是行動了。我們的口號是「打倒軍閥、男女平等」。<sup>25</sup>



在五四學生運動中，學生組成了各種組織，男女學生自由交往。男女麼，那個時候沒什麼界限，就整個上海大家都戀愛的，多半中學生、大學生，然後男女戀愛了。社會上批評學生組織，他們說：「現在的青年學生啊，學生會什麼什麼，現在全是在搞男女戀愛。」（笑）一些老腦筋的人說：「噢，男女沒界限了，現在是，都是一對對的，都是談戀愛什麼的。」這樣子批評。這種是自然的。那些人用老

眼光看待。但我保守思想蠻嚴重的，顧慮蠻多的，怕自己學校裏的同學會譏笑你，你也會交男朋友去了？什麼的。同學反對起來你也蠻討厭的。比方說某人朝前跑，外面報紙上登得多，會有嫉妒心了。那個時候新舊交接的時候，有點縮手縮腳。尤其是年紀輕，我還小。收到了男學生的信，我不敢回。因為我是許多人認識的學生，我不想招來流言蜚語。

我不太喜歡看小說，小說萎靡精神。我看看《紅樓夢》，裏面的情節太苦了，一點女子的地位都沒有。看了《紅樓夢》，我就小說一點也不要看。《三國志》什麼的，這個裏面全在人殺人，人害人，我不喜歡。新小說我看的，從前看胡適的，還有那些西方的、白話的，但我看的不多。我主要讀實用的教育方面的書。空虛理論的我就不看。我一生不喜歡空虛，渺渺朦朦，都不喜歡。實實在在的、做的，是我要看的。我是從報紙上和那些提倡女權的婦女那裏知道「女權」、「女權運動」這些詞的。

我就聽不得人家說侮辱女子，我就心裏氣呀。我說怎麼就這個樣子啊？過去上海婦女界幾個人大家都熟的。比如有個張湘紋，她也是做事業的，我倒蠻佩服她的，她是真的做事業的。她也是名譽受損的，攻擊她，說她同福建的什麼廳長什麼什麼；說，張湘紋不像樣子啊，某廳長來上海她總是車子去接啊。還全是些女子在講。我說他們在美國就是朋友了。後來他們倒結婚了，結了婚就不講了。她到五十多歲才結婚，別人批評了她也不敢結婚，那個男的前妻沒死，她不敢和他結婚。人家這樣講她，她也很氣的。她是人和女校校長、人和醫院的院長，她的事業也蠻好的。她姊妹幾個都是醫生，辦醫院的。從前的張竹君最早了，張竹君在辛亥革命的時候，辦上海醫院，現在的上海第二醫院。我到了上海時，只聽見人家說，她跟什麼什麼人，講來講去都是講這種閒話，真是難聽啊，總歸摧殘女性啊。現在就不同了，現在女子全做工作了。那個時候，在外面做事情的女子少，不敢做呀。不做事情沒有錯，一做事情就有錯。人家說，越做大越做壞。

那麼人家女子都不肯做。誰肯做呢？所以創事業多數是打擊對象，學堂都關掉許多，可惜啊！到後頭麼堅持不了。名譽打擊最大。你爺娘也要勸的呀：「你們何必呢？去做啥呢？受這種打擊呢？」我也時時人家勸的：「儂（你）做啥呢？儂再做下去，儂的命都要拼掉了。又被人家都批評。儂為啥要這樣做呢？」我說，我想要國家強，人民健康。人家說富國強民，我要強民富國。我講出這個話，就要做到底。你們去講你們的好了。這個樣子麼，所以忘記掉了。我受冤枉的事情多得不得了。

講一個例子：從前有個楊秀瓊，上海到香港的一個女的游泳健將，在全國運動會打破紀錄。名譽也被別人破壞得不得了。我曉得她，因為我造了個游泳池，她也是在我游泳池裏表演、比賽。她年紀輕，只有十幾歲，所以娘總是跟在她後頭。那一次要派她到德國奧運會去代表，我們國家沒鈔票，她娘要跟著去麼，要你自己自費。娘講：「你們不給我去的話，我女兒也不去。你們要我女兒去的，我要跟著去的。」這個事情就弄僵了。我在香港生病，闌尾炎開刀。她們娘和女兒倆來看我，叫我：「校長啊，幫幫忙。」娘說：「他們不許我去。我去要自己出錢，我哪來錢啊？」我說：「這便當的。我到上海去，我幫你辦。」游泳只有一個人，她不去的話中國游泳代表也沒有。我的意思是，為中國代表，總要有個游泳隊員，這個項目應該要有。我叫楊秀瓊到上海去做幾場比賽去，表演去，這個票子賣下來，就給你姆媽做旅費。她姆媽開心死了。於是我幫忙安排了楊秀瓊在上海的表演。報上登出來：楊秀瓊即將到上海比賽，幾次在市運動場，幾次在兩江游泳池。那麼好了，報館裏的人妒忌了：哎呀，陸禮華在利用楊秀瓊賺鈔票，讓她來表演，然後又可以為兩江的名譽出名，有這種種用意。報上這麼一句話：「楊秀瓊啊，楊秀瓊啊，你要鄭重注意啊，你不要給別人利用了啊。你聽陸禮華的話，你出來表演啊，你要是上當啊，那你要吃虧的。」楊秀瓊和她娘心裏面覺得對不起我。我說：「別的不用說，在開大會的時候你們說一聲，是我們要求陸校

長到上海去，為我母親籌得一筆到德國的旅費。」但是今天她說了，明天報紙上不登。像我受的這種冤枉氣，要和誰去講呢？好在我有信仰，心裏想得開。沒有宗教的人要氣死的。不管怎樣，我內心知道我沒有做壞事。一個人必須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這樣才能心態平和。



我到現在為止，就是一個，學生好，無論國內國外的同學，對我只比對親生母親還要好。她們經常來看我，今天來的年紀大的已經有83歲，小的也有80歲了。有的學生寫信來，七八十歲大人叫我「媽媽」、「母親啊」。噢，這樣叫的。「你們和我差十幾歲，我就算你們母親了？」「不管的，你總歸是我們的母親。」蠻快活的，這個一輩子。所以我說教育是不白費精神的，教育是有收穫的。我的學生在世界各地都有。我一直收很多很多信，各國的來信。我也給她們寫信，一天可以寫八封。就是老花了，只能寫好之後再看看信有沒有寫錯。

中國婦女還沒有真正解放，父母還是重男輕女，和我小時候一樣，生個男小囡，噢，歡天喜地，生個女小囡，就覺得晦氣。女子教育仍然不充分。沒有女子教育，我們就不可能讓她們自尊和自強。<sup>26</sup>

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叫〈我與20世紀〉。我對20世紀，我總感覺是我的時代。因為在小的時候，看到鄉下的苦惱的女子，現在能到這個時候，一個轉變，很大。同時我們婦女的建設呢，也實在廣闊。我們中國最專制的時代，前清時代能夠變到現在最進步的社會主義國家。那麼女子來講呢，前清就是本世紀初，那個時候呢，可以說統一都是小腳時代。婦女的變化，那我現在說句真的話：舊社會裏面，雖然國民黨執政以後法律也規定婦女也有權，但這個全是空話。婦女一點點權都沒有，這個是事實。有些人到洋行裏面去，到銀行裏去，到什麼地方，就是當教師，當什麼，全是當你花瓶，從前叫花瓶。前清的時代是女子真不當人的。所以這裏面我就覺得變化太大，覺醒太大了。解放之後呢，不管怎麼樣，女子是一個人了，女子是半片天了。這個是我的一個感覺。

把我年輕時候的活動和現在比較的話，現在麼是這個樣子的，婦女的組織呢，還是民眾沒啥組織的。現在的上海，比方說上海市婦聯，都是歸國家辦的，民眾的也沒了。換句話說，我就說民主方面麼，雖然你有民主的名義，但是我籌備一個婦女會是不行的。現在呢，有國家來辦了，我們也不必去辦了。是不是這種想法啊？像體育一樣的，過去沒有體育的，我們到處組織運動會，到處開運動會。現在國家辦了，你用不著。你要麼去參加市政府的，你住在什麼地方，靜安區麼靜安區，黃浦區麼黃浦區，由國家替你組織了。那麼設備也有了。然後國家做了，你每個省都有運動場，都有游泳池、體育館什麼的，都有的。那你一想麼，「國家辦了，國家辦了我們是用不著辦了。」以前的情況呢，是人民主動的；現在你去辦起來都是被動。那我們也不去研究了，不去動這個腦筋了（笑）。這個是說真話，是吧？你也出不了力了。我比方說私立學校，他不讓你辦的，要收掉你的。那麼能夠不辦就不辦了。從前沒人辦麼，我們要辦呀。一個呢，是人民自己主動起來辦。現在叫你組織你也不組織了。你叫我組織個婦女會組織什麼呢？你還去對市婦聯對抗啊？

像我市婦聯也不參加的。市婦聯要有市婦聯的資格參加進去。比如說，你一個工廠裏面，要正式派代表。什麼單位裏面，你參加市婦聯要有資格的，他也要審查你的，符合市婦聯的參加標準嗎？這個沒主動力了。所以我有時候想，一個國家到底怎麼一種才最好？又合民意又合政府的意思？你政府一做多了，人民的主動力就沒了呀。現在婦女就是說工作崗位上辦好，社會上活動都沒有了。沒有就沒有，大家不管。說起來人民也變成被動了。是沒啥了，你活動就不適宜呀！到後來還要帽子戴上了。我是講人的個性，每個人的個性總歸好像有主動的能力。主動的能力，這個工作做出來，好像有成績。比如我辦學堂。你給我國家的學堂，我辦不出成績，有限制的呀。一年給你多少經費，你一定要辦到什麼程度，是吧？你不聽也不對的。我們私人辦學堂，今年學生多招點、發展，我一年多體育學生招到三百，全

國也沒有的。從前每個體育學堂三四十個人。你一個學堂三百人，全國創舉呀。然後妒忌也來了，但是心裏蠻開心的。噢，我辦得發達的。我出多少力，就有多少成績。現在你出不出，沒辦法。唉。我也沒什麼黨派，我講的話是實事求是，對嗎？

我們那個時候覺得自己是新女性，敢衝敢想，因為那個時候鼓勵人朝前衝。解放以後，1954年上海市教育局接收四百幾十個私立學堂，一半以上都是女子辦的，尤其是小學。這是後來我跟杭葦（當年負責接管後任教育局長）辦交涉，他和我談的，他的意思是並不只有我才受到這種對待，因為1954年接管了四百幾十個私立學堂了。那麼我說：「54年的政策，你50年已經執行了。」他就是看你有學堂房子、有財產。沒財產他也不要的，就叫你解散掉。有房子、有生員、有底子、有繼續的希望，要奪取這學堂來辦，做校長。這樣子麼，上下一拍攏，把這個學堂收掉了。所以這樣子呢，我這許多年是覺得沒興趣。我這個對畢業了的學生在國內的工作、地位都有影響的。比方說這個同學在省裏面擔任工作，那麼你母校呢？這樣對她不是影響嗎？我為這一點心裏蠻痛苦的。我用什麼話安慰她們？假設你有什麼名目，我有什麼缺點，你的確指出來，我惹過什麼事情。那麼你一點都沒有，就是這樣講：「你和國民黨沒關係的？那你怎麼幾十年國民黨讓你辦〔學堂〕的？這是奇蹟！」那我沒什麼話說了。我對畢業的同學覺得沒法交代，怎麼安慰她們？她們都在各省負責工作，我給她們心裏很大的打擊。幸虧同學都好，都能夠諒解我這個人。所以直到現在呢，我不是說假話，我的學生對我呢，真是比自己女兒都好。親熱，一種關心，對我生活上什麼總歸來信問候。這是我最大的安慰。

## 解讀

### ——女子教育和五四女性的出現

陸禮華談到比她大五歲的姐姐時，她說她們倆生在不同的時代，提出了中國婦女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分期。她的生活與姐姐的差別很大，那是因為她的「時代」給了她以前上層家庭的女子才能擁有的東西，即受教育的機會。縱觀中國歷史，上層家庭的女子能上私塾，但是正式的學校教育直到1844年才向女孩開放，當時一位英國女傳教士在寧波開辦了第一所女校。此後，西方人在沿海大城市開辦了教會學校。<sup>27</sup>到1902年，全國已有251所教會學校，學生人數達到10,158人，其中有4,373名女性。教會學校為中國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提供了有限的受教育機會，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為國人樹立了辦女學的榜樣。<sup>28</sup>

1898年6月1日，在著名改良派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支持下，具有改良思想的紳商經元善在上海創辦了第一所中國女學堂。當時這件事被上海的主要報紙和《湘報》報道，加上學校得到改良派、商業精英和官員的支持，吸引了公眾的關注。在學校開辦之前，梁啟超發表了兩篇倡導女學的文章，並指出女子教育是增強國力的有效方法。他認為，由於中國女子不允許受教育，被幽閉在閨房，受制於習俗，已經變得「惰為遊民，頑若吐蕃」，他質問：「聚二萬萬之遊民土蕃，國幾何而不弊也……夫男女平權，美國斯盛；女學布濩，日本以強。興國智民，靡不始此。」<sup>29</sup>

梁啟超的文章標誌著國族主義話語的開始，以強種保國為目的，使女子教育在這代人的努力下合法化了。經元善向商界和政界尋求資金支持時，他用強種保國的口號來打動捐贈者們的心。當時社會很快認識到中國人自己開辦女校的重要歷史意義。但由於康梁改良運動的失敗，經元善牽扯其中，只好逃到澳門，故第一所女學堂只辦了兩年便關閉了。然而，辦女校的思想已經進入國族主義話語，並且成為一



項既受尊重又代表進步的事業，得到了開明人士的支持。越來越多由中國人開辦的女校在全國範圍內出現，到1907年，全國22省開辦了428所不同層次的女校，學生人數則達到了15,496人。<sup>30</sup>

1907年清政府也對興女學的新趨勢做出了回應，於1907年3月8日頒佈了兩條女學章程法令，要求地方政府開辦女子小學堂和女子師範學堂。這些女學章程吸收了當時新思想，一段時間在社會上廣為傳播。他們宣稱女子小學堂的宗旨是「養成女子之德操，與必需之知識技能，並留意使身體發育」。<sup>31</sup>然而，清政府主要關注的是，面對西方影響如何保持中國婦女的「傳統美德」。法令規定，傳播知識與維護儒家倫理應該互不影響，「一切放縱自由之僻說（如不謹男女之辨，及自行擇配，或為政治上之集會演說等事），務須嚴切屏除，以維風化。」<sup>32</sup>然而，不管對於女子教育的指導思想如何保守，由清政府支持和建立的女校卻是全新的、進步的機構，後來民國政府繼承和發揚了這一點。到1909年，全國共有308所女子小學、14,054名學生。清政府被推翻五年後，小學女生的人數達到了16萬人，到1916年，中學達到了八千所。<sup>33</sup>

1911年民國政府的建立極大地推動了女子學校教育。1912年陸禮華家鄉附近的小鎮上甚至建起了一所女校。一年後，陸禮華從這所女校升到縣立女校去了，當時12歲的陸禮華比小學裏其他同學大。當然，她父母不會想把她已達適婚年齡的17歲姐姐送去上學。因此，她姐姐錯過了機會，度過了和陸禮華完全不同的人生。

有一點必須說清楚：正式的女校並不是從陸禮華這一代才開始的。然而，正是從她這一代開始，像她這樣來自鄉村小商業家庭的女孩也有機會進入女校讀書，這才是新的變化。在20世紀初，教育不再是出身上層家庭女子才能享受的奢侈品，更為重要的是，公立學校、私立學校和教會學校都成了被公眾普遍接受的機構。本書中的其他敘述者也證實了世紀之交的巨變：從開辦第一所中國女校，到對於所有富裕或者小康家庭來說，女孩進入正式學校學習成為必經階段。這種

社會標準快速而平穩的變化成為現實，是因為女子教育的發展與現代國家的建立和國族主義話語的建構有密切聯繫。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族主義就是一輛車，載著婦女擺脫傳統窠臼駛進公共領域。沒有這輛車，很難想像任何其他社會規範會允許「良家婦女」進入公共場域「拋頭露面」。

如果說男性創造的國族主義話語為20世紀頭十年的女孩提供了正規的學校教育使其受益，那麼到了1920年代末，許多年輕女子從內心深處開始擁護國族主義，因為她們發現國族主義能夠為女子賦權。在陸禮華的個案中，她父母並不是受國族主義的鼓動而送她去學校讀書，卻只是因為她家裏缺男性繼承人。陸禮華選擇了女子體校時，也還沒有接受國族主義，將來能在省立學校找到一份工作才是吸引她選擇女子體育的原因。各級女校對體育老師的巨大需求，本身就是國族主義為女子創造社會空間的一個例子。但是直到五四運動之前，陸禮華也沒有意識到國族主義及其對她日後發展的可能性，只有聽了馬相伯的演講後，她才頓悟到，比起在省立學校找份工作，她可以為了國家做更多的事——強國的需要和開辦一所女子體育師範學校的個人抱負就這樣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到年輕女孩進入她的學校時，她們對國族主義的話語都已經很熟悉了，她們對陸禮華說：「我們想要國家強盛，人民健康。」國族主義肯定促使她們選擇了這所學校，因為體育教育被看做是強種保國的關鍵所在。當然，這些年輕女子意識到了國族主義創造的工作機會，甚至小腳女人也渴望體育教師這份現代職業。雖然她們的身體已經被束縛，但國族主義激發了她們去創造一個嶄新的、有價值的人生的強烈願望，並使這種願望變得合理。

陸禮華19歲時興奮地目睹了五四運動的興起。自從孩提時代她就崇拜女英雄，她的成長歲月被辛亥革命中著名革命者的故事浸潤著。但是那時她呆在小鎮上的家族南貨店裏，遠離革命潮流，而正是在革命潮流中，一些年輕女子因自己的英勇事跡而聲名遠揚。當陸禮華成為一名上海女子體育學校的學生後，她突然發現自己處於歷史大

事件的中心，席捲全國的學生運動讓她感到「如魚得水」。她活力四射，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請願、遊行、演講、集會，等等。她曾經化裝成一個女傭，和其他幾個扮成貴婦的女學生一起到上海最大的百貨商場，要求經理在總罷工協議上簽字。<sup>34</sup>國人還不太習慣女人在公共場合做這些事情，因此人們都說她很大膽。不管人們說的「大膽」是什麼意思，陸禮華確實無所畏懼，繼續在公共場合喊口號：「要愛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她知道自己很大膽，但這種突破傳統規範的行為的背景是國族主義話語的有力支持。

五四事件為受過教育的青年女子提供了適時的機會，幫助她們打破性別隔離，創造了更大的社會空間。直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夕，小學以上的學校還實行男女分校，女學生被隔離起來。當北京大學的男學生代表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聯繫女學生聯合參與五四遊行時，女高師校方堅持「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他們把男女學生代表分別安排在禮堂的兩個對角，派一個學監來回在學生中間傳話。由於學生不能自由討論遊行的問題，女高師的女學生沒有參加五四遊行，但這是女學生最後一次被隔離。5月4日當晚，女高師的女生衝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辦公室，要求把她們也關進牢裏，和那些白天被捕的男學生關在一起。從那時起，北京的女學生，隨後是全國範圍的女學生，衝破了學校的男女界限，投身到五四運動中。這是受過教育的中國女子與男子並肩工作的社會自由的開端。<sup>35</sup>

對於上海這第一個開埠城市的女學生來說，打破男女界限相對容易。她們沒有任何社會壓力，立即參加到學生運動中去。上海學聯成立時，有12所女校加入，三位女老師、八位女學生以及一些男生一起當學聯的領導。陸禮華告訴我們，在學聯工作時，她被委以重任，並接待著名的演講者。當時社會對學生運動中的男女融合鼓掌歡迎，上海《時報》的一篇文章熱情洋溢地寫道：

上海學生聯合會由起初到現在，總是男女一同做事，會務進行得很快，外面也沒有一句閒話。可見受過教育的男女同在一塊兒

做事，是只有好處，沒有壞處的。現在外面要做的事很多，有的男子做得好，有的女子做得好。當這個時候，男子也不要輕視女子。女子也不要太客氣，假使能把男女的界限漸漸的化除，各盡各的責任，就是我國的進步。<sup>36</sup>

運動中的女學生也意識到了她們愛國活動中的性別維度，對她們而言，參與運動不僅意味著救國，也是為婦女爭取平等的地位。因此，她們堅持做男學生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被警察毆打和被逮捕。天津赴北京請願的女學生代表劉清揚與其他請願學生一起被捕時，因京師警察廳長和劉清揚都是回民，想立即把她釋放，但被她拒絕，說：「男女同為國民，理應與男界同受甘苦，即便死於廳內，我等亦甘心。」這位警察廳長派車把劉清揚的三兄請來勸她，劉清揚對其兄說：「我們女界此是初次在社會上作事，絕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即或死，我們亦死在頭裏。代表等從此一定要與我們全國女子作個榜樣，以免將來被男界之輕視。家兄雖來，想亦不願令我偷安於一時而作一女界萬世之罪人也。」<sup>37</sup>

五四運動之前的新文化女權主義者的鼓動，顯然提升了五四女學生的女權覺悟，並在五四學生運動中發展到一個新高度。和許多同代的女學生一樣，陸禮華意識到了五四運動中的新文化潮流。當她加入成立於1922年10月的女權運動同盟會和婦女參政同盟會這兩個婦女組織時，她了解到「女權」這個詞（女權主義或者婦女的權利）。許多大城市相繼成立女權主義組織，標誌著新文化女權主義達到了頂峰。

但是，1920年代早期大規模有組織的女權主義運動並沒有持續多久，許多人認為這次運動取得的效果甚微。本書第二章討論過，女權主義的男性倡導者認為婦女運動只是雷聲大雨點小，沒有達到什麼實際目的。陸禮華的敘述證實了這一點，即當時婦女組織的活動大都局限在演講和開會。然而，陸禮華又清晰地告訴我們，這些活動對於像陸禮華這樣的年輕女子是有意義的。陸禮華回憶起在年輕時經歷的壓迫和不公時，她提到了她的女權主義活動，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她

氣憤地說：「所以這個我常常也要問了：我說女性為啥要這樣被摧殘呢？但你和誰去講呢？所以只有說我們大家組織這個會，宣傳宣傳也好的。」發表演講和聲明對這些婦女來說是重要的。她們感到社會對婦女不公平，覺得有必要給她們灌輸新思想。開會是賦權的一種方式。那些在社會中孤身奮戰的女子，因這樣的會議而感到振奮和鼓舞，因為這些會議反復重申女權主義思想，並且聯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婦女。通過婦女自己為了婦女來傳播女權主義思想，1920年代早期的婦女組織為像陸禮華這樣的女子提供了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支持，這就是陸禮華積極加入上海各種婦女組織的原因。

當然，陸禮華加入婦女組織不僅是為了尋求心理上的安慰，更是在自覺追求婦女的平等權利。她親身經歷和見證了婦女所受的壓迫，用她的話說：「我就聽不得人家說侮辱女子，我就心裏氣呀！」她強調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女權和體育。她小心謹慎，既沒有加入國民黨，也沒有加入共產黨，但她願意加入為了婦女利益的任何組織。雖然她沒有用「女權主義者」這個詞來界定自己，但她就是一個女權主義者，一個追求女權的女子，這麼說似乎再合適不過。

事實上，陸禮華十分符合新文化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所塑造的婦女解放的典型。她受過中等教育，有自己的職業，獨立生活，自由擇偶和自由離婚，熱衷於社會活動。她當然是20世紀初中國的新女性。需要強調的是，1919年她在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浪潮中規劃自己未來的職業時，完全沒有因自己是女性而被約束。知道了像張謇和蔡元培這樣的男性領袖人物在領導著實業和教育後（這是中國當時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中的兩件），陸禮華決定關注第三件事情，即體育。她很輕鬆地做出了這個決定，當然也感到興奮，隨即就投身於這項事業。

我們不妨深入分析她強烈的自信。她之所以無視性別障礙，可以從兩個方面作出解釋。其一，當時的社會環境鼓勵年輕女子開創自己的事業，因為社會、文化、經濟的急遽變化拓展了新的地平線；二是，陸禮華一直想（或至少是希望）取得與男人一樣的成就，因為她從兒時起的榜樣就是花木蘭和其他巾幗英雄。

陸禮華的敘述和其他幾位受訪者的講述有一個共同點：在回憶人生中最有意義的事件時，她們都強調了年輕時候崇拜花木蘭。顯然，花木蘭是她們的榜樣，影響了她們的個人發展。換言之，陸禮華和其他中國20世紀初的新女性，最初受到的激勵來自於千百年來流傳於中國文化中的古代傳奇人物。畢竟，這種文化傳統對婦女的影響並非完全消極，精英文化和民間文學都謳歌頌揚花木蘭式的女英雄。這些讚美強調的是忠孝（木蘭從軍是為了代替她年邁體弱的父親），但沒人能忽略其中明顯的性別含義——女人能和男人一樣建立赫赫戰功。這些女英雄穿上男人的鎧甲，展現出比男人還要強的武藝，她們如男子般的英武行為非但不令人懼怕，更是得到包括男人在內的所有人的敬佩。只要是報國或盡孝，男女的界限就可以模糊。從這一點來說，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巾幗英雄」形象為女人跨越男女界限確立了一個特殊位置，或者說，想要跨越男女界限的女人可以嚮往做女英雄。不過，女人可以有這種渴望，但並非中國歷史上的每一位女子都有機會成為女英雄，而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則為20世紀初的眾多中國婦女提供了通過報效國家而成為女英雄的機會。陸禮華景仰的秋瑾就以這種方式成為近代第一位女英雄。五四運動爆發後，陸禮華知道她的時機來了。古代女英雄可說是20世紀新女性湧現的文化土壤。

不過，這些新女性和她們景仰的古代女英雄又有所不同。古代女英雄跨越男女界限是為了履行其對父母或者家庭的義務，並沒有試圖以女兒身進入政治和社會生活，僅是出於需要暫時扮演男性的角色。一旦完成了任務，她們就得體地回到以前的家庭角色。如《木蘭辭》所述，木蘭拒絕了皇上（他不知道木蘭的真實性別）許給的高官厚祿，回家過上了女人的生活。有意思的是，木蘭一回到熟悉的家，便立刻換上了女裝。在男性文人創造的木蘭角色中，這位征戰疆場的女英雄的舉止非常得體，她知道自已不能以女兒身出現在朝廷上。古代男子對巾幗英雄的表彰可以充滿溢美之詞，卻不會在男人的世界裏給她們留個永久位置。履行了男子的職責無助於女子與男子平權，那時的女英雄尚無「平權」這一概念。

20世紀的新女性也被邀請在愛國行動中跨越男女界限，但她們卻很不情願再跨回來。這些新女性熟悉西方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人權和男女平權的概念中找到了留在公共領域的新的正當理由。或者更準確地說，20世紀初的婦女加入國族主義事業就是為了打破男女界限。她們把自己與男子並肩作戰的能力看作是有資格成為現代國民的證據。從秋瑾開始，婦女活動家們一再強調這一點。從邏輯上說，一旦她們完成了自己的愛國任務，就期望能獲得真正的國民的待遇。

婦女參與辛亥革命的故事以及清朝覆滅後婦女參政組織的形成，彰顯了現代中國女英雄的群體湧現，<sup>38</sup>但她們擁抱的女權新思想與許多男性革命領導者所持的傳統性別期望相衝突。1912年1月，革命軍總部頒佈了一道命令，要求解散全國的女子作戰營。3月11日頒佈的臨時憲法沒有提到婦女參政權。意識到女子的軍事貢獻不再被需要，且不能再希冀男子為忠實的同盟者，女戰士和女救護隊立馬轉向了參政。1912年4月8日，五個婦女組織聯合在南京成立了女子參政同盟會，成員大約有兩百人，但是接二連三的挫折在等著她們。8月，袁世凱政府頒佈的議會選舉法案中，沒有賦予婦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月，新改組的國民黨在黨綱裏刪除了「男女平權」，這是對同盟會綱領的公然背叛。女子參政同盟會艱苦鏖戰，困難重重。最終，1913年1月，袁世凱政府內務部下令取締女子參政同盟會，並懸賞通緝會長唐群英。<sup>39</sup>

短暫的參政運動表明了有趣的幾點：其一，革命會激發過高的期望。參加辛亥革命的婦女相信，清朝的覆滅會使國家和婦女進入一個民主時代。秋瑾在1907年就義之前，已經堅定地擁抱男女平權，把推翻滿清作為實現平權的先決條件，雖然她沒有提出過革命後實現平權的具體方案。但到了1911年末，許多女革命者則奮力爭取參政的機會，並以此作為實現男女平權的第一步。在那些因革命改變了自己的人生的人的眼裏，革命的影響被誇大了。

其二，中國婦女參政運動是國際婦女參政運動的一部分，前者受到了後者的激勵和塑造。中國的婦女參政運動者們不僅熟悉國際婦女參政運動的發展，而且與其有著直接的聯繫。英國的婦女和政治社會聯盟為了婦女的投票權領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並於1912年3月給中國女子參政同盟會發來了一封電報。英國婦女參政運動者對中國婦女參政運動者的行動感到興奮，她們鼓勵中國的參政運動者們「為全世界的婦女們創造一個新紀元，成為一切文明國家的楷模」。<sup>40</sup> 國際婦女參政聯合會主席凱瑞·凱特(Carrie Chapman Catt)和其他兩位成員於1912年9月訪問了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每到一處都發表演講。為期一個月的考察被中國報紙公開報道，稱這些國際參政運動者「受到中國婦女的廣泛歡迎」<sup>41</sup>。因為中國婦女了解到西方民主國家的婦女是長期進行參政鬥爭，也因為她們被勇敢的、堅持不懈的國際參政運動者榜樣所打動，因此中國現代女英雄在中華民國一成立就大膽地要求平等的政治權利。在新憲法起草之時，許多激進的參政運動者認為，向國會施壓要求其接受婦女參政是一個必要且緊迫的策略。然而，即使汲取了國際參政運動的經驗，中國的婦女參政運動也不可能超越其社會政治背景。帝國崩塌後的激烈權爭導致軍閥的崛起和政治勢力的重組，那些忙於政治洗牌的政客根本無暇關注婦女選舉權。女權主義此刻尚處於中國知識和政治話語的邊緣，人數不多的婦女參政運動者面對著太多強大的敵手，無法在這一目標上有所進取。

其三，這些婦女參政運動者們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但是她們標誌著新女性的出現——這些現代女英雄要求在公共領域內擁有合法的空間。為了實現獨立，許多婦女參政者全身心投入到了事業中，辦學校、醫院、公司，即使參政運動失敗了，挑戰性別藩籬的鬥爭仍在繼續。第一代現代女英雄的奮鬥榜樣，使得陸禮華這代青年婦女能夠自信從容地投身職業。在陸禮華的敘述中，顯然可以看出，她很清楚這些早期女權主義者做出的貢獻。她強調說：「辛亥革命之後有幾個女權的，照我現在看來，歷史上應該表揚她們。」在她孩童時期這些女權主義者就是她的楷模。



與1912年婦女參政運動者們的微弱聲音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文化女權主義話語吸引了大量的聽眾——迅速擴大的女學生群體，女權成為了當時的熱點話題。有組織的女權運動的高漲持續時間不長，與參政運動的全盛期一樣時間短暫。這一次，婦女消除性別藩籬的集體努力沒有受到軍閥政府的鎮壓，而是被一股新興政治力量所收編，即國民黨與新成立的共產黨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不過在婦女的女權主義關切轉移到國族主義話語後，許多女權主義活動家如陸禮華等仍然在不同的位置上繼續鬥爭。陸禮華這樣總結了她的一生：「我的工作一天到晚都沉浸在這個裏面，為女權、為體育，這個女權是我終身的事業。」雖然她參與的1920年代有組織的女權主義運動時間不長，但她顯然並不認為自己為女權的鬥爭僅限於那個短暫的全國範圍的組織活動。事實上，陸禮華的一生表明，像她這樣的女性主要是通過投身個人事業而不是有組織的婦女運動來追求女權主義事業。陸禮華致力於女子體育集中體現了新女性以個人努力的方式來衝破性別藩籬。總之，新文化自由女權主義話語構建了一種新的女性主體性，即使當有組織的女權主義運動在變化的政治環境中衰落時，這種主體性仍然延續著其生命力。

即便如此，新女性反對性別壓迫的個人鬥爭依然是充滿艱難困苦，時常受著痛苦的煎熬。陸禮華強調：「我在舊社會一辦學的時候就感受到女性的苦惱。」陸禮華經歷的痛苦生動地表明了新女性所處的困境。她們想要獨立，但必須面對舊文化規範，社會文化還沒有準備好在公共空間接納獨立女性。她們進入了男人的世界，要做事就必須向有權有勢的男人尋求支持。因此，任何事業成功的女人都會遭受人們的誹謗，被認為是為了達到目的而向男人出賣了色相。被辱罵為水性楊花是對中國女人最嚴重的打擊，在這方面，即使新女性也遠沒有獲得性解放，如陸禮華所言：「名聲敗壞了是最沉重的打擊。」在我的採訪中，陸禮華沒有明說她遭到性方面的誹謗。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仍然是令人痛苦的、不堪提及的往事。但另一位受訪者告訴我，她

在1920和30年代聽到關於陸禮華的一些流言蜚語，比如說她為了獲得學校資助與男人跳舞、說她結婚前就和另外兩個男人睡過覺，或說她婚前與其他男人的關係讓她丈夫痛苦不堪，害得他結婚後不久就去世了。

這些流言蜚語，和陸禮華對其以及對自己性生活的態度，都生動反映了1920到30年代上海的性標準。新文化人士集中攻擊傳統性道德，並努力提倡自由戀愛、結婚、離婚的新觀念，使陸禮華那一代婦女顯然在與男人社交、擇偶、離婚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根據陸禮華的敘述，她一生與兩個男人結婚，一個男人同居。但關於她的流言表明，即使女人可以離婚再婚，公眾對此還是持負面態度，對婚外性關係也持否定態度。陸禮華自己也接受和內化了這些令她備感壓抑的觀念。第一次訪談中，她只提到了她的第二次婚姻；在續訪中，她才談到了她人生中的另外兩個男人，還強調說明：「在人家眼中，這不是什麼好事。」

顯然，新文化遠遠沒有摧毀雙重性道德標準。陸禮華憤憤不平地說：「這個女子離過一次婚後，再一次結婚，就不得了了！那就批評得不得了。但是男子就不是這樣，男子你三次四次結婚都沒關係的。」傳統的貞操觀念仍然被信奉為女人的最高美德，嚴重阻礙了新女性的社會進步。職業婦女不得不在時時刻刻盯著她們的大眾目光中生活。受到新文化女權主義的熏陶，新女性相信她們有離婚的自由和求愛的自由，但是一旦她們實踐這些自由，公眾就會譴責她們不道德。所以新女性依然受到傳統性道德的評判。如果她們不符合良家婦女的標準，那麼她們的名譽就會受損，最終會危及她們的事業。陸禮華證實，許多婦女在事業上半途而廢，就是因為她們不能忍受這一「最沉重的打擊」，可想而知，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男女平等新觀念與性壓迫的舊現實之間的衝突，給新女性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緊張和壓力。

雖然新女性通往男性世界的道路是條佈滿地雷的坎坷之途，職業婦女與男人的關係隨時會成為爆炸性的社會醜聞，但是陸禮華始終堅

持著自己的事業。她成為上海著名的職業婦女，這意味著她和男人打交道非常成功。沒有強有力的社會關係，任何人——無論女人還是男人——要取得她那樣的成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她學校的董事都是有錢有權的男人：潘公展曾任《申報》主編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張公權、錢新之和陳光甫這三位都是上海顯赫的銀行家。<sup>42</sup> 這些關係使她在1949年後受到共產黨的懷疑，但是她有能力運用強大社會關係並不意味著她本人也有權勢。共產黨把她趕出自己的學校後，她痛苦地意識到自己不過是個孤零零的女性。當然，她與國民黨的關係在變遷的政治環境中也置她於不利的境地。即使她與共產黨有些關係（比如她曾與鄧穎超關係密切），但是否因此能保住她的學校仍然是個疑問，取代她校長位置的是全國人大一位大人物的妻子。所以她心酸地說：「假設我後面有個老闆，或者是有人支撐我的，也不會到這個地步呀！」她沒有大權在握的丈夫和父親，這意味著她沒辦法進入男性主導的、能改善她處境的權力結構。

儘管如此，像陸禮華這樣的職業婦女在1949年前的社會轉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創建了女子籃球隊，並帶隊前往日本和東南亞比賽；她籌資創辦了兩江女子體育師範學校，被譽為「遠東最好的體校」；她頂著輿論壓力把女子運動服的長袖和燈籠褲改成翻領短袖和短褲，由此改變了公眾認為女子運動服「有傷風化」的看法。她強調她一直相信「外國人有什麼，我們也要有什麼」。這句話聽起來非常像1990年代的流行話語，她對迅速接受西方事物的自豪也反映了1990年代中國的普遍態度。不過作為女子體育推動者，她的經歷確實是充滿了有意模仿西方樣式的例子。畢竟，將體育作為女校必修課以及允許女子參加西式體育運動，都是被視為學習西方模式的現代現象。因此，陸禮華的人生故事與中國的現代性密不可分，她向我們呈現了這樣一幅圖景：在改變中國婦女的行為準則方面，在以社會實踐傳播現代觀念方面，像陸禮華這樣的女子引領了時代的潮流。通過效仿西方模式，陸禮華和她同代的職業婦女的成就超越了國族主義者強國夢的

期待。在急遽變化的城市社會中，她們為其他婦女和她們自己開拓了新的社會位置，並在西化的大城市中確立了自己的精英地位。

陸禮華在1930年代救亡運動中的作用也體現了她那一代職業婦女所扮演的另一個角色。在上海和其他大城市，許多職業婦女為了救國而自發地組織起來，在動員抗戰資源方面所發揮的積極而重要的作用表明，職業婦女在1930年代已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群體。除了表達愛國熱情外，她們廣泛的努力和成就展示了她們對自己的能力和社會地位的自信。

反諷的是，雖然政府聲稱1949年後中國婦女都得到了解放，像陸禮華這樣有才華、有能力的婦女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卻找不到位置了。在民國時期，陸禮華這一代受過教育的婦女追求進步的步伐遭到保守勢力阻擋，但仍能為自己開拓社會空間。相比而言，在毛澤東時代，雖然婦女更容易獲得平等教育和職業機會，但主動組織活動來維護婦女權益的自由卻大為削弱。陸禮華在訪談最後的評論很有深意，作為一位94歲的老太太和曾經的傑出婦女活動家，她清楚地意識到，雖然「婦女能頂半邊天」（毛澤東名言），但婦女自發組織的活動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幾乎沒有存在的空間。在婦聯這個代表婦女利益的官方機構成立後，毛澤東時代的婦女就難以超越婦聯確定的議程，希望有所行動的婦女的唯一選擇就是與黨的路線保持一致。陸禮華的經歷有助於我們看清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解放的悖論。隨著共產黨內的女權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的婦女解放路線的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婦女成功地進入了公共領域，獲得了經濟獨立。雖然男女平等的國策（反映了大部分五四女權主義的議題）提高了婦女，尤其是城市婦女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但相比陸禮華那一代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和開拓自己所追求的發展道路，當代中國婦女並沒有太多的自主和自由。在黨的理論中，婦女的利益應該由社會主義國家來代表，但更準確地說，婦女的利益是由黨和國家所界定的，這個角色在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承擔起來了。無所不在的國家管控限制了男女的主動創造性，而正是這

種主動創造性才使陸禮華這樣的五四女性能在20世紀上半葉發揮改變歷史的積極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早期婦女運動的蓬勃態勢可以歸功於民國政府的軟弱。

## 注釋

- 1 以下敘述是在1993年3月、1994年12月、1995年1月這三次訪談的基礎上形成的。
- 2 在20世紀初，青浦縣屬於江蘇省，1958年劃歸上海。
- 3 即主要售南方地區產的食品、工藝品和土特產的商店，過往一般特指食品店。
- 4 即銅質小額貨幣。
- 5 即銅質硬幣。泛指金錢。
- 6 即銀元。
- 7 張謇(1853–1926)是一位企業家，他在世紀之交創辦了許多企業，並在辛亥革命後被任命為臨時政府實業部部長。見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辭書出版社，1980)，頁1086。
- 8 陸禮華提及自己年齡時用的是虛歲。
- 9 于右任(1879–1964)是中國同盟會的早期成員。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後，他被任命為交通部次長。1922年，他和其他國民黨成員創辦了上海大學，並任校長。1924年，他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於1947年擔任檢察院檢察長。
- 10 沈雁冰在自傳裏曾經詳述過五四運動期間的薪水。1916年，他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當一個編譯，作為一個新人他的薪水是每個月24塊大洋。五個月後，漲到了30塊。一年後，他存下了200多塊大洋。1919年，由於他的高效率，他的薪水漲到了每月50塊，其他同事要工作十年才能達到這個收入水平。沈雁冰還為其他幾家雜誌和報社供稿，這樣每月他還有40塊的額外收入。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和日漸出名的作家，沈雁冰一個月收入約90塊大洋。同一時期，作為一個年輕的女體育教師，陸禮華一個月賺100塊大洋，這個收入確實很高。參見茅盾，《我走過的道路》(香港三聯書店，1981)，頁100、129。
- 11 日本軍隊在1932年1月28日進攻了上海閘北，中國十九路軍在上海堅持抗戰一個多月。

- 12 日本女運動員首次在奧運會得獎是在1928年於阿姆斯特丹舉行的夏季奧運會，人見絹枝獲得了800米跑銀牌，不是金牌。但她在其後的國際錦標賽中獲得冠軍。
- 13 劉長春是首位參加奧運會的中國運動員。1932年他「單刀赴會」前往洛杉磯參加奧運會田徑賽，未得名次，但畢竟是「零」的突破：中國運動員首次站上奧運會賽場。半個多世紀後陸禮華依然記得這個歷史事件。
- 14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日軍於8月13日進攻上海，史稱淞滬會戰或八一三戰役。
- 15 婦女慰勞會是戰爭時期上海婦女的聯合組織，負責動員各階層婦女參與募捐、救護和前線勞軍等。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加入進來。宋美齡是全國慰勞會的主席。上海分會的第一任主席是何香凝。陸禮華負責募集資金和捐贈。關於慰勞會的更多情況，請參見第五章。
- 16 這裏，陸禮華的記憶並不準確。鄧穎超來上海邀請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到北京是1949年6月，而不是抗日戰爭期間。不過在這之前，鄧穎超多次到過上海，並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顯然陸禮華在1920和30年代都在上海遇到過鄧穎超。1949年，鄧穎超是以共產黨領導人的身分來上海，逗留期間會見了上海知名的婦女活動家。從這個意義上說，出席鄧穎超在場的那些會議是身分地位高的體現。據此我們可以斷定，直到1949年陸禮華還在上海知名婦女之列。
- 17 估計因為我的海外身分，陸禮華和我談她的私人生活時顧慮較少。在我訪問她之後，她接受了另一位國內學者周美珍的採訪，僅講述了第一次婚姻，並叮囑周「永遠不公開」這個部分。陸禮華沒有向我提這個要求，我才能向讀者展示她在人生中所經歷的多方面的挑戰和磨難。
- 18 中華教育改進社於1921年12月23日由新教育共進社、新教育雜誌社、實際教育調查社三者合併而成。蔡元培等九人為董事，陶行知為總幹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教育社團。
- 19 此處陸禮華提到的「一二八戰爭」，指的是1932年1月28日至3月3日中國軍隊對抗侵略華日軍進犯上海的作戰，也稱「淞滬抗戰」、「一二八事變」。
- 20 陸禮華的意思是她基本沒有性生活。
- 21 陸禮華講的這種關係在戰爭期間很普遍。背井離鄉的男男女女，在他鄉同居，有的是合法婚姻，有的不是。對於女性來說，這種關係有個特殊的詞語，叫「抗戰夫人」。這種關係一般發生在一個結婚男人和一個單身女人之間。進一步討論見第六章。
- 22 周谷城在全國人大任要職。

- 23 1920年代初期上海的這兩個女權組織，主要是由在美國或日本接受過教育的職業婦女領導。她們中有幾位加入了西方基督教女青年會和基督教婦女節制會。與此不同，北京的這兩個組織由大學生領導。
- 24 康同璧(1889–1969)是《女學報》的女編輯和主要撰稿人之一，這本雜誌創辦於1898年，是中國第一份婦女雜誌。由於與晚清改良派關係密切，百日維新被鎮壓，《女學報》也就沒辦多久便倒了。康同璧一直活躍於上海的各種婦女組織。張竹君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女醫生和女權活動家，畢業於廣州的教會學校。她在廣州創辦了醫院和女子學校。1904年，她去了上海，隨後幾年又在上海開了幾家醫院。作為同盟會的早期成員，她在辛亥革命時組建了赤十字會，為傷員提供救治。
- 25 陸禮華指的是1924年12月20日成立的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聯合了上海21個婦女團體，要求婦女的參政權。該會主席是婦女節制會負責人劉王立明，中共婦女部部長向警予在成立會上發言。這次聲勢浩大的女權聯合行動的大背景是國共合作推動的國民會議運動，向警予是中共方面對這項聯合行動的領導者。參見第二章。
- 26 自尊、自立、自信和自強是婦聯對中國婦女提出的要求。陸禮華對現在婦聯的口號很熟悉，而且含蓄地批評了官方組織的議程。
- 27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34。
- 28 沈智，《婦女解放史問答》(浙江出版社，1986)，頁28。
- 29 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啟〉，《時務報》，第45期(1897)，頁283–285。
- 30 羅蘇文，〈中國第一所自辦女校〉，《社會科學》(上海)，第2期(1988)，頁144–146；沈智，《婦女解放史問答》，頁28–31。
- 31 〈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章程附〉，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頁982。
- 32 同上注，頁976–977。
- 33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36–39。
- 34 上海市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頁51。
- 35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71–72。
- 36 見玉，〈男女一同做事〉，《時報》，1919年10月14日，頁10。
- 37 〈劉清揚之百折不回〉，《天津益世報》，1919年8月29日，頁3。關於劉清揚生活的更多細節，參見Vera Schwarcz (舒衡哲),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說明事實真相的時間已過)(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8 根據一份調查，辛亥革命有超過380位婦女活動家的名字被記載下來，當中包括1911年後為了婦女參政而奮鬥的婦女。參見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

討論會著、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頁2019。

- 39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54-58；上海市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頁31；Croll,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Ch. 3。
- 40 王家儉，〈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頁550。
- 41 同上注，頁598。國際與中國參政運動的領袖會面被一張合影記錄下來。即使中國的參政運動遭到了鎮壓，中國的參政運動者還繼續參與了國際參政運動。1913年國際婦女參政聯合會在布達佩斯的一張照片顯示，在凱特主持會議的台上，旁邊有個寫著「同心共濟」的漢字條幅。這兩張圖片都收錄在Adele Schreiber and Margaret Mathieson, *Journey Towards Freedom: Written for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自由之旅：紀念國際婦女聯合會五十週年）(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1955)。
- 42 陸禮華在《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中的自傳提到了這三位銀行家，見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編，《上海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頁144；潘公展則是她外甥在場的一次訪談時提到的，由於潘曾任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要職，顯然陸禮華不想在自傳中提到他。





# 5

朱素萼 (1901-2001)

——  
律師

“ 法律讀了做啥？保護女權，伸張女權……看到舊社會丈夫壓迫妻子，我是不服貼的，就覺得封建要推翻。 ”



朱素萼，1933、1995

朱素萼歡迎我來到她舒適的家，她已經在這裏住了六十年。她個子矮小但嗓門很大，儘管已經94歲高齡了，說話卻是與眾不同而且富於雄辯。她思維敏捷，頭腦清晰，在盛年時一定是位出色的律師。除了這些顯著的特點，她的樂觀豁達也讓我驚嘆。面對因荒誕造成的人生苦難，她依然能放聲大笑。<sup>1</sup>

## ■ 自述

我並非書香門第出身，我父親可以說是個金融家，是錢莊的經理。我的籍貫現在是叫常州市，過去是武進縣。我媽媽識字不多，我都是私塾先生教的，他是個舉人。<sup>2</sup>我父親蠻開通的，覺得男小囡女小囡都應該識字。我上頭還有兩個阿姐，都讀書的。我出生於1901年，兄弟姐妹一共有八個，我老三，老四老五是弟弟，老六的妹妹和老七老八的弟弟，都出國了。只有我一個女小囡讀大學的。有兩個弟弟讀到高中就工作了，一個大弟弟和我一樣，也讀法律，也是律師，在上海的。頂小的小弟弟是美國留學生，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做翻譯，高級職員。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在1930年代去了印尼，在那裏辦學校；二姐比我大兩歲，畢業於常州女子師範學校。

小的時候，大阿姐沒用，忠厚，包腳就包了。二姐也纏了，但不曾纏得像樣，還算好。我這個老三不是東西，自己曉得不是東西——你日裏纏好了，不響的，夜裏躲在被子裏面給你拆得乾乾淨淨，拆光。我母親沒主意了，就給你把鞋子做得老緊老緊，緊得鞋沿都崩豁開了，豁就豁吧，要不小學上體操課痛也要痛死啦！我體操很好的。上肢運動、下肢運動，都做得好。緊的鞋子脹豁開了麼，我就鞋皮給它拖著。所以我的腳是天然足。記得我13歲的時候，母親講了一句：「讓儂去！不肯包小腳，將來嫁不脫！」我說：「嫁不脫就嫁不脫！我不吃儂的飯！我自己去生產，我自己養自己！」

我父親也是法律畢業的，從前有個專科的，講習所畢業，我看過一張文憑。所以雖然他經商，但是他非常開通。我們小一點點的時候，就拉著我們去開學去了。那個時候沒有學堂的，只有私立學堂。我的家鄉有兩個私立學堂，一個是老處女辦的；一個是認識他的朋友辦的，是個舉人。他還不曾考進士，就設個學館、招學生，那時女小囡男小囡都招的。我父親因為他是舉人，〔覺得他〕不錯的、有學問的，就把我二姐和我兩姊妹還有兩個弟弟，四個人一道送去開學。上面兩個進小學，兩個弟弟進蒙養院，私人辦的，從前不叫托兒所、幼兒園。我二姐和我只差兩歲，我那時大概七八歲。大阿姐已經在讀書了。那個時候開學是這樣的，舊社會屋裏廂（家裏）是有傭人的，不像現在鐘點工只用兩個鐘頭，傭人是從早到晚在家的，有的是男傭人，有的是女傭人。從前是帶了一個錫的大茶壺，一茶壺糖茶和一條紅毯子兩樣東西，傭人跟在後面，送我們去開學。牆壁上掛個孔夫子像，先去給孔夫子跪下來磕頭，孔夫子磕好了頭，再去給先生師母磕頭。磕好頭後再去拿糖茶敬這個先去的同學，小朋友吃了糖茶，大家就和和氣氣不吵相罵了。我們和男小囡一起讀四書五經，《論語》、《孟子》私塾裏都讀過了。

讀了一年多以後，聽說那個三十多歲的老處女辦了一所女校，父親就把我們女小囡拖出來送到了女老師那裏了。後來大概到了民國時候，武進縣立女子師範學校成立了，是政府辦的。所以我說我父親好，別人家家庭封建，不許去的，說：「洋學堂（西式學校），小囡要學壞的。」我父親聽說縣裏辦學堂了，快點把我倆姊妹送進去。大姐在另外一個學堂。這個學校一開門就馬上叫我們去考試，我們就去考試。這個學校的學制是這樣的：小學一年級到四年級，叫初小；高小是高一、高二、高三；高三讀好，馬上直升師範預科一年，一年讀好讀師範本科四年。我和阿姐一起去考，那時做的是嵌字，比方說，「草木」後頭有兩個圈圈要填，我記得我填的是「草木美人」。考取了，我們倆都錄取了二年級，就一道插班讀。

我們小學裏就讀過《木蘭辭》，初中的課本也有的，我還記得的。木蘭是巾幗英雄，女兒代父從軍，因為父親年紀老了，兄弟還小。既是孝又是英勇，這是了不起的事情。裝了男小因去從軍的呀，她到回來才改女裝的呀！所以同道一嚇（大家都嚇一跳）了：他怎麼變成個女人啦？所以我們從小反動的：木蘭可以從軍，那麼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啥體（怎麼）不好做啊？小腦子裏是這樣想的。好改男裝的呀。稱得巾幗英雄的木蘭是第一個。那麼參加革命的麼，是清朝的秋瑾。我們讀書都讀到了，〔關於〕秋瑾的書也不曉得讀了多少了。我書讀得很多，要看各人的求知慾。

讀到三年級就開始讀英文，從前我們的英文很深的，讀到初小四年級已經蠻好了。英文老師是個女老師，外國人，教得很好，這種大概是傳教士。我們那時候傳教士蠻多的，我的舅舅、舅媽、姑舅、表兄妹現在都在美國，統統都是神父帶出去的。我的一個教國文的老師，是抱牌成親的：從前封建得不得了，她給了一個男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親訂好了，結婚還不曾結婚的，男的就死掉了；男家要討回去，女家只好嫁出去，抱著一塊牌子，叫做抱牌成親。這個抱牌成親的老師非常之好，語文好得不得了，一肚皮才學。從前舊式女子，琴棋書畫大家閨秀都會的，她也是大家閨秀，這樣子就到學校裏教書。她姓任，責任的任，我們叫她任老師，她的脾氣乖僻得不得了。我印象很深，她戴副眼鏡，兇得不得了，真像寡婦面孔。我腦子裏就覺得她可憐相，就有同情心的；她儘管兇，我老聽話的，所以她也蠻喜歡我的。就是這樣的人教我們語文。還有個圖畫先生也是，年紀輕輕守寡。多數是這種情況。

女子師範的學生一級裏有二三十個。學生家庭都不錯，上代都來自書香門第，最小的是知縣，還有知府，再高級的也有，有七品的縣長，四品官都有的。小時候同學道（一起）裏去白相（玩）去，都是很大的房子，前門到後門一進一進的都有十三進啦，不像現在前門到後門就一進。都是大花園，我們放了學夾著書包，穿來穿去白相，到大

花園裏，還有亭台樓閣都是很好白相。全是很好的家庭。像我這樣的和她們一起去讀書，不容易的，所以我認為父親非常好，開通。我媽媽也很好的，非常賢德。媽媽主持家務，主張我們讀書都是父親做決定。我外公家也是很開通的。我們常州這個地方舉人進士很多，進士、狀元、秀才是沒啥稀奇的。<sup>3</sup> 所以人才很多，我小時候的同學都出自大牆門，這批人都是書香後代，所以出來不是參加國民黨就是參加共產黨。我到後來才曉得一個姓瞿的，瞿秋白是革命老前輩。<sup>4</sup> 他的妹妹就是我小學同學。

我二姐是從師範畢業的，上了12年學，相當於高中畢業。她和史良是同學。<sup>5</sup> 但我沒能畢業，後來母親生病了，血崩。屋裏有傭人，但是不放心，要留個女兒在身邊。傭人要照顧病人，又要照顧廚房間，還要送兩個兄弟去蒙養院。當初我和阿姐在讀書，都是傭人送飯的，一送四個人的飯了。這樣就叫二阿姐留下來，她不肯，她要繼續讀上去。沒辦法，我這個小妹吃癩，把我留下來。媽媽說歡喜我，聽話，我小麼，好差使囉。所以爺娘喜歡小孩子也不是好事情，喜歡我就留我在身邊。我停學幾年了，心裏覺得不開心。我不是光陪陪母親，我還看父親的書。大伏天家裏書箱都要翻出來，叫我放到天井裏去曬曬。父親叫我曬書，書都是他的，看麼不許我看的，我就偷看，他不曉得的。看到喜歡的，就拿一本夜裏在帳子裏電燈一開，偷偷看書，今天看這本，明天看那本。十三四歲時，我舊小說都看完了：《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鏡花緣》、《儒林外史》等等。從前在被頭裏看書看得枕頭都哭濕掉了。翻譯書倒是極少，那個時候翻譯書在內地很少。

我二姐可以讀上去，叫我留在屋裏陪媽媽，我覺得是欺負我，氣死了，火很大。後來教導主任，教國文的，寫信來通知家長，問這個學期開學這麼長時間了，怎麼還不來？這是刺激我神經的，二姐偷偷把信交給母親，母親把信藏在床頭，我翻床翻出來，看到了，我對母親哭了。哭了之後我動腦筋了。後來母親好點，隔了一年，學生運動

了。我想我要逃走了，不再呆這兒了。五四運動之後，受了新文化的影響，我就想我不讀〔這些舊書〕了。他們叫我蹲在家裏陪母親，我到外頭去讀去！我這個思想有點反動思想，反對家庭這種情況。我怎麼反對呢？「阿姐大了，倒繼續讀下去，不留下來照顧母親，我小倒擺在屋裏廂，小麼應當讀下去，怎麼陪母親啊？」我想想不對。我要到上海來讀書，住讀。於是，我到了上海，進了愛國女中。我二姐從師範畢業，留校當了老師，她成績好。我們那時讀書成績都很好的。她後來在一所義務教育學校做校長，所以一直沒出來（離開常州）。她結婚以後連著生了六個小囡，就在屋裏廂照顧小囡了。我大阿姐喜歡刺繡，後來進了刺繡專科學校。在抗戰期間，我們全家都逃到上海來。我常州沒有根了。



我的思想和別人兩樣點，有點倔強的。我看我親戚朋友中間都是男人壓迫婦女：都是丈夫壓迫妻子，拉著頭髮來打，外頭另外去弄女人，不回家，不是去賭就是吃鴉片煙。我母親的兩個妹妹，嫁的都很好的人家，四扇的大牆門，門口還有石獅子。那是有官銜的，狀元門口有石獅子，探花和榜眼門口不能有石獅子，門口是盤大石，再下頭的是長方形的石頭，<sup>6</sup>這三種不同的石頭，都是大牆門。我這兩個姨父賭銅鈔的賭銅鈔，吃鴉片煙的吃鴉片煙，外頭去弄女人，兩個姨母老是哭，回來對我母親大阿姐哭訴。我母親是有我父親好，規規矩矩，做人迭角四方（方方正正）。一張方枰子，我們吃好了飯，櫈子都要塞進去的，塞得歪一點點角，父親擺擺端正。我兩隻眼睛看著就懂了。我父親從小就教育我的兄弟，對我們女小囡比較寬，他說：「只有規矩才成方圓。要有規矩，才會得方是方，圓是圓。」我們從小聽慣了的。我看到姨母的情況，我想怎麼女人家不是人啊？都要受壓迫的？從滿清封建下來的這樣的制度，那女人也是人囉。我哭了之後就這樣的想法：「不對！做啥要被人家欺負？」所以我出來考了法律，法律讀了做啥？保護女權，伸張女權的。

五四運動的時候我是還不懂啥的。我的阿姐和史良比我高一級，她們出去演講去，她們人不高，搬了張長櫓，放在街道上，我記得我阿姐和史良站在長櫓上演講的。五四運動時我還沒有到上海來了，還在家鄉。那個時候只有學生到馬路上去宣傳演講，沒有其他別樣的活動。五四運動後最重要的是新文化運動，不是揸著大旗乒鈴乓啷敲銅鼓，主要是文字上的改革。過去清朝的舊的制度，一切封建的，要改革，著重在這個上頭。「女權」這個思想是五四運動以後看書看得來的，我總歸是看了新時代的雜誌，啥個名稱我也不記得了。

五四運動之後主要是新文化革命，倒不是婦女運動革命。所以新的思想灌輸進去了，曉得女權了，從這個開始麼，不要別人來左右我的。把我藏在屋裏，侍奉母親，我已經這麼多年盡義務盡好了。阿姐師範畢業了，我師範不曾畢業，只有讀到高小。我到外頭去讀，你們管不著我了。那些報紙雜誌讓我覺得常州這個小地方，範圍太小，要出去看看大世面，上海總歸有啥英租界、法租界，去見見世面，到上海去讀書。1919年秋天我一個人到上海來了。

起先父母倒是供給我的，母親喜歡我的。我記得我帶了兩百塊出來，我一個學期一百多塊吃住都夠了，車馬費都有了。我自己報名、考試。到了上海先到一個表妹屋裏住幾天停停腳，參加考試。我小學中英文都不差的，愛國女中錄取了。我回去再卷了鋪蓋到學堂裏去住宿了。我記得用隻大網籃還有被頭鋪蓋，坐火車。從前火車好，有人提的，替你送上車子。火車下來喊部黃包車，前頭是網籃，後頭擺個鋪蓋，噠噠噠給你送到學堂裏。到了學堂裏有校友的，他們幫你搬到宿舍裏。從愛國女中畢業後，我停了一年，做啥呢？當初我預備去讀書畫的，預備到蘇州滄浪亭去讀藝術學校，學了一年。我歡喜書畫的。後來看到畫家全是窮癩三（乞丐），都是潦倒不堪的。從前的書畫家不像現在，身價不高的。我想這個做終身職業不對，就動腦筋快點回來。老早的思想是啥，經濟不能獨立，要依賴別人。從前我不想找朋友結婚，這種年齡不想了，就想自己獨立。我沒有看中的，男同學



都不及我，我八九十幾分，他們只有七十幾分，有的剛剛及格。所以那個辰光（時候）動也不動那個腦筋，後來就想讀法律，做律師，經濟獨立。

後來我去考大學，就是上海法政大學，開始叫法科大學，鄭毓秀曾做過校長，<sup>7</sup> 後來改名上海法學院，專科讀了三年，後來又轉本科再讀一年。那個時候只有少數幾個女學生，我班裏有一個女同學是教我們破產法的彭先生的女兒，她叫彭慶修；<sup>8</sup> 還有一個是上海中西藥房老闆的女兒，她的名字叫周文璣；還有一個叫尹進，一個叫杜玉英，松江人，畢業後到松江去做律師了。包括我在內，我們班有五個女生，我這個班算多的了，別的班只有一個，頂多兩個女同學。我進去時不是第一批女同學，比我前幾年畢業的是誰啊，又是大好老（大人物），所以我叫是隱居的，<sup>9</sup> 比我早兩屆畢業的就是史良。還有錢劍秋也比我早畢業的，<sup>10</sup> 錢劍秋曉得伐？就是婦女運動和我一道做的，也是我法學院前幾屆的校友。我是第三屆還是第四屆，開業女律師我好像是第二批了。我認為我讀法律總不錯的，法律有條文的，可以保護人權的。我腦子裏是有刺激，就是看到舊社會丈夫壓迫妻子，我是不服貼的，就覺得封建要推翻；我沒有力量推翻國家政府，家庭裏男權要超過女權，不得平等，這個總可以改革的，拉上來這婦女，我只有這一點點想法，大的想法不曉得。只曉得讀了法律好做律師，做了律師，要是〔有人〕侵犯了女權好去辯護。我想你要是受了欺負，我替你講話，我根據法律的條文，我有資格講講話。我只曉得這樣想法，要保護女權，你男人家打了婦女，我們婦女也要出來講講話的。

學校裏有很多書和新的雜誌，我都看的。我是優等生，我的作文牆壁上經常貼出來的，一級裏面有幾個人是貼出來的？全校都沒有幾個人。所以我現在懊惱不應該做律師，我就應當做作家；做作家的話，1949年解放之後我就呆在家裏著書好了，我可以出許多書的了。我的書讀錯掉了。當時我只是想，就為了伸張女權，去做律師的。不曾想律師做的時間太短，只做到1949年。



我是1930年畢業的。我班裏的女同學當中，尹進和同班同學結婚，丈夫做律師的。周文璣好像到了杭州去做法官，彭慶修也是和同學結婚，丈夫是律師，她自己沒做。做律師的只有杜玉英和我，她去了松江做律師，我麼在上海做律師，加入了上海律師公會，我們工會裏有一千多個律師的呢。我各種案子一概都接的，不管男的女的。不過我啊，求上門的都是女的多數。都是因為受了欺負、受了壓迫，連北京的都有到上海來找我的。有一個北京監查委員的媳婦到上海來找我，公婆欺負她，丈夫壓迫她，哭訴到我門上來，找我寫信，最後這個案子我和解掉的，那是剛剛抗戰開始的時候。

我是畢業以後結婚的，先生是醫生，在新加坡留學回來，同事介紹的，結婚的時候有30歲了，算晚的。我們在讀書的時候是兩樣的，多數是晚結婚的。有了知識這人啊和無知識的人兩樣的，不給父母做主的——你攀親，我們會逃婚的，有這點本事的。我二姐也逃婚，但不曾逃成功。名譽不好聽，吃痛。從前做媒人都是瞞來瞞去的，這個姐夫是在北京，看了個照片沒看著人；後來看到了人了，二姐不滿意他了，爺娘也懊惱了，懊惱了麼我父親光火拍枱子：「到衙門去抬人！」<sup>11</sup>那麼後來媒人來勸了：「名譽難聽的，影響起來總歸是女小囡吃虧。」只好花轎子抬了去了。我小腦子裏也是刺激，所以我是遲婚。揀揀看，慢慢交，我同學多著呢。那個時候學堂裏面女同學只有幾個，寥寥無幾，男同學啦朝你笑笑，過一歇枱板（桌板）裏給你插一封信在那兒，你去睬伊嗎？不睬的。馬路上跑跑，你也等車子我也等車子，明朝來一封信，你睬嗎？不睬的。男同學寫信蠻多的，我都不睬的，很乖的。這種都是要看各人本身，所以我是遲婚。我男女同學裏一對一對結婚蠻多的，像彭慶修和尹進，後來離婚了。

我在屋裏的時候，父母在給兩個阿姐說媒，還輪不到我。後來我反著出去到上海，爺娘管不著我了。不好管我了，管我也不聽了。我扳差頭（找碴責難對方）的呀。「噢，二阿姐讀上去，啊有啥叫小的

停下來啊？！」後來母親一直說：「對你不起。」我這個小囡是從小倔強的，衝出來了就不回去了。他們還敢給我做媒啦？我這麼倔強的脾氣，啥人來做媒人啊。我人也不回去的，只到放假才回去，時間也很短。他們想麼我放假還可以回去，所以不敢碰我了。後來我先生是朋友介紹的。他在新加坡做醫生，回國之後，一個同事和我認識的，介紹了就認識了，那是我畢業前。我之後也教過書，兼職在務光女中，一個星期兩個鐘頭上語文課。律師可以兼教育界職業的。我先生也兼職教畫圖。所以我們都是教育界，教育界開會碰頭，就認識了。後來我做律師，還做務光女中的校長，我律師校長一直做到解放。我們認識好幾年才結婚的。他做他的醫生，我做我的律師。我們從前還是古板，不大碰到的，禮拜天到大光明看看電影，看好就回去了，兩個人各有自己租的房子。等到三五年朋友做下來，覺得可以，性情合得攏了，那麼就通過介紹人，再通知雙方父母，出來參加婚禮。因為不是老式媒人做媒的，我父母還要關照：「儂不要上當噢，家庭底細曉得伐？儂靠得住伐？」因為不是他們給我們做的媒，那時我已經蠻大了，爺娘還說這種話。

我結婚的時候，爺娘有陪嫁的。我那時候被褥陪了十六條啦，一家被子八條，兩家十六條。箱子按規矩是八隻，六隻，頂少四隻，兩隻箱子就是窮人家了。我是八隻，一年四季的衣裳都裝滿了。陪嫁還有首飾的，鐲頭、戒指、項鍊。你說一個金戒指要幾鈔？都是爺娘陪嫁，所以舊社會嫁女兒是嫁不起的，嫁一個女兒要嫁掉小半家人家的了。我們屋裏有四姊妹的呢！一個一個都要陪嫁。非但陪嫁，要是有了外孫，還要給外孫從頭做到腳，要一套一套做了送過去。滿月囉，週歲囉，要一擔一擔送過去的。江蘇人都是這樣規矩的，蘇州無錫一直到常州。我大阿姐也有的，二阿姐也和我都一樣的。老四不一樣，她結了婚就到外國去了，沒要。我們總要幾千塊一個啦。不過男家也給禮金，大約有兩千三千禮金，叫聘金，拿過來。那我這個男家麼，我不曾拿，我已經開通了，不要禮金了，我和兩個阿姐兩樣的。我本

人開通了，我自己搞學生運動的麼。男家也給首飾的，戒指我收了。我公婆家也算大資產階級吧，是常州同鄉。

五四運動主要是學生發表公開演講，但持續時間不長。隨後是新文化革命運動，後來他們把「革命」這個詞去掉了。新文化運動開始後，出現了許多雜誌，我們學生自己也出雜誌。我受了影響就出來見世面了。常州新雜誌比較少，到上海來比較自由了，無拘無束的。內地比較封閉，還有家長管。新文化革命之後就曉得要讀大學。你中學讀了有啥用場啊？就感覺到自己不夠，起碼國內要讀到大學畢業，因為國內也只有大學畢業，這一點是明白的。除非你出國去，但不是每個人都可能出國去的。我這歇辰光想法是讀大學讀啥？研究藝術好伐？從前覺得藝術不好，沒有發展。中文麼，中文總歸有根底的，從小讀起，總歸有根底的。外文麼，這歇辰光不是頂必須的，外文能夠通就算了。這歇辰光出國留學還不曾想到，還不敢了。只想中國推倒封建社會，頂要緊的就是推倒封建社會。跟著孫中山，孫中山不是宣傳「三民主義」嗎，我聽得進，讀得熟透，我們從前「總理遺囑」是天天讀的。<sup>12</sup> 每個禮拜要到市黨部去讀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讀得爛熟的。



我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我1930年結婚，三年後生第一個小囡。我兩個小囡都是奶媽（笑）。那時在下客堂，〔女兒〕坐在地板上，賴著要跟著出去，那怎麼好跟我去上班的呢？那屁股上是要拍兩記的吧？從前兩樣的，有奶媽的。奶媽斷了奶，叫幹領——不吃奶了，再請領小囡的，一個小囡一個傭人。我們從前的屋裏兩個女傭人、一個男傭人、一個汽車夫。兩個女傭人，一個在廚房間，買菜燒飯，一個領小囡，收拾房間洗衣服。那時我們的收入蠻好的，我傭人有三個，還有汽車，我們的汽車解放後就扔在人家廠裏爛掉了。我們另外還有房子，我先生是內科醫生，有診所，三層樓的很大的房子。

我做律師收入倒不一定計較的，我是老資格的義務律師，不是每樁案子都收費的。有種人家苦惱得很，我就算了。我不像那種人，幾個律師出一次庭就要兩百塊，我從來不是這樣的。史良從前也不是這樣的。她去給許多共產黨員辯護，只收三十塊。我們律師公會有一個集團，專門當義務律師，我也加入的。有種犯人請不起律師，沒人辯護，法院裏就指定義務團裏的律師，我也老被指定，指定了你總要去義務辯護了。還有這個義務渠道的，不一定每樁案子收很高的費。我同別的律師是不同的，別的律師不收費不出庭的，我這個律師貼了車鈔我也會出庭的，你只要是正義的、合法的、有理的、你會勝訴的，我出庭的，我義務就義務，不是一定收費的。不過看你屋裏有鈔票的，坐汽車的或者坐包車的，那麼應當收費的。收費多少我們律師公會有規定的，比方講，顧問費是一年一百塊，到頂了，少收一點五十塊也有的。有種不出庭，做法律顧問。我做法律顧問，比方我的老朋友跑來說，你給我做個法律顧問好嗎？我就鑲個鏡框，律師法律顧問，義務就義務了，送就送一張了，從前的老同學老朋友跑來，那不好意思的，也要收費啊？不收的。所以我這個律師特別的，不是每樁案子要收費的，所以會北京跑到上海來找我。那麼婦女團體裏面，我是婦女會裏的常務理事，婦女受了壓迫了，被阿婆打了，被丈夫打了，那我也去收費啊？她苦惱你幫助她還來不及了，你還去收費啊？那也都是盡義務了。老是盡義務，為啥道理呢？我屋裏廂開銷夠了，蠻可以了，不是一定要這個收入。從前開銷不像現在呀，傭人的酬勞也比現在要低得多。現在一個傭人的工資要比我多。現在勞動力的代價比知識分子高，知識分子被壓下去了。

我這個人是這樣的，義務的很多。親戚朋友叫你做顧問，你難為情伐？你去收他一百塊顧問費啊？我都不收的。有種經濟不寬的，像那個從北京到上海來找我的人，那麼多女律師她不請，跑到我門上來請我，銅鈔沒有的，她說：「我送一點東西給你。」那我說東西也不要送了，算了。有上海要好朋友婚姻問題協商，到我這兒來，我做

證人，你也去收銅鈔啊？那也不收的，算了。有種是我要好朋友，「丈夫欺負我，你給我貼張律師證書好伐？」那我就給她填一張律師證書，她拿了法律顧問的證書去鑲個鏡框掛在房間裏麼，丈夫不敢欺負她了，曉得你有後台了，你會找律師去。常年法律顧問證書是現成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去買好了，上面有「法律顧問」四個大字，某某大律師、受任某某人的常年法律顧問，如有侵犯伊的財產權、人權、啥個權麼，一切由該某某律師保障伊的權利。這種事很多的。

從前有個叫吳國璋的，當初是浦東人夫婦兩個人，蠻好的，女的幫他的忙，辦出來一個小的廠。後來他到上海來，得發了，男的擴充了，女的還在浦東不曾搬出來了。不曉得男的有鈔票了，自己造了兩幢房子，再到淮海路租了房子弄一個電影明星，同居了。那老家的那個想不開了：「儂起家是夫婦兩個人闖出來的，儂一點一點得發起來了，儂現在攢脫（甩掉）我這原配，去娶一個電影明星啊？」那麼就來請我做常年法律顧問，嚇一嚇她丈夫，不敢欺負她。這一嚇麼，丈夫就把一幢兩上兩下的房子給了這個老的原配妻子住。每月還規定他給幾百塊錢零用，繳進來。家用總歸要有的，人麼管不著的了。丈夫不敢欺負她了，有時還回去住住。只要一張法律顧問證書好了，因為他也是要名譽的，打官司起來他不坍台啊？他還是個廠長。

我是民事案子比較多：分財產，從前女子分不到的，都是兄弟分的，姊妹分不到財產的；還有爺娘的遺產，傳下來搞不清楚了，到底是啥人的；還有分家，不曾死的先分家。還有夫妻倆鬧翻了，女的吃了虧了，那我們伸張女權的朋友麼代表女的當事人出庭辯護；有的麼鬧離婚了，協商不行了，我們總歸先到律師事務所來協商，先協議勸他們，實在勸得沒辦法了，才給你寫張狀子，進法院去，再打官司吧，是這樣的。還有房屋糾紛；協議借款，從前借款不寫憑據的，全是要好的辰光麼，借給你一句話，等到以後討了還了就賴皮了。那無憑據怎麼辦呢？就要請他們找人證。能還多少，是否能和解，和解得了就和解。和解的收費極少，隨便送點的。所以事務所忙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律師、醫生都是自由職業。我上班小囡有奶媽領，所以屋裏不太有人的，只有傭人。醫生有診所，我們律師自己有事務所，畢業了，外頭大樓裏去借了間寫字間，門口掛塊牌子。我們律師不興打廣告的，我登廣告都是啥：某某律師、受任某某人常年法律顧問。常年法律顧問一定要登報的，還要登封面，上面有事務所的地址、電話。其他廣告我從來不做。從前我就是自己獨立獨闖的，不去依賴任何人的。我和先生是平等的，要是他是老式男人我也不會和他結婚的。我也不會做高官男人的太太。大家是一樣的。早上大家上班，晚上大家下班，小囡麼奶媽領。各管各。他也不敢說他有錢就要我呆在家裏這種話，思想上都不會有，不敢說這種話的。我先生認識我的時候，我已經是職業婦女了。所以無所謂，習慣了。男人也有職業，女人也有職業，大家有職業，大家不依賴啥人的。為啥道理呢？舊社會就是女子沒有職業，一切生活都是依賴男子，你買一根縫衣裳的針都要依賴男子的經濟，所以我明白這一點道理，要自己有經濟能力，可以獨立。所以說我的思想小的時候就有點反對的，就看不順，看到姨父姨母，怎麼會這個樣子的啊？我覺得不對，到上海來讀法律。當然，那個時候像我這樣的女子很少。所以我的外孫出去讀書，老師一看，啊，這個家庭怎麼的？外公外婆是大學生，父親母親大學生，說：「那你這個小囡聰明得不得了啊。」其實我們並不特殊，也不是聰明得不得了，只是上過大學罷了。

我這一輩裏先生不支持妻子工作，鬧翻也有的，所以律師生意就來了。不支持工作這種情況極少數，當時三妻四妾倒還有的。為啥道理呢？那歇社會裏廂四馬路有妓院，長三妓院，他們請客都到這種地方去的，毛病出在這個裏廂，所以非常之多。那麼還是欺負太太。為啥呢？那個年齡還不曾受過教育，教育受得太少了，所以找上門來求幫助了。你看現在辰光這種年齡的男的是被女的壓住的，都不敢響的，討不到家小，不是容易事體呀。你也是一份職業一份工資，我也是一份職業一份工資，你養得活你自己，我也養得活我自己。從

前舊式女子養不活要丈夫養她的。(朱素萼的女兒插話：像我們現在一輩人有工資，退休了，大家碰頭了，看看都老開心的。現在和老早不一樣了。)所以婦女要有職業。從前舊式婦女沒職業，尤其是大家閨秀。公子哥兒都要嫖堂子，大家閨秀麼都躲在繡房裏，房門口也不好出的，這個階層。所以我們知識分子阿是看不順眼啦？所以要出來反，所以我這個時期啦，全是在爭女權的。爭女權之後才變成救亡了。

這歇辰光我做律師不曾因為是女的被人歧視過，法院的推事<sup>13</sup>只有覺得，你這個女的倒也了不起。要有膽子，要爭〔辯〕的，要爭出理來。沒理的官司我不接的，有理的我是理直氣壯。對方男律師也老客氣的，下了庭照樣大家握握手。我們這一批人不是野流的，不是包打官司的流氓派，我們都是正正派派的，知識分子也有等級的。我們律師公會的律師都是差不多的人，都有聯繫的，接了案子互相溝通，不是冤家。抗戰之後人家說你們幾個寶貝紅得發紫。我們名氣響了，又是有後台，又是有正理不是歪理，這都有關係的。有的不是同道裏的男的我們也看不起。這個是看地位去的，你地位不高的，你不及伊的，說話就說不響。你的地位比伊高的，你的名氣比伊響，伊就比你軟。我們在裏面全是尖頭貨(拔尖的)，尖頭貨也不是擺在面孔上的，叫做有理各處行得通。剛剛大學畢業時我也蠻乖的(笑)，<sup>14</sup>我是跟老律師一道出庭，比我大十歲二十歲的，在北京大理院做過推事的，資格多老的啊，我會得和他們一道出庭。你辯這一部分，我辯這一部分，分開辯論，你一部分我一部分，這個樣子帶了，自己的身價就提高了。那你也要這個大律師看得起你的呀。要是這個大理院的律師：「儂這隻小鬼頭。」看不起你，那他就不和你配合了。你在學校裏，80分的人和80分的人就會軋道的(在一起)，59分的人和不及格的人一道去，談吐裏廂軋得出苗頭(看得出門道)的呀。我們有時和老師一道出庭，老師也曉得哪幾個學生是高材生。高材生也有點關係的。我出庭是挺胸凸肚不嬌里嬌的，男子氣派比較剛。律師的法衣一穿，



有威勢的，人兩樣的，這種倒也有關係的。這種衣裳穿著，人家都會說：「了不起啊！現在的女人真了不起啊！」我也門檻蠻精的，不與推扳（差的）律師搭道的。我律師事務所是姐弟倆和一個老師，老律師和我們一道搞，兩樣的。所以我們出庭有老師的，理直氣壯。周文璣當年出庭也是跟了兩個老師，這我倒是曉得的。周文璣雖然是真正的資本家小姐，倒是沒小姐派頭，頭髮也不燙的。到這種地方去啦，要樸素，看上去正派、有威勢的。



我的同學錢劍秋法科畢業之後，到美國去留學，讀博士回來後再做律師。她的先生是華僑。救國運動我和她一道做的。解放了，逃到台灣去了，她也動員我到台灣去，我不去。我是國民黨黨員，我老早在1928年就參加了，大學三年級參加的，大概1926至1927年的辰光兩黨暗地裏來拉人的。這歇辰光我們在大學裏害怕的，同學裏互相要咬耳朵，「當心哦，不要隨便瞎參加哦。」都謹慎的。後來明顯國民黨站穩腳了，這個黨是孫中山領導的，領導革命推翻了清庭，這個不錯的呀，所以我們堂而皇之地參加國民黨。當時共產黨還不曾出頭的了。外頭的謠言都是共產黨要共產的，要共妻的。我和幾個同學一道參加了國民黨。我的大學文憑上頭圖章都蓋好了，我跑出去當知府是現成的；我們七品芝麻官不做，縣官不做，我們的資格要做官，起碼要是府台。我做工作的時候，後來是第二次國共合作，何香凝的組織拉攏我進去，起先我們是單做國民黨工作，不是共產黨的，情況不同的。我和何香凝一道做工作時是國共合作，我和錢劍秋一道做的是國民黨的救國運動、抗戰運動，這個抗戰是國民黨的抗戰。勝利了之後，國共又分裂了。國共和談不曾成功囉，和談不成功我們就倒霉了，我們小百姓倒霉了。是不是倒霉啊？哪有啥1949年就請我在家退休的啊？49年我只有49歲呀，知識分子的退休年齡要到55呀。廠裏面也要到50歲。解放前我是紅得發紫的，我是女子中學的校長，務光女中的校長；又是律師，律師好兼校長的，我的許多男同事都是兼

校長的；又是市婦女會的頭，常務理事；還是各個婦女組織的理事。1946年被選為上海市參議員兼駐會委員直到解放前夕。解放時正當好做事的辰光，正當要發展的辰光，1949年就休息下來了，等於退休了，虛度光陰幾十年，一直到1983年我到文史館去。新政府的教育局從1949年後接管了所有的學校，我就失業了。1953年我受到監管，1955年被逮捕，兩年後才釋放。

婦女運動開始於五四後，沒有國民黨，就沒有婦女運動，清朝會讓你搞婦女運動嗎？1931年在我執行律師業務不久，日寇侵佔我東三省，出於愛國熱情，我組織了婦女救亡團體——中華婦女國防會，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同時與社會上幾個從事婦女運動團體的負責人，如中華婦女社的卜振華、婦女節制會的劉王立明、婦女協進會的吳戴儀，還有上海市婦女代表金光楣等等，一起搞婦女運動。國民黨時期開始的婦女運動是這樣的，黨裏面指定一個女代表來參加上海各個團體組織，要開會，派個女代表去，這個女代表是國民黨產生的。這歇辰光我也受到它領導了，我在大學裏已經是〔國民黨〕了。這歇辰光到南京去討名額增加，我也一道去的。<sup>15</sup>王立明的團體派一個代表也去的。但是啥人領頭呢？沒有的，我們都是平級。每個婦女會一個代表，我的婦女會是我代表，王立明的團體派一個手下得力的人做代表，金光楣代表上海市婦女，市黨部產生的。實際上我們婦女會都是平等的，沒啥你領導我，我領導你的，大家都是平等的。<sup>16</sup>

當初成立組織麼我們有知己朋友的，兩三個人就是一個組織了呀。兩三個人一討論麼，別方面的也有組織的，不單單是我們，別方面的章程可以討得來參考參考的，自己做自己的章程。那麼這個章程上定個宗旨，你是啥宗旨？我們總歸主要就是婦女運動，組織婦女。婦女要啥？要爭政權的呀，沒有政權，婦女會得解放嗎？你沒有政權，沒說話的地方，政府不來理你的呀。當時要參加政權就是這個道理，婦女要爭取多名額，多兩個名額麼婦女好代表講話了。政權取不著，你有啥用場啊？你爭女權，你不去到政界裏頭軋（擠）進去，你怎

麼能爭取到女權呢！我們組織的宗旨大約都是這樣，參政不參政麼解放婦女麼、男女要平等、受教育，普及教育。有種家庭封建，女小因不要讀書，兒子去讀好了，這種就不對哦。宗旨就是這樣的，婦女麼教育要平等、社會麼要平等、要有經濟獨立權，自己要能夠工作，那麼才好達到男女平等哦，這樣麼就女權了。我們要向社會局送申請，要經過調查的，社會局要批准的，然後開成立大會，他們派代表來出席，出席就是監督監督。那我們不會講反動話的，國民黨的組織不會去替共產黨做宣傳的囉，總歸通過的。

「八一三」日寇發動淞滬戰爭，上海各界紛紛組織救亡團體。我們婦女界又有幾個婦女團體，如婦女同盟會的李秋君、婦女互助會的田淑君，都和我們一起參加抗日救亡活動。到抗戰時期何香凝到上海來了，南京是宋美齡做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就是婦女慰勞會的頭，那麼都算她領導之下。<sup>17</sup> 何香凝是上海分會，她是我們的老前輩，那我們不好提出來說：「你也是婦女會一個頭頭，大家一樣的。」不好這樣的，那要客氣點的，你領導吧，我們參加你的。<sup>18</sup> 表面是國共合作，何香凝是傾向共產黨的，我們都是國民黨的組織，都是各個婦女組織的頭頭，也是婦女會的頭頭，像劉王立明是頭頭，幾個頭頭都不做了；我們都是客氣，把何香凝捧出來，因為南京是宋美齡領導，上海分會麼就讓給何香凝來領導了。她上來團體沒有的，下面群眾沒有的，就拉我們。我一個團體有幾百個人了，所以她就把我們各個組織的頭頭拉過去，做常務理事；七個常務理事，她是理事長。史良、許廣平、黃定慧沒有組織的，但都是活動分子，也進去做了理事。<sup>19</sup>

組織成立後我們具體怎麼參與工作？比方說，上海來了一批外面來的難民，是不是要救濟？國家沒這力量，只能社會幫忙，社會幫忙麼我們婦女就出來了。募捐，缺少寒衣的去捐寒衣，缺少伙食費的去捐金錢，這種事情都去做過。那時醫院裏新四軍的傷兵行裏行是的（多極了），救護人員不夠的，我們就辦救護訓練班，我的幾百個會

員都辦訓練班，還在我一樓客廳裏辦過訓練班。參加了訓練班之後，都到醫院裏去盡義務，都是自己出了車鈔。這些小孩多愛國啦，多熱心啦，都是中學生。我的學生那麼多，那時我已經是校長了，所以很便當的。還要冬天做棉衣，夏天做單衣裳。還要做袋袋裝香皂、牙刷、牙膏、毛巾、襪子，各樣東西都是我們做的。還要做鞋子，我一樓客堂裏都來做過的。(朱素萼的女兒插話說：那歇辰光她們在客堂間做鞋子做衣裳，我也記得的。)我們還要做募捐。東西我們統統送到何香凝那裏，她屋裏離我不遠的。她要送八路軍也好，要送新四軍也好。她麼都送到新四軍那裏。我們這不是為共產黨做的事情嗎？國民黨老早撤離了，此地都是新四軍的世面了。我曉得何香凝把我們捐的東西送給了新四軍，我們毫無怨言，統一戰線麼。日本人打進上海後，何香凝、史良相繼離開上海，婦女慰勞會改組為上海婦女界難民救濟會，由許廣平領導，她兼任總務組組長，黃定慧任副組長，推選李秋君和我為救濟組正副組長。<sup>20</sup>我們辦起了建成難民工廠生產毛巾等產品，委託中國國貨公司代銷，從而安置了一部分難民。我們這種事情都做過的，這樣你才好爭取婦女提高提高自己的地位呀！那麼好伸張女權了。否則你和男的還是不一樣，男的會做的你女的不會做，你伸張啥女權呢？不會得平等的呀。你會做的我也會做，所以救濟事情也做，普及教育事情也做，都是文盲，你不普及教育有啥用場呢？所以我們做的工作多了！

我的同學錢劍秋從這兒到台灣去做了中央委員。抗戰時期，她和我一道做抗戰工作的，一直做，做了八年。抗戰工作和婦女工作是一道的。所有婦女都發動出來參加抗戰，就是婦女工作放在抗戰工作之中，所以婦女工作也屬抗戰的成就。上海淪陷後，市黨部撤退了，上海變成沒有頭了，就從重慶派個市黨部負責人吳紹澍來，我們偷偷做的。那這裏面要擺個婦女組囉，錢劍秋就是婦女組長，她不是要找組員麼？還是要找朋友了。那麼就找了我 and 江蕙若，因為我們都是律師同行。那麼我們就開展了救亡工作。我們這個工作不公開的，與何香

凝組織不同的，這是重慶派來的黨務裏的工作，所以我是兩面有關係的。錢劍秋沒有參加過何香凝組織的慰勞會工作。我們一起辦了《中國婦女》雜誌，一直到1941年日本人進了租界後就停刊了。她待母至孝，對朋友也很重義。當風聲緊急時，她躲避在我家，我的房子是在法租界裏的。有次她說不放心老母親要回家看看，不料竟被日軍所捕，在刑訊中也沒有將我招供。我為營救她而四處奔波，76號也去過，<sup>21</sup> 托朋友，後來她被釋放了。等到之後勝利了，1945年開始錢劍秋正式是婦女的領袖。這個辰光我們是婦女會，她是頭牌，我就是二牌，我們兩個人是最重要的了，找不到她就找我，找不到我就找她。

我和劉王立明是老朋友了，一道開會的，全是在開婦女會來的。她是只做婦女運動，我又是婦女運動又是愛國運動，所以我是兩層關係。我是有黨派的，劉王立明是沒有黨派的，她專門看著她們的教會，發展不起來。我們這個救國會裏的婦女活動，劉王立明全擠不進來。後來劉王立明自己不出來了，叫一個姓陳的代替她，年紀老輕老輕的小姑娘出席了。她是教會派，所以，她做的婦女運動範圍太小了，還擠不進去，自己寫寫，自己說說，不夠全面。到抗戰勝利，這個婦女運動發展得快了，這叫全面了。從1945到1949年十足只有四年，但這四年間婦女運動開展得轟轟烈烈。

這個辰光正式市黨部有個婦女運動委員會，有運動的辦公室，一隻一隻桌子，全分檔的，文書啥人，秘書啥人，組織啥人。這個辰光就是錢劍秋了，籌備做婦女運動。具體的事情呢，我們主要是辦學校，辦教育。我預備另外再辦一個職業學堂，教育局已經立案了，我就借新生活運動會的會址，有個大廳，付出租費的，辦個書畫展覽會義賣，潘公展也來的。義賣之後，自己的經費拿出來，再貼進去，辦個職業婦女學校。這個大家都知道的，朱校長倒貼。幾個董事一個銅板都沒有拿出來過。我想職業婦女再培養點出來。全是普通中學，不適當，中小學畢業做點啥呢？不懂，一點不懂，專門知識都沒有的，你叫她立櫃檯也不會立的。總之一句話，我認為一個人要有一

種技術，就餓不死了。我認為婦女職業學校上海太少，我想再創辦一個。上海婦女職業學校，名稱也定好了，我是預備辦的，都是解放解掉了。婦女運動委員會宗旨是團結婦女，爭政權，從前主要是爭政權。三十歲出頭時，我到南京去請願過的，<sup>22</sup> 國民代表會裏婦女代表只有三五個，零零碎碎的，我們去請願多加幾個婦女代表。這個辰光婦女好參政了，假如代表有八十個，裏面只有三個女的，那不是太少了啊？那我們說增加到七個好伐？我舉個例子，就是這個意思。這是抗戰之前。還不曾有結果了，就抗戰了，就去做救國運動，這個〔爭〕代表〔名額〕就放到後頭了，不談了。不談了就做抗戰工作了。<sup>23</sup>

一等到八年抗戰勝利後，1945年我就做上海市參議員，一百多個參議員只有兩個是女的，那麼這兩個女的就不得了了。一個是國民黨黨員，她的丈夫是老黨員，給日本人活埋掉，那也是可憐的。我麼是冒著生命危險做地下工作，這個生命也是拾來的。參議員之後要開國大代表大會，同時立法院要選舉立法委員。就是一方面要選舉國大代表，一方面要選舉立法委員。我有許多女朋友是去參加上海市婦女會裏的婦女代表〔競選〕，婦女會是可以產生國家規定的幾個代表。我看看名額差不多了，我是律師，我就到律師公會去，代表律師公會去參加競選立法委員；要中央組織部批准，我跑到中央，到南京偷偷去看，有朋友來告訴我你是立法委員候選人，排隊就好了。我是競選了立法委員，但不曾競選著，所以這叫做黑暗，就是作弊啦。我正式票子很多的，給你弄個候補；票子沒有的，走內線的，就給你當選了。這個辰光女的只有一個名額，兩個人搶一個，這個人姓方，後來弄得家破人亡，也是律師公會的會員，也是個女律師。起先她不預備出來競選的，就是因為看到我，就想你女人做到這麼大啊。她的家屬鼓勵她，說你看看這個女人家多能幹啊。抗戰勝利之後我不是極紅極紅的啦？那麼家屬發動她了，她就回去動腦筋了。她是寧波人，寧波與奉化是搭界的，奉化和蔣介石有關係。<sup>24</sup> 她去走內線，通過姨太太門路。我是大太太門路也不走的，官老爺門路也不走的，實骨鐵硬靠自

己的本領，靠自己的能力，走正路的。因為我抗戰吃那麼多年苦頭，我盡義務，倒貼家當，為了愛國才來參政的，否則我看不起你這腐敗政府我也不來參政了。所以我和她的情況是不同的，她去走了奉化的人的內線麼，是蔣介石侍從室的主任，七搭八搭搭過去了。我麼就堂而皇之走正路。我只靠我的選票，很多人都給我投了票，比如無錫律師公會的票全都投給了我。我沒利用任何內部關係，是一個正直的人。這也是我1949年沒有跟國民黨到台灣去的原因。

五四運動之後就開始女權運動，女人思想開通了，有點懂了：「哦，原來人是平等的，我們現在是受著壓迫的呢。你們男人有男權，我們女人沒有女權的啊？」怎麼叫受五四運動的影響呢？五四運動就是推翻舊的封建皇朝，舊的思想轉變為新的、進步思想。新的進步思想是什麼呢？就是男女應當平等。怎麼實現平等呢？就要讀書，要爭女權。這個樣子開始的，所以叫先是爭女權，那麼以後好了，救國囉愛國囉全來了。史良不是救國會麼？我的沈鈞儒老師也去和宋慶齡一道是救國會的，那麼捉進去了，叫「七君子」啥，關到江蘇高等法院。這是他們救國會。<sup>25</sup>我們不曾那樣出面反對，叫愛國會，愛國你總沒罪的，愛國你總應當愛的囉，所以比較緩和一些。實際上我們是同情這進步派的，腐朽的一邊我們叫沒有力量推翻，思想情緒都是不滿意的。這就叫讀書的關係。所以要讀大學，中學生就沒有大學生的老練，大學生就懂得這些了。

說到我是怎麼想到要去讀大學呢？就是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懂得很多道理了。社會方面聽到的，家庭當中看到的，全是啥？男人壓迫女人。最觸動的就是啥？我兩個姨母和姨父，姨父虐待姨母，叔叔虐待嬸嬸，那歇辰光全是花花公子，不是外頭弄女人，就是出去賭銅鈔，夜裏不回來。回轉來的話麼，拿個妻子麼拉一把頭髮，吃醉了酒，發瘋的樣子；小囡倒要養幾個的，結果都是在姨太太那裏照顧，丈夫一點不管的。我看看這個樣子，心裏有點覺得不平：屬於一樣的人，怎麼把女人這樣子對待？不尊重。我總覺得不對。大家是人

呀！妻子給你養小囡，一個爺一個母親，這母親都負責的，這父親怎麼不管的？經濟方面從前舊式女子不工作，當然是你父親負責的囉，你繳了一點家用，啥事都不管，還要回來發脾氣發酒瘋，那我總覺得不對。到十二三歲我懂了，心想這姨父怎麼這樣欺負姨母的？我將來倒要不買帳了，要講句公道話了。這時還不懂太多，心裏就是這樣想的。還聽到社會上，某人家的鄰居把家小的頭也打破掉了；某人家的阿婆把媳婦怎麼怎麼虐待了。社會上聽到的，家庭親友當中看到的，我這個小孩子神經刺激了，懂得了。懂得了就想，你讀到中學有啥用場啦？要讀大學。讀大學讀啥？你要保護女權，你要讀啥？讀法律！那麼就走了法律這條路。你去學畫畫有啥屁用場？畫了自己看看。讀法律你才好去代表別人講話，去伸張正義，主要是去伸張正義。你不要壓迫我，大家平等！這個就是受了新潮流的影響，思想一點一點的，這個不要啥人教的，社會看到、聽到的，思想震動了，自動要去組織。一個人沒有力量的，要組織起來。那麼不曾曉得弄弄女權麼，本來都是為自己爭女權，後來變得國家出事體了！結果變得分不開，女權和愛國救國擺到一道去做了。



救國也不放掉爭女權。你不踏進社會，你不懂的，你會得去參加這邊去救濟婦女、這邊去護理？你會得懂嗎？不懂的呀。你參加了社會工作你才會懂得這一套的呀。否則什麼募捐寒衣、募捐經費，怎麼會得懂呢？這些就是女權裏面的呀，全出來做社會工作的。你女權不懂得，怎麼會去做這些工作？這些全屬於婦女運動裏面的呀。我們辛辛苦苦募捐好了，送到社會局去，你社會局去分配，哪裏的救濟團體。這全是婦女運動裏的工作呀。婦女運動的工作做了多多少少了啊！我們出雜誌宣傳，抗戰時期我們出《中國婦女》，橫的四個字，這四個字我去弄的，一塊銅板。抄家敲掉的，抄家的人嚇死了：「原來儂是官老爺！」我是編輯，從前編輯不像現在報館裏是分開的。我們從前抗戰時期有時稿子不夠，我們換個名字自己寫了就放上去。請



自己的同學、同事寫文章，我去討稿子。我曉得《女聲》，不過我們不大去〔聯繫〕，她們是教會派。像我們《中國婦女》是各個學校都送的，要麼不出版，出版都有的。《女聲》大概沒有《中國婦女》這樣普及。我們是綜合性的月刊，一個月出一期，發行量也不小，每個學校都送到的。我們當初不計較經費，自己挖點出來，自己貼的，貼車鈔，盡義務。和幾個朋友：「哎，你捐50塊好伐？哎，你經濟寬麼你捐100塊出來好了。」全是這樣子來的。所以抗戰勝利之後，政府請我做參議員，全是這種關係：你對社會有貢獻的、抗戰時期你幫助我們的、貼車鈔盡義務的，伊給你這種名譽。這種是叫名譽，權也沒啥的，參議員等於現在的人民代表，也是伸伸手的。我提案提的，為啥呢？舉個例子，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待遇兩樣的，那我覺得不對。一樣教育家麼，公與私的，分啥家呢？所以提案。你提案上去一定通得過照你的意見辦事嗎？也不是的，你提歸提。

在那些年裏，許多婦女做了大量事情，多數是自己的經濟還可以，自己的家庭開銷得了，才有這個餘力。有種呢是老熱心的，經濟條件是不夠的，那我們就不勉強了（不用捐款），幫助共同來工作，也有的。在《女聲》和《中國婦女》中還有一個婦女雜誌，它要停刊了，我們也拿出銅鈔來的，所以等於是合作社一樣的，大家討論幫幫她忙。沈茲九你聽說過嗎？她後來到共產黨那邊去的，到北京去了。她的雜誌出不出了，我們大家拿銅鈔去幫助她。<sup>26</sup>這以後出版也不出了，時局轉化了。我和沈茲九蠻好的，抗戰期間一道開會的，都是老朋友。在何香凝的辰光開會，也邀請沈茲九來，雖然她不是一個團體的頭頭，也不是常務理事，但也有一份婦女雜誌。再到後來抗戰她們也停刊了。我們《中國婦女》一直出版，一直到日本人來捉人，和我一起工作的負責人錢劍秋被關起來了，那我想早晚要挨到我，所以雜誌就不做了，《中國婦女》出版社就不出了。但是救濟工作我還是做的，那麼多難民在那兒呢，難民工廠有一百多個人了呢，救濟工作怎麼好結束呢？！我說我做救濟工作總歸不犯罪的，啥個黨派來救濟工作總

歸要做的。所以我把救濟工作一直撐到結束，難民遣送了，結束了，我就把後面的救濟工作統統交給了女青年會，因為它是教會辦的，算是外國的，不是中國辦的。

現在也是一樣的，我都捐的。1958年大躍進，政府號召家庭婦女走向社會參加工作。我覺得自己也能為社會做些什麼，因此當里弄的熱心人想辦托兒所，為參加工作的婦女解決實際困難，又苦於無房屋時，我決定將自己家裏底樓四十平方米的會客室及餐室讓給居委會辦托兒所，解決了三、四十戶人家的後顧之憂。上次有受災了，我們全捐的。還有個希望工程，偏僻的地方，小孩子讀書讀不起，我們在文史館也把兩百塊捐出去了。<sup>27</sup>我今天看到數目，文史館捐了一萬幾，市政府領導機關給的表彰，起碼五十、一百，一個人到頂要兩百塊，那麼我實骨鐵硬爽爽氣氣就兩百塊。因為這個等於掃盲工作啦，偏僻地方，數學書都買不起，你怎麼叫普及教育呢？我們的宗旨，最要緊的就是普及教育，使得女子大家都能讀書受教育。先要有知識、有文化、有能力去找工作了，經濟獨立了，社會上才可以平權。不然你怎麼平這個權啊？要爭取到平等權利，你就要找個代表去發言，提出來。你不提出來，會送給你的嗎？領導上不見得會送〔權利〕給你的。

我搞婦女組織的辰光，國民黨放開了，婦女可以參加參政會，反對政府、反對蔣介石的也可以派代表參加。沈鈞儒、史良的救國會，這一批就是要批評國民政府的，有參政員、參政會。我們曉得了，參政會討論之後要開婦女代表會了，我們救國團體都組織好了，我的團體也登記好了。一個一個團體的頭頭，共產黨叫頭頭，我們全叫負責人，我的會就是我做負責人。我們都是群眾團體，婦女團體老多的，十個八個總有的。各個婦女會的負責人經常開聯合會，所以大家都認得的。1938年錢劍秋做了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的主任，她邀請我做委員，委員有五個吧。還有上海市婦女會，是上海市婦女運動委員會領導的，就等於現在的上海市婦聯。一個是官場裏領導的，一個就是群眾組織，發動做啥，群眾組織出面。婦女運動委員會就叫官老爺

了，坐在辦公室裏。我是上海市婦女會的常務理事，下面還有一批理事。從前我們花樣蠻多的，我們還自己組織聯誼會；從前社會寬，不像現在辰光。只要不反政府，十個八個人一組織就是聯誼會。聯誼會不是要碰頭的嗎？一碰頭又是我認識她，你認識她的，十個人就變成了二十個人，就這樣子拉攏來的。比如我們律師，就叫法學界婦女聯誼會；我們連大學裏的大學生都組織的，叫做大學女生聯誼會；教師裏面就組織教育界婦女聯誼會；我和陸禮華老早就認得了，她是體育界婦女聯誼會；我們連得工廠裏都有的，叫女工聯誼會。那個辰光廠裏面也有兩派：一派走國民黨的路，不全是走共產黨的路；還有職業界婦女聯誼會，連得家庭婦女也有聯誼會。這樣上海各個組織裏的婦女全團結起來了，全有組織，你屬於啥組織，她屬於啥組織，這個是我們市婦女會領導的，就是這樣的情況。這都是我們自己組織的，國民黨不曉得的，不過社會局要報一報，我們說清楚的，不是反政府的，沒有政治作用，我們聯絡聯絡感情，我們有會的章程送到社會局看，我們公開的。我們開會麼討論討論：婦女節到了，我們預備做啥？春天來了，我們組織去春遊好伐？重陽節來了，我們登高去好伐？沒有政治作用，不成問題的。那麼我們人多了，所以三八婦女節遊行起來，南京路是排起隊伍來浩浩蕩蕩地出發的。<sup>28</sup>大光明麼放場電影。那個辰光我們真是叫轟轟烈烈，做得紅得嘍發紫。

勝利之後我們在市黨部工作忙得不得了呀，坐也坐不定的，都是婦女在家裏受丈夫的壓迫，受公婆的欺負，有團體了，有人撐腰了，都是來求救的。起先（淪陷時期）我們不敢響。勝利之後我們出面了，就全找上門了呀。社會上這種事情多得很，即使孫中山革命幾十年了，比清朝封建時期好一點點，還是受壓迫的婦女呀！社會上的婦女知識程度淺到極點，都是哭訴無門，受丈夫欺負受公婆壓迫，一聽見市黨部有個婦女會，幫婦女講話的，幫助婦女的，快點找上門來，所以忙得不亦樂乎。要解決我們忙了，要調解了，調解好了沒事情了；調解不行，交個狀子進法院。當律師的人不是要給她出庭啊？出庭都

是義務律師，等於我們做好事呀。不一定是救濟窮人算做好事，這個也是做好事啊。為婦女伸張正義，伸張女權。



上海婦女會裏不一定全是國民黨員，我好幾個學生是共產黨員，解放之後我才曉得。這種小孩子在學堂裏蠻尖的，有啥活動都是搶在前頭領導，不是呆篤篤蹲在後頭的。我沒啥，都好。學生啊，黨派不許進校門的。沒啥公開地你麼去拉一派國民黨分子，她麼去拉一派共產黨地下組織，我們不做這種事情的。我們就是辦學堂，教書的。暗地裏的，我們不干涉的，眼開眼閉。公開麼，何香凝來領導了，共產黨國民黨合作了，他們政府都合作了，你老百姓對啥人去作對啊？不需要去了。你國民黨黨員去和共產黨黨員敵對啊？沒意思的，大家都為了愛國救國一個目標。何香凝是共產黨裏一道的，我的教務長（沈鈞儒）也是和毛主席要好朋友。我的幾個學生也是要推翻腐敗政府的寶貨。所以我說我的反對思想也來得很激烈，你腐敗了我就要推翻你。啥人領導得好，我就擁護啥人。啥人對國家前途有希望，是愛國的、救國的，擁護你。我只要國家強盛，老百姓少吃點苦，我就擁護你。我黨派也不管，雖然加麼加入了，但我這個不管的。你一定要蔣介石獨裁也不好。做啥呢？你放鬆一點。伊領導得好，讓伊上來；你領導不好，換一換，調調班，我倒是贊成這樣子換班好了。你做啥要這樣子把牢了？你要是領導得好，你不會1949年逃到台灣去了。你當時也有你的腐敗缺點的囉。所以後來法院說：「你沒有罪行。」有種人策動學生反對共產黨，我沒有這種事的。但我逮捕進去，他們說我有罪職，我說「啥罪職？」「你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就是罪職。」那麼是不是有罪行呢？我沒罪行。我不曾去煽動，我在學堂裏不拉學生做國民黨，一個不拉的。你到外頭去參加我不管的，那是外頭的事體，我學堂只是管教育，只讀書，別樣全不管的。所以我做校長沒事體。假使那歇辰光共產黨黨員和國民黨鬥，我偏在國民黨一邊，壓制共產黨員，那我就有罪行了。我都沒有這種行為。所以他們說，我只有罪職

沒有罪行，那麼我說：「那我沒罪行算點啥個罪呢？」承審員說：「你不要自己給自己辯護。」我說：「我是個律師，要有法律依據的。」這像講笑話了（笑）。所以後來平反撤銷原判，我想我兩年監牢白坐的啊？逮捕的辰光送到公安局分局，先審的，後來決定，沒罪的給你回去，有罪的到提籃橋去。<sup>29</sup>我說：「我只有罪職沒有罪行，有罪行的麼你可以判刑的。我沒有罪行麼，那怎麼可以給我判刑啊？」他說：「你反革命。」七年徒刑。（朱素萼說到這裏，放聲大笑。）我不是共產黨員麼，就是反革命。這個滑稽到極點，無啥講頭的。否則會那麼便宜，我坐兩年請我出來的啊？我經常生病，因此叫我保外就醫。

1962年我被通知「刑滿釋放」。誰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降臨，十年動亂我吃了多少苦。總算還好，也不曾貼大字報，也不曾去遊街。我家當抄光算數，我橫豎也帶不走，無所謂。街道來抄家，跑進來兩打人（24個人）。喔呦，我說我這官做得那麼大啊？不得了了！房間蹲不下，把我的棕棚一拆，棕棚豎起來，24個人軋進來，說：「儂是國民黨黨員，儂做過官的。市黨部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就是官。」剛進來是抄江青在舊社會時代不名譽的證據。啥人屋裏廂有這條件藏你（江青）的歷史材料？你也沒啥呀？你不過做做話劇呀？曉得的呀你是藍萍呀！我也看過伊的話劇，瘦長條子，蠻好的呀，我們熟透熟透的。那麼你現在去做了主席夫人也沒關係的，做啥要一家一家屋裏廂去，全有你的憑據在啊？我屋裏廂弄不出來的呀。你又沒啥其他不好的名譽。伊又不曾到長三堂子裏去過。我也不曉得江青是藍萍的辰光有沒有朋友，話劇界也無所謂，文藝界開通得很，與我們是兩樣的；我們還是舊禮教過來的，我們還是算舊式的，不及她們的。那麼我想她們文藝界做做話劇麼也不過如此囉，也沒啥大不了的，頂多麼搞點男女關係。老實說男女關係的證據也不會跑到老百姓屋裏來，查不到。你曉得跑進來的人在我耳朵邊咬咬耳朵，〔悄悄〕說：「哎，金銀財寶有伐？」我一聽「金銀財寶」這四個字我人呆住了。我想你是來抄家抄犯罪證據的，怎麼講起金銀財寶來的啊？噢……我說：「我

一部分上繳了。」「啊？儂就這麼一點點啊？」我說：「那隨便你們去翻吧。」我是聽了人家講，上繳了他們就不來了。那我就把書畫、條子（金條）、戒指囉、鐲子囉，統統上繳，送到街道辦事處。鐲頭是傷心啊。從前我這歇辰光已經不興戴一對了，都是一隻手戴鐲子，一隻手戴手錶。我買的時候都是一隻一個樣子。他們問鐲子應該一對的，怎麼是一隻一隻的啊？橫解釋豎解釋的，你逼死我我也拿不出另一隻的。我丈夫的醫師診所被紅衛兵勒令停業，我們夫婦的生計也斷絕了，靠子女的一點工資。以後十多年生活之艱苦是可想而知的了。平反之後值銅鈔的東西都不還了，說是給人家拿走了。衣裳倒是還的，他們喜歡的東西就沒了。我和我先生都喜歡書畫的，吳昌碩的、徐悲鴻的畫，于右任的都沒了。我聽也不要聽人家講這些東西現在值多少多少，快點逃開點，刺激神經，有啥意思呢？一個人啊，東西又帶不走的。我們出來的辰光全是精光地來的，去是穿好了衣裳去的，已經算福氣了！

我是1979年提出平反申訴，我在申訴書裏列舉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在何香凝的領導下我為婦女和救亡運動所做的事情。為啥道理我那麼晚再去謀平反呢？因為我想他們自己人都勿曾平反好了，要等共產黨把自己內部的事情平反好了，再排得上我這個黨外人士；我想你們自己黨內人士還沒有落實了，我這個黨外人士不來軋鬧猛（湊熱鬧），我是交關識相（很知趣）。畢竟我是當過律師，明事理的。我看到後來黨內人士差不多快了，我想我這個黨外人士可以來軋一腳了。勿曾想我這個黨外人士去軋一腳實在是有資格了，他們態度很友好，來我屋裏調查案子。很快，幾個月功夫就平反了。法院很快就進行復查，並做出「原判適用法律不當，應予撤銷」的判定，我終於獲得平反。那麼平反之後呢，叫我去做政協委員，我不肯，做了我也屏不住，樣樣要插進去。現在都是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講話的，那麼有用伐？又沒啥大用場的。叫我做參事，是市政府任命的，那就是上級任命下級的囉，我也覺得不好。後來請我到文史館。我一看，裏面都是

些老朋友、熟面孔，都是進去出來進去出來的寶貨，有兩個還是判過死刑的，做過市黨部執行委員，被宣告死刑的。實際上，國共都是有聯絡關係人的，所以後來也出來成了文史館的人了。我想還是文史館去吧，太平點。文史館是聘請的，那沒啥好說的。我的文史館的聘書是汪道涵市長簽的。1983年2月我被聘為上海文史館館員，國家每月發給我固定的生活費，享受公費醫療待遇。



現在「三八紅旗手」挑幾個出來，先進工作者特級教師選幾個，我們那個時候不是這樣做法的。<sup>30</sup> 你想，現在這特級老師，你能有幾個？下面的老師還肯進取嗎？積極性沒有了。捧一個，壓一批，這種做法你說好嗎？我們那個時候是婦女要求解放、爭女權的時代，大家地位一道共同提高呀！你提一個尖子有啥用場啦？你政府裏面插一個在那兒，你說男女平權啦？我們並不希望這樣的，我們是希望大家起來。為什麼要參加啥救國會、愛國會？為啥道理要去爭取名額去？當初國民黨也是的，一個、一個〔名額〕。後來到我那個時代已經不是這樣了，改成委員會了，不是一個了。成立了一個婦女委員會，而不再是一兩個婦女孤軍奮戰。

我看婦女要參政是最難的。那歇辰光第二次世界大戰發動了，全世界成問題了，那我們還不挺出來？這男和女不是一樣的人啊？我們再不挺出來不得了了，我們應當和男人一樣分擔責任了。那歇辰光我想，我們和男人一樣分擔責任，大家負擔一半責任，那麼將來有朝一日天下太平了，我們女人的地位、頭也好抬起來了。我這樣的想法，也好頭抬起來了。但是呢，現在辰光頭抬起來了，抬到現在中央只有一個陳慕華，可憐伐？共產黨還比國民黨進步。現在陳慕華下來了，做啥？就做婦聯主管、負責人。還有啥人上去伐？一個也不曾上去了。鄧穎超上去的，做了政協主席，死了。死掉後還有啥人啊？康克清也死了。到現在辰光還有啥人呢？上海有陳至立，副書記，只有一個。副市長女的，謝麗娟，就一個。從前的政協委員我叫做「伸手」

委員，現在我加一個，叫做「開口」委員，現在可以提建議。本來是謝希德，下任了，現在是陳鐵迪。<sup>31</sup>是政協裏面主席叫你女人來做。我現在覺得婦女還是難的，還是成問題的。這個政治要給婦女插進去啦，比較艱難。技術不成問題，技術人才，你設計師囉，建築師囉，你去做好了，去搞研究好了，發明好了，比較容易。踏上政治還是吃力的。這個政權還是男子佔了多數，這女子還是沒有力量，還是男子中心的社會。共產黨到現在也是這樣子，國民黨時期（參政權）更加難爭取了。

我們這一代人總算是爭到了一點點，東也芝麻插一個，西也芝麻插一個。現在，我也老了，不做了，等下一代接班人去做吧。

## ■ 解讀 ——女權目標和政治手段

朱素萼是我訪談對象中唯一的國民黨員，她的黨員身分是貫穿她人生故事的主線。我感興趣的不僅是她的政黨立場如何影響了她的命運，也關注女權主義如何與她的黨員身分聯繫在一起。此外，朱素萼是1949年選擇留在大陸的少數幾個國民黨婦女活動家之一，因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她表達的可說是對民國時期婦女運動的較獨特的視角。

與陸禮華一樣，朱素萼小時候有機會去學校上學。不同的是，她並不需要打扮成男孩。她居住的那個小城是清朝的女學中心，人們通常都會把女孩送到私塾讀書，她父親也認為不論是男孩女孩都應該接受教育。朱素萼強調她父親學過法律，因此思想很開明，也可能他有男女平等的新思想。但朱素萼也讓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在新辦的西式公立學校，也就是女子師範學校裏，大部分學生都來自書香門第家庭，即使作為一個銀行家的女兒，她的地位也比學校其他



女孩低。住宅的規模和樣式很明顯象徵了社會地位，任何人都難以忽視；即使是個小女孩，朱素萼也敏銳地意識到她家與同學家的不同。朱素萼認為她能進入新式學校是得益於她父親思想開明，因為她那個階級的人都害怕自己的女兒會被西式教育污染。不過在新式學校讀書意味著可以融入到書香門第官宦家庭的女孩中，因此她父親的決定也可能是出於對自己商人社會地位的敏感。此外，當地有讓女孩在舊式私塾讀書的習俗，她父親願意把女兒送到任何學校，與其說是思想開明，不如說是遵循當地的傳統：女子受教育在常州是精英家庭的標誌。<sup>32</sup> 不管怎樣，當地方精英開始把女兒送入公立師範學校時，她父親也跟著做了。

精英帶頭把女兒送進公立學校並不令人驚訝：關於近代女子教育的話語是諸如康有為、梁啟超這些清末士大夫領袖所製造的，其目標就是社會精英。對於常州的精英階層來說，把女兒從舊式私塾轉學到新的西式公立學校是很容易的，尤其是這種轉學在國族主義的話語中被界定為愛國舉動。儘管當時社會在其他方面對西方的影響持懷疑和抵制的態度，但在精英的支持下，近代公立女子學校自1910年代初期便得到迅速發展。

與陸禮華不同，朱素萼沒有參與五四運動。她居住的常州坐火車到上海雖然只要幾個小時，但文化氛圍和政治場景還是和上海這個龐大的開埠港口差異巨大。當陸禮華和成千上萬的學生一起參與遊行和集會、請願、發表演講和寫大字報，正在經歷著令人振奮的日子時，常州的朱素萼看到只有少數學生在街頭站在轎子上發表演講。但是，這個安靜小城的一些人，尤其是年青人，還是受到了五四運動的鼓動。史良這個年輕女子就和朱素萼的姐姐一起到街上演講，她後來去了上海，並在抗戰期間成了著名的活動家。

朱素萼受到了與五四運動交織在一起的新文化運動的激勵。她做出離家的決定，就是受了新文化的影響。新文化反對傳統父權制家庭的思想，使年輕的朱素萼產生對自己在家庭中的處境的不滿。七十年

後，她仍然清楚地記得「反抗家庭」這個新文化詞彙，當父母讓她而不是她姐姐輟學照顧母親的時候，這個詞彙激勵了她採取行動反對父母的決定。朱素萼對於離開學校一直感到鬱悶，但她沒有辦法表達自己的不滿，因為在儒家道德中，孝順父母是女兒的義務。姐姐可以繼續讀書而她自己只能呆在家裏，她感到很不公平。雖然她為這種處境暗自垂淚，但直到「新思想」進入頭腦後，她才能清晰地用語言表達出內心的不滿。她以一個新的視角來審視當前的處境時，煩惱也發生了變化：問題不再是「她應該履行義務嗎？」，而是「她應該繼續被父母控制嗎？」。新文化對個人自主和獨立的強調，鼓勵這位年輕女子做出了以前從不敢做的決定：離家出走。她選擇去上海的一所寄宿學校，以此來擺脫父母的控制。

朱素萼不僅受到新文化的鼓舞，而且也為到上海的興奮所激勵。她顯然意識到了小城市的局限和大城市的機會，也因此「想去見見世面」。她這次移居到上海，為將來的獨立生活提供了可能性。我們若把她和她姐姐進行比較，這次遷移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朱素萼的姐姐比她大兩歲，在五四運動中比她要活躍很多。從師範學校畢業後，姐姐留在了家鄉，在一樁包辦婚姻中不情不願地被抬上轎子接走了。相比之下，上海的朱素萼能夠「挑選」伴侶，29歲時和一個自己選的男人結了婚。在常州這樣的小城市，一個悔婚的女人會被人唾棄，這也是她父親不得不把她姐姐嫁出去的原因。但在五四後的上海，大量年輕男女逃離包辦婚姻，在非熟人社會裏找到了避風港。這個大都市裏聚集了大量政治激進分子和文化異端分子，西方人在這裏盡情展示其異國情調的生活方式，年輕人以抵制包辦婚姻為榮，並以此作為具有現代思想的標誌。其實即使不同的地域也會給兩姐妹帶來個人生活上的巨大差異。

朱素萼到上海是她自己的決定，這本身就說明了這個年輕女子的一些特質。如她自己所說：「我的思想和別人兩樣點，有點倔強的。」她用童年的回憶來證明自己的倔強，在性格形成的幼年時期，朱素萼

兩個姨母和其他婦女的悲慘生活給她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訪談中，她不停地描述丈夫不忠帶給婦女的痛苦，並譴責孩童時她看到的和聽到的暴力行為。圍繞在年輕朱素萼身邊的婦女的痛苦讓她痛哭、讓她憤怒，更為重要的是，面對婦女受壓迫，她的心聲是：「我是不服貼的。」她的倔強或者堅強的個性在這時就顯示出來了。在朱素萼之前，許多個性強的女子看到其他女人的遭遇，一定會有類似的感受。許多拒絕這種悲慘生活的女人選擇了自殺。但對於朱素萼這一代堅強的女子來說，自殺遠非唯一的出路。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年青女子，她已經有新文化思想為後盾，新文化運動使得她能夠說出婦女受到的壓迫。「壓迫」、「人權」、「平等」這些新詞語不僅為她提供了一種分析身邊婦女受虐待的方式，更為她打開了新的視野。她知道了婦女可以過一種不同的生活，一種和男人平等的生活。她明白了通過高等教育就能走上那條不同生活的道路，並決定沿著這條路走，去追求一種沒有痛苦的生活，而這種痛苦是許多婦女經歷過的。堅強的個性、對其他婦女悲慘遭遇的憤怒和同情、對新機遇的敏銳感受，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使得她做出了離家的決定。這個決定本身也意味著新覺悟在這個年青女性身上出現了。離家是朱素萼獲得新的主體性的關鍵一步。

有必要指出的是，本書的其他幾位敘述者也都證明她們深受早年看到的婦女受壓迫的影響，深深觸動她們的那些女人通常是自己的母親或者近親。親眼目睹其他婦女遭受的痛苦，驅動著這些年輕女子為自己過上一種不同的生活而奮鬥。新文化對儒家文化壓迫婦女的批判，恰恰引起了這些女子的共鳴。對這些年輕女子來說，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最有意義的進步思想，就是根植於婦女權利或者說女權之中的男女平等概念。對於她們每個人來說，男女平等的口號喚起了婦女遠遠沒受到平等對待的記憶，又或許比這還要糟糕得多的回憶。因此，她們對男女平等的追求是個人目標，並沒有和建構現代國家的宏偉目標直接地或者有意識地聯繫在一起，而後者是男性精英用來倡導男女

平等的理由。用朱素萼的話說：「本來都是為自己爭女權。」雖然女權思想通過國族主義話語獲得了合法性，但許多像朱素萼一樣的女子起先只是從個人的視角來看待婦女的平等權利，而正是這種個人對女權的情結激發了1920年代婦女參與女權主義活動的高潮。但是，這種個人對女權的情結並不適用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因此共產黨成立後就立即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

朱素萼在1920年代沒有參加任何婦女組織。她選擇學習法律作為爭取女權的手段，這個不合常規的選擇既讓她成為受益者，也使她成了新文化女權主義的倡導者。新文化女權主義要求教育平等和職業平等，促成法律學校和法律職業向婦女敞開了大門，朱素萼通過選擇法律作為職業，迅速進入了新女性的行列。

相比為婦女創造新的社會職位，新文化女權主義達到了更重要的目標：重構了婦女的主體性。像朱素萼這樣受過教育的女子，在參加女權主義者組織活動之前，已經受到了女權主義思想的洗禮。朱素萼在其敘述中使用的語言充滿了新文化女權主義的詞語：「男女平等」、「人人平等」、「伸張女權」、「婦女也是人」、「獨立」、「自立」，這些詞不僅表達了思想，也用來描述她的生活。她選擇法律作為職業，目的在於伸張捍衛女權。她對高等教育的追求讓她成為獨立的職業婦女，擁有了獨立，至少在家裏享受到了男女平等。她具有典型的五四女權主義者的姿態，強調自己不會嫁給一個守舊的男人，也不會做一個太太。在朱素萼的年青時代，很多官員和有錢人都娶了女學生，一個受過教育的全職妻子是男人地位的象徵和現代性的標誌。一些精英女校甚至被冠以「太太學校」的綽號，許多畢業生都嫁給了地位顯赫的男人。如果下個定義，太太就是那些把丈夫的身分作為自己的身分、但沒有自己的職業或社會職位的妻子。對於受女權主義影響的年輕一代女子來說，做太太是對她們獨立人格的最大侮辱。<sup>33</sup> 朱素萼在訪談中驕傲地強調她在婚姻中的獨立性，以此來表達在此問題上的強烈情感。

作為一個享受到獨立和平等的年輕職業婦女，朱素萼的生活也證明了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追求的婦女解放之路，給這群女子帶來了實際的成果。她為自己追求女權，擁有為婦女開放的新的教育機會和職業機會，過上一種與她姨母或者母親截然不同的生活。朱素萼的故事證明，20世紀初中國的女權主義現象有著一定的社會和經濟基礎。上海這樣的現代都市出現了新的工作和職業，從而產生了新的中產階級。女子教育的發展則培訓了大量受過教育的婦女，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20世紀初上海的女子學校比國內其他地方多。<sup>34</sup>雖然這一大批女學生不是中國女權主義話語的發起者，但毫無疑問是女權主義主要的支持者。當男性新文化人士提出了男女平等的議題時，受過教育的年青女性迫切地投身於女權主義者要求的實踐，追求教育平等和經濟獨立。可以說，女權主義思想對特殊社會環境中的一群特殊觀眾有重要意義，並且吸引了她們。女權主義話語使得受過教育的婦女參與到了20世紀初中國中產階級的培育過程中，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這裏，一個與美國明顯的反差出現了。在20世紀之交的美國，職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產生男性壟斷者的過程，剩下的受過教育的女性通過創造與「女性」價值有關的職業，來為自己找到合適的職位。<sup>35</sup>在中國，女權主義與現代性的結合為1920年代和1930年代婦女進入各種現代職業提供了合法性。在上海，女銀行家、女企業家、女醫生、女律師、女作家、女編輯、女記者、女教師、女護士、女校長、女電影明星成為了中國現代社會有機組成部分。江青和丁玲是其中兩位於1930年代從上海去延安的著名職業婦女，但是許多女名人留在了上海。<sup>36</sup>雖然沒有對上海或者全國職業婦女的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是從朱素萼、陸禮華這些職業婦女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30年代救亡運動中，職業婦女已經是一支重要的社會力量。<sup>37</sup>

朱素萼不僅把自己看作是職業婦女，更是一個婦女運動的活動家。在女權主義高漲的1920年代，她沒有參加婦女組織。但是，在

救亡運動中，她組織了中華婦女國防會，成為婦女慰勞會上海分會的常務理事、上海市婦女界難民救濟會領導成員，創辦了《中國婦女》雜誌，1945年後還擔任了國民黨官方婦女機構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朱素萼沒有把這些活動看作單純是救亡運動的一種參與形式，而是把抗戰時期發生的事情界定為婦女運動和愛國救亡運動的混合體。她認為：「你參加了社會工作你才會懂得這一套的呀。否則什麼募捐寒衣、募捐經費，怎麼會得懂呢？這些就是女權裏面的呀，全出來做社會工作的。你女權不懂得，怎麼會去做這些工作？這些全屬於婦女運動裏面的呀。」她強調只有婦女在社會中工作，才能理解女權和愛國主義，這看起來好像女權（婦女權利或者女權主義）不僅包括在公共領域裏的權利，也包括為國家工作的權利。因此，按婦女活動家的理解，作為一個獨立的婦女組織的成員參加救亡運動，也是婦女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sup>38</sup>

我們在本書中看到，各種政治傾向的人都使用了同樣的詞語——「救國」和「抗日」——來表達了這一階段她們最關心的事情，但這並不等於說婦女被1930年代的國族主義話語所操縱；相反，婦女是出於自身利益而認同了國族主義話語。也可以這樣解釋，通過為救亡出力，婦女也是在為自身利益而工作，因為她們不想生活在日本統治之下。陸禮華的個案向我們證明了，日本人的侵略是如何毀了她的學校，隨後又如何使她從一個校長變成一個愛國活動家。但是，這裏還有另外一個把婦女愛國與婦女利益聯繫在一起的內在邏輯：從歷史角度看，正是通過國族主義這一途徑，中國婦女才能進入公共領域，救國運動使得婦女的社會空間得到前所未有的擴大，正是在這個階段，婦女組織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令婦女活動擴展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正如朱素萼明確指出：「我們這種事情都做過的，這樣你才好爭取婦女提高提高自己的地位呀！那麼好伸張女權了。否則你和男的還是不一樣，男的會做的你女的不會做，你伸張啥女權呢？不會得平等的呀。你會做的我也會做。」從擴大婦女社會空間的角度看，救亡運

動不但沒有阻礙，反而有助於推動女權主義事業。這或許能解釋為什麼這麼多政治傾向各異的中國婦女活動家，都把她們在抗戰中擔任重要角色視為中國婦女運動史上重要的一章。對她們而言，所有那些能夠賦予婦女權利和擴大婦女社會空間的有組織的活動，都是婦女社會進步取得實實在在的成就的一部分，也都應該被界定為婦女運動。

如果說中國婦女活動家和學者對於婦女在 1930 年代發揮了顯著作用達成了一致的看法，但卻對誰領導了中國婦女運動以及這場運動的構成等問題上存在分歧。由於朱素萼加入了國民黨，她對中國婦女運動史的認知反映了國民黨的立場，她的一些觀點會受到共產黨歷史學家反駁。例如，朱素萼聲稱：「沒有國民黨，就沒有婦女運動。清朝會讓你搞婦女運動嗎？」她還強調婦女運動在抗戰後到 1949 年前這期間到達了頂峰。朱素萼把中國婦女運動的存在歸因於國民黨的這一觀點，不僅反映了國民黨的官方立場，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許多女權主義者加入了國民黨。<sup>39</sup>

國父孫中山在推翻清朝的革命中擔當了領導角色，即使在他去世後，國民黨在民眾中依然保持了革命黨的形象。對於女權主義者來說，國民黨關於男女平等的記錄看起來十分體面，其前身中國同盟會在 1905 年成立時就宣告男女同為國人，一切平等。雖然 1912 年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時，在中國首次婦女參政運動高漲之際，出於對政界保守勢力的妥協，新擬的國民黨黨綱中刪去了「男女平權」，引起同盟會女會員的激烈反對，<sup>40</sup> 但是這段背棄當初男女平權承諾的歷史，並非鐫刻在五四一代青年女性的記憶中，畢竟 1924 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改組後的國民黨再次確認了男女平等的原則。總體來說，用女權主義綱領來動員婦女參加國民革命，是此時兩黨的共識，執行「聯俄容共」政策的國民黨內的左派和女權主義者在這方面的推動並不比共產黨少。在 1924 年 1 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三位女代表之一的何香凝提出了「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的議案，其後議案獲通過，將男女平

等寫進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為了更有效地組織婦女活動，1924年1月31日，國民黨第一屆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決定仿效蘇聯的組織架構，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成立婦女部。<sup>41</sup>此後各級黨部都成立了婦女部，女國民黨員和女共產黨員在這些部門一起工作，來推動國民革命中政黨領導的婦女運動，穩固地樹立起國民黨在這一時期推動的婦女運動中的領導角色。<sup>42</sup>

由於國共兩黨為了國民革命而聯合起來，對婦女運動的出現加以控制並使其制度化，令婦女運動變得更為複雜了。在許多五四女權主義者加入了共產黨或者國民黨，並推動一場政黨領導的婦女運動後，五四女權主義組織和無黨派婦女組織在1924年後就被政黨領導的婦女運動所收編或遮蔽。1927年統一戰線破裂後，兩黨都保留了其婦女部、婦女運動委員會或更名後繼續領導婦運的機構，並從此宣稱自己在中國婦女運動中扮演了領導角色。<sup>43</sup>新文化女權主義話語把「婦女運動」變成了標識中國現代性的徽章，任何聲稱要推動中國向現代文明邁進的政治力量都會佩戴起來標榜自己的前衛性。

國民黨在1927後成了中國的執政黨，進一步鞏固了它對婦女運動的控制。這一時期的宣傳都在稱頌國民黨在婦女解放中的作用，並頒佈了婦女要遵從的新準則。在1933年出版的《婦女問題論文集》中，作者呂雲章詳細解釋了國民黨的婦女運動政策：

既然婦女運動是一種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很顯然的，必須與國內政黨提攜，而不應一意孤行、自行其是。然而環顧國內政黨中，最提倡婦女運動、切實尊重女權、保護女益，殆無過於國民黨者。以往婦女運動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婦女的地位，增加了許多。自今以後，婦女運動，還得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以共謀黨的利益，和婦女的利益。<sup>44</sup>

呂雲章提到了婦女要遵守的幾個準則：婦女要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從事有組織或有計劃的活動；婦女應該追求精神解放和行為改造，讓



自己的生活更簡樸、更科學、更接近普通人；婦女組織不僅要關注自身利益，還要考慮社會和國家更廣大的利益。

這幾條準則揭示了國民黨的婦女運動的幾點信息。其一，國民黨試圖把所有的婦女活動納入其「有計劃的」領導之下。雖然這一意圖證明了政黨想要控制社會的方方面面，但這也可以被解釋成國民黨女權主義者對更為有效的婦女運動的展望。朱素蓁的故事有助於理解那些在國民黨各級婦女部和婦女運動委員會工作的許多婦女在國民黨等級結構中的位置。在她們看來，國民黨的政治權力能夠被用來為婦女利益服務，正如許多女權主義者加入共產黨是出於對中共婦女解放路線的信仰，許多女權主義者加入國民黨則是出於對婦女參政的執著。每個政黨對婦女運動的控制不僅是男性主導的一種體現，更被兩黨的女權主義者理解為婦女運動的「正確路線」。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婦女部或婦女委員會工作的婦女，都支持她們各自的黨在婦女運動中扮演的「領導」角色，並為了鞏固其政黨的領導地位而努力工作。

其二，呂雲章強調的婦女改造回應了《婦女雜誌》的重要主題（見本書第二章）。應該指出的是，婦女的自我改造不僅也是共產黨婦女解放路線的一個重要主題，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聯大力倡導的主題。這意味著執政黨的女權主義者或多或少要和統治階級保持一致，並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普通婦女群眾。不過，呂雲章提倡婦女生活應該更「簡單化、科學化、平民化」，暗示了國民黨女黨員的階級背景，她的表述蘊含了對國民黨女黨員中的精英主義的警示。<sup>45</sup> 儘管呂雲章與共產黨內的女權主義者不同，並沒有採用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概念分析中國婦女的慣常做法，但她意識到了國民黨女黨員與下層婦女之間的隔閡。比如，呂雲章批評婦女運動中的活動家「多少有點閨閣氣」，因為她們不能忍受為爭取婦女利益所受的艱苦。<sup>46</sup> 她建議城市裏受過教育的婦女應該到鄉村地區去當小學老師，以便接觸鄉村婦女，推進男女平等。她還建議，為了能在全國範圍內有效地領導婦女運動，國民黨應該開設兩個婦女運動的試點，一個在城市，一個在

農村。<sup>47</sup> 但是，即使意識到城鄉婦女之間的差距，國民黨並沒有採取行動來加以彌合，而這或許說明了立足於城市的國民黨婦女活動家遠離下層婦女的生活，很難有特別的措施來彌合差距。

第三，雖然國民黨試圖控制婦女運動，但既沒有禁止社會上的無黨派女權主義組織，也沒有採取共產黨那種負面定義女權主義的排斥性做法。相反，「女權」這個詞的歷史似乎是與國民黨聯繫在一起，在國民黨員的著述中廣泛流通，並且對於朱素萼這樣的國民黨女權主義者和陸禮華這樣身處在國統區的女權主義者來說，這個詞始終保留了其積極正面的意義。其所代表的女權主義要求男女平等，但不倡導推翻現行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因此它在國民黨統治下保留了合法地位。呂雲章提到的幾個準則反映了國民黨對有組織的婦女活動的控制，與婦女自發活動的可能性是並存的；在國民黨提出的幾條準則的範圍內，婦女被允許自發組織起來。五四時期婦女結社自由的傳統在國民黨時代保留下來，正是這種社會和政治環境使得1930年代的婦女組織活動達到高潮。相比而言，共產黨對婦女組織活動的控制要更嚴格、更全面：從革命根據地時期開始，共產黨內的婦女組織到1949年後的婦聯，是婦女利益和婦女聲音的唯一合法代表，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1949年前的許多婦女活動家在毛澤東時代的命運。當1949年後婦女的社會空間被急劇壓縮，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這些婦女活動家在官方體制裏發揮作用的空間，前婦女活動家陸禮華和朱素萼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

朱素萼的故事闡釋了國民黨領導的婦女運動中的婦女活動。在她的記憶裏，雖然許多婦女組織在日本佔領上海租界前也十分活躍，但婦女運動是在抗日戰爭後才達到頂峰。從她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一場體制化的婦女運動在1945年後的上海復蘇了，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不僅擁有一間大辦公室，而且鞏固了其對各行各業婦女組織的控制。考慮到朱素萼在1945年是婦女運動委員會的委員，在這一時期得以發揮更為顯著的作用，因而可能影響到她對「頂峰」的理解。雖然在抗

戰的那些年裏，朱素蓁也很活躍，但婦女聯合組織的代表是諸如何香凝和許廣平這樣的大人物，其他名氣不大的人就很容易黯然失色。此外，抗戰期間國共兩黨的合作使得共產黨和無黨派的活動家在國統區能夠大展身手，但隨著第二次統一戰線的破裂，國民黨的婦女運動委員會則完全佔據了國統區的婦女運動領導地位。

朱素蓁的敘述也揭示了她加入國民黨和參加婦女運動的動機。當她解釋自己為何加入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時，她給出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國民黨正在掌權。朱素蓁主動提到她大學畢業時就是國民黨員，文憑上蓋的圖章讓她有資格當個地方知府。雖然她畢業後當了律師而不是官員，但對於一個從小就與官宦之家的女孩來往的年輕女子來說，這個圖章意義非同尋常。不過她還是在女權主義的框架內表達了她的政治抱負：「要爭取到平等權利，你就要找個代表去發言，提出來。你不提出來，會送給你的嗎？」

因此，對於朱素蓁來說，獲取政治權力是她為平等權利奮鬥必不可少的一步，而她從事婦女組織活動也反映了她對政治形勢的清醒判斷：「我搞婦女組織的辰光，國民黨放開了，婦女可以參加參政會。」朱素蓁組織中華婦女國防會，不僅是為救國奉獻出力，還是為了取得政府裏的代表權。作為婦女組織的領袖，她很快和其他幾位婦女代表聯合組成一個代表團去南京請願，謀求在國會中獲得更多的婦女席位。作為婦女組織的領袖，她成了上海兩個聯合婦女組織的常務理事，即婦女慰勞會和婦女界難民救濟會。當她的朋友錢劍秋當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領導的婦女運動委員會的主席，她被邀請成為委員。於是，通過她在婦女組織裏的活動，她成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官員。朱素蓁的經歷似乎印證了共產黨對「資產階級女權運動」的一種批判，即許多上層婦女組建婦女組織主要是為了在政府裏當官。當國民黨的權力結構在最大程度上把婦女拒之門外時，婦女組織提供了一條進入權力結構的重要途徑。國民黨內的婦女很難進入權力核心，而朱素蓁向我們表明，婦女運動委員會成為在權力結構中由婦女開拓並佔領的領域，在這個領域內工作成為朱素蓁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

朱素萼未曾預料到，在國民黨權力結構中的短暫時光讓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她的黃金時代在1949年戛然而止，從48歲開始，她就被剝奪了工作的機會，1955年後更被關押了兩年。她近80歲時才被平反，當上了文史館員，享受一些社會地位和利益，但沒有什麼能夠彌補她失去的珍貴歲月。94歲高齡的她，思維仍然犀利敏捷，以一個律師的口才侃侃而談。當她提到1955年遭受到荒唐的審判時，她放聲大笑，就好像她說的是別人遭遇的荒唐之事。伴隨著她明顯的開朗樂觀精神，卻是毫不掩飾的深深遺憾。訪談中她不時會說這樣的話：「解放時正當好做事的辰光，正當要發展的辰光，1949年就休息下來了，等於退休了」、「虛度光陰幾十年」、「我現在懊惱不應該做律師的，我就應當做作家；做作家的話，1949年解放之後我就呆在家裏著書好了」、「當時我只是想，就為了伸張女權，去做律師的。不曾想律師做的時間太短，只做到1949年」。與許多有著類似經歷的婦女一樣，朱素萼看到自己的經歷並不是最糟的，並以此安慰自己。很多人都沒能挺過迫害。

朱素萼和本書中的其餘四位受訪者都認識，其中和陸禮華在年輕時候就相熟。雖然一位是國民黨，一位是無黨派，但兩人一直都很友好，陸禮華與顧正來結婚時，朱素萼參加了很熱鬧的婚宴，送了銀盾作為禮品。1945年以後朱素萼還邀請了無黨派的陸禮華擔任上海市婦女會的理事。在一段我沒有記錄進她自述的談話中，朱素萼表達了對陸禮華的尊敬，她說：「我一直贊成她，說她不容易，她靠自己的能力打天下。一個鄉下的女孩子，中國體專出來，就去辦體育學校，那是要有點魄力的，我就佩服她的魄力。」她還將陸禮華和自己做了比較：

陸禮華這個人很開通的，她和我兩樣的。她沒有人管頭管腳的，她的交際廣得不得了，男人無所謂的。不像我上有長輩下有小輩（抗戰時期朱素萼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搬到了上海），不行的。陸禮華是鄉下出來的，情況不同。她辦這個學堂，要借社會上的人幫忙囉，所以她要拉私立學堂校董會、找有名人物，雖然不出鈔

票，名譽上幫幫她也好的囉，所以她蠻活絡的，男朋友女朋友全交際廣得很。我是兩樣的，做律師靠法律條文吃飯的。

在1949年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朱素蓁不敢去拜訪任何人，與她諸多活動家朋友們都斷了聯繫，但這兩位早年的婦女活動家卻一直保持著友誼，直到陸禮華去世。文化大革命後，陸禮華來找朱素蓁商量怎麼從政府手裏要回她在老西門和江灣的兩處學校房產。朱素蓁希望陸禮華至少能夠收回江灣的學校房產，那是陸自己買下地皮來建造的。當年學校裏有一個很好的游泳池，朱素蓁和其他女性朋友經常約了一起去那裏玩。朱素蓁講了陸禮華如何去與教育局交涉，但是無果。「最後弄到文史館來，學堂麼弄不回來。」這位94歲老人以略帶諷刺的口吻做的評論，顯示了老人依然犀利的洞察力。

有一次我去拜訪朱素蓁，提到了1990年出版的《上海婦女運動史》。她對這本書很感興趣，我就把書借給了她。我再次見她時，她很生氣，對我說：「這本書我看了大部分，沒必要看完了。我曉得了她們只寫共產黨婦女，其他婦女一起做的事情講了，人就都不提了！」儘管朱素蓁在救亡運動中非常活躍，又是上海國民黨婦女運動的領袖人物，這本婦女運動史卻一句都沒有提到她。她對這本書的評價也是準確的。上海市婦聯寫的這部著作呈現了1949年前上海女共產黨員活動的圖景，除了打入非共產黨掌控的婦女組織的地下黨員（包括朱素蓁的中華婦女國防會的一位幹事），其他黨派的婦女活動家則極少被提及。對於這種基於政治立場對史實做取捨的婦女史，朱素蓁表露的強烈不滿與失望令我難以忘懷。

在此呈現的，是被官方歷史抹去的朱素蓁的人生故事，相信其有助於加深我們對20世紀上半葉各類職業婦女及其與女權運動的關係的了解，並提醒歷史學者，在任何限制條件下要盡可能地區分做歷史和搞宣傳的差別。

## 注釋

- 1 以下敘述是在1993年2月19日、1993年3月5日、1994年12月22日、1995年1月7日訪談的基礎上形成的，也參照了朱素蓁本人寫的小傳。
- 2 舉人是指明清科舉考試中通過了省試的人。
- 3 在科舉考試中，通過了殿試的叫進士。通過了最低一級科舉考試得以在府學、縣學讀書的，則稱為秀才。
- 4 瞿秋白(1899–1935)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
- 5 史良(1900–1985)是一位著名的律師，也是救國會的領導之一。救國會號召結成統一戰線，抵抗日本侵略。她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司法部長。
- 6 磐大石為圓形如大磨盤，刻花。
- 7 鄭毓秀(1891–1959)於1925年獲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是中國第一位女性法學博士，為民國時期法律界和政界知名人物。
- 8 關於彭慶修更多的故事，參見第八章黃定慧的敘述。
- 9 這兒朱素蓁指1949年之後，她因自己國民黨員的身分低調生活，因為以前熟悉的史良等人成為新政府的掌權者。
- 10 錢劍秋自1930年代初起一直是朱素蓁的好朋友，她1949年去了台灣，1960年代擔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婦女工作委員會的主任。錢和朱一起從事的婦女運動是國民黨內的婦運。
- 11 按照傳統習俗，新娘要被轎子從娘家抬到新郎家裏。這裏，朱素蓁父親的意思是做好了打官司的準備。
- 12 孫中山闡述的三民主義——「民族」、「民主」、「民生」，是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基礎。「總理遺囑」是他留給國民黨的一份重要政治文獻。
- 13 舊時指審理訟案的司法官，即今日法官。
- 14 此處的「乖」應為「乖巧伶俐」的含義。
- 15 朱素蓁在這提到的去南京請願，指的是1931年春天，國統區女權主義者組織的全國性的婦女參政行動。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在1931年5月召開國民會議。1930年元旦國民政府頒佈的《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規定的團體代表中，並沒有包括婦女團體。雖然婦女可以參加其他各界代表的選舉，各地婦女團體還是紛紛行動起來，爭取婦女團體選舉代表的權利，並派婦女團體代表赴南京請願。國民黨中央沒有改變選舉法，作為妥協允許一些婦女團體派代表列席國民會議，並增加了各界代表中的女代表人數。關於國民政府時期的婦女參政運動，參見梁惠錦，〈抗戰前後的婦女運動〉，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第三章；及李木蘭著，方小平譯，《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 16 關於民國時期婦女團體之間的關係，可參見葉韋君，〈後五四時期的知識婦女：《婦女共鳴》的社會網絡（1929–1944）〉，《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3期（2019），頁113–163。雖然此文聚焦南京的女權組織和刊物，但所述婦女團體間的關係、組織方式與行動目標都與朱素蓁所述同期上海的婦女團體運作有諸多雷同之處。
- 17 此處朱素蓁對歷史事件順序記憶並不準確：宋美齡成立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是在1937年8月1日，上海分會則於1937年8月4日宣佈成立，在淞滬會戰之前九天。
- 18 何香凝（1878–1972）1904年在日本加入了同盟會。她丈夫廖仲愷是國民黨的高級領導之一，1925年被暗殺。雖然沒有官職，但她在國民黨的聲望很高，影響很大。她在很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扮演了領導的角色，這在後面的敘述中會提到。
- 19 採訪後，朱素蓁給了我一張紙條，上面寫有上海慰勞分會七位常務理事的名字：何香凝（理事長）、許廣平、史良、李秋君、朱素蓁、黃定慧、田淑君。這個名單與上海市婦聯編的《上海婦女運動史：1919–1949》不一致，這整本婦運史裏都沒有提及朱素蓁的名字。
- 20 許廣平（1898–1968）是魯迅的妻子，在魯迅1936年去世後她成了上海公眾視野中的名人。關於許廣平的簡要論述，參見第一章；黃定慧是本書中的另一位口述者，參見第八章。李秋君是一位藝術家，除了組織救濟工作外，還捐了自己畫的國畫，為抗戰籌錢。她的畫作描繪了婦女抗戰的情形。
- 21 「76號」是汪偽政府的特務機構所在地，位於極司非爾路76號（今萬航渡路435號）。
- 22 見注17。
- 23 朱素蓁在國民黨內的婦女運動中致力於參政運動，她這段敘述並未能呈現她在這方面諸多的活動和領導角色。筆者在本書英文版發表多年後，看到了一些史料記載了她的活動，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民國政府卷（1912–1949）》，下卷（中國婦女出版社，2011），頁656。在其中的〈上海婦女界爭取國大代表名額發起人名單〉中，朱素蓁排名第二，列於錢劍秋之後，此次活動於1940年4月開展，為了爭取更多婦女代表參加1940年國民大會；同卷的頁902至903中，朱素蓁作為上海市婦女會理監事起草了《上海市婦女會請增加婦女參議員名額》呈文（1946年5月14日）。這些史料佐證了她自述中提到的1930年代初期到1949年間，她曾是上海國民黨婦女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
- 24 奉化是蔣介石的家鄉。
- 25 「七君子」是沈鈞儒、李公朴、章乃器、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和史良，都是救國會的核心人物。國民黨指控他們的活動危害公眾，於1936年11月23

- 日逮捕七人，引起了全國的抗議呼聲。共產黨和許多無黨派人士加入到營救七君子的行動中，也營造了強烈譴責國民黨政府的公眾輿論。這七個人後來被讚譽為「愛國七君子」。
- 26 沈茲九(1898–1989)是1930年代上海著名的社會活動家，1934年她是《申報》副刊《婦女園地》的主編，1935年她新辦了《婦女生活》雜誌。《婦女生活》是抗日戰爭期間宣傳中國共產黨婦女運動政策的主要媒體，先是在上海發行，後去武漢、重慶繼續出版。沈茲九1939年成為中共地下黨員。解放後，她是全國婦聯的領導，也是全國婦聯雜誌《新中國婦女》的主編。
  - 27 希望工程是一個幫助貧窮地區孩子上學的國家項目。文史館要求館員捐款，兩百元是最大的一筆捐款。
  - 28 朱素萼在這兒指的是1946年三八國際婦女節，由國民黨婦女運動委員會組織的上海各界婦女的集會遊行。她聽說那天還有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在中山公園的三八節婦女集會，但遊行走到半路就被社會局擋住了，沒能走到靜安寺。《上海婦女運動史》的說法是，中共以上海婦女聯誼會出面組織的婦女集會規模比國民黨組織的大，儘管有國民黨特務阻撓，仍有三萬婦女的隊伍從中山公園出發，一直遊行到外灘。兩撥隊伍在南京路相遇了，國民黨組織的隊伍被中共組織的衝散了。參見上海市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頁238–244。
  - 29 提籃橋是上海監獄所在地，建於1901年，早年有「遠東第一大監獄」的稱號，位於今日的虹口區。上海人不說「進監獄」，而是說「去提籃橋」。
  - 30 「三八紅旗手」是一項榮譽稱號，頒給從不同區域和城市選出來的少數優秀婦女，她們通常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挑選由各級婦聯來運作。三八婦女節是1920年代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從蘇聯引進，此後國共兩黨都慶祝這一節日。「先進教師」是授予高水平教師的一個稱號，按照小學和中學來分類。
  - 31 謝希德(1921–2000)是位著名的女物理學家，曾擔任復旦大學的校長，1988至1993年擔任上海市政協主席。陳鐵迪(1935–)在1993至1998年間擔任上海市政協主席，成為繼謝希德之後的第二位女性主席。此後，上海市政協主席一職再未有女性擔任。
  - 32 關於清朝時期一些地區(包括朱素萼的家鄉常州)女子教育重要性的研究，參見曼素恩，《綴珍錄：18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
  - 33 那些加入共產黨的女權主義者後來因這問題陷入了尷尬境地，她們的丈夫成了高級幹部，在一些外交場合她們被稱為「某某夫人」。為了避免這種羞辱，許多婦女拒絕陪同她們的丈夫出席這種外交場合。參見金鳳，《鄧穎超傳》(人民出版社，1993)，頁581–589。



- 34 1907年，中國22個省一共有四百多所女校。許多上海的女校在全國都有名氣，因此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朱素蓁進入的愛國女校就是其中非常著名的一所女校，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創辦。
- 35 關於美國婦女進入男性職業領域的努力，參見D. Kelly Weisberg, “Barred from the Bar: Women and Leg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890” (被排除在律師業之外：1870至1890年美國女性法律教育史),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28, no. 4 (1977): 485–507；Rosalind Rosenberg, *Beyond Separate Spheres: Intellectual Roots of Modern Feminism* (超越性別隔離：現代女權主義的思想起源)(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以及Barbara Miller Solomon, *In the Company of Educated Women: A History of Wome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與知識女性同儕：美國女性高等教育史)(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36 江青在去共產黨根據地之前是上海的一個電影明星，在延安時成了毛澤東的妻子。丁玲是一位著名作家，在抗戰時期也去了延安。關於這一代上海職業婦女的紀錄，參見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以及Pang-Wei Natasha Chang (張邦梅), *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小腳與西服)(Anchor Books, 1996)。
- 37 受訪者的描述得到許多文獻證實，雖然這些著作與本書的研究重心不同，但卻描述了1930年代婦女逐漸擴大的社會角色。在《鄧穎超傳》中，金鳳描述了鄧穎超為了抗戰而努力聯合不同政治立場的婦女。她使用的這些素材也可以被解釋為顯示國共兩黨為了贏得著名職業婦女和她們組織的擁護而進行的鬥爭。見金鳳，《鄧穎超傳》，頁262–274。

《上海婦女運動史》一書則把焦點放在女共產黨員在婦女運動中的作用，列舉了這一時期許多婦女組織和傑出的婦女活動家。儘管它描述了婦女活動日漸聲勢浩大，但朱素蓁反對其對非共產黨婦女的忽略，這一批評進一步確立了1930年代是婦女社會活動進行得最史無前例的時期。自本書英文版於1999年出版之後，中英文出版界有諸多關於民國時期職業婦女在各領域開拓的著述。
- 38 不僅朱素蓁和她那一代的婦女活動家抱有這種看法，當代中國歷史學家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最近關於中國婦女運動歷史的研究都認為，婦女參與救國運動在中國婦女運動史上寫下光輝燦爛的一筆。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以及上海市婦女聯合會，《上海婦女運動史》。
- 39 許多五四女權主義者後來選擇加入共產黨或者國民黨。比如學生活動家王孝英1922年在北京參與創建了女子參政協進會，成為發起五四女權運動的重要組織之一。1933年她出任國民黨立法院第三屆立法委員，並在1930年代上海婦女組織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 40 參見本書第三章對民國初年婦女參政運動的介紹。
- 41 蘇聯共產黨於1919年在中央委員會中創立了婦女部，參見卡倫·奧芬著，朱曉慧、柯倩婷譯，《歐洲婦女解放史》，頁328。第三國際第三次會議決議，命令各國共產黨建立婦女部，中國共產黨在1922年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婦女運動決議中表示盡快實現第三國際的決議，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1922年7月），中國婦女幹部管理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一冊（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頁49-50。尚不清楚1924年國民黨成立婦女部是接受了中共的建議，還是蘇聯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的主意。據洪宜嬪研究，何香凝在廣州與鮑羅廷夫人關係密切，並且她任婦女部部長後中共女黨員大量進入婦女部，參見洪宜嬪，《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國史館，2010），頁28-31。
- 42 《中國婦女運動史》提供了國民黨婦女運動組織變化的情況。儘管這部著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家所寫的中國婦女運動官方歷史，卻提供了國民黨在國共合作時期推動婦女運動的重要作用的詳細信息。這也與此時兩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狀況相關。推動男女平等和國民革命婦女運動的兩位國民黨女領袖何香凝和宋慶齡，在1927年兩黨合作分裂後轉向支持共產黨，此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擔任要職。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61、158-160。關於這一階段婦女活動的進一步討論，見本書第八章。
- 43 對國民黨婦女組織發展的歷史研究，可參見洪宜嬪，《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
- 44 呂雲章，《婦女問題論文集：第一集》（女子書店，1933），頁69-70。
- 45 同上注，頁70。
- 46 同上注，頁62。
- 47 同上注，頁72。



# 6

王伊蔚  
(1905-1993)

主編

“ 我的婦女解放就是：一切的一切，  
婦女就是一個人，跟男人一樣，立  
於平等的人的地位。 ”



王伊蔚，1989

王伊蔚熱情地邀我進入她那僅有七平米的小房間。當我想找地方放包時，她為空間的狹小道歉。作為上海本地人，我習慣了擁擠的小房間；但是，看到這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住在如此狹窄的空間裏，我還是感到痛心。不過我的悲傷情緒很快被牆上的國畫和書法所轉移。王伊蔚得意地告訴我，除了一幅書法卷軸外，其他的都是她自己的作品。在她的書架上，我發現當時中國的一本暢銷小說。王伊蔚說她已經把這本書讀完了。在我們的交談中，她拿出幾本厚厚的相冊，給我介紹她的家人和朋友，我意識到王伊蔚的思想和社會生活並沒有局限在這個小房間裏。她對當今政治的尖銳批評（她讓我不要錄這類話），顯示了她思想的活躍和對中國社會發展的深入洞察。看著她虛弱的身體，我對她思維的活力和情感的充沛感到驚訝。<sup>1</sup>

## ■ 自述

我來告訴你我的愛與恨，愛與恨都源自堅實的基礎。吸引我參加婦女運動並且一輩子關注婦女的，就是婦女受到的封建壓迫和男人的壓迫。

我出生於一個封建家庭。我母親生了七個孩子，兩個男孩，五個女孩。我爸爸那時候也不是資產階級，他出生在福建馬尾，家裏大概是中農，我也不大清楚。他入了海軍學校，就是李鴻章在天津辦的北洋水師學堂。他最後在袁世凱手下當上一名軍官。因為我跟著父親輾轉各地，所以我的口音混雜，很難辨別出我是哪裏人。我排行第五。在我前面有兩個姐姐和兩個哥哥，我後面還有兩個妹妹。我大姐和一個小妹在小的時候就死了。另外兩個哥哥也死掉了。結果，七個孩子只剩下我們三個女孩子。我媽媽根本不知道怎麼養孩子。我媽媽挺腐敗的，一天就知道享受。

我出生於1905年，我一養出來就很摩登：我媽媽在醫院生的。什麼醫院？大名鼎鼎的紅房子婦孺醫院，<sup>2</sup>那可是在上海剛成立的教會

醫院。我說我怎麼還摩登？有一點創造能力？（大笑）我母親就會享受，也很會趕時髦。我出生前，我大哥就死了。我二哥跟著母親到醫院，去跟著母親一塊吃產婦吃的東西，吃得很好。養了我以後，他非常歡喜我，他那會四歲。可是我一哭呢，他嚇得不得了，很奇怪。好了，我倒楣了，結果怎麼樣？我哥哥因為吃得太好了，再加了又不消化，結果死了。他死了以後我就得了一個綽號，我母親說都是我害他的，我把哥哥吃掉了。算命的人也說我命很硬，我哥哥是我吃的，母親相信了，於是就叫我「掃帚星」。更糟的是，生了我之後，母親又生了兩個女孩，沒能生男孩。因此母親終身遺憾，這對我不利的，從小就埋下這種壓力。你曉得我為什麼要參加婦女運動？我在家裏是這樣的地位，一切的待遇好像都比我妹妹差，妹妹長得又好看，又沒有吃掉哥哥。

我爸爸比我大30歲。他39歲時，我媽媽還只有36歲不到。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兒時在舊北京城的一個新年，那天我父親坐在炕頭上，來訪的姑姑坐在炕頭的另一面，對我父親說：「恭喜你今年40大壽，可你膝下還缺少個兒子。常言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你該想個辦法啦！嫂嫂是個明白人，她絕不會怪你的。」當時坐在一旁的母親面色刷的一白，立刻離開座位回到自己的房間。我尾隨進去，只見母親一頭倒在床上淚流滿面。當她發現我站在一旁，隨手就給了我一巴掌，罵道：「你這個掃帚星，還不給我滾開！」

就在這年下半年，母親孤身一人悄悄去福建家鄉。她很聰明，知道我爸爸總會討小老婆的，她想：「與其他討一個，還不如我給他討一個。」她到福建用四百大洋向地主家買了一個17歲的丫頭，帶回北京家中，人人都稱讚母親賢慧，替丈夫納妾。這個丫頭雖然又醜又笨，但她的肚子卻很爭氣，十個月後就為父親生下一個胖小子。孩子生下後，母親就把他抱在懷裏，據為己有。我們管這個小妾叫「姨娘」。她雖然生了一個男孩，但並沒有改變其卑微的地位，依舊整天繁忙地操勞家務，與傭人沒什麼兩樣。

我媽媽生了七個孩子，一個男孩都沒有了，因此我爸爸娶小老婆。我媽媽為此長期心情憂鬱，終於得了胃病了。胃病看不好，有人勸她還得用鴉片，吃鴉片就好了，她就吃上鴉片了。一吃鴉片又搓麻將，就是這樣一個墮落的女人。她娶來那個小老婆，她虐待小老婆：晚上叫她伺候吃下鴉片，吃完鴉片，再給她洗腳，再給她煮點心。這樣每一夜都要鬧到2點才睡覺，早上12點起來，全部姨太太伺候她。家裏頭不是有廚子有傭人麼？不要，要叫小老婆來伺候她。這麼虐待，那我也看著不順眼。我爸爸不要小老婆伺候，就伺候我媽媽。他有時候陪著我媽媽也吃鴉片，在一塊兒。這種環境惡劣吧？我媽媽妒忌很厲害，我媽媽長得很美，我爸爸大概是怕老婆的人。我媽媽自己認字，看小說。一方面吃鴉片，一方面自己認字，一方面叫我的表哥講書講點小說給她聽。她死的時候，她床鋪底下一箱子書都是《紅樓夢》、《水滸傳》了，什麼都看的。不管怎樣，在那種可怕的家庭環境中，我既同情母親，又可憐姨娘，我恨的是父親。幼小的我就暗暗地立下了志願：「我一定要為母親爭氣，為所有的女人爭氣，長大了做一個比男人還強的女人。」

我父親得了胖小子，精神振奮，工作更加努力，取得了當時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的賞識，任命父親為松花江江防司令，<sup>3</sup>批准他帶八艘軍艦通過威海衛進駐松花江，於是我們全家搬往哈爾濱。

我們福建人歡喜請家庭教師教育子女，我爸爸叫我在學堂裏讀，我在學堂裏讀過小學。後來在哈爾濱我們請了家庭教師，沒有到學堂裏去。我為什麼好像還有這種開拓的習慣？好像還有這種新的思想呢？關在哈爾濱的家裏頭怎麼還有一點新的思想呢？就是我這個家庭教師灌輸我的。還有我爸爸是很用力栽培我的。雖然我是個女的，但是他看我還聰明。他是官僚啦，他手底下的秘書都是我的老師。其中有一個老頭做過天津《益世報》的主編，他大概退休了，他管我寫文章，寫報紙的政論文，還有一個呢教我寫信，還有一個50歲的男人是清朝的舉人，他教我讀《孟子》和古文。大概我受孟子的影響深，

我把《孟子》唸了七遍。孟子「君為輕、民為貴」的政治觀點刻印在我腦海裏。他還教我們唐宋八大家的作品，<sup>4</sup>我妹妹和我一起唸。她讀《論語》，我讀《孟子》和《詩經》。我們也讀柳宗元。我們讀了很多文章，但沒有讀唐詩。他把我當男孩子培養，我爸爸媽媽把我當男孩子培養。我和妹妹從早上9點唸到晚上9點，一般都不放出來，出來吃飯，吃完飯再進去。

總而言之，我家裏頭對我也不壞，就是偏心。我還有個奶孀孀，老壞的，她叫我吃奶吃到六歲。為什麼叫我吃到六歲呢？她要保持她的飯碗。她說我爸媽對我很偏心，什麼好的東西我都挨不著，因此我就產生一種好像對父母不好的心。這麼樣子呢我就拼命讀書，關在家裏頭。到了我16歲的時候，我心裏想：「我一定要奮鬥唸書，我要唸得比弟弟好，我一定要留洋出國。」那個教我《孟子》的老先生知識淵博，思想進步得不得了。他看《東方雜誌》，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的進步雜誌。他給我講他讀到的內容，還鼓勵我去上海讀書。女孩子挺好，要唸書，要像什麼木蘭什麼謝道韞，這還是一種舊思想。<sup>5</sup>所以我對我爸爸說：「我不一定結婚，你用不到陪嫁，你陪嫁的錢栽培我唸書吧。」我爸爸看我還聰明，而且他手底下那些人又拍馬屁，就說我特別聰明，我爸爸就答應我了。我爸爸媽媽想栽培我做女狀元。我要求到上海唸書，還指定的學校，上海的中西女塾，很有名氣的。我爸爸身邊的衛兵保護我一個人，從哈爾濱到了上海，就在中西住宿了。我告訴你這頭一段：一個像我這樣出身封建家庭裏的人，為什麼後來思想這麼進步？還就是因為家裏是如此出身的。



1921年我離開家從哈爾濱來到上海。但進了這有名的中西女塾後，我卻不喜歡這所學校。這是美國教會辦的學校，除了國文課以外，所用的課本全部採用英文教材。在這裏，我經過三年的訓練，在英語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這學校使我不滿意，除了它那深度洋化的教學使我難以接受外，最令人頭痛的是每天清晨做禮拜、讀聖



經。甚至星期天整個半天都被關在學校，聚集在大禮堂恭聽牧師佈道或信徒們陳述「神的奇蹟」。更何況這個學校所錄取的學生幾乎全部是資產階級千金小姐，每天上下課大多由汽車接送。宋美齡就是從這裏畢業的。這裏的學生個個穿得花枝招展，每個人都有一個親密的好友，下課後一雙雙、一對對像情侶一樣在操場上並肩散步，唯有我這個離群的孤雁像「鄉巴佬」似的，在宿舍裏埋頭苦讀。中西女塾的大部分畢業生都去了美國。我進中西女塾也是想要出國留學的。但因為我不喜歡這個教會學校，所以在父親從哈爾濱離職回到北京，我也趁此機會離開了上海。

到北京後，我考取了馮玉祥將軍領導的今是中學。這是中國第一個男女合校中學，由五個教會學校中反帝反教會的進步師生脫離原校而匯合創辦的。取名「今是」即悟出「昨非」而「今是」的意思。學校成立了學生會，我被選為學生會文書，參加了一系列進步活動。其中最使我難忘的是當時在北京發生了震撼全國的「三一八慘案」。那天學校師生走上街頭遊行示威，抗議段祺瑞政府賣國求榮。<sup>6</sup>段政府下令開槍鎮壓學生運動，進步師生傷亡慘重。我的一個同學李敏學犧牲了。目睹此悲壯場面，我心中無比憤怒。

我爸爸從哈爾濱下來了就沒有工作，是甘休的啦，北洋軍閥貼他錢。民國17年北伐開始後，這次我爸爸就好像沒什麼可靠了，所以就回到福州，靠我的姐夫。我的大姐夫那時候在造船所任所長，<sup>7</sup>就接我們全家回到福建去，去養老。我呢在北京唸高中就畢業了，我想我回去有什麼意思啦？我說我要繼續求學，謀獨立。當時我說要唸大學，一則家裏頭經濟也不夠，還要靠我姐夫，二則我要賺錢養家。我就考上燕京附設的一個護士班，護士班一出來就80塊錢，等於小醫生。開頭在燕京大學底下唸預科，到了一定的時候就到協和醫院做實習生。那時候燕京大學學生也有，它中學也有，大學也有，合起來了都到協和去做實習生。我最後考取的是和大學生一塊兒考的，我得了第一名，我得了獎學金！大學生也考不過我。如果我再實習一年半，就

可以成功了。我在那兒一方面也學習醫學，醫生都說我是天才，都說我應該學醫生不應該學護士。我已經學到打針了，學到通大便了，好像心裏就不高興了。我說：「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要替母親打抱不平。怎麼我學醫生？」而且我什麼都學到了，給黃包車夫洗身子擦身子。什麼傳染病也醫過了。有一趟一個女的生砍頭瘡，砍頭瘡很危險的，叫我給她洗澡。她都要死了，叫我給她洗澡！你說氣不氣？我只好給她洗。洗了一半她死掉了。我害怕不害怕？而且那時候協和醫院他們種族觀念很差。護士長或者什麼在前頭走，我們都在後頭跟著，上電梯也要讓她們，我更覺得我怎麼這樣跟著外國人。這時我就寫信給我的同學，我的同學在南京大學。後來我就在南京大學唸書了，進了歷史系。這時我還跟我的一個在上海復旦大學的同學來往，她說我們復旦本來新聞學系不收女的，今年要開放了，你要不來新聞學系？這時我想，歷史是很死的，沒辦法發揮我的願望，我就轉到復旦來。那一年（1928年）的新聞學系大概有12名女生。

在復旦那些年我跟叫花子一樣沒有錢。我姐夫後來也派到上海來了，姐夫還是贊助我一部分，後來還有堂姊夫幫我忙了，還有我爸爸的一個朋友也幫我忙，這樣唸完大學。我大學時候已經教書了，做家庭教師。我妹妹嫁了一個人，她比我小兩歲。我妹妹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不過在家裏唸唸詩詞罷了。她23歲了還在家裏頭，沒有找婆家，長得很美。我爸爸媽媽就強迫她嫁給一個36歲的，她23歲，大她13歲，有五個孩子。銀行家，有錢。我爸爸媽媽就強迫她嫁。後來我也寫信回去抵抗，幫我妹妹，沒有用。後來她嫁到上海。所以，我在復旦大學正好有得依靠她們了，以後我就靠我姐姐和我妹妹幫忙。有一趟，我們三個人出去，坐的汽車，我坐在當中，我是老二，我妹妹坐在這邊，我姊姊坐這邊。她們一人都有一部汽車。我呢，家裏要給我說，我定位不要結婚。她們倆對我說：「你看你。你不然也有一部汽車。」我慢慢再講我姊姊我妹妹們，結婚了怎麼痛苦。

我爸爸很能幹的，做過美國留學生監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在美國，那時候我爸爸很紅的，在外國，手底下很多留學生。他回來以後把那留學生一個一個都分配，我幾個表姐都嫁給了他們。我姐姐本來是看上那個海軍部部長，他叫陳紹寬。她看見照片啊，一見鍾情，要叫爸爸答應她。我爸爸看他太漂亮啦，他說男人漂亮啊會變心，不好。他給姐姐挑了另外一個留學生，姓袁的，袁晉，比我姐姐大十歲。她這個時候20歲，他30歲。後來他們結婚了。他學問很好，學習造潛艇的。結婚以後，我爸爸在哈爾濱去做總司令以後，他在我爸爸手下做事情。後來，爸爸下來了，我爸爸就靠他養活了。

我告訴你我姐夫怎麼樣混帳！解放前的男人壞透了！我們福建有規矩噢，要結婚的女人都有陪嫁，陪嫁個丫頭。我姐姐養了頭胎（就是我這外甥女），你想我姐夫怎麼樣，他跟丫頭發生關係！你說可怕吧？我姐姐月子還沒坐好，就發現丫頭懷孕了！我姐姐很生氣，從這時後就得了心臟病。後來這丫頭被嫁出去了，賣出去了，打胎了。但我姐夫並沒有改過。後來到上海來，就嫖窯子。還有我的妹夫也不清不楚。他也是清華留學生，是表姐介紹的。還有許多了，我堂房不要說了。所以我這樣決定（不結婚）。



我為什麼辦《女聲》？為什麼從事婦女運動？就是因為我的家庭造成我這條路，並不是因為我這人很有志氣啊，我這人怎麼樣子。還符合毛澤東講的，環境決定一切。我倒沒有想什麼平等，我就想報仇。我一生出來就像一顆炸彈，就是要報仇。年輕時我是糊里糊塗，就只是唸書追求高分數，唸書唸得好。在中西女塾時，禮拜天都不好出來，住在裏頭，這等於關了三年。連上海五卅慘案我一點都不知道。在北京的高中和復旦大學讀書時，我的思想有了變化。復旦大學那裏也有一批共產黨人。陳望道是復旦的教授，他是最早把《共產黨宣言》翻譯進中國的人。<sup>8</sup> 陳望道的一個最親的學生現在還跟我來往。我

們一些同學在陳望道等進步教師影響下，也接觸到了一些革命理論書籍，逐步意識到我們的民族危機越來越緊迫。

我是怎麼會創辦《女聲》的？1932年我從復旦畢業，下定決心要尋覓一份新聞工作，放棄了我那開辦銀行的妹夫早已為我準備好的銀行科長職位。我們新聞學系教我們的老師都是報館裏頭的。我們的老師潘公展是辦《晨報》的，他把工作介紹給我同系的同學郭箴一，就是在《晨報》館的婦女欄做編輯。我就出主意了，我創作出來了。我說：「你給我一個名義好吧？我是外請記者，印個卡片。」好了，她就給我印了卡片，我就做了《晨報》館記者。去訪問誰呢？我第一個採訪的對象是著名的婦女工作者劉王立明，滬江大學校長的夫人，當時她主持上海的中華婦女節制會的工作。這是基督教的民間婦女團體，專門宣傳廢除不良嗜好，禁菸、禁賭、禁嫖，主張節制生育，鼓勵婦女發揮自身服務於社會。她當時30多歲，我27歲。我倆一見如故。

中華婦女節制會辦有一份《節制月刊》，經費由教會提供。「劉王立明訪問記」見報後，引起社會反響。她也主動約我會談，表示對自己依賴教會資助的《節制月刊》很不滿意。她渴望能擺脫宗教勢力或其他政治力量而真正自立於社會。劉王立明提議與我合作，創辦起由民間婦女活動家獨立主持的婦女刊物，來宣傳自己的主張，公開討論婦女問題，鼓動處在封建社會最底層的婦女姐妹們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這正合我心意，我欣然接受了。我們協商決定了刊物名稱為《女聲》，意即「婦女大眾的呼聲」。

這個經費怎麼辦呢？劉王立明說我的《節制月刊》停止，就辦這《女聲》，這錢還是不夠，那一半的錢要你負責。要死了，我負責，我哪來的錢哪？後來我想想，拉廣告。廣告我怎麼認識人呢？我有妹夫。我的妹夫是銀行的。好了，幾個銀行，什麼大陸銀行，什麼銀行，廣告一登，就足夠辦雜誌了。還有銷路呢？我自己去一個個報攤拿報紙去推銷，這樣我負責起一半。經過兩個月的籌備，第一期的《女聲》在1932年10月出版了。但雜誌印數很少，這女人一天為女人

說話，男人誰要看啊？只有知識分子女人有幾個啊？每一期雜誌就賣兩三千份。<sup>9</sup>開頭是半月刊，後來改的月刊，在全國發行。

雜誌出版後不久，我和劉王立明開始有了分歧。當時，我真心擁護共產黨的思想。我當初追求男女平等是因為我的家庭背景。所以我去上學，我並不知道什麼是婦女運動。我認為婦女運動就是婦女受教育，並像冰心、廬隱那樣做事。<sup>10</sup>但我在復旦受到共產黨的影響，開始意識到民族危機越來越緊迫，同胞們的苦難越來越深重，而廣大婦女又被壓在社會最底層，掙扎在水深火熱之中。我醒悟到自己不應該只關心個人命運，應該把目標放遠，胸懷放寬，把個人命運與整個民族利益結合起來。1932年我畢業了，正好抗日運動蓬勃發展，我就投入這個運動，那麼好了，搞不清到底是婦女運動還是抗日運動。我創辦《女聲》時，我根本也沒有想到我是在做婦女運動，我覺得我們大家一塊行動、一塊愛國。作為總編的我在創刊號上就旗幟鮮明地向廣大讀者強調：「《女聲》的歷史使命是鼓動勞動婦女和所有愛國者投身於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中去。」在另一期，我發表了《我們的立場和態度》一文，認為「人類最可悲的現象是兩個貧富懸殊階級的對立。一方面是勞苦終日而不得溫飽的無產者；另一方面是坐享優閒窮奢極慾的有產者」。我們號召剷除這種不合理現象，宣傳世界大同，認為想要振拔自己，唯有走社會主義大道。認為凡是阻礙社會進步的團體和個人都是我們的敵人，凡是同情被壓迫婦女和所有無產者的才是我們的親人。「本刊的使命就是預備著給我們的同志做最有力的喉舌。」我的觀點跟共產黨是一式一樣的，但他們不承認我。

《女聲》引起了很多關注，包括共產黨的關注。一天，夏衍到我住的女子公寓來拜望我，<sup>11</sup>還送了我一本他翻譯的《婦女與社會主義》。這是一本堅持唯物主義觀點的書，它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武器對婦女受壓迫的社會根源和階級根源作了精闢的分析，並指出「私有制的產生是輕視甚至蔑視婦女的開始」。讀了這本書後，我更加相信共產黨婦女解放思想，我認為他們關於婦女解放的思想更加系統，我也接受了

私有制是婦女受壓迫的根源這一理論。在復旦大學，我就接受了共產黨的婦女解放思想，婦女應該走出來進入社會，婚姻方面是一夫一妻，還有人類應該平等，婦女解放是社會解放的一環。我讀了《婦女與社會主義》之後，我推動雜誌減少討論婦女狀況的版面，用更多的版面來號召婦女走出家庭藩籬，參加社會革命。解放後，我冷眼旁觀。共產黨來了到底是好多了，這不可否認。但是他們接下來就變了，變著變著，越走越遠了，不對了。所以到現在我完全覺得自己過去是錯了。共產黨就是利用婦女運動，沒有婦女運動，就是利用婦女。但是當時，我受共產黨的影響，和劉王立明不和，她是做婦女運動，倒是開始沒有受共產黨的干擾。

我們一起工作兩年後就分道揚鑣了。有幾件事情導致了我們關係的破裂。劉王立明始終認為《女聲》是節制會的宣傳品，強迫我在每期都要刊登節制會的活動消息，我沒能按期照辦。其次，她的思想總帶有明顯的宗教色彩，與《女聲》的宗旨並不完全符合，所以她所給的稿子，我也並不是一一刊登。我們的思想出現了分歧。當然我那時候滿肚子的就是相信共產黨了，她的主張有點舊式的婦女，就是主張賢妻良母，這一套跟我的主張不大相同，我是傾向於共產黨的。但是我傾向的，人家共產黨並沒看得起我，因為我不能跟他們一樣的意見。後來，劉王立明在我號召廣大婦女衝出家庭，走向社會，投身於波瀾壯闊的社會革命的同時，卻偏向於鼓吹賢妻良母主義。她主張每個婦女都首先應該努力做個好妻子、好母親。我認為，這種庸俗的賢妻良母主義只會是婦女解放的枷鎖。而且那個時候劉王立明的節制會經濟也不夠，她覺得《女聲》也不能賺錢，要了《女聲》還是一個累贅了。那麼我跟她鬧矛盾了，當然我不喜歡她的主張，她要登的文章我不要登，就這樣。後來我們就鬧翻了。鬧翻了，《女聲》就獨立了，沒有後台了。我在三卷一期上強調了獨立後《女聲》宗旨：

我們相信，婦女問題是整個社會問題的一環，整個社會問題未解決前，婦女問題決不能有徹底的辦法；反之，婦女問題沒有徹底辦

法，社會問題也不能算是根本解決。目前中國婦女運動的傾向：一方是提倡新賢妻良母主義；一方是進行狹隘的女權主義。前者是部分的男子借以束縛女子的枷鎖，後者是少數投機分子借以謀個人福利的工具。這兩者都不是為大眾婦女謀出路。我們不但不應與以合作，而且要堅決地反對。我們所需要的是深入群眾的婦女運動，從民族解放運動中而達到人類的解放。……今後的《女聲》，希望在大眾努力之下，由「婦女之聲」而發展為「社會之聲」！<sup>12</sup>

我說的「狹隘的女權主義」，是指那些只是想要男女平等的婦女。

《女聲》既然要獨立，首先遇到的是經濟來源的困難。我臨時成立了「女聲社改組委員會」，積極籌備經費。我召集了原《女聲》的廣大作者和友好人士，通過私人關係，請來了著名演員鄭君里、胡蝶等人到場義演，舉行遊藝會賣票募捐。遊藝會規模很大，賣座又高，當時就匯攏了一大筆款子。同時我又以個人名義設法請人贊助，隻身跑到南京和青島去，得到父親的好友陳紹寬（曾任國民黨海政部長）和沈鳴烈（曾任國民黨青島市長）的慷慨資助。我的妹妹也不斷從她的私蓄中接濟我。這樣，辦刊物的經費困難才得以解決。

我擴充了撰稿人，特約社會知名人士為《女聲》寫文章，其中很多都是共產黨員。但是由於《女聲》宣傳共產黨思想，經常正面指責國民黨統治當局，國民黨政府的刁難也越發厲害了。官方的出版檢查員對《女聲》嚴加審查，經常長時間地扣壓稿件，影響《女聲》的按期發行，有時還將我們已經編排好的稿件肆意刪減，形成大段空白，使《女聲》版面不斷「開天窗」。一天夜裏，一個朋友匆匆跑來，告知我的「名字已上了工部局的黑名單」。1935年下半年，反動派對新聞界的輿論壓迫越來越兇，加之《女聲》經濟十分困難，來稿急劇減少。《女聲》陷入發行數量衰減、廣告難以兜攬的困境。在此情況下，我為之奮鬥了三年多的《女聲》，終於不得不宣佈停刊。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生，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當時我正在郵局謀事。我的一些朋友希望我能重返新聞界，挑起發動群眾抗擊日寇的重擔。同時也有人寫文章，罵我「只會寫文章鼓動別人抗日，自己卻逃避現實鬥爭」。這些不同角度的反響，再次激起了我的戰鬥熱情，我毫不猶豫地辭去了被稱為鐵飯碗的工作，在兵荒馬亂中闖過日寇統治區，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廣東省。到了韶關，在路過的一家書店裏看到一本《廣東婦女》月刊，是當時廣東省政府主席李漢魂的夫人吳菊芳領導下的婦女會主辦的，上面登有列寧小傳。我似乎感到此刊物思想進步，就把赴內地時沿途聽見的廣東勞動婦女生活現狀作一描述，取名〈粵東婦女通訊〉，寄到這家刊物，並附言自己曾是《女聲》主編。稿件很快被刊登了，並得到省政府婦女會文化部主任陸素英的接見。陸素英原畢業於中山大學，思想傾向於革命，在她房間裏總掛著馬克思、列寧等革命家照片。她十分讚賞我的「《女聲》觀點」，專誠聘我擔任《廣東婦女》主編。我能繼續以《女聲》的立場觀點來編輯《廣東婦女》，內心感到極大的滿足。

但是《廣東婦女》是當時省政府機關主辦的，工作人員中不少是國民黨人員。他們對我這新來的主編當然是不滿意更不歡迎的，專門用妒忌的眼光對我側目而視。我主編出版了兩期《廣東婦女》後，聽說日本人要來了。省政府打算遷到廣西，《廣東婦女》就此停刊。因患上嚴重瘡疾，我趁機告辭了陸素英，應朋友的邀請回到孤島上海。不久，在《大美晚報》社主辦的中文版《大美週報》婦女欄任編輯，其主要文章由我自己撰寫，內容偏重鼓勵婦女加入抗戰。誰知不久，《大美晚報》社的總編張似旭被日本人暗殺了，報紙也就被迫停辦。那以後，我在中西女塾教了幾年書。

《女聲》獨立後，就是那個時候夏衍來看我的。那麼關露呢，她是他們那一派的，共產黨裏的人。她看我們鬧矛盾了，你是要獨立的，經濟又沒有後台，她想抓《女聲》，她想打進《女聲》。關露是女作家，她會作詩。我們開會她就來參與，她想抓《女聲》，我不給她抓。當然



也許是共產黨派她來的，不知道。我跟她也是意見不同，因此她對我非常不滿意。因此呢，在上海淪陷之後，出現了一份名字也叫《女聲》的雜誌，而且看起來和我們原來的一模一樣。但這份《女聲》卻宣揚投降和大東亞共榮圈。它的主編是日本人，關露在編輯的名單中。那個時候，我正忙著上課，不知道這份冒牌《女聲》的出現。但我從一個朋友的信中知道了此事，並在書攤上找到了這份雜誌。我恍然大悟，因為我拒絕了關露接管《女聲》雜誌，所以她很恨我。現在，她把刊名給了一份賣國雜誌，她侮辱了《女聲》，給《女聲》抹黑。我當時也不敢去找她，她是日本紅人啊！眼看著這偽《女聲》打著《女聲》旗號，對人民放射種種毒素，我心中萌發起復刊念頭。我發誓要恢復《女聲》的本來面目，充分揭露關露漢奸的醜惡嘴臉，再次提高《女聲》威望。

在日本人打敗以後，國民黨又回到上海來了。關露有一個妹妹叫胡綉楓，在國民黨回來以後大紅特紅。我後來才知道她是個共產黨員。胡綉楓的男人是李劍華，是復旦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據後來報紙登了，胡綉楓是第四個老婆。他們共產黨很厲害的，這個時候派他做社會局局長。胡綉楓也辦了一個雜誌，叫《現代婦女》。她知道關露那個時候跟我有矛盾，而且也知道她編偽《女聲》。所以我的《女聲》要復刊的時候，要推銷到外埠去，可是呢沒有社會局的圖章。李劍華當然是壓住了，不給《女聲》登記。我怎麼後來又登記了呢？我在中西教書，學生很歡迎我。那時候有個學生的母親認識一個人，叫陸什麼，名字我忘了。談起《女聲》來了，她說：「這個《女聲》我知道得很，她那個編輯文章做得很好。」這位姓陸的在《大美晚報》工作。她對我學生說：「你告訴她，我陸某某有辦法幫她登記。」她說：「王老師的文章在孤島的時候大家各報紙都廣播出去的，我們都知道她。」我學生就介紹陸某某認識我。她說：「我有辦法幫你的忙。」我挺奇怪，說：「你怎麼有辦法？」她說：「我認識國民黨一個宣傳部部長，我給他說，他馬上可以叫你登記。」後來果然，她寫封信去，沒有一個禮拜，社會局就登記了。

《女聲》復刊後的註冊登記手續，居然在我們的對手（被我們長期抨擊的國民黨官員）通融下辦成了，這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反常現象，也是我在「史無前例」中受衝擊時所「說不清楚」的問題。有的人就以為我跟國民黨關係密切。

日本投降後，我又得到妹妹的五百元資助，召集了幾位老朋友，幾位仍在上海的前撰稿人，積極著手《女聲》的復刊工作。在一些朋友和學生的幫助下，終於在1945年11月1日出版了新的《女聲》，復刊後的《女聲》為月刊。在復刊號上，我說：「在敵偽魔掌下的淪陷區，任何美麗的外衣都被強攫披在醜惡的屍體上。本刊《女聲》也曾被張冠李戴，沐猴登場，放射了種種毒素。幸而是非皂白，智者當能明察，毋庸置疑。……現在抗戰勝利了，為了保持永久的勝利，為了完成建國大業，今後更應積極推動婦女解放運動。」在開始的幾期裏，我們發文章，肯定了中國婦女在抗日戰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刊登了一些婦女戰鬥的英雄事跡。我的一個學生採訪了錢劍秋，她是國民黨員。我們刊發了這篇報道，因為我認為所有在抗日戰爭中做出了貢獻的婦女都應予以表揚。我們也登載國民黨員寫的文章，因為我認為她們也是愛國的。這就是我與共產黨不同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說，《女聲》的性質改變了。抗戰期間，《女聲》緊跟共產黨的步伐，只寫愛國主義，就好像婦女參加愛國運動等同於從事婦女運動。抗戰後，我很少刊登共產黨的文章，而刊登更多婦女的文章，甚至國民黨人的文章。

由於《女聲》經常揭露批判一些嫌棄髮妻而另置年輕貌美的如夫人的權勢者，指責專事破壞他人家庭以圖榮華富貴的知識婦女，還抨擊那些藉口談戀愛而事實上玩弄女性的流氓文痞，以致獲罪於人。他們懷恨在心，對《女聲》發出了種種誹謗。有的污衊《女聲》為「狹隘的婦女主義」，專門罵男人，片面地庇護女人。事實上，《女聲》是完全站在公正立場的，曝露的是封建社會大男子主義流毒在民間所造成的惡果。我就是這塊招牌，不管他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漢奸人也好，他看我滿口罵男人，他就搖頭，覺得和你無啥談頭。其實我罵

蔣介石也很厲害，他們也不睬，他們認為你這個人無聊得很，就是罵男人，他們覺得我不中用。國民黨知道我沒有政治背景，所以根本不理睬我。他們都看不起女人，不理睬你就像不理睬一隻叫著的狗。但《女聲》在批判任何不合理現象時總是首先考慮全民族的利益。例如，田漢的妻子曾向《女聲》提出申訴，控告田漢和另一個女人的不正常關係。田漢是共產黨的大人物，當時國民黨報刊趁機大肆宣傳、攻擊進步力量。《女聲》卻為了顧全大局，投鼠忌器，為了民族解放事業而惡痛在心，沒有刊發任何文章來聲援田漢的妻子，儘管我們非常同情她。

《女聲》復刊後不久曾與出版商康丹合作。我們負責編輯，他們專管發行。後來康丹漸漸想干預《女聲》的編輯權限時，我們就分手了。那個時候，剛巧劉王立明由重慶回到上海。經過八年抗戰，劉王立明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她好像接受新思想了，不再提倡賢妻良母主義。她對我說，我們沒有太大的分歧，她對《女聲》復刊十分贊成。於是我們再次合作。和第一次合作一樣，她是社長，我是主編，其餘雜務均由節制會職員兼任。編輯方針有所改進。為了培養廣大婦女的寫作興趣，提高其寫作能力，《女聲》社決定全部刊用婦女作者的作品，無論是教育界的、文藝界的、醫學界的、法律界的、影評界的、書畫界的都廣為徵集。

我和劉王立明還積極參加了各種社會活動，團結各界人士共同反對國民黨破壞國共合作，發動內戰。當時國民黨加強了控制。劉王立明是民盟的重要成員，時常拋頭露面。在國民黨的追捕威脅下，至此已不得不做逃亡之計了。她把職務交給楊美珍代管，離滬去香港。與此同時，我們固定撰稿人耿馨之剛好結束對著名婦運活動家、名律師史良的採訪，準備刊登於《女聲》，已排版付印。但在白色恐怖威逼下，為避免迫害，史良連夜通知，撤回製版，連同稿件一同銷毀，自己也迅速轉移了。劉王立明臨行時囑咐我們要盡力把《女聲》辦下去。然而此時局勢越發緊張，《女聲》處境十分艱難。我們把耿馨之請來擔任經理之職，籌備經費。在她的指導下，我們舉辦義賣活動和開聯誼

舞會來募捐。雖然當時支持者很多，許多人捐獻國畫、古玩，還有作家將新出版的小說送來。可是由於內戰，國庫空虛，以致通貨膨脹，人民購買力薄弱，義賣終於失敗。面對種種壓力，我感到精疲力盡。不得不忍痛將《女聲》停刊。《女聲》從1932年創辦到1947年停刊，歷時15年之久。由於時局動亂，辦辦停停，停停又辦辦，經過了苦難的歷程。最使人遺憾的是《女聲》和劉王立明再度合作到最後停刊的材料已全部失散。我甚至不記得哪本是最後一期。



此後，我靠當家庭教師來養活自己。解放以後，李劍華就搖身一變成了勞動局局長，那麼他老婆胡綉楓就大出風頭。我所以沒有到社會上去，就怕胡綉楓知道我要害我。我在家裏教幾個學生，以此度日。解放後，關露被關押了。但是，七、八年以前（約1986年）關露的名字又變得出名了。忽然間電台有一個記者來拜訪我，說我跟你打聽一件事情。他說電台要做一個電視故事，我們也要把關露寫出來，關露是一個女英雄。可是到七、八年以後也沒有演出來。我知道他們在搜集關露的材料，預備捧她為女英雄。後來還有兩本雜誌都在捧關露。當時我很氣，想寫信到共產黨秘書處，問是不是你們共產黨派關露去做特務？我不相信，因為共產黨從來沒有地下黨員公開用自己的名字，像關露就用自己的名字宣傳大東亞共榮圈。因為這個事情我很氣憤，你明明是漢奸，一會變成女英雄了！而且很奇怪，又是共產黨派進去的。共產黨這很複雜的。我想我沒希望了。我本來講我死了跟周恩來一樣扔到水裏了。後來我想我怎麼宣傳，怎麼叫後人知道關露和我們《女聲》的真相？我很氣，還沒地方申冤，所以我說我立一塊碑把它寫下來。

1990年我在蘇州鳳凰山立了塊墓碑。墓誌銘是朋友寫的，內容如下：

王伊蔚女士終身投入婦女解放運動和愛國反帝鬥爭。1932年正值日寇魔掌深入中國之際，王女士奮起聯合進步婦女劉王立明

等，組織「女聲社」並創辦《女聲》雜誌，撰稿者為劉王立明、楊美珍、何香凝、彭子岡、黃碧瑤、金石音、章乃器、沈志遠等。在抗日民族救亡運動中，《女聲》起了前導作用，引起讀者強烈反響，因而在上海淪陷後，日寇便利用《女聲》威望，冒名出版偽《女聲》，宣傳「大東亞共榮圈」和賣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灌輸投降毒素，妄圖中國人民亡種滅族。結果適得其反，瘋狂的日寇一敗塗地，終於被趕回老家去。今天中華民族已站起來了，婦女已解放。在推動歷史車輪前進中，王女士已盡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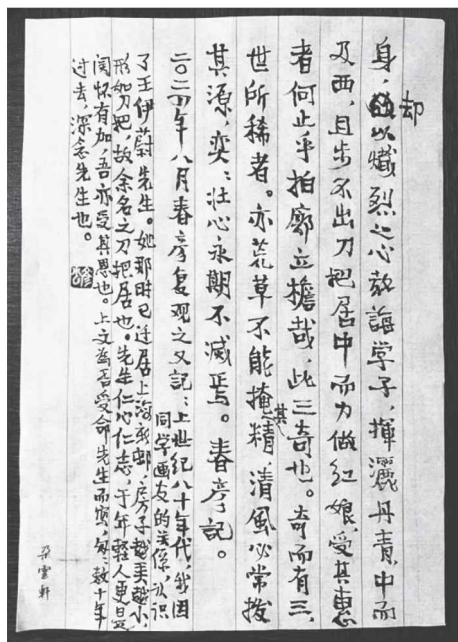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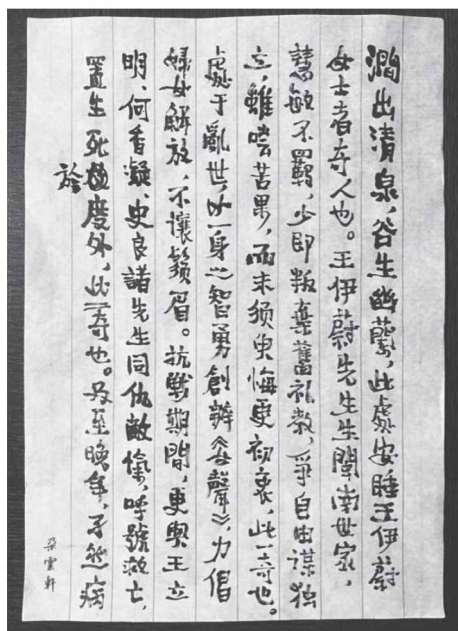
我叫我的畫家朋友謝春彥<sup>13</sup>也寫了一篇，還沒有刻上去，我認為這款他寫得非常好：

澗出清泉，谷生幽蘭，此處安睡王伊蔚女士者奇人也。王伊蔚先生閩南世家，慧敏不羈，少即叛棄舊禮教，爭自由謀獨立，雖嚐苦果，而未須史悔更初衷，此一奇也。處於亂世，以一身之智勇創辦《女聲》，力倡婦女解放，不讓鬚眉。抗戰期間更與王立明、何香凝、史良諸先生同仇敵愾，呼號救亡，置生死於度外，此二奇也。及至晚年，孑然病身，卻以熾烈之心教誨學子，揮灑丹青，中而及西，且步不出刀把居<sup>14</sup>中而力做紅娘，受其惠者何止乎拍廊立檐哉，此三奇也。奇而有三，世所稀者。亦荒草不能掩其精，清風必常撥其源，奕奕壯心永期不滅焉。

我花了二千塊錢要弄這個墓碑，就是為了這幾個人寫，我就是怕她們被埋沒。你要是早來了，我就不要弄這些墳墓了。我不相信宗教，我相信這有點命運，大概是上帝派你來的。這段話是我自己在1983年寫下的：「年年憂患生何苦，事事無成死未甘。」



解放後，共產黨只承認他們主張的婦女運動，一般婦女運動他們不承認。但是，即使沈茲九、史良都沒有推動婦女運動；她們只是做



謝春彥為王伊蔚手書的墓誌銘（作者特邀重抄手跡）

了跟隨共產黨推翻國民黨的事情，這完全與婦女無關。一般人都誤會了，認為凡是有婦女的就是婦女運動。共產黨的婦女解放，就是要跟著共產黨跑叫婦女解放。我當時也是這樣認為的。我1932年畢業了，正值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我就投入運動的，好了，就搞不清到底是婦女運動還是抗日運動。我一直做的都是抗日運動，沒有做多少婦女運動，等解放後我才一點一點知道的。共產黨還是處處的重要職位都不給婦女，只是利用婦女。共產黨很聰明的，他什麼人能夠利用他就利用，並不是真正為了婦女。解放後，就沒有婦女運動了。婦女運動不應該由男人來領導，因為男人領導的婦女運動永遠都是不徹底的。這是解放後，我把自己關在亭子間裏，讀了很多報紙，看到了真實發生的事情後得出的結論。辦《女聲》時，我就是跟著共產黨搖旗吶喊。但是現在，我知道了真正的婦女解放是什麼。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不當這個婦女是人，婦女是裝飾品，婦女是奴隸，婦女是生孩子的工具，傳宗接代麼，主張賢妻良母啊。我的婦女解放就是：一切的一切，婦女就是一個人，跟男人一樣，立於平等的人的地位。雖然共產黨嘴上也講男女平等，但他們言行不一。共產黨推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這些運動，只是為了告訴你他們想要你做什麼。他們掛羊頭賣狗肉。三座大山沒有推翻，到處都壓迫女人，有許多丈夫壓迫女人壓迫得厲害了，在婚姻方面處處的這種表現。還有廠裏頭，聽說是婦女，不要，還開除。還有大學裏頭，哪一個系，不要女的。今天政府所需要的女人是什麼樣的女人啊？他們最捧的就是要發財，要女人能做女經理，隨著他的政策！你要是會賺錢哪，會做公司啊，會當個女經理啊，他就捧你了。

在國民黨時期，我當然感到社會對女人的歧視囉，處處叫女人做花瓶。還有我在中西教書，它第一個條件，不要結婚的女人，要獨身的。而校長是女的，沒有結過婚的，她要老師最好不要結婚的。現在還什麼廠長他不要女人。那個時候她女子學校的校長就不要結過婚的。女的在許多地方工作，她就是花瓶。女人能做到最高職位就是校

長和律師。這就是為什麼我聽說了共產黨就被吸引的原因。但就我個人來說，我沒有遇到歧視。在學校裏大家都一樣的。我辦《女聲》時，大多數都找女人。很多人也會來找我，比如夏衍來找我，我沒有去找他。還有一個很有名的畫家，葉淺予，也來拜訪過我。我那個時候紅得發紫，好多那些男人來找我。因為我不大漂亮，長得不好看，他們就不再來了。我沒有去回拜他們，一個也不回拜。我怎麼這麼驕傲的啊？（笑）他們來看我還送禮。我很驕傲的。

我在辦《女聲》時，有一個人在浙江，他看到了《女聲》，寫信給我，投稿給我，因此我就認識他了，後來就和他結婚了。他叫陸合豐，是個中學生，是國民黨縣政府裏的小職員。我們沒有馬上結婚。我們先是認識了，有了關係，後來才結婚。我讓妹夫在上海給他找了一個財政方面的工作。嫁給他是因為我以為他喜歡並且關心《女聲》。但事實上，他是頂壞的壞蛋。共產黨裏頭有很多嘴巴好聽，在婚姻方面卻比封建人還厲害。我常常講啊，國民黨時代是不好，娶小老婆。那共產黨好了，還要厲害，大老婆不要了，另外娶。在封建社會，大太太和二太太，地位還給大太太對吧？在共產黨下，就根本不要你了，正式離婚，而且呢，還要給大太太戴上「帽子」，說思想不好什麼的。

陸合豐不是黨員，但他傾向共產黨。他和共產黨一樣，言行不一。他哪方面都不行，在文學界出不了頭，就寫婦女問題的文章來出風頭。他壞透了。他很愛《女聲》，只是想借《女聲》的名字，發表一些文章。他在文章裏的觀點當然都是假的，當然不是真的了。他絕對是父權的，不能平等地對待女人。共產黨員都是那樣的人。我認為共產黨他們都是討小老婆的人，我不願意理了。毛澤東不也那樣嗎？在抗戰期間，我聽說了毛澤東和江青的事，這改變了我對共產黨的看法。陸合豐和毛澤東一樣，不過他政治上爬不上去，他就借《女聲》來幫他往上爬。誰知那些人都是這樣的，很多男人追求我，中國的男人就是這樣的，肯定我對你看不起。一方面壓迫女人，面上又說支持男



女平等。田漢的老婆來找過我，還有好幾個女人來找過我訴說她們丈夫的事。這些男人都是壓迫老婆的。郭沫若有七個老婆，他死的時候有七個人來分家產，還帶著孩子，把最後一個老婆氣死了。有次我和陸合豐吵架，他說：「我們需要好幾個女人。男人要吃飯，也要吃點心。」我氣死了，把他的帽子扔到他頭上！他絕對是個大男子主義者，還會打人呢。很快我們就離婚了。

我沒有孩子。那時候有一個很出名的婦科醫生，我去查婦科，她說：「你為什麼不要孩子？你要是想要孩子很方便，我一下子就能讓你有。」我說：「我要革命，有了孩子就不能工作了。我要替婦女出氣。」陸合豐也不想要孩子，左傾的人都不要孩子。他也是左傾的。我沒有把婚姻放在前頭。我是一直在搞男女平等。女人有女人的思想，女人有女人的個性。不像封建社會，她吃飯要靠男人，只好一百個都聽男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所以將來的社會家庭要解體的，我認為家庭要解體的。你就說朋友，能有一輩子的朋友嗎？常常朋友做一半了，就斷了。



1962年我進了文史館。那裏頭有很多藝術家，我開始向他們學繪畫。後來，我又開始寫詩。我年輕時候對這些東西根本不感興趣。解放後我不知道共產黨怎麼看待解放前我的活動，我都以為我被他們遺棄了，被他們反對的。我頭一個害怕的是胡綉楓，她解放以後在上海不得了，一天到晚在廣播號召婦女，她是婦聯領袖。所以我一直保持低調。後來史良死了，她的朋友沈茲九和胡愈之為她寫了一篇文章，文章裏提到了《女聲》和我。我才知道共產黨沒有把我當做反革命。我這才出來了。我念念不忘繼續為婦女工作。我認為婦女應該提高她們的文化水平，才能取得真正的男女平等。於是我利用空隙時間，為青年婦女義務補習文化，還幫婦女找工作，並幫助她們解決婚姻問題。傳統也賦予女人一種母性。我認識幾個年輕女的，她們讓我介紹婚姻。我說：「你們幹嘛一定要結婚哪？」她們說不曉得，只是覺得

空虛，她們到了一定時候，就想要結婚。我說你們既然曉得男人多半是不好的，為什麼還要結婚呢？為了糾正她們對婚姻問題上的錯誤看法，我還做了二首詩句：「天賦無鹽貌，偏憐宋玉才。佳音懸似月，坐待鬢毛衰」；「梨花滿地春將暮，寂寞空闌喚奈何。莫怨紅娘惜腳力，鴛鴦樓少侏儒多」。向大齡未婚婦女提出告誡。

我們文史館很重視那些藝術家，外頭報紙登說他雕刻雕得好，畫圖畫得好，他們就捧他，對於我搞婦運的人一點不放在心裏。那時候怎麼文史館會叫我寫文章的呢？所以我說這個人你不能漏掉她——鄧穎超。是鄧穎超要求文史館挖掘解放前對於婦女運動有貢獻的，所以他們就來找我了，不然他們一點也不知道的。那是1984年。鄧穎超對婦運貢獻很大，在以前是真正的婦女運動份子。因為周恩來的名氣太大了，她就放棄了，跟著周恩來做家庭婦女。<sup>15</sup> 鄧穎超在二幾年辦了《女星》雜誌，《女聲》社是1932年。現在我還叫人家寫一篇文章〈《女星》社與《女聲》社〉。前些年上海檔案館收集名人資料，要吸收我，後來聽人家講我沒有群眾基礎，就沒有吸收我。我很生氣。我辦了這麼長時間的雜誌，這都沒有群眾基礎？我還是把我手裏有的《女聲》雜誌捐給了檔案館。我還複印了一些《女聲》的文章，有我寫的，也有其他作者寫的。這些文章都在這兩大本剪貼簿裏，我想送給你。<sup>16</sup>

我在尋找以前的《女聲》雜誌去捐獻的時候，我的朋友陳詠聲給了我一本她保存的《女聲》。她認識劉王立明，節制會開會她也來過。她是工部局學校的體育老師，去美國留過學的。當時在劉王立明手下像陳詠聲這樣的人多了，她們受了大學教育，或者留學過了，找一份職業然後向上奮鬥。這些人都是個人主義者。她們不管整體的什麼婦女運動，一切都是個人奮鬥，一切為自己。當時為了整體奮鬥的人很少，所以我們雜誌銷售不多。我有個朋友叫蔡慕暉（陳望道的夫人），她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總幹事。我在辦《女聲》時，她在辦《女青年》。她看到《女聲》編得非常好，就邀請我到她那兒去編，工資要100多塊，我這只有60塊。我不去。我為什麼不去？因為那是基督教會主

辦的刊物。我非常反對宗教，覺得他們很虛偽。所以我後來讀了一所反基督教的高中。

我1905年出生那年，同盟會成立。我來上海讀書那年是共產黨成立。復旦大學從震旦學院脫離出來，正式成立復旦大學也是1905年，和我同齡，今年88歲，怪吧？我的年齡都好像我會成為大人物，結果只是一個無名小卒。我在南京大學的時候是南京大學40週年，我上台演戲，演了一個老妓女，還演男人。我在復旦大學也演戲，演得不好，所以沒有出名（笑）。好玩。

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共產黨只是利用婦女運動來鞏固其統治地位。我呢，我是抓政治、利用政治來達到男女平等的目標。這是我與共產黨不同之處，所以國民黨不要我，共產黨也不要我。就把你扔到一個七平方米的亭子間，只給你一口飯吃。我就是這樣一個可憐的人。我是真正的孤老，我在政治上孤獨，在家庭和事業上也孤獨。我的人生就是一場悲劇。假如我是個男的，我爸爸去歐洲時就會把我帶出國。如果我不是傾向於共產黨，我也會去美國。因為我在復旦受共產黨影響，所以我親蘇反美。我在中西女塾教了三年書。我的許多學生都在美國，她們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 ■ 解讀

### ——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女權主義

我在上海尋找老年婦女活動家時，一位朋友告訴我，她家附近有位老太做過一本婦女雜誌的主編。當我被介紹給王伊蔚這位老太時，她非常熱情地歡迎我，說：「你找對人了！我就是婦女運動的專家，你再找不到第二個像我這樣的人了。」王伊蔚把自己視作是通過編輯雜誌參與了婦女運動的婦女活動家。在幾次採訪中，除了編輯雜誌以外，她幾乎不主動談別的人生經歷。儘管她辦雜誌或者為報紙的婦女

專欄寫文章總共大概只有五年多時間，但她是圍繞著《女聲》雜誌主編這身分構建自己的人生故事的。在成為文史館館員之前，她當過老師、家庭教師和郵局工作人員，可這些經歷都沒有在按她要求寫的墓誌銘中出現。顯然，做《女聲》主編是她漫長一生中最有意義也是最令她滿足的經歷。對王伊蔚而言，編輯的經歷似乎不僅僅標識了她的身分，而且也構建了她這個人。她對自己的家庭背景和童年經歷的分析，都是為了解釋自己如何最終成為一名婦女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在王伊蔚的故事中，我們再次看到讓20世紀早期的婦女投入婦女解放鬥爭的兩個主要因素：婦女在家庭中受到的壓迫和男女平等的話語。王伊蔚在自述中很深入地分析了家庭生活對她的影響。作為一個剋死了哥哥的女孩，王伊蔚在童年時期便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記憶中一連串的事件如同夢魘：她的出生剋死了哥哥；父親因為獨子的死亡而納妾；小妾的存在導致抑鬱的母親患上了不治之症且最終染上了鴉片癮。這個故事裏，王伊蔚、她母親和那個小妾，這三個不同輩分 and 不同社會地位的女人，都是父權、父系家庭制度的受害者。在這種規定男兒繼承權的壓迫制度中長大，王伊蔚決心要做得比男人更好來作為反擊。目睹了母親的悲傷，激勵她要胸懷大志，決心要比同父異母的弟弟取得更大的成就，為她母親和所有的女人爭氣。她對婦女議題的關注肯定源自於她早年的這些個人經歷。

王伊蔚父母在培養她的抱負時，採用的方式既消極又積極。他們很遺憾王伊蔚不是個男孩，但他們把她當做男孩養，希望她能成為一個女狀元。在中國文化中，對一個沒有兒子的家庭，把女兒當做兒子養並不少見，無論是出於現實的需要，如陸禮華的父親準備把她培養成家族生意的繼承人，還是出於滿足父母自己的心理需求。<sup>17</sup> 這樣的年輕女孩通常要承擔著作為女性的心理壓力，但同時她們也受到鼓勵和優待，這暗示著她們與眾不同且前途無量。通過陸禮華和王伊蔚的案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幸運的女兒可以成為堅強的女人。這樣的女兒為了讓父母驕傲，也讓自己滿足，會奮力爭取比普通兒子更大的

成就。在20世紀初動蕩的社會政治變遷中，這些被選中的女孩的抱負是通過在男人的世界裏謀取位置來實現的。

但是教育機會並非僅是給被選中的女兒的特殊待遇。王伊蔚強調她父母認為她特別聰明，對她的教育尤為關注。她要求去上海讀著名的女中時，她父親立刻就答應了；她的兩個姐妹雖然沒有上大學，但也有私人教師。王伊蔚的解釋是，在福建人的家庭裏，給女孩請家庭教師是尋常之事。女子教育故事中有不同之處，或許可以部分歸因於地域差異。在陸禮華生活的地方，在她之前沒有女孩接受過任何教育；相反，在朱素蓁的家鄉，私塾裏的女子教育是理所當然的。王伊蔚與朱素蓁的情況很類似：常州和福州分別是朱素蓁和王伊蔚家族的發源地，也是歷史學家何炳棣所列舉的明清兩代學術成就不平凡之地。<sup>18</sup>從歷史上看，似乎產生過更多士大夫的地區更可能支持女子教育，或許在這些地區，士大夫家庭為女孩聘請私塾老師被視為一種地位象徵，令其他家底殷實的家庭紛紛仿效。因此，父權制家庭中婦女的受壓迫故事有時是互相矛盾的，正如王伊蔚敘述中所透露的，一個被視為「掃帚星」的女兒也會被當作未來的女狀元來對待：她既能給家族帶來災難，也能帶來榮耀。

相比起陸禮華和朱素蓁，王伊蔚接觸到男女平等話語的方式在某些方面有些不同，她比陸和朱要小幾歲，因此五四運動給她帶來的影響沒有那麼深刻。<sup>19</sup>而且，由於她父親是北洋軍閥政府的高級將領，她可能被刻意與學生活動區隔開來。但是進步思想還是衝破了軍官府第的隔離，她的家庭教師訂閱了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本頗具影響力的雜誌，並向她講述雜誌上的內容，新文化的信息就這樣傳播給了王伊蔚。這位家庭教師不僅向王伊蔚介紹了一所西式女校，還鼓勵她視古代婦女為榜樣：木蘭和著名詩人謝道韞。與許多古代文人一樣，他承認婦女的天賦，而作為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男學者，他也歡迎致力於公共事業的新女性的出現。有趣的是，鼓勵自己的女學生胸懷大志，並不意味著這位男性長輩與過去徹底決裂；相反，如王伊蔚精闢地指

出：「要像什麼木蘭什麼謝道韞，這還是一種舊思想。」一個現代的謝道韞不會滿足於在閨閣中學習，王伊蔚也有個出國留學的梦想。正是這位家庭教師鼓勵她追夢，建議她去讀一所招收精英家庭女孩的美國教會學校中西女塾，以此作為實現夢想的第一步。這是自20世紀初以來很多來自精英家庭的女子所走過的一條路，許多從國外回來的女學生，包括從日本回來的，都在中國城市創立了受人尊重的事業。到了王伊蔚，她是被師長鼓勵循著她們的足跡前進。出國留學對於男女來說，都已經成為獲取較高社會地位的可靠途徑。

由於王伊蔚住在哈爾濱，一個遠離新文化運動中心的北方城市，她對於正在發生的新思潮知之甚少。用她的話說，她當時「糊裏糊塗的」，只是想著考高分。她對早期歲月的這段描述反映了她較少受到國族主義、自由主義或者女權主義的影響，但她的榜樣包括了著名的五四新女性冰心和廬隱這兩位1920年代的職業女作家。王伊蔚在其自述中強調：「我並不知道什麼是婦女運動。我認為婦女運動就是婦女受教育，並像冰心、廬隱那樣做事。」王伊蔚正確地將這些新女性與婦女運動聯繫起來。婦女擁有平等的教育和職業機會就包括在新文化女權主義的重要主題之中，而冰心和廬隱都接受過大學教育和擁有獨立的事業。就這樣，通過她那個時代著名的新女性，王伊蔚學習到新文化女權主義所傳達的信息。她把這些給她指出自我實現之路的新女性視為榜樣。因此，王伊蔚孩童時就胸懷的要比男人要出色的遠大志向，是在回應新文化女權主義中得以實現的：接受高等教育並成為獨立的職業婦女。

王伊蔚的這條自我實現之路並不平坦。在中西女塾這所著名女校學習並沒有如她期望的那樣興奮。中西女塾是所為上層階級服務的學校，大部分學生來自上海富豪家庭。<sup>20</sup> 雖然王伊蔚也是來自上層階級，但她與學生主要群體仍有著明顯區別。她主要在北京、哈爾濱這樣的北方城市長大，這意味著她可能在口音、服飾甚至喜歡的食物等方面，都與上海女孩差別很大。而且，直到16歲，王伊蔚熟悉的都是中

國傳統經典，對西方文化了解不多。現在突然進入到一所美國教會學校，她肯定感受到了文化衝擊。中西女塾的那幾年給她留下了許多不好的記憶，她既不喜歡那些時髦的學生，也不喜歡嚴重西化的課程，並且由於教會學校的經歷而變成反宗教了。在這樣的環境中，她父親調回北京是個好消息，因為這意味著她能夠離開上海回北京和家人團聚了。她當時沒有意識到的是，離開中西女塾，就偏離了最初出國留學夢想的軌道，直到生命的盡頭她仍然為未能實現這個夢想而遺憾。

在北京讀今是高中的時候，她開始接觸到左翼意識形態。她喜歡那些反宗教的老師和同學，在訪談中不斷重複說今是高中是一所非常進步的學校，改變了她的思想。她是在那兒開始受到國族主義和共產黨的影響。高中畢業後，她從燕京大學附設的護士學校轉到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最後進了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經歷了經濟上的困境才得以完成學業。復旦大學顯然適合她，新聞專業也讓她有機會成為一名記者，那時記者這一職業剛向婦女開放。她的寫作天賦有了用武之地，帶著為她母親和所有女人爭氣的使命，王伊蔚成了第一代職業女記者。復旦還給她留下了另一個印記：復旦吸引了一大群進步的教授，後來她才意識到這些人實際上都是資深共產黨員。

共產黨對她的吸引力很合乎情理。她一定多次在內心深處探尋這個問題：「像我這樣一個封建家庭的人怎麼會如此進步？」，所以才能在敘述中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套答案，而我們也很容易從中追溯到一個共產黨支持者的成長經歷。「封建家庭」既壓迫她，又培育了她要超過男人的抱負。懷著這個抱負，看到的卻是她所處的時代女人最高的社會地位也僅僅是當個校長和律師，這使她很沮喪。在這種情況下她歡迎激進的社會變革，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因為共產黨承諾將實現完全徹底的男女平等。

王伊蔚在自述中有意無意地證明，影響她的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包括了中共的婦女解放路線。她清晰地說明，她在復旦那幾年開始接受中共的思想，而作為《女聲》的主編，她寫了很多與中共路線「一式

一樣」的文章。然而，解放後，她卻對中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在她的晚年對中共有激烈的批判，並重新評價中共的男女平等政策以及她以往對中共的支持。但同時，她對中共話語的嫺熟運用卻塑造了她的表述方式。比如，她用「腐敗」和「墮落的女人」這類詞彙來表達對母親的批評，這些詞轉達了中共意識形態裏對資產階級道德譴責的語氣。雖然她對母親的悲慘遭遇深感同情，但還是情不自禁地用中共的語言來評判她。在她對中共的重新評價中，她總結說，在中共推動的社會運動中，婦女是被利用的；但她還是把她那一代追求職業成就而不是積極投入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婦女稱為「個人主義者」，這是個在中共話語中充滿貶義的詞。總之，王伊蔚的講述透露出她對中共話語既反抗又遵循的矛盾。當她發現自己不得不重新審視她人生中最寶貴的那段光陰時，她的敘述常常流露出內心深處的矛盾衝突和迷茫困惑。

陳望道這位重要的共產主義理論家是王伊蔚在復旦的教授，王伊蔚通過他開始熟悉中共的婦女解放理論。她跟著中共「搖旗吶喊」，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她與劉王立明分道揚鑣後在《女聲》上寫的文章。她批判了劉王立明宣傳的賢妻良母主義，以及「狹隘的女權主義」，同時順應了當時中共強調的主題，號召婦女參與救亡運動。王伊蔚在和劉王立明決裂後就不怎麼談論婦女問題了。王伊蔚在最後一次訪談時有這樣的自我批評：「我一直做的都是抗日運動，我沒有做多少婦女運動。」這似乎與她第一次和我見面時的說法互相矛盾，她當時說：「我就是婦女運動的專家。」實際上，王伊蔚是用了不同的框架來呈現兩種情形。如她所評論的：「一般人都誤會了，認為凡是有婦女的就是婦女運動。」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這個「誤會」，朱素蓀的自述就證明了這一點。如本書前面幾章所述，救亡運動中婦女社會空間的擴大，使婦女自身利益與國家利益融合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1930年代的王伊蔚既從事婦女運動又從事救亡運動。

創辦《女聲》是王伊蔚人生中最有意義的經歷，是她事業的巔峰，賦予她巨大的個人滿足。更重要的是，這讓她參與到救亡運動和婦女



運動中。這裏我不僅要強調這些運動為很多像王伊蔚這樣的婦女賦權，更要強調中共對婦女參與抗戰的認可。許多參與救亡運動的左翼婦女活動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都獲得很高的地位，共產黨的官方書寫也一向承認她們是婦女運動的領袖。1949年後，史良和沈茲九這兩位王伊蔚在1930年代認識的著名婦女活動家，分別當上了司法部部长和全國婦聯常委。通過強調她在1930年代救亡運動和婦女運動中的作用，王伊蔚表達了她對中共主導話語的認同，無論是在她的墓誌銘、自傳和回憶錄中，王伊蔚從未放棄強調這段歷史。遵從黨的路線來呈現自己的敘述，王伊蔚並不是特例，即使朱素尊這樣一位國民黨員，也強調了她在國共合作時期的活動，並在其自傳中讚揚中共的婦女解放。在共和國，每個人都知道在公開場合需要講哪些政治正確的話。不過王伊蔚將自己呈現為一個中共路線追隨者，目的不只是通過審查，也是希望得到黨對她的認可。

王伊蔚自述的複雜性在於她對中共的矛盾態度。她最引以為傲的人生階段是追隨共產黨路線的那個時期，如果她跟與她同代的許多女共產黨員一樣，或如她在自傳中所顯示的那樣，仍然相信中共的婦女解放路線，那麼她構建的自述通篇內容會較一致。但是，她對中共所抱的幻想痛苦地破滅了：共產黨的革命既沒有給她個人帶來社會地位的提升，也沒有實現其所承諾的各方面男女平等的目標。回溯過去作為一個共產黨支持者所做的努力，她覺得自己被利用了。所以，她對中共的重新評估，與她把自己勾劃為獻身於婦女運動的人的不懈努力，無可避免地產生矛盾衝突。實際上，她對中共婦女運動的尖銳批評也導致她批評自己在193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我就是跟著共產黨搖旗吶喊」和「我沒有做多少婦女運動」。當然，她讓朋友寫的墓誌銘絲毫沒有流露她對自己過往行動的疑慮和重估。

寫在墓誌銘上的內容清晰地展示了王伊蔚最關切的事情。在當代中國，一個人死前就為自己立起帶墓誌銘的墓碑，並非尋常。對於王伊蔚來說，購買墳地墓碑是個重大決定。她在訪談中強調，購買墳地

和立墓碑花了她兩千元，相當於她六個月的工資。在第一次採訪中她談到墓碑，是為了證明自己是一位致力於婦女運動的專家；但在隨後的訪談中，墓碑的全部意涵才逐漸清晰起來。她開始談起了顯然牽涉到她的人生的重要方面的關露。按照王伊蔚的說法，關露曾經試圖接管陷入資金困境的《女聲》，但被王伊蔚拒絕了，關露自此懷恨在心。上海被日本佔領後，關露用《女聲》的名字來兜售賣國主義，王伊蔚擔心她的過去會被這件事情玷污。王伊蔚1984年寫了〈《女聲》回憶錄〉這篇文章，發表在1986年出版的《上海地方史資料》中，她在文章中描述了偽《女聲》的出現。1984年，她口述了一份更為詳細的《女聲》回憶錄《我與「女聲」》，1987年由《大千世界》雜誌印成小冊子作為參考資料。在小冊子裏，王伊蔚討論了關露接管《女聲》的企圖與偽《女聲》出現之間的關係。她還強調，這份冒牌《女聲》雜誌促使她下決心要復刊自己的《女聲》。

關露還在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影響了她。胡綉楓是關露的姊姊，她的丈夫是國民黨時期上海社會局局長，胡綉楓則在共產黨掌權後擔任過上海婦聯主席。王伊蔚認為是胡綉楓阻攔了抗戰後《女聲》的註冊。而且，由於解放後胡綉楓是政府的高官，她丈夫又成了勞動局局長，王伊蔚擔心胡綉楓知道她的下落會迫害她，因此不敢去政府找工作，只能在家裏教幾個學生維持生計。<sup>21</sup>

1980年代末，王伊蔚發現她曾經得罪過並且被她鄙視的人——關露，突然變成了共產黨女英雄，她感到極其憤慨和心煩意亂。原來關露竟然是中共的地下黨員，受中共的指派參與偽《女聲》的工作，在日本佔領期間扮演成「文化漢奸」，很有可能是為了掩護其間諜活動。由於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關露和其他許多地下黨員一樣，在解放後長期被監禁。<sup>22</sup>毛澤東去世後，她和其他受迫害的共產黨員一起被平反。關露在平反後受到了媒體的關注，主要因為她是1930年代上海著名的女詩人，還因為發現她其實不是「文化漢奸」而是共產黨的間諜。官方對關露1930年代的活動如此重新界定，則將王伊蔚推到了一

個尷尬的境地。如果關露一直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那麼王伊蔚與她的不和在政治上就是錯誤的。而且，如果關露受共產黨的指派來接管《女聲》，或者為了黨的事業而利用了《女聲》的名字，那麼王伊蔚在回憶錄中對她的譴責就站不住腳。如果王伊蔚的對頭關露是共產黨女英雄，那王伊蔚又是誰？雖然人們的注意力都在關露這位女英雄身上，甚至都沒有人提到王伊蔚這位悄無聲息地居住在窄小陋室的孤老，她卻認為關露的平反給自己的身分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她心生妙計：為自己樹碑立傳。墓碑，再現了這位老人對中共話語的反抗，而這種反抗卻又是以中共的語言表達的，這構成了一種不難理解的自相矛盾。

王伊蔚的墓碑不僅是要澄清「事實」，更是想讓她所做的事被承認。在訪談中王伊蔚經常抱怨道，雖然她在《女聲》上宣傳了中共的思想，但共產黨並沒不承認她的努力。她還批評了共產黨：「只承認他們主張的婦女運動，一般婦女運動他們不承認。」她在墓誌銘中特意提了幾位婦女活動家的名字，因為「我就是怕她們被埋沒」。當然，墓誌銘記載的是她本人與這些婦女活動家共事的經歷。以個人行動保留對「這些婦女」的歷史記憶，王伊蔚在做的是拒絕歷史對自己以往工作的價值的抹煞，也堅持要讓那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長期埋沒的非共產黨婦女活動家的價值得到彰顯。

王伊蔚圍繞墓碑的運作也說明了中國「婦女運動」的複雜性。作為1930年代的婦女活動家，她知道存在不同類型的婦女運動。畢竟，她和劉王立明的決裂就是因為她們對這一運動所包含的內容持不同的看法。現在，年邁的她作為中共的批評者，對中共關於中國婦女運動史的表述並不滿意。為了讓中共的婦女活動家在婦女運動的歷史中居於顯要地位，中共貶低和埋沒了許多優秀的婦女活動家，她們不是中共黨員，在大部分時候也沒有追隨中共的婦女運動路線。為了打破中共在婦女運動史方面的話語霸權，王伊蔚的策略是把那些包括自己在內的邊緣婦女活動家置於墓碑的顯要位置。

由於墓碑上的空間有限，同時考慮到此舉是把自己的歷史與黨的事業聯繫在一起，王伊蔚用的是官方語言來描述這些被埋沒的婦女活動家，而不是把她們描述成獨特的個體。例如，她把《女聲》的創辦置於由中共推動的民族救亡運動的歷史脈絡之下，而她和劉王立明在1930年代的作為被描繪成以救亡為中心。但在訪談中，她則無顧忌地談論了她那個時代的婦女活動家的區別。當我問到劉王立明在1930年代所扮演的角色時，王伊蔚強調劉王立明「是做婦女運動，倒是開始沒有受共產黨的干擾」。王伊蔚與劉王立明分道揚鑣後，曾在《女聲》發表文章，形容劉王立明的活動是「狹隘的女權主義」；但在訪談中，王伊蔚並沒有用這個詞來定義劉王立明。劉王立明這一時期的無黨派婦女活動家身分也得到了朱素蓁的證實。在與朱素蓁的訪談中，她強調劉王立明參加了婦女運動，而她自己既參加了救亡運動，又參加了婦女運動；還強調了劉王立明是無黨派，而 she 自己是國民黨員。這些婦女描繪了一幅政治博弈的場景，身在其中的婦女活動家都自覺意識到彼此不同的政治立場。對於國共兩黨來說，救亡運動是一個競爭場域，是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雖然許多婦女活動家準備在這個舞台中扮演角色，但看來劉王立明好像不願意捲入其中。從王伊蔚所描述的情況看，她與劉王立明分分合合的關係，肯定在劉王立明的個人的歷史中蘊含了更多的意義。她對兩人關係的描述也使我們看到1949年前處於互相競爭的婦女解放話語中的婦女運動的大畫面。

劉王立明的個案表明，新文化女權主義活動在日本侵佔上海前仍然活躍，但卻開始式微，並要面對來自中共的不斷增大的壓力。日本的侵略為共產黨擴大其在城市的影響力提供了良機。隨著民族危機加深，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尤其是受過教育的人，被中共的抗戰口號及其國族主義吸引。救亡運動成了一個理想工具被中共用來接觸其潛在的追隨者，並擴大其影響力。王伊蔚就是在救亡運動中響應和支持中共路線的一員。1932年王伊蔚大學畢業時，正好遭遇首次抵抗日軍的戰事，一二八淞滬抗戰。為了支援十九路軍抗日，上海婦女組織起

來救治傷員、募捐、縫製冬衣等。雖然戰爭在一個月後結束了，但國族危機對上海人來說卻如此真實緊迫，由地下共產黨員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很快成了上海居民的關注焦點。在此背景下，像王伊蔚這樣的女子就很容易接受中共的主張：抗日救亡是婦女解放的前提，此時此刻婦女運動的目標就是共赴國難，救亡圖存。王伊蔚強調，她開始辦《女聲》的目的是促使廣大婦女投身於愛國行動中去，這顯然與劉王立明關於婦女雜誌的想法不一致。王伊蔚在復旦大學受到共產黨地下黨員知識分子的深刻影響，剛出校門，她就毫不猶豫地宣傳她在大學學到的思想。

王伊蔚從來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因為她接受了共產黨的觀點，就和一名共產黨員一樣，要在正確和錯誤的立場之間劃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女聲》在很大程度上受中華婦女節制會的資助，但是看到《女聲》遵循劉王立明的路線和推動「狹隘的女權主義」，王伊蔚很高興。劉王立明的著作顯示，所謂「狹隘的女權主義」從來不會號召婦女加入革命推翻國民黨政府來獲得婦女解放。相反，「狹隘的女權主義」相信，婦女狀況的改善只有通過逐步的社會進化來實現，而五四以來這十年間，城市中產婦女的生活發生的快速變化，包括越來越多的教育和職業機會、越來越少的男女界限，以及個人生活更大的自主權，皆使那些「狹隘的女權主義」者增強了信心。但是，她們的立場與王伊蔚的不可能達成一致。王伊蔚相信「就是要跟著共產黨跑才叫婦女解放」，並坦率地說，她受共產黨的吸引是因為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婦女的機會有限。總之，王伊蔚希望且相信，共產黨革命會為婦女的社會進步創造一個不受限制的社會。主要是基於這個信念，王伊蔚最終宣佈脫離劉王立明的中華婦女節制會。她接管了《女聲》，宣傳中共的路線，拒絕了「狹隘的女權主義」的聲音。

王伊蔚主動支持中共的路線說明了共產黨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在1930年代，許多像王伊蔚這樣受過教育的婦女選擇追隨共產黨的婦女解放路線。新文化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在1920年代中期遭遇國民革

命的國族主義話語挑戰，又在1930年代中期進一步被共產黨的救亡圖存國族主義話語所遮蓋。<sup>23</sup>

王伊蔚和劉王立明之間有意思的糾葛與她們個人生活的重大變化相吻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合作期間，兩人都經歷了個人的不幸：劉王立明的丈夫被日本特務暗殺，而王伊蔚的丈夫被證明是一個欺騙她、虐待她的卑劣傢伙。劉王立明因丈夫的死而更支持共產黨及其抗日立場，但王伊蔚反因丈夫的背叛降低了對共產黨的熱情。王伊蔚的丈夫陸合豐是左派，支持共產黨，卻被王伊蔚痛苦地發現他言行不一。他聲稱支持男女平等，但在個人生活中把女性只當做性對象。陸合豐的背叛捅開了王伊蔚內心深處的舊傷疤。王伊蔚自幼就憎恨父親納妾。其實，她恨任何納妾的男人，但現在她發現自己也處於母親的境地，甚至更糟，只能心酸地說：「在封建社會，大太太和二太太，地位還給大太太對吧？在共產黨下，就根本不要你了，正式離婚，而且呢，還要給大太太戴上『帽子』，說思想不好什麼的。」她雖沒有直接描述自己的境況，但這是在談論她前夫時做出的評論。顯而易見，經過發現丈夫有了外遇並隨之離婚的痛苦後，王伊蔚把她的人生與母親做了比較，而陸合豐帶給她的痛苦使她更難以忍受任何不忠的男人。因此，當她聽到毛澤東和江青的韻事後，她對共產黨的幻想開始從內心破滅。<sup>24</sup>

為了解王伊蔚對共產黨的怨氣，這裏有必要闡釋她前夫背叛給她帶來的影響。在頭兩次訪談中，王伊蔚給我的印象是她從未結過婚。後來她提到，一份叫《女聲》的雜誌不久前在廣東省發行，但卻沒有徵求她的意見。她對此感到很惱火，還給我看了這份雜誌的影印本，其中有一篇文章署的是她的筆名和另一個名字：「陸合豐」。她說陸合豐發了這篇文章，卻沒有給她打招呼。於是我問陸合豐是誰，這時她才不情願地說，陸合豐是她前夫。我很驚訝，想了解更多，但她只是評論了兩三句話，說：「這個人對《女聲》沒有一點影響，所以我就不提他了。」我反駁說：「他對你的私人生活是有影響的。」王

伊蔚隨即氣憤地用三言兩語講了他的大男子主義、他的婚外情以及對她的暴力，突然就停頓了。顯然繼續講這段婚姻對她太過於痛苦，而繼續追問也會令我感到痛楚，我們就此打住。

我很震驚，半個世紀過去了，失敗的婚姻依然是王伊蔚心頭之痛！顯然，她對陸合豐避而不談不是因為他不重要，而是因為他帶給她的傷害太深，以至於她不能釋然地談論他。我這才明白，她一直在用她母親、姐妹們和表姐們的丈夫的不忠來證明「解放前的男人壞透了！」可她對這些「壞」男人的強烈憎恨並非僅僅來自於她所看到的其他婦女的痛苦，更是來自於她自己的悲劇。她是一個有抱負且自尊的女子，想要比男人強，要做一個獨立的新女性，要在社會上與男人平等，絕不想步母親和姐妹們的後塵，生活在缺乏自我實現的不幸婚姻中。但因為陸合豐聲稱是男女平等的支持者，她最終放下了對婚姻的恐懼，和他結了婚。通過王伊蔚，陸合豐這個來自浙江小縣城的高中畢業生才能在上海的雜誌上發表文章，甚至還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他們的結合本可以是一種新式婚姻，妻子不用依靠丈夫來養活自己，更不依靠丈夫來達到一定的社會地位。但是，當陸合豐有了外遇，王伊蔚覺得自己不僅是被騙了，更是被利用了。此外，王伊蔚發現陸合豐把她置於一個她母親和姐妹們都經歷過的可憎境地，這對驕傲的王伊蔚來說實在是奇恥大辱，絕不願意提起。

王伊蔚戰後再辦《女聲》，以驅散偽《女聲》帶來的陰霾。復刊後的《女聲》清晰地表明了她的觀點的變化，她不再自覺追隨共產黨的路線，而是強調自己關切的事情。她在兩個不同時期寫的兩篇文章，便可以證明她的立場的變化。1934年在她宣佈脫離中華婦女節制會後第一期雜誌上，王伊蔚寫道：「我們相信：婦女問題是整個社會問題中的一環。整個社會問題未解決前，婦女問題決不能有徹底的辦法；反之，婦女問題沒有徹底辦法，社會問題也不能算是根本解決……我們所需要的是深入群眾的婦女運動，從民族解放運動中而達到全人類的解放。」<sup>25</sup> 1945年在《女聲》復刊的第一期上，王伊蔚則聲稱：「我們始

終確信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只有婦女得到解放，民族問題才算真正得到解決……現在抗戰勝利了，為了保持永久的勝利，為了完成建國大業，今後更應積極推動婦女解放運動。」<sup>26</sup>顯然，1945年的論述推翻了《婦女與社會主義》一書中的邏輯，這本書是地下黨員夏衍送給王伊蔚的，曾經是王伊蔚做編輯工作時的參考書。王伊蔚暗示，現在民族危機已經結束，婦女解放應該優先於其他任何事情。在國民黨和共產黨準備一決勝負的關鍵時刻，王伊蔚的無黨派口吻反映了她與共產黨漸行漸遠。

王伊蔚清楚地知道復刊的《女聲》不再追隨中共的路線。雖然它刊發蘇聯婦女的故事和批評國民黨政府的文章，但不再跟著中共來號召婦女加入革命派和反動派之間的政治鬥爭；相反，它的基調聽起來是呼應「狹隘的女權主義」。雜誌讚揚了為戰爭做出貢獻的婦女，不論這些婦女是什麼政治背景。主編組織了一系列的討論文章，主題包括「女子參政」、「女子教育」和「知識婦女的前景」。此外，《女聲》因揭發不忠男人和花花公子而聞名，由王伊蔚組織的「抗戰夫人」的討論反映了她對不忠男人的厭惡。<sup>27</sup>她譴責這些男人以戰爭分離為藉口，拋棄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結果「有的誣《女聲》為『狹隘的婦女主義』，專門罵男人，片面地庇護女人。因此男人也要辦《男聲》來報復」。<sup>28</sup>用王伊蔚自己的話說：「《女聲》的性質發生了變化。」更為意味深長的是，在她正式的自傳和墓誌銘中，王伊蔚強調了《女聲》在救亡運動中的作用，卻只是簡略地提到甚至略去了抗戰後復刊的《女聲》。

與此同時，劉王立明則改變了她對共產黨的負面看法，變成了共產黨的支持者。現在，她能更好地理解王伊蔚之前支持中共的立場，正如王伊蔚開始贊同劉王立明之前的「狹隘女權主義」。她們意識到彼此的分歧沒有想像中那麼大，能夠再次合作，王伊蔚也很感激劉王立明再次支持她。雖然由於國共內戰導致第二次合作時間短暫，而且自第二次分手之後王伊蔚再也沒有見到劉王立明，但她一直把劉王立明看做她的同志，並高度評價了她們的友誼。40年後，王伊蔚用墓誌銘



表達了對劉王立明的深厚感情，她想要後輩不僅記住自己，也要記住劉王立明。畢竟，劉王立明是讓她擁有那段寶貴經歷的人，儘管墓誌銘上的那段話聽起來像是王伊蔚一手創辦了《女聲》。

劉王立明與王伊蔚的合作結束於1947年，但這段經歷仍深遠地影響著王伊蔚。在王伊蔚的人生結束前，她表達了自己對真正的婦女解放的觀點，並嘲諷了共產黨的錯誤的婦女解放——「婦女就是一個人，跟男人一樣，立於平等的人的地位。」她強調，1930年代的許多婦女活動家都不是真正為婦女運動工作，但劉王立明是真正做婦女運動的。從批評劉王立明是一個「狹隘女權主義者」到承認她是真正的婦女運動的領袖，王伊蔚走過了一條特殊的道路，共產黨會稱之為倒退。對於王伊蔚來說，這條道路反映了她多年的探索和屢次的失望。當共產黨解放後沒有履行其承諾，甚或在更早，當共產黨領袖表現出雙重標準時，不再抱有幻想的王伊蔚開始尋找婦女解放的其他可能道路。她在探索一種語言，以此來批評共產黨的婦女解放運動，並指出一條不同的途徑，但她只知道新文化女權主義的語言。對她而言，這不是簡單地回歸新文化女權主義，而是顯示了新文化女權主義仍然可以作為一個參照系。或者更準確地說，它可以作為一種媒介，讓婦女表達她們對未能實現夢想的失望，以及她們對中共婦女政策的批評。

## 注釋

- 1 以下敘述是根據1993年2月18日、2月20日、3月1日和3月10日所做的訪談，以及王伊蔚的自傳和回憶錄而形成的。我最後一次訪談後三個月，她得了中風，當時她正在家裏跟一個朋友聊天。在那以後不久她就去世了。
- 2 紅房子婦產科醫院 (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 原名為西門婦孺醫院，創建於1884年，是美國基督教福音派女公會在中國創建的第一所婦產科醫院。
- 3 王伊蔚的父親王崇文是中華民國海軍將領、東北海軍的奠基人。1920年海軍部在哈爾濱設吉黑江防司令公署，王崇文任司令。1922年被張作霖撤職，是王伊蔚後面提及的家道中落的直接原因。

- 4 唐宋八大家是指唐朝的韓愈、柳宗元和宋朝的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和曾鞏。
- 5 謝道韞是東晉(公元317–420)著名的女詩人。
- 6 這是一場北方共產黨領導的抗議活動，旨在反對段祺瑞政府在中國軍隊和日本政府衝突上的所做的妥協。
- 7 王伊蔚的大姐夫袁晉時任福州馬尾造船所所長，該造船所建於1866年，在19世紀末是中國最大的造船工業重鎮。
- 8 在五四時期，陳望道寫了很多關於婦女解放的文章。本書第二章引用過他的文章。
- 9 根據《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中的「上海市婦女團體調查表」(1933年9月30日至12月16日)，中華婦女節制協會的調查表列出了組織的出版物。《女聲》至填寫此表時已出版了27期，印數為五千冊，編輯人為王伊蔚。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民國政府卷(1912–1949)》，上冊(中國婦女出版社，2011)，頁351–352。
- 10 冰心和廬隱在五四時期成名，她們屬於近代中國第一批職業女作家。
- 11 夏衍(沈端先，1900–1995)，中共黨員、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社會主義時期電影工業的領導。1927年作為地下黨員的夏衍接受上海開明書店老闆章錫琛邀請著手翻譯《婦女與社會主義》，成為完整地翻譯此書進中國的第一人。此書原作為德文，1879年出版，作者是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倍倍爾。作為歐洲社會主義女權主義經典文本，此書對歐洲社會主義的婦女解放政策產生重要影響。自中文版問世後，它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婦女解放話語的重要經典。此書最初的翻譯節選出現在五四時期提倡婦女解放的雜誌上，包括《婦女雜誌》。
- 12 王伊蔚，〈今後的女聲〉，《女聲》，第3卷，第1期(1934)，頁2。
- 13 謝春彥(1941–)為當代中國美術界著名畫家及美術評論家。1980年代他與王伊蔚在拜師學畫時認識，自此成為忘年交。此墓誌銘作於1990年6月10日。
- 14 謝春彥給王伊蔚的居室取名為「刀把居」，感慨其狹小且形如刀把。
- 15 關於鄧穎超與《女星》社以及她在五四時期領導天津女權運動的歷史，見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天津市婦女聯合會編，《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中國婦女出版社，1987)。鄧穎超在1930年代跟周恩來一起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伊蔚顯然不了解鄧穎超在共產黨內的活動。關於鄧穎超在共產黨內的女權活動，見Wa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 16 當我第二次拜訪王伊蔚時，她給我準備好了兩大本《女聲》文章的剪貼簿。她曾想將另一本記錄著從幼年至成年的家庭相簿交給我。我婉拒了，覺得那看

似是份珍貴的家族記憶，想著隨時可回來翻拍。但這個決定很快就讓我後悔了。得知她過世的消息後，我又去了她家。她的保母還在，但所有遺物都已經被親戚搬走了，那些照片再也無法追尋。我想，是否王伊蔚知道只有我會像她那樣珍視她的這些個人資料。王伊蔚去世後，我去上海檔案館查找《女聲》，但他們告訴我沒有這份雜誌。我引用的《女聲》都是來自王伊蔚給我的這兩本珍貴的剪貼簿。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有1945年和1946年發行的四期《女聲》。這些珍貴的雜誌證明，在那個社會政治大動蕩的歲月裏，王伊蔚為了這份雜誌復刊所作的艱苦卓絕的鬥爭。圖書館也有日本佔領期間發行的《女聲》。王伊蔚認為這份偽《女聲》是日本人辦的。由於這份雜誌涉及到共產黨地下黨員關露，因此它究竟是日本人辦的，還是對共產黨活動的掩護，尚不清楚。

- 17 關於以第一人稱講述假小子的故事，參見Buwei Yang Chao (趙楊步偉),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一個女人的自傳), trans. Yuenren Chao (John Day Company, 1947)。
- 18 Ping-ti Ho (何炳棣),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中華帝國晉升的階梯) (John Wiley and Sons, 1964), Ch. 6. 據何炳棣研究，明清兩代的學術成就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若把不同地區的進士數量進行比較，就會發現江蘇南部和福建南部都名列前茅。
- 19 心理學研究發現，在過渡為成年人的階段發生的事情比其他階段更具有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五四運動並不是王伊蔚生命中的分水嶺，因為她當時還不到14歲。參見Abigail J. Stewart and Joseph M. Healey Jr., “Link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個人發展與社會變革的聯繫),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no. 1 (1989): 30–42。
- 20 在一項關於上海1930年代婦女的研究中，素素談到，進入中西女塾學習是一種地位的象徵，因此父母花大錢找人脈來幫助女兒進到學校。中西女塾與教會創辦的其他女中不同，一開始就把目標瞄準那些來自富有家庭的女孩。參見素素，《前世今生》(遠東出版社，1996)，頁66–67。
- 21 王伊蔚的擔心未必有真憑實據。1990年出版的《上海婦女運動史》中提到，《女聲》是作為國民黨時期的進步刊物。胡綉楓是《上海婦女運動史》一書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負責這本書的出版工作。如果她真的對《女聲》或王伊蔚持負面觀點，以她的地位，完全有權把《女聲》這一段刪除。參見上海市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
- 22 王朝柱在其《功臣與罪人》(海天出版社，1993)一書中描述了關露在抗戰中的作用、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以及許多地下工作者在1949年後的命運。

- 23 《上海婦女運動史》第六至八章揭示了在救亡運動和抗戰期間，上海婦女為地下黨所進行的活動。據這本書的內容，許多婦女活動家在這一時期加入了共產黨。
- 24 毛澤東與江青同居後，就和賀子珍離了婚。賀子珍是毛澤東的第三任妻子，是一位老紅軍，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與毛澤東結婚，並跟隨毛澤東長征到了延安。
- 25 王伊蔚，〈今後的女聲〉，頁2。
- 26 王伊蔚，《我與〈女聲〉：向三八婦女節獻禮》（《大千世界》報文史部，1987），頁20。
- 27 日本佔領期間，一些男人由於戰爭被迫與合法妻子分開，其後和這些男人結婚或者同居的婦女被稱為「抗戰夫人」。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婦女以前都沒有結過婚，而在一些個案中，她們並不知道這些男人以前結過婚。
- 28 王伊蔚，《我與〈女聲〉》，頁23。「狹隘婦女主義」是「狹隘女權主義」的另一種表達方式。「Feminism」在五四時期被翻譯為「婦女主義」、「女子主義」、「女權主義」、「女性主義」，到1930年代「feminism」都沒有一個固定的翻譯。然而，在共產黨話語的影響下，「婦女主義」和「女權主義」與形容詞「狹隘的」聯繫在一起了。



陳詠聲  
(1900-1997)

教育家

“ 作為一個人，我從未停止過盡力幫助別人的義務……我雖為老人，思想卻是年輕蓬勃的。我但願無愧於一生。 ”



陳詠聲，1935、1995

我第一次去拜訪陳詠聲時，是一位在文史館做行政工作的朋友陪我去的。他把我介紹給陳詠聲後，我們三人聊了一會兒。陳詠聲對我朋友說，她想辦個英語班，這樣她能多賺點錢請位阿姨<sup>1</sup>為她做點家務。她問，文史館是否對這個想法感興趣，是否能提供必要的幫助。我的朋友和我交換了個眼神，都被這位93歲老太太的想法逗樂了。但是陳詠聲是認真的，我聽了她的人生故事後，才開始明白她這種想法的意義。<sup>2</sup>

## ■ 自述

我1900年出生在湖南長沙。我們湖南那個時候有官費考出洋，我父親陳家瓚先是中了秀才，後來再去考的出洋到日本學經濟學，他就是清朝政府資助的了，是湖南省裏頭派出去的。辛亥革命家黃興跟我父親是同時考官費到日本去的。我父親是洋舉人。<sup>3</sup>在日本與章士釗、譚延闓等人創辦進步刊物傳播西方新思想。我父親在去日本時已經結婚了。父親到日本去，母親還留在長沙。母親是沒有進過學校，但是她是自學，比如說這些什麼《白蛇傳》等古老的故事，她都能夠看，《西廂記》什麼的，講故事給我祖母聽。我的母親生了八胎小孩，不過有兩個不在了，一個是三歲的時候在湖南就不在了，我的哥哥是最大的一個，還有一個小妹妹是在北京不在的，生出來才七天。那兩個不在的不算就六個，我是老二，那麼女兒當中我是老大。〔八人之中，〕我排行老三，也是大女兒。我的哥哥因為當時封建，一定要有兒子，我的伯母呢伯父不在了，就有兩個女兒，沒有兒子，所以就非要有個兒子不可，就把我的哥哥過繼了，所以我媽媽是很開通的。那個時候只有我，底下還沒生出來呢。我已經生出來了，把哥哥過繼了。

我母親是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的出身，她家裏我也不是太清楚，不過我舅舅辦了一個小的百貨商店，就是這樣。我們真正的原籍是江

西，大概就是因為洪秀全，那個時候很多人從江西逃，祖父到湖南大概是那個時候。我的祖父我沒見過，不過他留下了一個南貨店。我的父親弟兄七個，有一個姐姐，也是八個。我的祖母是第二個祖母，填房的，她生了這麼八個小孩。這第一個大伯我沒見過，第二個我見過，還有幾個叔叔，這幾個叔叔全部都到日本去過的。我的兩個嬸嬸，還有兩個堂房姐姐，都到日本去過。後來她們有這麼好的機會也不好好學習，那個時候封建啊，日本人洗澡大家都一起洗的，她怕難為情，她不幹，兩個人都回來了。要是我，我就在那裏呆著讀書了。

我的叔叔們都去過日本。我們整個家族都不太傳統，更傾向於西方思想。我們家裏我這一輩的女人都不纏足，因為我父親去過日本，日本女人都不纏足。當我出生時，我父親就不想讓我纏足。

長沙有個習俗，農曆七月初一每家都要開門祭祖。從那天開始，家人就要做好迎接祖宗魂靈的準備。七月初四這天要擺好貢品：幾張大的方形餐桌擺在寬敞的客廳裏，上面擺上點心、水果和其他好吃的。七月十五這天，要把祖宗的魂靈送走，還要燒紙錢給他們花。要給每個祖宗準備一袋子錢，我們家所有的孩子都忙著把祖宗的名字寫在封套上。就在我們家放鞭炮迎接祖宗時，我母親在七月初十這天生了我。大家都說：「這小孩命好，她是祖宗送來的。」他們找了一個算命先生，他說：「這個小姑娘與眾不同！將來肯定有出息。」我大哥一出生就夭折了，我二哥比我大三歲，被過繼給了我嬸嬸。我排行老三，是個女孩。一般這種情況下女孩都不會被人喜歡。但是，我家人很喜愛我。我父親特別愛我，給我取了各種各樣的小名。這是我二哥上了年紀後在一封信裏告訴我的。

因為我父親有那麼多弟兄，所以小孩子就特別多。我們是大家庭，好像《家》那種樣子，<sup>4</sup>不過我們沒有他們那麼神氣啦。我們都是住在一起的，房子很多很多。我們家裏有大師傅，煤來呀都堆成山，很大很大的。廚房呢那是大鍋飯，我們也有小灶，每一家自己的小灶也可以燒熱水。我祖母大概也沒有上過學，但她很有錢的。這幾個兒



子對她都很孝順，早晚都要請安。到過起年來啊，或者她的生日啊，那是很熱鬧、很熱鬧的。那時候我父親就是比較獨立的，在外頭有工作的。其他的兄弟就是搞搞地產的事情。我的幾個叔叔他們講起話來都是講日文的。叔叔他們在買賣房子、買賣土地做這些事情，南貨店後來也關門啦，也沒人管了。家庭教師請過一個，是親戚。這些小孩子早上要去報到，不分男孩女孩一樣都要報到。我跟男孩子一樣的，在一起，讀書麼，現在也記不清楚了讀些啥書。就是帶我們出去玩、看戲。

我父親到北京去做官，七品小軍官。我母親去了，我們全家人都去了。在那什麼郵傳部，就是現在的交通部。1908年到1911年，我們住在北京。我父親主張男女平等。他把所有兒女都送去學校。我八歲念小學了，大概拜了拜個孔夫子，初一十五就要磕頭。那個時候在北京大家孩子都進學校，女孩子也進去。我小時候在北京，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我爸爸給我哥哥、我妹妹和我三個人都是穿男孩子的衣服，都是長袍坎肩那樣子的。我喜歡學校，從來不缺課的。1911年以前我們湖南學校已經很好了。周南〔中學〕你知道吧？周南就是朱鳳武的後代〔辦的〕，朱鳳武下台了，姓朱的人就改姓周。<sup>5</sup>姓周的family（家族）都是共產黨。<sup>6</sup>他家裏很大的房子，所以就開了兩個學校，一個是男學校，一個是女學校，周南女校。我六歲就進學校住讀了。我這兩個姊姊也住讀了。

我們是辛亥革命1911年回到湖南的。我父親在長沙，那個時候譚延闓當省長，他是日本留學生，跟我父親也是認識的。我父親因為是學經濟，所以就做了一任財政廳的副廳長。不過我祖母不願意兒子做官，我父親自己本人也不歡喜做官，所以做了一個月就不幹了。後來他就自己開房產公司，跟他朋友們一道開的，好像規模很大的。從北京回長沙後我們另外買了房子，獨立了，就和祖母分開住了。從北京回到長沙呢，我進的古稻田。<sup>7</sup>古稻田也是很有名的學校，培養了很多革命家，像蔡暢這些人都是那個學校的。在湖南長沙這種地方，

一般家庭條件可以的都會把女孩送去上學。我父親是日本留學生，他們日本的女學也很普遍，所以我們家的女孩理所當然地要進學校囉。但是我們湖南出門都是要坐轎子的，我們都坐轎子去上學。我的堂姐妹們也都受教育的，沒有哪個不受教育，就是小學教育都受過，中學也受，專業也受到，她們好幾個都讀accounting，當了會計，都有工作，就是有兩個堂姐姐沒有工作，她們結婚了，生孩子了。社會上有的結了婚還工作，但是多數女的結了婚就不工作了，生孩子了。在我們大家族的堂姐妹中，只有我和我妹妹出國讀了大學。



我在16歲就決定不要結婚，最大的原因有兩個，一個愛國。徐特立是我的先生，我1916年畢業於湖南長沙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他沒有正式給我上課，但是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時候，<sup>8</sup>他發誓要爭氣，要報仇；他切了手指頭，流了血，寫血書。這件事情對我影響很深。<sup>9</sup>日本是個小國，卻能恣意欺凌中國，強國必先強種，只有體育救國才能一洗「東亞病夫」之恥。我們中國的男子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確實是不對的。要怎麼樣子愛國呢？就是強國必須強種，要強種，女子的教育很重要，身體很重要，培養她們有好的身體。所以我就下決心要學體育。

還有另外一個原因不結婚，就是女人太苦了。生兒育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我看到周圍的女人，確實很苦。還有呢，很多家有很多小孩子，男人在外頭還要搞女人。女人也不像現在可以出來提出離婚。光受罪，活守寡，你說苦不苦？女人沒地位！所以我一輩子就是不結婚。

本來我覺得他們(家族裏的男人)是非常老實、非常神聖的，我很崇拜的，結果呢他們搞了姨太太回來了。所以我想這事蠻氣的，有什麼辦法？既來之則安之。我父親也有一個姨太太，所以我母親死得早唉，她42歲就不在了。我是在上海，我妹妹在蘇州，我哥哥也在上海，都是在讀書，收到電報我們立刻回家。到了家裏，棺材已經裝好

了，沒看見，沒看見。她這裏生疔，這東西毒啊，很厲害的。中醫外科它能治，以毒攻毒。那個時候西醫是沒辦法醫的。我父親把媽媽送到醫院裏，西醫，後來沒辦法。

本來父親的姨太太是在外頭的，因為我叔叔的進來了，我父親的也進來了。本來我們家人不知道，小孩不知道，大人們也不一定知道，因為他瞞著的。所以交朋友也很重要，交了這個壞朋友勾引他，影響他。一個老老實實的人，就是因為朋友的緣故，就是帶呀，帶著就像吃橄欖一樣，嚐到味道了。像那種女人怎麼樣子對待狎客啊？我父親搞的是一個私娼，她也不是怎麼太年輕，反正這種人呢使得男人高興就是了，就是招待得周到，你懂吧？自己的妻子做朋友的時候是很好的，等到結了婚以後大家原形畢露了，馬馬虎虎了，對吧？男人就是要你哄著他呀，對不對？那我媽媽就不會這一套了，這些小孩子也來不及管了，對吧？因為孩子多麼，所以家裏還用了好幾個阿姨，那阿姨還要管了。我就看著這個生氣。另外還有，一個女人出了嫁生孩子了，人家不要了，你漂亮的當個花瓶也是暫時的，真的你結了婚人家也不要了。<sup>10</sup> 就是女子沒有地位。所以我就是自己一個人。我也不懂得什麼獨身主義囉，我都没聽說過，<sup>11</sup> 就是我自己這麼想的，我自發的。

還有一件事情。我就覺得什麼呢？女人所以到今天還不能真正說是解放，真正跟男人平等，什麼道理？就是一個姓的問題，Mrs. so and so，Mrs. so and so（某太太，某太太），〔當男人的〕附屬品。男人結了婚他也沒改姓啊。我為了這個事情搞了幾十年也沒有效果。你說人家幹不幹哪？啊，一個男的跟我結婚，好，我們兩個人都改姓，好像開舖子一樣，另外有一個招牌。女人就是這個。你看現在那個電影裏頭常常有什麼家裏財產糾紛，都是這個姓的緣故，是不是這樣？我1930到1931年在杭州YWCA（基督教女青年會）做總幹事。做總幹事也是個頭頭，所以當時呢男青年會啊，還有個之江大學啊慕名來請我。那個時候我才30歲，年紀還輕，請我去演講，我就出個題目：

「我們的切身問題」。切身問題是什麼？就是姓氏問題。一個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就失掉了自己的人格了，我說我不是任何人的附屬品。我強烈譴責社會上男女不平等的現象。男人做一千一萬件錯事也不犯罪，女人跟一個男人講一句話，就是不行的。現在女人在外面和男人說了話，一回家她丈夫就會和她吵架：你怎麼在外頭吃飯啊，喝酒啊，或怎麼怎麼的？女人說：「你可以我為什麼就不能啊？」這個姓氏問題我1940年代末在美國跟美國人也談過，她們回答我說什麼：「Oh, I never have thought about it!」（哦，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我要做我自己，不要依靠別人。

有一次，有人給我介紹一個大家庭的，就是說結了婚可以出國去，我都沒考慮，因為我下定決心要搞體育的。體育老師你一個大著肚子，你怎麼能夠到操場上去？我父母親不勉強我。因為我父親自己犯了錯誤的，他不敢來跟我講的，我會跟他吵的。

我父親在日本有些同學都是很進步的，經常帶些資料到上海，從上海帶回湖南這樣子的。我父親創辦了群益書社，一個在東京，一個在上海，一個在湖南，那都是他辦的。從前他很有地位的，當時一個商務〔印書館〕，一個中華〔書局〕，下面就是群益〔書社〕。毛澤東和楊開慧經常去我父親在長沙的書店。<sup>12</sup> 上海的書店就是在商務印書館對面，就在河南路上，規模很大的，有幾個門面。我父親也寫了很多書，也翻譯了很多日文書。他是個博學的人。我後來很後悔，沒有向我父親學什麼東西，因為我一直對我父親有意見，因為我父親帶一個女人來了，是吧，我媽媽就生病了，後來過世了。我哥哥後來也跟父親不那麼親熱。我叔叔在上海認識了陳獨秀，所以群益書社就是《新青年》的發行人。<sup>13</sup> 但是我沒讀過《新青年》。我到上海來是16歲，從古稻田高小畢業，到上海來進體育學校。那個時候《新青年》這個雜誌已經有了，因為我的興趣是在體育，也沒有哪個再去說：「啊你看看《新青年》」，沒有一個人說。想想我看見過這個雜誌，但是我沒有鑽到裏頭去，沒有。要男女平等的想法就是我自己周圍都看見的麼，很多都是這種〔不平等的〕事情麼。



上海中國女子體操學校有三個畢業生到了我們湖南，在幾個學校裏教體育，所以這個就引起了我的興趣了。這三個老師都是女的，教女學生體育。她們沒有在我的學校，但我聽說了這三個老師，我就說我要到上海去，要進她們的這個學校。所以我16歲就來了。我父親也沒有干涉我，我媽媽也沒有干涉我。他們對我很相信，我說什麼就是什麼，反正我也沒做壞事。我的叔叔也是群益書社的。那個時候我們還住在一個大家庭裏，所以我叔叔就在那裏資助我。我到了十六鋪〔碼頭〕上岸了，一下子人多了，跟舅舅走失了。幸虧我還能說普通話，我自己就找到了群益書社，到了這裏我看到我叔叔，我叔叔就把我送到我的另外一個嬸家裏。那個地方叫新重慶路，離跑馬廳很近的。那個房子是石庫門房子，就是當中，還有兩旁邊都有廂房的，底下就是群益書社的堆賬，出入賬都堆在這裏的，樓上就住人。我在住的同時就是有三個男孩，我的cousins（堂兄弟），有兩個是同父同母的，一個是伯父的兒子。三個人呢，一個是留德，一個是留英。他們因為是男孩子，同時也是接班人，所以就派他們自費到國外去讀書，就是群益書社的錢。我叔叔帶我去找那所體育師範學校，找來找去沒這個學校，這個學校已經停辦了。那怎麼辦哪？已經來了。那現在有這麼個學校，愛國女中有體育課，愛國是蔡元培發起的，那我就進了這個體育課。上了半年，學校鬧風潮，那些老師她們就要恢復體育師範學校。但不是停辦了嗎？又恢復了，所以我就跟著重新考了體育師範。這個學校還不錯，樣樣都很滿足，在那裏學了一年，是住讀的。課程有國文啊、英文啊、生理衛生啊、體育原理啊，這些都有，都是日本式的，因為這些老師都是日本留學的。英文有一點點，不多。體育有啞鈴啊、棍棒啊、體操啊、球類，還有武術。田徑那個時候還沒有。

沒有畢業的時候，我去那個青年會。那個時候在昆山路有一個女青年協會辦的一個體育學校，叫Physical Training School（女青年會體育

學校)，第一任校長是個美國人，第二任校長是從波士頓的威爾斯裏畢業的，廣東人。她的丈夫追求她八年，就要結婚，所以她就離開學校了。那麼又來了個美國人當校長。Mrs. Lynn，林夫人，在金陵〔女大〕也教過體育，我在中國體操學校的時候，Mrs. Lynn開了一個業餘的舞蹈班，我就去參加，之後我告訴她，我想進你們這個學校，兩年畢業。那兩個學校（中國女子體操學校和愛國女中）都是一年半畢業。我就跟她談。因為這個學校的資格一定要中學畢業，我沒有中學文憑，我就讀到小學畢業，然後進了體育學校。她說好。所以我從頭來學，我在這個地方就讀了兩年。我們這個體育師範學校的學生不多，我畢業的時候只有十幾個人。為什麼這麼少？因為條件苛刻。很多人不願意學體育，尤其女孩子學體育，將來生孩子怎麼辦？等結了婚以後再做體育老師就麻煩了。這十幾個人都是全國各地保送來的，有廈門的，有福州的，有廣東的，有香港的，有保定的，也有北京的，都是人家保送來的，我這是自己願意去的，是自費的。

我是1918年進的這所學校。第二年五四運動爆發，我積極投入，擔任上海學生聯合會交際部成員。反正是愛國的青年人都去參加我們的活動。然後到各個地方去宣傳，與同學們一道遊行請願，焚燒日本貨，還擔任我們學校學生會會長。沒多少時候就結束了。

1920年我就從學校畢業了。畢業了要工作怎麼辦？我有一個學生，就是中國女子體操學校的學生，她的姐夫是北京國立女子高等師範的校長。那麼她介紹我去當老師。在今天這叫「開後門」。1920年我20歲就到北京去了，我做體育主任啊。我們這個學校大是不大，但是當時是算了不起的，學生都是有的比我年紀還大。魯迅也在這個學校教，是我走了以後去的。我給來自不同系的一百多個學生上體育課。我的同事中最有名的就是吳貽芳，那個時候她是英文系主任。她也是做了一年，後來就去美國讀書了。她是密西根大學畢業的，後來當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

我媽媽她一直講：「我不要再靠兒子，我要靠女兒。」很傷心的，沒有，就是她沒有享到我的福，相差幾個月。我母親是1919年12月去

世的，我1920年畢業就賺錢了。20歲當體育主任那個錢是足夠養活自己了。



我在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體育學校時，有一個好朋友姓馬，叫馬新宇，山東人。她人也是很老實，做事情也不馬虎。她的父親是醫生，她的媽媽去世早。她告訴我她出世的時候是她爸爸接生的。我們倆在體育學校是roommates（室友），住在一道。因為她爸爸不在了，那麼就去奔喪哪，功課就behind（跟不上了）。我們校長就派我去coach（輔導）她，補她的課。所以我們兩個人就比較close（很親密）。她跟我兩個人，還沒有畢業的時候就這麼商量：她是準備去考省的官費出洋，一個人的官費可以帶兩個人。我是1920到1921年在北京，她呢已經考取了，我從北京先到濟南，在她那裏待下來，跟她商量這個事，我們到哪個地方去？濟南有一個女青年會，那裏有個外國幹事是從Texas（德克薩斯州）來的，所以就將我們帶到Texas。我是要走了，我在這裏準備，箱子我在這裏有了，準備衣服的什麼東西，她呢在準備出國的手續什麼的。等到要走的時候，我去不了，她走了。我去不了，因為我沒錢！那個時候中國學生一定要坐first class（頭等艙）。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怎樣過日子的。你看坐那個頭等艙的都是有錢人哪，都是大亨啊，還有人做飯吃，還有規矩。我付不起船票，也不想找家裏幫忙，所以我第一次沒去成功。我朋友去了奧斯汀的德克薩斯州立大學，獲得了化學博士學位。

我既然去不了美國，為什麼不回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呢？我們國家窮啊，尤其是反動政府八個大學都拿不出經費，老師就得不到工資，就罷課啦。我就不去了。我在北京的一個學生介紹我到湖北武昌的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去教體育，我就到湖北去教中學了。那些年輕的學生很喜歡我，因為我也年輕，天天晚上都到我的房間來跟我聊聊，非常歡迎我。好了，出事了。那裏有一個女的舍監，管學生的，以為我是共產黨員呢。那個時候1921年，共產黨已經成立了。她對

我就顯得有點忌諱，我自己也有一點。另外呢，廣東的同學來信了，叫我到廣東女子師範學校去教體育，她是我上海女青年會的同學，那麼她把我請去，那我就高興地去了。這個學校是廖仲愷的姐姐辦的，她當校長，也是日本留學生。我在那裏當體育老師，廖仲愷的女兒也是我的學生。在那裏教教教，後來呢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我現在回想起來，可能呢，她們不是共產黨的人嗎，也許我不知道，〔我的〕作風啊總歸有點西化了。那個時候我還沒去美國了，不知道什麼意思，反正我有一點覺得不大合適。我主動不幹了，就回上海了。當時一個年輕女子獨自旅行也沒覺得奇怪，從來沒想到不安全的，我也不害怕。沒有人來管我，買票啊什麼的都是我自己幹的。那時女子出來做事情，多數就是做護士，還有做教師，這些人哪多數都要這樣維持一家人的生活。

那麼廣東離開了就到上海，到上海就出國。就是Dr. Ma，我那個同學馬新宇，用官費約我去，我去不了，去不了我心還不死啊，還是想去，所以就請她留意。現在呢她在Austin(奧斯丁)，已經去了快三年了，住在一個Professor(教授)的家。這個Professor叫Miss Lavender(拉文德小姐)，她沒有結過婚，所以叫Miss。我的同學就在她家裏代替她管家，周圍的人都說：「哎呀，你的學生比你幹得好，她會幹。」所以她就相信她。Miss Lavender是教會裏的Baptist(浸信教)，我那個學校Baylor(Baylor College for Women；貝勒女子大學)也是Baptist，我那個校長跟Lavender教授經常在一起開會，所以兩個人很好了。Dr. Hardin(哈丁博士)，就是那個校長，有一次就到Lavender家，Lavender就提出這個問題，說：「Rubetta」，就是我的同學的英文名字，「Rubetta有一個很要好的同學，很想到國外來讀書，你能不能給她個機會呀？」哎，他馬上答應，馬上給我來信了，給我full scholarship(全額獎學金)，four years(提供四年)，頭一個中國學生，我在那裏的時候也是唯一的中國學生。我原來呢是希望拿一個體育學位，但是這個學校那個時候還沒有。但是體育的部分是很好的，



頭等的，課程好，學校的設備樣樣都好，我學游泳啊、學 archery (弓箭) 啊，這些都是在那裏學的。那總要拿個 degree (學位)，那讀什麼專業呢？那就學 English (英語)。英語這個課程開得很多啊。要學寫詩啊、寫散文啊、長篇小說啊這些。我又不是一個搞文學的人，但是沒辦法呀，只好啃啊！別的功課也要選擇，我樣樣都學啊，Home Cooking (家庭烹飪)、Home Economics (家政)，<sup>14</sup> 這些東西都學，反正我就是要學，沒有學過的東西都想學。不過第一年我不是在大學，而是在中學。為什麼呢，我沒有中學文憑啊。他們一定要有中學文憑，那怎麼辦？那沒辦法只好去。都跟著那些比我年輕多了的一班。就是在班上不錯的，老師都誇獎我，他們學生不懂的還問我呢。後來在這裏(大學裏)我當頭頭，外國留學生會會長。我們那裏一個中國人也沒有啊，我是 only one (唯一的)。我在那裏就參加了教會。四年後我獲得了英語學士學位。所以我們的校長 Dr. Hardin was very proud of me because I was the first Chinese (哈丁博士為我感到非常驕傲，因為我是第一個從貝勒畢業的中國人)。

畢業後我經人介紹到一個海軍軍官家作家庭教師。儘管待遇優厚，吃住舒適，但主人態度傲慢，叫我做一些僕人的事情，我憤而辭職。隨即轉到一個猶太工人家工作，攢夠路費後即回國，回到上海。我回來也因為我家裏需要我做點事情幫補一下，我父親困難了，買股票失敗了。所以現在買什麼股票等等，我是聽也不要聽，看也不要看，我父親就是這個事情失敗，害了我們這些兒女。我回來以後學校都開學了，那怎麼辦啊？我得養家糊口了。我回國是1927年，有很多從國外回來的，從南洋群島回來的，商務印書館的「交際博士」黃警頑是個很熱心的人，他開了一個 party (聚會)，在裏面我認識了一對夫妻，這對夫妻是從緬甸回來的，聽說我是美國留學生沒有工作，所以他很歡迎，說：「像你這樣的人我們那裏很需要。」我說：「你保證我能去？」他說：「那當然。」我就跟他們去了。到了緬甸他那裏，不是正規的學校，是一個業餘的青年補習班，由華僑集資捐款而成，經

費來源無保障，以致經濟拮据。我做什麼事情呢？一把抓，都是我，校長也是我，員工也是我，樣樣都教，既教英語又教漢語。後來就是那裏的climate（氣候）不好，太熱了，非常非常熱的，我這個眼睛這裏常常生偷針眼，啊唷，天天晚上電扇不停地開，還有呢，沖涼，不解決問題。我賺的錢都吃掉了，自己又不開伙，都到館子吃，很貴的。所以我爸爸說：「好吧，你既然賺不了錢，就回來吧。」1928年我辭職回國。



回來要找工作了，就找我老校長，她介紹我到中西女中，1928到1929我就在中西，教體育，不是教英文。英語啊，上海不稀奇啦，多得很，但是體育老師可稀奇了，first class（頭等的）是體育老師，所以我在舊社會是非常吃香的，非常非常吃香。我在那裏一年還沒到時候呢，我的一個同學的丈夫是山東省教育廳的領導，因為我在美國學習時主修英語、輔修教育，我同學就把我推薦給了她丈夫，我做了山東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的校長。我29歲，成了山東第一個女校長。在那裏也有好的地方，就是交了個老朋友，她是中國基督教女青年的總幹事 Miss Gallaher（耿麗淑女士）。那時我把妹妹帶到山東去了，就是現在在美國的這個妹妹。她因為開運動會，又吃零食，吃梨子，吃花生，吃饅頭啊，吃亂了，急性闌尾炎，當天晚上肚子疼得要命，沒辦法就進醫院，馬上就要動手術。晚上誰陪啊，我是姐姐，沒有辦法。那時候她全部麻醉，很痛苦的，要吐的，晚上得要照顧的。我就找了Miss Gallaher，我去跟她商量，說我可不可以住在你家裏，因為她家離醫院很近。她是很同意的，當然是外國習俗麼，總要付錢的，我說沒問題。我就住她家了。

後來我離開了那個單位。為什麼呢？第一，我覺得我不是做校長的料，這個行政工作很難做的。我是一個外省人，他們有點排外。這是山東省第一個女校長哪。還有教職員裏頭是一盤散沙。吳貽芳金陵女大校長也介紹人給我，還有本地人也有，都是湊合起來的。那麼

人事問題沒有後台，雖然是教育廳的廳長請我來的，我不能樣樣事情去麻煩他呀。我們那個 secretary (秘書) 是個大老爺，人家說：「哎唷，校長是怎麼搞的？怎麼有這麼一個漂亮的人啊？」說著就下手了。我氣壞了。在山東也有人向我求婚，我說：「對不起，沒有必要。」也是一個美國留學生，他說：「女人麼都是要到家庭去走進廚房的，當什麼校長。」我根本一個都不理睬的。

那麼我為什麼緣故要離開呢？那裏有個國民黨黨部，我們每一個禮拜要背孫中山的遺囑，每個禮拜一早上全體教職員工站在大禮堂裏背。像現在就不一樣了，現在是唱國歌，音樂就代替了，用不著你來背。那個時候要背出來。有時候搞得心思不集中，忘記了。一個呢就是黨裏頭有人跟我們學校的一個老師勾結起來，造成一種風氣。所以呢，我覺得我是待不下去了。我為啥要待在這地方啊？我是從上海來的，山東對我來說很多事情都不習慣，山東人麼一個茅房髒得來，蒼蠅啊，唷，臭得要命！所以我就改了一個比較好一點的、乾淨一點的廁所，另外就是造了一個洗澡堂，就這兩件事情。別的事情，我曉得我不是這個地方的人，我沒意思，所以我要回來。

回來了就要找工作了，Miss Gallaher 介紹我到杭州當上了女青年會的總幹事。我也很喜歡這個工作，不過有一件事情我就不能夠待下去了，就什麼呢？青年會這個組織它是總會捐出一些，捐一個外國幹事，不要你花錢，替你幹活。另外它一部分經費就靠地方，地方就是要靠老百姓捐款。這捐款的事情，我已經講過了，經濟方面我不內行。我覺得費心費力地，還要坐冷板凳，到各個董事家裏去拜訪，人家都是家庭婦女啊，要靠丈夫的，不靠你的牌頭。我覺得浪費時間。捐來的錢呢，大部分都是我的工資，我覺得不合適。工作我喜歡，就這個我不喜歡。訂合同訂了一年，到了時候我就不幹了，無論如何她們留我我也不幹。後來我在浙江大學文理學院當體育代課老師，在杭州又待了半年。這個時候杭州舉行了一個西湖博覽會，1931年的春天，全國來了很多很多 visitors (訪客)，有一位是從上海去的，叫劉

湛恩博士，滬江大學校長。他就說：「我請你到我們學校去當體育老師。」所以我就回上海啦，到滬江。我跟劉王立明也是老朋友。她有個國際的婦女節制會，她們也經常開年會，我也去參加，在這裏我也是董事。

在滬江的時候，我是女學生的體育老師，兼那個女學監副主任，正的是個美國人。我在那兒也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總而言之哪，女人沒地位。一個男人當校長當教授，全家的人都可以有房子，但是一個single lady（單身女士）那就不行。我跟化學系的一個老師，是德國留學生，我們兩個人住女生宿舍啊。我們兩個人都是可憐巴巴地，洗澡也好，上茅房也好，要跟學生去搶。我們實在不習慣。後來跟校長也談，跟外國老師去說，我們校長答應我們可以讓我們share（合住）。外國女老師也是住在這個女生宿舍，但是她們住的一個apartment（公寓單元）給她們。她們自己有dining room（餐廳），有bathroom（衛生間），她們是single（單身），我也是single，我是中國人，對不對？我們照樣付錢，自來水、煤、電，就是幾個人平分。我們吃虧了，我們吃得少呀。但總比到學生那兒去搶好吧？你知道有的學生很不好的，歡喜弄送（作弄）老師的。做些小動作，使得你難堪唄。你知道別人說滬江，窮學生固然是有，但是多數還是家境都很好的。她們在家裏享受慣了，出來當學生吧，她們經常都是叫大師傅給她添菜的。你這個可憐巴巴的老師，你不能就吃點青菜呀，但你掙的這點錢不行的。我在那裏才100塊錢，還是125塊，記不太清楚，反正是不多的。總歸女人總是到處吃虧。後來呢，碰到一個九一八，一個一二八，學校就搬家，搬到downtown（市中心），圓明園路。<sup>15</sup>我要求說我盡義務都不行，你沒有一個地方怎麼做體育啊？不要體育老師了。沒辦法了。



我家裏呢，我哥哥分了一個印刷廠，規模很小的，就在浙江北路。買賣不好，後來弄得實在沒有辦法，就破產了。所有的東西統

統都要賠，所以變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一分都沒有了。因為我父親失敗了，兩個弟弟都在我哥哥那裏，義務勞動。還有他一個兒子也不小了。三個男孩子一天要吃，你說錢從哪來？我在滬江現在也沒有工作了，所以我帶著這三個 boys (男孩) 坐三等艙逃難到香港去了，做 refugees (難民) 了！那個時候香港人那愛國熱情，接待了我們，我住在女青年會。他們三個 boys 就住在男青年會，待遇都不錯，女青年會總幹事招待得我很好，因為我已經當過杭州女青年會的總幹事了，也是同行，所以特別客氣，飲食起居都不錯。不過我們想想這個仗打到哪一天我們不知道啊，這個不行，總要想辦法有個出路啊。後來我就給我那個介紹我到廣東工作的朋友說了，他們夫妻兩個都是青年會的工作人員，他們很慷慨：「你們過來，住我家裏，吃在我家裏，沒問題。」我們就都去了，四個人哎！我那個同學就給我兩個弟弟找了工作，給我也找了女子中學教書。就是姪子他不幹，他又要回上海。他回來就讓他回來，我自己也要回來，因為我在上海還有個家，離開了滬江我自己就租房子住了。後來我就回來了。

回到上海後，因為我是閒不住的，有機會就出去義務勞動，所以經常去一家歐洲人開的體育館玩玩，在威海衛路。體育館是歐洲式，設備也不錯，各式各樣的電療水療等等，我也到那裏去學一點，也幫他們一點忙。後來那裏就認識一個姓黃的，Mr. Huang (黃先生) 也是從美國回來的，他也是沒有工作，就在體育館裏頭幫幫忙，也是一種義務的性質的。這個人他廣交朋友。有一天他請我吃飯，另外還邀請了一個 Miss Li (李小姐)，是個老師。這個老師跟我們三個人一起吃飯，閒談了，後來她就知道我是一個體育老師：「啊呀，太好了！我們學校正要一個體育老師。」她回去就告訴她的校長了。第二天早上電話來了，就請我去談了，一談就成功了。就開始在這個學校，當時就是代課老師，代過暑假就聘為正式的老師。這樣一來就好了。怎麼叫好呢？那個時候是英租界，是英國人的政府，這個學校是 SMC 的，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上海工部局)，就等於現在的市政府。

這個學校是由現代教育學家陳鶴琴先生創辦的，叫工部局女子中學。它和聖瑪利亞女中、中西女塾這些學校不一樣，它們都是有錢的人去的，學生就是做什麼夫人。我們這裏是公立學校，宗旨就是培養職業婦女的。學生有知識分子家庭的，有工人家庭的，也有一般家庭的，都有。所有的老師一色都是女的，一色都是大學畢業的。一些是國外來的，一些是本國大學畢業生，也有日本留學生。我們那時教師不多，十幾個，教六百個學生。待遇比較一般的就高了。那個時候都是銀元啊，我這個美國留學生，開始就是240塊，國內畢業生是180塊，這比我以前當校長和大學老師的薪水都要多，每一年還要加。我在那裏執教11年。從第一次赴美學成回國，曾力圖振興民族的體育教育，到了工部局女中，個人的夙願才得以較好的實現，個人的才能也才得以發揮。我那時是一把抓，什麼都是我一個人搞，校長也相信我，所以我能夠發揮我的才能了。當時我一個人教六百名學生的體育課，工作辛苦，成天在室外教練，皮膚曬得很黑，學生背地裏給我起個綽號「茶葉蛋」。我開設了當時女中禁忌的許多體育項目，如吊環、爬繩、跳箱以及各種球類。其中最富冒險精神的是訓練女學生騎自行車表演，一輛自行車可同時載好幾個人，並做各種優美的動作。我們每一年要開兩次運動會。當時在上海學校裏面確實是數一數二的。人家一提出來工部局學校，就是體育好。我們這邊學生到了大學裏面都是好樣的。我這個體育老師不是像一般的體育老師上上體育課，我要好好地培養她們做人，做個好樣的啊。前天新選出來的上海市市政協的第一把手就是我們工部局女中畢業的，陳鐵迪。我在上海市中小學運動會團體操做了好幾年的評判長。

我1932年開始一直教到1943年。為什麼能夠教這麼長？因為工作順利，這是第一。第二待遇不錯，我自己租房子，有個家。我弟弟妹妹就住在我家麼，我是大姊姊啊，我是家長麼。還有我的很多朋友同事經常到我們家來吃飯。就像你請我，明天我也請你，大家就是在同事當中請來玩玩。我請了個阿姨住在我家的，我上班，她在家裏燒

飯啊，洗衣服啊。我告訴她：「張媽，我們家裏明天有客人來，我今天晚上把錢交給你，你明天做幾個菜。」到了第二天，她的菜都做得很好。我們同事都很好，大家有時候出去看電影，幾個人就叫部祥生汽車，或者走人家，有時在外頭也吃一頓，出去玩玩，那時很好。那個時候請個阿姨也沒多少錢，很便宜的，多少錢現在我也不記得，反正是一般性的，不會多，不像現在。你看現在一個阿姨的錢比我的工資多呀，那個時候是我比她多呀。那個時候我自己過日子還挺好的，比現在開心。反正我覺得那個時期是我一生難得的時候，黃金時代，我要幹什麼就能幹什麼。

還有一個事情就是說好人有好報。我哥哥破產後他手上沒錢了，他給了我一張萬國儲蓄會彩票。1934年春天4月份還是2月份，報上登出來，我中了一個特獎，有一萬一千銀洋啊，發財啦。當時上海很多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說綁票。人家知道你有錢那你就不得了了。那我就把錢全部拿出來，他給了我的支票，我就都存到了中國銀行。後來這個錢怎麼用完了呢？現在我還是無產階級了。那我哥哥借了一個寡婦的錢三千元，然後還錢。他一家裏的開銷也要在這裏拿：我妹妹出國三千元；我弟弟到日本留學，一千元；我到德國去，兩千元。1936年6月，我作為中華體育考察團成員，出席了在德國舉行的第11屆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考察團大多是全國各大中學的體育教師，體育做出成績來的。我去是自己爭取的，我也要開個後門。教育部體育幹事的妻子是我的同學，通過他們的關係，我就問他們我能不能夠去？他們說你要去只好自費，因為工部局是外國人的單位。其他人是國民黨政府給的錢，有的是省政府給的，有的是學校給的。所以我就自費。就是有了那筆錢才會去的。利用暑假去的，來回三個月。我走了以後就學生做老師，我培養了一批小先生，所以校長讓我走，我照樣拿工資。我們的考察團12個女的，每一個都是大學生，每一個人都能說英語。我們團還去了法國、意大利、捷克、匈牙利、奧地利、丹麥和瑞典等七國考察體育事業。回國後，我整理出版了《赴歐洲考

察日記》，著力描述與介紹了國外體育教育情況。還把看到的都用上了，在漢堡看了摩托車比賽表演，我這沒有摩托車，就用腳踏車，所以我們腳踏車隊很有名的。

1943年日本人進了我們學校了，我們受不了了，校長辭職不幹了，我反正也不幹了。反正上海不能待了，我痛恨做亡國奴，就避難奔赴重慶，在重慶公益工商研究所任過短期事務員。1945年，我辭去這份工作，陪著妹妹去了蘭州。1935到1939年，我妹妹一直在美國，後來回國為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也是我介紹的。現在要去蘭州新開 establish a new YWCA (建一個新的女青年會)。她一個人膽子小，交通也不方便，路上也好幾天，讓我陪她去。到了那裏到處找房子，那麼也要認識當地的一些人。那是1945年5月，抗戰還沒了。好容易已經開始工作了，學生也來了，因為開學校，還有會員活動等等，好，勝利了。聽到那個消息的時候，我們正在那裏開大會，有人 announce (宣佈)：「啊，勝利了！」一下子馬路上熱鬧得不得了，蘭州人打起鼓踩高蹺。熱鬧了幾天以後，我們就想到要回上海了，青運會也不開了。回來的時候你想坐什麼火車啊？都是裝牛裝馬的那些車子，一下子這車子要開，一下子爬上去，一下子不開，就爬下來，一天不曉得要爬幾次啊！1945年回到上海，工部局女中調了校長了，那個時候是國民黨的人了，是三青團的人。我根本也不想回去了。我對政治不感興趣，要感興趣的話我就不回來了。很多人都跑了，我回來看到很多中國人外國人都在往美國跑哇，我一點都沒有我也要出去的想法。我在辦事情，我辦我的學校。就是不搞政治吃這個苦，你不搞它，它搞你唉。



1945年我回來以後也出了件事情。一下火車就碰到一個人，這個人也是很有名的，俞慶棠。<sup>16</sup> 這個人是個進步分子，她是美國留學生，搞勞工教育的。她曾經接收了一個日本小學校，在膠州路，在那裏她開了工人學校什麼的。可是法院裏面的一個院長原來是燕京大學



的教授，也是美國留學生，請她到提籃橋去當女監的監長。<sup>17</sup> 請俞慶棠，俞慶棠不高興，她不幹。好了，那天我下火車，她看到我，立刻就把我介紹給這個人。到第二天早晨小汽車開到我門口，不由分說一帶就帶到法院，再到提籃橋，首先看房子：「這個房子是apartment（公寓）；那個房子靠近監獄，房子很大，一共有好幾間，朝馬路的。這兩個地方隨便你要哪一個。」當時我住在烏魯木齊路，我也有三個房間。我想這也不是我的職業，我不幹這個事情的。她跟我說：「你不要想這個不是你的內行，這個跟辦學校一樣。她們這些人都定罪了，現在就是學習，等待刑滿釋放。」叫我去做。那個時候我還沒有工作，我也是好奇，去看看玩玩。我因為沒有結婚，沒有顧慮。所以我就去了，但我沒有搬。提籃橋在東，我家在西，每一天我就騎著自行車，一天去，回來，去，回來，大概一個月。後來我手下的兩個高級職員，她們叫我監長：「監長啊，你什麼時候搬來啊？你一天不搬來，我們也一天就不得安心。」我說：「好，我去看看房子吧。」那個apartment比較遠，這個是比較近，就去看看吧。一到那裏一看啊，可了不得了。所有的窗、門統統都是敞開的，沒有一個是關的。我就想像這個地方不是我待的地方。什麼意思啊？人家就給你點顏色看看囉。你知道這裏頭黑暗啊。這些個看門的人啊接待的人啊，都是要拿錢的。那我們呢現在都是當清官的，自己以身作則，不貪污，別人也不能貪污。那些人就恨不恨啦？「好樣的，你來啦，對你不起！」我想我那時才40幾歲，身體挺好，還有雄心壯志。這不是我要幹的事，我沒有精力去搞這種名堂。回到家裏馬上就寫了一封信辭職，從第二天起我就沒去過。

那時我們SMC的老校長在1945年日本人投降之後接收了一個學校，在愚園路烏魯木齊路口，那個時候有兩個學校，一個是男的，一個是女的，都是為外國人的，是SMC辦的。她就接收這個女校，那個時候外國人也有，不過少，主要外國人還有那個俄國的小孩子，我們中國小孩子也不少。這個學校名叫西僑女中。我到那兒是1946

年，還是教體育。到5月份，就開運動會。第二天外國英文報紙上就登出來了，說想不到中國人這麼能幹，辦了這麼一個大規模的體育運動會。那時我還不到46歲，我就想要出國去了。我幾十年教學的一個總結，就覺得人是一個動物，是動物就是要動。但是有些人不能動怎麼辦呢？所以我就想出國去看看人家怎麼教的。所以我就到Columbia（哥倫比亞大學）學習Special Education（特殊教育）。我到那兒看了醫院啊、學校啊、還參加workshop（工作坊），參加在美國召開的國際特殊教育年會和美國傷殘兒童教育年會。我是自費去的。在美國我也是朋友幫忙，朋友好心，我和她住在一起，她工作我就在家裏做勞動，她有客人我幫忙接待。就這樣對付過去了。1948年我獲得了特殊教育的碩士學位。我的畢業論文題目是「要建立中國第一所殘疾兒童學校」。

後來我的工作是由陳鶴琴請我回來的，就是這個國民黨的社會部辦的一個新興事業，特殊兒童輔導院讓我擔任主任。我1948年8月就回來去上班了，工作根本就沒開始。有八個大學生派到這個單位來，我怎麼辦？我就帶了一些資料回來讓他們翻譯。後來快要解放了，聖瑪利亞（St. Mary's Hall）她們少一個體育老師，校長親自到我家裏來請我，我沒辦法，我就好啊好啊，我就答應了，就去了。那是1949年2月。同時我就籌備我的傷殘兒童學校。我呢是個窮秀才，什麼也沒有的，那怎麼辦？學校要有房子，要住宿人員。房子後來解決了。有人介紹我認識了一個鞋帽店的商人，這個老頭有房子在鉅鹿路，底下一層三大間就要拜祖宗，有什麼大喜事都是用的，平常不大用，所以也很漂亮的三間房子。但是就是解放前夕，他怕共產黨來了要接收他的房子，所以為了保他的房子，就歡迎我去辦這個學校。我的學校都是小兒麻痺症的小孩子，他們站都站不起來，不會給他出毛病的。我們就租底下一層，還有個花園，花園裏還有幾十條大眼睛的金魚。樓上都是他的。1949年6月1日我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傷殘兒童學校，終於實現了在哥倫比亞大學的誓言。

我這個學校是解放了之後再登報招生的。<sup>18</sup> 我辦了一年之後，社會上公認，這個學校辦得好，家長也是非常高興。學制就是按照教育局的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這樣子的，當然還有小孩子還吃奶的，反正是傷殘的人都來。教職員全部都是義務的，包括我自己。我的生活來源就是在現在的第三女中、曾經的聖瑪利亞教體育。我那時候騎車奔來奔去的，就是為了這個學校。辦了一年之後，國家增收地價稅。我們租的人家三間房子一個花園，那麼他就叫我們要付這個地價稅。那我們沒錢啊。我是赤手空拳辦這個學校，拿我的精神、我的力量同時間，我所學的，來做這個工作。那怎麼辦呢？已經辦了，不能叫學生回家去啊。那我就想辦法，跑教育局啊，跑衛生局啊，也跑這稅務局啊。後來經過一個朋友的介紹，就找到了趙樸初。我到今天為止還沒有跟趙樸初見過面，但是他知道我辦這個事情就很願意幫忙，因為那個時候他在上海專門搞救濟工作的。那麼給我們什麼幫忙呢？就是在現在的徐匯區中心醫院的地點，當時有個小花園，最初是個 tearoom（茶室），後來做過宋慶齡的辦公室。這位趙樸初就把這個 tearoom 派給我們了，所以我們就從鉅鹿路搬家搬到這兒來。

在鉅鹿路的時候我們是客人，什麼都要聽主人的吩咐。現在我們來了，把大門一關，都是自己人了，所以很高興。可是在這個時候就出毛病了。有兩個老師，一男一女，也是盡義務的，但是他們是住在學校的，學校供給膳食。像我們這些走來走去的，什麼好處也沒得到。那個女的姓陳，她有一個老師生肺病，從蘇州住到我們學校來，我就表示不歡迎。為什麼？這些孩子小得很，你這個有病的人住在我們學校這不合適，這件事情得罪了她。另外這個老師還有一個學生在上海市教育局裏工作，她們兩個人勾結起來，那麼有這個男老師幫忙，就想法子奪權。我這個人是湖南人，合則留，不合則去。這學校是我辦的，你們要給你吧，我也不一定要，我還可以找別的工作。但是她不好好地給你走。我確實辭職了，結果她在報紙上去登一個教育局撤職。後來我這一輩子就完蛋了！人家不了解呀！這個陳某某做

了什麼壞事啊？怎麼會撤職的？哪有無緣無故的？她們用了什麼手段呢？買通了《文匯報》的一個記者，到學校裏來，用那種很不體面的方法來利用這些小學生，就是鼓勵他們說陳校長怎麼怎麼虐待你，要他們這樣說。這樣的來，就是1951年6月1日兒童節，報紙上一登，說陳詠聲怎麼怎麼怎麼的，罪名就是欺負孩子們。你想我這個人幹嘛要做這個事？我辦這個學校，我要怎麼害這些學生？我把他們當上帝看待還來不及呢，對不對？就是造謠言、誣告。所以這幾個幹部都是土包子，他們沒有腦筋的，人家辦這個學校是不是好事？你幹嘛這樣欺負人家？人家自己辦的學校，你來給人家撤職，說不過去的呀！人家犯了什麼罪啊？這個學校經費都是我們自己籌集的，什麼東西都是借的，我們是來自人民，服務於人民。所以說，這些土包子！後來我進文史館就是因為他們對不起我，讓我吃苦頭，現在他彌補對我的不公平。把我幾十年的時間浪費了，把我的事業搞掉了。那個時候剛剛解放，對共產黨一種害怕的心思，誰敢說話？我也懶得說話，我就忍著。那個時候一邊倒，你是美國留學生，那個時候抗美援朝。我在聖瑪利亞教書，我也有個體會，我做了一輩子老師從來沒有受過這種侮辱。這些學生有一部分的人已經受了共產黨的教育了，我是美國留學生，她就是跟你你不合作。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後來弄得我就不高興做了，我辛辛苦苦跑來跑去做啥？所以我就不幹了。



我離開這個學校以後，1952到1954年我學俄文學了兩年。生活來源呢，我妹妹有時寄點錢來，她1947年又回美國去了。我總要找工作，有一次好朋友給我介紹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我覺得這個工作對我來說也是很好的，體育治療，我也很喜歡。是校長請我去的，校長在我沒去之前已經過調查研究，認為我這個人是靠得住的，沒有政治問題的。因為我的工作是在醫院，我的對象就是病人，還有工作人員都是年輕的解放軍。他們真不熟悉我的情況，其實我真是好心好意要把這工作做好，這個院長也是個土包子，不適合，種種種的來

折磨人家，想盡辦法，這個不行，那個不行的。還有，我在那裏是做個醫生哪，醫生啊連病歷都不給我的。病歷卡啊，病人來的時候這個我應該知道啊！就是因為我是美國回來的，不相信你唄。所以我在那裏我是不高興的，自己不能夠按我自己的心願做。後來呢，一個肅反運動，肅清反革命，1955年夏天開始的，又把我當靶子打。那要搬進去住。我原來是他們給我一個單元，那個日本式的房子給了我一套，我住在那裏，天天騎車子來回。那個事情（肅反）來了麼就要搬進去。但在那裏面那比文化大革命要好得多了。我的車子也帶進去了，人家吃飯麼我就跟著上飯堂吃，大灶小灶都隨便我吃了，工資照樣發。等到半年之後，說到我的問題：沒政治問題。也沒叫我不幹，我自己不幹，這個地方不是我待的地方。我想這叫啥名堂啦！我不是為了要錢到這來的。就辭職要回來。學校在江灣啊。我就要求說：「我希望你們給我個車子把我的行李搬回去。」他給我說什麼：「呃，車子是可以的，但是不是汽車，而是馬車。」馬車！另外呢，還要你跟著跑呢！我還好是騎腳踏車的人，就跟在馬車後面跑。有幾個同事在那裏幫我把行李統統綁在車上，那麼他們走了，去坐公交。我回來的時候，他們站在我大門口在等著我呢，再把東西卸下來，幫我搬到三樓。好了，回到家裏。我也沒想到我犯了什麼罪啊。到文化大革命可不得了了，人家說我是押回來的。這些人腦子沒有的啊？你說押怎麼會押到家裏來呢？這些人還幫我把行李搬上去了。

後來我怎麼辦呀？我要做事情啊，人活著就是要工作呀！生活來源是有我妹妹幫忙的，我開銷也很小的。後來我就拜老師，拜了個中醫，原來是我的老師，他是武術家，有名的王子平。我覺得對於一個搞體育教育的人來說，掌握傷科是件好事。我就向他學習傷科，他是看病的。我在他那兒學習一年，原來應該是三年，但是我也遇到不幸的事情。那老師很喜歡我，因為我聽話，老師說什麼我總是聽，他在看病我就一個一個地聽，有時候我還要 take notes（做筆記）。可是同時他的女婿跟我一樣的，他是浙江大學畢業的，他也學，他在裏頭就搗

鬼了。我在那裏他就不怎麼樣神氣，因為我是美國留學生，老師有時還聽我的。所以總是惡刻來西（使惡毒陰招），都是些小事情，但使得我難堪，使得我忍受不了，我氣死了，我就不幹了，做了一年。

我1956年2月份離開二軍大，4月份就到王子平那兒，學到1957年。然後我到北京去取經，看了很多社團。還有當時學氣功還是劉王立明介紹的。她介紹我到北戴河的氣功療養所，我在那裏住了一個禮拜，還不錯。後來我開業，這叫無照開業，那個時候有個政策，參加學習，你可以開。我開推拿、傷科。所以我搞了十年也不錯，那來的人可不少，來來往往的都是知名人士，什麼電影演員啊、導演啊，還有校長啊，還有民主黨派的人啊。人挺多的，就在我們家裏，上半天就門診，下半天就出診。我也不在乎要錢，都是些熟人。我一個人沒有事情幹了難過吧，總歸要做工作。人活著就是要工作的。我的診所一直開到文化大革命。他們說我是無證開業，就停了。

文化大革命很慘。我的鄰居來「除四舊」，抄了家。我沒有戴過什麼帽子啊，<sup>19</sup>所以這些人抄我的家是出於嫉妒。他們看到我自己住了一套大公寓，我從美國帶回來的東西，他們都有興趣，把我帶回來的廚房的東西都抄得一塌糊塗了，開水壺可以叫的都抄去了。第一師範的紅衛兵也來抄家，是衛生局安排的，因為我在地段醫院學習過。我學校的紀念品、我的書、我帶回來的體操dancing record（跳舞的唱片），還有家裏的很多好東西都拿走了，最後拉走了三黃魚車的東西。我的最後一個罪狀，反對毛主席。一個我不喜歡的人，在我買的毛主席相片背面題詞，我不喜歡那個人提的詞，我氣得當時就撕了這張相片。有一個人看見了，去給居委會打了小報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就是犯罪。那個街道主任說：「那你要撕這個相片你恨這個人，你不曉得從這兒去撕，為什麼從那兒去撕？」我說：「那個時候我氣也氣得要命，從來沒想這個事。」後來里弄裏頭一直纏著我這件事，鬥啊，還要去背毛主席語錄，還要掃地掃馬路，還在馬路上撬石頭。那個說出去的人，是民主黨派的人，也是個老師，我對他是幫助了不

曉得多少次數。現在這個人死了，死在馬路上，說得什麼靜脈曲張，一身的血。這是報應吧？害我的人現在一個個都死了。

文化大革命後，我從那個地方搬走了，因為我再也不想看到那些人。當時抄家寫了好幾張收條，結果東西都不翼而飛，都沒有了。唉，我的老相片一張也沒有了，我氣得都撕掉了。其實我不撕掉的話那東西還在的。我想現在這樣的運動搞到哪一天為止啊？這種社會我不要活了，沒意思。那有什麼意思？這些東西將來有了，運動又要來一次，煩不啦？所以我幾箱相片都撕掉了。世界各國我跑了很多地方，這些照片我一張都沒有了。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現在我只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文憑，別的地方的文憑都沒有了，就這一張，這文憑放在抽屜裏一張舊報紙的底下，他們沒打開報紙，打開了這個文憑就沒有了。現在能夠證明我是哥倫比亞的學生、去過美國，就是這一個文憑。天曉得。有時候想，想不通；有時候想，人家性命都沒有了，我還留了一條命。我在1930年代買的一本《女聲》雜誌保留下來了，王伊蔚很幸運，她總算讓人家知道她是做過一番事業。要不是我幫忙這個事情誰知道？我把我自己那份《女聲》捐給檔案館了，她就憑這份東西寫東西了。我做的好事可以寫一本書，我不是要人家來誇獎我，就是我的性格，我喜歡做。



年輕時我下定決心不要結婚了，就是堅定的。所以見到男同志無所謂，沒有當他是個男人，就是跟女人一樣的。一個女子總會有人求的呀。我也碰到好幾個。我自己站穩立場就說我不結婚，我也不想跟你再來往，永遠不會有什麼，對吧？五四運動的時候有一個男同學寫信給我，說願意跟我做朋友。我說：「你是來幹什麼的？要找朋友呢？還是來幹革命的？」（笑）這個人長得還不錯，那個時候也是西裝筆挺啊。我只是把那些男人當做普通朋友。我從未遇到一個對我獻身事業表示尊重的男人，除非上帝造一個。幾年前，我的一個學生的鄰居的兒子週歲，托我幫她聯繫，在徐匯區政協餐廳擺了三個酒席。

那我被請了，不得不去，但是我也不願意白吃人家一頓，我心裏會不開心，所以我要送點什麼。我就送了一個照相簿子，寫了幾句話大意是：從今天起，希望你好好保存這個本子和相片，慢慢地積累下去，等到你像我這樣年齡的時候，你打開看看很有意思。寫這個東西還要把名字寫進去啊，就問什麼名字，一寫，四個字。頭一個字是代表爸爸，第二個字代表媽媽，第三第四是那小孩的名字。這是個創舉。這個小孩就是爸爸媽媽合起來有的，而不是爸爸一個人的，你看一個女人大肚子受多少苦，他們自己編了個雙姓，表示承認女人的貢獻。我沒有遇到過其他這樣做的男人。我們那個時候不結婚沒人管，不像今天。像今天哪，我說，解放以後就不會有什麼不結婚的人了。你不結婚，別人關心啊（笑）。現在關心，那個時候沒感覺關心，各人有各人自由呀。而且，很多地方更願意要單身女子當體育老師。現在這些女孩子很苦悶的，沒有結婚的叫什麼，大齡女青年。

我覺得現在的女人比從前還要苦，還要苦。說起來麼男女平等、半邊天，實際上她們有苦也說不出。有事業心的人啊，家庭生活都不美滿。男人的這個思想啊，我想中外一律，就是認為女人應該在家裏伺候他。所以回來又要燒飯帶孩子，還有老一輩的生病的，那又苦了。還要求她生孩子，是蠻苦的。我們那個時候職業婦女多半家裏都有阿姨，就專心做她的工作。現在，又要做這樣，又要做那樣，你說她苦不苦？

我在上海認識許多婦女活動家。我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每個人都參加這些愛國運動，參加這些婦女活動，婦女大同盟什麼的。我那個時候去開會，我是群眾。因為我的工作很忙啊，我沒功夫做這些事情。那麼這些事情呢也有機遇的，比如有些要好的朋友，大家推舉推舉啊，這樣的。現在都是這樣的，人際關係很重要的。我呢16歲就有一個志願，就是體育救國。所以現在雖然我不在位，但是看到這個體育蒸蒸日上，我自個兒不幹了，但別人替我幹了，我也很高興。

文革開始後，我的身心遭受嚴重創傷。但作為一個人，我從未停止過盡力幫助別人的義務。每天早晨俟買菜之機，我便義務替人治病



救急。從1977年以來，我義務教授美國口語，我的學生從教授到工人，遍及各行各業。我雖為老人，思想卻是年輕蓬勃的。我但願無愧於一生。

## ■ 解讀 ——個人主義與國族主義

在王伊蔚看來，因為陳詠聲在1930年代的上海並不是著名的活動家，她應該被定性為只關心自己利益的個人主義者。雖然陳詠聲曾經加入了中華婦女節制會，但她只參加了少數幾次婦女組織的活動。在這一方面，她和本書的其他幾位敘述者不太一樣，但她的個案仍然與我們對五四時代女權主義的研究密切相關。事實上，她的人生故事與本書的其他受教育婦女的經歷仍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也為女權主義話語對於那一代受教育婦女的影響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陳詠聲出生於一個20世紀初追隨新思潮的家庭，她的父親和叔叔都曾留學日本，父親參加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創辦了進步的群益書社。通過她叔叔與陳獨秀的關係，群益書社成了《新青年》的出版商。在這樣一個「不太傳統，更傾向於西方思想」的家庭，陳詠聲這一輩的女孩不纏足，而且都上學。陳詠聲六歲時作為寄宿生進入周南女校學習，她在其自傳和我的訪談中都強調了這一事實。周南女校是朱劍凡創辦的一所私立學校，朱劍凡是在日本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一位教育家，相信「革命以啟迪民智為前提，以解放婦女為先導」。清政府不准辦私立女校，他就把自家園林宅地改成學校。1911年辛亥革命後，1912年「周氏女塾」改為「湖南私立周南女子師範學校暨附設小學校」，明確辦校宗旨為「著眼於婦女解放，培養人才，以振興中華」。<sup>20</sup> 學校招收的學生後來很多都成了20世紀初中國的風雲人物，例如向警子和蔡暢這兩位著名的中共婦女運動領導人，著名作家丁玲，還有本書

的一位敘述者黃定慧都畢業於周南。在中國要說自己在周南女校讀書，就是在強調自己有進步的教育背景。

不過陳詠聲在周南女校的時間不長，與其他著名女校友不同，她沒有成為一個具有政治傾向的婦女活動家。但周南女校和其他女校所強調的強烈的愛國主義主題，仍然鮮明地呈現在她的敘述中。陳詠聲的婦女解放的觀點是通過國族主義的稜鏡得以形成。她獻身於女子體育教育的決心是被日本《二十一條》和徐特立的抗議血書所激發的：「要怎麼樣子愛國呢？就是強國必須強種，要強種，女子的教育很重要，身體很重要，培養她們有好的身體。所以我就下決心要學體育。」她對體育教育是救國之路的信念如此強烈，以至於她決定堅持獨身來獻身女子體育教育事業。國族利益肯定是她職業發展的驅動力，而這是被王伊蔚那樣的婦女活動家所忽略的事實。王伊蔚對陳詠聲的評價折射了中國共產黨對那些在中國紛亂的政治鬥爭中試圖保持獨立立場的人的偏見。陳詠聲決不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只關注自身利益的個人主義者，她在救國道路上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專注於自己選擇的職業，而不是其他社會或政治活動，是她為中國婦女和國家的福祉貢獻力量的方式。20世紀初中國國族主義話語的霸權地位，使那一代受過教育的婦女很少有人能擺脫國族主義的情懷。

有趣的是，和陸禮華的個案一樣，陳詠聲對國家福祉的關注和她的個人利益很協調地融合在一起。救國需要受過教育的婦女做貢獻，而像陳詠聲這樣的職業婦女通過為國效力發現了自我實現之路。教女子體育成了一項關鍵的現代職業，所以陳詠聲發現自己是「非常非常吃香」，體育老師是「first class」（頭等的）。有過一兩年體育訓練的年輕女子，就可以在省立女校或者國立女子大學中找到教職。陳詠聲20歲就擔任了著名的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系的主任，即使她當時還沒有高中文憑。這些迅速擴大的職業機會以及對女子學歷的寬鬆態度，都是源於強種強國這一迫切需求。在這種國族主義話語中，女子的身體是實現強國目標的關鍵工具。不難理解，投身於體育教育的婦

女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以及個人的光明前景。陳詠聲經常換工作，在急需體育教師的年代，她有不斷尋找更適合自己的位置的自信。

除了受過教育的婦女從男老師那裏學到的國族主義，婦女自身的個人經歷也在幫她們做選擇。像她那一代的許多婦女一樣，陳詠聲目睹的女人的痛苦，極大地影響了她的人生。她父親和叔叔是她崇拜的開明而博學的知識分子，卻帶了姨太太回家了，這對她是一個巨大打擊。她把母親的早逝歸因於父親納妾，父親的行為帶給她心理上的創傷顯然並不比帶給母親的傷害少。在訪談中，陳詠聲強調她16歲時決定不結婚有兩個理由：愛國和女人的痛苦。她之所以清楚地記得做出決定的時間，是因為《二十一條》和老師的血書，而作出決定的主要原因並不難理解，便是她目睹了女人的痛苦，以及父親和叔叔給她造成的傷痛。當一個傷心的少女突然被國族危機和老師的英雄壯舉所激發，她不僅發現了一條救國之路，也發現走出自己女兒身的困境之路：為了強國，把自己的人生奉獻給體育教育。一個女子對性別壓迫的反抗就此在愛國主義的話語中得到合法的表達。

至此，陳詠聲的經歷與陸禮華、朱素萼、王伊蔚驚人地相似，她們之所以為了事業而努力奮鬥，都是受了家庭中女人悲劇的刺激。這些女子的共同經歷，以及在她們自述中這類早年經歷的重要性，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女人的個人經歷與她們接受某種意識形態之間的關聯。從這些女子的人生故事中，我們發現她們容易被國族主義和女權主義影響的一個因素：她們早年的社會性別體驗。無論是雙重性道德標準，還是重男輕女的父權制家庭制度，這些經歷都給這些年輕女孩帶來了憤怒、沮喪和痛苦。國族主義和女權主義以「婦女的壓迫」這一概念，幫助她們能清晰地說出她們童年的經歷和感受，並支持她們對「壓迫婦女」的制度和習俗的反抗。擁抱這些賦權的話語，反叛的年輕女孩們蛻變成勇敢的新女性。顯然，婦女新的主體性的建構過程不僅與新的話語的傳播有關，更涉及到一群對現狀不滿的女人。換言之，若不是因為有了個人經歷使得她們更容易接受新話語，即使新話語得

以傳播也未必能創造新的主體性，甚或，新話語會缺乏身體力行的傳播主體而難以流行。

作為對壓迫性的婚姻制度的反抗，陳詠聲堅持獨身的決定在她那一代人中並不罕見，王伊蔚也因為家庭中親人的不幸婚姻而決定不結婚。開放的就業機會使得這些婦女有信心過上獨立的生活，而國族主義話語又使她們為愛國做奉獻的獨身選擇合法化。對於20世紀初一位受過教育的女子來說，自己養活自己不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許多年輕女孩把獨身看作是一種明智而必要的選擇，那些把自己視為婦女解放「急先鋒」的婦女活動家尤其傾向於選擇獨身，因為婦女解放事業需要她們全身心的奉獻。既然在當下的社會制度中擁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婚姻幾乎是不可能的，婦女解放的先鋒們就沒有必要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拿婚姻做實驗。<sup>21</sup> 這樣一種觀點在五四時期的青年女性和想要獻身革命的年輕男子中都很流行。雖然大部分人沒能堅持自己的誓言，還是有不少女性做到了堅持獨身，並創造了輝煌的事業。<sup>22</sup>

年輕的陳詠聲很快學會了一種新的話語，為她的獨身決定增加了新的意義。在訪談中，陳詠聲不假思索使用上「獨立人格」和「附屬品」，兩者同是新文化女權主義中使用頻率極高的詞語。保持獨立人格、不當任何人的附屬品是陳詠聲主體性的核心。16歲時，獨身對於陳詠聲來說是獻身國家和逃離女人痛苦的理想結合；30歲時，她做關於婦女切身問題的演講時，對獨身有了新的見解，她有意識地去追求獨立人格，並且公開抨擊男女不平等。陳詠聲和本書中的其他幾位受訪者一樣，也說不出是哪一本具體的書或者雜誌給了她新的思想，但她學會了使用新文化女權主義的關鍵詞，並實踐其原則。

有意思的是，陳詠聲從沒提到她在美國期間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男女平等議題的啟發。相反，她在訪談中兩次提到了美國婦女，都是來說明她們無法理解她正在思考的那些問題。陳詠聲提到，貝勒女子大學的女學生每個週末都有聚會，她們如果能有約會就會興奮異常地說：「啊，我今晚有約會啦！」陳詠聲模仿著她在七十年前聽到過的

少女嗓音，來強調她美國同學的單純。沒有哪個美國同學經歷過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她很久前就因為目睹了太多的不幸婚姻，所以決定不結婚。男人對她來說，只是普通朋友；沒有男人讓她感興趣，除非他能平等對待她而且讓她保留自己的姓氏，她在美國絕對沒有遇到過這樣的男人。更糟的是，第二次到美國時，她向美國朋友提出姓氏問題時，卻發現她們從未思考過這個議題。儘管陳詠聲很關注男女平等的問題，她在美國期間未曾真正接觸到女權主義思潮。這或許是因為1920年代中期，她的美國同學是沉浸於爵士樂和摩登女郎時代氛圍的年輕女孩，而非投身於婦女參政運動的那一代人。況且，德克薩斯的一所基督教學校也不怎麼像是一個能接觸到女權主義的地方。她第二次到美國是在二戰後，當時盛行的是反女權主義而不是女權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開始宣傳「幸福的家庭主婦」讓婦女回歸家庭，多數美國婦女迫切地想做某某太太。因此，這位深受五四女權主義浸潤的中國女子很難和她的美國朋友討論性別議題。

陳詠聲在美國接受了高等教育，這一經歷與其他幾位受訪者不同。這段經歷如何有助於形成她的主體性呢？陳詠聲精通美語，這顯示了她的西方文化背景，但除此之外，聽上去與她那代受過教育但沒出過國的婦女很相似。她強調她愛國、對事業的奉獻、為他人服務——所有這些品質都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流話語所認可的。更明顯的是她與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她始終把大家庭的親戚看做是自己的家庭成員。雖然她獨身一輩子，在內心她從未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分開過。當有了一套公寓後，就很自然地歡迎兄弟姐妹來和她一起住，並把照顧兄弟姐妹、侄子侄女視為自己作為大姊姊的天經地義的責任。就連彩票中獎時，她都把獎金分給兄弟姐妹。即使在她的晚年，依然在深深遺憾母親早逝，都還沒來得及享受她的侍奉。從她的家庭觀念和對家庭的責任感中，絲毫看不到美國個人主義痕跡。

陳詠聲的所有表述中，只有一句是典型美國話：「我要做我自己。」儘管她是用漢語說出來的，但不難察覺到這句話並不源於中國傳統語言文化，沒有接觸過西方文化的中國人不大可能使用「做我自

己」(be myself) 這樣拗口的翻譯短語。有趣的是，她是在提到決心不做任何男人的附屬品時使用了這個短語。因為她早在去美國之前就決定獨身，而且她在五四時期就知道了「獨立人格」的概念，所以「做我自己」不是啟發她、改變她行為的美國概念，而是她能認同並且以自己的方式去領會的美國思想。許多美國女人都會說「我只想做我自己」，卻不一定會去質疑自己作為某某太太的狀態。而陳詠聲對「做我自己」的理解，是做一個獨立的女人，至少是能在婚姻中保持自己姓氏的女人。「獨立人格」和「做我自己」明顯有著密切的關係。「獨立人格」是提倡西方個人主義的新文化人士引入的一個外國概念。陳獨秀早期使用「獨立人格」這個詞，主要是要表達個人主義的基本要素，如獨立、自主及個體的獨特性。但當「獨立人格」一進入中國語境，就因其與特定的歷史和社會文化背景聯繫在一起而獲得了自身具體的內涵。這個詞是在新文化人士對女權的宣傳倡導中得以流行，因此就有了清晰的性別維度，大多出現在討論婦女問題的背景中，是五四女權主義的關鍵詞。對於五四女性來說，這個詞彰顯了要在各個方面與男人平等擺脫附庸地位的一種獨立人生狀態。陳詠聲把特定歷史中對「獨立人格」的理解投射到「做我自己」這個英文譯詞上，頗為順理成章。

陳詠聲的人生中一個最顯著的特點是她很享受自身靈活的流動性。無論是當學生還是當老師，她都不時地從一個學校輾轉到另一個。一到成年後，讀哪所學校、做或不做哪份工作，這些決定全部由她自己作主。從1920年體校畢業後到1923年去美國之前，她從上海輾轉到北京、湖北和廣東，最後又回到上海。有意思的是，她並沒有把這種頻繁的遷徙定義為追求「做我自己」，而是歸因於她湖南人的個性：「我這個人是湖南人，合則留，不合則去。」在她的認知中，她的頻繁遷徙是性格使然，而並非有意識去找尋自我。陳詠聲沒有用美國文化框架來解釋自己的經歷，她只是一個意志堅強的女子，恰好生在一個鼓勵女孩獨立的家庭，且身處在一個允許女子在社會上有行動自由的時代。陳詠聲清楚地記得，她母親說不想依靠兒子，而想依靠

女兒。可能是母親看到了個性很強的女兒有巨大潛力，或許只是希望女兒胸懷大志。不管母親是出於對女兒的信心或是激勵，她看到了女兒會有一種和自己不同的人生的可能性。總之，家庭背景和歷史的契機，而非西方教育，使得陳詠聲在自己選擇的頻繁遷徙中保持了獨立自主的生活狀態。

雖然從文化意義上，陳詠聲在美國受的教育沒有明顯影響她的生活模式，但在社會意義上，「美國留學生」的標籤還是給她的人生造成重要的差別。1949年以前，這個標籤是能給她帶來好處的一種信譽：她29歲就成了山東省第一位大學女校長，而她在上海工部局女中做體育老師的收入比沒有西方學歷的人要高。西方教育背景顯然很受歡迎，很多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女留學生都回到中國。在國族主義話語主導的背景下，幾乎所有20世紀初的留學生都回到中國，因為他們在西方學習的目的就是為了強國。一個很能說明當時情況的例子是，1928年陳詠聲獲得英語學士學位回到上海，儘管不同層次的學校都開設了英語課，她卻找不到一份教英語的工作。這個大都市裏擁有英語教師資格的人遠多於學校的需求。

1949年以後，陳詠聲美國留學生的身分卻讓她處於不利的地位。朝鮮戰爭爆發後，政府煽動起強烈的反美情緒，這種大氛圍導致陳詠聲失去了剛創辦的殘疾兒童學校。伴隨著學校一起失去的，還有陳詠聲的梦想，和她受人尊敬的社會地位。她成了一個被謠言誹謗中傷的人，用她自己的話說：「我這一輩子就完蛋了！」雖然幾年後她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歡的工作，但再也得不到信任。1955年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後，她不得不接受審查。即使審了半年宣告她沒有政治問題，好強的陳詠聲則拒絕繼續忍受被歧視，她辭職了，就像過去多次辭掉令她不滿的工作一樣。但這一次情況不同了：解放後，她不再有工作機會了。55歲時，壓不垮的陳詠聲開始學習傷科這門新的專業，並開了一個診所。雖然她很高興為人民服務，但作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時期的個體經營者，陳詠聲墜落入社會邊緣。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政府才恢

復了她的社會名譽，並接納她為文史館館員——在她眼中，此舉無疑只是對她所承受損失的補償姿態。

1949年前的獨特經歷最終讓陳詠聲獲得一些社會認可，1990年代政府也給了她一些特殊待遇。在中國申辦奧運會的活動中，陳詠聲被發現是一位老年愛國者，畢生為了中國體育教育和體育運動的發展而奮鬥。在圍繞著奧運會產生的日漸高漲的國族主義情緒中，陳詠聲曾經參觀1936年奧運會的經歷、她美國留學學成歸國服務的經歷，都使她成為與奧運會完美匹配的愛國主義敘事中的楷模。陳詠聲其後也作為貴賓受邀參加了1993年上海東亞運動會的開幕式，報紙和雜誌的記者都來採訪她。她支持政府申辦奧運會，看到中國體育教育和體育運動蓬勃發展，她由衷地高興。把陳詠聲描述為老年愛國者絕不是歪曲。準確地說，陳詠聲正是貫穿20世紀的強國強種國族主義精神的具體體現。

陳詠聲作為一位歸國的老年愛國者，終於得到官方的關注。上海市副市長龔學平在1995年春節前夕親自去探望她。看到這位95歲的老人獨自居住在一套凌亂的公寓裏，龔學平感到很難過，就讓僑務辦公室替陳詠聲請個阿姨，但被陳詠聲拒絕了。她說：「我雖然清貧，但決不要政府出錢請保姆。若是這樣，我寧願不要保姆！我有扎實的英語底子，可以搞點翻譯，掙些錢來支付保姆工資。」1993年我第一次採訪陳詠聲的時候，她已經透露過她想用自己的英語專長來掙錢請阿姨的想法，最後由僑辦幹部遵照副市長的指示，終於成功找到《上海僑報》和一家法律公司，聘陳詠聲為英文顧問，令她的願望得以實現。就這樣，陳詠聲直到晚年仍然實踐著終身堅守的獨立原則。<sup>23</sup>

作為一位職業婦女，陳詠聲和她那一代許多職業婦女有很多相似之處，救國和獨立人格都構成了這群受過教育婦女的主體身分的核心。她們在為國家做貢獻和保持獨立生活的雙重追求中，意識到社會中無處不在的性別歧視。然而，她們依然能在事業上取得巨大的發展。事實上，1920年代末以後，職業婦女已經成為中國大城市中一



支顯著的社會力量。五四時期所推動的高等教育和職業領域的男女平等，在此後迅速體制化。本書中的敘述者證明，只要單個家庭不阻撓女兒的職業夢想，並且能為她們提供教育資源，那麼這些婦女就能相對容易地進入中等職業學校或大學裏學習。有了教育背景，這些不想成為太太的婦女，就能夠成為「職業婦女」這一受人尊敬的新社會群體中的一員。「新女性女兒們」和她們母親的人生之間的巨大差異，證明了20世紀初迅速變化的社會性別關係和習俗。雖然當時職業婦女只佔總人口的很小部分，但正是這一社會群體的存在，「男主外，女主內」——這個在中國歷史上佔統治地位的社會習俗和意識形態——才開始了被顛覆的無可逆轉的歷史進程。

反諷的是，1949年以後國家雖然強調婦女解放，但這些婦女解放的先驅卻沒有受到重視。在新政府看來，她們的愛國奉獻並不代表她們便是政治正確。自立和職業成就只是證明了她們在「舊社會」不屬於被壓迫的無產階級；沒有參加過黨領導的革命使她們失去了進入新精英階層的資格；西方教育的背景或者跟國民黨有關聯，則進一步把她們推出了社會生活舞台的中心。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職業婦女」這個群體不適合中國社會階級分析中的任何一個階級範疇，她們也因而散落在不同階級之中。新社會依然需要少數取得巨大成就的職業婦女，於是她們能夠保留以往的名流身分，並繼續她們的職業。許多人則被劃進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行列，這些人若想要繼續在國家掌管的單位工作，則必須把自己放在接受思想改造的位置上。剩餘那些無法在新的社會架構中找到合適位置的人，如陳詠聲、王伊蔚、朱素蓁、陸禮華這些曾經事業有成的職業婦女，則只好中斷她們的職業，在社會邊緣謀生。五四時期以來就存在的職業婦女或者新女性這一社會群體，就此在毛澤東時代銷聲匿跡。<sup>24</sup>

## 注釋

- 1 1990年代初期家政服務尚未成為行業，上海家庭基本延續毛澤東時代用詞，稱家政服務人員為「阿姨」，而非1949年前的用語「傭人」或「女傭」。後來出現了「鐘點工」、「保姆」、「保潔工」、「家政服務員」、「月嫂」等等多樣詞彙，折射了迅速擴大的中產階級對家政服務的需求以及再生產勞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但是「阿姨」依然流通，並且是僱主面對僱員時的稱呼。
- 2 以下敘述是從1993年2月24日、1993年3月24日和1995年1月8日我對陳詠聲所做的訪談，以及她在文史館出版的自傳中整理提煉而成的。
- 3 關於中國科舉考試頭銜，參見第五章注3。
- 4 巴金（1904–2005）在1930年代初出版了小說《家》後成了著名作家。這本小說主要是以他自己的大家庭為原型創作的，被認為是20世紀初關於中國大家庭最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家》這部新文化文學作品，影響了五四時期無數青年讀者。
- 5 民間稱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朱鳳武。此處應為明朝滅亡後朱家改姓周了。
- 6 此處指朱元璋的27世孫朱劍凡（周家純）一家人。
- 7 「古稻田」即1909年創辦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
- 8 當時西方列強忙於一戰，日本決定擴張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其中包括了日本在華享有廣泛的經濟、商業和管理權利。袁世凱屈服於日本的要求，這激起了全國的反日集會和抵制日貨。按照西方計算年齡的方法，陳詠聲1915年還不滿15歲。
- 9 徐特立成為著名的老師不僅是因為寫抗議血書，更因為深受他愛國和進步思想影響的學生之一是毛澤東。
- 10 陳詠聲這一代人用「花瓶」這個詞，指的是那些被企業或者公司僱來裝點門面的女人。許多僱主使用年輕女子，為了給人一種現代的印象或者吸引男顧客。從198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這種現象又開始流行起來。不過被僱來招待或者吸引男顧客的年輕女子不再被叫做「花瓶」了，而是有了新的頭銜，如「公關小姐」和「禮儀小姐」。
- 11 「獨身主義」是五四時期被廣泛討論的話題之一。為了避免婚姻的痛苦和完全獻身於革命，許多年輕男女認真探索了保持獨身的可能性。
- 12 楊開慧是毛澤東的妻子，1930年被國民黨殺害。
- 13 1919年9月15日，陳詠聲的叔叔陳子壽與陳獨秀討論了《新青年》的出版事宜。參見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頁68。
- 14 這類課程是20世紀初期美國女校必備課業，體現了當時因性別角色不同而與男校有所區別的女子教育的宗旨。

- 15 1932年1月28日淞滬戰爭爆發，日本人佔領了滬江大學在楊樹浦的原址，學校不得不搬到市區。
- 16 俞慶棠(1897–1949)於1922年獲得了哥倫比亞大學的教育學博士學位。她回國後推動民眾教育，創立了中國社會教育社。她在幾所大學擔任教授，也是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的院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她被任命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
- 17 提籃橋是上海監獄所在地。
- 18 中國人民解放軍於1949年5月27日結束了從5月12日開始的上海戰役，宣告上海解放。
- 19 陳這兒指在1949年以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她沒有被定性為「反革命」、「資本家」或「右派」這類階級敵人。在一般情況下她不應該屬於被文化大革命衝擊的對象。
- 20 摘引自蘇平，《蔡暢傳》(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頁15–17。關於朱劍凡與周南女校的更多內容，見本書第八章。
- 21 獨身在五四時期是一個全國討論的熱點議題，這裏引用的觀點是由婦女活動家張若名所提出。參見張若名，〈急先鋒的女子〉，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頁49–58。
- 22 蔡暢和她哥哥蔡和森、嫂嫂向警予以及毛澤東都在年輕時決定把自己的生命獻給救國而發誓不結婚，但不久他們都違背了當初的誓言。見蘇平，《蔡暢傳》；何鵠志，《向警予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最有名的未婚職業婦女是知名婦科醫生林巧稚。從這一代人開始，擁有傑出成就的獨身婦女因為獻身於事業而享有公眾對她們的尊敬。
- 23 我在1995年1月8日拜訪陳詠聲時，她告訴我副市長剛探望了她，她與龔學平是在1993年東亞運動會開幕式上認識的。龔學平要為陳詠聲請保姆的報道刊登在1995年2月14日的《新民晚報》上，標題是〈你愛祖國，祖國更愛你〉，頁3。這篇報道強調了陳詠聲的愛國和副市長的心繫人民。至於陳詠聲拒絕政府給她請保姆，記者把這歸因於這位老婦人的「倔強」。20世紀末已經很少有人還記得或理解「獨立人格」這個詞了。
- 24 直到1989年《中國婦女運動史》一書出版，官方的婦女史中才有對1920年代和1930年代職業婦女的講述。職業婦女在推動1949年前中國婦女社會進步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了認可，標誌了後毛時期意味深長的變化。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283–288。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女權主義在1949年後的政治運作，見Wa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黃定慧 (1907-2017)

職業革命家

“ 如果婦女不參加革命、婦女不覺悟，  
運動要成功、革命要勝利是不可能的  
……我是不是一個英雄，自有歷史  
來評判。 ”



黃定慧，1930年代（以學生身分從事地下工作）、1995

黃定慧86歲了，但看上去充滿活力，好像剛過60歲。她眼睛明亮，身材瘦小，淺淺的酒窩更突顯了她的笑容，我想她年輕時一定是位嬌小的美人。她有輕快悅耳的嗓音，可以滔滔不絕講幾個鐘頭。她語速很快，充滿激情。我提的一個簡單問題常常會引發她的長篇大論。她有太多有趣的生命故事迫不及待地要講給我聽。用她自己的話說：「我經歷的事，兩本書都寫不完。」<sup>1</sup>

## ■ 自述

我出生在一個以革命歷史聞名的家鄉，湖南瀏陽。毛澤東同志1927年在我們瀏陽文家市起義的時候，帶了些工農子弟兵到井岡山，那是從我們瀏陽去的。瀏陽不僅風景優美，而且出了很多名人。湖南的教育水平相對較高，就連三輪車夫和挑夫都學過《三字經》和《千字文》。瀏陽沒有乞丐，因為人們都很勤勞。每家婦女都紡織棉麻。有一句民謠說：「六歲學織麻，七歲學紡棉，九歲十歲學刺繡。」湘綉享譽國際。男耕女織，都很勤勞。

我母親家姓李，她父親是個中醫。母親不識字，但記性很好。父親教她背誦許多文章，所以她說的話都是引經據典。她18歲嫁給我父親。父親之前娶過兩個妻子，都沒有孩子。他比我母親大15歲。母親生了六個男孩和三個女孩，我排行老大，但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出生不久後就夭折了。我出生於1907年7月20日。我母親在家操持家務，我們僱了一個女傭做飯和打掃衛生，還僱了一個男的挑水。

我父親是個思想開明的人，我六歲時他讓我去上學。我的童年生活很幸福，沒有意識到世界上還有痛苦、憂傷和煩惱。我是父親的大女兒，我出生時他已經30多歲了。他視我為掌上明珠。幾年後，母親生了我弟弟，但我父母並沒有重男輕女。

母親嫁給父親時，父親讓母親馬上放足，給她剪了裹腳布。根據當地習俗，我在六歲時就應該開始裹腳。在我們家鄉，比我大幾歲

的女孩都裹腳。她們看到我不裹腳，還和男孩子一起玩，覺得我很新奇。我母親告訴她們裹腳的壞處。父親經常說：「女子應該享有平等。消除纏足之痛是男女平等的先決條件。」我能識字，也能唱歌，當時大部分鄉下女孩都不行。因為我去鎮裏上學，所以我思想更開放。

我曾祖父是醫生，開了個藥舖，但傳到我祖父時家道中落了。我父親是獨子，他讀書還是靠他祖母的娘家幫助的。他很聰明，12歲時就能寫詩，但可以說他是個有才無運的人。他結交的許多朋友都是那個時代有名的學者，他們互相寫詩，他和譚嗣同還是同學。<sup>2</sup>我父親的著作最近在大陸和台灣再版了。父親參加過舊民主主義革命。<sup>3</sup>他也考過一個「優貢」，這是個類似「舉人」的頭銜，有了這個頭銜，就有資格到北京參加狀元考試。<sup>4</sup>但他沒有通過考試，譚嗣同一年前就考過了。然後，父親成了譚嗣同的幕府。譚嗣同的兒子是父親的學生，因為他做過湖南岳麓書院的主任教習，相當於現在的教育系主任，很多辛亥革命者都是父親的學生。

我父親和譚嗣同以及瀏陽的其他進步人士合辦過一家育嬰堂。湖南有溺殺女嬰的惡俗。女兒出生後，被叫做「賠錢貨」，因為家庭要準備一筆嫁妝，但卻得不到聘禮。第二個女兒或許能保留下來，但第三個女兒肯定被遺棄。育嬰堂建起來以後，許多女嬰被送到這裏。父親和他的朋友們宣傳溺殺嬰兒是犯罪、女孩長大也能幹農活的思想，因此溺殺女嬰的事件逐漸減少了。

辛亥革命後，政治黑暗，我父親就不再想鬧革命了。他相信實業救國。他在岳麓書院時，給譚延闓寫了一份報告，提出在湖南開發錒礦和修建鐵路。後來，發展錒礦失敗了，有人就以此來排擠他，他就辭職了。隨後，湖南都督譚延闓請他去參加株萍鐵路的修建工作。後來，他得到了粵漢鐵路總指揮詹天佑的提拔，負責修建廣東到漢口之間的鐵路。當武昌到長沙段修成之後，北伐革命了。我當時加入了共產黨，我是走了，但很多人到過我的家。父親因為我的關係，被貶了，貶到河南鄭州的隴海鐵路。他就生病了，肺病。他又想念我，又自己不得志，詹天佑又死了，波波折折的，他很快就死了，才59歲。

我父親一共在鐵路有18年。那個時候在株萍鐵路是60塊錢一個月。後來到了粵漢鐵路有180塊錢一個月。我們家庭的開支頂多100塊錢。我媽媽就節省下來一點錢，在瀏陽買點田買點房子。這是過去人的辦法了。她肯定自己省吃儉用。她也想到爸爸年紀比她大，這麼一大堆兒女，將來的教育費用怎麼樣？這樣變成後來就被劃成一個地主。本來是個貧窮的家庭。母親對我們管教嚴格，省吃儉用地持家，送我的三個弟弟上了大學。我妹妹上過高中，嫁給了一個大學生，這個人後來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外交官。我另外兩個弟弟是革命烈士。



我上了瀏陽縣女子小學，縣辦的小學只有一家女校。我記得我們還穿的黑裙子，黑布的裙子，白布的上裝，那個時候我好像自己帶飯盒子去吃中飯的。我六歲上學唸書走讀了，八歲就小學畢業。本來應當四年，我成績好，跳了一年。我從小記憶力就很好。幾歲父親就教我讀唐詩，我全部能夠背得出來。後來父親每兩年才回家一次探親。父親回來之後就教我考我書。還有我媽媽不識字，叫我代她寫家信了。寫家信的時候大人看有寫錯字了，然後爸爸把信寄回來，這個字應當怎麼寫怎麼加。後來，我這一肚子的書根本都是我父親教的。父親支持我上學，家裏也支持我參加革命。他唯一的遺憾我是個女孩，他認為如果我是個男孩，家裏就會興旺起來。我之後出生的弟弟體弱多病，但是我身體很健康。弟弟之後，又添了個妹妹。父親總認為我很聰明，經常對我說：「如果你是個男孩，你肯定能光宗耀祖。」作為一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人，他也有些封建思想。

我就讀的那所瀏陽的小學非常進步。這所小學的名譽校長是譚嗣同的妻子，我們的老師都是日本留學回來的。這些老師給我的印象很深，這是我既不裹腳也不穿耳的原因。體操教師、國文教師等等都是女的。那個時候在小學就喜歡唱《木蘭辭》和《滿江紅》。<sup>5</sup>我們唱這些詞的時候，老師她一定給你講解花木蘭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滿江紅》岳飛是怎麼樣的人，我們從小學就已經受了一些進步的愛國思想的教

育。我們家是個愛國家庭，也是個民主家庭，從小學就已經有了這個基礎。我的老師都是決心終身不嫁的獨身主義者，以畢生致力於女子教育事業，也為爭取婦女的平等自由權利而奮鬥為榮。她們也說，在日本接受了教育後，就不能再安於國內的現狀了。因此，她們也很難找到伴侶。

小學時，我國文、體操和其他各科成績都很好，畢業時榮獲第一名。學校的工友把文憑送到我家裏的時候，放了長長一串鞭炮。我媽媽當然很高興，給了工友一個紅包，自己家裏也放起了鞭炮。這就驚動了左鄰右舍，他們說我高小畢業考了第一名，就好比是科舉時代中了個秀才，紛紛來道喜，給我家送一掛小鞭炮以示祝賀。作為我家鄉第一批畢業於那所女校的人，我感到非常光榮。我媽媽做了三席酒菜款待賀喜的鄉鄰們。

我11歲時，湖南漲大水。我父親在粵漢鐵路了，就把我們全家搬到了武昌。我11歲從瀏陽到武昌，大水輪船要走這個跳板好幾丈遠，我背了比我小九歲的三弟，我還很大的膽子上輪船了。我媽媽小腳，前面攙著後面扶了她。她小時候掉到水裏，看見水就害怕得很。結果好不容易把她弄到船上，就暈船嘔吐什麼的。我到現在也不暈飛機、不暈船、不暈什麼東西。然後，我們到了武昌。我舅舅在長沙工作。粵漢鐵路那個時候子女來往都可以有免費的車票，爸爸還是高級員工，那麼我們有免費的車票來回就是不要花錢的。我12歲時我父親送我到長沙上了周南女校。

我沒有拿過任何文憑。我讀過最有名的學校就是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很有名，他和他夫人都是日本留學回來的。1990年，我回到學校參加周南女校85週年校慶。現在，上海有一百多名周南女校友。我是1919年的，但找不到其他同學了。

朱劍凡先生是非常開明的。他支持學生成立學生會，並鼓勵學生多讀課外書籍，他每星期還親自給我們講課。我從小就很喜歡聽中國歷史。朱先生給我們講中國近代史：清朝為何沒能抵抗住外國侵略



而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封建社會重男輕女是怎樣的。他說：「我為什麼要辦女校？我們夫婦倆立下了志願，要為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盡些力。雖然現在婦女解放運動已經講了、做了好多年了，但是最重要的還是應從普及女子教育做起。婦女都受教育了，她們就能獨立，成為真正對社會有用的人。」我也聽我的小學老師講過男女平等，但沒有朱先生講得那麼透徹。他給我們講這些不平等條約，並把這些條約與中國現狀聯繫起來，啟發我們的愛國主義思想，使我們初步地接受了反封建主義、反軍閥混戰、反帝國主義侵略的啟蒙教育。飲水思源。我想說，如果沒有朱先生的啟蒙，沒有在周南女校參加五四運動，後來我就不會離開家參加北伐大革命，也不會反對包辦婚姻去追求自身的解放，進而提高到追求全體婦女的解放，升華到追求全人類的解放。我進入周南女校幾個月後，五四運動爆發了。因此，我12歲時就參加了五四運動。我們一共有三個班，我是最低的第一班。每個班選一個人，寫那時候我們創辦的牆報，報導遊行這些事情。我就當了第一班的代表。是什麼原因？就是我寫的論文老師非常的喜歡，就時常把我的論文貼在牆上表揚的，所以我當了牆報的三人小組。朱校長是非常革命的，他主張我們去參加活動。他宣傳反帝國主義、<sup>6</sup>反對《二十一條》，是個愛國者。他說：「你們學生們是打衝鋒的，我們教職員應當是做後盾，支持你們的工作，贊成你們成立學生會。」那麼我們就成立學生會和學生聯合會，在學生會裏頭當選了牆報的三人小組。我也跟著其他人遊行和參加別的活動。

每個運動都要經過一個幼稚的階段，都有一個幼稚的時代。共產主義起來時也是這樣的，工人恨機器把機器都砸掉。那個時候我們看見玻璃杯，日本杯子就給它砸掉，看見日本洋紗就給它剪掉。我們都到商店裏去檢查，所謂抓奸商、遊街、戴高帽子，就是這個運動當中就不要賣日本貨，日本貨要登記的，不登記就給他剪掉了。那時候毛澤東同志已經是在那裏辦《新民報》了，但是他沒有出面來領導我們，可是學生聯合會裏頭給我們學校一個通知了，所以以後看見這些東西

就叫他登記，把那個老闆也登記，把他的貨物叫他送到教育廳的那裏集中，去拍賣的錢就補助清寒子弟、補助民辦學校，這個就是把左的運動糾正過來了，也不要拖著那些老闆戴高帽子遊街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也像我們初期的時候很幼稚的了。

我在五四運動中知道了婦女解放的口號。五四時期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這個階段，我們都有一些覺悟，但我們的覺悟還比較模糊，因為共產黨還沒有成立。

列寧曾經說過：「即使短暫參與革命運動，也相當於數年的社會實踐。」雖然我參加五四運動只有幾個月，但人們的團結、激情和義憤，卻令人振奮，非常鼓舞人心和極具教育意義。



在學生會的同学決定暑假不回家，那麼我就寫信給家裏說不回去了。我父親的學生當中是分幾派的，有的是愛國左派，有的是反動派，有的是中間派。他以前岳麓書院一個學生是我們學校的教務主任，我們都叫他「樓矮子」。他叫我們學生投票，贊成回家還是不回家，我寫個不回家，那麼另外問學生會好不好？我說學生會好。他看見這樣之後，偷偷地發信給家長，說我們不回家的學生不好了，跟我爸爸告狀了。爸爸那個時候固然開明，但是也不知道究竟我在學校裏搞點什麼呢？不放心，就叫我弟弟說我媽媽病了，讓我舅舅把我接回家了。我媽媽正好生了第四個弟弟，產後很多病。我是個大姐姐了，底下弟弟妹妹這一大堆，要照顧母親，要照顧弟弟妹妹，我就只能不上學校了。媽媽病得很重，血崩了，會有危險的，這樣一個情況，那麼只好不上學了，就只好在家裏讀書了。後來慢慢調養好了，我也沒再進學校，就媽媽教我學針線，所以我針線活也做得不錯的。

我父親給我排定了我學習的功課表：規定單日讀經、雙日讀史。我自己讀歷史書，讀完了《二十四史》。父親每天早上去上班前教我四書五經，下班回來要問我的功課。我讀都不讀的，因為媽媽這個事情要叫我做，那個事情要我做，我就算了。我爸爸五點下班，四點半

的時候我坐到椅子上看兩遍，就哇哇會背了。我最不喜歡讀那些古書了，都只好硬著頭皮讀了下去。

我父母親在我還不到10歲的時候，給我許配到一個人家姓李的，後來18歲的時候就讓我出嫁，出嫁一看，到他家裏的時候，我沒有辦法忍受。我跟你講我是不喜歡談人家的不好，就是他本人不好，但是公公婆婆都對我很好，曉得是兒子的錯。他從大學還沒畢業就跟丫頭搞上了，另外又抽上鴉片煙，晚上很晚的回來，開門開遲了，一腳就踢丫頭。我嫁了過去，我不敢寫信。公公是爸爸的朋友，我結婚前沒有見過他。他妹妹跟我很好，還是我周南的同學，而且還告訴我說，她哥哥脾氣可不好了。她並沒有說他哥哥吃鴉片煙或跟丫頭怎麼樣，這些沒有告訴我，只是說：「你太好了，我哥哥脾氣很不好。」她只講了這句話，當時我心裏就已經不願意嫁，但是爸爸還備著嫁妝，還掛了一個專車送我去，真是很隆重地送去的，爸爸在鐵路局當科長，當然可以掛專列。

後來我父親有事情到長沙來，就來看我，我就寫好了一個條子塞給他。我父親來了（丈夫）要陪著我父親，我怕發現我去訴苦，我跟父親都沒有個別談話，就招待他吃頓飯。我寫好了一個條子，塞到父親手心裏，就是這麼幾句話：「以母病召歸，一切面談。」這是嫁了他一年多的時候。我怎麼會甘心做這樣的一個人？還接受過進步教育，又碰到這樣一個人。他對我很不好的。他回來這麼晚，我要規勸他的時候，他當然拿丈夫的架子來駁我了：「爸爸媽媽都不管，你管我！」我和他沒有感情的。後來父親就發來電報，說母病重。舅舅來接我了，我就回去了。

那麼我既然從那家跑出來了，爸爸還是預備我考大學，還是繼續我的學習。我們那時候同等學歷可以考大學的，你不一定要文憑的。爸爸就感覺到我女兒這麼好，怎麼會碰到這樣一個人呢？父親是跟他爸爸好，但不認識這個女婿，也沒有見過面的。媒人講得天花亂墜，父親想這家人是不錯的，那個時候就講門第相當對吧？父親就名正言順，跟親家講了，從女兒了解，你的兒子有不良的嗜好。我回來

之後他就支持我，馬上就寫信的，說暫時我的女兒大歸，就是接回來了，不回婆家了，大歸看他（丈夫）能不能夠悔改再說。這樣的話當然沒有正式離婚了，這樣那邊也不來接我們。我們嫁妝什麼的，什麼都沒有拿。

我母親是開明的，因為我父親也是開明的，是參加革命的，所以他知道我嫁到這樣的一個人家是受委屈了，我父親也很寶貝我。我父親把秋瑾的事情講給我聽了，說秋瑾也是遇人不淑。他說志氣要有，既然這樣子的不滿意，就自己獨立謀生。父親當然沒想到我再去嫁個共產黨員或者怎麼樣了，那個時候也沒想到我去參加革命了。就是預備我大學招生獨立謀生了。我要不是這樣一個開明的家庭，我父親要不是民主人士，母親要不是這樣子的，父母不這樣的寵愛我，我也不可能走出來。假定我配的人是個好的，我也完了，就是普通家庭的家庭婦女，這一生也沒有這麼多的波折。這一段歷史我父親的詩詞裏頭還是有的，但是我的自傳裏頭也只簡單地帶一句，就是說因為父母的包辦婚姻我不滿意了，就脫離了家庭走出來。

我當時補習了很多，還讀商務印書館的英文函授學校，成績還不錯的。另外請了一個教師給我補習數學，爸爸給我教古文，我是讀了四書五經，我想我就像在學校一樣完成了學業。我除了自學父親給我規定的課程外，最喜歡的就是看小說。我最喜歡看的是《三國演義》，至於《紅樓夢》我卻不喜歡。可能我這個人雖然是個女孩子，卻多少有些男孩子性格的陽剛之氣，不太懂得也不欣賞那些纏綿的男女愛情故事。但我讀了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後，倒是很欣賞的，認為它很真實地反映了青年男女在封建包辦婚姻下所經歷的痛苦和煩惱。從商務印書館我知道了《小說月報》，主編是茅盾（沈雁冰）。<sup>7</sup>我訂閱了一份，這是那個階段我唯一看過的新雜誌。我很喜歡看茅盾寫的小說。

我回家半年後，正好1926年的春天廣東在準備北伐，地下黨有傳單。我的一個表兄在粵漢鐵路工會裏頭當一個小幹事，經常帶著工會的宣傳文章、傳單和簡報回來給我看。他知道我婚姻不滿意，知道我

這樣回來後很苦悶。這樣，我知道了廣州的工人運動如火如荼，還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特別是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領導的廣州婦女運動。<sup>8</sup>有一次在我表兄帶給我的傳單上看到英美煙草公司女工罷工。我們五四運動的時候，我工廠都去過的。我就拿了傳單去慰問罷工姐妹。那是1926年的6月15日。那時候我父親給我零用錢很多了，我馬上就捐了50塊錢。去了就碰到共青團負責人李子芬，他後來是共青團中央的，當時他是湖北共青團的負責人。他就了解我的情況了，我就在講怎麼讀書，到現在在家裏讀書到出嫁怎麼樣。他說你看了些什麼新的，我說因為我父親開明，商務印書館的茅盾的《小說月報》、郭沫若的《少年維特的煩惱》我都看過了。他聽了後說，歡迎你來參加革命。我介紹你去見杜韞章同志，就是婦女部長章蘊。他寫個條子，我去見了章蘊。章蘊跟我一談話說：「歡迎你投入革命，脫離家庭。把這少奶奶的巴巴頭剪掉吧。」我那時還梳著那頭髮。我很高興，想這不就同參加辛亥革命的人先要把辮子剪掉一樣嗎，就說：「好的。」馬上去理髮店剪掉了長髮。回家後，我把這一切告訴了父母。他們都對我表示支持，還說我碰上了一位好的女領導人，這也是奇遇。他們同意我立即離開家，與同志們住在一起。我參加革命的動機就是反對包辦婚姻。



6月15日後，李子芬和我談了好幾次話，讓我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章程。他問我有沒有願望加入共青團。我說：「我非常願意加入共青團組織，我非常需要領導和組織的幫助，這對提高我的政治覺悟很關鍵。」這樣，李子芬介紹我加入了共青團。還有好多青年男女都和我一樣加入了共青團，我們都非常興奮。入團後我當了章蘊的秘書。我們白天工作，晚上七點到九點上團課。通過參加這些專門為新團員開設的培訓班，我的眼界開闊了。我開始明白，加入革命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追求自我解放，而且是為了全世界婦女解放而奮鬥。黨章規定，我們要追求全人類的解放。相比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更徹底、更先進。

1926年10月，北伐軍到了武昌，武漢成了大革命的中心。後來宋慶齡辦了婦女幹部訓練班，我們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共產主義ABC》、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婦女解放理論。許多領導人來做不同主題的演講。我們還聽了鮑羅廷夫人講了蘇聯的婦女是如何參加革命的。<sup>9</sup>我們知道了如果中國婦女想要徹底解放，必須推翻夫權、神權、族權以及反動政府，要反對封建主義。沒有政治組織，不加入共產黨，一個人的行動是個人英雄主義，不可能取得一項偉大事業的成功。一隻筷子容易折斷，十隻筷子綁在一起就折不斷，團結就是力量。為了實現我們的夢想，我們必須有組織、有領導、有信念、有理論、有政策；萬眾一心，遵守紀律，克服困難，推動一次又一次的浪潮。

除了理論還有實踐。我看到了何香凝和宋慶齡她們，還有秋瑾，我對秋瑾一直是很景慕的。有這許多榜樣，那你怎麼不想學習啊。我自己也很自豪，自己老早就以傳奇式的人物自負的。因為我小時候讀書的時候就喜歡花木蘭那唧唧復唧唧的歌。我想：我也沒有長兄，我爸爸也老了，我加入大革命，也是從軍了麼。所以1926年我入團的時候就把名字改為「慕蘭」。開始的時候我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那時大部分參加革命的婦女都是因為家庭的原因，是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這個時代的潮流，你想出來也沒有辦法，你走出家庭，也沒有團體領導你，也沒有組織領導你，你要怎麼樣？你苦悶也就苦悶了，你個人只好怨你的命運哪。我正好當時在武漢，正好在那個偉大的時代，真是翻天覆地的。

章蘊介紹我認識了宛希儼。宛希儼是我們的老師，也是宣傳部長，是《楚光日報》的主編，後來擔任《民國日報》的主編。他大學畢業，很有才華，文章寫得很好。他經常在課後找我談話，給我講解革命理論。有一次他和我說，我們要去個人英雄主義。我的名字不是叫黃慕蘭麼，他以為是仰慕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意思。<sup>10</sup>那個時候我其實還沒有聽說過羅蘭。我告訴他，我的名字是仰慕代父

從軍的花木蘭的意思。宛希儼告訴我，我們共產黨人相信集體主義，我們入黨是為了革命、為了人民，而不是為了其他任何事情。

李子芬、宛希儼和章蘊都給我很大的幫助。章蘊手把手地教我怎樣擬寫標語口號、怎樣草擬婦女協會籌備委員會的章程。好在我有相當的文化基礎，對這些新鮮事一學就會。我還演過話劇，扮演一個童養媳。那是我第一次上台演出，居然還演得挺像的。在北伐大革命的高潮中，我感到自己好像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不但能執筆寫文章，還能不用講稿就在群眾大會上講話，不但會做群眾運動的組織發動工作，還能上台演戲。我感覺在很多方面我都進步很快，自然要深深地感激黨、團組織對我的培養教育，感激那些領導在工作實踐中對我的傳幫帶。

我在婦女部工作了三個月後，章蘊被調走了，我被任命為婦女部部長。婦女協會屬於我們婦女部。毛主席的妻子楊開慧和劉少奇的妻子何葆貞都在婦女協會做常務委員，屬於我們婦女部領導的。我們婦女部就是一個部長、兩個秘書和三個幹事，領導整個婦女協會，漢口會、武昌會、漢陽會，武漢三鎮都歸我們領導，其他的縣歸省婦女協會領導。我是漢口特別市的婦女部長，那個時候的特別市跟省是並行的。我是19歲當了部長，是時勢造英雄。我領導的都是這種大學畢業的、留學畢業的，或者是領導的夫人，都是年齡比我高，資格比我老的。不過沒有我這樣的上台就能演講，不需別人寫的。特別是記憶力強，聽領導同志的講話，能很快地領會接受，能立即到群眾中去報告傳達。那時人家給我的追求信都塞滿了抽屜，都是革命隊伍裏的人，聽過我的演講，就非常崇拜你了。不管他是求愛不求愛的，我反正都不看的。

像今天的婦聯一樣，我們通過婦女協會接觸婦女，傳播婦女解放思想，幫助解決婦女問題。我們反對包辦婚姻和納妾蓄婢。常常有婢女和受虐待的妻子哭哭啼啼地來找我們尋求幫助，我們就去教育那些虐待妻子的男人。我們還關閉了妓院，婦女部承擔收容教養妓女的責

任。我們還開展了放足運動和掃盲運動。當然還有要八小時工作制，要參政權，要婦女平等。那段日子裏，我情緒高昂，沒日沒夜地工作。我們正處於革命高潮，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1926年11月12日，共青團提名我轉為黨員。當時共青團員成批地轉為黨員。1926年的冬天，組織上決定派我去莫斯科學習。學習費用由國民政府支付。我先到了上海，準備從那裏去莫斯科。但是董必武給我發了電報，要我回武漢，<sup>11</sup> 讓瞿秋白和楊之華來找我談話。<sup>12</sup> 我說，我想到莫斯科學習一年，然後回來工作。他們把我的答覆發回武漢。但董必武又發了電報，說他們還是想要我回去，因為我以前一個人做的事情現在三個人幹也完不成。瞿秋白和我談話，他說：「我們黨員應該服從黨的決定，你將來還有機會去莫斯科學習的。」這樣我又回到了武漢。沒想到六個月後形勢發生了變化，但是當時，我在革命中是發揮了重要作用的。

在我離開武漢去莫斯科之前，宛希儼就愛上了我。但是我不想結婚：我想讀書，想有個學歷有個文憑。我父母也贊成我去莫斯科，母親還替我縫製了一件皮袍子，做了行裝。要是我那時去了莫斯科，那就和蔣經國是同學了。我後來和宛希儼說：「我要是去成功了，就不是你宛希儼的愛人了。」也有個謠傳，說是宛希儼想和我結婚，就跟董必武說，這樣的。事實上我的職務分三個人還擔不了，我一個人兼了三個最重要的職務，實際上我有十幾個銜頭。1937年我在上海時，也有十幾個銜頭。

回到武漢後，我們辦了一個婦女幹部訓練班。湖北婦女協會選了一批婦女幹部來參加培訓。培訓三個月，結業後我們發給證書，仍回各地去工作。訓練期間學生學習了工人運動史和國際婦女運動史。宛希儼還講了反對「婦女主義」這一課。那時在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同時，有好些工作能力很強的婦女產生驕傲自滿情緒，只講婦女解放自己，而看不起男同志。這些婦女都經歷過不幸婚姻，就主張獨身主



義。獨身主義是那個時候的一個傾向，主張獨身主義的一般是知識婦女。反對婦女主義主要是反對婦女的獨身主義。宛希儼鼓勵女青年結婚，還講了要共同獻身革命。堅持獨身主義的婦女通常都對男人的要求很高，許多參加大革命的婦女就是為了要獨身，但是她們不少人後來嫁給了國民黨官員。

1927年，國民政府決定在武漢舉行盛大的三八婦女節紀念活動，我被任命為紀念活動籌備委員會主任。雖然我還年輕，卻被委以重任，負責組織這次活動。3月8日，十多萬婦女聚集在市中心廣場。我們先開了大會，國共兩黨的很多名人參加了會議。宋慶齡、何香凝和柳亞子也出席了。<sup>13</sup>我在這次大會上擔任總主席，這是黨和人民給予我的巨大榮耀。因為這件事情，很多出席大會的人到今天還記得我。演講之後，大會結束，二十多萬名婦女遊行經過主席台前，然後向市區遊行。

當時黃埔軍校第六期在武漢開辦了分校，第一次招收了女生，並且在婦女節前不久組建了一個女子方隊，有二百多名學生。她們穿著軍裝，參加了婦女節遊行。當她們雄赳赳氣昂昂地經過主席台時，我們都為她們感到非常驕傲。每個人都為她們鼓掌喝彩，她們是那天的焦點。其中有個女學生是謝冰瑩，她後來成了著名的作家。<sup>14</sup>我和謝冰瑩1991年再次見面，從那以後我們一直保持通信。婦女節那天的婦女遊行成了國際新聞，不僅因為其盛大的場面，也因為遊行時發生的一件意外：武漢的反動派僱了一群年輕的妓女，讓她們裸著上身衝進了遊行隊伍。雖然她們被迅速趕了出去，但這件事還是成為轟動全國的新聞。反動派的報紙竟然說武漢的婦女舉行了裸體大遊行。<sup>15</sup>

3月8日那天，我白天參加遊行，晚上就結婚了。我們沒有舉行儀式，只是在報紙上發表了聲明，說「我倆因為志同道合，結為革命伴侶，特此敬告諸親友」。我們沒有提以前的婚姻。此後，許多人都效仿我們。回想當時，政治權力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可以自由離婚、自由結婚，沒人會起訴我們。那天遊行後，我們在總部舉行了一

個小聚會，董必武宣佈我們結婚，同志們都鼓掌祝賀我們。由於宛希儼當時還兼任新聞記者協會主任委員，所以他被稱為「無冕皇帝」，而我那時因為經常出席各種活動，坐在主席台上，非常活躍，新聞界和文化界的人士都戲稱我為「皇后」。同志們中間就開玩笑說，「皇帝」和「皇后」結婚了。我們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就回家結婚了。

宛希儼去我家拜訪了幾次，我父母都喜歡他。宛希儼和父親討論革命理論，父親認為他博學多才。父親生病後，他請了一位名醫生，陪同醫生過江去給父親看病。我父親信奉孫中山三民主義，認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是個偉大的政策。所以，他和宛希儼談話很投機。一開始宛希儼沒有表明他共產黨員的身分。我去蘇聯的計劃取消後，宛希儼帶了一些領導去看我父親。我父親很開明，非常喜歡宛希儼，他同意了我們的婚姻。結婚後，我們住在法租界的一棟房子裏，這是父親租來放書的地方。在那段忙碌的日子裏，母親來和我們住一起，幫我們料理家務。

我和宛希儼結婚後，我告訴了他我以前的包辦婚姻。但他向我隱瞞了他的包辦婚姻，我直到解放後才知道這件事。宛家是大地主，宛希儼結過婚，還有一個女兒。解放後，我和兒子團聚時，兒子告訴我他還有個姐姐。解放後，那個女的（宛在老家的妻子）享受了烈屬待遇。

蔣介石背叛後，大革命失敗了。共產黨不能公開呆在武漢，黨員立即被分散或者轉移。我和宛希儼接到指示，要去南昌的黨組織報道。我決定離開家，跟著宛希儼一起去南昌。1927年7月14日我們一條輪船就到了九江。我們教導團帶了很多文件，還有隨行人員。宛希儼發現船上好像有人注意我們，他決定我們分成兩隊。我和他去了廬山，其他人帶著文件去南昌。那些年宛希儼因為工作忙身體不好，他喉嚨痛，還拉肚子，所以我們去了廬山，在那裏休息了十天。那時只是通知我們到南昌報到，並不曉得有八一起義。

廬山下來去南昌的大旅社報到的時候，是7月28日或者29日，離起義快了。陳潭秋就傳達中央的指示，我們兩個人不公開參加八一，留下來做地下工作。陳潭秋是江西省委書記，宛希儼是江西省委的宣傳部長，我是江西省委的秘書，這樣我們就開始地下工作了。地下黨沒有工資的，我們是地下黨的機關，開支都是黨的經費。陳潭秋改了名字，開個小醬油舖子，算老闆。姓徐的老夫婦倆掩護我們，他們的兒女都是我們的共產黨員。陳潭秋和宛希儼就變成了老夫婦的侄子，我們這家人就變成了姓徐，陳潭秋叫徐國棟，宛希儼叫徐國梁，算是弟兄兩個。這小醬油店前面是賣醬油雜貨的，當中兩間就是老夫妻兩個住了，後頭的就是我們的機關。夜裏頭我寫文件常常都要到天亮，因為白天不好工作麼。

我們的地下工作又艱苦，又危險。三天五天國民黨就來搜查。我開始也是年輕，臉還紅，怕這樣，就是陳潭秋訓練我，要泰山崩於前都不變色。當時不是還點煤油燈嗎，那麼他們來檢查了，我肚子裏懷了孩子，就搬了一隻板凳坐在那裏，低著頭擦擦燈罩，眼睛都不看那些兵，讓他去對答了。他小鬍子，拿了一個水煙袋，像個地主老爺的樣子，比我們大十幾歲，那時候他三十幾歲，看上去像四五十歲的老頭子一樣。「好！」兵問他的時候他好神氣那個樣子。什麼事情都是他一個人包辦了，叫我們就不能慌張。這樣我們鍛煉好了，受過訓練了，隨便怎麼樣的人都不可避免的。讓我做地下交通，告訴我的秘密技術、怎麼樣接頭、怎麼寫秘密文件，當然都要受一番訓練。就是章蘊手把手教我入門，陳潭秋再手把手教我做地下工作的。

那時傳達鄧小平起草的《八七宣言》，就是檢討我們第一次國共合作，哪些地方是成績，哪些地方是失敗了，哪些地方是做得不好。這個文件一來，我們要傳達到各個地方去。陳潭秋化裝成一個地主到鄉下收租的樣子，宛希儼化裝成一個小店員，我化裝成一個平常小家庭的主婦。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傳達這份文件，很艱苦的。

1928年1月，我生了孩子只有三天後，宛希儼來和我告辭，中央調他到贛西南兼特委書記。他弟弟宛希賢是前敵委員會委員，已經在井岡山了。宛希賢的名字出現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裏，他的名字比他哥哥的還大了。宛希賢是黨派去開闢井岡山根據地的第一人。他成功說服了國民黨兩個團（兩個團長都是他同鄉）起義並佔領了井岡山。朱德是等到南昌起義了才去的，毛澤東是等到文家市起義了才去的。朱毛井岡山會師發生在宛希賢佔領這個地區後。宛希賢後來被王明槍斃了。<sup>16</sup>我黨的歷史總是錯綜複雜。

本來宛希儼的調令已經來了，看見我發動了，住進了南昌的婦孺醫院，就把動身的日期推遲了幾天。這是我頭產，肚子痛，見了點紅，就去醫院了，家裏又沒有人服侍，三天後才把孩子生下來。生下後第三天，宛希儼就來了。他就輕輕地跟我耳朵旁講，又不能夠大聲，又不是一個人，一張床鋪。他說：「現在我要出門去了，你反正有哥哥嫂子（陳潭秋夫婦）照顧，還有叔叔嬸嬸（醬園店老闆徐老夫婦）照顧，你放心好了。但是，如果有萬一，我出去做生意買賣，做得好做不好我不知道，萬一有啥呢，把這個孩子想法子送給老家，讓他祖父母照顧他。」他怕會犧牲囉，我是搞筆桿子的，現在要去搞武裝暴動。那時旁邊有人也只能夠講是做生意。

宛希儼他家裏也是個地主。早年參加革命的都是知識分子，都是家庭條件比較好的，上過大學的，都是從理論上接受了馬列主義的。他老家在安徽黃梅。他說：「你不要難過哦。」我聽見這句話時，當然眼淚出來了。他拿個手巾給我擦，說：「產婦不能夠流淚啊，聽哥哥嫂嫂的話噢。」聽哥哥嫂嫂的話就是聽組織的話了。說了這句話，他就走了。

他1月份走的，4月份就犧牲了。這期間，我沒有收到他的信，也不知道他犧牲。我生了孩子後血崩，也是不好，幸虧有陳潭秋夫婦還有徐老夫婦對我的照顧。我們有一條船做交通。孩子出生三個月後，我出來工作時，就到江邊上去看這條船來不來。去了一次沒

有來，去了幾次也沒來，本來我們都約好了時間的。陳潭秋是7月份調走的，這時候他才告訴我，開始他瞞著我，他早就知道了，組織也知道了，但是顧慮到我生病，又覺得這麼大的一個打擊，假如他不走了，他們還可以照顧我，他們要走了，只好告訴我了。陳潭秋就做我的工作，對我說：「撫孤事小，黨的事業要重，化悲痛為力量。我們的事業是長期的。你現在要想法子和你的家人聯繫。」他很會做工作。

報紙上已經登了宛希儼共匪槍斃掉了，那麼我爸爸媽媽不要想到我也槍斃掉了？家裏頭婦女協會的同志還留在那裏工作，看見報紙了之後還到我家裏去，到我爸爸媽媽那裏，我又死了一次了，我就九死一生好多次數了。那麼爸爸媽媽哭了，婦協的同志也哭了，這麼好的一對夫妻，最美滿的，就成這樣的了。爸爸很喜歡宛希儼，這個人才華很好，對長輩也很恭敬很好，想想我好命苦，怎麼結婚了幾個月就這樣子的？也替我難過。

陳潭秋曉得這消息（宛希儼過世）也是好幾個月之後了，就寫信告訴我爸爸媽媽，他們已經悲傷了幾個月了。我產後有病也沒有寫信給他們。陳潭秋就告訴我，說我已經寫信告訴了你的爸爸媽媽了，你沒有去，你生了個男孩子，很好，這樣的。他說你還是跟你爸爸媽媽聯繫一下，想法子把這個孩子送回老家去。宛希儼老家是個地主，孩子的祖父也是個秀才，家裏是一個宛家大屋，房子很大的了，那麼讓地主家的孩子長大不就可以留一條根嗎？

1929年1月，中央調我到上海來，我就寫了信告訴我媽媽爸爸，說我要到上海去讀書，他們當然知道我是去工作，我說帶孩子不便，你們是不是可以來把孩子接走。我二弟弟是共青團員，他陪著我媽媽到九江碼頭上。我們約好時間的，我們那次就派人到九江去買到上海的輪船的票子，定好了日期哪一天開、哪天到九江碼頭，他們漢口也坐輪船到九江。他們要在九江等半天，我們在九江也要等半天，那麼就在碼頭上見面，三代人抱著哭得難捨難分。孩子自小爸爸就死了，7月份陳潭秋就調走了，我要到1月份走，當中還有半年，我們在那

裏也不能夠戴孝，也不能夠嚎啕痛哭，總是夜裏頭睡在床上，眼淚掉到這個孩子臉上。孩子這孤兒也不曉得爸爸死了，這個是非常痛苦的一段，頭一次受這麼嚴重的打擊，孩子又怎麼不是生離死別呢？我弟弟就跟我說：「姐姐你放心，孩子我們會送給宛家，你自己保重。」孩子那個時候就這麼一點大，只有一歲，他當然什麼都不知道。（黃定慧哽咽地講了這段故事，眼睛裏噙滿了淚水。）

孩子在我們黃家住了幾個月。同志們想法子聯繫了，祖父來接回去了。宛希儼弟兄兩個都是革命者，爸爸也是個開明地主，不然也不會讓子女去革命，讓兒子去讀大學。這個孩子到解放才〔和我〕見面的，1929年他抱回去的，1949年他20多歲了。他13歲就流亡，那時抗戰了，從黃梅流亡到重慶。在重慶他考進報務學校，考到了清寒子弟的補助金，中學沒有畢業就進練習生做了學徒。沒人告訴他父親犧牲了，母親在哪裏，他根本不知道的。解放後才告訴他的，1949年底他才找到我的。不是這樣安排也不行啊，這樣他才能有地主家庭的保護。



1929年，我去了上海，成了中央政治局秘書。這第二個丈夫怎麼會碰到的呢？<sup>17</sup> 中央委員在漢口開會時我就認識賀昌了，在上海開會又見面了。這些中央委員都是在武漢見過面的。那時候彭湃的農工部長、周恩來的組織部長、李立三的宣傳部長、蘇兆徵的工人部長，我在武漢都見過他們，委員們都認識我。那時他們在講「皇帝和皇后結婚」，賀昌就說：「我們都羨慕你們，沒想到希儼同志這麼快就犧牲了。」我是中央政治局的秘書，又兼機要交通員，就是跟中央的交通見面，跟團裏的交通見面。委員們知道宛希儼犧牲了，也知道我的工作做得很好。都覺得我在那樣一個家庭出來，我在武漢的時候這樣子轟轟烈烈，紅極一時的，一下子變成一個地下的工作者，又艱苦又危險的工作，也做得這麼好，這麼積極。

賀昌沒有那種貞操觀念，而且是他灌輸我的思想，他這麼講：「你是背叛你自己的家庭出來，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婦女，沒有貞操思

想的，沒有樹牌坊，從一而終的思想，我相信你也不會有這個封建思想。你跟宛希儼結婚時也沒有什麼儀式。人家都講你們是反封建婚姻的旗手。」還跟我講了很多列寧時代的革命婦女的故事，言外之音就是打通我的思想。他只比我大一歲多，是山西人，他也是建立共青團的創始人。他是中學畢業就參加工作。我們在武漢怎麼見面的呢？我們在總工會有個文娛晚會，那時候的文娛晚會也不是現在這樣的卡拉OK跳舞了，當然都是革命歌曲囉，有人講革命故事。他在文娛晚會是最活潑的，他是中央委員，講蘇聯的革命歷史故事，大家都是很鼓舞的。他長得非常的英俊，人也豪爽。他幾次約我個別談話。後來我們就報告了組織部。中央組織部長是周恩來。那時他派賀昌到湖北去，我們兩個就在旅館裏頭同居的。更沒有任何儀式，組織同意了我們就同居了，更少的人知道。不像那次結婚，董必武還宣佈了，大家還鼓掌啦，祝賀我們啦。這次我們根本是秘密結婚的。後來，賀昌去了湖北。

跟賀昌結婚後，有一次我碰到了饒漱石。<sup>18</sup>他挖苦我說：「好啊，你攀上高枝啦！」賀昌是中央委員，比饒漱石的職位高。那時我根本不知道饒漱石對我有意思，我也不是因為賀昌的地位和他結婚的。聽他說這種話，我氣壞了，無法忍受，但又實在沒人可以去說。第二天參加中央會議後，我一個人坐黃包車回家，一路上還在想著這事，越想越難過，結果下車時昏頭昏腦地竟然把我的小皮包忘在了車上。我的會議記錄簿在包裹，雖然我是用自己編的速記密碼做的會議紀錄，人家也看不懂的，但丟失筆記本總歸是個大錯誤。當我想起忘了拿皮包時，趕緊跑回去追那部車子，但跑了一路也沒有追到。心裏真是又急又怕。我六神無主地走到了外灘，就在黃浦江邊哭了好一陣子，心想：「為什麼女同志出來參加了革命，還要忍受男同志的這種侮辱呢？」覺得太受冤枉了，再加上又害怕丟失筆記本會受處罰，後果不堪設想，乾脆了此一生算了，就跳進了黃浦江。

結果我被水上公安局的警察發現救了起來，把我送到濟良所。他們反覆問我，為什麼要自殺。我只好編了一個故事，說是因為失戀。

第二天，《申報》上登了篇文章，標題是〈妙齡女郎失戀自殺遇救〉。我說我有個表哥在上海，給了他們一個同志的化名。周恩來在報紙上看到了，就派那位同志把我接了回去。我見到周恩來就把一切都和他說了。他批評我不能受委屈，缺乏一個共產黨員對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他說：「我們共產黨員應該獻身革命事業。你要是在同敵人的鬥爭中死了，那麼你的死重於泰山；但為了這種小事去死，那就是輕於鴻毛。」他要我忘掉這件事，說他也不會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包括饒漱石。最後他說：「不管怎麼說，你在濟良所想到了組織，讓我們的同志去接你。你被救起來後，還想跟著黨走，這很好。」其實在濟良所我心裏很掙扎，難以做決定：我究竟是應該回家還是回組織？我想了好久，最後決定不能回家。因為李家去我老家找過我。我母親害怕他們找到我，所以叫我不要回家。都是因為這樁包辦婚姻，我才不管出了什麼事還是要跟著黨。

賀昌後來知道了這件事，他以為是因為我和他結婚後不滿意。我只好告訴他饒漱石對我說了什麼。賀昌就說：「他暗戀你那也不是什麼錯，心胸狹窄的人會嫉妒、諷刺挖苦你，也是難免的，你就不要再耿耿於懷了。」賀昌盡力安慰我，使我心裏好受了許多。在黨內有一條規定，犯了錯誤的人，就要下放到基層去工作，於是我請求下放到工廠工作。

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子的，一同居就會懷孕，奇怪的，又懷孕了。那個時候下放到基層是體驗生活，真正是去領導工人的罷工。這次罷工是由李鐵映的父親李維漢領導的。他當時是政治局委員和江蘇省委書記，也是上海市委書記，那時江蘇省委設在上海。他領導了這一次1929年上海紗廠絲廠二十萬工人總同盟大罷工。那一年叫「反帝鬥爭勝利年」，就好像革命高潮又復興了。事實上還不是復興。世界大戰結束了，民族資產階級也是有點讓了步，各個地方都改善了一點條件。所以罷工只要改善了一點條件就復工。





那年五一勞動節為罷工做準備，就出去散傳單。已經都散完了，飯籃裏只剩下一張了，巡捕把我逮住了。「你這是什麼？」我說：「這麼好一張白紙頭麼，我地上拾來的。」他把我關到了巡捕房。星期六關一晚上，星期天關一天，星期一送我到公堂。英租界的公堂那時有所謂假的文明制度，還有個義務律師辯護制，輪班地在那裏辯護的。我當然說不識字了，我不曉得這是什麼。我說：「這麼好一張白紙頭。我包梳子用的。」我說我剛從鄉下過來，進廠沒幾天。法官說：「這是共產黨的傳單你曉得伐？」我像傻瓜一樣，不懂他講的什麼話。他看我傻里傻氣的。我已經23歲了，我就說我只有17歲。沒滿法定年齡，長得又這麼矮小的，樣子又是傻傻的，要裝傻瓜麼。他說：「好吧，這趟就不怪你了。你要曉得上海亂糟糟的，壞人很多的。不要上當啊，隨便啥東西都拾啊！」

頭一趟就這樣出來了。大家都說我很機警。我說我做地下交通早訓練過了，對這些人一點都不會害怕，不會恐慌，很大方。因為滬西巡捕已經抓過我了，恐怕再露面不安全，就調我到滬東，在恒豐紗廠。正好，絲廠已經開始罷工。上海絲廠的大姐服飾是很漂亮的，都是絲襪子啊，漂亮的衣服啊。上海的女工，紗廠的也好，絲廠的也好，都是很漂亮的。所以我們學生扮女工是沒有問題的，扮農婦就不像的。恒豐紗廠的老闆是湖南人，廠裏一共有五個團員和三個黨員。進去是頂替了一個叫劉阿秀的，她請假回去了，病了。當時的工頭叫拿摩溫，我們支部就送了他點錢，就可以作為臨時頂替工進去了。<sup>19</sup> 做學徒工去主要是跟工人去接近，點罷工這把火。

七一（建黨日）要散傳單。七一還沒到，五個團員當中有一個青工是搞電的，他在半夜把總門關掉，並且剪斷了電線，人家也不知道。我爬到屋頂上，把傳單啪一下撒下來。等到警察來了，等到電燈都修復好了，我們不是罷工，只能算停工了。傳單已經散好了。廠裏是嚇死了，不曉得有多少共產黨人在裏頭。廠裏老工人經歷過五卅的有很

多，不是共產黨員，就是老工人，對共產黨有很深厚的感情。我裝做不識字，拾了傳單找老工人：「老伯伯，你講給我聽聽好嘛？」老伯伯就悄悄說：「這是共產黨，支持我們工人罷工的。他們提出了幾個條件。」他啥都曉得的！

我那時學徒工也選代表了，工會就選我了。我們就把絲廠的罷工情況帶回來，在紗廠的工會報告了。這樣一串聯，黨再撒傳單，二十萬群眾的大罷工就罷下來。我是學徒工的代表，在閘北的大眾茶園裏頭開會，資方跟我們面對面講條件，我和另外七位代表參加了。我們還沒有講完，幾十車警察就來抓我們，圍在茶園外的上千工人群眾大叫「不許抓人！」但被警察驅散了。我們八個代表都抓去了，被關到龍華司令部。

那是1929年7月，我被關了一百天。我大概是6月份懷孕的，賀昌的孩子。我的兒子在我肚子裏都坐牢了。關了一百天肚子還不太顯得出來，因為犯人的衣服是很大的。同關去的八個人很友愛，不叫我到井裏頭去打水洗衣服，曉得我懷孕，曉得我吃不下，老在嘔吐。監獄裏的日子很苦，我得了嚴重的胃病。賀昌那時已經調到廣東，擔任了南方局的書記，他不知道我懷孕的事。等我出來後，他才曉得。兒子生下來很瘦，比大兒子差得多了。這個孩子身體不好，生下來我就沒奶，母親胎兒都營養不好。他後來還心臟病開刀的，那也因為後來在牢裏頭我還要工作。

正好我關進去後不久，中央委員彭湃就關進來了。他是海陸豐領導農民起義的將領，我不都認識的嗎？他是因為南京政府派人抓他，叛徒把他的身分都認好了，他沒有辦法不承認自己是彭湃。他就預備犧牲的了。抓進來的時候在車子上就宣傳了，就唱歌。正好看守所的一個班長，是廣東人，參加過海陸豐農民運動，是彭湃的下屬。那時他們廣東也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失敗之後，他家有親戚在上海，就介紹他到龍華司令部了。他當了看守所的一個班長。他看見彭湃就頭一低，彭湃也好像看見這個人很眼熟，夜裏就找了他去談話，他

記得彭湃。彭湃就做他的思想工作，說：「你在這個地方很好，我們要打進來都打不進來。你最好給政治犯生活上一點照顧。」那個時候你只要給犯人多搞一口開水都是好的了。這位班長告訴彭湃，說我們這裏有幾個弟兄專門給他們送信，送信出去五塊錢。彭湃就給中央寫了信，讓他送出去了。中央本來準備要劫獄營救他，他寫信告訴中央不要劫獄，他說敵人戒備很嚴，劫不成的話，不止我犧牲，還要連累其他同志都犧牲，現在我犧牲就犧牲了。彭湃問女監裏有什麼人，班長說有八個罷工的女的。彭湃問有沒有識字的，班長說：「她們說不認識字。有個矮矮小小的，看樣子很活潑。」彭湃讓他來問我的名字。因為他完全和我們通了，我說：「我叫黃慕蘭。」我一直用劉阿秀的名字作掩護。跟彭湃我在政治局開會見面，在武漢也見過面的。現在出版的《彭湃文集》裏頭，有兩封信上點了我黃慕蘭的名字。彭湃通過那位班長告訴我在牢裏繼續做工作。

我們八個女工進去的時候，女監裏還有一個強盜婆，她的丈夫搶劫被判了無期徒刑。她想，我是個犯人的老婆，誰會要？她就給所長打報告，說我在這裏不要錢，我替你們縫縫補補，在牢裏頭做，給人換洗衣服也可以賺點零用錢。凡是監獄都是這樣，瞞上不瞞下的。那些所長包括士兵都是和外面通的，送錢送東西進來了，他們先要敲敲竹槓。那麼所長就答應她了。我們八個人一進去，就叫她乾媽。我們就說你不是強盜，你們生活不好是被政府壓迫了，你們才去搶。等到我們工人農民的天下打下來了，不會無期徒刑，沒幾年你們就要出去的。把革命形勢講得很好，讓她也有個幻想。從來也沒有這麼多女孩子叫她乾媽的。

開庭的時候，我是學徒工講我的條件，她是女工講她的條件，那麼就是因為拿摩溫打罵了，調戲女工了，我們是吃飯也沒得休息了，坐馬桶的十分鐘都沒有了。各種各樣的受苦的情況，和要改善生活的條件，一個個講，法官記下來了，問認識字嗎？都說不認識字。每個人畫個十字，故意把我手抖一抖，十字都畫歪了。就這樣開一天

庭，不僅法官同情，就是旁邊站的背槍的兵士聽了也同情我們。這都是階級同情。這些士兵上面都是要扣餉的，三塊錢一個月的餉金，半年都不發餉的，就是在這裏給你們有飯吃，有衣服穿就是了。為什麼願意給我們送信呢？那個時候五塊錢一封信，三塊錢一擔的米啊！

八個女工當中，有兩個黨員、三個團員、三個群眾。所以我們在裏面就建立了支部了。這個班長跟我們通了之後，他就怕我們一起抓進來的人，不曉得這個口供對不對，不像我們八個人還關了一個房間，他們都是隔開來的。我們就在衣服裏塞對口供的條子，晚上給他們送小條子。乾媽就做針線，替我們望風。她看到有人來了，就咳嗽一聲。我們就趕緊躲進被窩裏，裝作睡著了。擔驚受怕，怎麼孩子後來得心臟病呢？萬一給條子發現了，自己槍斃，那個犯人也要槍斃的。

彭湃大概關了不到十天就槍斃了。他不會受審，因為驗明了他的正身，只要報上去等命令下來槍斃就是了。他就在這十天當中做牢裏的工作。他叫這個班長一個個牢房去傳：「彭湃說，他抓來了，是準備死的，他關照凡是政治犯：第一，要耐心不要鬧了，鬧了對自己沒有好處。你鬧監絕食，只會加重你的刑罰；第二，不要曝露你的身分；第三，有外面的親戚朋友可以通過他們去營救。」彭湃是很慷慨犧牲的。去刑場的路上，他高聲地喊口號。打他的一排兵站在那裏，開槍的手都抖啦！因為從班長那裏知道了他的事情，跟他有了感情，就覺得這是個英雄。打幾槍才死的。牢裏的人個個都掉了眼淚。我呢又是宛希儼犧牲了，現在彭湃又這樣子……（黃定慧哽咽了）。我們有的人在裏頭很低聲地唱《國際歌》，有的人在掉眼淚。

工人罷工取得了勝利，工會就派人接我們出來。在牢裏的時候王明還到監獄裏來探監，說是我的表兄，送我兩塊錢和一包大頭菜，告訴我們外面正在談條件，你們安心一點好了，就要出來了。出來之後，賀昌就打電報給中央，請求派我到南方局，地點在香港。那時鄧小平是廣西省委書記，賀昌是南方局的書記，<sup>20</sup>負責廣東和廣西。



1930年我在香港生了孩子，一點奶也沒有。生孩子之後只有七天，賀昌被調到北方局當書記，他就把孩子送給了接替他任南方局書記的盧彪夫婦，盧彪的妻子是個小工商業主。那時候吃牛奶算享受了，他說孩子有牛奶養，你沒有奶，這個孩子瘦得皮包骨，跟了你沒有命了怎麼辦呢？他把孩子先抱走了，再做我的工作。「養兒防老是封建思想。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我們都是拋家出來參加共產黨的，誰能夠有一個兒女家庭觀念呢？」當然，他都把孩子都抱走了，我還能不聽他的嗎？就跟他一起到了天津。

因為1929年的革命高潮，到1930年黨內出現了立三路線。李立三佈置「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舉行各大城市的大罷工」。取消工農青婦，成立行動委員會，賀昌是委員會的總指揮。要暴動就要買槍，槍還沒有買好，武裝暴動還沒有準備好，敵人就偵探到了。彭湃那時候就曉得劫獄不成損失會很大。工人罷工至少會讓資本家做出一點讓步，但是國民黨的軍隊、偵緝隊武裝力量在大城市比我們要勝過多少倍了。李立三把1929年各省罷工的勝利看成一個革命高潮又復興了。他低估了敵人的力量而高估了我們自己的力量，還下命令叫毛澤東從井岡山也進攻武漢，會師武漢。毛主席他沒有執行這條命令，他覺得我們的力量不夠進攻大城市，就保存了紅軍力量。反正中央指示傳達到他那裏也一兩個月了，而那時情況發生了變化。

賀昌跟李立三一起在安源工作過的，非常要好。我是交通員，到上海來把中央指示帶回去，賀昌就這樣佈置了。佈置了之後還沒有能夠暴動，就出了叛徒，下面買槍的被敵人抓去了。立三路線一共就幾個月。但是像我們北方局的情況一樣，武漢、廣州、青島都是要準備暴動，還沒有暴動，就被敵人發現了，就破壞了。後來周恩來、王明、秦邦憲、張聞天這四個人從蘇聯回來，改組中央。10月份我和賀昌到中央參加六屆三中全會。<sup>21</sup> 那時候賀昌是檢討得很深刻，所以保留他的中央委員，批准他到蘇區去打游擊，下放了。李立三調到蘇

聯去學習。那時王明當權。王明是很專橫的。賀昌原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北方局書記，下放到長崗鄉當鄉委副書記，但還是保留了中央委員。

1930年冬天，我做了互濟總會的營救部長。那個時候顧順章叛變，許多同志都被捕了。<sup>22</sup>賀昌最好的朋友、共青團的負責人關向應也被捕了。組織上覺得我坐過牢，跟牢裏的關係打通過，這是第一。第二，我爸爸社會關係很廣，南京要人的關係很多了。為什麼調我做營救部長？因為我在天津時又懷孕了，又流產了，我沒有參加他暴動的佈置工作。我看見這個指示就不同意，我說彭湃那個時候坐到牢裏都不肯劫牢，有這個教訓。我說你們這個時候想跟蘇聯一樣的搞一省幾省的勝利，我覺得恐怕靠不住。我當時就講了這個話，賀昌在檢討時據實向中央反映的。他說：「我倒是不如慕蘭。慕蘭在牢裏看見彭湃估計的敵人的力量高過我們。我們這次的確是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太低，是我們自己的盲動。」他做檢討的時候把我托出來，這樣中央調我做營救部長。王明跟我在罷工的時候也認識了，他們覺得我這個人的才幹可以，就讓我留在上海了。

那我不肯，我哭了三天三晚。我想跟賀昌去，我說：「我辭職跟你一起走，不跟去的話，你一走又跟宛希儼一樣的。」我是這樣的想法。他覺得不好做我的工作，就叫地下交通負責人吳德峰同志，解放以後是周恩來旁邊的政法委員會主任，來做我的工作。他說：「這樣，以後再送你去。你現在這個樣子怎麼能化裝成個農婦呢？」到蘇區要越境，我們的接待站是在農民家裏，賀昌長得英俊但他皮膚很黑。吳德峰說，他化裝個農民，穿個草鞋還像。我那時皮膚是白得來，手是嫩得來，那麼嬌滴滴的樣子。吳德峰說：「你怎麼樣化妝，都不像農婦。對我們保護賀昌不利，對農民接待站也不利，對護送的人也不利。所以你只好等我們將來開闢了另外一條交通線，我們保證送你去。暫時你們兩個就分開。」那就沒有辦法了，為了要保護他的安全、農民接待站的安全。

我對賀昌說：「我坐過牢，當過工人，我能吃苦，我不怕苦。兩個孩子你們都丟開了，又要叫我分離。我不肯！怎麼樣都不肯！」賀昌說：「我知道你對我的感情，但你要知道你不是屬於我的。資產階級的感情就是你屬於我，我屬於你。但你不屬於我，你是屬於黨和屬於人民。要有組織紀律觀念。現在中央已是決定了我走，你留下來做營救工作。你要是從敵人牢裏搶救一員大將回來，你不就是替黨替人民立了功嗎？你跟著我去，萬一出了事情你也犧牲了。你愛我你跟我犧牲了，我愛黨我犧牲了。我犧牲我不後悔，但是我們怎麼對得住黨呢？黨要這樣分配，我們這樣子的不服從，行嗎？」那沒辦法，只好哭。在當年5月份就分居，他要等交通送走，我做特殊工作。（黃定慧哽咽著敘述了這段經歷）。



黨另外給我佈置了，我對外聯繫，潘漢年對內。<sup>23</sup>我認識了一個律師，他叫陳志皋，他爸爸是上海法租界會審公堂刑庭庭長，叫陳其壽。他是個進步律師，做過很多事情，救「七君子」也是他參加的。<sup>24</sup>他是進步律師沈鈞儒的學生。這樣就開始了救關向應。

我在上海的公開身分是，沒有結婚，還是黃小姐。把宛希儼瞞掉了，賀昌也瞞掉了，只把我爸爸媽媽講出來了。我爸爸已經死了，但是我黃家的地位還是有的，我是書香門第的小姐。但我不能對陳志皋隱瞞，對他瞞了就不好救人。周恩來跟我講，對他你不要瞞，你要是瞞了賀昌的〔婚姻〕，就講我參加過武漢大革命。因為武漢大革命我是露過面的，我還要通過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這許多人來救我們共產黨員，所以那一段不能瞞，公開地說我已經脫了黨。對那些知道我的人來說，我是改嫁了陳志皋，不知道的，他們陳家的親戚朋友只曉得我是黃小姐了。那時二十幾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還能夠冒充小姐。那個時候年輕是很漂亮的。

為了營救關向應，我去陳家拜訪。陳志皋的父母一看見我就喜歡。我談起我是黃某人的女兒，我爸爸是譚嗣同的朋友。陳志皋的

爸爸也是個開明的人，放掉過孫中山的同盟會的會員。我的爸爸媽媽是佛教徒，陳志皋的爸爸媽媽也是佛教徒。我的名字改成定慧就是佛教徒的名字。我告訴他們我到上海來考大學，沒有考好，想找事情工作。我的中文很好，他爸爸就叫我教他的小妹妹《古文觀止》，當家庭教師一樣的來往。

陳志皋跟他爸爸說我的表哥是個小商人，被關在龍華，求他幫忙。他爸爸是會審公堂18年的法官了，龍華的法官是他的後輩。他把這位法官叫到家裏，對他說：「這個黃小姐是我的乾女兒。」事實上，那時我還沒有拜他做乾爹。「她表哥是個規規矩矩的商人。你去查查看，如果真的是錯抓了，讓我兒子把他保出來。」那個法官只是不停地點頭，好的，好的，我回去查。查的中間法庭書記官要敲點竹槓，三個月了還不批下來。志皋問的時候，法官說我是沒意見的，但書記官說這個人的口供不太對。陳志皋說：「那就改口供了。」法官說，書記官是抽鴉片煙的，想要弄點油水。老太爺也抽鴉片煙的，就拿出了最好的雲土送給了這個書記官。這樣，就改了口供，關向應就保出來了。

我想賀昌說過：「救回一員大將，就是為黨立了一大功。」關向應是政治局委員和共青團的總書記，這就救回了一員大將，我就等他們來接了。賀昌是1935年犧牲的。他知道我在上海救了很多，就不來接我。他這個人是國而忘家，公而忘私。他認為我在上海做的貢獻要比在蘇區大，不派交通來接我。我們信也不通的，一直等他死了我才知道。他是最壯烈地犧牲了。現在中央立了《賀昌傳》了，宛希儼也有傳，都是黨的優秀領導。我就做地下工作，一直救地下黨員、救難民、救七君子、救民主人士。

我跟宛希儼一起，一共只同居了九個月，生了個孩子後他就走了。跟賀昌兩年多，1929年結婚，1931年他走掉了。這兩個人都是優秀黨員。對黨的歷史、對理論方面、在人的修養方面，我受的教育不少。雖然是愛人，但是我把他們當老師一樣的尊敬。



我跟陳志皋見面是1931年，九一八，那一年是國難深重的時候，大家都唱「九一八」、「九一八」的歌的時候。陳志皋寫的抗日的文章在雜誌上發表了，我也寫了文章。陳志皋在學校的時候就進步的，他比我還早讀過《資本論》。我雖然入了黨，我還沒讀過《資本論》。他是讀的法文的《資本論》，他一個同學大概就是地下黨員，後來到法國去留學去了，寄了一本法文的《資本論》給他。他房間裏頭的書架上全是馬列主義的書籍，什麼《馬克思傳》了、《恩格斯傳》了、《反杜林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了，已經很多人翻譯出來，很多人參加大革命失敗後，就跟茅盾他們一樣寫文章，有的做翻譯工作，出版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籍。我做地下黨的工作的時候，到他家裏借回家去看。我雖然入黨早，理論學習很少。反正我在地下黨工作，理論學習倒有時間了，自己一切都是自修的。

我並沒有向陳志皋隱瞞我跟宛希儼結的婚，我還有孩子交給了他們家，我是個寡婦身分。對於很多認識宛希儼和我的人來說，我是宛希儼的遺孀。陳志皋要追求我，他自然是什麼都包辦，請客送禮，去保人，一個個的事情表現得非常的積極。我心裏也矛盾，不想跟他結婚。所以我們做了四年朋友，沒有結婚。不結婚也很合理的，我是他爸爸的乾女兒，他叫我阿姐，是我兄弟。

人家說陳志皋對我一見鍾情，事實不是這樣的。<sup>25</sup> 他喜歡他的同學彭小姐，但彭小姐的父母不同意他們的婚姻。在我和陳志皋結婚前，彭小姐就已經結婚了。那時做他工作的也不是我一個女同志，還有幾個女同志都對他有感情。原因就是聯繫了送案子來了，都是為保人，不是保一個人，也不能夠我一個人出面，還有其他的人來出面辦案子，那都是「我的表哥」、「我的表叔」、我的什麼了，都委託他辦案子，也都跟他很要好，我們那時候叫他賈寶玉。他又很年輕、很漂亮、很慷慨，文質彬彬的，大家都喜歡他。我就講你應該跟她（其他喜歡陳的地下黨員）結婚，不應該跟我結婚。我說：「我前面還有孩子。人家還是小姐，比我年輕。」他說：「那不行，爸爸生前也喜歡

你，媽媽也喜歡你。你的家裏我們是查清楚的。你是有根有底的，她們這些人沒有根底的。」我黃家他查得清楚的，他心裏想那些是共產黨員，我是真正脫黨的。他對我放心，那些人還比我年輕，追求他都沒有同意。他說：「我們家裏頭通過你，不通過這些人。我也不好講這些人是怎麼認識的，而你跟我們家裏頭來往已經幾年了。」

他爸爸已經講了我是他乾女兒，組織上就正式讓我拜他做乾爸爸乾媽媽。那時候是組織上給我請客的，在大鴻運三桌，他家裏頭的哥哥、弟弟、伯伯、叔叔這些陳家親戚也來了。他們海寧陳家乾隆皇帝到過他家裏四次了。<sup>26</sup> 這樣還沒有結婚，就用陳家親戚的上層關係來活動、救人。我1931年就開始做地下黨員了，不想跟他結婚，一直到1935年。我還逃婚兩次，逃回到瀏陽去了之後，組織上追回來的，又有案子要托他的時候。那個時候廖承志被捕了，陳賡也被捕了。中央要救這些人，不就要叫我來？這個人是最聰明的。他從來不出面，請客也好送禮也好，他都來。他爸爸的關係很多。他不出面，救廖承志也好，救陳賡也好，都是托了別的律師。

不想跟他結婚，就是自己也有些封建思想。第一不適合於他的家庭，第二我的身分也沒有公開，第三一嫁二嫁。那麼畢竟我曾經一嫁二嫁還是組織上的，都是優秀的領導了，再嫁這樣一個不是自己的同志，雖然是民主人士很進步的，但是總覺得還是不太好，再嫁也是不太好。我們雖然參加革命了，社會的封建意識跟本人的封建意識也都還是存在的。在我們瀏陽如果你要再嫁了，祠堂裏要把你沉潭去了，族長都不許你再嫁的。我已經是北伐時和宛希儼結婚，所以跟賀昌結婚就瞞了家裏了。我和陳志皋結婚時，也沒有告訴他賀昌的事，直到1938年他才知道的。他和他們家裏也不知道我小時候結過婚。那個李家後來還來找我媽，覺得又沒有辦離婚，就這樣走了，曉得我參加的革命。所以媽媽不讓我回瀏陽了，逼得我退後沒有地方退，到什麼地方去也不能去，我只能夠死盯著組織上了。到井岡山也不同意我去，說什麼皮膚太白了，到路上要發生問題，那麼只能夠黨叫你做什麼你

就做什麼。那麼跟陳志皋結婚，我倒是下了決心，犧牲就犧牲了，因為他救了我們的中央的委員，又這麼出錢來包辦許多事情，就是黨勝利了也會原諒我的。

我們在1931年認識，1933年他正式向我求愛的。這一年我三弟闖了禍，他是團員，參加學生會主持的罷課，結果被學校開除了學籍。正好這年他畢業，開除學籍，就不能上大學了，急了，就一個電報「母病重盼速歸」。我想1932年我沒有回去，二弟死了，爸爸也死了，我都無法回去。我就向組織匯報了，組織說可以，我們派個人護送你回去。劉伯垂的夫人叫趙婉華，就是來往湖北跟上海的交通。潘漢年走了後就叫劉伯垂和我聯繫，劉伯垂不和我直接聯繫，是讓趙婉華和我接頭的。陳志皋的母親托趙婉華問問我母親是否同意這樁婚事。趙婉華就問我媽媽，我媽媽的答覆是這樣的：「這個事情我不管，你們覺得人家好、老太太好，替我們救了很多共產黨員。我女兒離開家裏這麼遠，也不能回來，就讓她自己考慮吧。」所以1933年沒有正式允許婚姻。

1935年組織告訴了我賀昌犧牲的消息。<sup>27</sup>在組織的允許下我和陳志皋結婚了。他跟我結婚的時候，我們黨有一個人證婚。證婚人跟他講了三個條件：第一個條件就是你要繼續支持我們的工作；第二個條件，彼此不干涉個人的行動，因為我總有些其他的事情，黨的機關要接頭啦，有事情的，如果真的結了婚，又不能夠完全瞞他，你干涉我的話，我怎麼好結婚？第三條，黨勝利的時候，我要跟遺孤團圓的。他同意的，他要我這個人的時候，就不管你勝利不勝利，反正只要你嫁給我，什麼條件我都答應你。他不知道我和賀昌的關係。我和賀昌的兒子直到解放後才見面。<sup>28</sup>我兩個兒子都是解放以後才見面的，那時婆太太死了，我跟陳家也公開了，但是陳家弟弟妹妹都走了，到美國去留學了。

婆太太始終也不曉得我是共產黨，她59歲死的。老太太是最開明的，只曉得她乾女兒救人。反正抗戰她知道了，抗戰時各黨各派都

在我家裏開會，老太太剝蓮子，搞點宵夜，深更半夜都不睡覺，還跟我到前線去慰勞。我夜裏頭出去天亮才回來，她坐在佛堂裏頭點了長明燈，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不睡覺，要保佑我的平安。婆媳關係也非常的好，一家人都投入抗戰了。抗戰合作，這樣掩護我的身分，根本沒有曝露過。我們在國民黨活動用宋慶齡跟何香凝的旗幟，左派文化界就用郭沫若的旗幟。在這些活動的掩護下，我的真實身分很安全。



我本名叫彰定。抗日期間，我把名字改成了定慧，這是我父親的意思。我爸爸講：「定兒生有夙慧，夙孽亦重。」就是我最聰明，我過目能頌，我記憶力很好的，但夙孽亦重。我祖父是道教，他會算命看相，他說我有貴人，會逢凶化吉，遇難呈祥，有牢獄之災，這老早就給我算定了。我父親是個佛教徒，那個時候還不曉得我有這許多波折了，1931年他只知道我已經嫁給宛希儼，宛希儼又犧牲。我參加革命，他同意了，革命也失敗了。就想我夙孽亦重，應當借佛菩薩能保佑她，我祝福她福慧雙修。所以我就叫定慧，「定」就是從彰定來的，「慧」就是我爸爸祝我福慧雙修。定慧就是佛教徒的名字。陳志皋的母親是佛教徒，他自己也是佛教徒。我不披著佛教徒的外衣，我怎麼能夠躲到他那裏後頭去做活動？因為周恩來指定我抓住他，通過他去做捕房的工作，通過他去做國民黨的立法方面的工作，通過他的關係做，你在幕後當參謀。

那些年，我直接在周恩來的領導下工作，吳德峰在中央和我之間傳遞消息。組織上不是派我一個人埋伏在他旁邊的，讓我嫁給他了，他的律師事務所的秘書就是我們的同志，管這些保出來的人的案卷，由他送到什麼交通站的人，到事務所接頭，又不要去旅館，又省錢又保密又安全。但是這些都瞞著陳志皋的。

在營救關向應的時候，又得到一個情報。陳志皋有個同學在巡捕房裏頭的，告訴他說，剛抓了一個共產黨的頭頭向忠發，他已經叛變

了。我知道後馬上通知了潘漢年，潘漢年又通知了康生。當時康生是保衛局長，他馬上報告了周恩來。第二天，四個首長接見我，我就講了這件事。周恩來就說要陳志皋去做巡捕房的工作。我就奉命留在這個地方。我的工作是周恩來直接佈置的。我和陳志皋在一起是組織的命令。

抗戰開始後，我想到延安去。我心裏想我跟這個家庭不可能長久的，因為我的身分一直還沒有對他家裏頭公開。1938年我偷偷地走，我留個條子放在家裏頭，我就出來住在滄州飯店，到中國旅行社去買船票。本來我們夫妻吵一架了，吵架的時候，老太太也不知道我們為什麼事情吵架。但看見我當天不回來，三天都不回來，他們就急了，到處去找。那個時候登記一個船從香港走，回重慶，不是馬上就有船票的。我住在滄州飯店。碰巧了，中國旅行社又是陳志皋哥哥的親戚，他一查我登記的名字，當然不是用的家裏的名字，但是他們一查這個日子，又是姓黃的，他們就跑到滄州飯店來找。找到了之後老太太很開明的，她並不知道我的身分，但是知道我們吵架的時候，她就當面責怪她兒子了，就把我接回去了。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我和陳志皋在1937年的7月中旬就在震旦大學的操場搭個竹棚子，收容難民。陳志皋過去是震旦大學的學生，就去和校長還有跟法國天主教神父饒家駒(Robert Jacquinet de Besange)商量，辦了個國際第一收容所。饒家駒神父的主任、陳志高的副主任委員、我的總幹事、下面的幹事全是共產黨員。陳志皋之前就參加了國際救濟會，饒神父是國際救濟會的外方會長。《上海人民革命史畫冊》裏頭有一張照片，<sup>29</sup>是國際救濟會第一難民收容所全體工作人員的照片，我認為這是關鍵性的照片，我和陳志皋都在裏面。全體工作人員的照片為什麼最重要？就是我們地下黨在這裏的建黨，我們在那裏秘密組織青年難民送到新四軍去參軍。那麼陳志皋做什麼事情？就是推動饒神父去跟日本軍司令部打交道，就說上海這些難民，這些青年人在這裏很鬧事，吃飯也吃得很多，糧食有困難，我們

現在決定了送他們回鄉生產，請他們不要在半路攔截。日軍司令部同意了，因為那時候日本軍隊的糧食也困難。我們一共送了三千子弟兵去，當上司令員的都有，當然三千子弟兵不都是我第一收容所的，是上海幾十個收容所去動員出來的。外面的人都只曉得是返鄉生產，我們地下黨就把他們集中了秘密報名，填了志願書，之後集中在一個地方訓練了。開歡送會的時候，帶隊的人在我家裏走了，我每個人送他們一個紅十字會的會包，船上也掛了紅十字會的旗幟，通過戰區就不可以攔截了，都安全去了。所以這張照片是我最得意的。

還有一件事情也是我的創舉了。難民收容所裏頭有些難民要回鄉，我們就可以發一個難民證，難民證是叫良民證。他回鄉了，日本人看到是良民證，就給他通行。我們的交通不就是到處都用良民證嗎？各地方都有難民，各地方的蘇區跟白區的交通不都是難民了？所以交通網也是從我們那裏開始，建黨參軍統一戰線也從我們工作開始。所以周恩來1938年就給我一封表揚信，叫劉少文帶來給我，說不同意我到延安去，表揚我們上海的工作，公開地跟陳志皋致敬致謝。這樣他直接接上了周恩來的關係。劉少文1938年1月以八路軍辦事處主任的名義來看陳志皋之後，才對陳志皋公開了我的身分。這樣我的身分對他完全公開，我還有賀昌的孩子在澳門也公開了，他知道了。

那個時候，我見廖夫人（何香凝）後，廖夫人就叫我去組織一個婦女慰勞會。我以前沒有建立過自己的組織，然後我就申通了上海22個婦女組織，成立了上海婦女慰勞會，廖夫人是會長，我是常務理事。因為我家離廖夫人家不遠，我經常到她家去。她腿腳不便，所以她一些對外聯繫活動就由我代表了。我也代表何香凝會長去杜月笙和黃金榮家募捐過。



1942年，我生下兒子十天後，在曲江被捕了。曲江屬韶關，廣州淪陷後，這裏成了廣東省政府所在地。劉少文向陳志皋轉達了周恩來的建議，要他接受重慶國民政府的聘書，到曲江擔任中央振濟委員會

的特派委員，負責廣東和福建的賑濟工作。香港淪陷後我們幫了很多重要人物從香港撤退到重慶。那時上海童子軍的楊惠敏到曲江來找我要工作，楊惠敏就是當年夜裏穿的游泳衣，渡過蘇州河去給守著四行倉庫的謝晉元獻旗的，四行倉庫把國旗掛起來了。我讓她帶著人去香港搶救物資（上海銀行有東西在香港），搶救高級幹部回來。她送了兩百多人回來，何香凝就是我們最先接回來的。我們都是東江游擊隊的關係保護回來的，因為他們可以繞過日本人的崗哨，知道怎麼走出來安全。後來又接到胡蝶交的21件行李。胡蝶也想從香港到重慶去，是委託楊惠敏，楊慧敏就把行李交給另外人帶，把她的人分開來帶，也是為了保護她。結果人就安全回來了，行李被搶了。到處是流言蜚語，說楊惠敏私通東江游擊隊搶劫了這些東西，我們又是私通東江游擊隊的，又是包庇楊惠敏。陳志皋也氣不過了，不想做了。那個時候交通銀行請他去做副處長，他要辭職。他叫我帶了兩個女兒到重慶，儘早安排去辭職，因為我們到曲江去工作是劉少文和周恩來的命令叫他去的。我們把賑濟委員會的錢批了一個特別救濟會，是搶救香港的人回來。這裏頭的錢分了一批給東江游擊隊到香港去買槍枝，這個事情要是查出來不是要槍斃的？所以陳志皋也很想快點離開這個崗位。<sup>30</sup>

我帶著兩個女兒從桂林坐飛機到達重慶，住到中振會副委員長屈映光家裏頭。馬上鄧大姐就打電話來，說派車子來接我。在電話裏頭我問她，我們兩個孩子一起來的，很小，能不能帶來？她說可以帶來。見到周恩來後，我講了陳志皋因為流言蜚語想辭職，還有關於我的流言蜚語，說我是杜月笙的女弟子，也說了我想到延安去。人家說我們跟東江有私通。現在私通是有的，萬一發現了怎麼辦？周恩來說：「那現在還是沒有發現，你們還是要勉為其難。陳志皋替我們做了很多工作，這個地方是東南幾省的交通樞紐，非常重要。」一定要叫我回去。我說：「這些流言蜚語人人都要傳到我耳朵裏來，叫我怎麼忍受？」「怎麼不能忍受？我們共產黨不是在挨圍剿挨打挨罵的聲中壯大起來的？只要我們不是土匪也不是強盜，人家罵我們強盜土

匪，隨他罵我聽不見。人民總有人民的眼睛，因為我們是代表工農的，反對地主的，反對資本家的。當然蔣介石的政權是代表資本家跟地主的，他不罵我們罵誰呢？你聽見一些人講你的不好，你就灰心了，你什麼革命意志啊？」他一方面給我上課，一方面就安慰我：「回去回去。陳志皋做了不少的工作，難道你一定要到延安才是參加革命嗎？」我告訴他還有個顧慮，我對外面都說是脫黨了，只有少數幾位領導知道我的身分，將來黨籍黨齡會不會成問題呢？周恩來答應說：「將來革命勝利了，我會替你證明的。」我帶著孩子就回到了曲江。<sup>31</sup>

那年12月我從曲江被捕的時候剛剛生下小孩十天，發40度的高燒還在月子裏頭，我從曲江醫院回到家，曲江醫院用了一個特別護士叫陸小姐，我相信也是我們地下黨員，否則她不會這樣的。那天晚上陳志皋出去開會了。半夜忽然來了三個人，不速之客，就說要見我。陸小姐說：「陳夫人發高燒，不能見你。」「不能見我也要見！」我聽聲氣不對，我拿起電話來就預備跟吳菊芳打電話，她是省長夫人跟我們在一起工作過，一打電話電線就割掉了，那我就曉得不對了。他也不等陸小姐同意不同意就衝到我房間裏來了，帶著獐笑的樣子：「嗨，陳夫人，我們的司令請你去談話。」我說：「你們司令今天上午剛來看過我，怎麼會請我去談話呢？好了，明人不說暗話，看你的樣子也不對。」我說我有個條件，請你派個人陪陸小姐拿了賑委會的印鑑和存摺送給出納組長，移交完了跟你們走。他說可以。陸小姐說：「陳夫人40度高燒，我是特別護士，我跟她一起去，等她能夠下地能夠自己活動了，我回來行不行？」他們開始時說不行，後來三個人嘰嘰咕咕商量了一陣：上面要抓活的，如果我們把她路上搞死了，又怎麼辦？還是同意她去吧。一到火車站就看見陳志皋坐在那裏，我們看見彼此但也不能講話。

我兒子就丟在那邊，後來沒多久就死了。我死了兩個兒子。1948年公司破產時（黃定慧在後面講了破產的事），我肚子正大，一急就小產了，產下來的孩子全身都是綠的，就死掉了。兩個孩子都是因為政



治壓迫死的。我和陳志皋抓走後劉少文派人接走了我的兩個女兒。護士小姐跟著我到衡陽42天，衡陽是軍統的一個秘密監獄。讓陸小姐進城去替我買東西，雞蛋了、紗布了、棉花了，要走90里來回一天，一個禮拜進城一次，兩個人押了她去，兩個人陪著她回來。我剛生了孩子，腰像斷了，我坐馬桶不能坐，在床上的，就是護士替我解大小便了，倒便盆了，一直發高燒。陸小姐等我42天滿了之後，回到了曲江醫院，所以我說她是地下黨員，不是地下黨員，沒有這個勇氣說我陪你去坐牢。

我凡是壞事當中總會碰到好事。衡陽地區是歸周夔龍管，周夔龍是黃埔第一期的，戴笠是黃埔第六期。周夔龍到上海來買槍枝，被巡捕房抓去了，他的部下請陳志皋去保，保出來的時候，我們還送他300塊錢路費。周夔龍就打個電報給戴笠，說陳志皋、黃定慧是愛國的，可不可以釋放，不要送到重慶？戴笠回個電報：委座批准，必須轉，等我好一點，就轉送到重慶。周夔龍馬上就到看守所來看我們，就交代姓徐的看守所長，說這是我的救命恩人，他就講了他自己在上海的情況，現在我雖然打電報給了戴笠，委員長不同意，還是要解到重慶去，請你優待。那麼就是優待了，那麼冷給我送了火盆來，還讓陸小姐進城給我們買東西。優待伙食，而且允許我們吃飯的時候見面，我們就可以商量口供了。

在衡陽囚禁六個星期後，我們被押解到重慶，在那裏關了兩年，有一年受罪，一年也受優待的。一年優待是戴笠想拉攏陳志皋，想要陳志皋加入軍統。陳志皋被關在一個優待室裏。我跟普通女犯人關在一起，16個什麼走私鴉片或者什麼人。我在裏頭替好些人打報告，都是文盲，糊里糊塗關了的，沒有人理啊，我保出來幾個人。

我是去曾家岩的時候被發現了，八路軍辦事處的隔壁就是特務機構，他抄好了汽車的號碼。所以抓我去的時候並不問楊慧敏的事情，他直接問我：「你什麼事情到曾家岩去？你是假的脫了黨，你是打進我們這裏來搞情報的，是不是？」我說我脫了黨好幾年了。陳家是這

樣一個世家，他家裏怎麼可以去個共產黨員的？我就這樣講，陳志皋不知道我的身世，我說我瞞著他們，偷偷去探望我前夫的兒子。因為特務當然知道我1926到27年的共產黨歷史，生了一個孩子也知道，但是我跟賀昌結婚了或者在上海坐牢這一段他們都不知道。我暗地支持共產黨的工作，他們是查出來的。我究竟恢復了黨籍不黨籍，還是奉命不奉命，這點他們還沒有把握。我在抗辯書中寫了：「我如反共，他年遺孤長成，將何顏相見？如以聯共有罪，請處極刑，俾獲從先夫於地下，雖死猶生。」因為他們都知道宛希儼的。後來，軍統方面給陳志皋定了罪名是貪污挪用公款。我們還是給了很多錢給共產黨員，又給了很多錢給東江游擊隊，賑濟委員會的錢給共產黨買了槍枝，這樣有什麼辦法呢？都不能夠公開報銷的，扣一頂貪污帽子就把他判了七年徒刑。陳志皋的弟弟是白崇禧的私人醫生，坐牢兩年後他弟弟把我們保出來的。



我和陳志皋有三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我一共有六個孩子。陳志皋1950年去了台灣。他為什麼會去台灣？1949年劉少文在石家莊的時候提名第一個政治協商委員會，提到我的名字，提了陳志皋的名字，結果被四位民主大姐反對掉了，她們誤解了我和陳志皋在抗戰期間做的一些事情。<sup>32</sup> 因為黨的紀律最機密的情報機構是不能夠向任何人公開的，這種培訓情報人員，共同偵查日本人的情報，還有情報跟國民黨合作的。潘漢年受審查就是為這件事情，但事實上是兩方面都通天的，我們這方面不承認通天，就是我們的人都打進去了，三分之二的人是我們的人，在這裏訓練了之後就由國民黨統一調配，調入到各個地方去了，所以每一個部隊裏頭，每個地方都有我們的人，陳誠的旁邊也是我們的人，都是在上海培訓的。四個民主大姐就那個時候攻擊我跟陳志皋，說把她們民主人士的機構出賣了給國民黨。那時我們不能夠承認，因為那邊國民黨的人是我們的人。在石家莊的時候劉少文也不能公開，所以石家莊把我們兩個人否定了，一刀砍掉了。

劉少文在剛剛解放的時候是華東局的紡織工業管理局的局長，他就到我們家裏來看我們：「抱歉，石家莊沒有通過你們。」那個時候陳志皋跟我是焦頭爛額的時候，公司破產清理，債權人訴苦盈門，自己也沒有工資了，什麼收入都沒有了。我們在焦頭爛額的時候他來慰問。陳志皋這個人，他倒是這樣講：「她們誤會麼，你們證明一下就算了，我也並不喜歡這個政協委員，反正你知道我的個性是布衣傲公卿。」事實上還有些其他的個人恩怨也很難說。我們那個時候的工作作風太耿直了，得罪人也很難說。

還有一個主要原因使他去台灣。饒漱石打擊我不承認我是共產黨員。那個時候我也不曉得在江西他追求過我，他也沒有跟我表示過。饒漱石解放後當了華東軍委書記。<sup>33</sup>我去看他，因為陳志皋在做一個計劃，做外貿的出境。他譏笑地說：「哎喲，資本家現在還來求我們哪！」、「嫁了資本家做太太啦，享福啦。」這樣的挖苦。這個話我回來怎麼好跟陳志皋講？我也不好講。我自己坐了黃包車回來。本來我們是有小汽車的，但是他公司垮掉了，我們小汽車、汽車司機統統都打發走了。我自己眼淚掉下來，哭哭啼啼回來，也沒跟他講。他不是有好幾個女朋友嗎？後來知道這個消息就告訴了他。他說：「你為什麼瞞著我？饒漱石不承認你是黨員，那我支持你的工作不都泡了湯了？」他的綽號是觀音菩薩，那個時候無論哪個來，無論地下黨的誰派人來，要錢有錢，要人有人，都是支持的。他說我為了你做你的觀音菩薩都夠了，但是這樣一來都泡了湯。泡了湯也不要緊，他說，我千金散盡還復來。他還雄心勃勃的了，說，我出去搞石油生意，對國家有好處，對你有好處。

陳志皋是完全知道會發生什麼。他說：「你要跟我走。你不跟我走，1942年你們黨內整黨整得多厲害，你吃得消嗎？」我說：「我吃得消。我怕什麼呢？我的事情都是中央交代我的，我做過什麼壞事情？救地下黨員、救民主人士、救難民，跟你的工作就是這些工作。」他說：「我吃不消。」

為什麼他吃不消？那時候他是個銀行總經理。正好那時候國民黨打我們，因為我太曝露了。宋慶齡她們搞文化人的專募基金了，我開一張大支票，特務在現場看見了，就查我們公司的賬，吊銷了執照。一個報紙登出來吊銷執照了，領款的人存款的活期的都要付，12天不付完了，還要吃刑事官司，來不及只好借債還債了。借債還債的時候又碰到「金圓券」的風潮，一萬塊錢回來了之後買一張草紙，人家借了你去的故意不還給你，等到還給你的錢都不值錢了。雙重打擊之下他破產了。之後他沒有錢付債權人的時候，把他的皮袍子也扒掉了，把他頭髮也抓掉了，他受到這些侮辱，他說：「士可殺，不可辱。」所以他說我還是出去。

國外還是有些人跟他合作。抗戰時期我們在廣東救了很多，廣東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我們都救了，但是救的國民黨員還是比救的共產黨員多了。他說我出去搞國際貿易還是可能賺點錢，這個房子不要賣掉，那時候只剩下一棟房子了，他想保存這棟房子，這房子還是他自己設計造的。孩子們也小，等我出去搞筆錢來再講。中央為什麼同意他出去？沒有通過我們的政協提名後，聶榮臻有封親筆信給我們：「請入京共商大計。」<sup>34</sup>寫了這麼大的字，是一張信紙，也是劉少文帶來的。陳志皋那個時候擬了一個方案，他的意思是我不能跟他一起進北京，否則他進台灣不方便。他的方案就是幾條，第一條他去策反空軍起義，因為我弟弟是空軍，他弟弟也是空軍，他說我去策反空軍起義，不要轟炸我們，因為那個時候是二六轟炸以後，他說我怎麼講，蔣介石不是很想不要炸掉他的祖墳嗎？他說你轟炸上海，風吹歪一點，把你的祖墳炸掉了，你怎麼辦？第二，他想法子把台灣的人跟香港聯繫起來，爭取外匯內流。第三條，那個時候不是我們自己國家還沒有石油，我們在1960年代才有麼。抗美援朝的時候美國人對我們是封鎖禁運，我們根本石油一滴都搞不進來。我弟弟在泰國搞石油公司，經過弟弟他們從中東買來了，然後經過香港再轉運到上海。爭取外匯內流、突破封鎖禁運、策反空軍他這三個計劃，中央就批准了。

走之前他告訴劉少文，我走有點不放心。劉少文說你放心，恩來會證明的。他就這樣地放心走了。他走我想頂十多年回來，那時候有個天真幼稚的想法，解放台灣頂十多年，就是這樣的想法。他1950年走，也並不曉得1955年我要坐牢這麼多年。他想不到，我也想不到。

陳志皋是要帶我走的，我不肯走，因為什麼原因？他和我在一起跟我坐過牢，又把公司打垮了。我的面孔太紅了，我相信我出去了對他不利用。所以我同意他帶他的女朋友彭慶修走。他們從前在同學的時候就有過戀愛關係的，但是她嫁了個人不滿意，那個男的還打了她，她要自殺的時候，我還去救了她。這時彭已經離婚了，和陳志皋又舊情復燃。我心裏想陳志皋只有40歲，他不帶她走，他也會有別的人結婚。我又救了她命，又同意她一起走，他至少還要感恩我。我說你們一起走，反正你這個公司就交給我。公司本來我是秘書長，後來我就是代理董事長，把他的房子賣掉，替他債務清理。他的女朋友也欠了一屁股的債，後來我賣了房子也替她還掉了，大家都說我度量寬大。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1985年我們通過一次電話。我平反後去廣州，他從台灣去香港和兒女見面，從香港給我電話的。陳志皋到了台灣不反共。以前蔣介石想拉他，他說，我第一不反共，第二不做官，第三我只做律師。他做到了世界律師協會的常務委員，出席日內瓦的會議，救台灣的地下黨員，還是替他們辯護，不收律師費。他是真正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是不念經也不拜佛的，就是積外功積陰功。

他對我說：「我跟你是前世的緣分，所以我一見你就愛你了，愛你了就為你犧牲了，我也願意的。」我跟他離婚了，1953年不能不離婚，不離婚這裏要懷疑我，會說你怎麼讓他走了，還帶個人走了，你還替她還債了。那個女的債務我都替她還了，那麼政府會覺得你真是一心向黨了，你還三心二意？這樣懷疑的了。我就正式到法院跟他離婚了。離婚判決書寄去後他寫血書寄回來：「祭告天地祖宗神明在天之靈，絕不負、絕不離異！」但是他去了那邊，他當然要去那邊，

他走的時候就是不願意受我們共產黨的審查的，他自己那麼多的關係很複雜。陳志皋1988年死在台灣。孩子們都瞞了我，1989年我才知道。知道了之後，我在這裏龍華給他開了一個追悼會，把他的骨灰送回來，葬在他父母那裏。



陳志皋走了後，我只好賣了我們的房子來還債。政府買了這棟房子。我住的地方是長寧區，區委派我參加上海社會福利界的代表大會，我當然是有資格的，解放前我是國際救濟會的地下黨的，福利界當然我是有名的，我就代表去了。代表開完會之後，我就寫個條子給潘漢年，他是副市長，我說我參加這個組織行不行？我過去工作在這裏做的，地位我不計較。因為那個時候秘書長派好了，副秘書長派好了，處長也派好了，副處長也派好了。他就寫個條子給救濟分會秘書長趙樸初，趙樸初就叫人來看我，他就講他曉得委屈你了，現在都已經派定了，你來做秘書兼聯絡科的科長行不行？我說好的，沒有問題。我就去了。在地下黨的時候趙樸初跟我們一起工作，他雖然是個民主人士，我覺得他跟我知己，他會詩詞，我也會詩詞，也不把我當一個手下人看待，他也知道我的黨的關係了。我還評上了工作模範，我覺得饒漱石反對我也無所謂。

1953年我去北京見周恩來，沒有見到。住到阿英家裏，<sup>35</sup>我打電話給鄧大姐，鄧大姐叫個姓陳的秘書跟我說：「你回去。伍豪講的話一定兌現的。」<sup>36</sup>我是1955年抓進去的，因為潘漢年。我跟潘漢年一個案子，同一天抓進去。潘漢年不就是他跟陳立夫打交道了，在廬山上見蔣介石，這都是你毛澤東周恩來都知道的，不是他一個人可以去。但是到那個時候我們在左的審查之下，凡是跟國民黨的人有關係的人，不要講別的，一般知識分子都扣右派帽子了，不要講我們搞地下工作的，人事關係複雜，還有很多人在海外。

我知道我會被關起來。1955年，我第二次到了北京，因為我的二兒子要開刀，心臟病。我住在吳德峰家裏，他當時是最高法院副院

長。那時我知道地下黨的一些人都已經開始要交代了。吳德峰就覺得最高人民法院不應該出拘票來抓我，就應當讓我在他家裏交代質證，因為我們的交通工作沒有破壞了。1932年他就派一個共產黨員做陳志皋的秘書管案卷，我們在事務所建立的交通網四通八達，〔1949年〕我們一百件案卷都交進去了。他還可以證明，毛澤東自己去看關向應，關向應向毛澤東懇求：黃慕蘭是為了救我們，才派她做這個地下工作的。黨勝利了之後，希望對慕蘭特優照顧。毛主席說，你放心。我在吳德峰家裏，他老婆就替我打個電話給鄧穎超，說：「慕蘭不要進去交代可不可以？就在我們家裏寫交代，因為吳德峰可以給她證明交通工作。」鄧大姐在電話裏回覆吳德峰的老婆戚元德怎麼講，這是一塊板壁，我睡在這裏聽得清清楚楚：「駱劍冰已經進去了，潘漢年也要進去了。」她說：「我們替她證明就是了，住在你家裏交代是不方便的。」<sup>37</sup> 那麼我就知道駱劍冰進去了。我一回來就自己都準備好了東西，就曉得要進去審查了，這還不審查嗎，我們的關係這麼複雜？！我已經從劉少文那裏知道我們不能夠當選第一屆政協委員，不是有人攻擊嗎？有人批評嗎？在我心裏想是問心無愧的，去就去了。我們以為是整風學習，這是黨的決策要給我們關起來，哪裏知道進去了之後是反革命罪，也沒想到會關這麼久。我被關了八年半。

1955年關進去的時候，我沒有坐牢監，而是先在德勝門那個地方審查。我還講我們是中狀元，因為那個是考狀元的地方。1959年才造了房子，一共八棟房子，四棟房子關末代皇帝、起義將領，四棟房子關我們高級幹部。我本來只是一個科長，但是他給我吃的就是高級幹部的伙食，45塊錢一個月，我們優待的。我們在那裏頭地下掉個針都聽得見，不能講話，放風的時候放你到外頭活動。那個房子是特造的，比三個這個房子高，上面是空的，搭個橋一樣的，一個背槍的人在上面看著你。你在裏頭打拳活動，要把手巾包好了，要咳嗽也要把手巾包好了，就怕你隔壁房間裏聽見了。它一個個房間是這樣的單獨房間，一個人關一個房間，伙食也是很好的。毛澤東來秦城那一年好

像是自然災害的時候，是1960年還是1961年我就記不清了。我們自己並沒有見到毛澤東，是管理我們的處長跟我們說：「你們好幸福，毛主席親自來看你們，我們受到批評了，因為你們都拉肚子，就是我們廚房內搞得不清潔，你們都是國寶，將來還要派用場的。」

1963年宣判我是「叛徒、特務、反革命」罪，被釋放，判處管制三年。我出來後就寫了申訴書上訴，要求重新審理我的案子。在我的案子重審前，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紅衛兵來抄家，搜出了陳家的東西，抄出了陳家先祖傳下來的古董，還有乾隆皇帝送的朝珠和玉如意。紅衛兵又打了，打斷了三根肋骨。「你還是什麼共產黨員？你嫁到這樣的人家？」後來我又被送進了秦城監獄，在裏面又被關了八年半。送進牢裏就不挨鬥了。生活只吃窩窩頭，吃稀飯鹹菜，吃棒子麵的稀飯。其實粗糧對身體有好處，結果胃病反而也養好了。秦城的醫療條件依舊，衛生部的醫生給我們看病，把我被打斷的肋骨治好了。我自己埋頭讀書，做詩詞。我很堅定地相信，這樣一個風浪總得要過去。我們關了進去的時候，毛澤東還在，周恩來也還在，總相信這些正派還能夠挽回潮流，有這個信心。吃得不好，就自己想，我也沒有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比長征的苦總還好一點。二萬五千里長征，你窩窩頭吃不到，棒子麵也吃不到。思想的開朗使我有這麼長的壽。1963年我從秦城出來，1967年再進秦城，再關八年半就跟王維他們一起放出來了，跟起義的高級將領一起放出來，一共兩次是17年。

我第一次進去的時候，我的小女兒才九歲。我出來的時候，她已經三十多歲了。我關在裏頭他們都下放，孩子們個個都經過大風大浪。團裏頭給四五塊錢的生活費，考地質隊的，支邊的支邊。我坐牢不僅是因為潘漢年，還因為我嫁了一個開銀行的，還去了台灣，還因為他和我的弟弟妹妹有的去了台灣，有的去了美國。沒有11屆三中全會我這個人都沒有了。

1975年放出來，那個時候還沒有開11屆三中全會。我弟弟黃彰任在泰國開森美石油公司發了財，做了董事長，我還沒有平反就來看



我了，看我就見了中央首長了。我自己也在那裏打了四次報告，要求平反，到三中全會才給我平反了。我弟弟從泰國回來就見了外交部長黃華，就把我的兒子從新疆調回來，他們下放在新疆。所以我1980年平反，弟弟也有點關係，我們自己內部也審查清楚了。我是1980年平反回到上海當市政府參事，1981年當政協委員做了三屆，現在退下來了，參事還保留。我是終身制，參事都是三代元老的。國務院通過了，這批老參事是養到老了，一年少一個一年少一個，一共也沒幾個人了，這裏1920年代的還有多少？現在80歲以上的不去開會，一個月去一次，車子接車子送看病，我就只好養老了，我回來都已經75歲了。

章蘊是介紹我入黨的。她做武漢婦女部長，我做秘書，三個月之後就是我升部長了。我平反後，她最誠懇地跟我做自我批評了。她不是剛一解放到上海來做華東的婦聯的主任嗎？她說：「我們初到上海時，在饒漱石那個華東政治局好些人講了你很多流言蜚語，所以你1953年到北京來看我們，我就主動地跟你疏遠，那時沒有辦法。請你原諒了。後來等到我自己也受審查的時候，也是因為一些流言蜚語。」她也關了八年半。這時候章蘊同志是中央紀律委員會第二把手了，陳雲是第一把手。他們看見了我寫給紀律委員會的報告，就認為我應當徹底平反。那時候還只是給我一個參事，只是法律上平反，黨齡問題沒有解決。章蘊指示我，你寫一個詳細報告，哪年哪月周恩來指示你做什麼。她說，你不要把錯判的事情提出來，你只提你做的都是奉命的。我寫了一共16件，就叫我兒子給送去了。所以鄧穎超看見了，那個時候周恩來已經死了，那是1982年，周恩來已去世很久了。



中央好幾個部長以前都是我手下，但是我因為嫁給了陳志皋，他到台灣去了，從解放之後我就一落千丈，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恢復我過去的級別。我的黨齡現在恢復了，從1926年算起。這個是我打的報告給中央組織部講了。我是爭黨齡不爭待遇。我就覺得本來我是

互濟總會的部長，我本來就是中央的部長了，剛解放，因為陳志皋走了，只是給了我一個科長的位置，我都沒有爭過。饒漱石對陳志皋的排擠和對我的打擊，不肯恢復我的黨齡，不承認我是地下工作者，我是接受了，我一意要求工作。那個時候的事情誰也忍受不了的：公司破產、15件官司、四個孩子、愛人也走了，雖然他走了是請示的中央，中央同意他走，但是總是一個生離吧，自己又政治上受這麼大的打擊，我硬挺住了。就是覺得重新來過，沒關係。就想到宛希儼犧牲了，賀昌也犧牲了，現在既然勝利了，他們的心願都得償了，人民也滿足了。我個人的損失，何必講它的，個人犧牲了就犧牲了，無所謂。但是我總覺得我並沒有脫黨，周恩來答應了勝利了之後替我證明的，所以我1953年進北京的時候就是為了這個。

在小學我們就學男女平等，因為我們的校長請來的老師都是日本留學生，從小學就給我們灌輸，為什麼你們要讀書，讀了書要做社會上有用的人，要爭取能夠自立，能夠男女平等。到了周南更提高了。在五四運動就接受過反帝國主義、反封建教育的思想，接受了新文化的思想。等到婚變的時候，就自然促使我自己離開家庭去求獨立奮鬥，求自己的解放。求自己的解放之後，入了黨之後，再提高到求婦女解放，全世界人類的解放。如果我沒有五四運動接受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思想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我也不會對李家這麼不滿意。既然不滿意，回家來父母又還預備我考大學了，我也本來預備只是考大學，獨立謀生了。就是因為我的瀏陽的老師都是獨身主義的。

如果今天的婦女已經真正平等了，就不會有保障婦女兒童的法律了。革命不是恩賜的，還是要自己努力爭取的。當然，現在也有些婦女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列寧講的：「革命沒有婦女參加，是不可能勝利、不能夠成功的。」這句話是我們剛一參加革命就聽見他們宣傳上講的。婦女佔人類的半數，如果婦女不參加革命、婦女不覺悟，運動要成功、革命要勝利是不可能的，這是列寧的話。當然現在是有相當的進步，不能夠說沒有果實，還是果實纍纍的。你看我跟媽媽回娘家

的時候，我們瀏陽鄉下還是裹足的。我們北伐的時候，婦女運動第一個就是放足運動，湖北比湖南落後多了。我沒有包過腳，也沒有穿過耳朵。我六歲就上學了，因為我家裏開明。我就是經過了一次包辦婚姻的痛苦才出來，沒有這個經歷我也不會參加革命。

我在沒有參加革命之前自修了，我已經二十四史都讀過了，所以對於歷史的東西都很熟悉。我的思想是各方面都有的，孔孟的哲學也有的，道家釋家的哲學也有的，馬列主義的哲學也有的，現在來回顧，才能夠知道對立面的統一了，精神的到極點可以相通的。都是犧牲自己為人家，助人為樂。要研究哲學的經理，每一派都有它的意義獨到之處，我們只能是什麼？根據毛主席這個話，去其糟粕存其精華。我很小的時候，我爸爸教我讀孔夫子的書，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我問爸爸：「孔夫子沒有母親嗎？」「哎，不是的，母親很賢慧的。那你去讀《列女傳》，所有成大名的人，都是靠母教的，母教是最重要的。」我就是想，孔夫子不是母親生的嗎？怎麼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我小時候就有這種反抗的思想了，要是小學不學男女平等，我也不會問爸爸這個問題了。

我為了顧全大局受了25年的審查、17年的監禁，這苦頭誰吃得？但是想得開的是什麼？劉少奇、賀龍這些人的功勞比我還大，死得比我慘哪！但是下一代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我這十幾年做的事情就是替下一代做的事情。我已經寫了幾個版本的自傳，希望能傳下去。我又重新寫賀昌的傳，重新再寫宛希儼的傳，重新再給潘漢年他們證明，重新再給那些已經犧牲了、扣了帽子了、沒有平反的人證明。我二兒子對我說：「媽媽，你要是跟爸爸去了，不也做了烈士了，你還能夠有性命回來嗎？現在這樣也好啊，現在我們都大了，你也可以享福了。」他當然是安慰我了。作為我來講呢，我想：「如果那時組織上同意我去了，我做了『烈士』，不就是後一段的毀滅？」造化弄人哪。我父親不肯教我詩詞。他覺得自古以來才貌雙全的女人多半是紅顏薄命的，所以不要學這些東西為好。他只希望我皈依佛，福慧雙修。但

是，我喜歡寫詩和寫文章。問題是每當我寫作和回憶過去時，寫也要動感情，講也要動感情的，就是這個不好。但是，我又不能不寫。這是我全部的人生。我是不是一個英雄，自有歷史來評判。

## ■ 解讀

### ——現代木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運動之路

與之前的四位敘述者不同，黃定慧是一位共產黨員。她對訪談和自己沒出版的自傳極為關注，因為她要證明自己從1926年加入共產黨後一直都是黨員，理解這一點很重要。正是由於這份注重，她自覺將自己置於黨的話語之中。她寫了幾個版本的自傳：其中篇幅最長、也是最詳細的自傳是為黨寫的，因為這本自傳裏充滿了機密的內容，她認為如果曝露出來會對黨不利；中長篇幅的自傳是她做了口述錄音，再僱人轉錄成文字稿，這本自傳是為了出版而寫，給我看了；稍短篇幅的自傳完成於1987年，是為了引起出版商的興趣而列出的提綱。以詩歌形式寫成的簡短自傳是由她和賀昌的兒子於1990年完成。她的自傳中充滿了黨的語言，由於篇幅所限我不能在這裏完全呈現。除了我從她的自傳選取的一些內容外，這裏呈現的口述內容大部分都是基於我對她的採訪。在我看來，黃定慧的口述相比她的著作揭示了更具衝突的主體位置。在她的著作中，她努力構建一種單一的身分——一個忠誠不二的共產黨員，而這一身分是黨長期以來拒絕承認的。

由於黃定慧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因此她的經歷包含了許多複雜且秘密的故事。要破解一些謎團完全超過了我的能力範圍，因為我沒有途徑獲得黨的機密檔案。當然，我的首要目的也不是描述黃定慧在中共地下組織中的作用。讓我感到有點釋然的是，黃定慧要我隱去國共兩黨秘密鬥爭的故事，因為她擔心這些信息若洩露給國民黨還是會對共產黨不利。為了尊重她的意願而不是僅用她的口述迎合我的寫作需要，我刪除了這方面的不少內容。

需要說明的是，我和黃定慧的第一次訪談是在1993年3月22日，而後續訪談則是差不多兩年之後。1995年1月12日我再次見到她時，她躺在病床上，我幾乎認不出她了。她老得太快了，現在看起來倒是和實際年齡差不多。她瘦了很多，看起來更加矮小了。我唯一能辨別出來的是她的聲音。當她開始說話時，我也注意到了她內在的變化。她的敘述不再是單一的黨的語言，來自內心深處的其他聲音時不時出現。她變得更加內省。她對呈現一個黨的女英雄形象不再那麼執著，而更多地表達了對受到的不公對待感到不滿和委屈。訪談結束時，她告訴我第一次採訪後她家庭發生了一場可怕的悲劇，她解釋這導致了她巨大的變化。我意識到這場悲劇完全毀了她。如她自己所說：「我這一生經歷了這麼多的坎坷，到晚年再遭受這樣一個打擊，太大了！叫我怎麼受得了？！」黃定慧不希望公開她的家庭悲劇，我唯一能說的是，這場悲劇毀了她的健康，並從內心深處撼動了她。這個事件對訪談的影響是，她不再堅守單一的敘述語言，而是讓對自己人生矛盾衝突的看法浮現出來。<sup>38</sup>

儘管刪除了很多訪談內容，黃定慧的敘述仍然豐富而有意義。就本項研究而言，我主要聚焦以下幾個問題：第一，五四女權主義話語與早期共產黨婦女運動路線之間的關係；第二，國民革命時期婦女運動的支持者；第三，花木蘭對五四時期的婦女的意義；第四，從一名五四女性到一名共產黨員的轉變。

## 女權主義和國民革命

在解放後長期被關押期間，黃定慧一定經常審視自己的人生。在平反後寫幾個版本的自傳時，黃定慧經常思考這個問題，即「是什麼讓我成了一名共產黨員？」當我詢問她的人生故事時，她已經對我的大部分問題準備好了答案。她用生動的事例來闡釋她多姿多彩的人生，為了突出她漫長而曲折人生中的里程碑，她會強調一些關鍵事件，並分析她行為和選擇背後的內在邏輯或者動機。在採訪黃定慧的大部分時間裏，我都是一個入迷的聽眾，仔細聆聽她滔滔不絕的獨白。

黃定慧在最後一次訪談結束時強調：「如果我沒有五四運動接受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思想和男女平等的思想，我也不會對李家這麼不滿意。」她說：「我就是經過了一次包辦婚姻的痛苦才出來，沒有這個經歷我也不會參加革命。」這些直白的陳述清晰地提醒我們五四話語、女性的新主體性和新女性參加革命三者之間的關係。

12歲時，黃定慧參加了五四運動，雖然短暫但卻難以忘懷。她迅速接受了新思想，對她影響最深的人是周南女校的校長朱劍凡。就像陸禮華記得馬相伯的救國演講、陳詠聲記得徐特立抗議《二十一條》一樣，黃定慧還能複述七十多年前朱劍凡在課堂上的講話。朱劍凡的演講啟蒙了黃定慧，因為這是她第一次聽到有人把婦女解放與救國聯繫在一起。直到那時，她還沒有男女不平等的個人體驗。小學老師關於男女平等的言論對她沒有太深的影響。但是朱先生卻打開了她的眼界。婦女解放並不僅僅是不纏足或者不穿耳（黃定慧在這些方面已經解放了）。婦女解放需要婦女平等地參與創建一個新的強大國家。這個從小學起就崇拜花木蘭的女孩，肯定會為進入男人世界幹出一番大事的前景所觸動。

五四之後的學生運動為那些和黃定慧一樣的女孩提供了第一個機會，讓她們走出被呵護的生活，參與到公共事務中。反帝、反封建、男女平等這些主題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得年輕的愛國女學生帶著自信和自尊進入了公共空間。在這一過程中，年輕的女性參與者被五四話語所重塑。男女平等覺悟的提高和對一種獨立而有意義生活的憧憬，使得許多如黃定慧一樣的青年女子不能忍受包辦婚姻。

與朱素蓁、陳詠聲和王伊蔚不同，黃定慧最初接受了包辦婚姻，而後又選擇逃離這段婚姻關係。這種模式在她那一代很普遍，儘管對於一個年輕妻子來說，逃離夫家需要巨大的勇氣。幸運的是，對黃定慧和與她背景相似的婦女而言，革命為她們提供了一個避難所，黃定慧很容易就做出了加入革命的決定。在她遇到那些共產黨員的當天，她就決心加入他們，並馬上搬去和他們一起生活。儘管她有愛她的父母和舒適的家庭，但作為一個已婚女人，她已經不再屬於娘家了。從

這個意義上說，她幸運地在黨組織裏找到了一個新家，而組織很熱情地接受了這個逃離包辦婚姻的女子。

國民革命對像黃定慧這樣的女性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黃定慧1926年參加的國民革命是由國共第一次合作領導的。大革命承諾推翻中國的帝制、消滅軍閥、統一中國、建立民主社會。合作是基於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政策。共產國際派來的顧問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仿照蘇聯的組織結構，中央執行委員會下面設立了特別部門來處理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問題。1924年，許多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並和國民黨左派一起致力於動員廣東的工人、農民和婦女。1924年1月31日，中央執行委員會下的第一個婦女部設立，旨在推動婦女運動。此後，婦女部在國民黨組織的不同地方和不同層級紛紛設立。這是中國婦女運動體制化的開端。

國民革命中的婦女運動使得許多五四女權主義議題仍然保持了活力。1923年2月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失敗後，共產黨意識到在中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還為時尚早。<sup>39</sup> 與不同政治派別和階級聯合，似乎是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唯一可行路徑，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革命的第一階段。當共產黨設法與國民黨合作時，也開始致力於動員包括婦女在內的不同社會群體。

1923年6月，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一項婦女運動的決議。在此之前的決議強調了為無產階級婦女解放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重要性，而1923年的決議把婦女運動劃分為兩類：勞動婦女運動和一般的婦女運動。一般的婦女運動包括女權主義運動、參政運動和廢娼運動。決議強調了這些運動的重要性，並指出：

本黨女黨員應隨時隨地指導並聯合這種種運動，口號應是「全國婦女運動的大聯合」、「打破奴隸女子的舊禮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職業平等」、「女子應有遺產承繼權」、「男女社交自

由」、「結婚離婚自由」、「男女工資平等」、「母性保護」、「贊助勞動女同胞」。這些口號之外，還應加入「打倒軍閥」、「打倒外國帝國主義」兩個國民革命運動的口號，以引導佔國民半數的女子參加國民革命運動。至於我們指導此等運動的態度，亦宜注意：第一，不要輕視此等為小姐太太，或女政客們的運動；第二，階級的主義的色彩不要太驟太濃，至使她們望而生畏。<sup>40</sup>

這份決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1923年中國婦女運動形勢的清醒判斷。五四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在城市的各種婦女組織中很有影響力，正是婦女權利和現實利益把不同群體的婦女吸引到婦女運動中來。雖然共產黨宣稱是以廢除私有制為基本目標，為婦女解放而奮鬥，但馬克思主義路線當時很少有婦女追隨者。1924年中國共產黨婦女部的一份報告估計，當時全國範圍內只有二十名女共產黨員和四十多名女共青團員。為了吸引婦女追隨者，「引導」各種婦女運動朝著「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路線前進，共產黨不得不採納當時的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議題，畢竟當時共產黨的大部分活動都以城市為基礎。<sup>41</sup>

那些加入了共產黨或者國民黨的五四女權主義者也支持了國民革命中的女權主義議題。鄧穎超或許就是解釋這一點的最好例證。鄧穎超（出生於1904年）是五四運動時期天津著名的學生積極分子。16歲時她就有「滿腔的愛國熱情，為了救國、為了民族的獨立、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封建勢力，有勇於犧牲一切，在所不計的革命精神」。<sup>42</sup>和許多其他五四積極分子一樣，鄧穎超也了解她那個時代多種多樣、有時還相互衝突的話語。除了在愛國運動中的活動外，鄧穎超還在推動天津女權主義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她也因此名聲在外。1922年8月女權運動同盟會在北京成立之後，鄧穎超和她的朋友們於1922年11月成立了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12月，鄧穎超被推選為支部的四位代表之一，向北京的北洋政府遞交了女權請願書。請願書包括了七項要求，這也是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中廣為宣傳的內容：



1. 全國教育機關，一概為婦女開放；
2. 女子與男子平等的享有憲法上人民應享的權利；
3. 私法上的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承繼權、財產權、行為權等，一依男女平等的原則，大加修正；
4. 制定男女平等的婚姻法；
5. 刑法上加入「同意年齡」，及「納妾者以重婚罪論」的規定；
6. 禁止公娼、禁止賣婢女、禁止婦女纏足；
7. 依「同工同酬」及「保護母性」的原則，制定保護女工法。<sup>43</sup>

鄧穎超當時的女權主義立場在她的文章〈姐妹們起喲！〉中表達得最清楚。她親眼見證了她的一個密友在一樁包辦婚姻中悲慘死去，這使她比以往更堅定地與舊制度作鬥爭。在直隸支部刊物上刊登的這篇文章裏，鄧穎超號召婦女們起來反抗壓迫。她的分析和觀點充滿了當時流行的女權主義寫作所使用的修辭。她強調了兩個主題——婦女作為一個「人」的權利和新的性道德：

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的文化、歷史、制度、習慣、法律上，概不承認女子是一個「人」，視女子為玩物，為奴隸。……

我們住在人類謀解放的二十世紀，我們首先要承認自己是一個「人」……對於舊禮教下產生出來蔑視女子人格、剝奪人權的婚姻制度，我們當首先的下攻擊令，不能再容彼存在，遺毒人間了。……

愛倫凱女士曾說：「結婚應以戀愛為中心的，有戀愛的結婚，是道德的；無戀愛的結婚，無論法律上的手續怎樣完備，也是不道德的。」……

已結婚的姊妹們！倘若你和對手方面不是戀愛的結合，且現在已經發生不滿意、不融合、不能再繼續雙方關係的情形，我很希望你們不要猶疑隱忍……要勇敢，決然的提出離婚，跳出賣淫的生活，打破舊禮教所謂的「偽貞操」！……

親愛的姊妹們！起喲！勇敢地起來，作一個真獨立的「人」吧！<sup>44</sup>

鄧穎超1924年1月加入了共青團，一年後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在這一階段，對於鄧穎超來說，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意味著就要壓制女權主義議題。相反，馬克思主義讓鄧穎超和其他共產黨女權主義者更加關注無產階級婦女的困境，也為她們提供了一種把私有制作為婦女受壓迫根源的分析。她們的共產主義目標是要推翻現存政治經濟制度，她們的女權主義努力是要喚醒姐妹們，去反抗婦女在社會生活和私人生活領域各方面受到的壓迫，這二者並不矛盾。在這個時期，鄧穎超和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的朋友們組織了名為女星社的婦女研究團體，出版了一本女權主義期刊《女星》和一份《婦女日報》，以此推動婦女運動。鄧穎超還在天津婦女國民會議促進會中擔任領袖角色。<sup>45</sup>

1925年五卅事件後，鄧穎超和其他共產黨員一樣，積極推動公眾情緒轉移到國族主義熱情和國民革命上來。在1925年7月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的演講中，她強調現在的婦女運動應該關注四點：「（一）拋開向來偏重職業、參政、婚姻等局部運動；（二）參加民族獨立運動；（三）努力宣傳工農婦女之團結；（四）全國婦女應有嚴密之組織」。<sup>46</sup>這四點反映了共產黨迫切需要動員大眾來參加國民革命，也揭示了鄧穎超自覺與黨的路線保持一致。

根據共產黨的分析，婦女的局部運動不能在當時的政治經濟制度中取勝。只有推翻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革命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婦女受壓迫的問題。因此，婦女積極分子應該首先投身於國族主義和階級鬥爭。在黨動員婦女參與國民革命的努力中，或者應該是說，在黨與女權主義組織爭奪支持者的努力中，「排斥」女權主義的實踐開始了。在婦女集會上，在為婦女雜誌撰寫的文章中，女共產黨員在狹義的女權運動和與國民革命聯繫在一起的婦女解放運動之間畫出了一道界線。著名的共產黨婦女運動領導人向警予與鄧穎超有著同樣的政治任務，她警告上海的女權主義者們不要「只爭女權

不管中國民族的生死存亡」。<sup>47</sup> 她論述道：「女權運動絕對不能離開民權運動（國民革命）而獨立……所以我們要爭回女權，只有在普遍的民權運動裏面去爭。」<sup>48</sup> 根據這種論述的思路，對婦女權利或者女權主義的爭取，因其與民族利益的分離而受到批判。這種批判偏離了新文化對女權主義的定義，在新文化的定義中，婦女對平等權利和獨立人格的追求是復興民族的關鍵。由於共產黨界定的「狹隘的女權主義」剝離掉了國族主義的內涵，致使「女權主義」一詞很快在中共的政治話語中喪失了合法性。

然而，由於女共產黨員參與了各種婦女組織，因此共產黨也意識到忽略婦女現實利益的革命動員不會成功。這一階段共產黨的決議、報告和宣言都強調考慮各種不同婦女需求的重要性。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最清晰地證明了這種認知：

（二）婦女運動之方針，領導婦女參加國民革命外，同時尤應注意婦女本身的解放。……

（九）應督促國民政府從速依據黨綱對內政策第十二條「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定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之規定，實施下列各項：

甲、法律方面

- 一、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 二、規定女子有財產繼承權；
- 三、從嚴禁止買賣人口；
- 四、根據結婚離婚絕對自由的原則，制定婚姻法；
- 五、保護被壓迫而逃婚的婦女；
- 六、根據同工同酬、保護母性及童工的原則，制定婦女勞動法。

乙、行政方面

- 一、切實提高女子教育；
- 二、注意農工婦女教育；

三、開放各行政機關，容納女子充當職員；

四、各職業機關開放；

五、籌設兒童寄託所。<sup>49</sup>

這一決議包括了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中提出的所有需求，這表明了五四女權主義話語的影響力。<sup>50</sup>更說明問題的是，負責提交這份決議的委員會是由宋慶齡、何香凝這兩位著名的資深女國民黨員和鄧穎超這位已經靠自己贏得名聲的年輕女共產黨員組成。<sup>51</sup>這三位婦女都主張把國民革命放在首位，同時又對婦女命運保持著深深的關切。三個人中，鄧穎超是唯一參加過五四女權運動的人。

國民革命吸收許多五四主題並不讓人意外。在國民革命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不僅有如陳獨秀、郭沫若、沈雁冰這些新文化人士，還有如毛澤東、周恩來這些曾是五四學生運動積極分子的政治新星。共產黨的成立就是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普遍傳播的結果。對於五四時期的許多文化批判者和女權倡導者來說，國共聯合以及興起的國民革命為實現他們的新文化夢想指出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因此，國民革命的中心——開始在廣州，後來在武漢——迅速聚集了一大批五四時期以及辛亥革命時期的名人。國民黨這個領導主體成了一個包容性政黨，裏面容納了形形色色的革命者。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國民革命的焦點都是五四國族主義的延伸和深化。只要是在兩黨合作領導下追求的那些五四女權主義議題，那就不是「狹隘的」，也無損於民族利益。相反，這些議題成為動員城市各種婦女群體的號召力。對於追隨政治潮流的五四女權主義者來說，這一階段婦女運動最顯著的發展——除了聯合農工婦女這一新著力點外——是黨派著力控制各種婦女組織。追隨蘇聯的模式，國共兩黨都迫切想要把整個國家（包括婦女組織）納入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合作破裂後，兩黨繼續實行這種組織原則。總之，作為國共合作推動女權主義議題的結果，國民革命見證了中國女權運動的快速發展，這是一場基於國族主義議程的兩黨「領導」的婦女運動。更為重要的是，黨領導

的婦女運動採用了「婦女解放運動」一詞，以區別於「女權運動」。這兩個詞後來在中共的話語中相互對立。

## 女積極分子的性別煩惱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成了整個國民革命期間婦女運動的藍圖。許多女國民黨員和女共產黨員熱情高漲地在各個層級的婦女部門工作。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積極分子加入進來（其中許多加入了國民黨，因為國民黨在革命中居於領導地位，而且其創建者孫中山德高望重），越來越多的婦女（工人、學生、主婦和農民）被吸引到婦女運動中。黃定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登上了大革命的舞台。

把上述藍圖印入腦海，我們就很容易想像黃定慧在第一次遇到這些共產黨員時的激動心情。他們並沒有瞧不起這位逃離不幸包辦婚姻的女人。相反，他們熱情地接納了她，並推動著她迅速地成為武漢婦女運動的領導者。她負責了許多活動，如給婦女放足、剪髮、關閉妓院、培訓以前的娼妓、幫助受虐待的妻子和婢女、為不識字的婦女開掃盲班，等等。也許她做的最多的是在各種集會上發表演講。她的記憶力非常好，聽過一遍黨領導的講話之後，她就能忠實而有效地將之傳達給大眾。在那個時代，收音機還沒有在大眾中普及，大部分人又都是文盲，黃定慧的演講才能、宣傳共產黨路線的能力顯得尤為重要。毫無疑問，她從事革命宣傳的能力極大地提高了她的影響力。此外，她還有宏亮的嗓音。當宋慶齡在武漢的一個盛大集會上演講時，黃定慧就當了她的擴音器：宋慶齡每說一句話，黃定慧就大聲重複一句，以便聽眾就能聽清楚。毫不奇怪，這樣一個年輕女性不僅在話劇中，還在眾多重要場合中扮演了主要角色。1927年的婦女節，不到20歲的黃定慧在20多萬人參加的慶典擔任主席。<sup>52</sup>

雖然黃定慧迅速成為名人顯得有些不尋常，但她在許多具有相似背景參加革命的年輕婦女中具有代表性。決議第五條確保了革命是那些逃離壓迫婚姻的婦女的避風港。儘管五四女權主義為年輕男女提

供了一條抵抗或者擺脫包辦婚姻的合法路徑，然而革命卻為這些反叛者提供了一個物質基地。在柯臨清對國民革命的女共產黨員的研究中，她強調性別議題在婦女加入共產黨的決定中具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對於那些挑戰了傳統性別關係，並提供了可選擇的行為榜樣的婦女來說，共產黨更像是一個亞文化群體 (subculture) 而不是一個政治機構。最重要的是，共產黨輕而易舉就促成了她們努力反抗家庭對婚姻的控制，也讓她們定義了新的社會秩序，如婚姻自由。」<sup>53</sup> 婦女逃婚參加革命的現象在當時的媒體上也有記錄。1927年6月3日的《民國日報》報道：「湖北自有婦女協會之組織以來，會員發達，已在四萬之上。其中為本身利益要求離婚者亦非少數，據調查所得，此項婦女以中產階級為最多，小資產階級次之，農工階級為最少。」<sup>54</sup>

頗有意思的是，武漢的婦女培訓班中，「對婦女主義的批評」被列為一個演講主題。<sup>55</sup> 據黃定慧說：「反對婦女主義主要是反對婦女的獨身主義。」她強調：「那時在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同時，有好些工作能力很強的婦女產生驕傲自滿情緒，只講婦女解放自己，而看不起男同志。這些婦女都經歷過不幸婚姻，就主張獨身主義。獨身主義是那個時候的一個傾向。」由於這是黃定慧指出的女革命者群體中的唯一問題，因此有可能受到「婦女主義」影響的婦女比例非常大。

通過研究各種文本對「婦女主義」的不同定義，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這個詞語背後的意義。楊之華是共產黨婦女運動的領導人，也是瞿秋白的妻子，她1926年對中國婦女運動進行了分析：

至五四運動以後……發生一種婦女主義的婦女運動，主張這種婦女解放的工作可以不參加政治運動及一切社會運動而實現，即婦女運動的對象就是男子。……

婦女參加政治運動的問題，已惹起一部分婦女運動者的反對，以為婦女既入了政治的漩渦，一定被政治所利用，不肯誠心去做婦女運動為婦女謀利益了；更以為援助女工罷工等事是有赤

化嫌疑。她們常以這種論調來避免許多應做的工作，而且使婦女運動更加分裂。其實做婦女運動的人專以兩性鬥爭的眼光來看，未免太狹小了，並且是錯誤的。<sup>56</sup>

根據楊之華對「婦女主義」的定義，那些加入國民革命的婦女不應該被叫做婦女主義者。但是，宛希儼這樣的共產黨男領導人卻擴展了她的論點，把那些不想結婚的女革命者也歸入了「婦女主義」。楊之華認為只把焦點集中在性別鬥爭是錯誤的，而宛希儼則在演講中強調，甚至在革命者陣營中意識到性別衝突都是錯誤的。我們不清楚這些婦女做出逃婚的決定，是由於其與男人的痛苦經歷還是由於受「婦女主義」的影響，抑或二者兼有。但是很明顯，黨的男性領導者對性別議題非常敏感，對「婦女主義」的趨勢迅速做出反應。宛希儼的演講標誌著共產黨男性領導人在革命內部壓制任何有關性別衝突認知的表達的最早努力。

國民政府婦女部組織的婦女協會在湖北迅速擴大。根據省婦女部部長1927年6月27日所做的一份報告，婦女協會的會員在革命軍抵達後由二千人增加到六萬人。這個數據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婦女運動的迅猛發展是很明顯的。在同樣的場合，其他的女性領導人討論了婦女運動存在的問題，尤其指出農村婦女經常對婦女運動心存疑慮。當時成員增長的數量絕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婦女。<sup>57</sup>

1927年6月21日，湖北農民協會關於農村婦女的決議規定，一是不同層級的農民協會要建立婦女部；二是農村婦女要加入農民協會；三禁止在農村強迫婦女剪髮，禁止宣傳絕對的結婚離婚自由；四是婦女部要調查農村婦女的生活狀況，以便了解她們的需求。<sup>58</sup>

顯然，農村婦女還沒有被動員起來。而且，在城市婦女中很有影響的離婚自由問題，卻在湖北農民中引起敵意的反應。雖然並不清楚農村婦女對離婚自由有何反應，但是決議看起來表明了婚姻自由並不是農村婦女最迫切的需求。由於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是以城市為基礎，黨員大部分都是城市裏受過教育的男女，因此對農村生活缺乏清

晰的認識。湖北決議表明，黨已經意識到需要把農村納入婦女運動的議程。

然而，國民革命中的婦女運動成功吸引了許多女工參加。早期的共產黨員和左翼國族主義者們，由於受以歐洲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影響，他們尤其關注不斷擴大的中國無產階級。通過如楊之華這樣的女黨員與工廠工人的緊密接觸，共產黨能夠了解女工的特殊需求。在國民革命中，共產黨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帶薪休產假以及其他保護性立法。共產黨也在支持外資工廠的女工罷工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比如引起黃定慧關注的武漢煙廠的工人罷工。雖然民國政府時期婦女的工作條件得到了怎樣的改善尚不清楚，還是有文獻表明女工參與了武漢的婦女運動。下面的這則消息或許就是例證：

（漢口十四日路透社電）被解放婦人之丈夫本日在總工會門前舉行示威活動，高呼「打倒婦協會！」參加此項運動者多半為勞工。彼等云：自國民黨到此以來，宣傳婦女自由、戀愛自由及婦女解放等故，彼等之妻不再回家住宿，徹夜在外流連忘返。彼等確認，因此種新解放而彼等之家庭被毀壞，故要求該妻及諸婦女恢復舊日習慣。<sup>59</sup>

這些丈夫沒有明確說明他們的妻子在「外面」做什麼。不過，女工確實因為要參加運動而在外面待到很晚，顯然這足以引起她們的丈夫或未婚夫的擔心。<sup>60</sup> 歷史文獻顯示武漢的女工積極響應放足的號召，並且對夜校充滿了熱情。雖然結婚和離婚自由讓她們的丈夫很緊張，但之前的調查表明只有小部分女工提出離婚。可能大部分女工加入婦女協會是因為她們關心的其他問題。湖北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的決議就提出了女工關心的兩個問題：「男女工人聯合起來」和「女工應該參加工會工作，男工不應該輕視女工」。顯然，在保護性立法之外，工人階級內部的性別歧視問題也是婦女運動中女工討論的話題。<sup>61</sup>



## 木蘭英雄主義

黃定慧一加入革命，就把名字改為「慕蘭」，意思就是「仰慕花木蘭」。她承認她把自己視為一個傳奇女英雄。這場革命使得黃定慧能夠沿著童年時期榜樣的足跡前行。對於那一代的許多婦女活動家來說，在她們聽說到男女平等這個詞之前，花木蘭對她們的影響至深至遠。在許多例子中，正是花木蘭的主體位置最早激發她們去追尋一種英雄的生活。婦女運動的第一位共產黨員領導人向警予的人生就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sup>62</sup>

向警予1895年出生於湖南的一個商人家庭。從她五歲開始，她父親和哥哥們就教她識字。兩年時間裏，她就能閱讀古文了。她喜歡歷史，她父親和哥哥們給她講的故事中，她最喜歡「木蘭從軍」。在父親和哥哥們的指導下，她學會了背誦《木蘭辭》。向警予經常把鄰居家的一群小女孩召集到河邊，一起大聲背誦《木蘭辭》。據說，從孩童時開始，她就「有效花木蘭發奮圖強的雄心」。<sup>63</sup>

據向警予的丈夫蔡和森回憶，向警予在小學時各科成績都很優秀。在學校和縣裏的比賽中，她總是名列第一，「文武雙全」。「在這種社會的獎勵空氣之下，愈加把這個新式的活潑可愛的小女孩子興奮起來，於是她自早到晚想做『天下第一偉人』，睡夢中都是這樣的想著。」蔡和森回憶到：「〔她〕唯一的欲望只是要她能幹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她每每自己這樣奮激的幻想：『將來我如做不出大事業，我要把自己粉碎起來，燒成灰！』她每每這樣激烈的幻想便要大哭一場。」<sup>64</sup>

向警予先後就讀於常德女子師範學校、周南女校和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後來，她返回家鄉，自己開辦了一所女校。五四運動時期，她發表了許多公開的愛國演講。1919年末她加入了湖南學生「勤工儉學會」，和蔡和森及他的家人一起去法國。蔡和森是一位年輕的共產主義追隨者，也是毛澤東的好友，他們在前往法國的旅途中，向警予和蔡和森多次談話後，放棄了「教育救國」和獨身主義的信念。她成了一名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並於1920年5月和蔡和森結了婚。

向警予在1922年初回國，在上海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很快參與到黨的婦女工作之中。事實上，向警予是早期中國共產黨婦女運動路線最重要的理論家和宣傳家。她寫了許多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文章，採用了階級分析的方法，表達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懷。在把上海女權主義者的熱情引導到國民革命中來，以及構想一場由中共領導的統一的婦女運動方面，她都發揮了領導者的角色。<sup>65</sup>

雖然向警予在中共婦女運動中的領導地位得到充分認可和高度評價，但她丈夫卻注意到她自己「總是不甘於『婦女的』工作」。蔡和森透露，向警予經常感受到黨內存在的無形壓迫：「以為女同志的能力不如男同志，在她看來，仿佛是『奇恥大辱』。同志們愈說她是女同志中的最好的一個，她便愈不滿足。」蔡和森承認，以向警予的能力，能夠勝任黨的一般性指導工作，而黨卻給她分派了婦女工作，這反而表明了黨組織工作的「缺點」。事實上，在共產黨發展的早期階段，女共產黨員只是被安排做「婦女工作」，負責動員婦女。向警予這樣一個自孩提時代開始就夢想在男人世界中幹出一番大事業的人，卻被迫在黨內面對著性別的隔離。把她與「婦女工作」等同起來，這也就意味著她在黨內的從屬地位，遠離了黨的權力中心。<sup>66</sup>

但向警予想成為英雄的梦想最終還是實現了。在莫斯科學習了一年多後，向警予1927年回到武漢。她先領導了女工運動，隨後被任命為漢口宣傳部部長。國共合作破裂後，向警予仍然留在武漢從事地下工作。她是共產黨一份地下刊物的主編。國民黨在清理武漢的共產黨組織時，向警予於1928年3月在法租界被捕。在她被押往國民黨武漢司令部的途中，數千群眾聚集在街上為她送行。她一路上都在發表演講，大聲喊著革命口號。1928年5月1日，她被國民黨殺害。向警予的英勇就義以及她在中共領導的婦女運動理論化方面發揮的主導作用，使她成為中共歷史上一位共產主義女英雄。

對於出生於19至20世紀之交的中國婦女來說，木蘭主體位置的意義是複雜的。英雄主義是鼓舞人心的。向警予為成為女英雄而奮

鬥，度過短暫而英勇的一生。黃定慧甚至到老年時期還為沒有機會成為烈士而遺憾，而她的兩任前夫都成了烈士。她也擔心她那漫長而複雜的一生是否能讓她成為後人眼中的巾幗英雄。大量史料表明，英雄主義的強烈吸引力跨越了政治傾向和階級或地域的差別。歷史學家沒有深入研究如何從心理學上解釋某些女孩更加容易接受英雄主義，目前能證明的是，在實際意義上，正是英雄的榜樣動員了這一代群星璀璨的特定的女英雄群體。

木蘭英雄主義在那個歷史節點上有著特定的內涵。它包含了婦女為了國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雙重奮鬥。反對列強、反封建和男女平等在清末就進入了中國人的話語中，並且在五四運動後成了主導性話語。女英雄的產生不可能脫離這一背景。把一個現代女性造就成女英雄的，是她能與男人一起，為了國家的獨立和富強而奮鬥。在五四時期後的左翼話語中，女權主義主要被理解為參與到國族鬥爭和公共領域的「婦女權利」。如果婦女只是堅持追求婦女的利益，她們就是「狹隘的女權主義者」或者「婦女主義者」。她們或許在公共領域為了婦女利益而英勇奮鬥，但在20世紀初木蘭英雄主義的話語中，她們不會被認可為女英雄。

與「婦女主義者」不同，現代木蘭認為通過為國族利益而奮鬥，她們自身的利益就能最大程度地實現。向警予在多篇文章中把這一路線作為中國婦女解放的路線並進行了理論上的闡釋。她的主要觀點是「在中國民族未達到自由平等以前，婦女絕對不會單獨達到自由平等的」。<sup>67</sup> 因此，國家獨立是婦女解放的前提條件。但是，並不是所有加入革命的婦女都相信這一婦女解放理論。黃定慧坦率地承認，她加入革命是為了自我解放。在她的個案中，政治參與能夠立即讓她擺脫不幸的家庭生活。然而革命並不只是給她提供一個避風港。更為重要的是，這讓她更接近兒時就想成為木蘭那樣的女英雄的夢想。

即使木蘭的主體位置帶有強烈的國族主義色彩，但它在中共話語中也並非絕對沒有問題。她還記得宛希儼教她的話，「我們共產黨

人相信集體主義」、「我們要去個人英雄主義」。古代女扮男裝的木蘭可以晉升為軍隊中的將領，但是現代木蘭卻被看作男人世界裏的女人。同志們說向警予是女同志中最優秀的，她感到很沮喪。如果她沒有犧牲，她在黨內能夠多大程度實現其遠大抱負呢？在黃定慧和許多其他女黨員的案例中，這樣的模式一直在持續。不管她們年輕時有多麼遠大的抱負，她們都在集體主義的話語中被重構：在共產主義這項集體事業中，個人利益要無條件服從黨和革命的需要。否則，她們將會被視為危險的個人主義者和資產階級。集體主義原則對男女都適用。問題是黨和革命總是號召婦女做一些從屬工作，而不是發揮領導作用。

木蘭的主體位置對於如黃定慧這樣的現代木蘭們來說是矛盾的。她們對中共對待她們的方式感到不滿，同時又為自己所做的犧牲感到寬慰。採訪中，黃定慧多次表達了對黨對待她的方式感到不滿。她的兩任前夫都被黨歌頌為共產主義英雄，但她按照黨的指示去做地下工作後，卻因此遭受了兩次牢獄之災，經歷了失去愛人和孩子的痛苦，她的貢獻還不被承認，更不用說被看作英雄了。更糟的是，黨甚至質疑她的黨齡。這樣，她兒時想當花木蘭般傳奇女子的夢想，終究沒能實現。不過，她在某種意義上感到自己比木蘭要優秀，因為木蘭是忠於統治者且代替父親遭受困苦，而她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是對黨忠誠，為了革命和人民而奉獻自己。願意犧牲自己的忠誠和魄力是木蘭的重要品質。以木蘭為榜樣的現代女英雄繼承了這些品質。在承受了人生中的巨痛後，黃定慧仍然堅定地為自己擁有這樣的品質而自豪。

## 塑造女共產黨員

在對黃定慧長時間的採訪中，她很少使用「獨立」這個詞，這一點很重要。當她使用這個詞時，這個詞也別有深意。在訪談快結束時，黃定慧以回溯過去的心情說道：

在五四運動就接受過反帝國主義、反封建教育的思想，接受了新文化的思想。等到遭到婚變的時候，就自然促使我自己離開家庭去求獨立奮鬥，求自己的解放。求自己的解放之後，入了黨之後，再提高到求婦女解放，全世界人類的解放。……我也本來預備只是考大學，獨立謀生了。就是因為我的瀏陽的老師都是獨身主義的。

這一陳述表達了幾層意思。由於有小學老師的榜樣，黃定慧一直都知道婦女可以選擇過一種獨立生活。五四話語讓這種獨立生活的預期不僅可行而且令人嚮往。和其他受過教育的五四一代青年女子一樣，黃定慧也渴望通過高等教育過上一種獨立生活，通過前面四位敘述者我們對這樣的故事已經很熟悉了。黃定慧提到這種選擇是一種自我解放之路，從而證實了五四自由主義女權主義話語的影響，以及那代女子過獨立生活的可能性。

如果黃定慧上了大學而不是加入了革命陣營，她的人生故事可能會有巨大的差別。這種想法或許多次出現在黃定慧的腦海裏。當她向我透露大約七十年前的打算時，她其實正在回顧她人生中本可以做出的其他可能選擇。但考慮到自己的特殊情況，她拒絕了其他可能的選項。她是一個不幸婚姻的逃婚者。雖然高等教育的機會向她招手，但她不確定學校和社會的其他人會如何對待她。而共產黨熱情地接納了她，並給她提供了一個溫暖的避風港，讓她觸手可及。加入革命，也就是進入一個激進的亞文化群體，這是當時她能做出的最好選擇。結果，她繞開了自我解放之路。因此，在與她的長時間交談中和她的自傳中，她從不用「獨立人格」這個五四女權主義的詞語。

一旦參加了革命，黃定慧就迅速熟悉了中共的話語。解放後她的長期牢獄之災也沒有將她年輕時接受的黨的教誨抹去。相反，她對證實自己老黨員身分的高度重視，保證了黨在她的意識中居於主導地位。從這樣的主體位置出發，她把想要成為傳奇女英雄的梦想看做是「個人主義的」，並且感激黨把她的覺悟提高到解放婦女和全人類的高

度。她感到幸運的是她「正好當時在武漢，正好在那個偉大的時代，真是翻天覆地的」。雖然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令她遭受了巨大的磨難，但共產黨員的身分卻在大部分歲月裏給予了她正面的感受和自尊。當所有的苦難和犧牲被當作人類解放事業所付出的代價的一部分時，她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有意義的。

但是，有幾次黨也讓黃定慧覺得疏離了。第一次危機是她被黨內男性領導人饒漱石污蔑。饒漱石說她與賀昌結婚是為了攀高枝。對於一個驕傲的現代木蘭來說，這是惡毒的侮辱。她想不通「為什麼女同志出來參加了革命，還要忍受男同志的這種侮辱呢？」她企圖自殺的部分原因是反抗黨內的這種不公，還有部分是出於對丟失了黨的機密筆記本會受到懲罰的恐懼。

提到這件事，黃定慧強調黨的領導人周恩來給她上了一課，教她如何做一個忠誠而堅強的共產黨人——從那以後她一直記得這次談話。另一方面，由於饒漱石在拒絕承認黃定慧黨籍上扮演了主角，黃定慧揭露這件事也為解釋饒漱石的報復行為提供了背景。在訪談和黃定慧的自傳中，黨的原則永遠是第一位。她在敘述中小心翼翼，以免玷污了黨的光輝形象。即便如此，這次自殺未遂事件還是讓我們窺見了一個年輕女黨員的極度抑鬱和孤獨。她沒有語言來表述黨內的性別政治。她只知道，自己所面對的和她夢想中的共產黨革命不一樣。這項偉大事業不再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在自殺被救後，黃定慧想到過回家。這是她生命中又一次需要做出重要選擇的關鍵時刻。但她再次決定留在黨內，沒有什麼選擇比這更好：「都是因為這樁包辦婚姻，我才不管出了什麼事還是要跟著黨。」黃定慧以悲傷和無奈的表情總結了她的自殺故事。<sup>68</sup>

第二次危機是黨決定把黃定慧的第三任丈夫賀昌派到井岡山。當時黃定慧才入黨沒幾年，已經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她的第二任丈夫在戰爭中死去。為了革命，她的兩個孩子也被送走了。現在，她不得不又一次面對生離死別——這次是和第三任丈夫分離，顯然她愛著他。她再也受不了了，在賀昌面前抗議：「兩個孩子你們都丟開了，又要

叫我分離。我不肯！怎麼樣都不肯！」她反對黨的決定，「哭了三天三夜」。黃定慧再也不能讓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保持一致了。她把黨稱為「你們」。

但反抗是徒勞的。賀昌用中共的話語壓制了黃定慧的個人意志。黨的需要使得對個人利益的剝奪合法化了。個人在黨內是無足輕重的，他或者她都是黨利用的工具。雖然完全服從的原則對男女都同樣適用，黃定慧和她丈夫都遭受這種離別之痛，但黃定慧的這種痛苦更加深刻。她是一個「仍然有很強烈封建思想」的女人。在她的家鄉，一個結過兩次婚的女人是會被族人沉潭的。她的三次婚姻給她心理上帶來了沉重的負擔。現在，她對保住第三次婚姻也無能為力了。那時她才24歲。她的未來會如何？還會結第四次婚嗎？或者必須永遠保持單身？即使她不去想將來的事情，眼前的現實是她必須忍受失去另一個心愛的人。

黃定慧的案例詮釋了許多女共產黨員的命運。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使共產黨成了一個非法的逃亡組織。除了小範圍的紅色根據地，在國統區公開動員婦女已經不可能，黨放棄了女權主義議題而為了生存作殊死鬥爭。整個婦女群體在黨內成了不顯眼的存在。像黃定慧這樣起初被社會性別議題吸引到黨內的女黨員，現在不得不放棄她們為了婦女解放的努力。

此外，女黨員為了滿足黨的新要求經歷了劇烈的改造。她們不再聚集在「婦女工作」這個性別隔離的領域裏，而是被要求做剪斷家庭紐帶和責任的無性別的革命者。如果女黨員能像傳奇木蘭那樣整個軍旅生涯不結婚，那麼對她們來說滿足新要求就會容易一些。然而，由於「批判婦女主義」和黨內的性別比，能保持單身的女共產黨員為數很少。儘管事實上大部分女黨員都有丈夫和孩子，但她們被要求不能把自己看作是妻子或母親，而只是共產主義革命者。她們對家庭親人的愛要服從於對黨的愛，否則她們就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正如黃定慧的故事所揭示的，把婦女縮減成無性別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是個創傷性的悲劇過程。

黃定慧終究還是被改造了。與賀昌和周恩來等男領導人反復談話鞏固了共產黨員主體位置的主導地位。這也是為什麼黃定慧強調她所經歷的「思想工作」在關鍵時刻的重要性。每一輪的「思想工作」支撐著她渡過了一段艱難時期。這些「思想工作」累積起來，為黃定慧提供了黨的意識形態的規範，界定和構建了她的身分認同。日後她被黨關押遭受了長期折磨，到了晚年她依然用黨的話語來界定自己的身分。不過，她已經不單單是一個共產黨員了，「我的思想是各方面都有的，孔孟的哲學也有的，道家釋家的哲學也有的，馬列主義的哲學也有的」。訪談結束時的這句話顯示了黃定慧開始調和自己一生的內心衝突。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她一生都在艱苦戰鬥。現在，她需要在「對立統一規律」中尋求內心的平靜。1990年代中國的政治氛圍發生了變化，她的家庭又遭受了悲劇，這些變化都削弱了黨的話語在她思想中的主導地位。她不再壓制內心的其他聲音，開始有哲理地回顧自己的人生。

我最後一次採訪黃定慧是在一所高幹療養院裏，她在康復中，看上去很虛弱，但還是接受了我的採訪。在我們的談話中間，她從書桌抽屜裏拿出了一份厚厚的手稿。這是她錄音自傳的部分文字轉錄稿。她聘了幾個大學生來做錄音的文字轉錄工作。她對這些稿子的質量不滿意，因為青年的大學生對許多歷史事件和人物都缺乏知識，而且經常寫錯別字。她拖著病體，在醫院裏修改這些手抄本。兩年前我第一次採訪她時，她告訴我她已經寫了幾個版本的自傳，我理解她的努力是要贏得黨對她黨齡的承認。但是既然黨隨後認可她的黨齡從1926年算起，那又是什麼驅使著她執意要講自己的故事呢？

黃定慧厚厚的、仔細審校的手稿讓我想起了王伊蔚和她的墓碑。這些參與創造歷史的婦女既不願放棄對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的追溯和肯定，也不願放棄呈現自己所經歷過的歷史的努力。用黃定慧的話來說，「我是不是一個英雄，自有歷史來評判。」最高裁判是「歷史」而不是黨。黃定慧決心盡自己所能來塑造這段歷史。歸根結底，黨的主導權遠不能壓制住忠誠的黨員黃定慧去表達自我的主體性，這一主體性



早就被五四時期中國的知識話語中佔主導地位的木蘭—新女性主體位置所形塑。

## 注釋

- 1 以下敘述是根據1993年3月22日、1995年1月12至13日的訪談錄音，以及黃定慧的自傳寫成，並非英文版的直接翻譯，讀者可能會注意到書面語和口語不同風格的並存。2004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了《黃慕蘭自傳》，其主線與基調和黃定慧早年給我看的自傳手稿相同，但包括了更詳實的地下工作活動經歷，值得細讀。
- 2 譚嗣同(1865–1898)是晚清著名的改革派。在他的主要著作《仁學》中，他抨擊了儒家的三綱思想。他也提倡男女平權。參見本書第一章對譚嗣同的簡介。
- 3 根據毛澤東的分析，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第二階段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由共產黨領導，以五四運動為標誌。
- 4 「優貢」屬於「貢生」一類，是清朝授予的一種學術地位，與舉人的社會地位相似。貢生是官僚體系的第一級，可以被選入國子監深造，或者被任命為低等級的官職。黃定慧提到的「狀元考試」可能會讓人誤解，她實際上應該是指進士考試，狀元是向進士考試第一名授予的頭銜。
- 5 20世紀初《滿江紅》和《木蘭辭》成為國族主義話語的重要文本。
- 6 當時「帝國主義」一詞尚未出現，應為「反對列強」。
- 7 郭沫若和茅盾都是著名的新文化人士，他們都加入了國民革命。黃定慧在武漢認識了他們兩人。關於茅盾在《婦女雜誌》中的作用，參見第二章。
- 8 廖仲愷的夫人是何香凝，參見第五章注18。
- 9 鮑羅廷原名為Mikhail Gruzenberg，是共產國際在華代表。他是孫中山的私人顧問，推動了國共第一次合作。
- 10 羅曼·羅蘭(1866–1944)是一位法國作家，也是諾貝爾獎得主。他的小說在新文化運動中被翻譯為中文。在近代中國，他的名字和他的小說《約翰·克里斯朵夫》(*Jean-Christophe*)聯繫在一起，這部小說講述了一位藝術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英勇奮鬥故事。在中共話語中，《約翰·克里斯朵夫》被看作一本褒揚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書。
- 11 董必武(1885–1975)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國民革命期間，他是中共武漢地委書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是國家最高領導人之一。

- 12 瞿秋白(1899–1935)是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楊之華(1899–1975)是瞿秋白的妻子，也是中共婦女運動的領袖。
- 13 柳亞子(1889–1958)是一位詩人，是同盟會成員，曾擔任孫中山的秘書。作為國民黨左派，在國共兩黨合作失敗後，他反對蔣介石。後來，蔣介石把他開除了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柳亞子擔任了全國人大常委。
- 14 謝冰瑩加入了北伐，並寫作了《從軍日記》來紀錄她在軍隊中的經歷，《從軍日記》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參見謝冰瑩，《女兵自傳》(良友圖書公司，1936)。
- 15 《史海鉤玄：武漢裸體大遊行》(崑崙出版社，1989)以這次事件為主題，作者竟陵子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包括黃定慧。
- 16 王明(陳紹禹；1904–1974)是1930年代初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
- 17 黃定慧沒有把包辦婚姻裏的那個男人看做丈夫，因為她在這裏說的「第二個」而不是「第三個」丈夫。此外，這段敘述是1993年訪談內容，她當時沒有提及她的那段包辦婚姻。
- 18 在訪談時黃定慧讓我不要曝露饒漱石的名字。我遵照她的意思，在1999年出版的英文原著中，僅用字母X來指代他。但在2004年她公開出版的《黃慕蘭自傳》中卻提了饒漱石的名字，也講了相同的故事。我詢問了黃定慧改主意的原因，她說：「看來中央不會改變對『高饒事件』的定性了。」
- 19 「拿摩溫」(Number One)是指工廠車間的工頭。這是英語中的俚語，在上海開埠後成為滬語中的外來詞之一。
- 20 賀昌時任南方局宣傳部長。
- 21 六屆三中全會應是1930年9月在上海召開的。
- 22 顧順章(1904–1935)是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候補委員，負責黨的安全工作。由於他知道黨的地下工作網絡，他的背叛導致黨內許多人的被捕和死亡。顧順章1931年4月24日被國民黨逮捕。黃定慧的任命發生在1931年夏天，她在她的自傳中記錄了這件事。
- 23 潘漢年(1906–1977)在中共地下工作中負責收集情報和策反，並代表中共聯絡國民黨、汪偽政權和日本佔領軍多方政治勢力。1949年後，潘漢年被任命為上海市副市長。1955年因內奸嫌疑被關押。許多上海的地下共產黨員都在潘漢年案件中受到牽連，黃定慧就是其中之一。潘漢年1977年死於勞改農場，1982年被平反。參見王朝柱，《功臣與罪人》。
- 24 關於「七君子」，參見第五章注25。
- 25 在第一次訪談時，黃定慧說陳志皋對她一見鍾情。即便當時陳志皋還愛著另一女人，他依然有可能很快喜歡上黃定慧的。
- 26 陳家家譜在美國國會圖書館有記載，見Library of Congress,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清朝時期顯赫的中國人)(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43)。乾隆皇帝造訪陳家先祖一事，在描寫陳世信那一部分中提及。

- 27 在訪談中黃定慧說明是得知賀昌犧牲的消息後才同意與陳志皋結婚的。但在《黃慕蘭自傳》裏，她很詳細地說明了是賀昌還活著時，劉伯垂和趙婉華勸說她為了黨的利益接受陳志皋的求婚。見黃慕蘭，《黃慕蘭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1），頁166–169。
- 28 在《黃慕蘭自傳》中，黃定慧透露1938年她在香港時，潘漢年告訴她賀昌的兒子在澳門。她在不曝露母子身分的前提下去澳門與二兒子賀平見過面。見同上注，頁230。
- 29 這張合影收入《黃慕蘭自傳》，陳志皋和黃定慧坐前排靠中間位置。見同上注，頁178。
- 30 在《黃慕蘭自傳》裏，胡蝶行李丟失事件發生在黃定慧去重慶返回曲江之後。口述中她把事件的時間搞錯了。陳志皋的辭職顯然也在胡蝶事件之前，並且是讓黃定慧去重慶向中央振濟委員會提辭職事宜。胡蝶之前的流言是說陳志皋浪費國家財產招待達官顯貴。見同上注，頁272。
- 31 在《黃慕蘭自傳》裏，黃定慧透露自己想去延安還有個原因：陳志皋愛著另一位女士。周恩來勸她以大局為重。見同上注，頁277。
- 32 在我1990年代初與黃定慧的訪談中，她希望我不要透露她和陳志皋參與的那些特殊活動的細節，她認為即使到今天，曝露那些活動也會對黨不利。但在2004年出版的《黃慕蘭自傳》中她披露了這些活動。與政協委員提名被取消直接相關的秘密活動是，1939年國共兩黨上層決定在情報上合作，把由上海婦女創建的中華女子職業學校改成國共兩黨培訓情報人員的機構——中華職業學校，專門搜集日本人情報。黃定慧和陳志皋參與了這項活動。因為培訓出來的人員大部分是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以國民黨身分去了台灣，一些人還就任要職，所以劉少文面對提名時四位民主大姊指控黃陳二人向國民黨出賣中華女子職業學校，就無法解釋。見黃慕蘭，《黃慕蘭自傳》，頁233–236。四位「民主」大姊是史良、羅叔章、沈茲九、胡子嬰，其中羅叔章和沈茲九也是地下黨員，建國初期她們依然不曝露黨員身分，以民主黨派身分參政。
- 33 華東局是一個行政管理區域，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福建、台灣和上海。這種劃分始於1950年，結束於1954年。
- 34 聶榮臻（1899–1992）是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副參謀長。1956年他擔任副總理和國防委員會主任。
- 35 阿英（1900–1977），原名錢德福，又名錢杏邨，現代文學家、劇作家。抗戰期間曾與黃定慧和陳志皋密切合作創辦「風雨書屋」發行機構。
- 36 「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曾在上海負責地下工作時使用過這個名字。

- 37 駱劍冰是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她做過潘漢年的助手，所以也牽扯進了潘漢年的案子。
- 38 我在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後，又去拜訪了黃定慧。這時她搬到杭州女兒家住，已經奇蹟般地恢復過來，90多歲的老人依然開朗樂觀。她離世時是110歲的高壽。
- 39 這次罷工也就是著名的「二七大罷工」。1923年2月7日，北京至武漢間的鐵路工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總罷工，抗議軍閥吳佩孚對鐵路工會的鎮壓。吳佩孚的軍隊當日屠殺了四十多名罷工工人，一百多名工人受傷，超過一千名工人被解僱。在付出巨大代價卻沒有收穫的情況下，罷工於2月9日結束。
- 40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頁68。
- 41 〈中國共產黨婦女部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報告〉，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171。1926年9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一項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號召不同的婦女群體聯合起來，見〈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關於婦女運動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475-476。決議承認：

我們往往只顧自己行動，只提出自己的口號，而很少注意到各階層婦女群眾的利益和各派婦女團體的主張，結果我們成了很單調的孤立的活動，而喪失多數群眾的同情，這也是過去的錯誤之一。因此我們今後應該特別注意各階層婦女及各婦女團體間的聯合路線。要建立這條聯合路線，我們便須注意：（一）多注意婦女本身的利益；（二）遇各種運動時須相當的尊重其他婦女團體的主張；（三）避免各種包辦的形〔式〕及各種不必要的衝突。

- 42 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
- 43 〈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頁126-127。1923年7月，女權運動同盟會直隸支部已經擁有六百多名會員，它是當時天津很有影響的一個組織。

關於鄧穎超在五卅時期的女權主義活動，參見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天津市婦女聯合會編，《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頁237-404，以及金鳳，《鄧穎超傳》，頁61-67。金鳳指出，鄧穎超起草了女權運動的宣言，並發表於1922年11月的天津《益世報》上。事實上，這份宣言是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起草的宣言的翻版。這部傳記披露了有關鄧穎超女權主義的許多軼事。

- 44 鄧穎超，〈姐妹們起喲！〉，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天津市婦女聯合會編，《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中國婦女出版社，1987），頁274–276。把婦女沒有戀愛就結婚視為賣淫，這是五四女權主義的一個普遍看法。
- 45 《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頁381–437。1924年底和1925年初的國民會議是共產黨推動的。這次全國範圍內的婦女運動高潮要求婦女參加即將召開的國民大會。儘管主題還是五四女權主義議題的延續，但共產黨指示女黨員活躍地參與其中。通過像向警予、楊之華和鄧穎超這些在不同地區發揮領導作用的女黨員，共產黨成功地將許多女權主義者的注意力轉移到國民革命上來。這場運動標誌著共產黨在把婦女運動引向國民革命中發揮的作用開始增強。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頁177–186，以及〈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婦女運動之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279–281。
- 46 〈鄧穎超在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發表演說〉，《民國日報》，1925年7月20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347。
- 47 〈中國婦女協會成立紀要〉，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387。
- 48 向警予，〈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442。
- 49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505–507。
- 50 這份決議關於婦女運動部分的口號，包括反對「一夫多妻」和「童養媳制度」。相比於女權運動同盟會的宣言，這份決議只是略去了禁娼和禁纏足。
- 51 宋慶齡作為國母在現代中國政治生活中一直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何香凝是廖仲愷（當時在國民黨是僅次於孫中山的元老）的妻子，她也一直積極參與黨派政治。她堅持在國民黨的綱領中加入「伸張女權」。鄧穎超當時21歲，在領導天津愛國運動和女權運動中聲名鵲起。1925年她被派到廣州工作，與周恩來在廣州結婚。
- 52 沈雁冰的回憶錄中三次提到了黃定慧，根據他的記載，黃定慧是革命中心武漢三位著名婦女之一。她因其美貌和能力而知名。竟陵子《史海鉤玄》中一份關於國民革命的武漢婦女的報告，黃定慧被描述為當時的一位傑出人物。她的名字還頻繁出現在由武漢市婦女聯合會所編的《武漢婦女運動大事記》（武漢市婦女聯合會，1981）一書中。
- 53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01.

- 54 報道引自武漢市婦女聯合會編，《武漢婦女運動大事記》，頁42。

《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是加入武漢黃埔軍校的婦女的一本自傳集，一些人提到自己加入國民革命就是為了反抗包辦婚姻。謝冰瑩也是一位女兵，因為發表了在國民革命期間寫的日記而出名。她提到：「我相信，那時女同學去當兵的動機，十有八九是為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以及為了自己尋找更好的未來。」謝冰瑩脫離包辦婚姻的強烈願望是她決定參軍的主要因素。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黃埔軍校同學會編，《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 55 關於婦女培訓班，可參見武漢市婦女聯合會編，《武漢婦女運動大事記》，頁17。宛希儼的演講題目是「對婦女主義的批評」，而不是黃定慧記得的「反對婦女主義」。這個主題和其他如世界婦女運動、中國政治等11個主題列在一起。
- 56 楊之華，〈中國婦女運動罪言〉，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557、559。
- 57 武漢市婦女聯合會編，《武漢婦女運動大事記》，頁50。這一場合是指婦女培訓班的開班儀式。
- 58 同上注，頁53。作為一份共產黨的重要文件，這份決議被收錄到〈湖北省農協擴大會關於婦女問題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708。
- 59 《晨報》，1927年3月18日，引自竟陵子，《史海鉤玄》，頁45-46。
- 60 《史海鉤玄》中，一位參加遊行的丈夫（一位老人）告訴作者：「報上天天登離婚結婚的啟事：婦協會白天給那女人辦離婚，晚上就給那女人找個對象連夜辦結婚典禮。那時的婆娘們啊，真解放啊……」。同上注，頁50-51。
- 61 〈湖北省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宣傳問題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頁767。
- 62 應該注意的是，木蘭不是世紀之交國族主義話語中唯一提到的女英雄。例如，1907年秋瑾殉難立即讓她成為近代中國的著名女英雄。但是，《木蘭辭》的傳播範圍比古代其他女英雄要更廣泛，也比現代女英雄要早很多。關於花木蘭對許多這一代婦女的影響，參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黃埔軍校同學會編，《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正如一位女兵回憶道，當她和她的朋友被黃埔軍校錄取時，她們激動萬分，慶幸她們成為為一個新世界而戰鬥的革命戰士，她們「再也不用羨慕木蘭，更無須偷偷地去女扮男裝了」（頁165）。關於木蘭影響的更多討論，另見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74, 100, 189。
- 63 何鵠志，《向警予傳》，頁9。

- 64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戴緒恭、姚維鬥編，《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1-2。蔡和森和向警予1926年分手，蔡和森1928年寫了這篇傳記，當時是向警予剛壯烈犧牲兩個月後。他說她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女英雄」和「中國無產階級永遠的愛人」。
- 65 柯臨清對向警予在推動婦女運動中發揮的作用給予了積極的評價，我對向警予的作用有比較複雜的評價。向警予致力於實現一場由中共領導的統一的婦女運動，這標誌著中國婦女運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一場本為城市婦女開闢了社會空間的自發女權運動，變成了政黨控制的婦女解放運動。雖然後者相比當時的女權運動，更廣泛地改變了中國婦女的生活，但最終卻在黨國一體的情況下關閉了婦女自發活動的社會空間。關於更加詳細的討論，參見我對柯臨清的書評：王政，〈評介柯臨清《從社會性別角度看中國革命》〉，《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期（1996），頁343-346。
- 66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頁2-3。
- 67 〈中國婦女協會成立紀要〉，頁388。
- 68 像饒漱石這樣的報復行為在黨內並不少見。性別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常常有助於身處高位的男同志追求女同志。如果一個年輕女同志拒絕了一個她不喜歡的男同志，而這個男同志又是她的頂頭上司，那她很可能被穿小鞋、受打壓。

# 結語

將婦女視為歷史的參與者——和男人一樣，在不可控力之下易受傷害；和男人一樣，竭盡全力去形塑自己人生的輪廓——就是要將對社會性別關係的分析引入歷史研究中。

要尋找婦女的能動性，就要力圖去重現她們在與男性對話和衝突中的聲音。我們相信這些聲音能加深我們對什麼算是有歷史意義的理解，我們相信這些聲音有助於了解婦女的情況，同時也有助於了解是什麼賦予並維持著特定男性群體的權力。

——《作為婦女史的美國史》  
(*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導論<sup>1</sup>

在完成本書後，上述這段文字吸引了我的注意，因為它闡明了我希望在本書中努力達到的目標。在20世紀初宏大的歷史事件中，中國婦女做了什麼？所謂的「中國啟蒙」時期是如何影響或者牽涉到婦女的？在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婦女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社會性別關係是如何與本世紀的思想、社會和政治變遷聯繫在一起的？社會性別關係的變化又在多大程度上是通過男人和婦女的自覺努力而實現的？對這些問題的追問，使我開始探究20世紀初中國男女的聲音。五四男性的著作中所發出的聲音，描繪了他們在那激動人心的思想和社會的劇變中確立起領導地位；而我們的女性敘述者描述了這樣一個歷史過程：婦女在其中絕非被動的追隨者，她們既產生於歷史變革，又積極推動了歷史變革。20世紀初，脫胎於五四新女性的職業婦女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而本書中的每位敘述者，都證明了這個被以前的民國研究所忽略的社會群體的存在。

新文化女權主義在五四時期廣泛傳播，激發起20世紀初中國迅猛的社會變化。相比美國婦女進行了七十年的艱苦奮鬥才獲得婦女參政權，20世紀上半葉女權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和成就是卓越的。這一特殊現象是由幾個方面的歷史原因綜合作用而成：第一，幾十年來在國族主義話語中，婦女的地位與中國的未來緊緊聯繫在一起。通過提出婦女問題，新文化人士鞏固了已經確立的國族主義主題，而非與主流思潮背道而馳。

第二，西方的權勢賦予了那些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特殊的權威。半殖民地的中國為了自強已經準備好接受西方的強國藥方。20世紀初，大部分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認為中國正處於與西方競爭的緊迫時刻，中國當時亟需了解西方文化。現代知識分子關於西方的知識，被新文化人士作為普遍真理加以傳播，這為他們迅速贏得了大批受眾和社會聲望。當時女權主義在西方是邊緣話語，但在中國卻被認為是普遍真理的一部分，是更高級文明的標誌。對於中國來說，若要在與西方競爭中加速進化步伐，接受女權主義就是一個關鍵策略，更是現代知識分子獲得權力的話語實踐。

第三，1910年代中國政治權力的分崩離析造成了一個真空狀態，讓現代知識分子的話語權正好填補了這一空白。新文化人士手中掌握

的西方意識形態變成了顛覆性的武器，況且他們的出版活動基本不受檢查控制。他們攻擊的儒家思想在這個時期缺乏政治靠山，因此新文化人士對「異端邪說」的鼓吹甚少障礙。對婦女問題的熱烈討論能遍及全國，吸引了大量不同政治傾向和知識背景的追隨者，無疑顯示了20世紀初非常寬鬆的思想氛圍。

第四，新文化思想擁有的多樣化的大批受眾，是新文化人士迅速崛起和女權主義廣泛傳播的前提。嚮導若無追隨者，也就不成其為嚮導；解放者若無尋求解放的人，也就不成其為解放者。在西方思想的影響下，20世紀中國的城市化和現代教育，包括正式的女子教育，為女權主義準備好了主要的擁戴者：五四的男女學生。這群城市裏受過教育的男女，擺脫了中國農村鄉土社會的束縛，了解了新文化女權主義的意義，沒有他們的支持，新文化人士的宣傳就沒有受眾。這些五四男女不僅是接受女權主義的受眾，也很快表現出來是充滿活力的社會行動者，身體力行地在構建中國女權主義話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國民革命終結了文化急遽變化的時代，兩黨合作推動了強勢的國族主義，蓋過了新文化女權主義的宣傳鼓動和婦女自發活動的勢頭。但是，女權主義在這個節點並沒有「失敗」或消失，相反作為一種切實可行的話語，持續不斷地影響著20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整整一代擁有新的主體性、受過教育的婦女既被中國女權主義話語所構建，又推動發展了女權主義話語。通過追求可以實踐獨立人格的生活，五四新女性不僅創造了完全不同於她們母親的生命旅程，還通過她們個人的和集體的自覺努力，創造和支撐了制度變革，這些變革實現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婦女的社會進步。

本書中的五位講述者闡釋了在教育、法律、新聞、體育等領域以及其他社會機構中新女性的女權主義實踐。但關於女權主義的博弈不限於婦女個人在基層社會的謀略。隨著政黨權力的增強，女權主義進入了國家政治層面。五四運動後，女權主義成了現代性的標誌，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宣稱支持女權。兩黨對婦女運動的制度化壓抑了中國獨

立婦女運動的發展前景，同時，兩黨吸納新文化女權主義議題都對婦女有積極的效果。兩黨中任何一個控制了政權時，都會把婦女平等權利寫進法律。政黨對婦女解放的支持也使得婦女在男性權力結構中有可能擁有一席之地。共產黨和國民黨內的女權主義者竭盡所能地在男權結構內運作來推動婦女進步。

中共建黨之初即把婦女解放作為目標之一，此為其自身合法性的重要內容。雖然在尋求和鞏固對婦女的政治控制過程中，中共把「女權主義」作為對立的「他者」來排斥，但它受五四女權主義所形塑，並吸引了許多女權主義者參與，依然是一個激進的政治組織。一旦中共取得國家政權開始了制度性變革它既踐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藍本，也體現了五四女權主義理念。柯臨清在她有關中共女權主義歷史的研究中評論道：「1949年後，中共讓婦女解放的大量話語和慣習繼續存在，這為任何有決心且精明地想要在黨國內利用它們的人提供了合法基礎。」<sup>2</sup>從1950年由黨內一群五四女權主義者起草的第一部《婚姻法》開始，到1995年中共總書記在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上發言，其中提及「把男女平等作為促進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到1996年三八婦女節《中國婦女報》發表了〈男女平等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的社論，通過輿論運作把領袖一句話推成一項需要政府各部門實施的國策，中共的男女平等政策講述了一個黨國體制內女權主義者不斷博弈的故事。<sup>3</sup>在黨領導的婦女解放的大旗下，我們可以發現對馬克思主義婦女解放思想的實踐，如提倡婦女參加社會生產；對社會主義女權主義願景的實踐，如建立食堂、托兒所和其他為婦女提供的社會福利設施；以及對自由主義女權主義的實踐，如爭取婦女在各方面的平等權利。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我們的敘述者證明了，在毛澤東時代自發女權主義活動的社會空間不復存在，但是大量五四女權主義的話語被吸收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流政治話語中。甚至當市場經濟優先於社會和經濟公平時，黨的領導人也會宣稱他們堅持男女平等。新文化人

士把男女平等與現代性如此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以至於任何在中國聲稱領導國家邁向現代化的統治集團，都不能公開拋棄它。同時，在男女平等為主導話語時代成長起來的婦女在與國家協商婦女利益時，越來越意識到這一官方話語依然具有的權力。



在後結構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理論盛行的時期把這本書呈現在西方讀者面前，我或許違逆了當前的學術潮流。當前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受到後結構主義學者的強烈批判，對東方主義的有力批判更是質疑了在非西方文化中傳播西方自由主義價值的嘗試。<sup>4</sup>在這種背景下，本書可能發出了個不和諧音，因為我強調了人權、平等、獨立這些西方自由主義的概念是20世紀初中國婦女解放的主要驅動力。

作為來自中國這個有著半殖民地歷史的國家的女性，我既不擔心「文化帝國主義」的污名，也不必完全認同來自有著殖民史或者被殖民史的國家的學術關注點。我真正關心的是在中國婦女爭取社會發展和完善的鬥爭中，什麼能夠或者可能會對她們有用。本項研究揭示，從歷史的角度看，人權這一自由主義概念為一代受過教育的中國婦女賦權，使她們掙脫儒家文化結構的束縛，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地進入到公共領域。「你是人，我也是人。你有什麼權利，我也應該有什麼權利。」直到93歲，朱素萼仍然記得那些在她年輕時改變她的思想覺悟的話。對這位中國婦女和許多其他婦女而言，西方的自由主義並沒有呈現為帝國主義文化霸權，相反在中國的語境下，它提供了一種反抗話語，使得中國的男女得以反抗霸權的儒家體系。西方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或其他任何西方意識形態，不是通過殖民者強加於中國，而是被追求自身利益與國族利益的各種中國社會群體所積極接納與挪用。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行動者們對外來概念的含義給予重新界定或賦予新的象徵意義，以表達他們基於本地具體情況的特定關懷。婦女有關人權以及西方婦女平權鬥爭的知識，如「女權」二字所指涉的，在塑造她們個人能力方面起到決定作用，使她們將自己造就為歷

史的行動主體而非被動客體。這些五四女性的故事展示了半殖民地中國的一段特殊的歷史進程與一組獨特的動態——兩者都不能被縮減或混同為殖民地國家民眾的體驗。

與西方的情況不同，西方自由主義在20世紀初引入到中國，並沒有造成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文化霸權。相反，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以毛澤東思想的形式出現，從世紀中葉開始成為霸權性話語，中國婦女在被賦予權力的同時，又被抑制了。國家將男女平等寫入憲法，也提倡婦女為社會主義建設進入公共領域，婦女由此獲得一定程度的賦權；但黨國成為國家父權，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要求婦女完全的服從與犧牲，造成對婦女的壓抑。當「被解放」的中國婦女在國家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時，她們大多數人卻失去決定婦女相關議題的發言權。婦女成為沉默的大多數，不僅是因為父權制國家壟斷了政治權力，還因為黨專橫的階級分析以及黨關於中國婦女已被解放的迷思，剝奪了婦女能提出婦女問題的語言。與五四新女性相比，毛澤東時代受過教育的城市婦女享有更為制度化的男女平等，卻更少政治自主權。意味深長的是，「男女平等」在毛澤東時代成為家喻戶曉的一個詞，同時「人權」和「獨立」等概念卻不再流通。

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批評毛澤東思想是「封建極權主義」，維護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也許毛澤東時代最明顯的文化繼承，就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的名義公開號召對個人意志與個人權利的壓制。中共對自由主義的持續打壓導致專制在文化大革命時達到頂峰，毫不奇怪，中國知識分子在文革後試圖復興自由主義，以當作一種反抗話語。在缺乏個人權利觀念的文化中，渴望社會和經濟公平的民眾可以被統治階級利用作為專制的基礎，這正是國人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統治過程中所得到的慘痛教訓。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都是西方啟蒙文化的產物，曾被20世紀初不同的中國群體所接受，但到20世紀末時中國知識分子正試圖反抗一個強權國家，追求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因此強調個人權利對他們而言具有更強的吸引力。

不難理解，在後毛澤東時代，中國很多男女知識分子又轉向西方尋求思想武器，就像五四時期的先行者那樣。走出「毛澤東王朝」後，他/她們與新文化知識分子產生了強烈共鳴，五四的文化批判在很多領域仍然站得住腳，而且依然可以從西方意識形態中找到反抗毛澤東霸權的力量。對許多中國當代知識分子而言，西方自由主義的吸引力與中共對個人自由的壓制密切相關。從五四時期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保持了作為一種反抗話語的鋒刃。如今，人權概念被男性用作消除政治迫害、削弱黨的控制的話語較量；婦女則用人權來呼籲婦女在教育 and 就業方面的平等權利，以及婦女免於性別暴力的權利。甚至連中國政府也為了自身目標挪用人權話語，宣稱人權對中國人而言就是生存權，普適的人權觀念作為西方帝國主義殘留而被摒棄。基於這個諷刺地與一些後結構主義批評相似的立場，中國政府成功地抵制了西方民主化的壓力。18世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可能不會想到，他們的創新思想日後會被各種奇巧新穎的方式所利用。

中國自由主義的故事說明了一點，就是中國各種利益集團總是有計謀地利用西方意識形態，以達到各不相同的目的。中國知識分子通過選擇西方知識為自己賦權，這彰顯了中西之間的權力關係。在20世紀的世界權力結構中，很難想像西方的社會群體會通過傳播有關中國的知識而擴展權勢。即使在1960年代，當毛澤東的革命鼓舞了西方左翼學生時，這些學生在他們的社會中依然處於邊緣。諷刺的是，這證明了在全球有影響力的國家中，邊緣群體的思想選擇的局限性。在這個意義上，生活在世界經濟邊緣的新文化人士是令人羨慕的邊緣群體，因為中西之間不平等的關係給他們反抗中國文化霸權增添了權勢。總之，新文化人士與五四新女性的故事顯示出移植西方話語的兩個要點：第一，即便中國的男女處於半殖民地的環境，他們並沒有盲目接納現成的西方概念，而是發揮了歷史能動性，為了自身的特定目標選擇了一些概念；第二，「為了特定的政治目標而調遣特定的話語決定了被利用的概念的內涵。」<sup>5</sup>不論一種話語在本土文化中是居於主

導或是邊緣，話語所構建的權力關係不是一成不變，而是依其語境而變。這種理解有助於我這個正在尋找有關反抗活動思想資源的中國學者，能開放地對待特定歷史背景下為中國婦女利益服務的任何話語。



除了理論基礎之外，一位歷史學者對歷史主體的觀點通常由他或她所能獲取的歷史資料所形成。我與這些尚在人世的五四新女性的相遇，深刻地改變了我對中國婦女運動、中國的女權主義歷史以及五四女性的想像。她們的口述史不僅形成了我對20世紀初中國的職業婦女這一新社會群體的理解，也使我得以從五四時期的多樣話語中甄別出對她們具有意義的內容。如果沒有她們的個人證詞，我在試圖判斷是什麼建構了新女性的新覺悟時就可能會迷失方向。

有了這些口述史，我就能夠探究歷史文本與婦女覺悟之間的聯繫。不是所有文本都會對受過教育的婦女有同樣的影響，也不是所有受過教育的婦女對新文化女權主義都會有同樣的回應。在我們的敘述者受到女權主義話語影響之前，有些東西已經使她們易於接受獨立新女性的新主體身分，這些東西就是她們早年的個人經歷。雖然她們年輕時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是她們早年的不可磨滅的記憶都突顯了男女不平等導致的痛苦創傷。

20世紀初，中國文化充滿了造成婦女特殊經歷的種種慣習。它是女子在小女孩時不得不經受的纏足痛楚；是讓女子覺得比自己兄弟低一等的區別對待；是女子擔心被賣做小妾、童養媳或者妓女的恐懼；是女子在結婚那天被送到一個陌生人家裏，並將一輩子生活其中的極度惶恐；是女子的丈夫或父親常逛妓院或把小妾帶回家時，所經受的劇烈痛苦；是女子經歷的分娩痛苦加上對生女嬰的擔憂；是女子力圖在丈夫的虐待下生存，既無求助的資源，又無逃離悲慘婚姻的途徑；是女子無論出自何種階級背景、位於哪些地理區域，都被排斥在男性世界之外。中國女子能逃離上述所有這些「女人經歷」的機會很少，這

是因為性別歧視體制就是她的人生方式。不論她是否能用語言去界定她這些體驗的意義，她都逃不脫生理上的疼痛和心理上的折磨，並清醒地意識到這些苦難只屬於女人。

本書敘述者的故事所顯示的，正是這些痛苦的體驗、在孩童時期就感受到的不公、以及逃離女人困境的渴望，使得這些年輕女子如此熱切地沿著新文化女權主義所指的方向奔跑。她們已經受夠了「女人」的生活，現在她們想要過「人」的生活。沒有其他東西能像她們的逃離那樣，向我們表明為什麼自由主義人文主義對她們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她們的逃離也向我們表明，要不是她們對女人的命運有著共同的痛楚與憤恨，開初就根本不會有追求不同人生的渴望。可以說，一位五四新女性是在以下過程中形成的：「女人的經歷」；渴望逃離這類經歷或拒絕將其作為自己的命運；遇到可以使她們表述「婦女受壓迫」體驗的新概念；可以過「人」的生活的物質可行條件。

雖然這些講述者生動地說明了「人權」與「婦女平權」的概念是如何為她們賦權的，但我們也注意到，這一賦權遠非那個時期所有中國婦女的普遍經歷。文盲、貧窮，以及與這些信息來源的實體隔離，使得絕大部分中國婦女無緣接觸這些賦權思想。更重要的是，哪怕新思想隨處可得，也不是所有婦女都有享有新文化女權主義所規定的「人」的生活的那份奢侈。這裏的「人」不僅是指男性，也指中產階級。新女性享受男性特權的能力通常是由她們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她們擁有活躍的職業與公共生活的前提通常是有能力僱一個或幾個傭人，雖然新女性獲得了獨立的「人」的生活，但她們的女傭人可能甚至不敢夢想「人」的生活，儘管她們也靠自己的勞動謀生。階級區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雖然不同階級的婦女或多或少都有「女人的經歷」，但只有少數婦女能夠實現新女性的主體身分。

新女性將男女平等奉為人權的主旨，對能做男人能做的事引以為傲。在那個時期，人文主義立場中包含的男性偏見並不是一個問題。在毛澤東時代，當中國婦女在家庭以外像男人一樣發揮作用不再是個



人選擇，而是國家命令，她們開始感到男女平等中男性偏見的壓迫。旨在消除階級分化而實行普遍低收入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城市職業婦女無力再僱人在家裏做「女人的活」；與此同時，家務勞動在官方和男性價值體系中被貶低與詆毀，但婦女依然承擔著主要的家務負擔。男女平等，或者說「被既存男性準則所同化」，<sup>6</sup>益發成為一種重負與限制，尤其對城市職業婦女而言。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城市知識婦女在後毛時代開始抵制這種同化的男女平等，並提倡「做女人」。在一個世紀中，中國不同時代的知識婦女在追求解放時，走過了一條從「要做人」到「做女人」之路。

本書中的女主角在追求「要做人」的路上卻從未動搖過，因為「做女人」的慘痛還在她們記憶中歷歷在目。此外，她們過去為獨立人格、其他婦女與國家的福祉而奮鬥的經歷，給她們的人生帶來了尊嚴和意義。雖然她們的奮鬥與成就在中國被長久遺忘，但她們在垂暮之年依然珍視生命中的那段歷程。作為一個歷史學者，我和她們一樣珍惜她們的人生故事。她們幫我重構了一段歷史：那時很多婦女起來挑戰傳統，改變男尊女卑等級關係，並變革中國城市的社會圖景。她們無可置疑地證明了新文化女權主義曾賦權於一群中國婦女，使她們成為20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者。我希望，在這些以及其他更多方面，由敘述者與歷史學者共同構建的五四女性富有意義的經歷，會成為常識的一部分，這種常識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過去，也為我們照亮當下跨文化婦女研究的理論探索之路。

## 注釋

- 1 Linda K. Kerber, et al., eds., *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作為婦女史的美國史：新女權主義論文集)(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7.
- 2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16.
- 3 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起草了1950年版的《婚姻法》，鄧穎超和一群五四女權主義者在起草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法律中表達了五四女權主義思想。參見金鳳，《鄧穎超傳》，頁457–461；鄧穎超，〈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報告〉，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卷2，頁49–64。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世婦會上的講話，見《人民日報》，1995年9月5日；社論則見〈男女平等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江澤民在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歡迎儀式上的講話〉，《中國婦女報》，第1808期（1996年3月8日），頁1。
- 4 參見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東方學)(Vintage Books, 1979)。
- 5 參見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女權主義者使政治理論化)(Routledge, 1992), xiii。
- 6 「被既存男性準則所同化」這一短語引自Jane Flax, “The Play of Justice” (公平遊戲), in *Disputed Subjects: Essays on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論辯的主題：心理分析學、政治學和哲學論文集)(Routledge, 1993), 113。



# 參考文獻

除特別注明以外，項目按筆劃排序。

## (1) 報章、雜誌

C. K.。〈婦女問題與中國婦女運動〉。《婦女雜誌》，第8卷，第11期（1922），頁55-56。

M. Y. H.。〈青年求愛問題〉。《婦女雜誌》，第9卷，第9期（1923），頁124-125。

丁逢甲。〈女界箴言〉。《婦女雜誌》，第4卷，第2期（1918），頁5-6；第3期（1918），頁1-4。

〈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婦女雜誌》，第8卷，第9期（1922），頁126-127。

〈不可不讀本報〉。《女報》，第1卷，第2期（1909）。

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文藝理論》，第7-12期（1995）。中國人民大學書報出版社。

心珠。〈我所希望於男子者〉。《婦女雜誌》，第10卷，第10期（1924），頁1518-1520。

方民耘。〈我國目前婦女運動應取的方針〉。《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87-127。

王士倫。〈秋瑾出生年代〉。《歷史研究》，第12期（1979），頁64-65。

- 王平陵。〈新婦女的人格問題〉。《婦女雜誌》，第7卷，第10期（1921），頁10-14。
- 王伊蔚。〈今後的女聲〉。《女聲》，第3卷，第1期（1934），頁1-2。
- 王卓民。〈論吾國大學尚不宜男女同校〉。《婦女雜誌》，第4卷，第5期（1918），頁1-8。
- 玉。〈男女一同做事〉。《時報》，1919年10月14日，頁10。
- 向警予。〈今後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28-32。
- 朱胡彬夏。〈美國家庭〉。《婦女雜誌》，第2卷，第2期（1916），頁1-8。
- 江學輝。〈女權平議〉。《婦女雜誌》，第4卷，第8期（1918），頁4-7。
- 西神（王蘊章）。〈通信問答〉。《婦女雜誌》，第3卷，第7期（1917），頁14-17。
- 何覺余。〈婦女運動的錯路與正軌〉。《婦女雜誌》，第10卷，第4期（1917），頁591-593。
- 〈你愛祖國，祖國更愛你〉。《新民晚報》，1995年2月14日，頁3。
- 李佩蘭。〈解放後的婦女人格觀〉。《婦女雜誌》，第6卷，第5期（1920），頁1-4。
- 〈男女平等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一項基本國策——江澤民在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歡迎儀式上的講話〉。《中國婦女報》，第1808期（1996年3月8日），頁1。
- 佩韋（沈雁冰）。〈解放的婦女與婦女的解放〉。《婦女雜誌》，第5卷，第11期（1919），頁1-6。
- 。〈婦女解放問題的建設方面〉。《婦女雜誌》，第6卷，第1期（1920），頁1-5。
- 。〈評《新婦女》〉。《婦女雜誌》，第6卷，第2期（1920），頁1-3。
- 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學的標準〉。《婦女雜誌》，第11卷，第1期（1925），頁8-12。
- 。〈二重道德〉。《新女性》，第1卷，第1期（1926），頁1-11。
- 尚一。〈婦女運動與新社會的建設〉。《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30-32。
- 〈促膝談五四〉。《東方》，第2期（1995），頁24-25。
- 胡適。〈易卜生主義〉。《新青年》，第4卷，第6期（1918），頁489-507。
- 。〈貞操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期（1918），頁5-14。
- 。〈美國的婦人〉。《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頁213-224。
- （胡適之）。〈女子問題的開端〉。《婦女雜誌》，第8卷，第10期（1922），頁125-128。

- 原田實。〈弗彌涅士姆概說〉。味辛譯，《婦女雜誌》，第8卷，第5期（1922），頁64-71。
- 唐敬杲。〈我所望於女青年〉。《婦女雜誌》，第8卷，第2期（1922），頁13-15。
- 孫熙育。〈女學生之責任〉。《婦女雜誌》，第4卷，第11期（1918），頁3-4。
- 徐世衡。〈今後婦女應有的精神〉。《婦女雜誌》，第6卷，第8期（1920），頁12-18。
- 晏始。〈最近的女權運動〉。《婦女雜誌》，第8卷，第10期（1920），頁61-63。
- 。〈婦女團體運動力的微弱〉。《婦女雜誌》，第9卷，第6期（1923），頁17-18。
- 殷同薇。〈擬本校學生自治會徵集會員啟〉。《婦女雜誌》，第4卷，第1期（1918），頁2-3。
- 記者。〈本雜誌今後之方針〉。《婦女雜誌》，第5卷，第12期（1919），頁1-3。
- 〈記述門〉。《婦女雜誌》，第2卷，第3期（1916），頁1-16；第3卷，第3期（1917），頁1-16；第3卷，第5期（1917），頁1-20；第3卷，第10期（1917），頁1-16；第5卷，第5期（1919），頁1-8。
- 馬仁常。〈人必如何而後能獨立說〉。《婦女雜誌》，第4卷，第4期（1918），頁2。
- 高山。〈將來的女權運動〉。《婦女雜誌》，第9卷，第12期（1923），頁14-15。
- 〈婦女新消息〉。《婦女雜誌》，第6卷，第4期（1920），頁6；第5期（1920），頁6；第6卷，第6期（1920），頁16；第7期（1920），頁8；第8期（1920），頁38；第11期（1920），頁10。
- 張友鸞。〈今後更要切實些〉。《婦女雜誌》，第8卷，第2期（1922），頁28-29。
- 張登仁。〈說女子教育〉。宋國樞譯評，《婦女雜誌》，第5卷，第5期（1919），頁4-8。
- 梁令嫻。〈敬述吾家舊德為婦女雜誌祝〉。《婦女雜誌》，第1卷，第1期（1915），頁6-8。
- 梁啟超。〈倡設女學堂啟〉。《時務報》，第45期（1897），頁283-285。
- 章錫琛（瑟廬）。〈近代思想家的性欲觀和戀愛觀〉。《婦女雜誌》，第6卷，第10期（1920），頁1-8。
- 。〈到婦女解放的途徑〉。《婦女雜誌》，第7卷，第1期（1921），頁1-4。
- 。〈愛倫凱女士與其思想〉。《婦女雜誌》，第7卷，第2期（1921），頁21-27。
- 。〈國際婦女勞動會與中國婦女〉。《婦女雜誌》，第7卷，第11期（1921），頁1-5。
- 。〈戀愛問題的討論〉。《婦女雜誌》，第8卷，第9期（1922），頁121-123；第10期（1922），頁120-121。
- 。〈婦女運動的新傾向〉。《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2-7。

- （記者）。〈我們今後的態度〉。《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2-7。
- 。〈最近十年內的婦女界的回顧〉。《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16-22。
- 。〈新性道德是什麼〉。《婦女雜誌》，第11卷，第1期（1925），頁2-7。
- 。〈最近婦女運動的失敗和今後應取的方針〉。《婦女雜誌》，第11卷，第7期（1925），頁1120-1124。
- 荷荷。〈六個男同學給我的信〉。《婦女雜誌》，第9卷，第7期（1923），頁41-44。
- 陳以益。〈男尊女卑與賢母良妻〉。《女報》，第2期（1909），頁4-7。
- 陳式甄。〈申婦從女帚之義〉。《婦女雜誌》，第2卷，第4期（1916），頁12。
- 陳百年。〈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現代評論》，第14期（1925），頁6-8。
- 陳問濤。〈提倡獨立性的女子職業〉。《婦女雜誌》，第7卷，第8期（1921），頁7-11。
- 陳望道。〈中國女子底覺醒〉。《新女性》，第1卷，第9期（1926），頁637-641。
- 陳獨秀。〈敬告青年〉。《新青年》，第1卷，第1期（1915），頁1-6。
- 。〈一九一六年〉。《新青年》，第1卷，第5期（1915），頁1-4。
- 陶履恭。〈女子問題〉。《新青年》，第4卷，第1期（1918），頁14-19。
- 陸振權。〈婦從女帚釋〉。《婦女雜誌》，第2卷，第5期（1916），頁2-3。
- 勞秋英。〈對於第三階級婦女的希望〉。《婦女雜誌》，第7卷，第10期（1921），頁110。
- 勞澤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將來〉。《婦女雜誌》，第7卷，第9期（1921），頁7-10。
- 彭季能。〈今日中國女子應覺悟的一點——自己的責任〉。《婦女雜誌》，第6卷，第6期（1920），頁1-4。
- 曾長秋、周建純。〈中國第一個女共產黨員繆伯英〉。《人民日報》，1987年6月8日。
- 渭川。〈對於婦女界的希望〉。《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73-77。
- 雁冰（沈雁冰）。〈讀少年中國婦女號〉。《婦女雜誌》，第6卷，第1期（1919），頁1-4。
- 。〈我們該怎樣預備了去譚婦女解放問題〉。《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1920），頁1-5。
- 。〈婦女運動的意義和要求〉。《婦女雜誌》，第6卷，第8期（1920），頁1-6。
- 雲舫。〈改造時代的婦女應具什麼資格〉。《婦女雜誌》，第6卷，第6期（1920），頁1-5。

- 黃河濟。〈新婦女應有的覺悟〉。《婦女雜誌》，第6卷，第10期（1920），頁18–20。
- 黃逸農。〈國民之敵〉。《婦女雜誌》，第5卷，第9期（1919），頁5–6。
- 〈碎佩叢鈴〉。《婦女雜誌》，第6卷，第1期（1920），頁4。
- 綺紋。〈真實的婦女解放在哪種條件下才能實現？〉。《中國婦女》，第2期（1926），頁4–5。
- 與謝野晶子。〈貞操論〉。周作人譯，《新青年》，第4卷，第5期（1918），頁386–394。
- 〈劉王立明追悼會在京舉行〉。《人民日報》，1981年3月19日。
- 劉盛。〈發刊詞〉。《婦女雜誌》，第1卷，第1期（1915），頁2–4。
- 〈劉清揚之百折不回〉。《天津益世報》，1919年8月29日，頁3。
- 〈廢刊詞〉。《新女性》，第4卷，第12期（1929），頁5–6。
- 〈編輯餘錄〉。《婦女雜誌》，第7卷，第7期（1921），頁116；第8卷，第12期（1922），頁124。
- 蓮史。〈婦女的非人時代〉。《婦女雜誌》，第9卷，第4期（1923），頁44–46。
- 余天穗。〈余之女子教育觀〉。《婦女雜誌》，第1卷，第1期（1915），頁1–3。
- 繆程淑儀。〈香與婦女〉。《婦女雜誌》，第6卷，第3期（1920），頁1–5。
- 謝遠定。〈促婦女徹底的覺悟〉。《婦女雜誌》，第10卷，第1期（1924），頁70–73。
- 羅柳之。〈女權運動領袖唐群英〉。《婦女》（瀋陽），第3期（1983），頁25。
- 羅素夫人（Dora Black）。雲鶴譯，〈中國的女權主義與女性改造運動〉。《婦女雜誌》，第9卷，第1期（1923），頁50–55。
- 飄萍女史。〈理想之女學生〉。《婦女雜誌》，第1卷，第3期（1915），頁1–4。
- 〈讀者俱樂部〉。《婦女雜誌》，第7卷，第5期（1921），頁104–106。
- 〈讀前號〉。《婦女雜誌》，第9卷，第6期（1923），頁121–123。

## （2）中文文獻

- 上海市文史研究館編。《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卷1–4。上海文史館，1990–1993。
- 上海市婦女聯合會編。《上海婦女運動史：1919–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天津市婦女聯合會編。《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中國婦女出版社，1987。
- 〈中國共產黨婦女部關於中國婦女運動的報告〉。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1922年7月)。中國婦女幹部管理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1918-1949》。第一冊。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
-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關於婦女運動議決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議決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婦女運動之決議〉。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議決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婦女協會成立紀要〉。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婦女雜誌社。《烈士向警予》。中國婦女雜誌社,1958。
-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編。《中國婦女運動史》。春秋出版社,1989。
- 、黃埔軍校同學會編。《大革命洪流中的女兵》。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研究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民國政府卷(1912-1949)》。上下卷。中國婦女出版社,2011。
-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王伊蔚。《我與〈女聲〉:向三八婦女節獻禮》。《大千世界》報文史部,1987。
- 王政。〈評介柯臨清《從社會性別角度看中國革命》〉。《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期(1996),頁337-349。
- 。〈「女性意識」、「社會性別意識」辯異〉。王政,《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越界:跨文化女權實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 、高彥頤、劉禾。〈從《女界鐘》到『男界鐘』:男性主體、國族主義與現代性〉(代序)。王政、陳雁主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 王家儉。〈民初的女子參政運動〉。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 王朝柱。《功臣與罪人：潘漢年的悲劇》。海天出版社，1993。
- 北京市婦女聯合會編。《北京婦女報刊考，1905–1949》。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
- 卡倫·奧芬。朱曉慧、柯倩婷譯，《歐洲婦女解放史：1700–1950》。復旦大學出版社，2024。
- 本間久雄。〈婦女問題十講〉。中國婦女研究會編、章錫琛譯，《婦女問題叢書》。卷一。中國婦女研究會，1924。
- 田漢。〈第四階級婦人運動〉。《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向警予。〈女國民大會的三大意義〉。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中國最近婦女運動〉。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何鵠志。《向警予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吳虞。〈女權平議〉。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呂雲章。《婦女問題論文集：第一集》。女子書店，1933。
- 李人杰。〈男女解放〉。梅生編，《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卷一》。新文化書社，1929。
- 李又寧。〈女界鐘與中華女性的現代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
- 李大釗。〈婦女解放與Democracy〉。《少年中國》，第1卷，第4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戰後之婦人問題〉。《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李小江。《夏娃的探索：婦女研究論文》。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李木蘭。方小平譯，《性別、政治與民主：近代中國的婦女參政》。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
- 李鶴鳴（李達）。〈女子解放論〉。《解放與改造》，第1卷，第3期（1919），頁18–32。
- 杜芳琴。《女性觀念的衍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汪輝。〈中國的五四記憶〉。《知識分子》(1922)，頁42-56。
- 沈智。〈辛亥革命前後的女子報刊〉。《辛亥革命70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資料II》，編號73。武漢，1981。
- 。《婦女解放史問答》。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
- 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74。
- 。〈人的文學〉。《藝術與生活》，1918。舒蕪編，《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 。〈北溝沿通信〉。舒蕪編，《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 孟悅、戴錦華。《浮出歷史地表：現代婦女文學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 武漢市婦女聯合會編。《武漢婦女運動大事記》。武漢市婦女聯合會，1981。
- 金鳳。《鄧穎超傳》。人民出版社，1993。
- 洪宜嬭。《中國國民黨婦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國史館，2010。
- 秋瑾(鑑湖女俠)。〈勉女權〉。《中國女報》，第2期(1907)。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
- 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中華書局編輯部編，《紀念辛亥革命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
- 胡適。〈論女子為強暴所污〉。胡適，《胡適文存》，第1卷，第4冊。遠東圖書公司，1968。
- 。〈論貞操問題〉。胡適，《胡適文存》，第1卷，第4冊。遠東圖書公司，1968。
- 胡繩武、金沖及。《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茅盾(沈雁冰)。《我走過的道路》。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
- 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 徐彥之。〈北京大學男女共校記〉。《少年世界》，第1卷，第7期(1920)。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男女交際問題雜感〉。《晨報》，1919年5月4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素素。《前世今生》。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康有為。《大同書》。中華書局，1935。
- 張若名。〈急先鋒的女子〉。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曼素恩。《綴珍錄：18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江蘇人民出版社，2022。
- 梁啟超。〈變法通議〉。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28。
- 梁惠錦。〈抗戰前後的婦女運動〉。陳三井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
- 梅生編。《婦女年鑒》。新文化書社，1924。
- 。《女性問題研究集》。新文化書社，1928。
- 。《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新文化書社，1929。
- 畢永升。《中國氣功》。上海中醫藥大學出版社，1990。
- 竟陵子。《史海鉤玄：武漢裸體大遊行》。崑崙出版社，1989。
- 章錫琛編。《新性道德討論集》。開明書店，1926。
- 陳東原。《中國婦女生活史》。商務印書館，1928。
-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期（1916），頁1-7。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廣東群報》，1921年1月21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陶春芳、蔣榮儒、朱明媚編。《馬克思主義婦女觀概論》。中國婦女出版社，1991。
- 曾智中。《三人行：魯迅與許廣平、朱安》。中國青年出版社，1990。
- 〈湖北省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宣傳問題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湖北省農協擴大會關於婦女問題決議案〉。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舒蕪編。《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文化藝術出版社，1990。
- 費孝通。《鄉土中國》。人民出版社，2008。
- 愛自由者金一（金天翮）。《女界鐘》。大同書局，1903。
- 楊之華。《婦女運動概論》。亞東圖書館，1927。
- 。〈中國婦女運動罪言〉。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楚南女子。〈中國女子之前途〉。《女學報》，第4期（1903）。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
- 葉韋君。〈後五四時期的知識婦女：《婦女共鳴》的社會網絡（1929-1944）〉。《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33期（2019），頁113-163。

- 葉紹鈞(葉聖陶)。〈女子人格問題〉。《新潮》，第1卷，第2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董竹君。《我的一個世紀》(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
- 暨南大學中文系中國古代文學教學室編。《中國歷代詩歌名篇賞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 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 劉王立明。《中國婦女運動》。商務印書館，1933。
- 蔡和森。〈向警予同志傳〉。向警予著，戴緒恭、姚維門編，《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 鄧穎超。〈五四運動的回憶〉。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姐妹們起喲！〉。中共天津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天津市婦女聯合會編，《鄧穎超與天津早期婦女運動》。中國婦女出版社，1987。
-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的報告〉。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中國婦女運動文獻資料彙編》，卷2。中國婦女出版社，1988。
- 〈鄧穎超在上海各界婦女聯合會發表演說〉。《民國日報》，1925年7月20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
- 魯迅。〈編完寫起〉。章錫琛編，《新性道德討論集》。開明書店，1926。
- 。〈狂人日記〉，1918。文學出版社編，《魯迅選集》。文學出版社，1956。
- 。〈祝福〉，1924。文學出版社編，《魯迅選集》。文學出版社，1956。
- 。《兩地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 (唐俟)。〈我之節烈觀〉。《新青年》，第5卷，第2期(1918)。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唐俟)。〈隨感錄四十〉。《新青年》，第6卷，第1期(1919)。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中國婦女出版社，1981。
- 〈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章程附〉。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
- 錢理群。《周作人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鮑家麟。〈秋瑾與清末婦女運動〉。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稻鄉出版社，1992。
- 薛維維。《中國婦女名人錄》。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
- 謝冰瑩。《女兵自傳》。良友圖書公司，1936。

- 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及其活動與影響〉。《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4期(1996)，頁63–86。
- 謝德銑。《周建人評傳》。重慶出版社，1991。
-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第1卷，第4期(1919)，頁623–632。
- 羅義俊編。《評新儒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 羅蘇文。〈中國第一所自辦女校〉。《社會科學》(上海)，第2期(1988)，頁144–146。
- 。《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辭書出版社，1980。
- 蘇平。《蔡暢傳》。中國婦女出版社，1990。

### (3) 英文文獻 (按字母排序)

- Anderson, Kathryn, Susan Armitage, Dana Jack, and Judith Wittner. "Beginning Where We Are: Feminist Methodology in Oral History." In *Feminist Research Methods*, edited by Joyce McCarel Nielsen. Westview Press, 1990.
- Andors, Phyllis. *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 1949–1980*.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Barlow, Tani E. "Theorizing Woman: *Funü, Guojia, Jiating*." In *Body, Subject, and Power in China*, edited by Angela Zito and Tani E. Barlo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Bellamy, Edward.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Penguin Books, 1986.
- Bergère, Marie-Clai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Butler, Judith, and Joan W. 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Routledge, 1992.
- Chan, Ching-kiu Stephen. "The Language of Despair: Ideologica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New Women' by May Fourth Writer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4, no. 1/2 (1988): 19–38.
- Chang, Pang-Wei Natasha. *Bound Feet and Western Dress*. Anchor Books, 1996.
- Chao, Buwei Ya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Woman*. Translated by Yuenren Chao. John Day Company, 1947.
-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Cott, Nancy F.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a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1780–1835*.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roll, Elisabeth. *Feminism and Socialism in China*.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

- Diamond, Irene, and Quinby Lee, eds. *Feminism and Foucault: Reflections on Resistanc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8.
- Duara, Prasenjit.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Translated by Gary G. Hamilton and Wang Zh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Feigon, Lee.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Flax, Jane. "The Play of Justice." In *Disputed Subjects: Essays on Psychoanalysis,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Routledge, 1993.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antheon Books, 1972.
- Furth, Charlotte,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Gilmartin, Christina Kelley. "Gender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mmunist Body Politic." *Modern China* 19, no. 3 (1993): 299–329.
- .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Gluck, Sherna Berger, and Daphne Patai, eds. *Women's Words: The Feminist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 Routledge, 1991.
- Goodman, Dena. "Women and the Enlightenment." In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edited by Renete Bridenthal, Susan Mosher Stuard, and Merry E. Wiesner.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8.
- Grieder, Jerome B.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1917–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John Wiley and Sons, 1964.
- Hsieh, Ping-ying.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Girl*. Pandora Press, 1986.
- Ip, Hung-yok. "More Than Ideological Being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94.
- Johnson, Kay Ann. *Women, the Family, and Peasant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Judge, Joan. "Knowledge for the Nation or of the Nation: Meiji Japan and the Changing Meaning of Female Literacy in the Late Qing." Paper presented at a workshop on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Qing Dynasty,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4 October 1997.
- Kerber, Linda K., Alice Kessler-Harris, and Kathryn Kish Sklar, eds. *U.S. History as Women's History: New Feminist Essay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5.

- Kingston, Maxine Hong.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Knopf, 1976.
- Library of Congress.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U.S.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1943.
-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Rebecca Karl, and Dorothy Ko, eds. *The Birth of Chinese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 Femi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 Lo, Jung-pang, ed. *K'ang Yo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67.
- Mote, Frederick W. *Intellectual Foundations of China*. McGraw-Hill, 1989.
- Nivard, Jacqueline.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 no. 1 (1984): 37–55.
- Rabinow, Paul, ed. *The Foucault Reader*. Pantheon Books, 1984.
- Rosenberg, Rosalind. *Beyond Separate Spheres: Intellectual Roots of Modern Femin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 Russell, Dora. *The Tamarisk Tree: My Quest for Liberty and Love*. Elek/Pemberton, 1975.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Vintage Books, 1979.
- Schreiber, Adele, and Margaret Mathieson. *Journey Towards Freedom: Written for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International Alliance of Women, 1955.
-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 *Time for Telling Truth Is Running Out: Conversations with Zhang Shenfu*.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chwartz, Benjamin.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 Scott, Joan W. “Experience.”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Routledge, 1992.
- Sievers, Sharon L. *Flowers in Salt: The Beginning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olomon, Barbara Miller. *In the Company of Educated Women: A History of Women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pence, Jonathan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W. W. Norton, 1990.
- Stacey, Judith. *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 Stewart, Abigail J., and Joseph M. Healey Jr. "Linking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4, no. 1 (1989): 30–42.
- Tilly, Charles. *Big Structures, Large Processes, Huge Comparison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4.
- Wang, Zheng. *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 Weedon, Chris.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7.
- Weisberg, D. Kelly. "Barred from the Bar: Women and Leg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890." *Journal of Legal Education* 28, no. 4 (1977): 485–507.
- Witke, Roxane H. "Transformation of Attitudes Towards Women during the May Fourth Er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71.
- Woloch, Nancy. *Women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McGraw-Hill, 1984.
- Yosano, Akiko. *Tangled Hair: Love Poems of Yosano Akiko*. Translated by Dennis Maloney and Hide Oshiro. White Pine Press, 1987.
- Young, Marilyn B., comp. *Women in China: Studies in Social Change and Feminism*.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3.
- Yow, Valerie Raleigh. *Recording Oral History: A Practical Guide for Social Scientists*. Sage, 1994.
- Yue, Ming-bao. "Gendering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edited by Lu Tonglin, 47–65.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 Zarrow, Peter G.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Zhang, Naihua. "The All-China Women's Federation, Chinese Women,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1949–1993." Ph.D. diss.,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96.







